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58年 北京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譯出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編譯、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社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譯校过程中参考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900×1220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1\frac{3}{8}$ · 插頁 7 · 字數 485,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3,500 定價(5) 3.30元

統一書號 1001·375

目 录

第四卷說明	VII—XVI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	3—20
第一部分 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鑿語	4
第二部分 “人民論壇报”的政治經济学及其对 “青年美国”的态度	9
第三部分 形而上学的夸大	12
第四部分 向宗教諂媚	14
第五部分 克利盖个人的言論	19
弗·恩格斯。普魯士宪法的破坏	21—22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布魯塞尔共产主义通訊	
委员会給古·阿·克特根的信	23—25
弗·恩格斯。普魯士銀行問題	26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布魯塞尔的德国民主主 义者—共产主义者給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信	27—29
弗·恩格斯。法国的政府和反对派	30—32
弗·恩格斯。普魯士宪法	33—41
卡·馬克思。駁卡尔·格律恩	42—45
弗·恩格斯。德国的制宪問題	46—65
(一)	46
(二) STATUS QUO [现状]和资产阶級	50

弗·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貿易制度	66—69
卡·馬克思。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	71—198
序言	75
第一章 科学的發現	77—137
第一节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77
第二节 构成价值或綜合价值	88
第三节 价值比例規律的应用	118
甲、貨幣	118
乙、劳动的剩余	127
第二章 政治經濟学的形而上学	138—198
第一节 方法	138
第一个說明	139
第二个說明	143
第三个說明	144
第四个說明	145
第五个說明	147
第六个說明	149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說明	153
第二节 分工和机器	158
第三节 竞争和垄断	172
第四节 土地所有权或地租	180
第五节 罢工和工人同盟	191
弗·恩格斯。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資產阶级的 现状	199—206
卡·馬克思。“萊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	207—222
弗·恩格斯。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223—275

一 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 诗歌	223—243
二 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論歌德”	244—275
弗·恩格斯。經濟学家會議	276—281
卡·馬克思。保护关税派、自由貿易派和工人階級	282—284
弗·恩格斯。討論自由貿易問題的布魯塞尔會議	285—296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297—315
弗·恩格斯。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运动。爱尔兰	316—318
弗·恩格斯。英国的雇主和工人。致“工場”杂志的 工人編輯	319—321
卡·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 論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駁卡尔·海因岑	322—356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357—374
弗·恩格斯。宪章派土地綱領	375—377
弗·恩格斯。宪章派为 1847 年选举而举行的宴会	378—380
弗·恩格斯。拉馬丁先生的宣言	381—384
弗·恩格斯。瑞士的内战	385—393
弗·恩格斯。法国的改革运动	394—402
弗·恩格斯。宪章运动	403—404
弗·恩格斯。改革派陣营的分裂。“改革报”和“国民报”。 民主主义的胜利	405—408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論波兰。1847 年 11 月 29 日 在倫敦举行的紀念 1830 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 的演說	409—412
馬克思的演說	409

恩格斯的演說	410
弗·恩格斯。紀念 1830 年波兰革命	413—415
卡·馬克思。駁阿·巴泰尔斯	416—417
卡·馬克思。拉馬丁和共产主义	418—419
弗·恩格斯。“改革报”和“国民报”	420—422
弗·恩格斯。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說	423—426
弗·恩格斯。宪章派的鼓动	427—429
弗·恩格斯。“滿意的”多数派議員。基佐的“改革”方案。 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古怪見解。民主派在沙隆举行的 宴会。賴德律-罗兰先生的演說。民主派大会。弗洛孔 先生的演說。“改革报”和“国民报”	430—437
弗·恩格斯。爱尔兰特別法和宪章派	438—440
弗·恩格斯。菲格斯·奥康瑙尔和爱尔兰人民	441—443
卡·馬克思。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1848 年 1 月 9 日發表 于布魯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	444—459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461—504
(一)資产者与无产者	465
(二)无产者与共产党人	479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491
1. 反动的社会主义	491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491
(乙)小資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493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495
2. 保守的或資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493
3.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499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502
弗·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	505—515
弗·恩格斯。奥地利末日的开端	516—523
卡·马克思。2月6日的“社会辩论报”论民主协会	524—527
弗·恩格斯。三个新宪法	528—53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论波兰问题。1848年2月 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两周年紀念 大会上的演說	534—541
马克思的演說	534
恩格斯的演說	537
弗·恩格斯。致“改良报”	542—544
弗·恩格斯。巴黎的革命	545—548
弗·恩格斯。給“北極星报”編輯的信	549—554
卡·马克思。給“改革报”編輯的信	555—557
卡·马克思。外国人在布鲁塞尔所受的迫害	558—560
弗·恩格斯。比利时的状况	561—562

补 遺

弗·恩格斯。英国谷物法史	563—568
--------------------	---------

附 录

马克思所做的关于1847年8月5日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 布鲁塞尔支部和区部的记录	571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572—577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致倫敦“民主派兄弟协会”	578—580

摘自“德意志—布魯塞爾報”關於民主協會 1848 年 2 月 20 日 會議的報道	581
致“北極星報”編輯、倫敦“民主派兄弟協會”書記朱利安· 哈尼先生	582—583
致法蘭西共和國公民們和臨時政府委員們	584—585
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 1848 年 3 月 3 日的決議	586—587
共產主義者同盟巴黎支部 1848 年 3 月 8 日會議記錄	588—589
共產主義者同盟巴黎支部 1848 年 3 月 9 日聯席會議記錄	590—591
注釋	595—634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業年表	635—643
人名索引	644—663
期刊索引	664—666
譯後記	667

插 圖

弗·恩格斯對 1847 年 4 月 11 日聯合省議會在柏林開幕時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發表御前演說所作的諷刺畫	37
卡·馬克思“哲學的貧困”第一版的封面	73
“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的一頁，載有卡·馬克思所著“萊茵 觀察家’的共產主義”一文和弗·恩格斯的“詩歌和散文中 的德國社會主義”篇首部分	208—209
“共產黨宣言”第一版的扉頁	463
“共產黨宣言”原稿的一頁	483
“共產黨宣言”1848 年版的封面（30 頁本）	492—493

第四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收集了他們在 1846 年 5 月至 1848 年 3 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馬克思主義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时期已基本完成。从此馬克思主義便成了工人階級的已經形成的、不斷發展的科學世界觀，成了工人階級在爭取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會和爭取共產主義的鬥爭中的強大的思想武器。这一时期的著作“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正象弗·伊·列寧所說，已經是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了。

在收入本卷的著作中，對構成科學共產主義的哲學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的主要之點，已經有了闡明。由於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係，和批判地研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著作，这个时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組成部分即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方面有了新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對工人革命運動經驗的理論概括，愈益明確地表述了馬克思主義中的主要問題，即關於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締造者——無產階級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作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工人階級實現其歷史使命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手段的原理。他們提出了一系列關於無產階級政黨、關於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策略的極其重要的理論原理。

科學共產主義的形成，是和馬克思恩格斯在歐洲許多國家資

产階級民主革命已成熟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实际的革命活动密不可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他們所领导的布魯塞尔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巩固了同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的联系，他們对宗派主义和各种幼稚的烏托邦的思想影响进行了斗争。馬克思和恩格斯活动的結果，1847年夏天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組織。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馬克思主义創始人所爭取建立的革命的无产階級政党的萌芽。

本卷开头第一篇文章“反克利盖的通告”是批判小資产階級流派之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馬克思主义在同这些流派进行不可調和的斗争中为自己敷設了通向无产階級群众的道路。在这篇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克利盖企圖把共产主义学說归結为关于爱的多情善感的言詞，把共产主义变成一种新宗教。馬克思和恩格斯无情地嘲笑了克利盖之类的小資产階級思想家們的空想和玩弄辞藻的把戏，尤其是嘲笑了克利盖想把美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描繪成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企圖，同时馬克思和恩格斯也以唯物主义的冷靜态度（按照弗·伊·列宁的評价）肯定了这类小資产階級民主运动的真正进步內容。“馬克思的辯証的和革命式的批判，去掉了庸俗学說的外壳，剝露出‘攻击土地私有制’和‘抗租运动’的健康的內核。”（“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三卷第255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克利盖的批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魏特林的粗鄙的平均主义的空想共产主义的批駁，魏特林的观点阻碍了德国工人階級觉悟的提高。

恩格斯在“德国的制宪問題”这篇我們所得到的不完全的手稿里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进步的資产階級的要求，这正合

反动的封建专制集团的心願。在这篇著作里恩格斯根据对德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情况的分析，拟定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革命策略。

在“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这篇評論中，恩格斯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美学观点，奠定了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評的基础。恩格斯尖銳地指責了在文学中的一切小市民的狹隘性、多愁善感、庸俗、市儈气、小心翼翼地有产者諂媚的行为。恩格斯強調說，进步的作家和詩人应当是进步思想和革命斗争的喉舌，应当歌頌“倔强的、威严的和革命的无产者”。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想用小市民的尺度来衡量伟大的德国作家歌德的創作的企圖进行了致命的批評。恩格斯在評述歌德的創作中，做出了研究文学的复杂現象的范例，揭示了作家的世界觀和他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間的联系，指出了歌德著作中的矛盾方面，說明了它們的真正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之所在。

1847年夏天問世的卡·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是馬克思主义的極其重要的理論著作之一。在这部哲学兼經濟学的著作里，馬克思第一次以論战的形式在报刊上詳細地闡述了他关于社会发展規律的唯物主义学說的基础；闡述了他在政治經濟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在这部著作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策略的創見。

“哲学的貧困”是为了反对蒲魯东主义而写的。蒲魯东主义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世界觀的矛盾和空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意向；它力圖摆脱资本主义發展給它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同时又要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經濟基础——生产資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馬克思証明，要在资本主义关系的范围内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

的任何計劃都是站不住腳的，這就給整個改良主義的思想體系以打擊，抱有改良主義思想的人們企圖用細小的改良的綱領引誘工人階級脫離社會主義革命鬥爭。

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方法的同時，在“哲學的貧困”中捍衛並發展了新的科學的無產階級世界觀。

馬克思在這部著作里比自己先前的著作更全面更深刻地論證了他的辯證方法。馬克思和把真實的現實描寫成“絕對觀念”的體現的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相反，他把觀念、抽象、邏輯範疇看成是現實世界中所發生的客觀的、不以人們的意志和意識為轉移的辯證過程的反映。

在“哲學的貧困”里馬克思在闡明物質生產發展的客觀規律方面前進了一大步。馬克思在揭示“生產力”這個概念的內容時，指出它不僅包括生產工具，而且還包括勞動者本身；“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見本卷第 197 頁）。馬克思指出生產力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揭示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辯證關係和相互作用。他證明，在階級社會的一定發展階段，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所發生的對抗性矛盾，使階級鬥爭尖銳化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使新的更先進的生產方式通過革命來代替舊的生產方式。只有在沒有階級對抗的社會主義社會里“社會進化將不再是政治革命”（見本卷第 198 頁）。

在“哲學的貧困”里馬克思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後來又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這一天才著作中對這門科學做了詳細的研究。馬克思駁斥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關於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是永恆的不可動搖的這種形而上學的觀念。馬克思用唯物主義辯證法分析了經濟的現實，從而揭露了資本主義經

济关系的对抗性和历史短暫性。

馬克思从新的真正科学的立場出發，考察了产生資本主义社会的条件，闡明了大机器工业在資本主义發展中的作用，分析了資本主义生产的許多方面：竞争、資本主义的分工。馬克思指出，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有机地联系着的，技术方面的每一項巨大的發明都使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加剧起来。馬克思強調說，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危机、群众的貧困化是資本主义必不可免的伴侶；他揭露了雇佣劳动制度的剝削实質，大体上表述了資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規律，指出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在产生財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貧困”（見本卷第 155 頁）。

在“哲学的貧困”里拟定了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貨幣、工資、利潤、地租等学說的一些初步原理。馬克思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的深刻思想，他認為在資產階級社会的条件下土地国有化是最徹底的資產階級措施。

馬克思在“哲学的貧困”以及“保护关税派、自由貿易派和工人階級”和“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里，提出了研究剩余价值理論的初步原理。50 年代末馬克思建立了这一理論的完备形式。在这以前所写的著作（“哲学的貧困”等）里，馬克思还使用“劳动价值”，“劳动价格”这样一些概念，正如恩格斯后来在給馬克思的“雇佣劳动和資本”一書所做的序言中指出的，这些概念“从晚期著作的观点来看，是不确切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后来馬克思确定了工人出卖給資本家的不是自己的劳动，而是自己的劳动力，因此他用“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概念代替了“劳动价值”和“劳动价格”的概念。

馬克思在“哲学的貧困”里把他关于工人階級革命运动的伟大

历史意义的結論加以具体化，同时指出經濟斗争、罢工、工人同盟（工会）在团结和以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群众的过程中的作用。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思想：无产阶级应当具有阶级觉悟，社会主义的觉悟，应当了解自己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革命作用，或者如馬克思所說的，应当由“对資本說来已經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的群众变成“自为的阶级”（見本卷第196頁）。馬克思表述了关于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統一的重要原理，并且強調指出，在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中，政治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統治具有决定的意义。

本卷收入了恩格斯在宪章派报纸“北極星报”和法国民主主义报纸“改革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和通訊。在政論性的文章中具有特別重大意义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魯塞尔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这一报纸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战斗的机关报。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視着国际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在报上評論当时的一切巨大事变，对无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許多重要問題上的立場加以論証，并同敌視无阶级的思想体系进行斗争。

在“‘萊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这篇文章里，馬克思揭露了打着基督教社会主义旗帜的普魯士封建反动派的代表人物迷惑人民群众的勾当。在馬克思的文章“拉馬丁和共产主义”、“駁阿·巴泰尔斯”和恩格斯的文章“討論自由貿易問題的布魯塞尔會議”、“拉馬丁先生的宣言”里，資本主义的辯护人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遭到了严厉的抨击，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关于共产主义的臆想遭到了駁斥。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布魯塞尔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給

古·阿·克特根的信和“布魯塞爾的德國民主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給菲格斯·奧康瑙爾先生的信”、弗·恩格斯發表在“改革報”上的關於英國憲章運動的通訊，以及當時的其他文章和文獻里，都包含着要無產階級的民主的力量實行國際合作和團結一致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贊同無產階級革命者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聯盟，但同時也批判了後者的落後觀點和幻想。在“路易·勃朗在第七戒宴會上的演說”一文中恩格斯寫道：“沒有批評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談不到團結”（見本卷第 423 頁）。在這篇文章中恩格斯堅決地駁斥了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和其他法國小資產階級活動家所宣揚的世界主義觀點。

在恩格斯所著的“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和馬克思所著的“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里，揭露了德國小資產階級激進派的狹隘性和不徹底的民主主義，尤其是他們對德國的集中和統一的必要性的無知。在同海因岑的論戰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捍衛並論證了科學共產主義的原則。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 1847 年 11 月 29 日關於波蘭的演說和他們 1848 年 2 月 22 日關於波蘭問題的發言里，在恩格斯的“奧地利末日的開端”、“菲格斯·奧康瑙爾和愛爾蘭人民”以及其他著作里，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提出了一系列關於民族問題的重要思想，宣布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他們贊同工人階級堅決援助波蘭、意大利、愛爾蘭和其他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做法，表述了著名的原理：“任何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別的民族時，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見本卷第 410 頁）。

恩格斯的“普魯士憲法”、“法國的改革運動”、“瑞士的內戰”、“1847 年的運動”等文是分析革命前夕許多歐洲國家的社會環境

和政治情况的。恩格斯在“巴黎的革命”一文中評論了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提出了为建立德意志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

本卷中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的手稿，反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为制定形成中的共产主义政党的綱領而进行的工作。恩格斯在这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綱領草案的草稿中，从理論上論証了无产階級政党的某些極其重要的綱領性的和策略性的原則。在恩格斯的这篇著作里拟定了取得政权的无产階級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应实行的措施。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包含着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內获得胜利的著名公式。这个对垄断前的資本主义來說是正确的公式，在垄断資本主义时代就过时了，因为各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濟和政治的不平衡的和跳跃式的發展規律，預先决定了无产階級革命的成熟時間在不同的国家里是各不相同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恩格斯的这个过时的原理，为弗·伊·列宁的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內获得胜利和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切国家或大部分国家內同时获得胜利这一新的原理所代替。

本卷中收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朽著作“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是他們在1848—1849年革命以前的那个时期內所完成的一切科学和政治創作的最高成就。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綱領性的文献。它完整而严密地闡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学說的基础。“在这部著作里極其清楚而鮮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觀，叙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內的徹底的唯物主义，叙述了作为最完备最精深的發展学說的辯証法，叙述了关于階級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創造者无

产阶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使命的学说。”（“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32頁）

在“共产党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証明了資本主义必定崩潰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他們以此武装了无产阶级，規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任务和目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象一条紅綫貫穿了整个“宣言”，弗·伊·列宁称这一思想为“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問題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389頁）。虽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还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但却清楚地表述了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的实质。他們指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見本卷第489頁）。

“共产党宣言”中給国家的实质下了真正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定义。“宣言”的作者指出，“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乃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組織的暴力”（見本卷第491頁）。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少数剝削者镇压多数被剝削者的工具之后強調說，工人阶级在夺得国家政权之后，应当利用政权为極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而制服一小撮剝削者的反抗，建立沒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共产党宣言”里馬克思和恩格斯給工人阶级指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建設共产主义。他們預見到，共产主义革命将消灭任何剝削和阶级对立，消灭任何社会的、政治的和民族的压迫，这一革命将导致建立一个“以各个人自由發展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条件”的社会（見本卷第491頁）。科学共产主义的創始人有先見之明地預言說，工人阶级的胜利不仅会达到消灭人剝削人的現象，

而且会使人类摆脱民族间的对抗和敌对关系，摆脱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各民族间的血腥的战争。

在“共产党宣言”里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沒有它工人阶级就不能夺得政权和实现社会的改造这一基本原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拟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时指出，必須使无产阶级争取最近目的的斗争服从于它争取最终目的的斗争的利益，必須使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共同任务相结合。他们论证了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各个不同阶级和政党的关系的指导原则，强调指出共产党人有责任支援一切革命的和进步的运动，同时对运动的弱点和缺点提出批评。

“宣言”的作者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伟大的号召清楚地表明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思想。

“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斯大林)

* * *

本卷收集了全集第一版沒有編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 27 篇著作。其中弗·恩格斯的三篇文章的俄譯文于 1940 年刊載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4 期上，他的另外三篇在以前历次發表馬克思主义創始人的遺著时都未編入过的文章，刊載在 1955 年“历史問題”杂志第 11 期上；其余的几篇都是第一次用俄文發表，这点在各該篇末已注明。

在本卷的附录中編入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还有一系列反映他們的实际革命活动的文献。

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46年5月—1848年3月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反克利盖的通告¹

在共产主义者恩格斯、日果、海尔堡、馬克思、載勒尔、魏特林、馮·威斯特华倫和沃尔弗出席参加的會議上，关于紐約出版的德文報紙

海尔曼·克利盖主編的“人民論壇报”²

大家（除魏特林一人“投反对票”外）一致通过了如下的決議，并附論据。

决 議

（1）“人民論壇报”主笔海尔曼·克利盖在該报上所宣传的傾向不是共产主义的。

（2）克利盖用以宣传这种傾向的幼稚而夸大的方式，大大地損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因为克利盖算是德国共产主义在紐約的著作界代表。

（3）克利盖在紐約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誕的伤感主义的梦囈，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們的意志頹废。

（4）本決議連同論据将分發給在德国、法国及英国的共产主义者。

(5) 本決議送交“人民論壇報”編輯部一份，要求該報在最近几号上將此決議連同論据一并發表。

恩格斯、菲·日果、路易·海爾堡、
卡·馬克思、戴勒爾、馮·威斯特華倫、沃尔弗
1846年5月11日于布魯塞爾

第一 部分

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囈語

“人民論壇報”第13号上刊登了一篇題为“告妇女書”的文章。

(1) “妇女是爱的祭司”。

(2) “送我們到这里来的是爱”。

(3) “爱的使徒”。

(a) 文学的插曲：“閃閃發光的仁慈的眼神”；“真理的声音”。

(b) 虛伪粗鄙的向妇女 *captatio benevolentiae* [討好的企圖]：
“你們即使穿着女王的服装也仍旧是**妇女**……你們也沒学会用不幸者的眼泪来哄人。你們的心腸太軟，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讓不幸的孩子餓死在**母亲**手里。”

(4) “可爱的小宝宝的未来”。

(5) “相亲相爱的姊妹們”。

(6) “啊，請听一听我們的話，假使你們不这样做，你們就会背叛爱”。

(7) “爱的”。

(8) “用爱”。

(9) “为了爱”。

(10)“我們向你們乞求(泣訴)^①的最神聖的爱的事业”。

(c)美文学和聖經上的庸俗論調：“妇女命定生产人类的兒女”，这等于指出：男人不能生孩子。

(11)“充滿爱的心灵必然發展成共性的聖灵”。

(d)插曲式的 Ave Maria [福哉，馬利亚]^②：“女人們，你們有福了，你們三倍地有福了，因为你們命定要給早已預言过的幸福王国以第一次聖化。”

(12)“相亲相爱的姊妹們”。

(13)“不是爱而是恨”（資產階級社会跟共产主义社会的对比）。

(14)“啊，亲爱的！”

(15)“把爱送上宝座”。

(16)“由互爱而結合起来的積極的人們”。

(17)“爱的真正祭司”。

(e)美学的插句：“假如你們胆怯的心灵还没有忘記作出几次美妙的飞翔”（这是能否实现尚待証明的魔术）。

(18)“爱的世界”。

(19)“恨的王国和爱的王国”。

(f)欺騙妇女的企圖：“因此你們在政治上占有举足輕重的地位，只要你們利用自己的影响，整个腐朽的恨的王国就会垮台而讓位給新生的爱的王国”。

(g)旨在压倒理智声音的哲学喇叭声：“讓全人类永远安然自得，这就是你們活动的最終目的。”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譯者注

② 天主教祷告的头一句。——編者注

(20)“你們的愛”。這是向婦女要求“最熱烈的”愛的借口，以便她們“一視同仁地把愛施舍給一切人”。這一要求是既下流的，又非分的。

(h)遁逃曲：“成千上萬被遺棄的孤兒正在消滅他們所處的可怕的环境”。這裡“可怕的”究竟是什麼呢？是“孤兒”消滅“环境”，還是“环境”消滅“孤兒”？

(i)新共產主義政策的表白：“我們不想剝奪任何人的私有財產；讓高利貸者保留已經擁有的財產吧；我們只想防止繼續盜竊國民財產的行為，防止資本以後剝奪勞動的合法財產。”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應該是：“每一個窮人，一旦保證他有從事生產勞動的可能，他立刻就變成人類社會有用的成員。”（根據這種說法，對“人類社會”貢獻最大的就是資產者，包括克利蓋十分憎恨的紐約資產者在內。）“假如社會給他一塊土地，使他能養活自己和家庭，那他就會永遠有這種勞動的機會……如果這巨大的土地（即北美14億英畝國有土地）^①不用來買賣而以一定數量交給勞動人民，那末美國的貧困現象就會一舉而消滅，因為那時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親手來給自己建設不可侵犯的家園了”。本來應該懂得，想用一道法令來阻止克利蓋所期望的宗法制度發展為工業制度，或者使東海岸工商業各州倒退到宗法的野蠻狀態上去，這是立法者辦不到的。可是，為了迎接上述幸福時刻的到來，克利蓋已在準備做如下一種鄉下牧師式的宣教：“那時我們就能教導人們和睦相處，彼此減輕一切生活上的負擔和困難，並且

(21)在大地上建設起第一批充滿天國的愛的村鎮”（每村都恰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譯者注

好占地 160 英亩)。

克利盖在结束对已婚妇女的号召时说：“首先你们要向

(22) 自己亲爱的丈夫，

恳求他们放弃旧的政策……让他们看看他们的孩子，恳求他们为了他们的(蠢人的)^① 孩子们醒悟过来”。其次，他又向“少女们”说：“但愿对于

(23) 你们的爱人来说

土地解放是他们人格的试金石，请不要轻信

(24) 他们的爱，

当他们没有发誓忠实于全人类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少女们举止稳重，那末他就会向她们保证，她们的孩子

(25) “也会和她们(指“天国的鸟”)一样成为富于爱情的人”，

他在结束他那单调的歌曲时又重复谈到

(26) “爱的真正祭司”、“伟大的共性王国”和“圣化”等。

“人民论坛报”第 13 号——“答索尔塔”：

(27) “它(共性的伟大精神)^② 象爱之火，在教友的眼中燃烧”。

(28) “女人如果没有她能爱、能为之献出自己的颤抖的心灵的男人，那她还成什么样子呢？”

(29) “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

(30) “母爱”。

(31) “对人的爱”。

(32) “爱的所有最初的声音”。

(33) “爱的光芒”。

① ②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译者注

(j) 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使“人类的全部生命服从于它(敏感的心)^①的跳动”。

(34) “在金錢声中, 爱的声音沉寂了”。

(35) “爱和自制可以获得一切”。

这样, 单是在这一号报纸中, 約略計算一下, 就可以看到 35 种表現的爱。按照这种談爱的廢話, 克利盖在“答索尔塔”一文中和在別的地方都把共产主义描繪成某种充滿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 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結为几个字: 爱和恨, 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正显示了他的懦弱: 他向高利貸者諂媚, 答应不动已經属于他們的东西; 他發誓說并不想“破坏对家庭生活、国家和民族的依恋”, 只想“实现这种依恋”。說共产主义不是“破坏”, 而是要使現存的腐朽关系以及資产階級对这种关系的一切幻想“实现”的这种懦弱而虛伪的說法, 从头到尾貫串在每一号的“人民論壇报”中。克利盖和政治家們爭論时所持的立場跟这种虛伪和懦弱是相吻合的。他認為(第 10 号上) 写文章反对类似拉梅耐和白尔尼这种醉心于天主教的政治幻想家就是违背共产主义。因此, 象蒲魯东、卡貝、德薩米这样的人, 一句話, 所有的法国共产主义者, 只是“有名无实的共产主义者”。至于德国共产主义者已經远远抛开了白尔尼, 正象法国共产主义者远远抛开了拉梅耐一样, 这一点是克利盖在德国、布魯塞尔和倫敦的时候就應該知道的。

这种爱的墜語将会如何使男女两性都变得神經衰弱, 将会如何使大批“少女”变得歇斯底里和貧血, ——关于这一点, 克利盖自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譯者注

己也該想一想。

第二部分

“人民論壇报”的政治经济学及其 对“青年美国”³的态度

我們完全承認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我們知道，虽然这个运动所力求达到的結果在目前会促进現代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制度的發展，但是它既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成果，是对一般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在美国現存条件下对土地私有制举行的攻击，其結果必然会导向共产主义。克利盖同当时侨居紐約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了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竟用一些流行的共产主义术语和华丽的詞句粉飾这个簡單的事实，而不去深入考察运动本身的内容。于是他就証明，他完全不清楚“青年美国”和美国社会环境之間的联系。除了上面已經引証过的那些地方以外，我們現在还要举出一个例子，說明他如何用使全人类获得幸福这种华丽的詞句来裝飾土地运动中提出的美国地产析分計划。

在“人民論壇报”第10号上所載的“我們要求的是什么”一文中說道：

“他們(即美国民族改良派)^①称土地为全人类的公共财产……并要求国民立法机关設法把尚未落入强盜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14亿英亩土地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讓渡的公共财产。”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譯者注

于是他为了替“全人类保留”这个“不可讓渡的**公共財產**”就接受了民族改良派的計劃：“每一个农民，不管来自哪一个国家，都分給他 160 英亩的美国土地供其維持生活。”在該报第 14 号上所載的“答孔策”一文中，这个計劃是这样說明的：

“任何人均不得从这一尚未动用的国民財產中領取160英亩以上的土地，而且領取这 160 英亩也只能限于自耕。”

于是，为了把土地留做“不可讓渡的**公共財產**”，而且是全人类的財產，就應該立刻先分配这些土地。克利盖以为他能用一項法令来禁止这种分配所發生的必然后果，即土地集中、工业进步等等。他把每 160 英亩土地都看成一样的，似乎这份土地的价值并不因質量而有所不同。“农民”自己将和其他人进行交換，不是交換土地，便是交換土地的产品。那时，很快就会發生这种情况：一个“农民”即使沒有資本，但由于他的劳动和他的 160 英亩土地的天然肥沃，就会使另外一个农民变成他的雇农。其次，不論“落到强盜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是“土地”还是土地产品，难道不是一样嗎？

讓我們仔細研究一下克利盖送給人类的这份礼物吧。

14亿英亩土地應該“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讓渡的**公共財產**”。同时，每一个“农民”應該領到 160 英亩土地。因而我們可以計算一下，克利盖的所謂“人类”有多大，不多不少，恰好 875 万“农民”，或者按每家平均五口人計算，一共有 4 375 万人。同样，我們可以計算一下，“无产階級以人类的身份应占有全部土地”（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的这个“永久时期”能延长多久。假如美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以前一样（即每 25 年增加一倍），这个“永久时期”就不会滿 40 年。这 14 亿英亩在 40 年內会全被占完，而下一代也就沒有

什么可“占”了。况且无偿地發給土地必然会使移民人数激增，所以克利盖的所謂“永久时期”可能結束得更早，何况这只能供 44 亿人用的土地連疏散現在欧洲的赤貧者也是不够的。欧洲每十个人中有一个赤貧者：单是不列顛島就有 700 万赤貧者。我們在第 13 号上的“告妇女書”一文中也可以看到同样违背政治經濟学的幼稚見解，克利盖在該文中說，如果紐約市把长島的 52 000 英亩土地交出来，这就“馬上”可以永远消除紐約的一切貧穷、困苦和犯罪現象。

如果克利盖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作无产階級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的初步形式，如果他認為这个运动由于發动它的那个階級的生活状况必然会發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他說明为什么美国共产主义最初應該以似乎和共产主义相矛盾的土地运动形式出現，那末他的意見也就沒什么可反对的了。但克利盖却把某些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一般人的事业。克利盖把这件事說成一切运动的最終的最高的目的（虽然他知道这是违反真实的），从而把运动的特定目标变成十分荒唐的胡說。

他在第 10 号的同一篇文章中唱着这样的凱歌：

“这样，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梦想就会实现，大洋的这边会給他們准备好土地，他們只要把这塊土地拿来并用自己双手的劳动使它肥沃起来，就可以在世界一切暴君面前自豪地声称：

这就是我的小屋，
而你們从来没有建造过，
这就是我的家园，
它使你們的心充滿羡慕。”

克利盖还可以补充一句：这就是我的一堆糞便，是我自己、我

老婆、我的孩子、我的雇农和我的牲畜拉出来的。究竟哪些欧洲人认为这是实现他们的“梦想”呢？决不是共产主义的工人！也许是那些希望在美国碰上好运重新成为小资产者和农民的破产的小店主、师傅和农民吧！用这 14 亿英亩来实现的“梦想”究竟是什么？无非是把一切人变成私有者而已。这种梦想就象梦想把一切人变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最后我们再引一段话来看看克利盖究竟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和經濟关系的：

“每一个人必须在每一种行业里至少学会这样一种技巧，使他（万一有什么不幸使他离开人类社会）必要时可以不靠旁人的帮助而能生活一个时候。”

不消說，“大談”其“愛”和“克己”，比起研究现实关系的發展和实际問題要容易得多。

第三部分 形而上学的夸大

“人民論壇报”第 13 号刊载了“答索尔塔”一文。

(1) 克利盖在这篇文章中說他“不习惯在抽象的不毛之地上玩弄邏輯的戏法”。但每一号“人民論壇报”都証明克利盖正是用哲学的和情感的詞句玩弄“戏法”，虽然不是“邏輯的”戏法。

(2) 克利盖用下面非邏輯的“戏法”来表达“每一个人单独生活”（簡直是廢話）的論点：“现在整个人类只是体现在个体中。”

(3) “事物现状的終止”必然取决于“人类創造精神的意旨”（这种精神根本就不存在）。

(4) 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这样的：“他身上带有人类的烙印

(現在对誰不能这样說呢?)^①, 按照人类的目标来确定自己的目标(似乎人类是一个可以有自己目标的人!)^② 并且只是为了有可能将目前和未来的他全部献給人类, 才力圖完全成为他自己”(在一种虛幻的怪影面前的完全自我牺牲和自卑自賤)。

(5)对个人跟人类的关系問題也是用下面的夸张的蠢話来表达的:“我們大家就如同我們个人的活动一样, 只是人类內部深处所發生的伟大运动的征兆。”“人类內部深处”, 这究竟是哪里呢? 这样說来, 具体的人只是虛幻世界“內部”所發生的“运动”的“征兆”和标记。

(6)这位乡下牧师把爭取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变成“对那种共性的伟大精神的探求”。他使这种“伟大精神”“在聖餐杯中發出色彩奇异的光輝”并象“聖灵”一样“在教友眼中發光”。

既然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被这样变成“探求”聖灵和聖餐, 当然, 克利盖也可以說, “只需要認識”这种精神, 就能“用爱把所有人团结起来”。

(7)在这个形而上学的結論未做出以前, 是把共产主义和聖餐[⊖]混为一談:“征服世界的精神, 支配風暴和雷雨的精神(!!!!), 治好盲人和癲疯病患者的精神, 讓世人同喝一种酒(我們要喝各种各样的酒)^③ 和同吃一塊面包(法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者的要求是更高的)^④ 的精神”, “永恒的和无处不在的精神, 就是共性精神”。如果这种精神确实是“永恒的和无处不在的”, 那就完全不能理解, 按照克利盖的說法怎么来解释私有制的长期存在。的确, 这种精

⊖ 俏皮話: «Kommunismus»——“共产主义”, «Kommunion»——“聖餐”。——編者注

① ② ③ ④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譯者注

神还没有被“認識”，所以它仅仅在克利盖个人的想象中是“永恒的和无处不在的”。

由此可見，这里克利盖是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是和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信念，即对“共性的聖灵”的信念，这正是共产主义为求本身实现时最不需要的东西。

第四部分 向宗教諂媚

不言而喻，克利盖关于爱的高談闊論和对利己主义的攻击，正是浸透了宗教思想的那种心情的大言不慚的表白。我們很快就会看到，在欧洲經常冒充无神論者的克利盖如何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贩卖基督教的肮脏貨色，其結果必然是完全自甘墮落。

在第 10 号上登載的“我們要求的是什么”和“海尔曼·克利盖致哈罗·哈林”等文章中說，共产主义斗争的目的是：

(1)“使爱的宗教成为真理，使人們期待已久的有福的天国居民的共同体变成现实”。克利盖却没有發現，这些基督教的幻想只是現存世界虛幻的反映，因此它們的“现实性”已經表現在这一現存世界的丑恶的关系中。

(2)“为了这个爱的宗教，我們要求：餓的人有飯吃，渴的人有水喝，裸体的人有衣穿”。一千八百年来这种要求已經重复得令人厭煩然而毫无成就。

(3)“我們教会人們表現爱”，为了

(4)“領悟爱”。

(5)“在他们的爱的王国不可能有任何鬼怪”。

(6)“他的(人的)^①最神聖的要求就是完全把个人融在相爱者的社会中,对这些人他决不保留其他任何东西,除了

(7)他那无限的爱”。可以设想,在这种无限性中,爱的理論达到了最高点,似乎没有什么比这点更高的东西了;然而事实上却还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东西。

(8)“这种爱的热情的流露,舍己为人的决心,对共同体的神聖的渴望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共产主义者最隱蔽的宗教,这种宗教只是缺乏相应的外部世界借以在整个人类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就是了”。但是,現在的“外部世界”显然是使克利盖完全有可能把他的“最隱蔽的宗教”、他的“神聖的渴望”、他的“舍己为人的决心”、他的“热情的流露”,在“整个人类生活中”最充分地“表现出来”的。

(9)“难道我們就不能严肃地对待长期受抑制的宗教心的激动,不能为彻底实现穷人、不幸者、被压迫者的兄弟友爱的乐园而斗争嗎?”于是克利盖就开始为严肃地对待心的激动而斗争,但这个心不是寻常的、卑鄙的,而是宗教的;这个心不是因现实的貧困而变得残酷的,而是充滿幸福的幻想的心。他象牧师一样在这里替别人說話,就是說替“穷人”說話,来証明他的“宗教心”。因此他一开始斗争时,就向人表明,他本人并不需要共产主义,他之所以参加斗争只是由于他对“穷人、不幸者、被压迫者”的寬宏大量的、自我牺牲的、含糊不清的忘我精神,因为这些人需要他去帮助。在孤寂和憂郁的时刻,这种崇高的情感就充滿这位善良人的心,成为他消除万恶世界一切不幸的灵丹。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譯者注

(10)克利盖在結束他那激动人心的冗长的演說时說：“对于不支持这种政党的人們，完全可以把他們当作人类的敌人。”这种十分过激的詞句似乎和“舍己为人的决心”以及对一切人的“爱的宗教”相矛盾。但它确是这种新宗教的完全必然的結論，因为新宗教和别的宗教一样，也極端仇視并迫害自己的敌人。政敌在这里也就很自然地变成了异教徒，因为实际存在的政党所反对的敌人已变成了对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人类”有罪的应受惩治的罪人。

(11)在給哈罗·哈林的信中說道：“所有穷人都在瑪門^①的压迫下痛苦呻吟，我們号召他們起来反对瑪門，当我们把可怕的暴君从他的古老的王座上推倒时，我們要用爱把人类联合起来，教会人类共同劳动和共同享用劳动果实，使早就預言的乐园终于来临。”为了对現在的金錢权力充滿义憤，克利盖首先就得把金錢权力变成瑪門偶像。这个偶像一定会被打倒，至于怎样打倒，那暂时还不知道。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縮小为单独的起义，打倒这个偶像以后，就会有預言家（“我們”）出現，为的是“教会”无产阶级以后該怎样做。这些預言家将“教会”当时很不了解本身利益的徒众，怎样“共同劳动和共同享用劳动果实”，而且并不是为了什么“共同劳动和共同享用劳动果实”，主要是为了实现聖書的預言，使一千八百年前一些空想家的預言不致落空。这种采取預言的作法在其他地方，例如在第8号上“什么是无产阶级？”和“安得列阿斯·迪奇”等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下面就是例子：

(a)“无产者，你們解放的时刻到了”。

(b)“千万顆心愉快地跳动着去迎接实现誓言的伟大时代”，

① 財神之意。——譯者注

即“伟大的爱的王国……期待已久的爱的王国的来临”。

(c)在第12号“答神甫的敌人科赫”中说：

“永恒救世的福音被人急速地口口相传”甚至“手手相递”。“急速传播福音”这种奇迹以及关于“永恒救世”的这种胡说，完全符合另一种奇迹，即古代传道师的早已遭到摈弃的预言却出乎意料地开始由克利盖实现了。

(12)如果从这一宗教观点出发，那末对一切实际问题的答复就只能是一些使任何一种意义都模糊不清的宗教的夸张形象，一些华丽的标记如“全人类”、“人道”、“人类”等等；这只会使一切实际问题变成虚幻的词句。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第8号“什么是无产阶级？”一文中。下面是对标题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无产阶级，这就是人类。”简直是故意说谎，这样说来共产主义者倒似乎想消灭人类。“人类”这一答复不正象西哀士对“什么是第三等级？”⁴的答复吗？这一点正说明了，克利盖是用模糊不清的外壳来掩盖历史事实。克利盖马上又对美国抗租运动做了一番虚假的描述作为新的论据。“最后，如果这个无产阶级以人类的身份”（他必需在一定的面具下出现；刚才还宣称无产阶级就是人类，而现在人类却变成无产阶级的一种身份了）“声明要求永远握有全部土地作为自己不可分割的财产又怎样呢？”我们看到，极简单的实际运动变成了象“人类”、“不可分割的财产”、“永恒性”等空洞的字眼，因此也就不会超出“要求”的范围。除了一般的形容词象“被压迫的”等等，还加上宗教的形容词“可诅咒的”。克利盖只是用一些神话和圣经中的形象来谈论无产阶级：

“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

“承担着人间罪恶的上帝的羔羊”，

“永世徬徨的犹太人”。

結尾时他提出了一个奇特的問題：“难道人类應該永远象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样在大地上徬徨嗎？”可是这个“人类”中的一部分安居在大地上这件事却正是他的眼中釘！

(13)克利盖宗教的本質極明显地反映在下面的話中：“我們的所作所为不应限于仅仅关心我們自己下賤的人格，我們是屬於人类的。”对于脫离了“人格”并且与人格对立的“人类”（人类于是变成形而上学的臆想，而照克利盖的說法甚至变成宗教的臆想）的这种可耻的令人討厭的奉承，这种真正極端“下賤的”奴隶般的自卑，就是克利盖的宗教以及其他任何宗教的結論。这种宣传卑諂求宠和輕視自己的学說，完全适用于勇敢的……僧侶，但永远不会适用于坚强的人們，特别是在斗争的时候。所差的只是使这些勇敢的僧侶閹割自己，去掉“下賤的人格”，以便使他們深信“人类”是能再生产自己的！如果說克利盖只能可怜地表現一下多情善感，想不出更好的东西，那末他在每号“人民論壇报”上反复搬弄他的“拉梅耐神父”，看来就是最机灵的做法了。

几乎每一号“人民論壇报”上都有那种乞求工作的話，这說明克利盖的无限怜悯和无限自我牺牲的宗教所引起的实际后果是什么，例如第8号上写道：

“工作！工作！工作！”

“在所有这些賢达的先生中，难道每一个人都認為供养忠誠的家庭并把无依无靠的年輕人从穷困絕望中拯救出来，是徒劳无益的嗎？例如，梅克倫堡人約翰·施泰恩到現在还没有工作，他願意为資本家卖命，只要能够糊口就行了。难道这个要求在文明社会里是过分的嗎？而巴登人卡尔·盖沙特勒呢？这是一位工作能力很强，并且受过教育的年輕人，他看来十分忠誠善良，我保証他是忠誠的化身……此外，一位老年人和許多别的青年人都都

在为謀生而恳求工作。凡是能帮助他們的人，請赶快帮助他們，否則有朝一日，当你們特別需要睡覺的时候，良心的譴責会使你們失眠的。誠然，你們可以說：成千上万的人都恳求工作，我們終不能帮助他們所有的人。噢，你們本来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你們是利己主义的奴隶，你們毫无心肝，不願意这样做。假如你們不願意帮助所有的人，至少也得証明你們还有一点人类情感的残余。尽你們的所能帮助那些孤苦的人吧。”

噢，只要他們願意，他們是能够超出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实践方面，这就是新的宗教所宣揚的自卑自賤和自甘墮落的实际表現。

第五部分

克利盖个人的言論

克利盖在他的报刊上所發表的言論带有什么性質，从上面所引証的那些地方就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因此我們在这里只談几点。

克利盖作为一个預言家，因而也就必然作为埃薩伊⁵秘密同盟——“正义同盟”的代表發言。因此，既然他不是代表“被压迫者”發言，他就是为了“正义”發言，不过这种正义不是一般的正义，而是“正义同盟”的正义。他不仅欺騙自己，而且也欺騙历史。他歪曲共产主义在欧洲各国的真正的历史發展，其实他对于这种發展是一无所知的，他把共产主义的产生和發展归功于这个埃薩伊同盟的荒唐的、神奇的、小說般的陰謀。关于这一点每一号報紙上都可以看到，例如在答哈罗·哈林一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关于这个同盟的威力的最荒唐的幻想。

克利盖作为一个真正的爱的使徒，他首先向妇女們呼吁，他并不認為她們卑劣到竟能抗拒充滿愛的心，然后，他作为“兒子”，作

为“兄弟”，作为“亲爱的兄弟”“用温順的字眼象兒子似地”向新出現的鼓动者們呼吁，最后他作为人又向財主呼吁。他剛一到紐約，就写信給所有德国富商，用他那爱的紙炮吓唬他們，却不願意过于露骨地承認他向他們要求的是什么。他有时用“人”，有时用“人們的朋友”，有时用“傻瓜”来署名。“我的朋友們，你們相信嗎？”对于他的丑角式的妄言沒有人理睬。除了克利盖本人外，誰也不感到奇怪。他往往用“万岁！共性万岁！平等万岁！爱万岁！”一类的感嘆詞句来裝飾我們所熟悉的引証过的关于爱的詞句（見第 12 号“答科赫”）。他把令人困惑的实际疑問和疑慮（見第 14 号“答孔策”）解释为先入为主的成見和固执。作为真正的預言家和爱的宣传者，他以仿佛受騙的純潔心灵对嘲笑者、不信神的人和旧世界的人表現了極端疯狂的憤怒，就因為他們不願意为了奇妙地变成“有福的天国居民”而求助于他的甜蜜的热爱。在第 11 号題为“春天”一文中，他怀着这种灰心而伤感的情緒對他們說：“你們今天嘲笑我們，但你們很快就会成为虔信宗教的人，要知道，春天就要来了！”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46 年 5 月 11 日

1846 年 5 月以石印单行本發表

署名：恩格斯、卡·馬克思等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石印单行本譯的

The Northern Star, AND NATIONAL TRADES' JOURNAL.

VOL. X, NO. 446

LONDON, SATURDAY, MAY 30, 1846.

PRINTED BY W. CLAYTON & CO. at the
Print Office and Stationer's Office

弗·恩格斯 普魯士宪法的破坏

普魯士有一条于1820年1月17日頒布的法律，那就是国王未得三級會議(大家都知道，在普魯士迄今尚无这种會議)批准，不得借任何國債。这一法律就是担保普魯士人总有一天会获得1815年就答应給他們的宪法的唯一保証。由于并不是普魯士国外所有的人都知道有这一法律，所以1823年政府很順利地在英国借到了300万英鎊，这是第一次破坏宪法。1830年法国革命以后，普魯士政府既要被迫地加紧准备当时看来即将爆發的战争，可是又没有錢，于是勒令官办企业“海外貿易协会”⁶借款1200万塔勒(合170万英鎊)；这笔款当然是由政府担保，供政府使用的，这是第二次破坏宪法。小的破坏，象通过該企业借款几十万鎊，就不必提了，如今是普魯士国王第三次严重地破坏宪法。由于这一企业看来已經信用扫地，国王就授权同样是完全由政府专营的机关普魯士銀行發行紙幣1000万塔勒(合135万英鎊)，除去三百三十多万作为保証金，六十多万弥补日益增长的銀行开支外，实际上等于“間接借款”600万塔勒，約合100万英鎊。政府将对这笔債款負責，因为直到現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私人資本家是普魯士銀行的股东。普

魯士人，尤其是資產階級，是最關心憲法的，看來他們決不會任其發展而不提出堅決的抗議。

弗·恩格斯寫於 1846 年 5 月

載於 1846 年 5 月 30 日“北極星報”

第 446 號並在標題下附有編者注：

“本報德國通訊員來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北極星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
給古·阿·克特根的信⁷

致古·阿·克特根并請傳閱

几天以前轉來你們的信，現在匆匆答复如下：

我們完全同意你們的意見，德國共產主義者必須結束他們中間一直存在到現在的隔離狀態，建立經常的聯繫；我們也同意，必須建立一些舉辦講演和辯論的機構，因為共產主義者必須首先對自己所处的環境有個清楚的認識，如果不經常舉行一些討論共產主義問題的會議，便無法完全達到這點。你們認為必須廣泛發行一些宣傳共產主義的便宜的通俗作品和小冊子，這個意見我們也完全同意。上面兩件事情應該馬上積極進行。你們認為必須規定定期交納會費的制度；但是我們不同意你們主張用這筆會費補助著作家以保證他們象樣的生活。我們認為，會費只能用來印刷宣傳共產主義的便宜的傳單和小冊子以及支付通訊（包括向國外發出的通訊）用費。必須確定每月會費的最低數字，這樣任何時候都可以確切知道，有多少錢可以用到公共用途上。其次，請你們務必把你們那裡的共產主義團體的成員的名字告訴我們，因為我們要知道同誰打交道，正象你們知道我們的情況一樣。最後，我們等候你們把每月用於公共用途的會費數額通知我們，以便能夠儘早開

始印刷几种通俗小册子。这种小册子不能在德国出版，这是显而易见，无需证明的。

你们对联邦议会、普鲁士国王、地方等级会议等等确实还抱有很大幻想。只有在德国已经有了强大的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下，通告才会发生影响，而实际上德国没有这样的政党。请愿只有当它同时又是一种威胁、而且还有紧密团结的组织起来的群众作后盾的时候，才会发生效力。你们唯一能做的（只要当地的条件有利于这样做），就是举行有大量的、声势可观的工人签名支援的请愿。

我们认为，目前就召集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还不是时候。只有当全国各地都成立了共产主义的团体，所有斗争办法都集中起来以后，召集各团体的代表举行大会，才有成功的希望。因此，明年以前这一点是办不到的。

在这以前，共同活动的唯一办法，就是书面讨论问题和定期的通讯联系。

我们已经开始经常同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以及侨居国外的德国共产主义者通信。只要我们得到关于英法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就会告诉你们，在我们经常的通信当中，我们了解到的一切也将随时告诉你们。

请把可靠的地址告诉我们（今后不要再用“古·阿·克特根”这样的全名，这样会把寄信人和收信人都暴露出来）。

来信请用下面完全可靠的地址：

布鲁塞尔，博登布鲁克街，菲·日果先生。

卡·馬克思，弗·恩格斯，菲·日果，斐·沃尔弗同上

維爾特問您好，他現在在亞眠。

如果你們實現了請願的意圖，那只會使共產主義的政黨公開暴露自己的弱點，并把政府要特意監視的人的名字全部泄露。要是你們的工人請願書連 500 個簽名也弄不到，那最好就象特利爾的資產者所打算做的那樣，發動一次累進所得稅的請願；要是當地的資產者連這種請願都不願參加，這也無妨，那你們就經常去參加他們的公開的示威遊行，巧妙地同他們一起行動，拋掉道地德國人的端莊、輕信和好心腸，簽名支持資產者要求出版自由、憲法等等的請願。如果做到這一點，對共產主義的宣傳來說，就會有一個新紀元到來。我們的辦法就會愈來愈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衝突就會更加尖銳。在黨內，必須支持一切使黨前進的因素，但不能陷入無聊的、倫理性的辯論。此外，為了進行通訊工作，你們應當選出一個常務委員會，草擬和討論寄給我們的書信的草稿，定期召開會議。否則就會亂七八糟。你們應該選出一個你們認為最適當的人來草擬信稿。個人的意見應當完全拋掉，它們會把事情搞糟的。委員會成員的名單，當然應該通知我們。

敬禮

上面簽名的幾個人同上

1846 年 6 月 15 日於布魯塞爾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寫於 1846 年 6 月 15 日

第一次載於 1933 年 2 月

“布爾什維克”雜誌第 3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弗·恩格斯 普魯士銀行問題

大概你們已經知道，普魯士國王想印鈔票的意圖肯定是不能實現了。兩個掌管國債的官吏拒絕在新鈔票上簽字，因為他們認為，發行新鈔就是再次增加國債，因而這件事應由三級會議負責。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為了顯示他能随心所欲地弄到錢，現在想出了一個更勝一籌的妙計。他想弄到的不是 1 000 萬，而是 3 000 萬：2 000 萬紙幣和 1 000 萬可靠、穩固的金幣和銀幣。他打算靠發行股票來募集 1 000 萬資本，“這些股票顯然不需要付紅利，僅僅付 3.5% 的年息；而且為了使股票不致被人用來投機倒把，只有在持有者死後，股票才能轉讓”!!! 能把這種紙張叫做股票嗎？為什麼不能呢？普魯士國王陛下已經宣布，這些紙張就是股票，並且他還夢想找到一大批願意掏出 1 000 萬塔勒來購買這些既不能轉讓、年息又固定為 3.5% 的股票愚蠢資本家呢！而且他這種夢想正是產生在資本家可以從鐵路股票的投機中獲得更大利潤的時候。如果國王如數找到了這些傻瓜，從他們那裡借到 1 000 萬硬幣，那他就要發行 2 000 萬紙幣，從而使國債總共增加 3 000 萬。這真是一個随心所欲弄錢的好辦法！連 1 000 萬也搞不到手，還想追求 3 000 萬！

弗·恩格斯寫於 1846 年 6 月末
載於 1846 年 7 月 4 日“北極星報”第 451 號
并在標題下附有編者注：“本報通訊員來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北極星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布魯塞爾的德國
民主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給
菲格斯·奧康瑙爾先生的信

親愛的先生！

欣悉您在諾定昂的選舉中取得了光輝的成就，我們謹向您，並通過您向英國的憲章派慶賀這次輝煌的勝利。正當自由貿易原則在立法上取得了勝利⁸的時候，自由貿易派大臣[⊖]在舉手表決時却由於憲章派大多數的反對而遭到了失敗⁹。親愛的先生，我們認為，這件事說明了英國工人階級十分清楚，在自由貿易原則取得勝利後他們應該採取什麼立場。這個事實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已經充分了解，現在，當資產階級實行了他們的主要措施，當他們只需用果斷的真正的資產階級內閣來代替目前軟弱的妥協的內閣就能成為貴國公認的統治階級時，資本和勞動即資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偉大鬥爭就要進入決定性的階段。今後戰場將由於土地貴族退出鬥爭而廓清。而鬥爭也只能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這兩個階級之間來進行了。敵對雙方各有自己的由本身的利益和地位所決定的戰鬥口號。資產階級的戰鬥口號是：“用一切辦法擴展貿易并由郎

⊖ 約·凱·霍布豪斯。——編者注

卡郡的棉紡織業巨頭組織內閣來實行這種措施”；工人階級的战斗口號是：“根據人民憲章¹⁰對憲法實行民主修改”，如果這一點實現了，工人階級就會成為英國的統治階級。我們非常高兴地看到英國工人充分了解到力量對比的這種變化；他們知道，從第三種力量即貴族被徹底擊垮後，憲章主義鼓動的新時期就開始了；儘管資產階級的報刊在玩弄“緘默詭計”，今後憲章運動應該而且將要起顯著的作用；最後，他們也知道，在這些新條件下，他們面臨着新的任務。他們打算在下一大次大選時參加投票選舉，這證明他們是完全了解這些新任務的。

親愛的先生，您在諾定昂選舉時發表的卓越的演說中，那樣鮮明地描繪了工人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之間的對立，關於這點我們應該特別向您表示祝賀。

由於托馬斯·庫伯這個偽裝的體面人物發表了誹謗性的聲明，所有憲章派組織都自發地一致通過決議表示對您的信任，我們對此也表示慶賀。憲章派只有把那些戴着假面具的資產者從自己的隊伍中清洗出去才能取得勝利，因為這些資產者是為了竊取聲譽而把自己偽裝成憲章派，同時他們又向資產階級的作家（例如，布萊辛頓伯爵夫人、查理·狄更斯、道·杰羅爾德和庫伯的其他“朋友”）阿諛奉承，並散布象“不抵抗”論這種只有老太婆才需要的腐朽可恥的學說，以求博得資產階級的寵信。

親愛的先生，最後我們還應該感謝您和您的助手們在領導“北極星報”¹¹方面所表現的高貴而開通的風格。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聲明，唯有“北極星報”這一英國報紙（或者把我們僅從“北極星報”中才知道的“人民雜誌”除外）了解英國各黨派的真正狀況，只有它在實質上是真正民主的，只有它沒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偏見，只有它

同情全世界的民主主义者和工人（在现代这两者几乎是一样的）；“北極星报”在所有这些問題上表达了英国工人階級的意見，所以它是真正值得大陆上的民主主义者閱讀的唯一的英国报纸。同时我們声明，我們將尽一切力量来扩大“北極星报”在大陆上的發行額，并尽可能爭取在更多的大陆报纸上發表它的譯文。

亲爱的先生，我們在德国的許多德国共产主义者同国外民主主义者进行联系的公認代表的身份，謹向您表达这些敬意。

布魯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代表

委员会^①：恩格斯

菲·日果

馬克思

1846年7月17日于布魯塞尔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46年7月25日“北極星报”

俄文譯自“北極星报”

第454号

① 指布魯塞尔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譯者注

弗·恩格斯 法国的政府和反对派¹²

現在兩院正在舉行會議。貴族院在處理了新出現的弑君者約瑟夫·昂利案件之後，照例就無事可做了。而眾議院則正忙於核對本院的當選議員名單，並想趁此機會表明一下它的歡欣鼓舞的心情。在 1830 年革命後這個時期內，從來還沒有出現過這樣露骨的厚顏無恥和對社會輿論的蔑視。至少有 $\frac{3}{5}$ 的議員是內閣的親朋密友；換句話說，這些人不是大資本家、商人、巴黎交易所的鐵路股票投機家、銀行家和大工業家之流，就是他們的恭順奴仆。現在的立法權比以前的任何立法權都更加體現出拉菲特在七月革命後第一天所說的話：“從今以後，統治法國的將是我們銀行家了。”這是大金融貴族和 haute bourgeoisie [資產階級巨頭] 統治法國的最顯著的證明。決定法國命運的不是土伊勒里宮，也不是貴族院，甚至也不是眾議院，而是巴黎交易所。真正的大臣並不是基佐和杜沙特爾這些先生，而是路特希爾德先生、富爾德先生和巴黎其他的大銀行家，這些人的巨大財富使他們成為本階級最有权勢的代表人物。他們操縱着內閣，而內閣在選舉的時候也關心僅使那些效忠於現存制度和受這個制度的恩惠的人當選。他們在這次選舉中獲得了很大成績。政府的庇護、各種方式的賄買，再加上大資本家對為數有限（不到 20 萬人）而多少又都是屬於資本家階級的選民

的影响,应时而来的謀杀国王的企圖在有錢人当中引起的恐惧,以及人們相信路易-菲力浦的統治不会超过目前两院的任期(到1851年滿期)等等,以上这些因素足以在大多数选举会上压倒一切重要的反对派。现在,既然这个宝贵的众議院已經召集起来了,这些人就要适当地关怀一下自己。独立的选民紛紛請願并提出抗議,反对內閣閣員的当选;他們断言并一再証明或者准备証明,政府官吏在选举时几乎到处肆意破坏法律;他們証明,在选举过程中采取了賄賂、收买、恫吓和各种各样的包庇行为。但是大多数議員对这些事实从来不加注意。当每个反对派議員对这类丑恶行为提出坚决抗議时,口哨声、喧囂声和“进行表决,进行表决!”的喊声便迫使他們緘默下去。于是一切违法行为便被符合法律的表决掩飾起来。大財閥們陶醉于自己的权势,但他們預感到自己的权势已为期不长,所以赶紧抓住目前这个时机加以充分利用。

不难想象,除了这个資本家小集团之外还普遍存在着一个反对目前政府和这个政府所为之服务的那些人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中心是巴黎,在这里,大財閥对选民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塞納河区的14个議員当中,只有两个議員拥护內閣,而其余12个議員都是反对派。巴黎的大多数資產階級选民都是屬於梯也尔和奧·巴罗派的。这些选民力求結束路特希尔德一帮人独揽大权的局面,恢复法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独立而光荣的地位,也許还要爭取一些不大的选举改革。大多数沒有选举权的作坊主、小店主等更加激烈,他們要求实行能够給他們选举权的选举改革,他們之中許多人都屬於“国民报”派或“改革报”派¹³,并且和包括着相当大一部分工人的民主主义政党相接近。这个政党又分为若干个派別,而其中人数最多的(至少在巴黎是这样)一个派別,是由共产主

义者組成的。这些不同的派別都在进行反对現存制度的斗争，当然每个派別都是按照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不过不久以前开始了一种新的斗争方式，这种方式是值得提的。一个工人写了一本小册子，抨击这个制度的首脑，但抨击的不是路易-菲力浦，而是“高利貸大王路特希尔德第一”¹⁴。这本小册子的成就（它已出了近20版）証明，打击的对象选择得非常恰当。路特希尔德大王不得不两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抗一位只有身上衣服是唯一财产的无名之士的抨击。公众对这场論战極感兴趣。現在，pro〔贊成〕和 contra〔反对〕的小册子已經出版了近30种。人們对于路特希尔德及其他大財閥們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照一家德国报纸的說法，路特希尔德應該引以为戒，最好把自己的大本营搬到离巴黎这个沸騰不息的火山較远的地方去。

弗·恩格斯写于1846年9月1日左右

載于1846年9月5日“北極星报”第460号
并在标题下附有編者注：“本报通訊員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北極星报”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于1940年
“无产階級革命”杂志第4期

弗·恩格斯

普魯士宪法

这个期待已久的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¹⁵终于問世了！如果相信“泰晤士报”、“地球报”¹⁶和一些法国德国报纸的說法，普魯士总算已加入立宪国家的行列了。但是，“北極星报”已經充分令人信服地証明，这个所謂宪法不过是給普魯士人民設下的一个陷阱而已，其目的是要剝夺已故的国王[⊖]在需要人民的支持时所許給人民的那些权利。事情正是这样，弗里德里希-威廉企圖利用这个所謂宪法来搜刮金錢，同时又不必向社会輿論作什么讓步，这是勿庸置疑的。各国的民主报纸，象法国的“国民报”和“改革报”，甚至政府的“辯論日报”¹⁷，都同意这种看法。从手足双縛的德国报刊吞吞吐吐的言論中，也只能得出一个結論，这就是：普魯士的进步人士已識破了他們“坦率寬厚的”国王的狡猾意圖。这样一来問題就可以归結为以下几点：国王能不能实现他的計劃？中央等級會議会不会那样愚蠢或那样胆怯，以至它不給人民提供广泛的自由，反而保証給国王提供新的貸款，好讓他有可能无限期地維持目前的統治制度？

我們的答复是：不，中央等級會議不会这样做，而且也不可能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編者注

这样做。

普魯士現存的統治方式，是由普魯士貴族和普魯士資產階級之間的力量对比关系所决定的。貴族以前的势力、財富和影响已大大丧失，再不能象从前那样支配国王了。資產階級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摆脱束縛着他們的工商业發展的重負——貴族。这样一来，代表着国家中央政权、受到大批各級文武官員的支持而又掌握着軍隊的国王，就能够时而迎合貴族的利益，利用它来压服資產階級，时而又迎合資產階級的利益，利用它来压服貴族，并尽量使这两者的势力保持均衡。差不多欧洲所有的文明国家都經歷了君主专制这个阶段，在較發达的国家里，这个阶段現在已經讓位給資產階級的統治了。

在德意志最發达的邦——普魯士，至今还没有能够推翻专制制度的統治和摧毁封建貴族残余的充分富足、强大、团结和坚决的資產階級。但是貴族和資產階級这两个敌对的因素所面临的状况是，在工业和文明的自然發展进程中，其中一个因素（資產階級）的財富和势力必然会日益增长，而另一个因素（貴族）則必然趋于沒落、破产，其势力亦必将日益丧失。譬如，当普魯士的貴族和大地主的状况由于本世紀初和法国进行破坏性的战争，随后又由于英国的谷物法使他們不能进入英国市場，以及他們在一項主要产品——羊毛的生产方面和澳大利亚进行竞争以及許多其他原因而每况愈下的时候，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却大大地增加了自己的財富，發展了生产力和增强了自己的势力。普魯士的工厂工业就是在对法战争和禁止英国工业品向大陆市場輸入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当和平重新恢复时，新兴的工业家已經有足够的力量来迫使政府为他們实行保护关税(1818年)了。跟着很快就建立了一种几乎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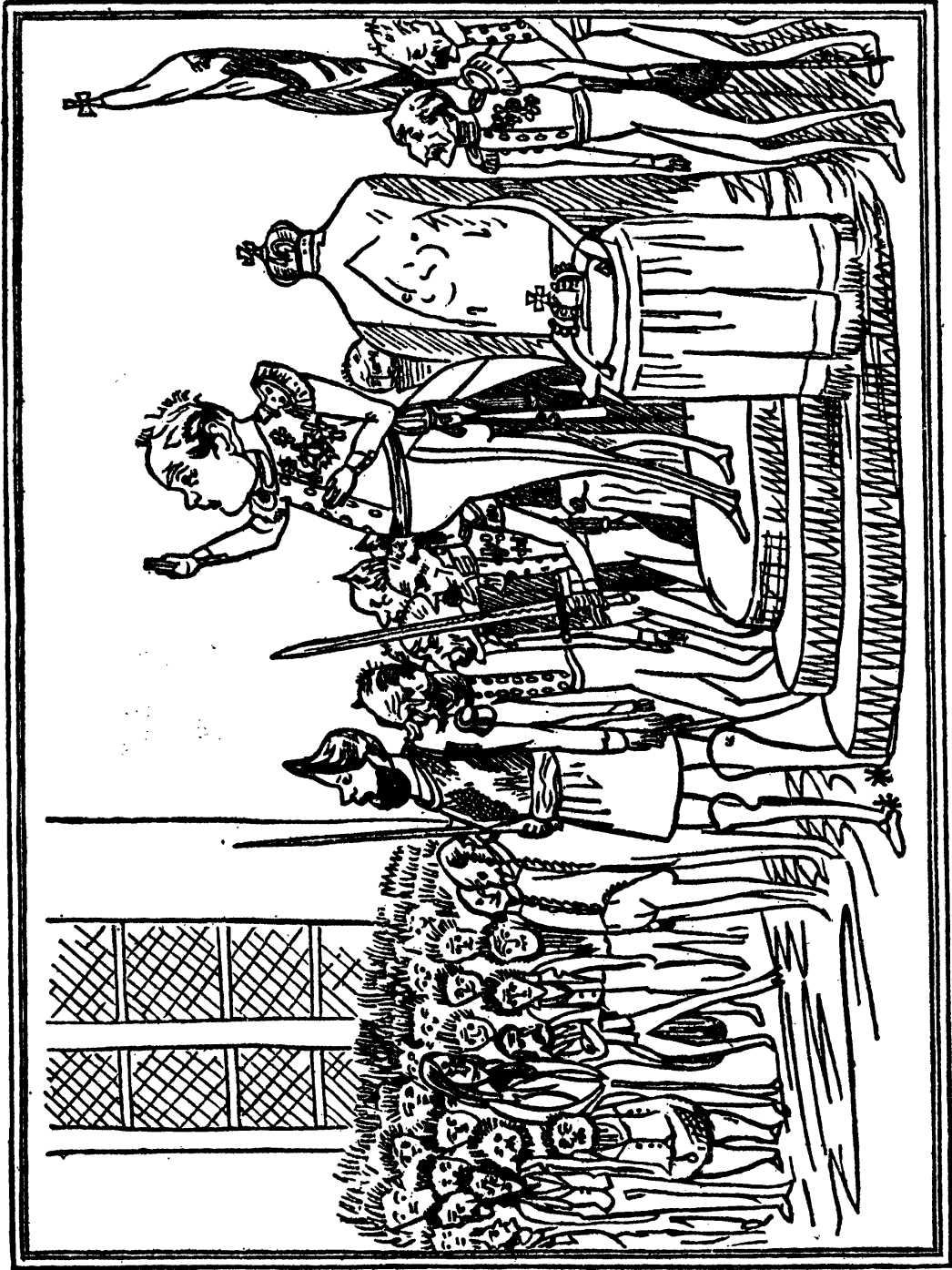
全是为了增进資產階級利益的關稅同盟¹⁸。但最主要的是，在近30年和平时期內各个工商业国家之間所进行的激烈竞争，迫使比較怠惰的普魯士資產階級必須加以抉择，或者是讓外国的竞争把自己徹底挤垮；或者是仿效自己的邻国，脚踏实地地干起来。

直到1840年，資產階級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發展，当新国王在1840年登基时，他們便認為这是一个表明1815年以来普魯士已經發生了一些变化的最好时机。至于从这时起資產階級的运动怎样順利地發展起来，怎样扩展到王国的各个地区，最后又怎样把整个資產階級、大部分农民、甚至連不少的貴族都席卷进去的情况，这里都不必說了。代議制、出版自由、公开审判、法官終身制和陪审制——这就是資產階級所提出的要求。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至少在王国里那些文化水平較高的地区是这样）很清楚，这些措施也符合他們的利益，因为只有借助于这些措施，他們才有希望摆脱封建制度的残余，取得他們所大力爭取的对立法的影响。比較貧困的那部分貴族認為，立宪制度也許会保證他們在立法机关中取得一个符合于他們利益的地位；他們認為，这个新制度無論如何也不会象現时的制度那样使他們破产。抱着这种想法来参加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是普魯士本部和波茲南那些特別苦于自己的产品沒有銷路的貴族。

資產階級本身的处境日益困难。他們把自己的工业、采矿业以及航运业發展到相当可觀的規模；他們成了關稅同盟所控制的全部市場的主要供应者；他們的財富激增，人数也增加很多。但是英国的工厂工业和采矿工业在最近10年到15年当中的巨大發展，使普魯士資產階級面临着致命的竞争。每逢英国市場上商品过剩时，關稅同盟所轄各区便有大量英国商品出現，这些商品的售价使

德国人比英国人更为吃亏，因为英国人在商业繁荣时期从美洲市場和其他市場获得了高额利潤，而普魯士人除了在自己的稅界內出售自己的商品外，根本无处銷售。普魯士的船只几乎没有进入外国港口的可能，但是其他任何国家的船只却可以和普魯士的船只一样开进普魯士的港口。所以，虽然普魯士的資本較少，但是要給这些資本找到有利的用途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商业經常处于困境；工厂、机器和商品慢慢地、但不断地在落价；这种普遍的不安曾一度为近八年来在普魯士盛行的鐵路股票投机所中断。鐵路股票的投机由于抬高了現金的价值而加速了物价的跌落，但是总的說来这种投机并不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国内大部分地区人口相当稀少，而且商业又不發达。不过和其他工业部門的投資比較起来，这种投机活动获得利潤的机会还是多些，因此稍微有一点資本的人都去进行这种投机。这种投机照例很快就發展到狂热程度，并以危机告終；普魯士金融市場承受这种危机的重压差不多已有十二个月了。这样，資產階級在今年年初便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金融市場上現款空前缺乏；工业区对政府拒絕实行的保护关税的要求比以前更加迫切了；各个港埠要求制定航海条例作为解救它們困难处境的唯一办法；但最严重的是粮价开始上涨，使国家处于飢餓的边緣。所有这些引起不滿的情况同时而且更严重地影响了人民：西里西亚的紡織工人受着極端穷困的折磨；棉紡織厂关闭；在广大的萊茵工业区内几乎全部工人失业；大部分新收获的馬鈴薯毀坏了；粮食貴得象在荒年一样。显然，对資產階級來說，从低能的国王、軟弱的貴族和傲慢的官僚手里夺取政权并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机已經到了。

在每个革命时期都一再出現这样一件稀奇事：当运动的領導



弗·恩格斯对 1847 年 4 月 11 日联合省议会在柏林开幕时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发表御前演说所作的諷刺画

(1847 年 5 月 6 日“德意志—布魯塞爾報”作为附頁發表)

階級所处的境地非常有利于把运动引导到底的关头，日暮途穷的政府常常是被迫向这个领导阶级求援。例如，1789年在法国，飢餓、商业萧条和貴族的內哄，可以说推动了资产阶级去进行革命，正在这个时候，政府由于自己財源枯竭而被迫召开了三級會議，从而为革命奠定了基础。1847年普魯士也發生了同样的事情。正当比較怠惰的普魯士资产阶级为形势所迫而几乎不得不去改变統治制度的时候，国王由于囊中空虛也被迫召开了普魯士的三級會議，从而亲自为改变这个制度奠定了基础。毫無疑問，如果当时金融市場稳定，工厂全部开工（这只有在商业繁荣，銷路暢通，因而工业品能在英国高价出售时才能做到）而粮食又很賤的話，三級會議就不会象現在这样激烈地反对国王了。但情况往往是这样：在革命日益迫近的时期，社会的进步阶级总是占有一切优势的。

在1845年、1846年間，我曾經一再向“北極星报”的讀者指出，普魯士国王的財政状况是非常紧张的；同时我也讓他們注意国王的大臣們企圖帮助他摆脱困难的各种詭計，我还不止一次地預言，这一切必然要以召开三級會議而收場。可見，这并不是意外的事情，也不是象現在人們所形容的那樣，是揮金如土的国王的慈悲表現。只有極端的貧困和破产才促使国王采取了这一步驟，这是普魯士的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所以，唯一的問題是，普魯士的资产阶级会不会答应提供新的貸款，从而讓国王繼續实行他的旧政策，把他們的要求和需要再擱置七年。

我們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們不能这样做。我們曾根据各个階級的状况証明了这点，現在我們再拿三級會議本身的成員来証明一下。三級會議中有：

上層貴族代表和下層貴族代表 311 名；

城市代表和农民代表 306 名。

由于国王宣布他要用賜封新貴族的办法来增加上層貴族代表的名額(共 80 个),我們不妨把貴族的代表再增加 30 名;这样,貴族代表或执政党总共就有 341 名。从这个数目中除去下層貴族的自由派分子,即除去普魯士本部的全部貴族、波茲南 $\frac{2}{3}$ 的貴族以及萊茵、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威斯特伐里亚等地的一些貴族代表,譬如說,一共除去 70 名在选举中同城市代表和农民代表采取一致行动的自由派代表,那末双方的对比关系就会如下:

貴族即执政党的代表——271 名;

城市代表和农民的代表即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表——376 名。

这样一来,即使偏僻地区的城市代表和农民代表中有 30 个或 40 个人投政府的票,自由派仍然会多得 25 票到 50 票。所以只要自由派再努力些,他們将来就不难提出实行自由主义制度的要求来对抗每一个收斂金錢的要求。此外,毫無疑問,在目前情况下,人民将支持資產階級,并且将从外面施加压力(这是非常需要的)来增加三級會議內反对派的勇气和声势。

所以,尽管普魯士宪法本身是不足道的,但是,它給普魯士以及整个德国开辟了新的时代。它标志着专制制度与貴族的垮台和資產階級获得政权;它給运动打下了基础,这个运动很快就会导致資產階級代議制的建立,出版自由的实现,法官独立审判制和陪审制的实行,甚至很难預料这个运动将如何結束。它是 1789 年在普魯士的重演。所以,即便是只有資產階級直接关心現在已开始的革命运动,那末这个运动对人民的利益也远不是沒有关系的。資產階級政权一旦建立起来,特殊的独立的民主运动馬上就会开始。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貴族的斗争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資產階級,而人

民、民主主义政党只能起从屬的作用。但是，从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統治并成为新专制制度和新贵族的体现者而和人民相对抗的时候起，民主主义政党将作为一个唯一的进步政党而出现；从这时起，斗争就简单化了，成为两种力量的斗争，并因此而变为“生死的决战”。法国和英国各民主主义政党的情况完全証实了这点。

还必须指出一种情况。普魯士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将使欧洲各国的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北方国家同盟将瓦解。掠夺波兰的主要国家奥地利和俄国将同欧洲其他国家完全隔离开来，因为普魯士会把所有那些建立了立宪制的較小的德意志各邦吸引到自己方面去。由此可见，这个不足道的宪法使³/₄的德意志从死气沉沉的东欧阵营轉到进步的西欧阵营，使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关系發生根本变化。1846年2月，波兰最近一次起义爆發了¹⁹。1847年2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召开了他的三級會議。**波兰复仇的日子临近了！**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2月末

載于1847年3月6日“北極星报”
第489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編者注：
“本报德国通訊員来稿”

署名：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北極星报”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卡·馬克思 駁卡尔·格律恩²⁰

“特利尔日报”²¹登了一篇标有“柏林3月20日”字样的文章，評論了我那本尚在印刷中的小册子“蒲魯东先生的經濟矛盾体系中的矛盾，或哲学的貧困”。柏林記者以为，“萊茵—摩塞尔日报”和其他一些报刊發表的那些关于这本小册子，关于蒲魯东的著作²²及其譯者格律恩先生的活动的报道，出自我手笔。他一再沿用布魯塞尔記者即上述报道的作者用的称呼，尊我为“前‘萊茵报’²³的編輯”。我們这位朋友“凭着熟悉德国出版界的現状”，大肆誣蔑。我看，不仅是他的誣蔑，就是他的全部写作生活，都可以“憑着熟悉德国出版界的現状”来行事。我承認，他在“熟悉德国出版界的現状”方面是久經考驗的；在这一点上，我自愧不如。但在这一次他的这一长处却没有“指靠得上”。

这个所謂的柏林記者只要看一下我在“批判的批判”²⁴里对蒲魯东提出的意見，就会相信，虽然他所攻击的那篇报道可能寄自布魯塞尔，但那篇报道却把蒲魯东和格律恩先生“看作有同样价值的人物”，单就这一点也可以証明，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我写的。

我批評蒲魯东的文章是用法文写的。蒲魯东可以自己来答复这篇批評。在他那本書沒有出版以前写給我的信里，並沒有表

示，如果我要进行批评，他会委托格律恩先生及其伙伴为他进行报复。

“至于说到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译者”，这位柏林朋友就只好写下自己的意见，说“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从格律恩先生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得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知识”，因此这本书的价值是无庸置疑的。不过这里必须好好考虑一下，“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取得了一些“知识”，尤其是取得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知识”，并且一下子就在质和量的方面都充实了起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啊！

柏林记者或者说冒牌的柏林记者把我当成了布鲁塞尔记者或者上述记者，他说：

格律恩“不幸先于‘前“莱茵报”编辑’马克思博士向德国公众介绍了国外社会主义的成就，也许就因为这一点才会受到报复”。

无疑地，我们这位朋友是竭尽了牵强附会的能事！我愿意 sub rosa [私下] 告诉他，在我看来，格律恩先生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同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之间，除了一些人名和日期而外，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但是同时我要对他讲，我没有兴趣“向德国公众介绍”我在研究格律恩先生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当中所取得的“成就”，因此我倒乐于把我一年以前写的详细评论格律恩先生的大作的手稿放到一边；现在只是由于这位柏林朋友的逼迫，才不能不把它交给“威斯特伐里亚汽船”²⁵ 杂志发表。这篇评论是对弗·恩格斯和我合写的“德意志思想体系”（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²⁶ 一书的补充。

至于这篇手稿一直未能發表的原因，也許会作为“德国出版界的現狀”的續評在另一个地方向讀者加以說明。但是单独發表这篇与書报检查令毫不抵触的对格律恩一書的評論，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唯一的一点点障碍是我們認為这本书不值得专门进行批判，只是在評述所有平庸鄙陋的德国社会主义作品的过程中提到格律恩先生的时候，才不能不提到这部作品。然而現在，当这位柏林朋友發表了他的文章以后，再单独發表这篇評論，就多少有点滑稽了：它将表明，“德国公众”是怎样“熟悉国外社会主义的成就”，特别是“我們这些在柏林的人”是多么渴望和多么善于取得“許多各式各样的知識”。由此还可看出，即使我想阻碍格律恩先生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的进展，我是否需要用此下策，在报纸上發表小塊文章，进行无足輕重的攻击。最后，这位柏林朋友也不能不向大家証明，假如我真的打算象他所理解的那样“向德国公众介紹国外社会主义的成就，并且真的害怕有个先行者同我竞争，那我就會每时每刻都为自己的命运祈祷：“但願上帝不要讓我碰上一个先行者，不然最好就讓格律恩先生做我的先行者吧。”

对于我“狂妄不羈地自以为已經达到了人类智慧的頂峰”这种說法，我还再說几句话。

除了格律恩先生，誰还能把这頂帽子硬扣在我的头上呢？格律恩先生（参看他的“建筑基石”²⁷的卷头語）認為，我在“德法年鑒”²⁸上發表的几篇文章也和蒲魯东現在的政治經济学一样，猜中了世界最后的謎語。他現在又把蒲魯东捧为具有真正观点的人，可是他也曾經恭維过我，說我（参看格律恩的“新軼文集”²⁹）“摧毁了立宪派和激进派的观点”。格律恩先生先給我灌够了毒藥，然后可以振振有詞地責备我，說我中毒了！但是請这位柏林朋友放心

吧！我还安然无恙。

卡尔·馬克思

1847年4月3日于布魯塞尔

載于1847年4月8日“德意志—
布魯塞尔报”第28号和1847年
4月9日“特利尔日报”第9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特利尔日报”并曾与
“德意志—布魯塞尔报”核对

弗·恩格斯 德国的制宪問題³⁰

(一)

德国的社会主义著作界一个月不如一个月了。它日益局限于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高談闊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本領不过是把德国哲学、德国式的庸人伤感情緒和一些被歪曲了的共产主义口号摻混在一起。它标榜和平，以至在經受检查的書刊上它也可以傾吐肺腑，暢所欲言。甚至德国警察对它都很难有什么挑剔。这就足以証明它不是德国著作界的进步的革命的因素，而是守旧的反动的因素。

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仅包括自封为 *par excellence*〔最道地的〕社会主义者的人們，而且还包括德国大部分盜用“共产主义者”名义的著作家。后者比前者更坏，如果他們之間可以比較好坏的話。

在这种情况下，不言而喻，这些 *soi-disant*〔所謂的〕共产主义著作家决不代表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党。党不承認他們是自己的著作界的代表，他們也不代表党的利益。相反地，他們維護的是完全不同的利益，捍衛着完全不同的、在一切方面都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原則相对立的原則。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前面已經講过，德国的 *soi-disant*〔所謂的〕共产主义著作家大都屬於这一种人）从法国共产主义者那里听說，由君主专制过渡到現代的代議制根本不能消灭广大人民的貧困，只不过使一个新的階級——資产階級获得政权而已。他們又从法国共产主义者那里听說，正是这个資产階級利用它的資本压迫人民群众最厉害，因此它是作为人民群众代表的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 *par excellence*〔真正的〕敌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懶于把德国的社会政治發展水平和法国的社会政治發展水平比較一下，或是研究研究决定着今后全部發展的德国的现实情况。他們沒有認真思考，就忙着把刚刚听到的东西搬到德国来。党的活动家总是力圖达到实在而具体的效果，总是代表整个階級共同的特定利益，如果他們真是党的活动家，那他們至少会注意到法国資产階級的反对者（从“改革报”的編輯們一直到極端的共产主义者）是怎样进行反对資产階級的論战的，特別應該注意到法国广大无产者的公認的代表老卡貝是怎样进行这种論战的。他們早應該看出，党的这些代表人物不仅經常接触到迫切的政治問題，而且甚至象选举改革草案这一类往往不代表无产階級直接利益的政治措施，他們也决不会傲慢地等閑視之。但是我們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党的活动家，而是德国的理論家。在他們看来，要紧的不是实际的利益和效果，而是永恒的真理。他們所努力保护的利益，是一切“人”的利益；他們所力圖达到的效果，只限于哲学上的“收获”。这样，他們只需使自己的新观点符合于自己的哲学良心就可以在全德国大喊大叫說，政治进步和一切政治都是祸害，正是宪法所規定的自由把对人民危害最大的階級——資产階級捧上了王座，不論資产階級遭到了怎样的攻击，这种攻击还远不算多。

在法国，十七年以来一直是资产阶级独掌政权，这种情况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沒有的。因此，法国无产者、他們的党的領袖和他們的著作界代表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就是对統治阶级、对現行政治制度的攻击。这是肯定的革命行动。下面一些事实表明居于統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对这一点知道得多么清楚：出版物和社团无数次地被起訴，集会和宴会遭到禁止，资产阶级利用警察对改革派³¹和共产主义者进行百般吹毛求疵的迫害。而德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德国，资产阶级不仅不是統治者，它甚至是現存各邦政府最危险的敌人。对各邦政府說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种轉移目标的活动是正中下怀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給法国共产主义者所带来的后果，十之八九是监禁和流放，但是它給我們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带来的，却无非是書报检查机关的贊揚而已。法国无产阶级論战的革命热火一到了德国理論家的冰冷的胸膛里，就冷却到書报检查机关所准許的程度，而革命的热火經過这一番閹割之后，就恰中德国各邦政府的心意，它們就利用它共同去反击进攻的资产阶级。“真正的社会主义”竟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原理变成了保护德国 status quo [現存秩序，现状] 这个泥坑的一道围墙。“真正的社会主义”从头到脚都是反动的。

资产阶级早已注意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反动傾向。可是它又毫不犹豫地径直地把这一流派当做德国共产主义在著作界的表现，它公开或暗地里責备共产主义者，認為他們反对代議制、陪审制、出版自由以及叫嚷着反对资产阶级，都只是有利于各邦政府、官僚和貴族。

德国共产主义者該解脫他們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反动行为和欲望所承受的这种罪責了。代表着德国无产阶级的非常明

确、非常具体的要求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应该无比坚决地和上述这一帮（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一帮歹徒而已）文人划清界限了。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代表谁，因而不得已地就投入了德国各邦政府的怀抱；他们自以为“使人们变得现实”，其实他们除了把德国的市僧的庸俗气奉为神圣而外什么也没有做。实际上，我们共产主义者同这帮在理论上胡说八道、摇摆不定的狡猾家伙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完全不同于反动的贵族，譬如说法国的正统主义者或“青年英国”³²对它的攻击，同样也完全不同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攻击。德国现状的代表者根本无法利用我们所采取的攻势，因为这种攻势与其说是针对资产阶级，不如说是针对这种现状。如果说资产阶级是我们的自然敌人，只有把这个敌人打倒我们的党才能取得政权，那末德国的现状就是我们的更大的敌人，因为它横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妨碍我们打击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决不置身于反对德国现状的广大群众之外。我们只是这一反对派大军中最先进的支队，同时，由于我们并不掩盖自己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打算，所以这个支队的地位也最为明显。

随着普鲁士联合省议会的召开，在反对德国现状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个转折点。这种现状是继续存在下去还是被消灭，都要取决于这届议会的行动。这样一来，德国那些态度很不明确、彼此间界限混乱不清但在思想方面又各不相同的党派，就必须弄清楚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和应该采取的策略了；它们应该彼此划清界限，开始进行实际活动。这些党派中的最年轻的共产党不能规避这一必要的任务。它也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战斗计划和手段。第一个步骤就是揭露那些力图钻进它队伍里来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它应该尽快地完成这一步骤，因为它已足够强大，用不着同那些败坏

它声誉的同盟者合作。

(二)

STATUS QUO〔现状〕和资产阶级

下面要講的就是德国的现状。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分强大，它们已把贵族打倒并上升为本国的统治阶级，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到现在也还没有这样的力量。虽然它对各邦政府也有某些影响，可是只要双方的利益一发生冲突，在贵族地主的影响面前，它这种影响就要退避三舍。法国和英国是城市统治着乡村，而德国却是乡村统治着城市，农业统治着商业和工业。不仅德国的君主专制的各邦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君主立宪的各邦如萨克森、维尔腾堡和巴登的情况也是这样。

这种情况是因为德国在文明方面比西方各国落后。在西方各国，人民群众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商业和工业，而我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则是农业。英国不仅不输出任何农产品，它还需要经常从国外输入农产品；法国输入的农产品至少和它输出的相等。这两个国家的富有首先是依靠工业品的输出。相反地，德国输出的工业品很少，而输出的谷物、羊毛、牲畜等等却很多。当德国的现行政治制度初建立的时候，也就是说1815年的时候，农业所占的比重比现在还大，而且由于推翻法兰西帝国的最积极的参加者几乎全是德国农业区的人，所以这种比重当时还有增无已。

也象欧洲大多数国家一样，德国农业在政治上的代表是贵族，即大土地占有者阶级。和贵族独霸局面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就是封

建制度。随着农业不再成为国家的决定性生产部门，随着（农业阶级之外）从事工业的阶级的形成和（乡村之外）城市的产生，封建制度到处趋于衰落。

这个新形成的、同贵族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贵族的农民并存的阶级，不是今天在各个文明国度里已掌握统治权、在德国正在争取统治权的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

德国现行的国家制度不过是贵族和小资产者之间的妥协，妥协的结果，管理国家的权力落到了第三个阶级——官僚的手里。在构成这个阶级的时候，妥协的双方是按照彼此的地位加入进来的：代表较重要的生产部门的贵族把较高的职位留给自己，而小资产阶级则满足于较低的职位，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才推荐自己人担任较高的行政职务。凡是官僚机构受到直接监督的地方，例如德国立宪制各邦，贵族和小资产者也是按照这个样子分享这种监督权力的；不难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贵族大占便宜。小资产者任何时候也不能打倒贵族，甚至连和它处于平等地位都做不到；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削弱贵族。要把贵族打倒，需要另一个具有更广泛的利益、握有更多财富、更坚决果断的阶级——资产阶级。

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是从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分离出来的，它的产生是由于世界贸易和大工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自由竞争和财产集中。小资产者代表内地和沿海的商业、手工业和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这些经济部门在有限的区域里发展着，需要的资本数额不大而且周转缓慢，它们所引起的竞争只是地方性的、微弱的。资产者代表世界贸易、全世界范围内商品的直接交换、银钱业、以机器劳动为基础的大工厂工业——这些

經濟部門需要尽可能大的地盘、最大数額的資本和最快的資本周轉率，它們所引起的競爭是普遍的、劇烈的。小資產者代表的是地方利益，資產者代表的是普遍利益。小資產者發現，只要他能在間接影响国家立法的情況下直接参加省政机关，同时又做自己本地市政机关的主人，那他的处境就十分安全了。資產者如果不直接地、經常不断地控制本国的中央行政机关、对外政策和立法，就无法保障自己的利益。小資產者的典型产物是德国的帝国城市^①；資產者的典型产物是法国的代議制国家。小資產者哪怕得到統治階級些微的讓步，就变得保守起来；而資產者在自己还没有爬上統治地位的时候則是革命的。

德国資產階級对那两个分享政治統治权的階級的态度如何呢？

在英国从 17 世紀起，在法国从 18 世紀起，富有的、强大的資產階級就在形成，而在德国則只是从 19 世紀初才有所謂資產階級。固然，在那时以前汉撒城市^②里也有个别富有的船主，国内也有一些豪富的銀行家，可是就沒有大資本家階級，更談不到大工业資本家階級了。德国資產階級的創造者是拿破侖。由于他的大陆体系³³，由于在他的压迫下普魯士必然实行的經營的自由，德国人才有了工业，并扩大了矿藏的开采。只过了几年，这些新出現的或是原已获得了發展的生产部門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这些部門而誕生的資產階級也取得了相当的势力，以致在 1818 年普

① 即中世紀时德国的一些直接受皇帝管轄而不受諸侯管轄的城市。——譯者注

② 14—17 世紀时，德国北部有过一个政治性及商业性的組織，叫做汉撒同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垄断德国北部的貿易。加入这个同盟的城市就叫做汉撒城市。——譯者注

魯士政府被迫为它們制定了保护关税。1818年的这项普魯士关税率是政府对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正式承認。它承認（固然是满怀不平、非常勉强地）资产阶级已成为国内不可缺少的一个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下一个讓步就是成立关税同盟。尽管德国大多数邦加入普魯士关税体系本来只是从国库和政治方面考虑的，可是結果这件事情对誰也不象对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普魯士资产阶级那样有利。虽然关税同盟在某些方面也給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带来了一些零星的好处，但是整个說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兴盛、竞争的活跃以及过去的生产工具被排挤，关税同盟給他們带来的害处畢竟要多得多。从那时以来，资产阶级發展得相当快，特别是在普魯士。虽然最近三十年来它还远沒有达到英国资产阶级和法国资产阶级所达到的高峰，可是它畢竟把現代工业的大多数部門都建立起来了，在某些地区清除了农民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宗法制度，多少积聚了一些資本，制造了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级，建立了相当大的鉄路网。至少它把事情做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現在它要末繼續向前迈进进而成为統治阶级，要末就放弃自己以前所取得的成績；也就是說，它是目前唯一能够在德国实现进步、能够治理德国的阶级。实际上它已經是德国的領導阶级了，它能不能存在，就要看它是否在法律上也成为德国的領導阶级。

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正式統治着德国的阶级之所以日益无力，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日益强大。自拿破侖时代以来，贵族越来越穷了，它負的債越来越重了。徭役的贖买使它的谷物生产費用提高了，并且給它造成了一个竞争者——新的独立小农阶级。贵族因此而受到的損失决不能长久靠它在农民贖买徭役时搜刮的大笔錢財来弥补的。俄国和美国的竞争限制了贵族的谷物銷路，澳

洲的競爭以及南俄罗斯的一度競爭，限制了它的羊毛銷路。生產費用越高、競爭越劇烈，就越清楚地暴露出貴族已不能夠有利地經營自己的莊園和採用農業方面的最新成就了。和上一世紀法國與英國的貴族一樣，德國的貴族只是利用文明的發展在大城市中擺闊佬架子，任意揮霍自己的財產。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在社會教養和文化教養方面展開了競爭，在豪富和揮霍方面展開了競賽；在資產階級未取得政治統治之前，處處都要發生這種情況，而且這種競爭和競賽也和其他任何競爭一樣，結果總是更富有的一方獲得勝利。土貴族向宮廷貴族轉化，結果破產來得更快、更無法避免。構成貴族收入的那 3 % 是抵抗不住構成資產階級利潤的那 15 % 的。收入 3 % 的貴族只好去典押不動產，向貴族信貸機關借錢，以便能夠支付適合於貴族那個等級的開支，而這樣只能使自己更快地破產。有些鄉紳很聰明，逃避了破產，他們和新出現的資產階級地主一起組成了一個新的地主—企業主階級。這個階級在農業經營方面沒有封建主那些幻想，也不象貴族那樣疏忽大意；它把農業當做實業、當做工業來經營，並採用資產階級的手段——資本、專門知識和勞動。它和資產階級的統治相處得很好，所以在法國這個階級同資產階級和平共存，相安無事，並且還按照自己財富的多寡參加了資產階級的統治。這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它經營的是農業。

可見，貴族已經軟弱到這樣一種地步，就連它本身也已經部分地轉到資產階級隊伍中去了。

小資產者比貴族還軟弱；它更遠不能和資產階級抗衡。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一樣，也是在歷史上曾留下過足跡的最可憐的階級。它的瑣碎的地方性利益使得它即使在自己的全盛時代即中世紀後期，也只能夠建立地方性的組織，進行地方性的鬥爭，取得地方性

的成績，只能做到这样一点，即它和貴族的并存只是得到了容忍；而全面的政治統治它在什么地方也沒有达到过。随着資產階級的誕生，它連表面上的一点历史主动性也丧失了。它在貴族和資產階級中間背腹受敌，既受到前者政治优势的压制又受到后者雄厚資本的競争，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住在大城市里的較富裕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多少有些胆怯地归附于革命的資產階級。另一部分是較貧穷的特別是住在小城鎮里的小市民，他們恪守現存秩序，并以它特有的全部惰性力支持貴族。資產階級越發展，小資產者的处境就越坏。这后一部分小資產者也逐漸开始明白，在現有的条件下，他們是逃不掉破產的，而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虽然也很可能遭到这种破產，但他們至少还有可能向前迈一步，跨入資產階級的行列。他們的破產越是不可避免，他們就越会轉到資產階級的旗帜之下。当資產階級刚刚一取得政权的时候，在小資產者中間就会重新發生分裂。小資產階級为每一支資產階級的队伍准备了后备軍，此外它还在資產階級和从現在起提出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的无產階級之間，形成許多帶有激进色彩的政治流派和社会主义流派，如果詳細考察一下英国的下院或法国的众議院以及各种期刊，便可对这些流派有詳細的了解。資產階級用它的資本的猛烈炮火和林立的股份公司把小資產者压得越紧，这一群群毫无紀律、装备很坏的小資產者就越是束手无策，他們的逃竄也就越發乱无秩序。最后，要末他們就集合在无產階級长长的战斗行列后面并站到它的旗帜之下，要末就向資產階級无条件投降，此外別无出路。这种动人的場面在英国任何一次商业危机發生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而在法国今天就可以看到。在德国，我們只是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小資產階級在走投无路和極端需

要錢的時刻，勇敢地下決心和貴族斷絕關係而投靠于資產階級。

可見，小資產者和貴族一樣不能成為德國的統治階級。相反地，他們也日益屈從于資產階級。

剩下來還有農民和無產階級。

我們這裡所講的農民僅僅指小農戶、小租佃者和小土地所有者而言，不包括短工和雇農。農民和小資產者一樣，也是一個沒有辦法的階級，不過他們有一點勝過小資產者，即他們比小資產者有勇氣。可是在歷史上他們完全不能從事任何首創活動。甚至他們從農奴制的鐵鏈下解放出來也只是在資產階級的保护之下實現的。凡是由于沒有貴族和資產階級以致農民有可能進行統治的地方，例如在瑞士山區各州和挪威，封建時代以前的野蠻、地方的局限性、愚昧而怪誕的頑固和迷信、愚忠和愚善這些東西同時也就占居統治地位。凡是除農民之外還有貴族繼續存在的地方，例如在德國，農民就完全和小資產者一樣，處於貴族和資產階級兩面夾攻的地位。他們要想使農業利益不致受到日益強大的工商業的侵害，就得投靠于貴族。他們要想使自己不致被貴族特別是資產階級地主的競爭所壓倒，就得投靠于資產階級。他們到底歸附哪一邊，這要看他們的財產狀況。德國東部的富裕農民對雇農還保有一些封建權力，他們各方面的利益都和貴族有十分密切的聯繫，所以他們不會真的和貴族一刀兩斷。德國西部由于貴族的莊園被分割而出現的小土地占有者和東部處于世襲統治之下而且有的還要服徭役的小農，這兩種人受貴族的直接壓迫太厲害了，或者說他們和貴族之間的对立太尖銳了，所以他們不能不站到資產階級那一邊。普魯士的各個省議會證明，實際情況確是如此。

可見，很幸運，農民的統治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農民自己也

很少想到这件事，所以他們現在已經大部分置身于資產階級支配之下。

而无产者，即 vulgo〔一般所謂的〕工人階級怎么样呢？我們很快就要詳細地論述他們。这里我們只指出他們成分不一的情况。工人分成雇农、短工、帮工、工厂工人和流氓无产階級，而且又散居在人口稀疏、中心城市少而不發达的广大地区上，这就使得他們不可能了解彼此利益的共同性，不能互相諒解并組成一个團結一致的階級。由于他們成分不一，住地分散，所以他們只能看到自己最切身的日常利益，仅仅希望好好工作以后能得到合理的报酬。換句話說，这使得工人們的目光短浅到这样一种程度：在他們眼里，他們的利益和雇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工人的每一支队伍都成了雇用他們的那个階級的援軍。雇农和短工維護貴族或雇用他們种地的农民的利益。帮工在思想和政治方面都以自己的師傅为轉移。工厂工人听憑厂主在要求保护关税的运动中利用自己。流氓为了两个塔勒就可以在資產階級、貴族和警察彼此發生摩擦时替他們做打手。凡是在两个雇主階級各自坚持对立的利益的地方，被他們雇用的工人之間也就进行着同样的斗争。

由此可見德国工人群众对夺取公共事务領導权是如何沒有准备。

我們把前面講过的总结一下。貴族已經衰敗不堪，小資产者和农民的整个生活状况使得他們太軟弱无力，工人还远不够成熟，所以他們都不可能在德国成为統治階級。剩下来的就只有資產階級了。

德国現状可悲之点主要在于：到現在为止，还没有一个階級强大到足以使自己的生产部門变成全民族的 *par excellence*〔主导〕

生产部門，从而自己也成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从10世紀以来在历史舞台上出現的一切等級和階級——貴族、农奴、徭役农民、自由农民、小資产者、帮工、工場工人、資产者和无产者——肩并肩地存在着。他們之中那些靠自己的財產而成为某个生产部門的代表者的等級和階級，即貴族、自由农民、小資产者和資产者，按照各自的人数、財富和在全国生产中所占的地位而瓜分政治統治权。前面已經講过，这样瓜分的結果，貴族分得的最多，小資产階級分得的最少。資产者的正式身份只是小資产者，而真正的农民根本不为人所注意，因为他們自身势力微弱而且分散在其余的階級中間。这种以官僚为代表的制度是德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軟弱低能、死气沉沉和烏烟瘴气在政治上的反映。在国内，和这种制度相适应的就是德国的分割状态：德国分成38个地方的和省的邦，而奥地利和普魯士又分成若干独立省；在对外关系上，这种制度对外来的压榨和打击显得可耻的无能。这种普遍的可悲状态的根源就是普遍缺少資本。貧穷的德国的每一个階級从一开始就带有小市民的庸碌的标记，和其他国家相应的階級比較起来，它們又穷又落后。从12世紀以来，德国的上層和下層貴族同家財豪富、心胸开闊、无憂无慮、凡事坚决果断的法、英貴族比較起来，显得多么小資产階級气呵！德国帝国城市和汉撒城市的市民同14、15世紀造反的巴黎資产者相比，同17世紀的倫敦清教徒相比，显得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多么偏狹短浅啊！就是在今天，我們的最大的工业家、銀行家、船主同巴黎、里昂、倫敦、利物浦、曼徹斯特的交易所巨头比較起来，也是多么小資产階級气呵！甚至德国的工人階級也是渾身浸透着小資产階級气息。可見，小資产階級虽然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低微，可是它至少有一点能够聊以自慰，即它是德国的

典型阶级，它把自己那种自甘屈辱和为日常琐事操心的特点也传染给其他阶级了。

这种可悲的状况的出路何在呢？出路只有一条。应当有一个阶级强大到足以使全民族的提高依赖于它的提高，使所有其他阶级利益的发展依赖于它的利益的发展和演进。这一个阶级的利益在目前应该成为民族的利益，而这个阶级在目前则应该成为民族的代表者。从这时候起，在这个阶级以及跟着它走的全民族的大多数人，便同政治现状发生了矛盾。政治现状是与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彼此冲突这种已不存在的情况相适应的。新的利益受到了束缚，并且就连本来是现状的服务对象的那些阶级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发觉现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了。这种情况的后果必然是消灭现状，不管是用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方法。代之而起的将是一个阶级的统治，这个阶级在目前是全民族大多数的代表者，它的统治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

既然现状即普遍虚弱无能的根源在于缺少资本，那末同样，只有拥有资本，只有资本集中在一个阶级的手里，才能赋予这个阶级以必要的力量去消灭现状。

在德国有没有这样一个能够摧毁现状的阶级呢？有的，有这样一个阶级，尽管和英国、法国的相应的阶级比较起来，它还是个小资产阶级气息非常浓厚的阶级，可是到底它是存在着的，具体说来就是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在各个国家里，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在官僚君主制度下所建立起来的妥协，都被它摧毁，并通过这种办法首先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

在德国，资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把大部分（起码是这样）地主一

企业主、小资产者、农民、工人、甚至某些贵族的利益同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面的阶级。

在德国，资产阶级政党是唯一明确意识到自己应该用什么来代替现状的党，只有这个党不局限于抽象原则和历史演绎，而要求实行非常明确肯定、具体易行的措施；只有它具有一定的组织性（至少在地方和省的范围内是这样），只有它多少算有个行动计划。一句话，这个党是带头和现状做斗争并直接参加消灭它的活动的党。

可见，资产阶级的党是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党。

因此，问题就仅仅在于资产阶级是否已到了必须通过消灭现状夺得政权的地步？和软弱的敌人比较起来，它自身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消灭现状？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这个问题。

德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是工厂主。整个国内贸易、汉堡和不来梅以及斯德丁一部分的海上贸易的繁荣、银行业的繁荣，都依赖于工业的繁荣。铁路收入依靠它，因而交易所的生意也有一大部分要依靠它。不依赖于工业的只有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的谷物、羊毛出口商和一小伙外国工业品进口商。因此，工厂主的要求就是整个资产阶级和目前依附于它的那些阶级的要求。

工厂主又分做两类：第一类进行原料的初步加工，出售的是半成品；第二类买进半成品，制成成品供应市场。属于第一类的是纺纱厂厂主，属于第二类的是织布厂厂主。第一类在德国还包括制铁业的企业主……[⊖]

要想能够利用新发明的辅助工具，修筑良好的道路，买到便宜

[⊖] 手稿缺4页。——编者注

的機器和原料，雇到經過良好訓練的工人，就必須建立整套的工業體系。要建立整套的工業體系，就需要把一切工業部門緊密地聯繫起來，就需要有依賴於內地工業的、商業繁榮的沿海城市。這個原理早已為經濟學家們所闡明。可是，在只有英國人不怕任何競爭的今天，要建立這樣一個工業體系就需要有一套完善的、適用於一切受到外國競爭威脅的部門而且經常隨着工業狀況而改变自己形式的保護關稅制度。普魯士的現政府不能夠建立起這樣一種制度，加入關稅同盟的各邦政府也都不能夠做到這一點。這樣一套制度只能由執政的資產階級自己來建立和實行。這也說明德國資產階級不能再沒有政權了。

在德國尤其需要這樣一套保護關稅制度，因為那裡的工場手工業已經奄奄一息了。如果不規定出一套完整的保護關稅辦法，工場手工業就經不住英國機器的競爭，而所有到現在為止還靠工場手工業謀生的那些資產者、小資產者、工人也都要遭殃。這就使德國資產者完全有理由情願用德國的機器把工場手工業的殘余消滅掉。

可見，保護關稅是德國資產階級所需要的，而且只能由資產階級自己來實現。因此，單從這一點看來，它也應該掌握國家政權。

工廠主不能充分有利地利用他們的資本，這不僅是因為關稅不夠高，而且還因為有官僚政治存在。如果說在關稅立法方面他們所碰到的是冷淡，那末在和官僚的相互關係上他們所碰到的是政府方面公然無忌的敵視。

官僚政治之所以產生就是為了統治小資產者和農民。這兩個階級散居在小城市或鄉村里，他們的利益超不出最狹隘的地方範圍，因此他們的眼光必然象他們狹隘的生活條件一樣短淺狹隘。

他們不能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就見識而言，他們也不可能使各种互相冲突的利益彼此协调起来。各种利益犬牙交错这种最古怪的现象（我們只要想一想行会和它們之間的冲突就够了），正是發生在小資產階級欣欣向荣的那个文明發展阶段上。这样，小資產者和农民就不能沒有一个强大的和人数众多的官僚机构。他們不得不接受监护，以免陷于極度混乱或讓无数次的訴訟弄得傾家蕩产。

可是，小資產者所必需的官僚政治很快就变成了資產者难以忍受的束縛。早在工場手工业时代，官吏們的监督和干涉已經令人感到非常不便了；在这种监督之下，工厂工业几乎是无法存在的。到目前为止，德国工厂主为了尽可能摆脱官僚机构的监督所使用的手段是賄賂，这一点無論如何也无法怪罪他們。但是这种手段只能替他們减去少許的負担；这一則是他們无法向自己接触到的一切官吏行賄，再者行賄也不能使他們不支付額外开支，不能使他們不付給律師、建筑师、机械师报酬以及由监督所引起的一些其他开支，行賄更不能使他們避免預料不到的忙閑不均現象。工业越發展，“忠于职守的官吏”就越多，这些人或者只是由于狹隘，或者是出于官僚对資產階級的仇恨，总是百般苛刻地刁难工厂主。

因此，資產階級不得不摧毀这个目空一切、吹毛求疵的官僚机构的势力。只要国政和立法一轉到資產階級的控制之下，官僚就不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也正是从这时候起，迫害資產階級的人变成了它的恭順的仆从。过去那些專門为了便于官吏对付工业資產者的規章和詔令退位了，新制定的規章是便于工业家对付官吏的。

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所有資產階級的派系都直接关心工厂工业的最迅速的高漲，而工厂工业在官僚的吹毛求疵的制度下是不能發展的，所以資產階級就更需要尽快地摧毀官僚机构的势力。

使关税体系和官僚机构服从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资产阶级所最迫切希望实现的两项措施。可是它的需要远远不止于此。它要根本改变差不多德国所有各邦政府的整个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因为这一整套制度纯粹是用来维护和支持资产阶级一向力图加以摧毁的社会制度的。贵族和小资产者得以共存并处的条件，和资产阶级所必需的生存条件完全不同；而在德国各邦，只有前者是得到正式承认的。就拿普鲁士的现状来看吧。小资产者能够听命于行政方面和司法方面的官僚制度，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财产和个人托付给“独立的”、即具有官僚式独立性的法官阶级胡乱摆布，而这个阶级因此也就保护他们不受封建贵族、有时也不受行政机关官僚的侵犯，但资产者就不能够这样做。在有关财产的诉讼方面，资产者所需要的是至少必须保证公开审理，而在刑事诉讼方面，除公开审理而外还要求实行陪审制，把司法置于资产者代表人物的经常控制之下。小资产者可以同意贵族和官吏不受普通的裁判，因为小资产者在国家生活中的这种屈辱表现，是完全和他们的低微的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可是不使本阶级在社会和国家中取得首位就非溃灭不可的资产者，却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小资产者可以把地产方面的立法权让给贵族独揽而不致损害自己的宁静生活；他们应该这样，因为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在城市中的利益不受贵族的影响和侵犯，已经够手忙脚乱的了。资产者则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贵族任意地调整乡村的财产关系，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要得到充分的发展，就需要尽量地对农业的经营也采取企业方式，需要建立一个农业企业家的阶级，需要自由出售和自由支配地产。由于地主免不掉要抵押不动产取得贷款，资产者就有可能利用这一点迫使贵族同意资产阶级可以干预有关地产的立法，至少在典

押法方面可以干預。小資產者的營業規模不大，資本周轉緩慢，顧客人數不多面也不廣，因此糟糕的普魯士舊商法並沒有使他們吃大苦頭，他們甚至还很感謝它給予他們的那一点点保障；可是對資產者說來這種商法就是無法忍受的了。小資產者所進行的交易非常簡單，大商人之間很少做這種買賣，小資產者的交易差不多總是零售商的買賣或者是生產者直接賣貨給消費者，所以小資產者就很少遭到破產，並且很容易遵守普魯士的舊破產法。這種法律規定，用債務人的財產抵償債務的時候，期票債務應該比其他票據的債務優先償還；可是通常全部財產都下了司法人員的腰包。這些法律的制定首先是為了處理債務人財產的司法官員的利益，其次也保護所有非資產者的利益不受資產者的侵犯。這些法律特別保護貴族，因為貴族把穀物送交買主或代售者的時候總是收到或向他們索取期票；而凡是每年僅僅出售一次貨物，收進期票就算完成全部交易的人，也都受到這些法律的庇護。在與商業有關的人們中間，受到保護的仍然是銀行家和批發商，而工廠主的利益却被大大地忽視了。資產者只是和商業家打交道，他們的顧客遍布各地，他們從世界上每個角落收進期票，所以他們需要一套非常複雜的處理各種交易的制度，他們隨時都有遭到某種破產的危險。這樣的資產者碰到這些荒唐的法律，只有垮台。小資產者關心本國总的政治情況只是為求平安無事；由於他們切身利益所涉及的范围很小，他們看不到各國之間的關係。而資產者是和極遙遠的國家通商，或者要和它們競爭，如果不對本國的對外政策保持最直接的影響，就不能夠獲得巨大發展。小資產者能夠容許官僚和貴族向他們徵稅，這和他們服從官僚政治出於同樣的原因。資產者最關心的是在分配社會負擔的時候尽可能地少損害他們的利潤。

总之，小资产者可以满足于用自己的消极和顽固来对抗贵族和官僚，并且靠本身特有的 *vis inertiae* [惰性力] 保持对社会权势发生某些影响，可是对资产者说来这些都是做不到的。他们要使自己的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使自己的利益在立法、行政、司法、税务和对外政策等方面成为首要的利益。为了不致湮灭，资产阶级就要一往直前，每天都要增加资本，每天都要降低产品的生产费用，每天都要扩大商业关系和市场，每天都要改善交通。世界市场上的竞争驱使它这样做。为了有可能自由地、充分地发展，它就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需要使一切其他的利益服从自己的利益。

而德国资产阶级正是在目前需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才能免于湮灭，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讲到保护关税和资产阶级同官僚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时已经指出了。可是这一点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却是目前德国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状况。

1845年英国工业的繁荣和由此而产生的铁路股票投机，对法国和德国发生的影响比过去任何兴旺时期都要强烈得多。德国的工厂主做了赚钱的买卖，而德国整个商业活动的高涨也随之而开始。农业区的人们在英国找到了销售自己的谷物的良好市场。普遍的繁荣活跃了金融市场，便利了借贷，把许多数额较小的资本吸引到市场上来，而这些资本在德国有很多几乎是找不到用场的。⊖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3月—4月

原文是德文

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
1929年第一次发表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 以下各页手稿缺。——编者注

弗·恩格斯

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

自从普魯士国王急需現錢和貸款因而不得不發布二月三日聖諭³⁴以后，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已不怀疑，德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即以“仁政”見称的过去的“基督教德意志”的統治，已临近末日，虽然它竭力掙扎而且国王也發表了威胁性的御前演說。于是，德国资产阶级可以看作这就是自己統治开始的日子来到了。这个聖諭本身也无非是对资产阶级力量的承認，虽然这种承認还籠罩着波茨坦的浓密的烟霧。但联合省議會只輕輕一吹，大部分烟霧就消散了，而所有这些基督教德意志的怪影，也会很快絕迹的。

但是，既然中等阶级开始居于統治地位，那末首先就該要求把德国以及关税同盟的整个貿易政策，从德意志各邦君主、他們的大臣以及对工商业問題一窍不通而又高傲的官吏等这些外行手里接收过来，交給熟悉这一行并和它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去掌握。換句話說，不管是保护关税即級差关税問題还是自由贸易問題，都應該完全交給资产阶级去处理。

柏林联合省議會向政府表明，资产阶级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最近关于关税問題的討論，已經相当明显而又尖銳地向施潘道政府制度³⁵的代表表明，他們不能理解物質利益，因此也不可能捍衛和支持这些利益。单只克拉柯夫事件³⁶就足以把神聖同盟中的威

廉[⊖]及其大臣当做最无知的蠢汉或罪恶深重的出卖国家福利的叛徒加以痛斥了。但是使陛下及其大臣閣下感到可怕的是，現在討論的还有許多其他問題；在探討这些問題时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話，唯独沒有贊揚君主和大臣（不管是去世的还是健在的）的才干和洞察力的。

資產階級內部也正在工商业問題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然而毫無疑問，坚持保护关税即級差关税的一派沒有問題是势力最强、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事实上，資產階級如不采取一些硬性措施来衛护和鼓励自己的工商业，他們就不能保住自己的陣地，巩固起来并取得絕對权力。如果不防止外国工业的侵入，十年之內他們就会垮台。很可能就連这种防止也不会使它长期得到真正的好处。他們等得太久了，在他們尊敬的君主多年来包裹他們的襁褓里躺得太乖了。他們受到四面八方的包围；別人赶过了他們，占去了他們最好的陣地，而他們却乖乖地挨着“拳头”，从来也拿不出足够的勇气摆脫自己那些虽然蠢笨但是極為仁慈的长官和上司。

現在情形就不同了。現在德意志各邦君主只能做資產階級的奴仆，成了可有可无的人。既然資產階級还有時間和可能来建立自己的政权，保护德国工业和德国商业就是他們唯一能够借以支持的基础。資產階級想（这是應該的）从德意志各邦君主那里得到的东西，也是可以得到的。

但是，和資產階級同时并存的还有一批数量相当可觀叫做无产者的人們——工人，无产階級。

試問，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对这些人会有什么好处呢？他們会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編者注

因此得到更高的工資，吃穿更好一些，居住条件更有益于健康嗎？会有更多的空閑時間休息和學習嗎？他們会得到一些錢来更合理、更注意地教养自己的子女嗎？

为保护关税制度进行辯护的資產者先生們，从来也沒有放过一个机会把工人階級的福利摆在首位。照他們說来，保护工业制度实行以后，工人会过真正的天堂生活，德国就会因而变成无产者的“流着奶与蜜”的迦南人之地^①。但是自由貿易派却說，只有实行他們的制度，无产者的生活才会象“在上帝怀抱里”那样自在快活。

这两派中还有很多目光短浅的人，他們真的相信自己的話是真話。但这两派中比較聪明的人都很清楚，上面那些話不过是一种騙局，目的只是为了迷惑群众，把他們拉到自己方面来。

聪明的資產者很清楚，不論占統治的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貿易制度，或者是以这两者的原則为基础的混合制度，工人得到的工資都不会多于他維持起碼生活所絕對必需的。不論实行哪种制度，工人得到的都只能是維持他这架开动着的工作机所必需的。

这样一来，起决定作用的是保护关税派还是自由貿易派，乍一看来，对无产者好象都是完全无所謂的。

但是，前面已經指出，德国資產階級需要保护关税是为了根除以封建貴族为代表的中世紀残余和“天生的”現代寄生虫，而且也是为了毫无阻碍地揭示自身的內在本質，所以連工人階級也想为資產階級取得无限的統治权出一把力。

只有到仅有一个剝削和压迫階級——資產階級的时候，只有到貧困不会时而归咎于这个等級时而又归咎于那个等級，或者只

^① 見旧約全書出埃及記第3章第17节。——譯者注

归咎于君主专制制度及其官吏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开始最后一次决定性的战斗，即有产者和无产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战斗。

那时候，战场上就不会有任何多余的障碍物，也不会有任何附带的次要的任务，敌对双方的障地就会很明确。

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以后，由于自己的处境而觉醒起来的工人，也会取得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进步；从这时起，起来反对现存制度的就不是单个工人，或者顶多几百几千个工人，而是他们全体、一个有着自己特殊利益和原则的统一的阶级，他们团结一致地按照总的计划行动，同自己最后一个最凶恶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战斗。

这次战斗的结局是十分清楚的。象贵族阶级和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中等阶级的致命打击一样，资产阶级一定要被无产阶级打倒。

私有制也要和资产阶级一道被消灭，工人阶级的胜利将使一切阶级统治和等级统治一去不复返。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6月初

载于1847年6月10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4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卡·馬克思

——
哲学的貧困

答蒲魯东先生的
“貧困的哲学”³⁷

卡·馬克思写于 1847 年上半年
1847 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刊行于
巴黎和布魯塞尔
署名: 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 1847 年版譯的, 并参考
了 1885 年、1892 年德文版、1896
年法文版所做的訂正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A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 Karl Marx.



PARIS.
A. FRANK,
69, rue Richelieu

BRUXELLES.
C. G. VOGLER,
2, petite rue de la Madeleine.

1847

“哲学的贫困”第一版的封面

序 言

蒲魯东先生不幸在欧洲异常不为人了解。在法国，人家認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經濟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認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經濟学家著称。我們是德国人同时又是經濟学家，我們要反对这一双重錯誤。

讀者将会明白，为什么我們在做这件不討好的工作时常常不得不放下对蒲魯东先生的批判，而去批判德国的哲学，同时还要对政治經濟学作某些評論。

卡尔·馬克思

1847年6月15日于布魯塞尔

蒲魯东先生的著作不单是一本政治經濟学的論著，也不是一本平常的書籍，而是一部聖經；其中应有尽有，如“神秘”、“来自神的怀抱的秘密”、“啓示”等。但是，因为今天預言家受到的裁判要比普通的作者更严格，所以讀者必須甘願和我們一起經過“創世記”的貧瘠而陰暗的杂学的領域，然后才和蒲魯东先生一起升入**超社会主义**的縹緲而富饒的境地（見蒲魯东“貧困的哲学”前言第3頁第20行）。

第一章

科学的發現

第一节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一切自然产品或工业产品所具有的那种維持人类生存的性能，有一个专门名称，叫做**使用价值**。这些产品具有的互相交换的性能，則称为**交换价值**…… 使用价值怎样变成交换价值呢？…… 經濟学家們并没有很仔細地闡明(交换)①价值观念的起源；因此我們必須对这一点加以論述。由于我所需要的許多东西在自然界里为数有限或者根本没有，因此我不得不去协助生产我所缺少的东西，可是，由于我不能单独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就会向別人，即向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建議，把他們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同我所生产的产品**交换**。”(蒲魯东，“貧困的哲学”第一卷第二章)

蒲魯东先生打算先給我們說明价值的二重性，“**价值内部的區別**”，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过程。我們必須和蒲魯东先生一起来談談这种神秘的变化。現在我們来看一下，根据我們作者的意見，这种变化是怎样發生的。

絕大多数的产品不是自然界供給的，而是工业生产出来的。如果产品的需要量超过自然界所提供的数量，人們就得求助于工业生产。在蒲魯东先生的想象中，这种工业是什么呢？它的起源怎样呢？个人需要很多东西，可是“不能单独生产这些东西”。需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要滿足的多种需求，就決定要生產多种東西（不生產就沒有產品）；要生產多种多样的東西，就已經決定參加這項生產的不止一個人。既然認為從事生產的不止一個人，那末這就完全決定了生產是建立在分工之上的。因而蒲魯東先生所假定的那種需要本身就已經決定了全盤的分工。既假定有分工，就是假定有交換存在，因此也就有交換價值。這樣看來，本來一開頭就可以假定有交換價值存在。

然而蒲魯東先生喜歡繞圈子。我們就跟他一起轉吧，轉來轉去總是回到他原來的出發點去。

為了擺脫每個人單獨生產的狀態並達到交換，蒲魯東先生說：“我就求助於各行各業中我的合作者”。這樣一來我就有了從事各行各業的合作者，雖然按照蒲魯東先生的假定我們（我和其他一切人）這時還沒有擺脫魯濱遜式的那種和社會隔絕的孤獨狀態。合作者和各種不同的業務，分工和這種分工所包含的交換等都是憑空掉下來的。

總括起來就是：我有許多建立在分工和交換基礎上的需要。蒲魯東先生既然假定有這些需要，因而也就是假定有交換和交換價值存在，而交換價值的“起源”正是他想“比其他的經濟學家更仔細地闡明”的。

同樣，蒲魯東先生也可以把整個事態倒轉過來而仍然不損害他的結論的正確性。要說明交換價值就要有交換。要說明交換就要有分工。要說明分工就必須有使分工成為必要的種種需要。要說明這種需要，就必須“假定”有這種需要，但是並不是否定這種需要，這和蒲魯東先生前言中的第一個定理：“假定上帝就是否定上帝”（前言第1頁）正好相反。

假定分工是已經知道的事情的蒲魯东先生，怎样用分工來說明他始終不知道的交換价值呢？

“个人”开始“向別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議”建立交換，并把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区别开。合作者們如果接受这种区别，那末要蒲魯东先生“操心”的只是記錄一下既成的事实、并在他的政治經濟学論文中标明和“列入”“价值观念的起源”。但是他总还应该把这个建議的“起源”講給我們听听，此外也应该給我們講講这位单独的个人，这位魯宾逊怎么会突然想到向“他的合作者”提出这种建議，而这些合作者又怎么会毫无异議地就接受了这个建議。

蒲魯东先生並沒有細究这些关系的始末，他只是給交換这一事实盖了历史的印記，把交換看做急欲确立这种交換的第三者可能提出的建議。

这就是蔑視亚当·斯密和李嘉圖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蒲魯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

交換有它自己的历史。它經過各个不同的阶段。

曾經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在中世紀，当时交換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費的过剩品。

也曾經有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不仅剩余品，而且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換。对于交換的这个第二阶段，即二次方的交換价值应该怎样說明呢？

对这点蒲魯东先生会找到很現成的回答：假定有人曾“向別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議”把交換价值提高到二次方。

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們一向認為不能出讓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換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讓了。这个时期，甚至象德

行、愛情、信仰、知識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買賣的對象，而在以前，這些東西是只傳授不交換，只贈送不出賣，只取得不收買的。這是一個普遍賄賂、普遍買賣的時期，或者用政治經濟學的術語來說，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質的東西都變成交換價值并到市場上去尋找最符合它的真正價值的評價的時期。

對於交換的這個新的和最後的階段，即三次方的交換價值又該怎樣說明呢？

對這點蒲魯東先生也會找到現成的回答：可以假定曾經有人“向別人，即向各行各業中他的合作者建議”把德行、愛情等都變成交換價值，把交換價值提高到三次方，即最後一次乘方。

可見，蒲魯東先生的“歷史的敘述的方法”事事適用，它能答復一切和說明一切。特別是在要從歷史上來說明“某種經濟觀念的產生”的時候，蒲魯東先生就會假定一個人，這個人向別人，即向各行各業中他的合作者建議去完成這個產生的動作，這樣問題就解決了。

從此以後，我們就把交換價值的“產生”當做一個既成事實；現在我們只要闡明一下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關係就行了。且聽蒲魯東先生是怎麼說的：

“經濟學家們很清楚地揭明了價值的二重性；但是他們並沒有同樣明確地闡明價值的**矛盾的**本性；我們的批判就從這裡開始…… 只指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這種驚人的對照是不夠的，經濟學家們慣於把這種對照看成非常簡單的事情，應當指出，在這種虛構的簡單中卻隱藏着深奧的秘密，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弄清這個秘密…… 用術語來說，就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成反比。”

假如我們已經領會了蒲魯東先生的思想的話，那末他要肯定

的就是如下四點：

(1) 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構成“驚人的對照”，形成互相對立。

(2) 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成反比，互相矛盾。

(3) 無論是兩者的對立或是矛盾，經濟學家都既沒有看出也不認識。

(4) 蒲魯東先生的批判從終點開始。

我們也從終點開始，並且為了消除蒲魯東先生對經濟學家們的責難，我們就讓兩個相當有名的經濟學家來講講話。

西斯蒙第：“商業把一切東西都歸結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對立”。（“概論”布魯塞爾版第二卷第162頁38）

羅德戴爾：“一般地說，國民財富（使用價值）^①是隨著個人財產（因交換價值的上升）的增加而減少；如果個人財產因交換價值的下降而減少，那末國民財富通常會相應地增加。”（“國民財富的性質和起源的研究”，拉讓蒂·德·拉瓦伊斯譯，1808年巴黎版39）

西斯蒙第把他的主要學說建立在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對立上，這個學說認為，收入的減少和生產的增長成正比例。

羅德戴爾把他的體系建立在這兩種價值的反比例上，而且他的那套理論在李嘉圖時代非常流行，以致後者可以把它當作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來談。

“由於交換價值和財富（使用價值）^②的概念混淆不清，有人就竭力斷言，只要減少商品的數量，即減少生活所必需的、有用的或能享受的東西的數量，就可以增加財富。”（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原理”，孔斯坦西奧譯，讓·巴·薩伊注，1835年巴黎版第二卷“論價值和財富”章40）

我們看到，蒲魯東先生以前的經濟學家們“已經看出”對立和

① ②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矛盾的深奧秘密。現在再来看看，蒲魯东先生在这些經濟學家們以后又是怎样說明这个秘密的。

如果需求不变，那末产品的交換价值随着供給的增长而下降，換句話說，产品越是供过于求，它的交換价值或价格也就越低。vice versa [反过來說]，越是求过于供时，供应的产品的交換价值或价格也就越高；換句話說，供应的产品越少，产品也就越貴。产品的交換价值取决于产品的多少，不过这总是对需求而言。假定某种产品不仅極為稀少，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如果对它沒有需求，这个独一无二的产品也是太多，也是多余的。相反地，假定某种产品有千百万个，可是如果它还不能滿足需求，也就是說对这种产品的需求非常大，那末这种产品仍然是稀少的。

這些話可以說是老生常談了，但是为了弄清蒲魯东先生的秘密，在这里我們还得重述一下。

“因此，按这一原則徹底推究下去，就可以得出世界上最合邏輯的結論：凡屬日用必需而数量又是无穷的东西就一錢不值，毫无用处但極端稀少的东西价格就不可估量。但是最困难的是，实际不会容許有这两种極端，因为一方面人类生产的任何产品决不会在数量上增加到沒有止境的地步，另一方面即使最稀少的东西也会有某种用处，否則就不会有任何价值。因此，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虽然按性質來說經常力圖互相排斥，但两者必然是互相联系的。”（第一卷第39頁）

蒲魯东先生最困难的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干脆忘記了需求，忘記了任何东西只有在对它有需求的条件下，才說得上多或少。他撇开需求不談，就是把交換价值和稀少、把使用价值和众多混为一談。他說，“毫无用处但極端稀少的东西价格就不可估量”，这种說法实际上正是表明，稀少就是交換价值。“極端稀少和毫无

用处”，这是純粹的稀少。“价格不可估量”，这是交换价值的最高限度，即純粹的交换价值。他在这两个术语之間划了一个等号。这样，交换价值和稀少就成了同义的术语。蒲魯东先生得出这个臆造的“極端的結論”，实际上他触及的并不是事物，仅仅是那些表达事物的术语，这说明他对修辞学要比邏輯学有才能得多。他以为得出了新的結論，其实只是源源本本地重新發現了他当初的假定而已。也就是用这种同样的手法，他才把使用价值和純粹的众多混为一談。

蒲魯东先生在交换价值和稀少之間、在使用价值和众多之間划了等号以后，既不能在稀少和交换价值中發現使用价值，又不能众多和使用价值中發現交换价值，这才使他大吃一惊；他后来發現实际不会容許有这种極端，于是只好相信神秘。蒲魯东先生以为，不可估量的价格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沒有購買者，可是只要他撇开需求不談，那就永远找不到購買者。

另一方面，蒲魯东先生所謂的众多好象是一种自然發生的現象。他完全忘記了正是人創造了这种众多，忘記了决不忽略需求是符合人的利益的。不然蒲魯东先生怎么能够断言，極有用的东西价格应当非常低廉甚至一錢不值呢？相反地，他應該得出这样的結論：要提高極有用的东西的价格和交换价值，就必须限制这些东西的众多，縮减这些东西的生产。

从前法国种植葡萄的人要求頒布一条法律来禁止开辟新的葡萄园，这和荷兰人烧毁亚洲的香料和鏟除摩鹿加群島的丁香树如出一轍，他們就是想减少众多来提高交换价值。整个中世紀人們都奉行了这个原則，他們以法律規定，一个师傅只可以雇用多少帮工、使用多少工具。（見安德森“商业史”⁴¹）

蒲魯东先生把众多当做使用价值，把稀少当做交换价值(証明众多和稀少成反比是再容易不过的)，就把使用价值和供給、把交换价值和需求混为一談。为了使这个对照更加明显，他就換了一个术语，用“由意見决定的价值”来代替交换价值。这样，斗争就轉移到另一个战场，現在一方面是效用(使用价值，供給)，另一方面是意見(交换价值，需求)。

这两种对立的力量怎样調和呢？怎样使它們取得一致呢？不能在它們中間找出哪怕是一点共同之处呢？

蒲魯东先生大声說，当然有，这就是决定的自由。价格是需求和供給之間、效用和意見之間进行斗争的产物，它不会代表永恒的公平。

蒲魯东先生进一步扩大这个对照：

“我作为自由的購買者，我就是我的需要的裁判，是物品适用与否的裁判，是对这个物品願意出多少价格的裁判。另一方面，你作为自由的生产者，那你就是制造物品用的資料的主人，因此，你就能够縮减你的費用。”(第一卷第41頁)

由于蒲魯东先生把需求或交换价值和意見当作同一个东西，他就只得这样說：

“已經証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引起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間的对立。只要自由意志存在，怎么能解决这个对立呢？不牺牲人，怎么能牺牲自由意志呢？”(第一卷第41頁)

因此，不会有什么結果的。在这两种可說是不能比較的力量之間，在效用和意見之間，在自由的購買者和自由的生产者之間存在着斗争。

讓我們更仔細地来看看問題吧。

供給并不只是代表效用，需求也不只是代表意見。难道需求者不也同样供給某种产品或貨幣(代表一切产品的符号)嗎？既然他供給了这些东西，难道他不也代表，象蒲魯东先生所說，效用或使用价值嗎？

另一方面，难道供給者不也需求某种产品或貨幣(代表一切产品的符号)嗎？因此他不也就成了意見的代表，由意見决定的价值的代表或交換价值的代表嗎？

需求同时又是供給，而供給同时又是需求。因此，蒲魯东先生随便把供給和效用、需求和意見混为一談的那种对照，不过是建立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之上而已。

蒲魯东先生称为使用价值的东西，其他的經濟学家也可以称为由意見决定的价值。我們就只举施托尔希的話为例吧(“政治經濟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48、49頁⁴²)。

根据施托尔希的意見，我們觉得需要的东西就叫做需要，我們給予价值的东西就叫做价值。大多数东西之所以有价值，仅仅由于它們可以滿足意見所产生的需要。关于我們需要的意見是可以改变的，因此，东西的效用(只是表現这些东西和我們的需要的关系)也是可以改变的。就是自然的需要也在不断地变化。实际上，各国人民的主要食物的差別就非常之大！

斗争不是發生在效用和意見之間，而是發生在出卖者所要求的交換价值和購買者所提出的交換价值之間。产品的交換价值每次都是这些互相矛盾的估价的合力。

归根到底，供給和需求才使生产和消費互相接触，但是生产和消費是以个人交換为基础的。

供給的产品本来并没有效用。它的效用是由消費者确定的。

即使产品的效用得到公認，但产品究竟不仅仅代表效用。在生产过程中，产品和原料、工人的工資等一切生产費用进行交換，一句話，和一切具有交換价值的东西进行交換。因此在生产者的心目中，产品代表交換价值的某种总和。生产者所供給的不仅是有效用的物品，而且主要是某种交換价值。

至于需求，它只有在掌握交換手段的条件下才有效。而这些交換手段本身也是产品，也是交換价值。

因此我們在供給和需求中，一方面發現花費过交換价值的产品和出卖这种产品的需要，另一方面又發現花費过交換价值的資金和購買的願望。

蒲魯东先生把自由的購買者和自由的生产者对立起来。他使两者具有純形而上学的性質。这也就促使他說：“已經証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才引起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的对立。”

生产者只要是在以分工和交換为基础的社会里进行生产（这正是蒲魯东先生的假定），他就不得不出卖。蒲魯东先生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資料的主人，但是他却同意我們說生产者的生产資料不取决于自由意志。不仅如此，而且这些生产資料大部分又都是生产者从別处取得的产品，并且在現代的生产条件下，他并不是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現在生产力發展的水平責成他在一定的限度內进行生产。

消費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他的意見是以他的資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組織。当然，工人买馬鈴薯和妇女买花边这两者都是根据本人的意見行事的。但是他們意見的差別就是由于他們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不同，而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別却又是社会組

織的產物。

需要的整個體系究竟是建立在意見上還是建立在整個生產組織上？需要往往直接來自生產或以生產為基礎的情況。世界貿易幾乎完全不是由個人消費的需要所決定，而是由生產的需要所決定。同樣，再舉另一個例子來說，對公證人的需要難道不是以一定的民法（民法不過是所有制發展的一定階段，即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的表現）的存在為前提嗎？

蒲魯東先生並不滿足於從需求和供給的關係中去掉了剛才我們說過的要素。他使抽象達到極端，把一切生產者化為一個唯一的生產者，把一切消費者化為一個唯一的消費者，然後使這兩個虛構的人物互相鬥爭。但在現實的世界裡情況並不是這樣。供給者之間的競爭和需求者之間的競爭構成購買者和出賣者之間鬥爭的必然要素，而交換價值就是這個鬥爭的產物。

蒲魯東先生去掉了生產費用和競爭以後，就能随心所欲地把需求和供給的公式弄得荒謬絕倫。

他說：“供給和需求無非是兩種儀式，使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互相接觸，並促進兩者之間的調和。這是兩個電極，把它們連接起來就會發生接合，又名交換。”（第一卷第49、50頁）

同樣可以說，交換只是使消費者和消費品互相接觸所必要的一種“儀式”。同樣也可以說，一切經濟關係都是直接消費借以進行的一些“儀式”。供給和需求（恰如個人交換一樣）就是某種生產的關係。

那末，蒲魯東先生的整個辯證法是什麼呢？就是用抽象的和矛盾的概念，如稀少和眾多、效用和意見、一個生產者和一個消費者（兩者都是自由意志的騎士）來代替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需求

和供給。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了以后能够引用他自己所去掉的各种要素中的一个要素（生产費用）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綜合。在他的心目中，生产費用就是这样构成綜合价值或构成价值的。

第二节 构成价值或綜合价值

“（交换）^①价值是經濟結構的基石”。“构成”价值是經濟矛盾体系的基石。

蒲魯东先生在政治經濟学中的全部發現——“构成价值”是什么呢？

只要承認某种产品的效用，劳动就是它的价值的源泉。劳动的尺度是時間。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時間来确定。价格是产品的相对价值的貨幣表現。最后，产品的构成价值不过是体現在产品中的劳动時間所构成的价值。

象亚当·斯密發現分工一样，蒲魯东先生也自以为發現了“构成价值”。当然这个發現中並沒有“什么聞所未聞的东西”，但是也应该承認，在經濟学的任何一个發現中都沒有什么聞所未聞的东西。蒲魯东先生虽然感觉到他的發現非常重要，但是“为了使讀者对他自以为独创的东西放心，并为了迁就那些由于懦弱而不容易接受新思想的人們”，他極力縮小这个發現的意义。但是当評价他的每一个前輩在确定价值方面所作的貢獻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承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認并大声宣称，在这方面，最大最多的一份应归功于他。

“亚当·斯密已經模糊地看出了价值的綜合观念…… 但是在他那里，这种价值观念完全是直觉的，而社会并不因信仰直觉就改变自己的習慣；只有事实的权威能使社会信服。必須使二律背反获得更明确的表现，而讓·巴·薩伊就是这个二律背反的主要解释者。”

总之，亚当·斯密有模糊的直觉，讓·巴·薩伊有二律背反，蒲魯东先生則有构成着的和“构成了的”真理，这就是發現綜合价值的完整历史。但是不要弄錯，所有其他的經濟学家，从薩伊到蒲魯东，都只不过躑躅在二律背反的老路上。

“四十年以来，这么多有思想的人都为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念而煞費苦心，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其实不然，价值之間虽然沒有任何共同点和任何度量单位，但也在被比較。这就是 19 世紀的經濟学家不接受平等的革命理論，却不顧一切地力圖証明的一点。后人对此将怎么說呢？”（第一卷第 68 頁）

突然受到这样追問的后人首先就会对年代感到困惑。他們必然会提出这样的問題：难道李嘉圖和他的学派不就是 19 世紀的經濟学家嗎？根据“商品的相对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一原則建立起来的李嘉圖的体系，創始于 1817 年。李嘉圖是复辟时期⁴³ 以来在英国占統治地位的那个学派的領袖。李嘉圖的学說严峻地总括了作为現代資產階級典型的整个英国資產階級的观点。“后人对此将怎么說呢？”他們总不会說蒲魯东先生完全不知道李嘉圖，因为蒲魯东談起过李嘉圖，談得不少，还常常引用他，可是結果却把他的学說說成是“廢話連篇”。如果后人有一天过問这件事，他們也許会說，蒲魯东先生怕激起讀者的反英情緒，所以情願自己充当李嘉圖观念的負責發行人。李嘉圖已科学地闡明作为現代社会即資產階級社会的理論，蒲魯东先生却硬把

它当作“将来的革命理論”；李嘉圖及其学派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作为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即交换价值的科学公式，蒲魯东先生却把它当做效用和交换价值之間的二律背反的解决；无論如何，后人会認为这种做法太幼稚了。我們干脆撇开后人不談，讓蒲魯东先生和他的前輩李嘉圖来对質一下。下面是这位作者的著作中总括他的价值学說的几段話：

“效用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虽然它对交换价值是絕對必要的。”（“政治經濟学……原理”，弗·索·孔斯坦西奧譯自英文，1835年巴黎版第一卷第3頁）

“东西本身一旦被認为有效用，那末这东西就从两个来源，即从东西的稀少和从获得这些东西所需要的劳动量中取得交换价值。有些东西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的稀少。因为任何劳动都不能增加它們的数量，所以它們的价值不可能由于供应增加而下降。珍贵的雕象和繪画等就屬於这类东西。它們的价值只取决于想占有这种物品的人的財富、趣味和癖好。”（同上，第一卷第4頁和第5頁）“但是这种商品在市場上每日流轉的大多数商品中只占極少部分。因为人們想占有的絕大多数的东西都是靠劳动获得的，只要我們願意为生产这些东西花費必需的劳动，它們的数量就会不仅在一个国家中，而且在許多国家中增加到几乎无可限量的程度。”（同上，第一卷第5頁）“因此，当我们談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和調节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原則时，我們总是只指那些人的劳动可以增加其数量，竞争可以刺激它們的生产而且不会碰到任何障碍的商品。”（第一卷第5頁）

李嘉圖引用亚当·斯密的話，他認为亚当·斯密“很精确地規定了一切交换价值最初的来源”（參看亚当·斯密著作第一卷第五章⁴⁴）。然后他又补充說：

“这（即劳动時間）^①就是一切东西（除了人的劳动不能随便增加的东西以外）的交换价值的基础，这个学說对政治經濟学有極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門科学中,再沒有比‘价值’这个名詞的含义不精确和含糊不清而造成更多的錯誤和意見分歧的了。”(第一卷第8頁)“如果商品的交换价值由体現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那末这种劳动量的任何增长就必然会增加在生产时花費了这种劳动的商品的价值;而劳动量的任何减少也会减低商品的价值。”(第一卷第8頁)

李嘉圖接着責备亚当·斯密,說他:

(1)“除劳动以外又給价值提出了別的尺寸:有时是粮食的价值,有时是用这种东西可以購買的劳动量”等。(第一卷第9、10頁)

(2)“无保留地接受这个原則,但是对这个原則的运用却只限于資本积累和土地所有权确立以前的社会的原始和粗野的状态。”(第一卷第21頁)

李嘉圖極力証明,土地所有权即地租不能改变农产品的相对价值,而資本积累对相对价值(它是由生产中花費的劳动比較量决定的)只起暫时的不稳定的作用。为了証明这一命題,他創立了有名的地租論,把資本分解为各个組成部分,最后,他在資本里除了积累的劳动以外什么也沒有看到。他接着又發揮了整套的工資和利潤理論,并且証明,工資和利潤的增减互成反比,而这并不影响产品的相对价值。他沒有忽略資本积累、資本在性質上的差別(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以及工資率等对产品的比值所能起的影响。这些問題就是李嘉圖所注意的主要問題。

他說:“节省劳动(無論是节省制造物品本身所必要的劳动,还是节省为形成这种生产中使用的資本所必要的劳动)常常会降低商品的相对价值[⊖]。”

⊖ 大家知道,李嘉圖用“制造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确定商品价值。但是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因此也包括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占統治的交换形式造成这样的情况:这种价值不是直接被表現在劳动量上,而表現在其他的商品量上。李嘉圖把表現在一定数量的其他商品(無論是不是貨幣都一样)上的商品价值叫做这个商品的相对价值。——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第一卷第 28 頁)“因此，只要一天的劳动一直使甲得到同量的魚，使乙得到同量的野味，那末無論工資和利潤的变化怎样，資本积累所起的作用怎样，相互交换时价格的自然率始終是一样的。”(第一卷第 32 頁)“我們把劳动看做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把生产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看做确定互相交换的商品数量时所依据的标准；但是我們也不想否認，商品的市場价格偶而也会暫時脱离商品的这个最初的和自然的价格的。”(同上，第一卷第 105 頁)“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費用来調节，而不是象一般所說的由供求关系来調节。”(第二卷第 253 頁)

罗德戴尔勋爵根据供求規律，或者說根据供多于求或供少于求的規律探討交换价值的变化。他以为，物品的价值在物品的数量减少或需求增加时就会提高；这个价值因物品的数量增加或因需求减少时就会下降。因此，物品的价值在八种不同原因的影响下都会發生变化，其中四个原因和物品本身有关，另四个原因和貨幣或作为这种物品的价值尺度的其他商品有关。下面是李嘉圖对这种观点的駁斥：

“个人或公司所垄断的产品的价值，是按照罗德戴尔勋爵确定的規律变化的：产品的价值随供应量的增加而下降，随購買者需求的扩大而上升。产品的价格和它的自然价值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至于在出卖者中間引起竞争而且数量可以适当增加的那些物品，它們的价格归根到底也不是取决于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生产費用的增减。”(第二卷第 259 頁)

我們讓讀者自己把李嘉圖的这种簡單明了而又准确的語言和蒲魯东先生想用劳动時間来确定相对价值的那种玩弄辞句的企圖比較一下。

李嘉圖給我們指出资产階級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蒲魯东先生却撇开这个实际运动不談，而“煞費苦心地”去發明按照所謂的新公式（这个公式只不过是李嘉圖已清楚表述了

的現實运动的理論表現) 來建立世界的新方法。李嘉圖把現社會當做出發點, 給我們指出這個社會怎樣構成價值; 蒲魯東先生卻把構成價值當做出發點, 用它來構成一個新的社會世界。根據蒲魯東先生的說法, 構成價值應當繞個圈子, 又成為按照這種估計方法已經完全構成的世界的構成因素。在李嘉圖看來, 勞動時間確定價值這是交換價值的規律, 而蒲魯東先生卻認為這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綜合。李嘉圖的價值論是對現代經濟生活的科學解釋; 而蒲魯東先生的價值論卻是對李嘉圖理論的烏托邦式的解釋。李嘉圖從一切經濟關係中得出他的公式, 並用來解釋一切現象, 甚至如地租、資本積累以及工資和利潤的關係等那些驟然看來好象是和這個公式抵觸的現象, 從而證明他的公式的真實性; 這就使他的理論成為科學的體系。蒲魯東先生只是完全憑任意的假設再度發現了李嘉圖的這個公式, 後來就不得不找出一些孤立的經濟事實, 加以歪曲和捏造, 以便作為例證, 作為實際應用的現成例子, 作為實現他那新生觀念的開端。(見本章第三節“構成價值的應用”)

現在來談談蒲魯東先生從(由勞動時間)構成的價值中得出的結論。

——一定的勞動量和同一勞動量所創造的產品是等價的。

——任何一個勞動日和另一個勞動日都是相等的; 這就是說, 一個人的勞動和另一個人的勞動如果數量相等, 二者也是等值的, 兩個人的勞動並沒有質的差別。在勞動量相等的前提下, 一個人的產品和另一個人的產品相交換。所有的人都是僱傭工人, 而且都是以相等勞動時間得到相等報酬的工人。交換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實現的。

这些結論是不是由劳动時間所“构成”或决定的价值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結果呢？

如果商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自然就会得出結論說，劳动的相对价值或工資也由生产工資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工資，即劳动的相对价值或价格，因而也是由生产工人一切生活必需品所必要的劳动時間来决定的。

“如果把帽子的生产費用减少，即使需求增加两三倍，帽子的价格結果也会降到新的自然价格的水平。如果用减少維持生活的粮食和衣服的自然价格的办法来减少人們的生活費用，即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結果工資也会下降。”(李嘉圖，第二卷第 253 頁)

当然，李嘉圖的話是極为刻薄的。把帽子的生产費用和人的生活費用混为一談，这就是把人变成帽子。但是用不着对刻薄大声叫嚷！刻薄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表明事实的字句！法国的作家，象德罗茲、布朗基、罗西等先生用遵守“人道的”語言的礼节来証明他們比英国的經濟学家們高明，从而得到天真的滿足；如果他們責难李嘉圖和他的学派言詞刻薄，那是由于他們不乐意看到把現代經濟关系赤裸裸地揭露，把资产階級最大的秘密戳穿。

总括起来就是：劳动本身就是商品，它是作为商品由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時間来衡量的。而要生产这种劳动商品需要什么呢？需要为了生产維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給工人活命和延續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時間。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資的最低額[⊖]。如果工資的市場价格超过了它的自然价格，那是由于被

⊖ 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即正常价格)和工資的最低額相等，即和保証工人活命和延續后代所絕對必要的生活資料的价值相等；这一論点，是我首先在“政治經濟学批判大綱”(“德法年鑒”(«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1844

蒲魯东先生推崇为原則的价值規律遇到供求关系波动后果的抵抗。但是工資的最低額始終是工資市場价格趋向的中心。

因而，由劳动時間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現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魯东先生所希望的无产階級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論”。

現在我們来看看，把劳动時間作为价值尺度这种做法和現存的階級对抗、和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間的不平等分配是多么不相容。

我們就拿一种产品例如麻布來說。这种产品本身包含着一定的劳动量。無論参加制造这种产品的人們的相互地位起什么变化，这种劳动量始終是一样的。

再拿別的产品例如呢絨來說，并假定生产呢絨所需要的劳动量和生产麻布的劳动量相等。

如果这些产品互相交換，那就是相等的劳动量在交換。这种等量的劳动時間的交換並沒有改变生产者的相互地位，正如工人和工厂主的相互关系沒有任何改变一样。如果認為这种由劳动時間来衡量价值的产品的交換会使一切生产者得到平等的報酬，这种說法就是假定，平等分配还在交換以前就存在了。当呢絨和麻布进行交換的时候，呢絨的生产者就会在麻布上恰恰占有他們以

年巴黎版)和“英国工人階級状况”⁴⁵中提出的。从本文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当时是采用了这个論点的。拉薩尔借用了我們两人的这个論点。虽然工資实际上經常有接近最低額的趨勢，但上述論点畢竟是不正确的。劳动力的报酬平均总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它的价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糾正了上述論点(見“劳动力的买和卖”节)，而且闡明了在資本主义生产下劳动力的价格会愈来愈低于劳动力的价值(第二十三章。“資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規律”)。——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前在呢絨上所占有的那一份。

蒲魯东先生的謬誤是由于他把至多不过是一种沒有根据的假設看做結果。

我們再看下去。

我們把劳动時間当做价值尺度，那末这至少是不是假定各个劳动日是等价的，这一个人的劳动日和另一个人的劳动日是等值的呢？不是。

暫且假定，一个首飾匠的劳动日和一个織布工人的三个劳动日是等价的；在这种情况下，首飾品对紡織品比值的任何变化，如果不是供求变动的暫時結果，就必然是由于两种生产的劳动時間有所增減。如果不同的劳动者的三个劳动日相互的比例是1：2：3，他們产品的相对价值中的一切变化也会是这个比率，即1：2：3。因此，虽然不同的劳动日的价值不等，价值还是可以用劳动時間来衡量的；但是要使用这种尺度，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比較各种不同劳动日价值的尺度表；确定这种尺度表的就是竞争。

你每小时的工作和我每小时的工作是不是等值？这是要由竞争来解决的問題。

据一个美国經濟学家的意見，竞争决定着一个复杂劳动日中包含多少簡單劳动日。把复杂劳动日化为簡單劳动日，这是不是假定把簡單劳动当做价值尺度呢？如果只把劳动量当做价值尺度而不問它的質量如何，那也就是假定簡單劳动已經成为生产活动的枢紐。这就是假定：由于人隶属于机器或由于極端的分工，各种不同的劳动逐渐趋于一致；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鐘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就象它是两个机車的速度的尺度一样。所以不應該說，某人的一个工时和另一个人的一个工时是等

值的，更确切的說法是，某人在这一小时中和那个人在同一小时中是等值的。時間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時間的体现。現在已經不用再談質量了。只有数量決定一切：时对时，天对天；但是这种劳动的平均化并不是蒲魯东先生的永恒的公平；这不过是現代工业的一个事实。

在使用机器的企业中，这个工人的劳动和那个工人的劳动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工人彼此間的区别，只是他們在劳动中所化的時間不等。但是从某种观点来看，这种量的差别也成了質的差别，因为用在劳动上的時間一方面是取决于純粹物質方面的原因，例如生理的构造、年齡和性別；而另一方面却又取决于一些純粹消極的精神上的原因；例如忍耐、鎮靜和勤懇。最后，如果說工人的劳动中有質的差别，那末这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决不能作为特点的无足輕重的質。总之这就是現代工业的情况。而蒲魯东先生却把他打算在“将来的时代”中普遍實現的“平均化”的刨子用到机器劳动中早已實現的这种平等上。

蒲魯东先生从李嘉圖学說中引伸出的一切“平等”的結論，是建立在一個根本謬誤的基础上。他把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混为一談。如果把这两种衡量商品价值的方法攪在一起，那末也就同样可以說，任何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都是由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或者說，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它可以購買的劳动量来衡量的；或者还可以說，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可以得到它的那种劳动量来衡量的。但是情况远不是这样。象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为了更清楚地說明上面这点，只要举几个例子就行了。

如果一个繆伊[⊖]的谷物在以前值一个劳动日，而現在值两个劳动日，这就是說它的价值要比原来增加一倍；但是这一个繆伊的谷物并不能起一倍劳动量的作用，因为它包含的养料和以前一样多。因此，由生产谷物使用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将增加一倍，但是用谷物能購買的劳动量或者可以用来購買谷物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决不会增加一倍。另一方面，如果用同样的劳动生产了比以前多一倍的衣服，那末衣服的相对价值就会因此降低一半；但是即使如此，这种数量加倍的衣服支配一定劳动量的能力并不会降低一半，或者換句話說，同样的劳动并不能取得加倍数量的衣服；因为現在这一半数量的衣服对工人的效用和以前同样数量的衣服的效用完全一样。

因此，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經濟事实相抵触的。这是在循环論証中打轉，这是用本身还需要确定的相对价值来确定相对价值。

毫无疑问，蒲魯东先生是把以下两种衡量的方法混为一談了：一种是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時間来衡量，另一种是用劳动价值来衡量。他說：“任何人的劳动都可以購買这种劳动所包含的价值。”因此按照他的說法，产品中所包含的一定劳动量和劳动者的报酬是相等的，即和劳动价值是相等的。根据同样的理由，他把生产費用和工資也混为一談了。

“工資是什么？这是粮食等的成本，这是一切东西的全部价格。再进一步說，工資是构成财富的各要素的均匀配合。”

工資是什么？这就是劳动价值。

⊖ 法国古代的容量名，用于量谷物时約合 1800 公升。——編者注

亞當·斯密有時把生產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當做是價值尺度，有時卻又將勞動價值當做價值尺度。李嘉圖揭露了這個錯誤，清楚地表明了這兩種衡量方法的差別。蒲魯東先生加深了亞當·斯密的錯誤。亞當·斯密只是把這兩個東西並列，而蒲魯東先生卻把兩者混而為一。

蒲魯東先生尋找商品相對價值的尺度是為了進而找出工人們應分得的產品的正確比例，或者換句話說，為了確定勞動的相對價值。為了確定商品相對價值的尺度，除了把一定勞動量所創造的產品總額當做它的等價物外，他想不出更好的方法。這就等於說，似乎整個社會僅僅是由以工資形式領得自己的產品的直接勞動者所組成。此外，他還把各種不同勞動者的工作日的價值相等當做既成事實。總而言之，他尋找商品相對價值的尺度是為了找出勞動者的平等報酬，他把工資的平等當做已經完全確定的事實，是為了根據這種平等去找出商品的相對價值。多麼奇妙的辯證法！

“薩伊和追隨他的一些經濟學家們指出說，勞動是一種其本身價值尚待確定的東西，是象任何其他商品一樣的商品，因此，如果把勞動當做價值的原則和實際的原因，那就是墮入循環論證中了。我可以說，這些經濟學家的這種說法表現了極大的疏忽。人們認為勞動有價值並不因為它本身是商品，而是指人們認定勞動中所隱含的價值。勞動的價值是一種倒因為果的比喻說法。它和資本的生產率一樣，是一種臆想。勞動在生產，資本有價值……所謂勞動價值，是一種簡略的說法……勞動象自由一樣……按其本質來說是一種模糊而不確定的東西，然而它的性質在其對象中是確定的；換句話說，勞動通過它的產品而成為實在的東西。”

“然而何必堅持呢？因為經濟學家（讀做蒲魯東先生）^①既要改變事物的

①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名称, vera rerum vocabula [事物的真正名称], 就是默認自己无能, 逃避問題的討論。”(蒲魯东, 第一卷第 188 頁)

由此可見, 蒲魯东先生把劳动价值变为产品价值的“实际原因”, 因为他以为工資(“劳动价值”的正式名称)构成一切东西的全部价格。正因为如此, 薩伊的反駁使他感到惶惑不安。他把劳动商品这个可怕的现实只看做是文法上的簡略。这就是說, 建立在劳动商品基础上的整个現代社会, 今后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破格的詩文和比喻性的用語上了。如果社会願意“排除”使它煩惱的“一切麻煩”, 那末只要去掉不好听的字句, 改一改說法就可以了; 要达到这个目的, 只要請求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辞典就够了。这样一来就不难了解, 为什么蒲魯东先生認为必須在政治經濟学的著作中大事議論語源学和文法学的其他部分。例如, 他老是摆出一付学者的面孔, 反对把 servus [奴隶]这字解释成起源于 servare [保护]那种陈旧的說法。这种語文学的議論具有深刻的意义, 神秘的意义, 这些議論构成蒲魯东先生論証的重要部分。

由于劳动[⊖]被买卖, 因而它也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 也是一种商品, 因此它也有交換价值。但是劳动的价值或作为商品的劳动并不生产什么, 正如粮食的价值或者作为商品的粮食不能当作食物一样。

劳动“值”多少取决于食物的貴賤, 取决于劳动人手供求量的大小等等。

劳动决不是“不确定的东西”; 进行买卖的不是一般的劳动, 而总是某种确定的劳动。不仅劳动的性質由对象来确定, 而且对象

⊖ 在 1876 年馬克思送給娜·吳亭娜的那一本上, “劳动”后面添上了“劳动力”一詞。1896 年的法文版上也加上了这一詞。——編者注

本身也由劳动的特性来确定。

由于劳动被进行买卖，所以它本身就是商品。为什么人們要买它呢？“由于人們認為劳动中隱含着价值”。但是当人們說某个东西是商品时，那这里所指的就已經不是購買它的目的，就是說，不是指想从这个东西中取得的效用，不是指想拿它做什么用了。它成为商品是由于它是交易对象。蒲魯东先生的一切議論总结起来不外是：劳动不是作为直接的消費对象才被購買。当然不是的，人們購買它是把它当做生产工具，就象購買机器一样。由于劳动是商品，所以具有价值，但它并不生产东西。蒲魯东先生也可以这样說，根本不存在任何商品，因为購買任何商品只是为了它的某种效用，而决不是由于它是一种商品。

蒲魯东先生用劳动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他就籠統地認為，既然劳动具有价值，是劳动商品，那就不能不把它置于这个共同的尺度下。他預感到，这样說就是承認工資的最低額是直接劳动的自然和正常的价格，因而也就是承認現代的社会制度。为了逃避这个倒霉的結論，他就掉轉头來說，劳动不是商品，它不可能有价值。他忘了自己就曾經把劳动的价值当做尺度；他忘了他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劳动商品的基础上，建立在可以买卖和交換各种产品的交易对象——劳动的基础上，建立在作为工人收入的直接源泉——劳动的基础上。他忘了一切。

为了挽救他的体系，他决心牺牲体系的基础。

Et 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 [为了生活而失去生活的根基!][⊖]

⊖ 尤維納利斯“諷刺集”。——編者注

現在我們得出了“构成价值”的一个新的定义：

“价值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

首先我們說，在“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这个简单的用語中已經包含着产品互相交换的某种关系的概念。把这种关系叫做“比例性关系”，除了名称以外，意思根本沒有改变。产品的价值無論怎样涨跌，絲毫不会使这种产品失去它和构成财富的其他产品形成某种“比例性关系”的那种特性。

这个新術語並沒有新概念，要它做什么呢？

“比例性关系”使人联想到許多其他的經濟关系，例如生产的比例性，供求之間的适当比例等；而蒲魯东先生在以訓人的口吻解释交换价值的时候，是考虑到这一切的。

首先，由于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每种产品所使用的劳动比較量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比例性关系就是表示在一定時間內所能生产并因而能互相交换的产品的相对量。

讓我們再看一看蒲魯东先生从这个比例性关系中得到了什么好处。

大家都知道，当供求互相均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都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也就是說，这种相对价值恰好表示了我們刚才所解释的比例性关系。蒲魯东先生把实际情况弄顛倒了。他說：只要先开始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那末供求就必然会达到平衡。生产就会和消費相适应，产品就可以永远順利地进行交换，而产品的市場价格也就会恰好表现产品的真正价值。一般人都这样說：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碰到許多散步的人；可是蒲魯东先生却为了保証大家有好天气，要

大家出去散步。

被蒲魯東先生當做由勞動時間先天決定交換價值中所得出的結果，大概只能用下面這種規律來說明：

今後產品應當完全按照花費在產品上的勞動時間來交換。不論供求關係怎樣，商品的交換應當永遠象商品的生产量完全適合需求那樣來進行。就讓蒲魯東先生來擔任制定和貫徹這樣一個規律好了，這裡我們並不要求他提出證據。可是他如果想以經濟學家的身份，而不是立法者的身份來為自己的理論辯護，那末他就應當證明：生產商品所必要的時間恰好表明了商品的效用的程度，而且表示了商品對需求的比例性關係，因而也表明了商品對財富總額的比例性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產品按照等於生產費用的價格出售，供求就會永遠保持平衡；因為生產費用被認為是表示供求的真正關係的。

蒲魯東先生確實力圖證明：生產產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說明它和需要的真正關係，所以在生產上花費時間最少的東西是最有直接效用的東西，並且可以依次類推。根據這個理論，生產奢侈品這一事實就足以證明社會有多餘時間來滿足某種奢侈的需要。

至於這種論點的證據，蒲魯東先生是這樣說的：根據他的觀察，生產最有效用的東西需要的時間最少；社會總是先從最輕便的生產部門開始；然後才逐步地“轉到生產那些化費勞動時間最多並適合更高級需要的東西”。

蒲魯東先生從杜諾瓦耶先生那裡借用了採捕（如採集果子、牧放、狩獵、捕漁等）這一最簡單、花費最少的工業作為例子；人類的“第二個創造的第一天”就是從這種工業開始的。他的第一個創造的第一天則記載在創世紀中，它告訴我們上帝是世界上第一個工

业家。

实际上，情况完全不象蒲魯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沒有对抗就沒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階級对抗的規律而發展起来的。如果硬說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滿足，所以人們才能創造更高級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階級对抗，顛倒整个历史的發展过程。不然也可以这样說：因为在羅馬皇帝时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里喂养鰻魚，所以說全体羅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羅馬人民連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羅馬的貴族却并不缺少充当鰻魚飼料的奴隶。

生活用品的价格几乎不断上升，而工业品和奢侈品的价格却几乎不断下降。就拿农业來說，最必需的东西，如粮食、肉类等的价格不断上涨，而棉花、食糖、咖啡等的价格却以惊人的比例不断下降。就在真正的食品中，如朝鮮薊、龙鬚菜等奢侈品在今天要比最必需的食品便宜。在我們这个时代中，多余的东西要比必需的东西更容易生产。最后，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代中，价格的相互关系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完全相反。整个中世紀中，农产品比工业品便宜；近代，两者之間的情形倒过来了。但是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农产品的效用自中世紀以来减少了嗎？

产品的使用取决于消費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本身又建立在階級对抗上。

棉花、馬鈴薯和烧酒是最普遍的消費品。馬鈴薯引起了癩癧；棉花大規模地排挤亚麻和羊毛，虽然羊毛和亚麻在大多数情况下，

即使从衛生观点來說，也比棉花更有用。最后，烧酒占啤酒和葡萄酒的上風，虽然大家都承認把烧酒当作食品是有害的。整整一个世紀，各国政府竭力抵制欧洲的鴉片，然而毫无效果；經濟取得了胜利，消費得听它的命令。

为什么棉花、馬鈴薯和烧酒是資產階級社会的基石呢？因为生产这些东西需要的劳动最少，因此它們的价格也就最低。为什么价格的最低額决定消費的最高額呢？是不是由于这些物品本身有絕对的效用，由于它們的效用最能滿足作为人的工人，而不是作为工人的人的种种需要呢？不，这是因为在建立在貧困上的社会中，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給最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

如果說因为最便宜的物品使用最广，因而这些物品就应当有最大的效用，这就是說，烧酒由于生产費用低廉而到处風行，这件事就是烧酒的效用最确凿的証明；这就是向无产者說，馬鈴薯比肉对他們更有益；这就是和現状妥协；結果，这就是和蒲魯东先生一起为自己并不理解的社会进行辯护。

在沒有階級对抗和沒有階級的未來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額来确定，相反地，花費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

現在我們再回到蒲魯东先生的命題上来。生产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時間既不表現它的效用程度，那末早就由包含在物品中的劳动時間所确定的这种物品的交換价值就决不能調节供求的正确关系，即蒲魯东先生現在所說的比例性关系。

供求的“比例性关系”，也就是一种产品在生产总和中所占的比例，根本不决定于这种产品按照相等于生产費用的价格的出售。只有供求的变动告訴生产者，某种商品应当生产多少才可以在交

換中至少收回生產費用。這種變動是經常的，所以資本也就不斷地出入於各個不同的工業部門。

“正是由於這種變動，資本才按照適當的比例（而不是超過這個比例）投入各種有需求的商品的生產中去。利潤隨着價格的漲落而升降於一般水平上下，因此，隨着某一生產部門中的不同變化，資本時而流向那里，時而又從那里流出。”——“如果我們注意一下大城市的市場，那末我們就會看到，這些市場如何正常地如數供應各種國內外商品，不管這裡的需求由於愛好或人口數量的變動有什麼變化；市場上很少發生供應過多、商品充斥或供不應求、物價飛漲的現象。我們應當承認：在各種生產部門間按照精確的適當比例分配資本的原則所起的作用，要比平常所想象的巨大得多。”（李嘉圖，第一卷第105、108頁）

如果蒲魯東先生承認產品的價值由勞動時間來確定，那末他同樣也應當承認，在以個人交換為基礎的社會中，單只這種搖擺運動已使勞動時間成為價值尺度。完全構成了的“比例性關係”是不存在的，只有構成這種關係的運動。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在什麼意義下把“比例性”說成是由勞動時間來確定價值的結果才算正確。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蒲魯東先生稱為“比例規律”的這個用時間來衡量的尺度如何變為比例失調的規律。

任何一種新發明，只要能在一小時內生產出過去兩小時才生產的東西，都會使市場上所有這一類的產品跌價。競爭迫使生產者出賣花兩小時生產的產品時不能貴於花一小時所生產的產品。競爭實現了產品的相對價值由生產它的必要勞動時間來確定這一規律。勞動時間成為交換價值的尺度這一情況因而也就成了勞動不斷跌價的規律。不僅如此，跌價的不僅是運到市場上去的商品，而且連生產工具以及整個企業也都在內。李嘉圖已指出這個事

实，他說：

“由于生产日益便利，因而过去生产的某些东西的价值也就不断下降。”
(第二卷第 59 頁)

西斯蒙第更进了一步。他認為这种由劳动時間所“构成的价值”是現代工商业的一切矛盾的根源。

他說：“交换价值归根到底总是由取得这种东西所必要的劳动量来确定，但不是实际花費的劳动量，而是在今后生产資料可能改进的情况下将要花費的劳动量。这种劳动量虽然很难作精確的确定，但它总是由竞争加以正确地确定…… 这一劳动量就是出卖者和購買者之間議价的基础。出卖者也許會說，这种东西花費了他十个工作日；但如果購買者知道这种东西以后花八个工作日就能生产出来，如果竞争給双方提出确凿的証明，那末这种东西的价值就会縮减到八个工作日，市場价格也就会固定在这个水平上。当然出卖者和購買者都知道这种东西是有用的，是有人需要的，如果没有人需要这种东西，那也就卖不出去；但是規定这种东西的价格却和它的效用毫无关系。”
(“政治經济学概論”布魯塞尔版第二卷第 267 頁)

千万不要忽視，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時間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時間来确定，而这种最低額又是由竞争来規定。我們暫且假定沒有竞争，因而也就沒有任何方法来規定为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的最低額。那时将会怎样呢？按照蒲魯东先生的理論，要以一种物品換取六倍多同样的物品，只要把別人一小时能生产的用六小时来生产就行了。

如果我們不論好坏总是要什么关系，那末我們得到的就不会是“比例性关系”，而是比例失調的关系。

劳动的不断跌价只是一个方面，只是用劳动時間估价商品的一个結果。价格过高、生产过剩以及其他許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现象也都可以用这种估价的方法来解释。

但是把劳动時間作为价值尺度，会不会至少引起蒲魯东先生为之神往的那种产品的均匀的多样化呢？

恰恰相反，它使单调而清一色的垄断在产品领域中占统治；正如大家看到和知道的，这种垄断已经侵入了生产工具的领域。只有某些生产部门，例如棉纺织工业会很快地进步。这种进步的自然结果就是使棉纺织工业产品价格迅速下降；但是随着棉花价格的下跌，亚麻的价格就必然会比棉花昂贵。这会发生什么结果呢？那就是棉花排挤亚麻。亚麻就这样几乎从整个北美被驱逐出来，结果并不是产品的均匀的多样化，而是棉花的统治。

此外，这个“比例性关系”还有什么呢？除了那种希望商品能按比例生产（这可以使商品按公平价格出售）的好心人的善良愿望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不论什么时候，好心肠的资产者和仁慈的经济学家总喜欢表示这种天真的愿望。

我們且听听布阿吉尔貝尔老头是怎样說的。

他說：“各种商品的价格必須永远是成比例的，因为只有这种相互的协调，才能使它们共同存在，时时刻刻能互相进行交换（这就是蒲魯东所謂的不断交换性能）^①，时时刻刻能互相重新生产…… 财富无非是人和人之間、企业和企业之間等的这种不断的交换，因此，如果不在因脱离比例价格而引起的交换的破坏中寻求贫困的原因，将是一种極大的謬誤。”（“論财富的本性”，見德尔編的文集46）

我們也听听一位現代經濟学家是怎样說的：

“应当运用于生产的重要規律就是比例規律（the law of proportion），只有它才能保持价值經常不变…… 等价物必須得到保証…… 一切国家在各个时代都企圖用許多商业上的規定和限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来实现这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个比例規律。但是人性固有的利己心把这整个調节制度推翻了。比例生产 (proportionate production) 就是真正的社会經濟科学的实现。”(威·阿特金森“政治經濟学原理” 1840 年倫敦版第 170—195 頁47)

Fuit Troja! [特洛伊城已不存在!] 人們一再迫切希望实现的这种供求之間的正确比例早就不存在了。它已經过时了; 它只有在生产資料有限、交換是在極狹隘的範圍內进行的时候, 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 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 由于自然規律的必然性, 生产一定要經過繁荣、衰退、危机、停滯、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

誰象西斯蒙第那样想恢复生产的正确比例, 同时又要保存現代的社会基础, 誰就是反动者, 因为要貫徹自己的主张, 他們必定要竭力恢复旧时工业的其他条件。

是什么东西維持了生产的正确的或大致正确的比例呢? 是支配供給并先于供給的需求; 生产是紧随着消費的。大工业由于它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質, 不得不經常以愈来愈大的規模进行生产, 它不能等待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 供給强制需求。

在現代社会中, 在以个人交換为基础的工业中,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 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

因此,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希望在現代生产資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 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沒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 那就必須放弃个人交換来保存生产力。

个人交換或者只适宜于过去几世紀的小工业和它特有的“正确比例”, 或者适宜于大工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貧困和无政府

状态。

归根到底，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即蒲魯东先生当做将来再生公式向我们推崇的那个公式，也无非是现代社会的科学表现，而这早在蒲魯东先生以前李嘉圖就明确地论证过。

但是，“平均主义地”应用这个公式至少不应该归功于蒲魯东先生吗？是他第一个想到把一切人都变成交换同等劳动量的直接劳动者这样的方法来改造社会吗？应当由他来责备共产主义者（这些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家伙，这些“顽固不化的笨蛋”，这些“天国的梦想家”），责备他们在他以前没有发现这样“解决无产阶级的問題”吗？

只要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一点点了解，就不会不知道，这个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候几乎都提倡过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圖的理論。我們可以給蒲魯东先生指出如下一些著作：霍吉斯金的“政治经济学”（1827年版）⁴⁸，威廉·湯普逊的“为人类謀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原則”（1824年版），托·娄·艾德門茲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1828年版）⁴⁹等等，这一类的著作的名称还可以写上四頁。現在我們且来听听一位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先生是怎么說的。这里引用他的出色的著作“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1839年里子版⁵⁰）中最重要的几段話，并且我們將要在这上面多花些時間，首先因为布雷先生在法国还很少有人知道，其次是我们觉得在这位作者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了解蒲魯东先生过去、現在和将来的一切著作的鑰匙。

“弄清基本原則是得出真理的唯一方法。我們馬上来回溯一下产生政府本身的根源。这样去探究事物的本源，我們就会發現一切統治的形式，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公平都是从現在占統治的社会制度，即現存的私有制度

(the institution of property as it at present exists)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要永远消除現在的不公平和貧困，就必須**徹底摧毀現代的社會制度**……如果我們在經濟學家的領域中用他們自己的武器去攻打他們，那就可以擺脫他們經常喜歡搬用的什麼**空想家、空論家**那套廢話。只要經濟學家們不想否認或推翻他們自己的論點所依據的那種公認的真理和原則，那末他們就決不能推翻我們按照這種方法所得出的結論。”(見布雷上述著作第17、41頁)“**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 (It is labour alone which bestows value)**……每個人對於他用正當勞動所獲得的一切東西都有不容置辯的權利。如果他占有了他自己的勞動果實，那末他對其他人並沒有做出任何不公正的行為；因為他絲毫沒有侵犯別人這樣做的權利……一切關於高貴和低賤以及主人和僱傭工人的概念，都是由於忽視基本原則及因之而產生的**財產不平等 (and to the consequent rise of inequality of possessions)**所引起的。只要這種不平等繼續存在，那末這些觀念就不可能根除，建立在這些觀念上的制度也不可能推翻。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枉費心機地希望通過消滅現存的不平等但並不觸及這種不平等的原因，來糾正現在占統治的這種反常情況；但是我們馬上就要指出：政府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它不是創造者，而相反地是被創造者，總而言之，政府是**財產不平等的產物 (the offspring of inequality of possessions)**，而財產的不平等和現在的社會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同上，第33、36、37頁)

“平等制度不僅有極大的優越性，而且十分公正…… 每個人都是一個環節，而且是一連串作用中不可缺少的環節，這一連串的开頭只是一個觀念，而末端也許是一匹呢絨的生產。因此，雖然我們對各種職業有不同的感覺，但不應由此得出結論說，這個人的勞動必須比另一個人的勞動得到較多的報酬。發明家除了得到正當的金錢報酬以外，經常還會獲得我們只給予天才的那種贊譽……

“按照勞動和交換的性質來說，嚴格的公正的要求是交換雙方的利益不僅是**相互的**，而且是**相等的 (all exchangers should be not only mutually but they should likewise be equally benefited)**。人們之間可以交換的東西只有兩種，即勞動和勞動產品。在公正的交換制度下，一切產品的價值都會由它們的**生產費用的全部總和**來確定，並且**相等的價值經常會換得相等的價值 (If a just system of exchanges were acted upon,**

the value of all articles w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entire cost of production, and equal values should always exchange for equal values)。如果帽匠化一个工作日生产一頂帽子，鞋匠化同样的時間做出一双鞋子(假定两者所用的原料的价值是相同的)，他們把这两种产品进行交换，那末他們从这种交换中所得到的利益就不仅是相互的，而且是相等的。这时一方所得的利益不会是对方的損失，因为两者都提供了同等的劳动量，而且都是使用同等价值的材料。但是如果在上述所假定的相同条件下，帽匠用一頂帽子換得两双鞋子，那末显而易见，这种交换是不公正的。帽匠騙得了鞋匠一个工作日，如果帽匠在所有的交换中都这样，那末他用半年的劳动就会得到別人一年的劳动产品。直到今天，我們一直在遵循这种最不公正的交换制度：工人們交給資本家一年的劳动，但只換得半年的价值(the workmen have given the capitalist the labour of a whole year, in exchange for the value of only half a year)。財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就从这里产生，而决不是由人們所說的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不等产生。交换的不平等以及买卖价格的差异，只有在以下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即資本家永远是資本家，而工人永远是工人，一面是暴君階級，另一面是奴隶階級……資本家和工人之間这种交易明显地表明，資本家和財主們对工人一星期劳动的偿付，只是他們上星期从工人那里取得的財富的一部分，換句話說，他們同工人以无易有(nothing for something)……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全部交易純粹是一幕滑稽剧：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无非是一种无耻的(虽是法定的)搶劫而已(The whole transaction between the producer and the capitalist is a mere farce: it is, in fact, in thousands of instances, no other than a barefaced though *legalised robbery*)。”(同上，第45、48、49、50頁)

“只要企业主和工人之間的交换不平等，那末企业主的利潤就永远是工人的損失；只要社会分成資本家和生产者，只要生产者靠自己的劳动过活而資本家靠从別人劳动中榨取利潤来养肥自己，那末交换就不会平等……”

布雷先生接着說：“显然，不論建立什么統治形式……不論怎样宣揚道德和友爱……互惠和交换的不平等是不相容的。交换的不平等是財產不平等的源泉，它是吞噬我們的无形的敌人(No reciprocity can exist where there are unequal exchanges, Inequality of exchanges, as being

the cause of inequality of possessions, is the secret enemy that devours us)”(同上,第 51、52 頁)

“从考察社会的目的和任务中我可以得出結論說, 不仅一切人都必須劳动, 这样才能进行交换, 而且相等的价值必須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其次, 为了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致成为另一个人的損失, 价值必須由生产費用来确定。然而我們知道: 在現存的社会制度下, 資本家和富人的利益永远是工人的損失; 这个結果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交换的不平等繼續存在, 在一切的統治形式下, 穷人将完全听憑富人摆布。平等交换只有在普遍劳动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得到保証…… 平等交换会使財富逐漸地由現在的資本家手里轉到工人階級的手里。”(同上, 第 53—55 頁)

“只要这种不平等交换制度繼續存在, 即使政府的一切賦稅和一切捐稅都取消, 生产者还永远会象現在一样地貧穷、无知, 劳动过重…… 只有彻底改变制度, 只有实施劳动和交换的平等才能改善这种情况并保証人們有真正的权利平等…… 生产者只要努力(也只有他們努力才能自救), 就能永远打碎束縛他們的鎖鏈…… 政治平等作为目的是錯誤的, 作为手段也同样是錯誤的 (As an end, the political equality is there a failure, as a means, also, it is there a failure)。

“在平等的交换下, 一个人的利益就不会是另一个人的損失, 因为那时候每一次交换只不过是劳动和財富的轉移, 不需要任何牺牲。因此, 虽然在以平等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生产者仍然可以靠節約致富, 但是他們的財富只是他們自己劳动的积累。那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財富和別人交换, 或者送給別人, 但是只要停止劳动, 他就不能长时期繼續保持富裕。随着平等交换的建立, 財富就会失去它現在所具有的那种自行更新和再生产的能力; 它再也不能弥补消費带来的損失, 因为已消耗的財富只有用劳动再生产出来, 否則它就永远消失了。我們現在所謂的利潤和利息, 在平等交换制度下是不可能再存在的。那时無論生产者或分配者将会得到相等的报酬, 每种生产出来并供应給消費者的产品的价值, 将由他們花費在产品上的劳动总額来确定……

“因而, 平等交换的原則, 按其本性來說, 必然会引起普遍劳动。”(同上, 第 67、88、89、94、109—110 頁)

駁斥了經濟學家們反對**共產主義**的議論以後，布雷先生繼續說：

“如果要順利實現以財產公有為基礎的最完善的社會制度，就必須改變人的性格；如果現在的制度沒有條件和可能來改變這種性格，使人們達到合乎我們理想的更好的狀態，那末顯而易見，情況就必然會保持原狀。否則，就必須發現和實行一種過渡的社會階段——即部分屬於現在的制度、部分屬於將來的制度（以財產公有為基礎的制度）^①的過程——或者某種中間階段，社會進入這個階段時將帶着自身的各種弊病和愚蠢，以後出來時却帶着財產公有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各種品質和特點。”（同上，第134頁）

“整個這一進程只要求最簡單的合作形式…… 生產費用在任何情況下都確定產品的價值，相等的價值總是和相等的價值進行交換。如果說有兩個人，其中一個人工作一個星期，而另外一個人只工作半個星期，那末前者所得的報酬就會比後者所得的多一倍；但是前者多得的報酬並不損害後者的利益，後者的損失決不會對前者有利。每個人都以自己所得的工資來交換同樣價值的物品；在任何情況下，無論哪一個人或者哪一個生產部門所得的利益，都不會是另一個人或者另一個生產部門的損失。每一個人的勞動才是他的利益或損失的**唯一標準**……

“……消費所需要的各種不同產品的數量，每個物品和其他物品（各種不同勞動部門所需要的工人數目）所比較的相對價值，總之，凡和社會的生產和分配有關的一切事務，都由中央和地方貿易局（boards of trade）來確定。這種核算在整個民族中實行，就象在現存制度下在私人公司中實行一樣，並不費什麼時間，而且是輕而易舉的…… 個人構成家族，家族構成鄉鎮，就象在現存制度下一樣…… 城鄉居民的分布不管有怎樣的弊病，也不會馬上取消…… 在這個聯合體中，每個人繼續享有任意積蓄和按照自己的願望去使用這種儲金的自由…… 我們的社會可說是由無數最小的股份公司（在這些最小的股份公司中，大家勞動、大家生產並且在最平等的基本上交換自己的產品）所構成的一個大股份公司…… 我們這種股份公司的新制度是為了過渡到共產主義而對現代社會的一種讓步，它允許產品的**個人所有制**和生產力

^①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的公有制同时存在；这种新制度使每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本身的活动，并使人人均享自然和技术的成就所提供的一切利益。因此，这种制度可以适用于现在的社会，还可以准备它今后的变化。”（同上，第158、160、162、168、194、199頁）

我們現在只要用几句话来回答布雷先生。他出乎我們的意料甚至违背了我們的意志，取蒲魯东先生而代之；所不同的是，布雷先生沒有以給人类下最后断語的主宰自命，他認為自己提出的办法只适合于现代社会和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制度之間的过渡阶段。

某甲的一个工时交換某乙的一个工时。这就是布雷先生的基本定理。

假定某甲工作十二小时，而某乙只工作六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某甲只要用六小时就能交換某乙的六小时，这样某甲的其余六小时就会剩下来。他怎样处理这六小时的劳动時間呢？

或者根本不做处理，这样他就白白劳动六小时，或者在其他的六小时不干活，以便取得均衡，再不然，最后的一着就是他把这自己用不着的六小时也一起卖给某乙。

这样某甲到底比某乙多得了什么呢？是劳动時間嗎？不是的。他只不过多得了空闲的时间，他只得在六小时中間无所事事。为了使这种无所事事的新权利不仅在新社会中得到承認，而且受到重視，这个新社会就必须把懶惰当作最大的幸福，将劳动看成必須全力摆脱的沉重負担。再回到上述的例子来看，某甲比某乙多得的空闲时间，对某甲來說該是一种真正的收获吧！并不是这样。最初只工作六小时的某乙經過經常的和有規律的劳动以后，便达到某甲在开始时用过度的劳动所得的結果。每个人都想做某乙，

于是就会發生为爭夺某乙的地位而展开竞争，即展开偷懶的竞争。

那末相等劳动量的交换究竟給我們带来了什么呢？生产过剩、价格低落和过度劳动（接着是无事可做），总而言之，現社会中所有的一切經濟关系，只是沒有劳动的竞争。

但是不然，我們錯了。要拯救新社会，即某甲和某乙的社会，只有一个方法。某甲可以自己消費掉他所剩下的六小时劳动的产品。但是一旦他不需要交换他的产品，那末他就不需要为交换而生产了，我們原先所說的社会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换之上的这个前提，也就完全垮台了。只有停止一切交换才能拯救平等交换，那时某甲和某乙就都会变成魯滨逊。

因此，假定社会的全体成員都是直接劳动者，那末要进行劳动時間的等量交换，只有事先对花費在物質生产上的時間数量取得協議。但是这种協議是对个人交换的否定。

如果不以产品的分配而以生产行为本身作为出發点，我們也会得出同样的結論。在大工业中，某甲不能任意确定自己劳动的时间，因为某甲的劳动，如果沒有組成企业的一切其他的某甲和某乙的合作，那就沒有什么作用。这非常清楚地說明英国的厂主为什么頑固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他們都很知道，減少女工和童工两小时的劳动時間⁵¹ 必然也会引起成年工人的劳动時間的縮短。大工业的性質就要求一切人的劳动時間都完全一样。今天是資本以及工人們之間相互竞争的結果的东西，如果一旦取消劳动和資本的关系，明天就会成为以生产力总額对現存的需要总額的关系为基础的一个实在的协定。

但是这样的协定就是个人交换的死刑；因此我們又回到原来的結論上了。

在原則上，沒有產品的交換，只有參加生產的各種勞動的交換。產品的交換方式取決於生產力的交換方式。總的說來，產品的交換形式是和生產的形式相適應的。生產形式一有變化，交換形式也就隨之變化。因此在社會的歷史中，我們就看到產品交換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產方式來調節。個人交換也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而這種生產方式又是和階級對抗相適應的。因此，沒有階級對抗就不會有個人交換。

但是可敬的資產者的良心却不承認這個明顯的事實。只要是資產者，他就不能不把這種對抗關係當作不允許任何人損人利己的、以和諧與永恆的公平為基礎的關係。在資產者的心目中，沒有階級對抗個人交換也可以存在；他們認為兩者之間是毫無關係的。資產者想象中的個人交換和實際中存在的個人交換是大不相同的。

布雷先生把可敬的資產者的幻想變成了他想實現的理想。他刷新個人交換，清除個人交換中的一切對抗因素，他以為這樣就找到了他希望社會採用的“平均主義的”關係。

布雷先生沒有看到，這個平均主義的關係，即他想應用到世界上去的這個具有糾正作用的理想本身，只不過是現實世界的反映；因此，要想在不過是這個社會美化了的影子的基礎上來改造社會是絕對不可能的。隨着這個影子重新成為具體的東西，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決不是夢想中的一個變了形的社會，而是現代社會的實體[⊖]。

⊖ 和任何其他理論一樣，布雷先生的這個理論也得到了一些受它假象蒙蔽的擁護者。在倫敦、設菲爾德、里子以及英國其他的許多城市中都曾設立過勞動產品公平交換所〔equitable-labour-exchange-bazars〕。這些交換所吸收了大

第三节 价值比例規律的应用

甲、貨幣

“金銀是价值已經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

所以金銀成了由蒲魯东先生……“构成的价值”的最初应用。蒲魯东先生是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比較量确定价值的方法来构成产品的价值，因此，他只要証明金銀价值的变动总是由于生产金銀所必要的劳动時間的变动就可以了。可是蒲魯东先生却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在談及金銀的时候，是把它們当作貨幣而不是当作商品。

如果还有邏輯的話，那末他的全部邏輯就是：他以变戏法的手法把金銀做为貨幣的特性运用于由劳动時間衡量价值的一切商品。当然，在这套戏法中，幼稚多于狡猾。

任何有用的产品的价值既然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時間来衡量，那末这种产品就永远具有交換性能。蒲魯东先生大声叫道，在“交換可能性”上已达到我所要求的条件的金銀就是証据。所以，金銀就是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即蒲魯东先生思想的体现。他在选择例子上沒有比这更幸运的了。金銀除了象其他商品一样是由劳动時間来衡量价值的商品以外，还具有普遍交換手段，即貨幣的

批資本以后都遭到可耻的破产。这批拥护者对它們也就永远失去了兴趣。蒲魯东先生可要注意这个警告！（馬克思原注）

大家知道，蒲魯东并没有接受这个警告。1849年他在巴黎也企圖开办一个新的交換銀行。但是这个銀行还没有开始正常活动就垮台了。对蒲魯东的审訊掩飾了这个銀行的垮台。——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特性。因此，如果把金銀当做由劳动時間所“构成的价值”的应用，那末要証明由劳动時間构成价值的一切商品都将具有不断交換性能，都将成为貨幣，是再容易也沒有了。

蒲魯东先生脑子里产生了一个非常簡單的問題：为什么只有金銀才能成为“构成价值”的典型？

“習慣賦予貴金屬作为交換手段的特殊职能是純粹契約的职能。任何別的商品，虽然可能有些不便，也都能同样可靠地实现这个作用；經濟学家們都承認这一点，并且举出了不少例子。貴金屬被公認作为貨幣使用，究竟是什么原因？而貨幣的这种特殊职能（政治經濟学中并没有类似情况）又該怎样解释呢？…… 貨幣似乎已經从一种系列中脱离出来，要重建这种系列并把貨幣重新引到它的真正的原理上去，这是否不可能呢？”

蒲魯东先生这样提出問題，那就已經預先假定了貨幣的存在。蒲魯东先生應該首先自問一下：为什么在目前已形成的这种交換中，必須創造一种特殊的交換手段来使交換价值个别化呢？貨幣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为什么貨幣所表現的关系也象任何其他經濟关系如分工等一样，是一种生产关系呢？如果蒲魯东先生对这种关系有个明确的概念，那就不至于把貨幣当做例外，当做人尚不知或需要确定的系列中分离出来的一个要素。

相反地，他会認為这个关系只是其他經濟关系的整个鎖鏈中的一个环节，因此两者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会承認，这种关系正如个人交換一样，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但是他究竟怎么办呢？他首先把貨幣从現在的生产方式的总体中分离出来，然后使它成为想象中的系列，即尚待發現的系列的第一个要素。

既已承認特殊的交換手段的必要性，即貨幣的必要性，剩下的

就只是說明为什么这个特殊的职能屬於金銀，而不屬於任何其他的商品。这是一个次要問題，這個問題不应当用生产关系的总体系来解释，而应当用金銀作为一种物質所固有的特性来解释。由此可見，如果經濟学家們在这种情况下，象蒲魯东先生所斥責他們那样，“超出自己所学的領域，去研究物理学、力学和历史等”，那末他們只是做了必須做的事情。問題已經不在政治經濟学的范围之内了。

蒲魯东先生說：“所有經濟学家都沒有看到、沒有理解到使貴金屬享有特权的那种經濟原因。”

誰也沒有（不是沒有根据的）看到和理解到的經濟原因，蒲魯东先生却看到了，理解了，而且传給了后代。

“沒有人注意到，金銀在一切商品中是价值已經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在宗法时期，金銀作为交易对象出現，而且还一錠錠地互相交换，然而当时它們已經具有占統治地位的明显趋向并且比其他商品占显著的优势。君主們逐漸地占有了貴金屬，并且在上面对了自己的印章；經過君主的神聖化以后就产生了貨幣，即 *par excellence*〔最道地的〕商品，不論交易中有什麼动荡，这种商品都能保持一定的比值并在各种支付中被人接受……再說一遍，金銀的特点就是由于它們有金屬的本性，开采困难，尤其是由于国家的干預，它們作为商品早就获得了穩固性和确实性。”

金銀在一切商品中是价值已經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从他上述的話里所得出的結論，就是說，金銀最早成为貨幣。这就是蒲魯东先生伟大的啓發，这就是在他以前沒有人發現过的真理。

如果蒲魯东先生想用這些話說明，人們对开采金銀所必要的時間比生产其他商品所必要的時間知道得更早，那末这又是他慷慨地奉送給讀者的假定之一。如果我們想遵循这种宗法时期的學問，那我們就要奉告蒲魯东先生，生产日用必需品（例如鉄等）所必

要的時間是知道得最早的。至于亞當·斯密的古弓那就更不必說了。

既然任何一種價值都不是單獨構成的，蒲魯東先生怎麼還能說價值的構成呢？價值不是由單獨生產某種產品所必要的時間構成，而是與同一時間內所能生產的一切其他產品的數量成比例。因此金銀價值的構成是以許多其他產品的價值已經構成為前提的。

可見，並不是商品在金銀這種形式中達到“構成價值”的狀態，相反地，而是蒲魯東先生的“構成價值”在金銀這種形式中達到貨幣的狀態。

根據蒲魯東先生的意見，由於某些經濟原因，金銀經過構成價值的狀態，比一切其他產品就更具有成為貨幣的優越性。現在我們就來進一步考察這些經濟原因。

這些經濟原因是：“力求占居統治地位的明顯趨向”、“在宗法時期”已經取得的“顯著的優勢”以及同一事實的其他的轉彎抹角說法；這種轉彎抹角的說法只能增加我們的困難，因為蒲魯東先生在解釋一個事實時添加了許多枝節，從而使需要說明的事實越來越多了。但是蒲魯東先生還沒有講完他的所謂經濟原因。下面就是那種至高無上和不可抗拒的力量的一個原因：

“經過君主的神聖化以後就產生了貨幣：君主們占有金銀，並且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

因此，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君主的專橫就是政治經濟學中的最高原因！

其實，只有毫無歷史知識的人才不知道：君主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並且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無論

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关系的要求而已。

究竟是君主占有了金銀，盖上自己的印章使它們成为普遍的交換手段呢，还是普遍的交換手段占有了君主，讓他盖上印章并授与政治上的神聖？

人們过去和現在給銀幣盖上的印記，并不表明它的价值，而是表明它的重量。蒲魯东先生所說的穩固性和确实性只和錢幣的成色有关；这种成色表明一塊銀幣中含有多少純金屬。

伏尔泰用他那总是健全的理智說：“一个銀馬克所含的唯一价值是一馬克的銀子，半磅銀子重量为八盎斯。只有重量和成色构成这种內在的价值。”（伏尔泰：“約翰·罗的制度”⁵²）

但是，一盎斯金子或者銀子值多少呢？这个問題还是没有解决。就算“大柯尔培尔”商店的克什米尔呢上印着“純毛”的商标，但是这种商标根本没有說明克什米尔呢的价值。而毛呢究竟值多少，这始終还是一个問題。

蒲魯东先生說：“法国皇帝菲力浦一世在查理大帝时代的土尔銀幣中掺进了三分之一的雜質。他以为他既占有鑄造錢幣的垄断权，也就能够象一切垄断产品的商人处理自己商品那样地处理錢幣。菲力浦和他的繼承人被人責难伪造錢幣实际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一种从商业慣例的观点來說非常正当、但从經濟学的观点來說却十分荒謬的想法。这种想法認為，既然供求調节价值，那末人为地使物品稀少或完全掌握它們的生产，就可以提高物品的估价及价值，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金銀，正如它适用于粮食、酒、食油、烟草一样。然而菲力浦的欺詐只要一引起怀疑，他的錢幣就会跌到真正价值上去，从而他也就失去了他指望从臣民那里贏得的一切。所有类似的企圖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首先，事实已經无数次地証明，如果君主要想伪造錢幣，那末

他就会遭到損失。他在最初發行中虽一度得到利益，但以后每当伪造的錢幣以捐稅等形式重新回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又要将这些利益失掉。但是菲力浦和他的繼承人多多少少防止了这种損失，因为他們把伪造的錢幣一投入流通，馬上就下令照原有成色普遍改鑄錢幣。

其次，如果菲力浦一世真象蒲魯东先生那样推論，那末他的推論“从商业观点來說”就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菲力浦一世或者蒲魯东先生只是根据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供求关系这一点，便以为金子的价值完全象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可以改变的，那末这只表明他們的商业才能很差。

如果菲力浦皇帝命令把一繆伊粮食叫做二繆伊粮食，那他就成了騙子。他就是欺騙了一切收租的人，一切收一百繆伊粮食的人；由于他的好意，这些人本来可以收一百繆伊粮食，現在只能收五十繆伊了。假定皇帝欠人一百繆伊粮食，那他現在只要还五十繆伊就行了。但是在貿易中，一百繆伊粮食一点也不会比从前五十繆伊有更多的价值。名称是改变了，事物却并没有变化。無論是供应的或是需求的粮食的数量，都不会仅仅由于名称的改变而有所增減。因此，尽管名称改变，只要供求关系不变，那末粮食的价格也不会有任何实际的变化。人們在談到供求的时候，指的是物品的供求，而不是物品的名称。菲力浦一世并不象蒲魯东所說的那样創造了金銀，他只是創造了錢幣的名称。你把法国的克什米尔呢充作亚洲的克什米尔呢也許会欺騙一两个購買者，但是一旦騙术被拆穿，那末你的所謂亚洲的克什米尔呢的价格就会回跌到法国克什米尔呢的价格。菲力浦一世在金銀上盖印了假标记，这种伎俩只能在未被揭穿前騙一騙人。象别的老板一样，用冒牌

商品欺騙顧客只能蒙混一時。他遲早一定會感到貿易規律的嚴峻。蒲魯東先生想證明的是這一點嗎？不，不是這一點。在他看來，使貨幣獲得價值的不是貿易，而是君主。實際上他證明了什麼呢？他證明貿易比君主更有權力。即使君主下命令使一馬克今後成為兩馬克，但是貿易卻總是告訴你：這兩個新的馬克只值從前一個馬克。

但是這並沒有把價值取決於勞動量這個問題推進一步。重新變成從前那一個馬克的這兩個馬克的價值，究竟是由生產費用來確定還是由供求規律來確定？這個問題仍然有待解決。

蒲魯東先生接着說：

“甚至也應當注意，如果君主不偽造錢幣，但有权把錢幣的數量增加一倍，那末金銀的交換價值由於比例性和均衡的原因，立刻會跌價一半。”

如果蒲魯東先生和其他經濟學家們的這個共同觀點是正確的，那末這也只是有利於他們的供求學說，對蒲魯東先生的比例性卻完全無補。因為根據這個觀點，無論在雙倍的金銀中包含的勞動量如何，只要需求不變而供應增加一倍，那末金銀的價值就會跌價一半。也許“比例規律”這一次是偶然和很受輕視的供求規律一致起來了吧？蒲魯東先生的這個正確的比例性的確伸縮性很大，隨時都可以變化、配合和移項，下一次很可能又和供求關係一致起來。

“任何商品，即使不是在事實上，至少在法律上具有交換能力”，金銀所起的作用便是根據；其實這是不了解金銀的作用。金銀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換能力，只是由於它們具有事實上的交換能力，而它們之所以具有事實上的交換能力，那是因為當前的生產組織需要普遍的交換手段。法律只是事實的公認。

我們知道，蒲魯東先生選擇貨幣作為達到構成狀態的價值的實際應用的例子，只是為了偷運他那一套關於交換可能性的理論，即為了證明每個按生產費用來估價的商品都必須成為貨幣。如果不是下面一個小小的缺陷，這一切都是很好的。這個缺陷是：在一切商品中，只有作為貨幣的金銀不是由生產費用來確定的商品；這一點是確實無疑的，因為金銀在流通中可以用紙幣來代替。只要流通的需要和發行貨幣（無論紙幣、金幣、白金幣或銅幣）的數量之間保持着一定的比例，那就不可能產生保持貨幣的內在價值（由生產費用所確定）和名義價值之間的比例問題。當然，在國際貿易中，貨幣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樣是由勞動時間來確定的。這是由於在國際貿易中，甚至金銀也只是以產品的身份作為交換手段，而不是以貨幣的身份作為交換手段；這就是說，金銀失去了蒲魯東先生認為構成金銀特性的“穩固性和確實性”，即“經過君主的神聖化”的特點。李嘉圖非常理解這個真理，他把價值取決於勞動時間作為他的整個體系的基础，並且指出：“金銀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樣，它們所具有的價值，只是與生產它們並把它們投入市場所必要的勞動量相適應”，但是他又補充說，確定貨幣價值的不是實物所包含的勞動時間，而只是供求規律。

“雖然紙幣沒有任何內在的價值，但是如果數量有限，那末紙幣的交換價值就會和票面金額相同的硬幣的價值或這種錢幣所包含的金屬的價值一樣大。由於這一原則，即由於貨幣數量有限，那末磨損了的錢幣如果它以前含有法定的重量和成色，就可以按照它應有的價值流通，而不是按照它實際所含有的純金屬的份量的價值流通。因此，在不列顛的貨幣史中我們常常看到，硬幣從沒有隨它們的質地下降程度而貶值。這是因為硬幣從來不隨其內在價值的減少而增加數量。”（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原理”）

讓·巴·薩伊對李嘉圖這些話的看法如下，

“我覺得，這個例子应当足以使作者相信：一切價值的基础都不是生產某種商品所必要的勞動量，而是和該商品的稀少相對比的那種對商品的需要。”⁵³

在李嘉圖的心目中，貨幣已經不是由勞動時間來確定的一種價值，而讓·巴·薩伊正根據這一點把貨幣作為例子，想使李嘉圖相信其他的價值也不能由勞動時間來確定。我說，這些被讓·巴·薩伊當作價值完全由供求確定的例子的貨幣，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就成了由勞動時間來構成……價值的 *par excellence* [最好的] 實例。

總而言之，如果貨幣不是由勞動時間所“構成的價值”，那末它就更不能和蒲魯東先生的正確的“比例性”有什麼共同之處。金銀之所以永遠能夠交換，是由于它們具有作為普遍交換手段的特殊職能，而決不是由于它們在數量上和財富總額成比例；或者更明確地說，金銀之所以經常保持均衡，是由于在一切商品中只有它們作為貨幣，作為普遍的交換手段，不管它們的數量和財富總額的比例關係如何。

“流通中的貨幣決不會多得無用；因為如果減少貨幣的價值，那就是在以同樣的比例增加貨幣的數量，而如果增加它的價值，那也就是在減少它的數量。”（李嘉圖）

蒲魯東先生大聲叫道：“這種政治經濟學真是一團糟。”

“一個共產主義者（通過蒲魯東先生的嘴）^①可笑地叫道：可惡的金子！同樣也可以說：可惡的小麥！可惡的葡萄！可惡的綿羊！因為一切商業價值都和金銀一樣，必須得出它的精確而嚴格的確定。”

^①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使綿羊和葡萄具有貨幣的特性，这种思想并不新奇。在法国，在路易十四那个世紀就有这种思想。在这个貨幣开始成为万能的時代，人們抱怨其他一切商品的跌价，热烈地期待有一天“一切商业价值”都可以得到精确而严格的确定，成为貨幣。在法国最老的經濟学家之一布阿吉尔貝尔的著作中，我們就已經發現有这样的話：

“那时，由于恢复了公正价值的商品作为无数竞争者出現，貨幣就会被引到它的自然界限。”（“18世紀的財政經濟学家”，德尔編，第422頁）

可見，資產階級最初的幻想也正是他們最后的幻想。

乙、劳动的剩余

“在政治經濟学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样荒謬的假設：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增加一倍…… 好象一切物品的价格并不是物品間的比例，好象人可以使比例、比率或者規律增加一倍！”（蒲魯东，第一卷第81頁）

經濟学家們之所以陷入这种謬誤，是由于他們不会应用“比例規律”和“构成价值”。

不幸得很，在蒲魯东先生自己的著作（第一卷第110頁）中也能看到这种荒謬的假設：“如果工資普遍提高，一切物品的价格就会上升。”不仅如此，在政治經濟学的著作中我們既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同时还可以找到它的說明。

“当說到一切物品价格的涨跌的时候，通常总是把某种商品除外的；这种商品通常是貨幣或劳动。”（“京都百科全書，或知識大辞典”1836年倫敦版第六卷中西尼耳所著“政治經濟学”条54。关于这种說法，也可参閱：約·斯·穆勒“略論政治經濟学的某些有待解決的問題”1844年倫敦版，以及圖克“价格史……”1838年倫敦版55）

現在我們來談談“构成价值”和其他比例性（它們唯一的缺点

是缺少比例)的**第二种应用**,并且来看看蒲魯东先生在这里的做法是不是比企圖把綿羊說成貨幣更幸福些。

“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这个定理是經濟学家們公認的。这个原理对我來說是普遍的和絕對的真理;这是可以当做全部經濟科学总结的比例規律的必然結果。但是請經濟学家們原諒,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的原理,在他們的理論中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不会得到任何証明。”(蒲魯东)

为了証明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蒲魯东先生把社会人格化;他使社会变成**作为人的社会**,这种社会决不是由人所組成的社会,因为它有自己的特殊規律,这些規律与組成社会的人毫无关系,有“自己的理性”,这种理性不是普通的人的理性,而是喪失理智的理性。蒲魯东先生責备經濟学家們不了解这种集合体的个性。美国有一位經濟学家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来責备別的經濟学家,我們認為有必要引用他的一段話来和蒲魯东先生的話作对照:

“人們給被称为社会的精神实体 (the moral entity)——即文法的存在(the grammatical being),硬加上一些实际上只存在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們的想象中的屬性…… 这就在政治經濟学中引起許多困难和可悲的誤解。”(托·庫伯“論政治經濟学的要素” 1826年哥倫比亞版56)

蒲魯东先生繼續說道:

“劳动剩余这一原理对于个人之所以正确,只是由于这一原理产生于社会,社会因此以自己的規律加惠于个人。”

蒲魯东先生是否只是想說明,社会里的个人的生产可以超过孤独的个人的生产?他是否指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生产剩余多于沒有联合的个人的生产剩余?如果是的話,我們可以給他指出几百个沒有求助于蒲魯东先生的那种神秘主义但却表明了这种簡單真理的經濟学家。例如薩德勒先生就說過这样的话;

“联合劳动产生出个人劳动决不能达到的結果。因此，随着人类在数目上的增加，人类联合劳动的产品将远远超过人口数量增长简单加算所得出的总額……今天，无论在机械技术中或科学工作中，一个人一天所做的事情比孤独的个人一生所做的还要多。全体等于各部分之和这一数学定理，如果应用到我們所考察的对象上来就会錯誤。至于劳动即人类生存的伟大支柱 (the great pillar of human existence)，那末可以說，共同努力的产品要远远超过个人的和分散的努力所能生产的一切。”(托·薩德勒“人口的規律”1830年倫敦版57)

我們再回来談談蒲魯东先生。他說，劳动剩余在作为人的社会中得到了說明。这种人的生活所服从的規律，是和确定作为个人的人的活动的規律相对立的；蒲魯东先生想用“事实”来証明这一点。

“經濟方面的新發現决不会給發明者带来和他貢獻給社会相等的利益……大家知道，鐵路企业为企业主提供的財富远不如为国家提供的多……兽力車运输的運費(包括装卸費用在內)平均每吨公里为18生丁。有人算过，照这种比率，普通的鐵路企业就得不到10%的純利，这和兽力車运输企业的結果差不多一样。但是假定鐵路运输的速度和兽力車运输的速度是4比1；由于对社会來說時間就是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運費一样，鐵路运输所提供的利益就是兽力車运输所提供的400%。然而这种对社会來說非常现实的巨大利益，对运输企业主來說却决不能按同样的比例获得实现：运输企业主使社会得到400%的利益，而自己却連10%的利益也得不到。为了把問題說得更清楚些，我們假定实际上鐵路運費提高到25生丁，而兽力車运输的運費仍然是18生丁，这时鐵路立刻就会失去一切运貨生意。所有的發貨人和收貨人都將重新使用旧时的行李車，必要时甚至使用馬車。機車就会被弃置不用，400%的社会利益將因35%的私人損失而牺牲。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鐵路运貨迅速所带来的利益完全是社会的，每人所得到的利益只占非常小的比例(不要忘記，目前只談运貨問題)，而損失对于消費者却是直接的具体的。假定社会只有100万人，那末等于400的社会利益对个人來說就是万分之四，而消費者遭受的33%的損失却决定了3300万的社会亏

損。”(蒲魯东)

蒲魯东先生还可以用原始速度的 400% 来表明四倍的速度；但是他拿速度的百分比和利潤的百分比来比較，并且在这两种单独可以用百分比来計算但相互不可比的比数之間来确定比例，这就是不管百分比指的是什么，而在百分比之間求比例。

百分比終究是百分比。10% 和 400% 是可以相比的；两者的关系就象 10 和 400 一样。因此蒲魯东先生就断言，10% 的利潤只及四倍速度的四十分之一。为了裝飾門面，他又說，对社会來說，時間就是金錢 (time is money)。他之所以犯这个錯誤，是因为他模糊地想起在价值和劳动時間之間存在着某种关系，就急急忙忙把劳动時間和运输時間等同起来，就是說他把某些司爐、車务員以及乘务員(他們的劳动時間确实和运输時間完全一致)和整个社会混为一談了。这样，速度一下子就变成了資本，他有充分理由說：“400% 的利潤将因 35% 的損失而牺牲。”他先以数学家的姿态确立了 this 奇特的原理，然后又从經濟学家的观点来給我們解释这个原理。

“如果社会只有一百万人，那末等于 400 的社会利潤对个人來說就只是万分之四。”就算是这样；可是問題不在于 400，而在于 400%；400% 的利潤对个人來說不多不少恰好是 400%。無論資本多少，而紅利总是按 400% 的比率来計算。蒲魯东先生究竟要做什么？他把百分比当做資本，似乎唯恐他的混乱思想表現得不够清楚，不够“明显”，所以繼續說：

“而消費者遭受的 33% 的損失却决定了 3 300 万的社会亏损。”对一个消費者是 33% 的損失，对一百万个消費者來說仍旧是 33% 的損失。蒲魯东先生既不知道社会的資本总额，又不知道当

事人个人的資本額，他怎么能确切地說，損失为 33% 的时候，社会亏损会达到 3 300 万？蒲魯东先生还不满足于把資本和百分比混为一談，而且更进一步，把投入企业的資本和对資本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数目混为一談。

“为了把問題說得更清楚些，假定在实际上”有一笔确定的資本。社会利潤是 400%，要在一百万个每人曾拿过一个法郎的参与者之間分配，那末每人可得四个法郎，而不是象蒲魯东先生所說的 0.0004 法郎。同样，每个参与者遭受 33% 的損失，社会亏损是 33 万法郎，而不是 3 300 万法郎 ($100 : 33 = 1\,000\,000 : 330\,000$)。

蒲魯东先生专心致力于他的作为人的社会的理論，忘記了用 100 来除，因此蒙受了 33 万法郎的損失。但是每人得到 4 法郎的利潤，对于社会來說就是 400 万法郎的利潤。因此，社会还留下 367 万法郎的純利潤。这种精确的計算所証明的和蒲魯东先生企圖証明的恰恰相反，就是說，社会的損益和个人的損益決不是成反比的。

糾正这种簡單的純粹算术上的錯誤以后，我們再来看看，如果我們同意蒲魯东先生以鐵路为例所得出的速度和資本的关系，去掉算术上的錯誤，会得出什么結果。假定說，运输加快四倍，運費也增加四倍，那末这种运输的利潤，不会少于那种速度慢四倍而運費只有四分之一的兽力車运输的利潤。这就是說，如果兽力車运输要 18 生丁，那末铁路运输就得 72 生丁。根据“数学的严密性”，蒲魯东先生的假設的結果就会是这样，——当然这里也得去掉他在計算中的錯誤。可是他却非常突然地告訴我們說，如果铁路运输不要 72 生丁，只要 25 生丁，它立刻就会失去一切运貨生意。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重新用行李車甚至馬車来运输。我們

唯一要忠告蒲魯东先生的，就是他在“进步的联合体的綱領”中不要忘記用 100 来除。但是很可惜！我們的忠告很难希望得到傾听，因为蒲魯东先生如此醉心于他那种适合于“进步的联合体”的“进步的”計算，他甚至大声疾呼地喊道：

“我在第二章中講到解决价值的矛盾时已經指出，每一种有用的發現給予發明者的利益(不論他怎么做)都比給予社会的利益少得不可比拟；在証明这一点方面，我已做到数学的严密性！”

現在，我們回到作为人的社会这一臆想上来，这个臆想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証明如下一个簡單的真理：每种新的發明都使产品的交換价值下降，使同样的劳动量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因此，社会之所以获得利益，并不是由于它获得更多的交換价值，而是它憑原来的价值获得了更多的商品。至于發明者，他的利潤在竞争的影响下不断下降到利潤的一般水平。蒲魯东先生有沒有照他所想的那样証明了这个論点呢？沒有。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責难經濟学家們沒有証明这个論点。为了証明事实恰好相反，这里只要引用李嘉圖和罗德戴尔的話就够了。李嘉圖是用劳动時間确定价值的学派領袖；罗德戴尔則是供求确定价值的一个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他們兩人都闡明了同一个論点。

“我們使生产越来越方便，因而以前生产的某些商品的价值就不断降低，虽然我們用这种方法不仅增加国民財富，而且还扩大将来的生产能力……一旦我們利用机器或自然科学知識使自然力从事以前人做的工作，这种工作的交換价值也就随着降低。如果推动一个面粉磨要用十个人的劳动，后来發現可以利用風力或水力节省下这十个人的劳动，那时磨子生产的面粉的价值就会随节省的劳动量成比例地下降；而社会将因获得这十个人的劳动生产物的价值而更为富裕，因为維持他們生活的基金絲毫不会减少。”(李嘉圖)

現在再看看罗德戴尔是怎么說的：

“資本的利潤經常是這樣獲得的：或者由於資本代替了人類必須親手去做的一部分勞動，或者由於資本做了超乎人力之外和人所不能為的那種勞動。如果和機器所代替的勞動價格比較起來，機器所有者通常得到的利益是微薄的，這也許會使人懷疑我們的看法是否正確。例如，一架蒸汽抽水機一天內從煤坑中抽出的水比三百個人用水桶背水還要多；而且毫無疑問，抽水機花的費用要少得多。一切其他的機器也都如此。機器代替人的雙手進行勞動，而代價卻非常低廉…… 假定說，有個發明家發明了一架代替四個人勞動的機器並獲得專利權；由於他有這種特權，所以除了被他的機器代替的那部分工人的勞動所產生的競爭以外，他不可能有別的競爭。顯而易見，在特權的有效期間，這些工人的工資就是發明家出售產品時定價的標準；這就是說，發明家為了保證產品的銷售，他的索價只要略低於機器所代替的勞動的工資就行了。可是這個特權一滿期，同樣的機器就會出現，和他的機器展開競爭。那時他就必須根據共同的原則調節他的索價，要根據機器增多這一情況索價。使用資本所獲的利潤……雖然它也是被代替的勞動的結果，到底並不是由這種勞動的價值來調節，而是象在所有其他情形下一樣，由資本所有者之間的競爭來調節；而競爭的強弱總是由某項用途的資本的供應量 and 對該項資本的需求之間的關係來確定。”

總之，只要新的生產部門的利潤高於其他部門，那末資本就經常會湧向這個部門，直到利潤率跌至一般水平為止。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鐵路的例子很難闡明作為人的社會這樣一種臆想。可是蒲魯東先生卻仍然勇敢地繼續發表他的議論：

“這一點一經說明，要解釋為什麼每個生產者的勞動必然給生產者一種剩餘，是再容易不過的。”

再接下去，就是有關遠古時代的事情了。這是富有詩意的故事，目的是要使因上述數學證明的嚴密性而疲憊不堪的讀者得到休息。蒲魯東先生把**普羅米修斯**的名字給予作為人的社會，並且用以下的話來歌頌他的功績：

“最初，普罗米修斯从自然的怀抱中走出来，感到生活在一种愉快的悠闲中……。于是，普罗米修斯就开始劳动，从第一天（第二次創世的第一天）起，他的产品，即他的财富，他的幸福等于十。第二天普罗米修斯实行分工，他的产品增加到一百。从第三天起，普罗米修斯每天發明机器，發現物体的新的效用，新的自然力……。他的劳动活动步步进展，他的生产数字也就随着上升，这表明他的幸福也在增进。最后，因为对他來說消費就是生产，因此每天的消費只是消耗前一天的产品，它还为第二天留下剩余产品。”

蒲魯东先生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真是怪物！他無論在邏輯上或政治經濟学上都是軟弱无力的。如果普罗米修斯只是教訓我們說：分工、使用机器以及利用自然力和科学的力量可以增加人的生产力，并且能比孤立的劳动提供剩余产品，那末这位新的普罗米修斯的不幸就是出世太晚。但是只要普罗米修斯一談起生产和消費，他就完全变成可笑的人物。对他來說消費就是生产；他在第二天消費的是前一天生产的東西，因此他經常有一天的儲备；这多余的一天就是他的“劳动的剩余”。但是既然今天消費昨天生产的東西，那末在沒有前一天的最初第一天，普罗米修斯为了使以后有一个工作日作为儲备就必须做两天的工作。但是在第一天，当时既沒有分工、又沒有机器，除了火以外也不知道別的自然力量，那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剩余的呢？因此，如果問題扯到“第二次創世的第一天”上去，那就寸步难行了。这种說明現象的方法，部分是希腊的，部分是犹太的，既神秘又有寓意；它使蒲魯东先生完全有权說：

“我已用理論和事实証明一切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这一原理。”

所謂事实，就是那大家知道的累进算法；所謂理論，就是那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話。

蒲魯东先生接着說：“但是这个象算术定理那样正确的原理，还远不是所有人都能實現的。个人每天劳动所得的产品随着集体劳动的进步而不断增

加，其結果必然是劳动者获得的工資和以前一样，但生活却日益富裕。然而我們看到的却是，社会上某些階層日益富裕，而另一些階層則死于貧困。”

在 1770 年，大不列顛联合王国的人口是 1 500 万，其中生产人口是 300 万。当时技术成就的生产力大約相当于 1 200 万人的生产力；因此生产力的总額是 1 500 万。所以生产力和人口的比例是 1 : 1，而技术成就的生产率和手工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是 4 : 1。

在 1840 年，人口沒有超过 3 000 万，其中生产人口是 600 万，但当时技术成就的生产率已达 6 亿 5 000 万人的生产力，和总人口的比例是 21 : 1，和手工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是 108 : 1。

可見，英国社会中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在七十年間增加了 2 700%，即 1840 年每天所生产的是 1770 年的二十七倍。根据蒲魯东先生的說法，那就应当提出这样的問題：为什么英国工人在 1840 年时并不比 1770 年时富裕二十七倍？这样提問題就是說，英国人即使沒有生产这种財富的历史条件（如私人資本的积累、現代分工、工厂、无政府状态的竞争、雇佣劳动制度，一句話，沒有建立在階級对抗上的一切东西），也能生产所有这一切財富。然而这些条件恰恰也是發展生产力和增加劳动的剩余的必要条件。因此，要获得这种生产力的發展和这种劳动剩余，就必需有階級存在，其中一些階級日益富裕，另一些則死于貧困。

但是蒲魯东先生使之复活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階級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資本家、农民和地主的關係。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一个沒有手脚的怪影，就是說既沒有工厂也沒有分工，总之，沒有最初你为了使他获得这种劳动的剩余而給他的一切东西。

如果在理論上，象蒲魯東先生那樣，只是對勞動的剩餘的公式加以平均主義的解釋而不必注意現代的生產條件，那末在實踐中，只要把現有的一切財富平均分配給工人們也就夠了，不必改變現代的生產條件。這樣的分配當然不會保證每個參加者都獲得極大的幸福。

可是蒲魯東先生決不是一般所設想的悲觀論者。因為在他看來一切都歸結為比例性，所以在現在實存的普羅米修斯中，即在現代社會中，他不能不看到他所寵愛的那個觀念在開始實現。

“但是財富的日益增加（即**價值的比例性**）到處都是統治的規律；當經濟學家們用公共福利日益增長和最貧困階級的狀況也獲得改善來反對社會主義者的申訴的時候，他們在不自覺中宣布一項真理，這個真理是對他們的理論的譴責。”

實際上，所謂集體財富，公共福利究竟是什麼呢？這是資產階級的財富，而不是每一個別資產者的財富。經濟學家們只不過證明了：在現存的生產關係中，資產階級的財富已經增長並應繼續增長。至於工人階級，那就大有問題；他們的狀況是不是因所謂的社會財富的增加得到改善還是疑問。經濟學家們為了替自己的樂觀主義作辯護，就拿英國的棉紡織工業工人為例，他們所看到的只是難得的商業繁榮時期工人的情況。這個繁榮時期和危機及停滯時期的“**正確的比例**”關係是3：10。也許經濟學家們所談的改善是指那些為了使同行的150萬英國工人在十年中得到三年繁榮而不得不賣命於東印度群島的幾百萬工人吧？

至於臨時分享社會財富的增長，那是另一回事。這種臨時分享的事實已由經濟學家的理論加以說明。這一事實是這個理論的**確認**，而決不是象蒲魯東先生所說的那樣，是對理論的“**譴責**”。如

果有什么东西应当受到譴責的話，毫無疑問，那就是蒲魯東先生的體系，象我們所指出的，它不管財富的增長却要把工人的工資降到最低限度。只有把工人的工資降到最低限度，蒲魯東先生才能應用價值的正確比例性的原則，即勞動時間“構成的價值”的原則。正是由於競爭使工資時高時低於維持工人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格，工人才有可能在某種程度內（即使微不足道）分享社會財富的增長；但正因為如此，他們也可能死於貧困。這就是在這方面沒有任何幻想的經濟學家們的全部理論。

蒲魯東先生節外生枝地長期糾纏於鐵路、普羅米修斯和应当在“構成價值”的基礎上重新改組新社會的問題之後，現出十分莊重的神情，他激動地以教訓人的口吻大聲喊道：

“我懇求經濟學家們暫時擺脫心靈深處那些迷惑他們的成見，不要考慮他們既得的或者希望獲得的職位，不要考慮他們為之獻身的利益，也不要考慮他們所追求的稱贊和誘惑他們虛榮心的聲譽，反躬自問一下，到目前為止，以我所說明的前提和結果這一環節來說，任何勞動必然留下一些剩餘這個原理會出現在他們面前嗎？”

第二章

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①

第一節 方法

現在我們已在德國中心！我們一方面談論政治經濟學，同時又要談形而上學。這一次，我們也只是跟着蒲魯東先生的“矛盾”走。剛才他迫使我們講英國話，使我們在相當程度上變成了英國人。現在場面變了。蒲魯東先生使我們回到我們親愛的祖國，使我們不由得又變成了德國人。

如果說有一個英國人把人變成帽子，那末，有一個德國人就把帽子變成了觀念。這個英國人就是李嘉圖，一位銀行巨子，傑出的經濟學家；這個德國人就是黑格爾，柏林大學的一位專任哲學教授。

法國最末一個專制君主和法蘭西王朝沒落的代表者路易十五有一個御醫，這個人同時又是法國的第一個經濟學家。這位御醫，這位經濟學家是預言法國資產階級必然要取得勝利的先知。魁奈醫生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他在自己的名著“經濟表”中概括地敘述了這門科學。除了已經有的對該表的一千零一個注解以

① 形而上學是一種反辯證法的思維和認識的方法。這裡所講的形而上學，是指脫離具體科學的哲學的一個部分，它用純思辨的方法來闡述經驗以外的各種問題，如關於存在的始源，關於世界的實質，關於上帝，關於靈魂，關於意志自由等等。——譯者注

外，我們還找到醫生本人做的一個注解。這就是附有“七個重要說明”的“經濟表的分析”⁵⁸。

蒲魯東先生是魁奈醫生第二，他是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方面的魁奈。

但是在黑格爾看來，形而上學同整個哲學一樣，可以概括在方法里面。所以我們必須設法弄清楚蒲魯東先生那套至少同“經濟表”一樣含糊不清的方法。因此，我們做了七個比較重要的說明。如果蒲魯東博士不滿意我們的說明，那沒關係，他可以扮演修道院長勃多的角色，親自寫一篇“經濟學—形而上學方法解說”⁵⁹。

第一個說明

“這裡我們論述的不是適應時間次序的歷史，而是適應觀念順序的歷史。各經濟階段或範疇有時候是同時出現，有時候又是顛倒的……不過，經濟理論有它自己的邏輯順序和理性中的一些系列，經濟理論的這種次序，如所預期的那樣，已被我們發現了。”（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第一卷第145和146頁）

蒲魯東先生把這些冒牌的黑格爾詞句扔向法國人，毫無問題是想吓唬他們一下。這樣一來，我們就要同兩個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魯東先生，其次是黑格爾。蒲魯東先生和其他經濟學家有什麼不同呢？黑格爾在蒲魯東先生的政治經濟學中又起什麼作用呢？

經濟學家們都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係說成是固定不變的、永恆的範疇。蒲魯東先生有了這些完全形成的範疇，他想給我們說明所有這些範疇、原理、規律、觀念、思想的形成情況和來歷。

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係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係本身是怎樣產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產生這

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魯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們在每一篇政治經濟学論文末尾已經按字母表排好）編一下次序就行了。經濟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魯东先生的材料則是經濟学家的教条。但是，既然我們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論上的表現）的历史發展，既然我們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賴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末，我們就只得到純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純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它是怎样造成这些思想的呢？

假如在黑格尔主义方面我們具有蒲魯东先生那种大无畏精神，我們就会說，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沒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沒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沒有自己可与之結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顛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結合——安置、对置、結合。用希腊語來說，这就是：正題、反題、合題。对于不懂黑格尔語言的讀者，我們將告訴他們一个神聖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就是措詞的含意。固然这不是天書（請蒲魯东先生不要見怪），然而却是脫離了个体的純理性的語言。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說話和思考的普通个体，而是沒有个体的純粹普通方式。

在抽象的最后阶段（因为这里談的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一切事物都成为邏輯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嗎？如果我們抽掉构成某座房屋特性的一切，抽掉建筑这座房屋所用的材料和构成这座房屋特点的形式，結果只剩下一个一般的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結果就只有空間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間的向度抽去，最后

我們就只有同純粹的数量,即数量的邏輯范畴打交道了,这用得着奇怪嗎?用这种方法把每一个物体的一切所謂偶性(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人类的或物类的)抽去,我們就有理由說,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邏輯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認為进行抽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日益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这些形而上学者說,我們世界上的事物只不过是邏輯范畴这种底布上的花彩;在他們自己看来,这种說法是正确的。哲学家和基督教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教徒只知道邏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邏輯不邏輯;而哲学家那里則有无数这种化身。既然如此,那末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經過抽象都可以归結为邏輯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沒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沒在邏輯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創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給我們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正如我們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邏輯范畴一样,我們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純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純粹邏輯公式。既然我們把邏輯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末也就不难設想,我們在运动的邏輯公式中已找到了一种**絕對方法**,它不仅說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

关于这种**絕對方法**,黑格尔这样說过:

“方法是任何对象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絕對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圖在每一个事物中發現和認識自己的意向。”(“邏輯学”第三卷60)

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末，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

那末，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它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理性怎样进行自我肯定，或者它怎样把自己形成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范畴呢？这已经是理性自己及其辩护人的事情了。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这个正题、这个思想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这种增殖过程就构成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另一个与自己矛盾的群为自己的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

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

中產生系列，從系列的辯證運動中又產生整個體系。

把這個方法運用到政治經濟學的範疇上面，就會得出政治經濟學的邏輯學和形而上學，換句話說，就會把人所共知的經濟範疇翻譯成人們不大知道的語言，這種語言使人覺得這些範疇似乎是剛從充滿純粹理性的頭腦中產生的，好像這些範疇單憑辯證運動才互相產生、互相聯繫、互相交織。請讀者不要害怕這個形而上學以及它那一大堆範疇、群、系列和體系。儘管蒲魯東先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體系**的頂峰，可是他從來沒有超越過頭兩級即簡單的正題和反題，而且這兩級他僅僅爬上過兩次，其中有一次還跌了下來。

在這以前我們談的只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下面我們要看到蒲魯東先生怎樣把它降低到極可憐的程度。黑格爾認為，世界上過去發生的一切和現在還在發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維中發生的一切。因此，歷史的哲學僅僅是哲學的歷史，即他自己的哲學的歷史。沒有“適應時間次序的歷史”，只有“觀念在理性中的順序”。他以為他是在通過思想的運動建設世界；其實，他只是根據自己的絕對方法把所有人們頭腦中的思想加以系統的改組和排列而已。

第二個說明

經濟範疇只不過是生產方面社會關係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學家蒲魯東先生對事物的理解是顛倒的，他認為現實關係只是睡在“人類的無人身的理性”懷抱里（正如這位哲學家蒲魯東先生告訴我們的）的一些原理和範疇的化身。

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一定的生產關係範圍內製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一定的社會

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們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們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証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們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产的發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創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們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們是历史的暫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⁶¹才是停滯不动的。

第三个說明

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統一的整体。蒲魯东先生把种种經濟关系看做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認為这些阶段一个产生一个，一个来自一个，正如反題来自正題一样；認為这些阶段在自己的邏輯順序中实现着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

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蒲魯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其他一些社会关系來說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辯証运动产生出来。当蒲魯东先生后来借助純粹理性使其他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們当成初生的嬰兒，忘記它們和第一个阶段是同样年老了。

因此，要构成被他看做一切經濟發展基础的价值，就非有分工、竞争等等不可。然而当时这些关系在一定的系列中、在蒲魯东先生的理性中以及邏輯順序中根本还不存在。

誰用政治經濟學的范畴構築某種思想體系的大廈，誰就是把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就是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同等數量的互相連接的單個社會。其實，單憑運動、順序和時間的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關係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呢？

第四個說明

現在我們看一看蒲魯東先生把黑格爾的辯證法應用到政治經濟學上去的時候，把它變成了什麼樣子。

蒲魯東先生認為，任何經濟范畴都有好壞兩個方面。他看范畴就象小資產者看歷史偉人一樣：拿破侖是一個大人物；他行了許多善，但是也作了許多惡。

蒲魯東先生認為，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益處和害處加在一起就構成每個經濟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應當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壞的方面。

奴隸制是同其他任何經濟范畴一樣的一個經濟范畴。因此，它也有兩個方面。我們拋開奴隸制的壞的方面不談，且來看看它的好的方面。自然，這裡談的只是直接奴隸制，即蘇利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隸制。

同機器、信用等等一樣，直接奴隸制是資產階級工業的基礎。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現代工業就不可設想。奴隸制使殖民地具有價值，殖民地產生了世界貿易，世界貿易是大工業的必備條件。可見，奴隸制是一個極重要的經濟范畴。

沒有奴隸制，北美這個進步最快的國家就會變成宗法式的國家。如果從世界地圖上把北美划掉，結果看到的是一片無政府狀

态，現代貿易和現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圖上抹掉美洲[⊖]。

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經濟范畴，所以它总是列入各民族的社会制度中。現代各民族只是在本国内把奴隶制掩飾一下，而在新大陆却赤裸裸地公开推行奴隶制。

蒲魯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他提出的任务是：保存这个經濟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

黑格尔沒有需要提出任务。他只有辯証法。蒲魯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辯証法那里只学得了術語。而蒲魯东先生自己的辯証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

我們暫且把蒲魯东先生当做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他的长处和短处。

如果說，与黑格尔比較，他的长处是提出任务并且保留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任务的权利，那末，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用辯証法引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辯証运动的實質。誰要給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辯証运动終結。我們看到的已經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相对置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間激动、掙扎和冲撞的蒲魯东先生。

⊖ 这对 1847 年說來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美国的对外貿易主要限于輸入移民和工业产品，輸出棉花和烟草，即南部奴隶劳动的产物。北部各州主要是为奴隶占有制各州生产谷物和肉类。直至北部开始生产供輸出用的谷物和肉类，并且成为工业国，而美洲棉花的垄断又遇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国的激烈竞争的时候，奴隶制才有可能废除。而且当时，奴隶制的废除曾引起南部的破产，因为南部还没有以印度和中国隱蔽的苦力奴隶制代替公开的黑人奴隶制。——弗·恩·（恩格斯在 1885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这样，蒲魯东先生就陷入了用正当方法难以摆脱的困境，于是他用尽全力一跳，便跳到一个新范畴的领域中。这时在他那惊异的目光面前便出现了理性中的一些系列。

他抓住第一个到手的范畴，随心所欲地给它一种特性：把应该清除的范畴的缺陷消除。例如，如果相信蒲魯东先生的话，捐稅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貿易差額可以消除捐稅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

这样，蒲魯东先生把所有經濟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經濟矛盾的体系”。

第五个說明

“在绝对理性中，所有这些观念……是同样简单和普遍的……实际上我們只有靠我們的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但是，真理本身并不以这些辯証的圖形为轉移，而且不受我們智慧的种种組合的束縛。”（蒲魯东，第二卷第 97 頁）

这样，一个急轉弯（現在我們才知道其中奧妙）就使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变成了幻想！蒲魯东先生的話从来没有說得这样公正。当然，如果把辯証运动的全部过程归結为简单地对比善和恶，归結为提出任务来消除恶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末范畴就失去自己的独立运动；观念就“不再發生作用”；它就没有内在的生命。它既不能把自己安置为范畴，也不能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范畴的順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辯証法已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辯証法沒有了，代替它的至多不过是最純粹的道德而已。

当蒲魯东先生談到**理性中**的一定系列即**范畴的邏輯順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說，他不是想論述**适应時間次序的历史**，即蒲魯东先生所認為的**范畴在其中出現的历史順序**。他認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純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辯証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現在当实际应用这种辯証法的时候，理性却背叛了他。蒲魯东先生的辯証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辯証法，于是蒲魯东先生只得承認，他用以說明**經濟范畴的次序**和这些**經濟范畴在其中相互产生的次序**是不相适应的。**經濟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

那末，蒲魯东先生給了我們什么呢？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魯东先生所認為的**范畴适应着時間次序在其中出現的那种順序**嗎？不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嗎？更不是。这就是說，他既沒有給我們**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沒有給我們**范畴的神聖历史**！那末，到底他給了我們什么**历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讓我們来看看这些**矛盾怎样行进**以及它們怎样拖着蒲魯东先生吧。

在未研究这一点（这是第六个重要說明的引子）之前，我們应当再作一个比較次要的說明。

我們暫且和蒲魯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适应時間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現的那种**历史順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紀，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紀。推其因果，我們应当說，不是原理屬於世紀，而是世紀屬於原理。換句話說，不是**历史創造原理**，而是**原理創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顧全原理和历史我們再进一步自問一下，为什么該原理出現在11世紀或者18世紀，而不出現在其他某一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一下：11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18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在每个世紀中，人們

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討这一切問題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紀中人們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嗎？但是，只要你們把人們当成他們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們就是迂迴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發点，因为你們抛弃了最初作为出發点的永恒的原理。

至于蒲魯东先生，他一直还在思想家所走的这条迂迴曲折的道路上緩慢行进，离开历史的康庄大道还有一大段路程。

第六个說明

我們且沿着这条迂迴曲折的道路跟蒲魯东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当做**不变規律、永恒原理、理想范畴**的經濟关系先于人們的生动活跃的生活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規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里。我們已經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沒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純理性的辯証运动中的历史。蒲魯东先生談到辯証运动中的各种观念不能自相“区分”时，把**运动的一切影子和影子**（它們可以造成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的一切**运动一概抹煞**。他沒有这样做，反而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历史，埋怨一切，甚至連法国話也埋怨起来。

哲学家蒲魯东先生告訴我們：“我們說什么东西出現或者什么东西产生，这种說法是不确切的，無論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 整个社会經濟也是如此。”（蒲魯东，第二卷第102頁）

在蒲魯东先生的体系中起作用并且使蒲魯东先生本人也起作

用的矛盾的實力竟大到這樣程度，以至他本想說明歷史，但卻不得不否定歷史；本想說明社會關係的順次出現，但卻根本否定**某種東西可以出現**；本想說明生產及其一切階段，但卻否定**某種東西可以生產出來**。

這樣，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再沒有什麼歷史，也沒有什麼觀念的順序了；可是，他那本自稱為“**適應觀念順序的歷史**”的大作卻繼續存在。怎樣才能找到一個公式（因為蒲魯東先生就是公式的人物）幫助他**一跳就**越過這一切矛盾呢？

為了做到這一點，他發明了一種新理性，這既不是絕對的、純粹的和純真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活躍的人們的普通的理性；這是一種十分特殊的理性，是作為人的社會的理性，是稱為**人類的**這種主體的理性，這種理性在蒲魯東先生的筆下有時也被寫為“**社會天才**”、“**普遍理性**”以及“**人類理性**”。然而這種名目繁多的理性都是蒲魯東先生的個人理性，它有一切好的和壞的方面，有消毒劑也有任務。

“**人類理性不創造真理**”，真理蘊藏在絕對的永恆的理性的深處。它只能發現真理。但是直到現在它所發現的真理是不完備的，不充足的，而且是矛盾的。經濟範疇是人類理性、社會天才所發現和揭示出來的真理，所以也是不完備的並含有矛盾的萌芽。在蒲魯東先生以前，社會天才只看見**對抗因素**而未發現**綜合公式**，雖然兩者同時潛藏在**絕對理性**里面。既然經濟關係只是這些不充足的真理、這些不完備的範疇、這些矛盾的概念在人世間的實現，因此，它們本身就包含着矛盾，並且有好壞兩個方面。

社會天才的任務是發現完備的真理、完整無缺的概念、排除二律背反的綜合公式。這就再一次說明，為什麼蒲魯東先生想象中

的这个社会天才不得不从一个范畴跑到另一个范畴，尽管已經有了一整套范畴，但是直到現在还不能从上帝那里，从絕對理性那里得到一个綜合公式：

“首先，社会(社会天才)^①假定一个原始的事实，提出一个假設……一个真正的二律背反，它的对抗性結果在社会經濟中展开就象它們作为后果可以在精神上被推論出来一样，所以工业运动在各方面随着观念的演繹分为两道洪流：一道是有益行为的洪流，一道是有害結果的洪流…… 为了和諧地构成这个两重性的原理和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社会就产生第二个二律背反，随后很快地又产生第三个二律背反；社会天才将一直这样行进，直到它用尽自己的全部矛盾(尽管未曾得到証实，但是我料想，人类固有的矛盾是有止境的)，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論点并在唯一的公式中将自己的全部任务加以解决时为止。”(第一卷第 133 頁)

正如以前反題变成消毒剂一样，現在正題将变成假設。但是，蒲魯东先生这种术语上的变换現在再也不能使我們感到惊奇了。人类理性最不純潔，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見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人类理性在絕對理性中發現的以及作为第一个正題的否定的每一个新的正題，对它說来都是一个合題，并且被它相当天真地当做一个任务的解决。这个理性就这样在不断变换的矛盾中乱窜，直至它达到了矛盾的終点，發覺这一切正題和合題不过是相互矛盾的假設时为止。在極度混乱的状态下，“人类理性、社会天才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論点并在唯一的公式中将自己的全部任务加以解决”。这里附带說一下，这个唯一的公式是蒲魯东先生真正的發現。这就是构成价值。

假設只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設立的。通过蒲魯东先生之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口講話的社会天才首先給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消除每个經濟范畴的一切坏的东西，使它只保留好的东西。他認為，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为什么社会天才只要平等，而不要不平等或友爱、不要天主教或别的什么原理呢？因为“人类之所以实现这么多特殊的假設，正是由于考虑到一个最高的假設”，这个最高的假設就是平等。換句話說，因为平等是蒲魯东先生的理想。他以为分工、信用、工厂，一句話，一切經濟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發明的，但是結果它們往往对平等不利。由于历史和蒲魯东先生的臆測步步發生矛盾，所以他得出結論說，有矛盾存在。即使是有矛盾存在，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間。

从此以后，肯定平等的就是每个經濟关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設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設。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社会天才在經濟矛盾的圈子里旋轉时从来没有忽略过它。因此，天命是一个火車头，用它拖蒲魯东先生的全部經濟行囊前进远比用他那走了气的純粹理性要好得多。我們这位著者在論捐稅一章之后，用了整整一章来写天命。

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說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說明任何問題。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冗长地重述事实的若干方式之一。

大家知道，英国工业的發展提高了苏格兰地产的价值。英国工业为羊毛开辟了新的銷售市場。要生产大量的羊毛，必須把耕地变成牧場。要这样做就必须集中地产。要集中地产就必须消灭

世襲租佃者的小农庄，使成千上万的租佃者离开家园，讓放牧几百万只羊的少数牧羊人来居住。这样，由于耕地接連不断地变成牧场，結果苏格兰的地产使羊群赶走了人。如果現在你們說，羊群赶走人就是苏格兰土地私有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末，你們就会得到天命的历史。

当然，平等趋势是我們这个世紀所特有的。但是，說以往各世紀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产資料等等都是为实现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这首先就是把我們这个世紀的人和生产資料当做过去世紀的人和生产資料看待，否認世世代代不断改变前代所获得的成果的历史运动。經濟学家們很清楚，同是一件东西对甲說来是成品，对乙說来只是从事另一种生产的原料。

如果你們同蒲魯东先生一道假定：社会天才制造出，或者更确切些說随兴制造出封建主，是为了达到把耕者变为負有义务的和彼此平等的劳动者这一天命的目的，那末，你們就是把目的和人換了一下，这种做法和为了达到恶意的滿足（即羊群赶走人）而在苏格兰确立土地私有制的天命比較起来，毫不逊色。

可是，蒲魯东先生既然对天命表现出那样亲切的关怀，我們就介紹他看一看維尔紐夫-巴尔热蒙的“政治經濟学历史”⁶²，此人也是追求天命的目的。但他这个目的已經不是平等，而是天主教了。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說明

經濟学家們在論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階級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經濟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們臆造的，而他們自己的教

則是神的啓示。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关系(資產階級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財富和發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時間影响的自然規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規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現在再也沒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經濟學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資產階級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資產階級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級。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們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沒想到結果总是坏的方面占优势。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統治时代,經濟學家看到騎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間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組織的工业的發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圖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状况、特权、无政府状态),那末結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絕,資產階級的發展在萌芽时就会被切断。經濟學家就会給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銷的荒唐任务。

資產階級得势以后,也就談不到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了。資產階級把它在封建主义統治下發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經濟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現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須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須指出,財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間形成,

生產力怎樣和階級對抗同時發展，這些階級中一個代表着社會上壞的、否定的方面的階級怎樣不斷地成長，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質條件最後成熟。這難道不是說，生產方式、生產力在其中發展的那些關係並不是永恆的規律，而是同人們及其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水平相適應的東西，人們生產力的一切變化必然引起他們的生產關係的變化嗎？由於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實（已經獲得的生產力）被剝奪，所以必須粉碎生產力在其中產生的那些傳統形式。從此以後，從前的革命階級將成為保守階級。

資產階級開始自己的歷史發展時就有一個本身是封建時期無產階級[⊖]殘存物的無產階級存在。資產階級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發展它的對抗性質，起初這種性質或多或少是掩飾起來的，只是處於隱蔽狀態。隨着資產階級的發展，在它的內部發展着一個新的無產階級，即現代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展開了鬥爭，在雙方尚未感覺、注意、重視、理解、承認並公開宣告以前，這個鬥爭最初僅表現為局部的暫時的衝突，表現為一些破壞行為。另一方面，如果說現代資產階級的全體成員由於組成一個與另一個階級相對立的階級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於他們互相對立，他們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對抗的。這種利益上的對立是由他們的資產階級生活的經濟條件產生的。資產階級運動在其中進行的那些生產關係的性質絕不是一致的單純的，而是兩重的；在產生財富的那些關係中也產生貧困；在發展生產力的那些關係中也發展一種產生壓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斷消滅資產階級個別成員的財富和形成不斷壯大的無產階級的條件下，這些關係才能產生

⊖ 在馬克思送給娜·吳亭娜的那一本上此處是“勞動階級”。——編者注

資產者的財富，即資產階級的財富；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顯了。

這種對抗性質表現得越明顯，經濟學家們，這些資產階級生產的學術代表就越和他們自己的理論發生分歧，於是形成了各種學派。

宿命論的經濟學家，在理論上對他們所謂的資產階級生產的否定方面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正如資產者在實踐中對他們賴以取得財富的無產者的疾苦漠不關心一樣。這個宿命論學派有古典派和浪漫派兩種。古典派如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他們代表着一個還在同封建社會的殘余進行鬥爭、力圖清洗經濟關係上的封建殘污、擴大生產力、使工商業具有新的規模的資產階級。從他們的觀點看來，參加這一鬥爭並專心致力於這一狂熱活動的無產階級只是經受着暫時的偶然的苦難，並且它自己也把這些苦難當做暫時的。亞當·斯密和李嘉圖這樣的經濟學家是當代的历史學家，他們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資產階級生產關係下如何獲得財富，只是將這些關係表述為範疇和規律並證明這些規律和範疇比封建社會的規律和範疇更便於進行財富的生產。在他們看來，貧困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東西來和工業上新東西出現時的情況一樣。

浪漫派屬於我們這個時代，這時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處於直接對立狀態，貧困象財富那樣大量產生。這時，經濟學家便以飽食的宿命論者的姿態出現，他們自命高尚、蔑視那些用勞動創造財富的活人機器。他們的一言一語都仿照他們的前輩，可是，前輩們的漠不關心只是出於天真，而他們的漠不關心却已成為賣弄風情了。

其次是人道學派，這個學派對現時生產關係的壞的方面倒是放在心上的。為了不受良心的責備，這個學派想盡量緩和現有的

对比；他們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資產者之間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誠的痛心；他們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們建議資產階級节制一下生产热情。这个学派的全部理論建立在理論和实践、原理和結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質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間无限的区别上面。

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們否認对抗的必然性；他們願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資產者；他們願意實現理論，因为这种理論与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会包含对抗。毫無疑問，在理論上把现实中每一步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那样一来，这种理論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因此，博爱論者願意保存那些表現資產階級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的實質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論者以为，他們是在严肃地反对資產者的实践，其实，他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資產者。

正如經濟學家是資產階級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階級的理論家。在无产階級尚未發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階級，因而无产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資產階級本身的怀抱里尚未發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階級和建立新社会必備的物質条件以前，这些理論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們为了滿足被压迫階級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階級斗争的日益明显，他們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們只需要注意眼前發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識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當他們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創立体系的时候，當他們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們認為貧困不过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

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現在再来談談蒲魯东先生。

每一种經濟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魯东先生沒有背叛自己。他認為好的方面由經濟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發。他从經濟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經濟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們在貧困中只看到貧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贊成，企圖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魯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純經濟的細节；說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沒有远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为一种合題，結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錯誤。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駕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結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經常在資本和劳动、政治經濟学和共产主义之間搖来摆去。

第二节 分工和机器

照蒲魯东先生的說法，一系列的經濟进化是由分工揭开的。

分工的好的方面 { “就实質而論，分工是实现条件上和智能上的平等的方法。”（第一卷第 93 頁）

分工的坏的方面 { “对我们說来，分工变成了貧困的源泉。”
 (第一卷第 94 頁)

另一种說法
 “劳动按照它所特有的、构成其有效性的首要条件的規律进行划分，結果就会否定自己的目的，毁灭自己。”(第一卷第 94 頁)

应当解决的任务 { 找寻“一种新的結合，以便消除分工的有害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第一卷第 97 頁)

在蒲魯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規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說明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种姓、行会、工場手工业、大工业必須用一个分字来解释。如果你們首先将“分”字的含义好好加以研究，将来你們就不必再研究每个时代中赋予分工以某种特定性質的无数影响了。

当然，把事物归结为蒲魯东先生的范畴，那未免把它們看得太简单了。历史的进程并不象范畴那样死板绝对。德国为了建立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紀。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來說，情况也各不相同；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那里則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这里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貴族，那里則是現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紗大王 (cotton-lords)。14、15 世紀中殖民地尚未出現，对欧洲說来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貿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性質，与 17 世紀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市場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

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質，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論出来的。

蒲魯东先生說：“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經濟学家都指出过分工的規律的**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但是他們常常更多地強調前者，因为这样做更适合他們的乐观主义；同时没有一个經濟学家反問过自己：一个規律的有害方面是什么……一个始終一貫的原理怎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結果呢？無論在亚当·斯密以前或在他以后，甚至没有一个經濟学家看出，这里有一个需要闡明的问题。薩伊承認，在分工中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亚当·斯密比蒲魯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間天賦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沒有我們所設想的那麼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賦，与其說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⁶³ 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間的原始差別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間的差別小得多，他們之間的鴻沟是分工掘成的。虽然这样，但蒲魯东先生仍在另一处說：亚当·斯密甚至一点也沒有想到分工还有有害的一面，而且还說，似乎讓·巴·薩伊**第一个**承認“在分工中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但是，讓我們听听勒蒙特吧；*sum cuique* [讓人人各得其所]。

“讓·巴·薩伊先生在他的一篇卓越的政治經濟学論著中採納了我在論分工的道德影响这一拙作中**提出的**原理，这使我感到荣幸。他沒有提到我的名字，毫無疑問是由于我那本書⁶⁴的标题欠妥。我只能以此来解释作家的沉默。这位作家由于自己的根底深厚，因此可以否認这种小小的剽窃。”（“勒蒙特全集”1840年巴黎版第一卷第245頁）

讓我們給勒蒙特一个公正的評价吧：他机智地描繪了今天所实行的这种分工的有害的結果，蒲魯东先生对这一点未能作任何

補充。既然由於蒲魯東先生的過錯我們已卷入誰在先的爭論，那末不妨再順便說一下，在勒蒙特之前很久，而且在亞當·斯密以前 17 年，斯密的老師亞·弗格森在專門論分工的一章中就已清楚地闡述了這一點。

“甚至可以懷疑一個民族的一般能力的增長是否同技術進步成正比例。在若干門機械技藝中……沒有任何智慧和情感的參與完全可以達到目的，並且正如無知是迷信之母一樣，它也是工業之母。思索和想象會產生錯誤，但是手或腳的習慣動作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所以可以說，在工場手工業方面，其最完善之處在於不用腦力參與，因此，不費任何思索就可以把作坊看做一部由人構成的機器……一位將軍可能是十分精通軍事的人，而士兵的全部義務卻只是完成一些手腳的動作。前者之所得可能就是後者之所失……在這所有的功能彼此分離的時期，思維的技藝本身可以自成一個獨立的行業。”（亞·弗格森“市民社會史試論” 1783 年巴黎版⁶⁵）

在結束這一場文獻的涉獵的同時，讓我們指出一點：我們明確地否認所謂“所有的經濟學家常常更多地強調分工的有益方面”。只須舉出西斯蒙第就可以了。

因此，一說到分工的有益方面，蒲魯東先生就只有把眾所周知的一般詞句多少加以夸大，重說一番。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在蒲魯東先生那里，從分工這種被看做普遍規律、範疇和觀念中怎樣引伸出同它有關的有害方面。這個範疇、這個規律怎麼會包含一種損害蒲魯東先生的平均主義體系的不平等的分工呢？

“在這分工的莊嚴時刻，狂風開始襲擊人類。進步並不對一切人都是平等劃一的……它首先只及於少數的特權者……這是進步對一部分人的偏私，它使人長期相信在地位上有自然的和天意的不平等，並且它產生了種姓，建立了一切社會的等級制度。”（蒲魯東，第一卷第 94 頁）

分工产生了种姓。种姓就是分工的有害方面；因此，有害方面是由分工产生的。Quod erat demonstrandum〔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如果我们想进一步问问，什么使得分工产生种姓、等级制度和特权呢？蒲鲁东先生会回答我们说：是进步。但是又是什么引起进步呢？界限。界限，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所谓的进步对一部分人的偏私。

哲学之后接着就是历史。这已不是叙述的历史，也不是辩证的历史，而是比较的历史。蒲鲁东先生将现代的和中世纪的印刷工人，将克列索工厂的工人和乡村的铁匠，将现代的作家和中世纪的作家加以对比；他使天平的一端倾向于那些多少代表在中世纪形成或由中世纪承接下来的分工的人们。他把一个历史时代的分工和另一历史时代的分工对立起来。这就是蒲鲁东先生应当证明的吗？不是。他应当向我們表明一般分工，即作为范畴的分工的有害方面。不过，既然在后面不远我們就会看到蒲鲁东先生自己正式收回了这一切假造的论据，我们又何必老是停留在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上面呢？

蒲鲁东先生继续写道：“自**灵魂被损害**以来，劳动被分散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延长工作日，使工作日同脑力消耗的总量成反比例增长……但是，工作日的长度不可能超过16—18小时，所以，自从脑力消耗的减少不能靠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时起，补偿就要靠劳动价格，于是工资就要降低……有一点是不容怀疑而且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的，这就是**普遍的良心**并不会把工头的劳动和小工的工作等同看待。因此，工作日的价格必然降低。这样一来，一个劳动者除了由于执行屈辱自身的职能而使灵魂受尽摧残以外，还免不了要忍受由于报酬微薄所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

我們不打算谈这种三段论法的逻辑价值，康德会把它叫做害人的谬论。

它的實質就是：

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自身的职能；被損害的灵魂与这种屈辱自身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資的不断急降又与灵魂的被損害相适应。要証实降低了的工資完全与被損害的灵魂相适应，蒲魯东先生为了不受良心責备，便肯定地說，普遍良心的意志就是这样。請問，这种普遍良心包括不包括蒲魯东先生的灵魂呢？

在蒲魯东先生看来，**机器**是“分工的邏輯反題”，他为了証明自己的辯証法，便从机器变成**工厂**开始。

为了从分工中推論出貧困，蒲魯东先生假設了現代工厂；接着他又假設由分工产生的貧困，以便得出工厂并且可以把工厂看做这种貧困的辯証的否定。蒲魯东先生在精神上用**屈辱身份的职能**、在肉体上用工資微薄的方法懲罰了劳动者，使工人附屬於**工头**，并把他的劳动降低到**小工劳动**的水平；随后他又把罪过推卸到工厂和机器的身上，說它們通过“使劳动者从屬於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而且，为了徹底貶低劳动者，又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真是絕妙的辯証法！如果他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可是不然。他还需要分工的新的历史，不过这一次已不是为了从中引导出矛盾，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工厂。为此目的，他必須忘記他刚才关于分工所講的一切。

劳动的組成和划分視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工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簡直是对历史的侮辱。

机器正象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經濟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現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

系，才是經濟範疇。

現在且來看看蒲魯東先生卓越的想象中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

“社會上日新月異的機器的不斷出現，就是分工的反題，即反公式，這是工業天才對被分散的和殺人的勞動的抗議。其實什麼是機器呢？這就是把分工後彼此分開的勞動的不同部分聯結起來的一種特殊方式。每一台機器都可以看做若干操作的結合……因此，通過機器會使勞動者復原……在政治經濟學中同分工相對立的機器，在人腦中則是同分析相對立的合題……分工只不過使勞動的不同部分彼此分開，讓每一個人都從事他最合心意的專業；工廠按照每個部分對整體的關係來組合勞動者……它把權力原理帶入勞動領域……但是，還不止於此，機器或工廠通過使勞動者從屬於他的主人的辦法屈辱他的身份，並徹底貶低他，使他從手藝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即機器時期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僱傭勞動。僱傭勞動是在分工和交換之後出現的。”

我們提醒蒲魯東先生一點。把勞動分為不同的部分，讓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從事他最合心意的專業，——蒲魯東先生以為這種現象早在世界存在的初期就已開始，其實，它僅僅是在競爭居于統治地位的現代工業中才存在。

其次，蒲魯東先生為了表明分工怎樣產生工廠，工廠又怎樣產生僱傭勞動，他給我們拿出了一份非常“有趣的家譜”。

(1)他假設一個人，這個人“注意到，把生產分為不同的部分並讓單個的工人來從事其中的每一部分”，這樣就可以擴大生產力。

(2)這個人“抓住這個思想綫索向自己說，只要把那些為了實現他給自己提出的特殊目的而選拔出來的勞動者組成一個經常性的集團，他就會得到比較持久的生產等等”。

(3) 这个人向別人提出建議，要求他們領會他的思想，抓住这个思想綫索。

(4) 在工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和自己的同伴們，即后来变成他的工人的那些人的关系是彼此平等的。

(5) “当然，可想而知，由于主人的有利地位和雇佣工人的从屬性，这种原始的平等势必迅速消失。”

这就是蒲魯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又一标本。

現在讓我們用历史的和經濟的观点来考察一下，权力原理由工厂和机器带入社会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后；当工人还从屬於他人权势之下的时候，他的权利是否已恢复；最后，机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劳动的复合，是不是这种劳动的合題——它同劳动的分析相对立。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結構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們以現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以便随后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末我們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財富而組織得最完善的社会，毫無疑問只应当有一个主要的企业主按照預先制定的条規將工作分配給社会集体的各个成員。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現代工厂中的分工無論巨細全由企业主的权力进行調度的时候，現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沒有别的規則、别的权力可言。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規則进行的。这些規則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嗎？不是。它們最初来自物質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不同的社会組織形式的基础。至于作坊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态中是很

不發達的。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訂为普遍的規則：社会內部的分工愈不受权力的支配，作坊內部的分工就愈發展，愈会从屬於一人的权力。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比的。

現在我們要来看看，作业被截然划分，每个工人的劳动只是極其简单的操作，各种工作都由权力即資本来安排部署的工厂是一种什么东西。这种工厂是怎么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問題，我們应当考察一下，工場手工业究竟是怎样發展起来的。我指的是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現代工业，但已不是中世紀的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那种工业。我們不想講得太詳細，只想指出几个要点來說明，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

形成工場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發現和美洲貴金屬的輸入而促成的資本积累。

交換手段扩大的結果一方面是工資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业利潤增多，这一点已毫无疑义。換句話說，土地所有者階級和劳动者階級，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資本家階級，資產階級則相应地上升了。

同时，繞道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航道开辟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体系，以及海上貿易的發展等也促进了工場手工业的發展。

在工場手工业的历史上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視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封建主遣散了无数的侍从，这些被遣散的下屬在未进入作坊之前都变成了流浪汉。在手工作坊建立以前，15、16世紀中流浪現象是極为普遍的。此外，作坊还找到了大量的农民这个强有力

的支柱，數百年來，由於耕地變成了牧場以及農業進步減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農民不斷被趕出鄉村而流入城市。

市場的擴大、資本的積累、各階級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剝奪了收入來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現，這就是工場手工業形成的历史条件。把人們聚集到作坊里去的並不是蒲魯東先生所說的那種平等者之間的友好協定。工場手工業並不發生在古老的行會內部。主持現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從前的師傅。工場手工業和手工業之間幾乎到處都進行着殘酷的鬥爭。

生產工具和勞動者的積累與積聚，發生在作坊內部分工發展以前。工場手工業的特点不是將勞動分解為各個部門并使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去從事很簡單的操作，而是將許多勞動者和許多種手藝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個資本的支配。

手工作坊的益處並不在於真正的分工，而是在於可以進行較大規模的生產，可以減少許多雜費開支等等。16世紀末17世紀初荷蘭的工場手工業幾乎還不知道分工。

勞動者集合在一個作坊是分工發展的前提。無論在16世紀或是17世紀，我們都找不出一個例子足以說明，同一手藝的彼此分開的各個部門已發展到完全可以集合在一個場所，形成一個完全現成的手工作坊的地步。但是只要生產者和生產工具被集合到一個場所，行會制度下曾經有過的那種分工就必然會再度出現並在作坊內部反映出來。

如果說蒲魯東先生能看見事物的話，他是把它們顛倒過來看的。在他看來，亞當·斯密認為分工在手工作坊之前，可是實際上這種作坊却是分工存在的条件。

真正的機器只是在18世紀末才出現。把機器看做分工的反

題，看做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統一的合題，真是荒謬之極。

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結合，但決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組合。

“当每一种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工簡化为对一种簡單工具的使用时，由一个發动机开动的所有这种工具的結合就构成机器。”（拜比吉“論机器……的經濟性質”1833年巴黎版66）

簡單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复合的工具；由一个發动机即人手开动复合工具，由自然力开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發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發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發展的进程。

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領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差別不能分离一样。英国在土地这种农业劳动工具积聚的时候，也有农业分工，并且还使用机器耕地。而在法国，农业劳动工具既很分散，又存在着小块土地制度，一般說来，这里既沒有农业分工，也沒有机器在农业上的应用。

在蒲魯东先生看来，劳动工具的积聚就是分工的否定。而实际上我們看到的又是相反的情况。工具积聚發展了，分工也随之發展，并且 *vice versa* [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發明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發明。

在英国，机器發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这一点无須再来提醒。例如，过去的織布工人和紡紗工人多半是至今我們还可以在落后国家里看到的那些农民。机器的發明完成了工場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結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織布工人和紡紗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現在紡紗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織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發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

本地原料來加工。例如：英國加工的是羊毛，德國加工的是麻，法國加工的是絲和麻，東印度和列萬特^①加工的則是棉花等等。由於機器和蒸氣的应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基地，完全依賴於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總之，機器對分工起着極大的影響，只要一種物品的生產中有可能用機械製造它的某一部分，生產就立即分成兩個彼此獨立的部門。

蒲魯東先生在機器的發明和原始应用中發現的慈善的和天命的目的還用得着說嗎？

當貿易在英國已發展到手工勞動不再能滿足市場需求的時候，人們就感到需要機器。於是人們便想到应用 18 世紀時即已充分發展的機械學。

工廠一出現就表現出一些迥非慈善的行為。兒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們成了買賣的對象，有人為弄到兒童同孤兒院訂立了合同。所有關於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廢除，因為，用蒲魯東先生的話來說，再也用不着綜合的工人了。最後，自 1825 年起，一切新發明幾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計地力求貶低工人特長的企業主進行沖突的結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點重要性的新罷工之後，總要出現一種新機器。而工人則很少在機器的应用中看到他們的權利的恢復，或如蒲魯東先生所說，他們的復原。因此，在 18 世紀中，工人曾經長期地反抗過正在確立的自動裝置的統治。

尤爾博士說道：“在阿克萊以前很久，淮亞特發明了紡紗機械（一系列溝槽羅拉）…… 主要的困難並不在於自動裝置的發明…… 困難主要在於培養必要的紀律，使人們拋棄毫無次序的工作習慣，幫助他們和自動的大機器的

① 地中海東岸諸國的舊稱。——譯者注

始終如一的規律性運轉融為一體。但是要發明一個適合機器體系的需要和速度的工廠紀律法典並付諸實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這是阿克萊的高貴成就。”

總之，機器的採用加劇了社會內部的分工，簡化了作坊內部工人的職能，擴大了資本積累，使人進一步被分割。

當蒲魯東先生願意當一個經濟學家而暫時放棄“理性中的一些系列的發展”時，他就從亞當·斯密在工廠剛剛產生的時期所寫的著作中汲取大量的學識。其實，亞當·斯密那時的分工和現代工廠里我們所見的分工之間有很大的差別。為了更好地了解這個差別，只須從尤爾博士的“工廠哲學”中引証幾段就夠了。

“當亞當·斯密寫他那本關於政治經濟學原理的不朽著作的時候，機器工業體系還幾乎不為人所熟悉。他認為分工就是使工場手工業漸臻完善的偉大原理，那是很自然的。他以別針的生產為例，說明工人由於完成同一操作而日益熟練，因此工作得更快而且工價也更便宜。他看到，根據這個原理，在工場手工業的每一部門中，如將銅絲切成等長部分等一些操作就大為減輕，而其餘如針頭的成形和裝置卻仍較困難；由此他得出結論說，這樣很自然就會讓一個工人去適應其中一項操作，這個工人的工資將和他的技藝相適應。這種適應也就構成分工的本質。不過，在亞當·斯密博士時代可以當做好例子的東西，今天就只能使大家對工廠工業的實際原理產生誤解。事實上，工作的劃分，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使工作適應各人不同的才能這一點，工廠的工作中幾乎不加考慮；與此相反，在每一個要求高度靈敏性和精確性的操作過程中，熟練的但是往往容易做出各種不規則動作的工人的手，就被某種專門的機械取而代之，因為機械的自動工作極有規則，只須由小孩看管就行了。

“因此，工廠制度的原理就在於機器勞動排擠手工勞動，以及操作分解為各個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業者間的分工。在手工勞動制度下，人的勞動通常是任何一件產品最寶貴的因素；而在機器勞動制度下，手工業者的技藝就日益為看管機器的簡單動作所代替。

“人類天賦的弱點就是如此：工人愈是熟練，他就愈是有主見，愈是難于

駕馭，因而對機械體系說來也就愈不適用，因為他的任意妄動會給機械體系的整個動作帶來莫大的損失。因此，現代工廠主的最大目標，就是通過科學和資本的結合，將工人的作用降低到僅僅使用他們的注意力和靈敏性，而這兩種能力，如果人們在青年時期就把它們集中在同一個對象上面，是很容易達到完善地步的。

“在實行順次勞動的制度下，要使眼和手的技藝達到可以完成一些特別困難的機械操作，必須經過多年的訓練；而在各種操作分解為由自動機器來完成的各個組成部分的制度下，這些基本組成部分的操作可以委託給一個平平常常經過短期訓練的工人；必要時企業主甚至還可以任意調配他，把他從這一台機器調到另一台機器。這種變換顯然是違背老規矩的，按照老規矩的分工，一個人固定做針頭，另一個人固定磨針尖，這種千篇一律、枯燥無味的工作，使得工人逐漸愚鈍……但在平均化原則即工廠制度下，工人的能力只是進行協調的操練”等等。“……由於他的業務只限於看管正常動作的機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時期內學會這種業務；而當他從這一台機器調去看管另一台機器時，他的工作內容豐富了，並且由於他要考慮自己和同伴們的勞動成果的共同配合，因而眼界也擴大了。因此，工作平均分配制度在通常的情況下不可能使工人的能力受抑制、眼界不開闊以及身體的發育受阻礙；把這些情況歸咎於分工，倒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實際上，機器技術方面一切改進的不變目的和趨勢，都是為了完全取消人類的勞動或以女工和童工的勞動代替男工的勞動，以未經訓練的工人的勞動代替熟練手工藝工人的勞動等辦法來貶低工人勞動的價格。這種只用眼靈手快的兒童而不用經驗豐富的熟練工人的趨向，證明按照工人技藝的各種不同水平而分工的死板教條，終於為我們開通的廠主們拋棄了。”（安得魯·尤爾“工廠哲學，或工業經濟學”第一卷第一章67）

現代社會內部分工的特點，在於它產生了特長和專業，同時也產生職業的痴呆。

勒蒙特說：“我們十分驚異，在古代，一個人既是傑出的哲學家，同時又是詩人、演說家、歷史學家、牧師、執政者和戰略家。這樣多方面的活動使我們吃驚。現在每一個人都在為自己築起一道藩籬，把自己束縛在裡面。我不知

道这样分割之后集体的活动面是否会扩大,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人是縮小了。”

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質。但是,当一切专门發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發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蒲魯东先生連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得,竟倒退一步,建議工人不要只做別針的十二部分中的一部,而要順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据說,这样工人就可得到做別針的从头到尾的全部知識。这就是蒲魯东先生的綜合劳动。进一步退一步也构成一种綜合运动,这一点誰也不会表示异議。

总括起来說,蒲魯东先生沒有超出小資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讓我們回到中世紀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紀的手工业者师傅的地位以外,沒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經談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足够了。無論就形式或实質来說,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紀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嗎?

第三节 竞争和垄断

- | | | |
|---------|---|---|
| 竞争的好的方面 | { | “对劳动来說,竞争和分工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要使平等到来,必需有竞争。” |
| 竞争的坏的方面 | { | “它的原理是自我否定。它的必然后果是把受它吸引的人消灭。” |
| 一般的想法 | { | “竞争的有害的结果同它带来的益处…… 必然都是由它的原理产生的。” |

应当解決的任務

“找出一個調和的原理，這一原理必須來自超乎自由本身的規律。”

另一種說法：

“因此，問題根本不在於消除競爭，消除競爭和消除自由同樣是不可能的；全部問題在於為它找到一種均衡，我看就是警察。”

蒲魯東先生一開始就維護競爭的永恒必然性，反對那些想以競賽代替競爭的人們[⊖]。

“無目的的競賽”是不存在的。“每一熱中的對象都必然和熱情本身相適應：婦女是求愛者熱中的對象，政權是野心家熱中的對象，黃金是守財奴熱中的對象，月桂冠是詩人熱中的對象；同樣，利潤也必然是工業競賽的對象。競賽也就是競爭本身。”

競爭就是追逐利潤的競賽。工業競賽一定要是追逐利潤的競賽即競爭嗎？蒲魯東先生用肯定來證明這一點。我們已經看到，蒲魯東先生認為，肯定就是證明，正如假定就是否定一樣。

如果說求愛者熱中的直接對象是婦女，那末，工業競賽的直接對象就會是生產品，而不是利潤。

競爭不是工業競賽而是商業競賽。在我們這個時代，工業競賽只是為了商業而存在。在現代各民族的經濟生活中，甚至還有一些時候，大家都患了一種不事生產專謀利潤的狂熱病。這種周期性的投機狂熱，暴露出競爭竭力逃避工業競賽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質。

如果你們對 14 世紀的手工業者說：工業上的全部封建組織和特權即將廢除，這一切將由工業競賽即所謂競爭來代替，那末他一定會回答你們說：各種同業公會、行會和商會的特權就是有組織的

⊖ 傅立葉主義者。——弗·恩·（恩格斯在 1885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競爭。蒲魯東先生說的“競賽也就是競爭本身”也正是這個意思。

“假如頒布一道法令，說從1847年1月1日起人人的勞動和工資都有保障，那末工業上的極端緊張狀態立即就會轉變為嚴重的停滯。”

現在我們看到的不是假定，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蒲魯東先生為了證明競爭的必然性、它的永恒性是一些范畴等等而專門頒布的一道法令。

如果我們以為只須頒布幾道法令就可以擺脫競爭，那末我們就永遠擺脫不了競爭。如果我們更進一步建議廢除競爭而保留工資，那就等於建議用王室法令來做一些毫無意義的事。但是各民族並不是按照王室法令來發展的。各民族在求助於這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須徹底改變他們在工業上和政治上的一切生存條件，也就是要徹底改變他們的整個生活方式。

蒲魯東先生會心平氣和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們說：這是一個關於“史無前例地改變我們的本性”的假設，並且他有权“把我們排斥於辯論之外”，我們不知道他根據的又是哪一道法令。

蒲魯東先生不知道，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

“讓我們根據事實來談吧。法國革命既為了爭取工業自由，也為了爭取政治自由；我們要直截了當地說，雖然法國在1789年未曾認識到它要求實現的原理的全部後果，可是它的願望和期待都沒有落空。誰想否認這一點，我認為他就喪失了任何批評的權利：我決不同一個承認2500萬人的自發性錯誤的論敵進行辯論……假如競爭不是社會經濟的原理、命運的法規、人類靈魂的要求，那末，為什麼人們寧願將同業公會、行會和商會廢除，卻不肯考慮將它們加以修正呢？”

這樣說來，既然18世紀的法國人廢除了同業公會、行會和商會而不是將它們改頭換面，那末19世紀的法國人就應該把競爭改

頭換面而不是將它廢除。既然競爭在 18 世紀的法國是作為某些歷史需要的結果而形成的，那末它在 19 世紀的法國就不該由於另一些歷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魯東先生不懂得，競爭的形成同 18 世紀人們的現實發展有聯繫，他把競爭變成 *in partibus infidelium* [在真正現實以外的]⊖ 人類靈魂的某種必然要求。他會把那位對 17 世紀說來是偉大的柯爾培爾變成什麼呢？

革命以後就出現了目前這種局面。蒲魯東先生就從這裡獵取一些事實，來說明競爭的永恒性。他證明，象農業等這樣一些生產部門，由於競爭這一範疇尚未充分發展，目前仍處於落後和衰敗狀態。

說什麼某些生產部門尚未發展到競爭的高度，而另外一些又還沒有達到資產階級的生产水平，這簡直是痴人說夢，絲毫不能證明競爭的永恒性。

蒲魯東先生的全部邏輯總括起來就是：競爭是一種社會關係，現在我們正在這種關係下面發展我們的生产力。對於這個真理，他並沒有在邏輯上加以發展，而往往只是進行過多的表述：競爭是工業競賽，是自由的最時髦的方式，是勞動中的義務，是價值的構成，是平等到來的條件，是社會經濟的原理，是命運的法規，是人類靈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恒公平的啓示，是劃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的劃分，是一個經濟範疇。

“競爭和聯合是相互依存的。它們不僅不互相排斥，甚至彼此間也沒有分歧。競爭必然以共同目標為前提。可見，競爭並不是利己主義，而社會主義的最可悲的錯誤，正是在於它把競爭看成社會的傾復。”

⊖ 原意是：“不信教國家中的”。這是對非基督教國家中徒有其名的天主教主教這一頭銜的稱呼。——編者注

競爭以共同目標為前提，而這就是證明：一方面，競爭是聯合，另一方面，競爭不是利己主義。難道利己主義就不是以共同目標為前提的嗎？任何利己主義都是在社會中靠社會來進行活動的。可見，它是以社會為前提，即以共同目標、共同的需要、共同生產資料等等為前提的。因此，在社會主義者所說的競爭和聯合之間甚至沒有一點分歧，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社會主義者很清楚，現代社會是建立在競爭之上的。既然他們自己就打算推翻現代社會，他們怎能責備競爭要推翻現代社會呢？既然他們認為未來的社會將要推翻競爭本身，他們又怎能反而指責競爭要推翻未來的社會呢？

往後，蒲魯東先生又說，競爭是壟斷的對立物，因此，競爭不可能同聯合對立。

封建主義一開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對立；可見它並不同當時還不存在的競爭對立。難道由此就可以得出結論，說競爭同封建主義並不對立嗎？

其實，社會、聯合這樣的字眼是可以用於一切社會的名稱，既可以用於封建社會，也可以用於資產階級社會——建築在競爭上的聯合。認為用聯合這個詞就可以駁倒競爭的社會主義者怎麼能站得住腳呢？蒲魯東先生本人又怎能設想，僅僅把競爭理解為聯合就可以維護競爭而反對社會主義呢？

剛才我們所講的一切就是蒲魯東先生所理解的競爭的好的一面。現在我們來談談競爭的壞的即否定的一面，談談它的有害的結果，它的破壞性的、毀滅性的、有害的屬性。

蒲魯東先生為我們描繪的那種情景是非常陰暗的。

競爭產生貧困，它釀成內戰，“改變地帶的自然條件”，混淆民

族，制造家庭糾紛，敗坏公德，“歪曲公平、正义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不仅如此，它还破坏誠实而自由的貿易，甚至也不拿綜合价值、固定而誠实的价格来代替。竞争使得人人失望，經濟学家們也不例外。它把事情弄到自我破坏的地步。

从蒲魯东先生所說的竞争的这一切坏处看来，竞争豈不成了資產階級社会关系及其原理和幻想的最具有分裂性和破坏性的因素嗎？

我們要注意：竞争对資產階級关系所起的影响，将随着新生产力即新社会的物質条件在它的刺激下急剧地形成而日益具有破坏性。至少在这一点上竞争的坏的一面也会有它的某些好处。

“从竞争的起源来考察，作为一种經濟状态或一个經濟阶段的竞争，是……主张减低一般生产費用的理論的必然結果。”

在蒲魯东先生看来，血液循环应当是哈維的理論的結果。

“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結局，竞争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产生出垄断。垄断的这种起源就証明垄断的正当…… 垄断是竞争的天然对立面……可是，既然竞争不可避免，那末它本身就含有垄断的思想，因为垄断好象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

我們和蒲魯东先生一同感到高兴的是，他总算有一次把他的正題和反題的公式运用成功了。誰都知道，現代的垄断就是由竞争产生的。

一牵涉到內容，蒲魯东先生就得依靠詩意的形象。竞争曾經把“劳动的每一細小部分”变成“一个好象是独立自主的領域，在这里每个人都表現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独立性”。垄断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独立自主的領域”至少和“屏障”同样好听。

蒲魯东先生所講的只是由竞争产生的現代垄断。但是，大家

知道，競爭是由封建壟斷產生的。可見，原來競爭是壟斷的對立面，並非壟斷是競爭的對立面。因此，現代壟斷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反題，相反地，它是一個真正的合題。

正題：競爭前的封建壟斷。

反題：競爭。

合題：現代壟斷；它既然以競爭的統治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壟斷的否定，同時，它既然是壟斷，所以就否定競爭。

因此，現代壟斷，資產階級的壟斷就是綜合的壟斷，是否定的否定，是對立面的統一。它是純粹的、正當的、合理的壟斷。蒲魯東先生把資產階級的壟斷當做粗野的、簡陋的、矛盾的、痙攣狀態的壟斷，這樣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學自相矛盾的境地。蒲魯東先生在壟斷問題上不止一次提到過的羅西先生，大概對資產階級壟斷的綜合性質理解得要深一些。他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教程”⁶⁸中舉出人為的和自然的壟斷之間的區別。他說：封建的壟斷是人為的，即專橫的；資產階級的壟斷則是自然的，即合理的。

蒲魯東先生推論說：壟斷是一件好事，因為它是一個經濟範疇，是從“人類的無人身的理性”中散發出來的東西。競爭也是一件好事，因為它也是一個經濟範疇。不過，不好的就是壟斷的實際和競爭的實際。更壞的是壟斷和競爭的互相蠶食。怎麼辦呢？設法找到這兩個永恒思想的合題，把它從太古以來所寄居的神的懷抱中拉出來。

在實際生活中，我們不僅可以找到競爭、壟斷和它們的對抗，而且可以找到它們的合題，這個合題並不是公式，而是運動。壟斷產生着競爭，競爭產生着壟斷。壟斷資本家彼此競爭着，競爭者逐漸變成壟斷資本家。如果壟斷資本家用局部的聯合來限制彼此間

的競爭，工人之間的競爭就要加劇；對某個國家的壟斷資本家來說，無產者群眾愈增加，各國壟斷資本家間的競爭就愈瘋狂。合題就是：壟斷只有不斷投入競爭的鬥爭才能維持自己。

為了辯證地引導出隨壟斷而來的捐稅，蒲魯東先生向我們講述社會天才的故事。這位天才勇敢地在他那條曲折的道路上行進，

“……他步伐堅定，不後悔也不躊躇；走到壟斷的拐角，他用憂郁的目光回頭一望，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便對一切生產品課以賦稅，並建立起一套行政機構，以便把全部職務交給無產階級並由壟斷資本家付給報酬”。

關於這位餓着肚子在曲折的道路上散步的天才有什麼可說的呢？這種散步除了用捐稅使資產者們毀滅以外沒有別的目的，而實際上捐稅正是資產階級保持統治階級地位的手段；關於這種散步，又有什麼可說的呢？

為使讀者約略地了解蒲魯東先生對待經濟細節的方法，只須說明一點就夠了：他認為消費稅的規定是為了平等和救濟無產階級。

消費稅只是隨着資產階級統治的確立才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產業資本是一種靠直接剝削勞動來維持、再生產和不斷擴大自己的持重而節儉的財富。在它手中消費稅是對那些只知消費的封建貴族們的輕浮、逸樂和揮霍的財富進行剝削的一種手段。詹姆斯·斯圖亞特在亞當·斯密的著作問世以前十年所發表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一書，對消費稅的這種原始目的有很好的描寫。

他說：“在君主專制下，君主對財富的增長似乎有些妒忌，所以就向發財致富的人征收捐稅，即向生產徵稅。而在立憲制度下，捐稅主要落在日益貧困的人身上，即落在消費身上。因此，君主們向工業徵稅…… 比如人頭稅

和平民財產稅是根据納稅人的假定財富按比例征收的。每人按照假定的收益相应地納稅。在立宪制度下，一般是向消費課稅。每人按照他支出的多少相应地納稅。”⁶⁹

至于捐稅、貿易差額和信用（在蒲魯东先生理性中）出現的邏輯順序，我們只要看到这一点就够了：英国資產階級在奧倫治公爵威廉三世时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之后，一到它可能自由發展自己的生存条件时，立即建立了新的捐稅制度、国家信用和保护關稅制度。

对于蒲魯东先生在警察或捐稅，在貿易差額、信用、共产主义和人口等問題上所做的深謀远慮的推論，这些短短的說明已經足以使讀者获得一个正确的觀念了。可以保證：任何評論，甚至是最寬容的評論也不会对專講這些問題的各章进行認真的研究了。

第四节 土地所有权或地租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發展着。因此，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虽然蒲魯东先生表面上似乎講的是一般的所有权，其实他所談論的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地租**而已。

“地租和所有权一样，其起源可以說是不在經濟范围之内：它根源于同財富生产極少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第二卷第 269 頁）

这样，蒲魯东先生就是承認自己在了解地租和所有权产生的

經濟原因上是无能的。他承認这种无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这些考虑的确同財富生产極少关系，但是同他那狹隘的历史眼光却大有关系。蒲魯东先生断言，所有权的起源包含有某种神秘的和玄妙的因素。但是，硬使所有权的起源神秘化也就是使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間的关系神秘化，用蒲魯东先生的話來說，这不是放弃对經濟科学的一切要求了嗎？

蒲魯东先生

“只是提醒：在經濟進化的第七个时代(即信用时代)^①，现实曾为虛构所排挤，人的活动有在空虛里消失的危險，因此有必要把人更紧地束縛于自然，而地租就是这种新契約的代价。”(第二卷第 265 頁)

有四十个埃巨的人^②大概預感到后来会出现一个蒲魯东先生，因而說：“造物主先生，您怎么說都行。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主人，可是您絕不能使我相信我們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用玻璃做成的。”⁷⁰在您的世界里，信用是使人消失于空虛的手段，因此，要把人束縛于自然，土地所有权也許有必要。但是在现实生产的世界里，土地所有权始終走在信用的前面，所以蒲魯东先生的 *horror vacui* [惧怕空虛]是不可能存在的。

不管地租的起源怎样，只要它存在，它就是土地經營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間激烈爭执的对象。这种爭执的最終結果是什么呢？或者，換句話說，地租的平均額怎样呢？請看蒲魯东先生是怎么說的：

“李嘉圖的理論回答了這個問題。在社会生活之初，人剛來到地球上，只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② 伏尔泰同名小說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溫順、勤勞的農民，每年收入 40 个埃巨。埃巨(écu)是法國 18 世紀以前的幣名，價值三金鎊。——譯者注

見大片的森林，土地廣漠無垠，而工業僅僅萌芽，在這個時候，地租當然等於零。未經勞動開墾過的土地是使用對象，並不是交換價值，它是公共的，但不是社會的。由於家族繁衍和農業進步，土地逐漸開始具有價格。勞動使土地具有價值，由此產生了地租。在付出等量勞動的情況下，收成愈多的土地，價格也就愈高；因此，所有者總是力求把除去土地經營者的工資即除去生產費用以外的全部土地產品攫為己有。於是所有權就緊跟在勞動之後，以便從勞動那里奪取超過實際生產費用的全部產品。當所有者執行神秘的義務，以社會集體的代表的身份對待耕者的時候，土地經營者卻命定只是負有義務的勞動者，他有義務把超過他應得工資的全部所得向社會交代…… 因此，從本質和使命來說，地租是一種可分配的公平的工具，是經濟天才用來達到平等的無數手段之一。這是所有者和土地經營者（在不能秘密串通的情況下）為了更高的目的而從相反的角度編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冊，其最終結果將是土地使用者和產業家平均占有土地…… 必須具備所有權的全部魔力，才能從耕者那里奪去他不能不視為已有的產品的餘額，因為他認為自己是產品的唯一創造者。地租，或者更恰當地說，土地所有權，摧毀了農業上的自私，產生了任何力量任何土地的分割所不能產生的團結…… 現在，所有權已經獲得道義上的成果，剩下的就只是分配地租了。”

所有這些響亮的詞句首先可以歸結如下：李嘉圖說，農產品價格超過它們的生產費用（包括資本的普通利息和利潤在內）的餘額，就是地租的標準。蒲魯東先生則更為高明，他使化裝成 *deus ex machina* [從機器里出來的神]⊖ 的所有者出面干預，以便從耕者那里奪去超過生產費用的全部產品餘額。他利用所有者的干預來說明所有權，利用收租者的干預來說明地租。他回答問題的方法就是重復應予說明的範疇，並在後面加上一個音節⊙。

⊖ 在古代的戲院里，扮演神的演員由特殊的機械裝置送上舞台；這句話的轉義就是指那種突然出現以挽救危局的人。——編者注

⊙ 用所有者 (*propriétaire*) 的干預來說明所有權 (*propriété*)，用收租者 (*rentier*) 的干預來說明地租 (*rente*)。——編者注

我們还要注意一点，蒲魯东先生用土壤肥沃程度来决定地租，使地租又有了一个新的起源，因为他認為土地在按照肥沃程度来估价之前，“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公共的”。使行将消失于无限空虛里的人回到土地上来的必要性，产生了地租；蒲魯东关于地租的这种虛构現在又到哪里去了呢？

李嘉圖的学說被蒲魯东先生用天命的、譬喻的和神秘的語句煞費苦心地包扎起来了，現在我們来把它解开。

李嘉圖所說的地租就是资产階級状态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階級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

我們看到，根据李嘉圖的学說，一切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費用，其中包括經營利潤；換句話說，价格取决于所用劳动時間的多少。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少的产品的价格决定着其余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場价格，就是說，产生一种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

与此相反，在农业生产中一切同类产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多的产品的价格。首先，这里不能象工业生产中那样随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数量。其次，由于人口逐漸增加，人們就开始經營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进行新的投資，这新的投資的收益比原始投資的收益就相应地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用較多的劳动获得較少的产品。劳动必須增加是由人口的需要造成的，因此用高价耕种的土地的产品就一定和用低价耕种的土地的产品同样有銷路。但由于竞争使市場价格平均化，所以优等地的产品就要同劣等地的产品等价銷售。优等地的产品价格中超过生产費用的这一余额就构成

地租。假如人們可以隨時得到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假如農業也和工業一樣隨時可以使用花費較少而效率較高的機器，或者假如後來的土地投資和最初的投資獲得的效果相同，那末，農產品的價格就會象我們所見的工業產品價格一樣，取決於最好的生產工具所生產的商品的成本。但是，這樣地租就會消失。

要使李嘉圖的理論普遍正確，必須[⊖]使資本能夠自由運用於各生產部門；資本家間高度發展的競爭必須使利潤達到同一水平；必須使土地經營者變成普通的資本主義企業家，他要从他投入劣等地[⊖]的資本中取得相當於他投資於任何工業部門時所能取得的利潤；必須使土地的耕作按照大生產制度進行；最後，還必須使土地所有者本人只想得到貨幣收入。

可能發生象愛爾蘭那樣的情況：土地租佃已高度發展，但是還沒有地租。因為地租不僅是扣除工資以後，而且還是扣除經營利潤以後的餘額，所以，如果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只是來自克扣工資，地租就不可能存在。

這樣看來，地租不僅不把土地使用者和土地經營者變成簡單的勞動者，不僅不“從耕者那里奪取他不能不視為已有的產品的餘額”，而且它使土地所有者面對的已不是奴隸、農奴、代役租的農民或雇農，而是資本主義企業家。自從土地所有權構成地租來源以來，土地占有者所得的就只是超過生產費用（不僅由工資而且也由經營利潤決定）的餘額。可見，地租正是從土地占有者那里奪去的

⊖ 在馬克思送給娜·吳亭娜的那一本上面，這一句話的開頭改為：“要使李嘉圖的理論（只要肯定它的前提）普遍正確，還必須”。——編者注

⊖ 在送給娜·吳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投入劣等地”改為“投入土地”。——編者注

一部分收入[⊖]。在封建租佃者被資本主義企業家排擠以前，還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例如，在德國這種變化直到18世紀的最後三四十一年間才開始。只有在英國，資本主義企業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間的這種關係才得到了充分的發展。

當蒲魯東先生的耕者孑然獨存的時候，還沒有出現地租。可是，一出現了地租，耕者就不再是土地經營者而是工人，即土地經營者的耕者。勞動者淪為普通工、短工、替資本主義企業家作工的雇農；象經營任何一個工廠一樣地經營土地的資本主義企業家出現了；土地所有者由一個小皇帝變成一個普通的高利貸者；這就是地租所表現的各種不同的關係。

李嘉圖所說的地租就是把宗法式的農業變成商業性的企業，把經營資本投入土地，使城市資產階級移到鄉村。地租並不把人束縛於自然，它只是把土地的經營同競爭聯在一起。土地所有權一旦構成了地租的來源，它本身就成為競爭的結果，因為從這時起土地所有權就依附於農產品的市場價值。作為地租，土地所有權喪失了不動產的性質，變成一種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業的發展和由此產生的社會組織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業利潤，只去追求農產品給他帶來的貨幣收入，教他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權看成僅僅是一架為他鑄造貨幣的機器以後，才可能有地租。地租使土地所有者脫離土地，脫離自然，他甚至可以完全不了解自己的領地，正象在英國那樣。至於土地經營者、資本主義企業家和農業工人，他們不束縛在他們取得收入的土地上，正如廠主和工廠工人不

⊖ 在1885年的德文版中，沒有最後的兩句，而在前面的“資本主義企業家”數字之後做了如下的補充：“他用僱傭工人來經營土地，他只是把超出包括資本的利潤在內的生產費用的餘額作為租金付給土地占有者。”——編者注

束縛在他們加工的棉花或羊毛上一样。他們感到切身有关的只是他們的产品价格和貨幣收入。因此反动势力便發出悲嘆，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們祖先的淳朴的風尚和伟大的德行。土地也服从于支配任何其他实业的那些規律，这就是而且也永远是私利哀悼的对象。因此，可以說，地租是将田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

尽管李嘉圖已經假定資產階級的生产是地租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他仍然把他的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資產階級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經濟学家的通病。

蒲魯东先生曾賦予地租以天命的目的——把耕者变成負有**义务的劳动者**，現在他从这里轉向地租的平均分配。

剛才我們已經看到，地租是由于**肥沃程度不等的土地**的产品具有**同等的价格**造成的。所以假定一公石谷物在劣等地上的生产費用是 20 个法郎，那末，原值 10 个法郎的一公石谷物就可以卖到 20 个法郎。

只要消費者由于需要而不得不購買市場上的全部农产品，农产品的市場价格就由最昂貴的产品的生产費用来决定。正是这种由竞争产生而絕不是由土壤肥沃程度不等产生的价格均等化，使上等地的所有者能够从他的土地經營者所卖出的每一公石中取得 10 个法郎的地租。

我們暫且假定谷物的价格决定于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時間；那末，上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将按 10 个法郎的价格出售，而劣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就值 20 个法郎。如果这个假定成立，那末，平均市場价格就是 15 个法郎，但是按照竞争的規律，平均市場

價格應為 20 個法郎。假如平均價格等於 15 個法郎，那末地租要進行均等的或者別的什麼方式分配都不可能，因為地租本身就不存在。只有在生產者用 10 個法郎生產的一公石穀物能賣 20 個法郎時，地租才能存在。蒲魯東先生假定生產費用不等而市場價格相等，那是為了把不等的產品進行均等的分配。

穆勒、舍爾比利埃、希爾迪奇等一些經濟學家之所以要求地租由國家掌握以代替捐稅，我們是可以理解的。這不過是產業資本家仇視土地所有者的一種公開表現而已，因為在他們的眼裡，土地所有者只是整個資產階級生產過程中一個無用的累贅。

但是，首先一公石穀物要按 20 個法郎支付，然後再把取自消費者的多餘的那 10 個法郎普遍進行分配，這的確足以使社會天才在他那條曲折的道路上行進時悶悶不樂，並且走到第一個拐角就碰破了自己的腦袋。

地租在蒲魯東先生的筆下變成了

“所有者和土地經營者……為了更高的目的而從相反的角度編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冊，其最終結果將是土地使用者和產業家平均占有土地。”

只有在現代社會裡，地租所造成的某種土地清冊才可能有實際意義。

但是，我們已經指出：土地經營者向土地所有者繳納的租金只是在工商業最發達的國家裡才多少正確地表現了地租。而且這租金裡面往往也還包含投入土地的資本的利息。土地的位置、靠近城市和其他許多情況都影響着租金的多少和地租的種類。這些不可駁斥的論據足以證明，建築在地租上面的土地清冊是不精確的。

另一方面，地租不能作為表明一塊土地肥沃程度的固定指標，因為現代化學的應用不斷改變着土質，而地質科學目前又在開始

推翻过去对相对肥沃的估价。英国东部各郡的广大土地直到大约二十年前才着手开垦，在这以前，由于人们对腐植质和下层土的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不够，这些土地没有开垦。

可见，在地租方面，历史不仅不给我们现成的土地清册，反而经常把现有的一切土地清册加以改变或全部推翻。

最后，肥沃绝不象所想的那样是土壤的一种天然素质，它和现代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块土地，用来种粮食可能很肥沃，但是市场价格可以驱使耕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场因而变得不肥沃。

蒲鲁东先生发明的他那种甚至并不具备普通土地清册所具有的意义的土地清册，纯粹是为了用来体现地租的天命的和平等的目的。

蒲鲁东先生继续说：“地租就是付给永存不灭的资本即土地的利息。但是由于这种资本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方法上不断改进，所以，虽然贷款（mutuum）的利息或利润由于资本充斥而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地租将由于生产更加完善和耕作的改进而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地租的实质。”（第二卷第 265 页）

这一次蒲鲁东先生在地租里面看到了利息的一切标志，所不同的只是，地租是特种资本的利息。这种资本就是土地，它是永恒的资本，“它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方法上不断改进”。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利息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地租却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利息由于资本充斥而下降，地租由于生产更加完善、土地使用方法日益改进而上升。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看法的实质。

首先我们看看所谓地租是资本的利息这一说法有多少正确的成分。

对土地所有者本人來說，地租是他买进土地时所付出的或卖出土地时所能收回的資本的利息。但是在买卖土地时他买进或卖出的只是地租。土地所有者为了取得地租而付出的代价是以一般利率而定，与地租的本質无关。投入土地的資本的利息通常是低于投入工商业的資本的利息。因此，如果不把土地給它的所有者带来的利息同地租本身区分开来，那末似乎土地資本的利息比其他資本的利息还要低些。但是，問題不在地租的买价或卖价，不在它的市場价值，不在資本化的地租，而在地租本身。

租金不仅包含真正地租，而且还可能包含投入土地的資本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不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是以資本家的身份获得这一部分租金。不过，这并不是我們所要講的真正的地租。

只要土地不被用作生产資料，它就不是資本。正如所有其他生产工具一样，土地資本是可以增多的。我們不能在它的物質成分上（用蒲魯东先生的說法）添加任何东西，但是我們可以增加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人們只要对已經变成生产資料的土地进行新的投資，也就是在不增加土地的物質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資本。蒲魯东先生所理解的土地的物質，就是有空間界限的土地。至于他所說的土地的永恒性，我們并不反对土地作为一种物質具有这种性質。但是土地資本也同其他任何資本一样不是永恒的。

产生利息的黄金和白銀，也和土地一样是經久而永恒的。如果說金价、銀价下跌而地价却上涨，那末，这絕不是由于土地的本性多少是永恒的緣故。

土地資本是固定資本，但是固定資本同流动資本一样也有損

耗。土地方面已有的种种改良要求人們把它們保持下来并进一步改良。这些改良只有在一定时期內才有效用，这和所有别的用来使物質变成生产資料的改良是一样的。假如土地資本是永恒的，那末，有些地方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面貌，羅馬近郊平原、西西里島和巴勒斯坦就会仍然放出昔日繁盛的全部光輝。

甚至有时有这样的情况：对土地实行的改良还保存着，而土地資本却已消失。

首先，这种情况每一次都是在真正的地租由于有新的更肥沃的土地的競争而被消灭的时候發生；其次，改良在一定时期內是可貴的，但自农艺学的發展使其普及以后，就不足貴了。

土地資本的代表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土地經營者。作为資本的土地带来的收入不是地租而是利息和經營利潤。有些土地产生这种利息和这种利潤，但不产生地租。

总之，土地只要产生利息，就是土地資本，但是，它既是土地資本，也就不能提供地租，就不能形成土地所有权。地租是实行土地經營时那种社会关系的結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經久的持續的本性的結果。地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

在蒲魯东先生看来，“耕作的改进”（“生产更加完善”的后果）是地租不断上升的原因。其实恰恰相反，这种改进迫使地租周期地下降。

一般說来，农业上或工业上的一切改良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用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就是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同样多或者更多的产品。由于这些改良，土地經營者可以避免用更多的劳动获得比較少的产品。这时，他已沒有必要去耕种劣等地，他在同一塊土地上繼續进行投資可以取得相同的收获。因此，这

些改良不但不能象蒲魯東先生所說的提高地租，它們反而成為地租上升的暫時障礙。

17世紀英國的土地占有者們非常明白這個真理，他們唯恐自己的收入減少，就反對農業上的成就。（參看查理二世時期英國經濟學家配第的著作⁷¹）

第五節 罷工和工人同盟

“任何旨在提高工資的運動除了使糧食、酒等等漲價即引起貧困的加劇以外，不可能產生別的結果。要知道，什麼是工資？工資就是糧食……的成本，就是一切物品的全部價格。再進一步說，工資就是組成財富和工人群眾每日為再生產而消費的各種要素的比例性。因此，將工資提高一倍……就等於把超過生產者產品的部分發給每一個生產者，這當然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在少數生產部門內提高，就會使交換普遍混亂，總之，會引起貧困的加劇……我可以斷言：導致提高工資的罷工不能不引起價格的普遍上漲，這同二加二等於四一樣確實。”（蒲魯東，第一卷第110、111頁）

除了二加二等於四以外，我們否定上述一切論點。

首先，不可能有價格的普遍上漲。如果一切物品的價格都和工資同時增加一倍，價格並不會因此發生任何變化，起變化的只是說法而已。

其次，普遍提高工資絕不會引起商品或多或少的普遍騰貴。實際上，假如一切生產部門都按照固定資本或所用勞動工具的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末，普遍提高工資就會使利潤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場價格卻不會有任何變化。

但是，由於各生產部門中手工勞動對固定資本的比例並不一樣，所以凡固定資本較多而工人較少的部門遲早總不得不降低自

己的商品价格。反之，如果它們的商品价格不降低，它們的利潤就一定会超过利潤的一般水平。要知道，机器是不要工資的。因此，普遍提高工資对于那些使用机器較多而工人較少的生产部門，影响就比較小。但是，由于竞争不断使利潤平均化，某些利潤超过一般水平的現象只能是暫时的。可見，如果除去某些波动情况，普遍提高工資的結果就不是蒲魯东先生所說的价格普遍上涨，而是价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机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場价格的下跌。

利潤和工資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資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絕不致影响产品的价格。至于“导致提高工資的罢工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甚至引起貧困的加剧”，这种思想只有不可理解的詩人的头脑里才能出現。

在英国，罢工常常引起某种新机器的發明和应用。机器可以說是資本家用来对付熟練工人反抗的武器。現代工业中一个最重大的發明——self-acting mule〔自动騾机〕[⊖]击潰了进行反抗的紡紗工人。如果說用来反对同盟和罢工的机械發明的加强是同盟和罢工的唯一結果，那末就这一点來說，同盟和罢工对工业的發展也是有巨大影响的。

蒲魯东先生繼續說：“萊昂·福适先生在1845年9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近来英国工人对同盟已不發生兴趣（这是一种进步，我們当然只有向他們表示祝賀），然而工人在精神上的这种改善主要是經濟上开化的結果。在波尔頓的一次集会上一个紡紗工人大声說过：‘工資不是由厂主決定的。在蕭条时期老板們可以說只是充当必然性手中的鞭子，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他們只得鞭打。供求关系是具有調节作用的原理，这一点是老板們无法操縱的’……”蒲魯东先生大叫道：“好啊，这就是馴良的模范工人”…… “英

⊖ 自动紡紗机。——編者注

国就是还缺少这种貧困；但願它不要跨過海峽。”（蒲魯東，第一卷第 261、262 頁）

在英國的各城市中，波爾頓的激進主義聲勢最大。波爾頓的工人是以革命最堅決聞名的。當英國為廢除穀物法而掀起廣泛的鼓動宣傳的時候，英國廠主們認為，沒有工人打先鋒，他們就對付不了土地所有者。但是由於工人利益同廠主利益的對立並不亞於廠主利益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對立，所以，很自然，廠主們在工人的集會上註定要失敗的。廠主們干了些什麼呢？他們組織了一些有名無實的集會，參加者主要是一些工頭、少數忠於他們的工人和道地的生意朋友。後來，真正的工人要參加集會（當時波爾頓和曼徹斯特的情況就是這樣），反對這種人工示威，卻被拒於大門之外，說這是 ticket-meeting [憑票入場的集會]，只有持入場券的人才能參加。可是牆上的招貼明明寫的是公眾的大會。每逢舉行這種集會的時候，廠主們的報紙總是把會上的發言大登特登。不用說，在會上發言的都是一些工頭。倫敦的報紙一字不改地將他們的發言全文轉載。不幸蒲魯東先生竟把工頭當成普通工人，而且嚴禁他們渡過海峽。

1844 年和 1845 年罷工的消息比往年少了，這是因為 1844 年和 1845 年是 1837 年後英國工業繁榮的頭兩年。儘管這樣，那時並沒有有一個工聯解散。

現在我們來听听波爾頓的工頭們的發言。他們說，廠主並沒有權力操縱工資，因為產品價格不決定於廠主，其所以不決定於廠主，則是因為廠主並沒有權力操縱世界市場。於是他們根據這個理由，要工人們了解到，不應當組織同盟來要挾主人增加工資。蒲魯東先生則相反，他禁止組織同盟是唯恐引起工資的提高，因而引起

貧困的加劇。不言而喻，工頭們和蒲魯東先生在提高工資就等于提高产品价格这一点上是同声相应的。

但是，使蒲魯東先生引为憾事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唯恐貧困加劇呢？不是。他对波尔頓的工頭們恼怒純粹是因为他們用供求关系来确定价值，毫不关心构成价值，即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毫不关心价值的构成，其中包括不断的交換可能性以及其他一切同天命并列的关系的比例性和比例性的关系。

“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不仅刑法典上如此規定，而且經濟体系、現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說明这一点…… 每一个工人有单独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双手的自由，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会不能容許工人組織同盟来压制垄断。”（第一卷第 334、335 頁）

蒲魯東先生想把法国刑法典的条文說成是資产階級生产关系的必然的和普遍的結果。

在英国，組織同盟是議会的法令所認可的，而且正是經濟体系迫使議會批准了这种法律。1825 年，在哈斯基森大臣任內，議會必須修改法律才能更加适应自由竞争所造成的环境，在这个时候，議會不得不废除一切禁止工人組織同盟的法律。現代工业和竞争愈發展，产生同盟和促进其活动的因素也就愈多，而同盟一經成为經濟事实并日益稳定，它們也必然很快地成为合法的事实。

因此，法国刑法典的有关条文至多只能証明，在制宪會議和帝制时期，現代工业和竞争还没有得到充分發展⁷²。

經濟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在給同盟定罪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是动机各不相同而已。

⊖ 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是傅立叶主义者，在英国是欧文主义者。——弗·恩·（恩格斯在 1885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經濟學家向工人說：不要結成同盟。如果你們結成同盟，就會破壞工業的正常工作，妨礙廠主滿足訂戶的要求，擾亂商業和加速採用機器，這樣，你們的一部分勞動就會毫無用處，機器將迫使你們接受更低的工資。同時，你們一定會徒勞無益的。你們的工資總是決定於勞動人手的供求關係；抗拒政治經濟學的永恆規律，不但可笑，而且危險。

社會主義者向工人說：不要結成同盟，這樣做歸根到底你們會得到什麼呢？能提高工資嗎？經濟學家可以非常清楚地向你們證明：即使事情順利，在短期內多拿到幾文錢，但是以後工資要永遠減少下去。熟練的核算家會向你們證明：單是你們組織和維持同盟所必需的一筆經費，就需要經過若干年才能從提高的工資中得到補償。而我們，作為社會主義者則要告訴你們：即使不談錢的問題，你們絕不會因為結成了同盟就不再當工人，而老板將來却照舊當他的老板。所以，不需要任何同盟，不需要任何政治，因為組織同盟不就是搞政治嗎？

經濟學家希望工人在目前已經形成、經濟學家已經在自己的教科書上記載和規定的社會里停滯不前。

社會主義者勸告工人不要觸動舊社會，以便更好地進入他們用非凡的先見之明準備就緒的新社會去。

不管什麼經濟學家 and 社會主義者，不管什麼教科書和烏托邦，同盟片刻不停地隨着現代工業的發展和成長而日益進步和擴大。現在甚至可以說，同盟在一國內的發展程度可以確切地表明該國在世界市場等級中所占的地位。工業最發達的英國就有最大的而且也組織得最好的同盟。

在英國，工人們就不限於組織一些除臨時罷工外別無其他

目的并和罢工一起結束的局部性同盟。他們还建立經常性的同盟——工联，作为工人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堡垒。現在，所有这些地方工联已組成全国职工联合会⁷³，拥有會員 80 000 人，中央委员会設在倫敦。工人在組織这些罢工、同盟、工联的同时也进行政治斗争，現在工人們正在宪章派的名义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政党。

工人們最初企圖联合时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

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識的人們聚集起来。竞争把他們的利害关系分开。但是維護工資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們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組織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間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資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維護工資，后来，随着資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漸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組成集团，工人們为抵制經常联合的資本而維護自己的联盟，就比維護工資更为必要。下面这个事实就确切地說明了这一点：使英国經濟学家异常吃惊的是，工人們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資支援經濟学家認為是单只为了工資而建立的联盟。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內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發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質。

經濟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資本的統治为这批人創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資本說来已經形成一个階級，但还不是自为的階級。在斗争(我們仅仅談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漸团結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階級。他們所維護的利益变成階級的利益。而階級同階級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我們应当把資產階級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資產階級在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的統治下形成为階級；第二是形成階級之

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旧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第一个阶段历时较长，花的力量也最多。资产阶级也是从组织反对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进行斗争的。

对资产阶级所经历各个历史阶段——从城市自治团体直到构成阶级，已有不少的探讨。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对罢工、同盟以及无产者在我們眼前实现他们组成为阶级所采用的其他形式给以明确估价的时候，一些人就陷入真正的惶恐，另一些人就显出先验的蔑视。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不是說，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阶级的统治呢？不是。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 这里所谓等级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级，这些等级有一定严格限定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誰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他就完全违背了历史。——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在这以前，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間的對抗仍然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鬥爭，這個鬥爭一旦達到最緊張的地步，就成為全面的革命。可見，建築在階級對立上面的社會最終將成為最大的矛盾、將導致人們的肉搏，這用得着奇怪嗎？

不能說社會運動排斥政治運動。從來沒有哪一種政治運動不同時又是社會運動的。

只有在沒有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情況下，社會進化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會全盤改造的前夜，社會科學的結論總是：

“不是戰鬥，就是死亡；不是血戰，就是毀滅。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喬治·桑）⁷⁴

弗·恩格斯

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

资产阶级的现状

英国的戏院应该把“扬恶学校”⁷⁵这个剧目从节目单上勾掉了，因为事实上最大的扬恶学校已经出现在巴黎的众议院。最近四、五个星期内那里发生的和宣扬出来的丑事之多，真是议会辩论记录上前所未见的。你们记得，邓科布先生曾经提议在你们光荣的下院的门前刻上这样一句题词：“在此四壁之内，进行着最卑鄙齷齪的勾当。”现在有人足以和你们的那一群资产阶级立法者相媲美了。这里人们的所做所为会使英国的那一伙恶棍自愧不如。古老的英国的脸面得到了保全：德·日拉丹先生赶过了罗巴克先生，杜沙特尔先生打破了詹姆斯·格莱安先生的记录。

我不打算在这里把最近几个星期内所揭发出的丑事全部列举出来。我决不谈那好几十件已交付法庭审理的行贿案，决不谈那位企图用不无妙处的手段把高等骗子的一套做法带到土伊勒里宫去的侍从武官圭丹先生。我也不想向读者详细地讲述那位前陆军大臣、法国贵族居比耶尔将军的丑事，这位将军曾托辞必须向内閣行贿才能取得开业许可而骗取了一个矿业公司的40张股票，他泰然自若地把这些股票塞进了自己的腰包，目前他正为这件事在贵族院受审。我不讲这些事情，我只从众议院的两三次会议里选择几个典型的事例，你们从这些例子就可以想见一般了。

众議院議員，“新聞報”編輯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無論在众議院里还是在他的報紙上都支持新成立的“进步保守派”，最近一个时期他变成了內閣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可是不久以前他还是这个內閣的支持者。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干有魄力的人，可是却毫无原則。从他初出茅廬的时候起，他就不顧羞耻地采取各种手段謀取显赫的社会地位。就是这位先生曾强迫“国民报”的著名編輯阿尔芒·加莱尔和他决斗，結果加莱尔被他用槍打死，他因而給自己鏟除了一个危险的竞争者。象这样一个拥有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同时又是众議院議員的人物，政府当然很有必要取得他的支持，但是德·日拉丹先生的支持卖得（他的支持向来是出卖的）可便宜。德·日拉丹先生和內閣进行交易已不止一次，但并不是每一次都能使双方心滿意足。同时德·日拉丹先生总是准备着随風轉舵的。由于預料到可能和基佐內閣决裂，他就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或通过他的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和代理人，尽量地搜集各种肮脏的交易、賄賂、舞弊等等的情报。他从这次會議上各党派之間进行的辯論看出，基佐和杜沙特尔倒台的时刻已經不遠了。他是新成立的“进步保守派”的主要組織者之一，他曾不止一次地威胁政府，如果政府一意孤行的話，他将把滿腔的怒火全部对它發泄出来。基佐先生用極為輕蔑的詞句拒絕和这个新的党派达成任何妥协。这个党退出了多数派，并开始發表反对政府的言論来和它为難。在众議院辯論財政以及其他問題的时候，揭發出来的丑事太多了，以致基佐先生和杜沙特尔先生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把几位同僚推下台去。可是补缺的人都是些无足輕重的人物，沒有一个党派感到滿意，內閣与其說巩固了倒不如說削弱了。后来就發生了居比耶尔事件，这件事使多数派的人們也都对是否还能够替基

佐先生保住位置發生了某些怀疑。这时候，德·日拉丹先生看出內閣已徹底瓦解，毫无力量，他终于認為該把自己那个装满丑事秘聞的潘多拉的盒子⁷⁶拿出来了，通过揭發那些甚至会动摇众議院之“腹”⁷⁷对內閣的信任的丑事，徹底击潰这个已經搖搖欲墜的內閣。

首先，他指控內閣曾以 8 万法郎的价錢出卖过一个貴族封号，但是收了錢以后却没有履行諾言！貴族院認為“新聞报”上講的这些话侮辱了自己，請求众議院准許把德·日拉丹先生交付貴族院法庭审判。这一請求在众議院引起了辯論，在辯論的过程中，德·日拉丹先生完全坚持自己所提出的指控，他說他掌握了証据，但拒絕提出人名，因为据他自己講，他不願意当**告密人**。可是他說他已經在私人談話中向基佐先生三次提起此事，而基佐先生哪一次也沒有加以否認，又說有一次他向杜沙特尔先生談起此事，杜沙特尔先生回答道：“这是我不在的时候發生的，事后我提出了反对；这是基佐先生干的。”杜沙特尔先生对这一切矢口否認。德·日拉丹先生說道：“那末我来向各位証明，兜揽这种生意是政府的家常便飯。”于是他宣讀了亚历山大·德·日拉丹將軍(据我所知，他是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的父亲，后者是这位將軍的私生子)給国王的一封信。德·日拉丹將軍在这封信里向国王表示，他感謝賞賜給他的貴族封号，但同时又說，基佐先生后来向他提出了一个受封的条件，要他(德·日拉丹將軍)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制止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的反对政府的行为，他(德·日拉丹將軍)不同意于这种交易，因此他謝絕这个貴族封号。杜沙特尔先生說道：“噢！要是全部問題只在于这一点的话，那我要告訴各位，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自己曾向我們表示，如果我們給他一个貴族封号的话，他就停止反对政府。但是我們拒絕了他。” *Hinc illae lacrimae!*

[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至于那封信里所講的事情,杜沙特尔先生却一字不提。于是众議院議決,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应受貴族院法庭审判。审判举行了。德·日拉丹先生仍旧坚持自己对政府的指控,但是他說,既然卖出的貴族封号未經授予,他所指責的只可能是政府而不可能是貴族院。于是貴族院法庭宣告他**无罪**。后来日拉丹先生又揭發一件丑事。去年曾有人筹办一个叫做“时代”的大型报纸,該报的任务是支持政府,把一切反对派的报纸都排挤掉,代替索价过高的德·日拉丹先生的“新聞报”来支持政府。这个計謀彻底破产了,德·日拉丹先生本人从中搗鬼也是原因之一。象这种搗鬼的事情沒有一件少得了他。被指控对报界实行賄买的杜沙特尔先生,声称政府从未資助过任何报纸。德·日拉丹先生在反駁的时候指出了一件无人不知的事实,即“时代”的編輯們曾屡次向杜沙特尔先生求乞,最后杜沙特尔先生对他們說:“黄金白銀我可沒有,不过我有什么給你們什么就是了”,——他給了他們一項在巴黎開設第三家歌剧院的特权,“时代”的“貴人們”把這項特权卖了10万法郎,其中6万用来貼补該报,下余的4万則不知去向。杜沙特尔先生又是矢口否認;可是这的确是一件无人不知无人不曉的事。

此外,德·日拉丹先生又講了几件类似的事情,但上面举出的几个例子已足够說明問題了。

昨天,德·日拉丹先生在众議院又起来講話,他宣讀了几封信,这些信件証明,杜沙特尔先生命令公家出資把关于上述賜予貴族封号一事的辯論印成文件,分發給全国各市政委员会;可是在这份內閣报告里,日拉丹先生和杜沙特尔先生的發言轉述得都不正确,相反地,这两个人的發言都被竄改了,使人感觉德·日拉丹先

生是一个可笑的诽谤者，而杜沙特尔先生却象一位十足的正人君子。至于事件的本身，德·日拉丹先生仍旧坚持自己所讲的一切，并且挑战式地向政府提议，要末成立一个议会委员会来推翻他的指控，要末就以诽谤的罪名把他交付法庭审判。他说，在这两种场合下，他必须讲出有关人的名字以及事情的全部细节，这样他既可以证实他的指控又不致落到一个小探子的地位。这些话在众议院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杜沙特尔先生一概否认，德·日拉丹先生坚持到底；杜沙特尔先生再否认，德·日拉丹先生再坚持；两个人就在众议院的各个“合唱团”彼此攻讦的喊声中这样翻来复去地争吵不休。其他反对派的议员也向政府挑衅，要求把这件事或是交给一个议会委员会去调查或是交付法庭审理。最后，杜沙特尔先生说：

“如果委托议会去调查，先生们，那就等于首先肯定众议院的多数对政府的廉洁有所怀疑；因此，一旦调查委员会成立，在同一天我们就得让位给别人；如果各位有所怀疑，就请坦白地说明，我们立刻就辞职。”

德·日拉丹先生说：“既然这样，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此事交付法庭审理了。我随时准备受审。只要你们敢这样做，就把我送交陪审法庭好了。”

司法大臣阿贝尔反驳道：“不，我们不这样做，因为众议院的多数将会公断。”

奥迪隆·巴罗先生说：“可是要知道，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处理这样的问题不在我们的权限以内，这是法庭的事。既然德·日拉丹先生在他的报纸上诽谤了政府，为什么你们不把他交付法庭审判呢？”

“我们不願意这样做！”

“很好，可是这里还对其他一些买卖贵族封号的人提出了明明白白的控告，为什么不把他们交付审判呢？至于‘时代’和开设歌剧院的特权这件事情，如果象你们所说的那样，你们没有参与其事，那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些参与这种卑鄙龌龊的勾当的人们交付法庭审判呢？这里明明白白地提出了控告，甚至已经有部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系列的罪行；为什么皇家检察官不象自己职

責所要求的那樣，对被控犯有這些罪行的人提起公訴呢？”

阿貝爾先生回答道：“我們不提起公訴，因為控告的性質和提出控告的那些人的名聲使皇家法律工作人員無法認為這些控告是真實的。”

這些話時時被抱怨、叫喊、敲桌子的聲音和各種各樣的嘈雜聲所打斷。眾議院舉行的這一次從根本上震撼了基佐內閣的無與倫比的會議，最後以投票表決結束，投票結果證明：雖然多數對內閣的信任可能動搖了，但是他們的投票制度卻沒有動搖！

“眾議院在听取了內閣的解釋以後，認為滿意，現在轉入本日的議程！”

你們覺得怎樣？認為哪一個好一些呢？是內閣還是多數？是法國眾議院還是你們自己的下院？杜沙特爾先生好還是詹姆斯·格萊安爵士好？我敢說你們會感到難以抉擇。可是他們之間有一點是不同的。英國資產階級到目前為止還必須和貴族做鬥爭。因為英國貴族雖然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但是還沒有完全被擠掉。英國貴族一向可以在資產階級本身某些派系中找到一定的支持，正是由於資產階級的這種分裂，貴族才得免于徹底滅亡。在目前，國家債權人、銀行家、有固定收益的人以及相當大一部分船主都支持貴族對工業家進行鬥爭。整個廢除穀物法的運動就是證明。因此，英國資產階級中先進的部分（我指的是工業家）還能夠實行一些加速貴族瓦解的進步的政治措施，工業家甚至將不得不這樣做；他們必須擴大自己的市場，要擴大市場就必須減低價格。可是要減低價格就必須先降低生產費用，而這主要地又要依靠降低工資才能辦到。要降低工資，再可靠沒有的辦法就是減低生活必需品的價格；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方法只有一個，即減低稅額。就是這樣一根邏輯的鏈條牽着英國的工業家們，使他們必須把國教會消滅掉，必須削減或“公平地調整”國債。只要他們一旦發覺（也勢

必会發覺)世界市場已不能經常不斷地吸收他們的产品,他們就非实行这两項措施以及其他类似的措施不可。可見,英国资产阶级到現在为止还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他們还必須推翻貴族和享有特权的僧侶;他們将不得不实行一系列只有他們才能胜任的进步措施。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情況就不同了。法国既沒有世袭貴族也沒有土地貴族。革命已經把他們一扫而光。这里也沒有享有特权的教会或是国教会;相反地,新教的僧侶們和天主教僧侶們全都从政府那里領取薪俸,二者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在法国,工业家不可能和国家債权人、銀行家以及船主进行什么重大的斗争,因为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中,国家債权人和銀行家(他們同时还是铁路、矿业以及其他公司的主要股东)无疑是最强有力的,而且自1830年以来,政权就在他們的控制之下,其中只有很短的几次間隔。工业家在国外市場上被外国的竞争压倒,在国内市場上又毫无把握,他們沒有可能强大到能够順利地对銀行家、国家債权人进行斗争。相反地,他們的情况一年不如一年;他們的政党从前在众議院占半数而現在只不过占三分之一。从以上可以看出,統治的资产阶级,不論是整个这一阶级还是其中的哪一部分,根本不能做出什么“进步”;可以看出,1830年革命以后法国资产阶级既已取得完全的統治,这个統治阶级就只有**逐漸地走向灭亡**。它也正是这样做的。资产阶级沒有向前进,它不得不倒退了,它限制出版自由,取消集会結社的自由,頒布各种各样的特別法以便压制工人。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所揭發的丑聞十分明显地証明,在法国,統治的资产阶级已經徹底地老朽“无用”了。

事实上大资产阶级現在处境很尷尬。它好不容易才找到基佐和杜沙特尔替它执政。它支持他們执政七年,每次选举都保証他們

获得更有力的多数选票。现在众议院里所有的反对派都毫无力量，基佐和杜沙特尔的全盛时代似乎已经开始，可是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内阁中竟暴露出这样多见不得人的事，以致无法再继续执政，即使众议院全体一致支持它也不行了。毫无疑问，基佐和杜沙特尔以及他们的同僚在最近的将来就会辞职；他们可能在内阁里再勉强坐上几个星期，但是他们的末日已经很近很近了。他们下台以后谁上台呢？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可以重复路易十五的话了：“我去后，管它洪水泛滥，国破家亡，天翻地复！”梯也尔不能获得多数。摩莱老朽无用；他将会遇到重重困难，他要想获得多数的支持，也必须去干那些丑恶的勾当，因此他的下场也会象基佐一样。主要的困难就在这里。今天的选民永远会选出象目前在众议院开会的那样的多数；今天的多数永远需要一个象基佐和杜沙特尔之流所组成的内阁，也就是无所不为的内阁；而任何这样的内阁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都不会站住脚的。现今的制度就是在这样一个圈子里面转来转去转不出来。但是象这样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冲出这个圈子，实行选举改革；可是选举改革意味着准许小企业主参加投票，而这对法国说来就是“末日的开始”。路特希尔德和路易-菲利浦都非常清楚：让小资产阶级也成为选民不意味着别的，正意味着 «LA RÉPUBLIQUE!» (“共和国!”)

1847年6月26日于巴黎

本文是弗·恩格斯写的

载于1847年7月3日“北極星报”
第506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
“本报驻法国首都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極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40年
“无产阶级革命”第4期

卡·馬克思

“萊茵觀察家”的共产主义⁷⁸

布魯塞爾 9 月 5 日。“德意志—布魯塞爾報”⁷⁹第 70 號轉載了“萊茵觀察家”的一篇文章，正文前面加了這樣一句：

“從下面可以看出，第 206 號‘萊茵觀察家’在宣傳共產主義。”

不管這句話是不是諷刺，共產主義者必須反對這種說“萊茵觀察家”好像能夠宣傳共產主義的論調，特別是要反對說“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第 70 號轉載的那篇文章好像是在宣傳共產主義。

相當多的德國社會主義者經常叫囂反對自由資產階級，而結果，除了德國各邦政府，這種做法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現在象“萊茵觀察家”一類的政府報紙竟根據這些先生的詞句聲稱，硬說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不是自由資產階級，而是政府；共產主義者不論和前者還是和后者，都沒有任何共同的地方。

的確有人力圖把這些論調強加在德國共產主義者身上，並責備他們和政府結成了聯盟。

這種責難是很可笑的。政府不會同共產主義者聯合，共產主義者也不會同政府聯合。原因很簡單：在德國所有的革命黨派中間，共產主義者的黨是最革命的，這一點政府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

共產主義者怎能同宣布他們為國事犯而且把他們當國事犯看

待的政府結成聯盟呢？

政府怎能在自己的报刊上宣传那些在法国被看做是（这个政府本身也常常这样認為）蠱惑人心、破坏一切社会基石的无政府主义的原則呢？

这是不能想象的。仔細研究一下所謂的“萊茵觀察家”的共产主义我們就会看到，这种共产主义是非常幼稚的。

文章一开头談到：

“在观察我們的(!)社会状况的时候，我們看到到处都是灾难困苦(!)，我們应当承認，是有許多疏忽的地方。这是明显的事实，不过只是(!)發生了一个問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們深信，我們的国家制度并没有过错，因为(!)法国和英国的社会状况要(!)糟得多。可是(!)，自由派認為只有代議制才是灵丹妙藥。他們說，如果人民有了自己的代表机关，就会使自己的状况得到改善。这当然完全是妄想，但同时(!)好象又十分(!)近乎真理。”

我們从这几句話看到了活生生的«Beobachter»[⊖]本人的形象；我們看到，他神情茫然，咬着笔杆，不知道如何下笔；他一面琢磨一面写，划掉又重写，最后，用了好长的時間，写出上面这段冠冕堂皇的文字。为了能够攀扯到他的祖传宝物——自由派，他先从“我們的社会状况”談起，換句确切的話來說，就是从“观察家”自己的社会地位談起，他的地位当然会有不妙的地方。他从肯定我們的社会状况十分可怜和有許多疏忽这种極其籠統的观察出發，通过运用一系列極其晦涩的辞藻，勉强达到这样一点，即在他面前只有一个問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他的这个問題的產生只是为了馬上又消失。实际上，这位“观察家”沒有說明这是什么原因造

⊖ 双关語：德文的«Beobachter»是“观察家”的意思。——編者注

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
Nr. 72
Preis 10 Cent

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

Brüssel, Sonntag den 12. September

1847
No. 72

Nr. 72. Brüssel, Sonntag den 12. September. 1847.

Einige Exemplare der „Deutschen-Brüsseler-Zeitung“ zu 50 Cent, und einige Exemplare der König-Patrie, des West-Vertrages, so wie von der vollständigen Darstellung des Königs von Preussen, auch der Erklärung der Königin in Berlin, sind zu haben zu 50 Cent im Bureau der Zeitung, 24, rue National, bei dem Adolphe und Schreiber-Druck, hinter dem belgischen Garten und an den Eisenbahn-Stationen in Brüssel, Lüttich, Arras, Mecheln u. s. w.

Die Rechte.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Die Rechte dieser Zeit, die die Welt...

“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的一頁，載有卡·馬克思所著“萊茵觀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和弗·恩格斯的“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会主义”篇首部分

成的，也沒有說明，什么原因**不会**造成这种現象，他只是說明了他深信**不会**造成这种現象的东西，这种东西当然就是普魯士的国家制度。他通过果敢的“因为”二字，便从普魯士国家制度轉到法国和英国，从这里他只要輕輕一跳，就到了普魯士的自由派；他这一跳的确毫不費力，只用了一个根据不多的“可是”就跳到了。这样，他終於到达了自已心爱的陣地，他可以从这里大声疾呼地說：“这当然完全是妄想，但同时(!)好象又十分(!!)近乎真理”。但同时又十分!!!

难道共产主义者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至可以認為上面这些辞藻、这些經典式的轉語、这些忽而产生忽而消失的問題以及这些妙不可言的**只是、因为、可是**，尤其是“但同时又十分”等用語都是他們創造的嗎？

在德国，除了“老統帥”阿尔諾德·卢格，有这种写作本領的人是不多的，而为数不多的这些人也全是艾希霍恩先生部里的国教顧問。

我們沒有必要研究这段前言的內容。除了平庸的形式而外，这段話毫无內容；这只是一个入口，从这里进去就是我們这位觀察家国教顧問宣揚对自由派实行十字軍討伐的場所。

我們听听他的議論：

“自由派首先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有一种比官僚更容易、更吸引人的接近人民的形式(連达尔曼先生或盖尔温努斯也从沒有用过这样晦涩費解的文辞)①。自由派张口閉口都談人民的福利、人民的权利。其实它只是把人民当成恐吓政府的工具，人民只是它大举进攻政府当局时的炮灰。把政权搞到自己手里，这才是自由派的真正意圖，而人民的福利，对它來說是次要的。”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这位国教顧問先生是不是以为，他在这里向人民提出了什么新东西呢？人民，尤其是其中主张共产主义的人，知道得很清楚，自由派資產階級只关心他們本身的利益，很难指望他們会对人民表示同情。但假如国教顧問先生由此做出結論，說人民参加政治运动会被自由派資產階級利用来达到其自身的目的，那我們就不能不这样回答他：这在国教顧問看来也許完全近乎真理，但同时又是極端的妄想。

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階級考虑問題的方法却是和宗教事务部的人士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无产階級不会問，人民的福利对資產者是重要的还是次要的，資產者是不是想把无产者当炮灰。他們根本不想知道資產者想怎么样，他們想知道的是資產者被迫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問題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階級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統治，还是自由派想望的制度即資產階級統治。他們只要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无产階級的政治地位跟他們在德国的地位比較一下就会相信，資產階級的統治不仅使无产階級在反对資產階級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嶄新的武器，而且还給他們創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們已成为一种公認的力量。

国教顧問先生也許以为，日益靠近共产党的无产階級不会利用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吧？請他看看英法的工人报纸吧！請他看看（即使一次也好）宪章派的群众大会吧！

但是，編輯“萊茵觀察家”的宗教事务部的人士，对无产階級的看法却十分独特。这些先生以为，所謂无产階級就是波美拉尼亚的农民或柏林的短工。他們認為，他們答应給人民以 panem et

religionem [面包和宗教]而不是 panem et circenses [面包和娱乐]，也就算考虑得十分周到了。他們覺得，无产階級渴望援助，但未想到，无产階級除了渴望自己的援助外，并不渴望任何人的援助。他們也不知道，无产階級既很了解国教顧問先生們所說的“人民的福利”和沉重的社会地位的真实含义，也很了解自由派資產者的类似詞句的含义。

但是为什么人民的福利对資產者是次要的呢？“萊茵觀察家”回答說：

“联合省議會証明了这一点；自由派的背信弃义已經很明显了。所得稅問題应当是自由派的試金石，但自由派沒有經得起考驗。”

这些心地善良的国教顧問們覺得自己在經濟問題上清白无辜，因而可以用所得稅来迷惑无产階級了！

磨粉稅和屠宰稅直接出自工資，所得稅則出自資本家的利潤。国教顧問先生，这不是十分近乎真理的嗎？但資本家不願意也不可能同意从自己的利潤中抽稅而得不到任何补偿。竞争本身就会照顧到这一点。所得稅推行几个月以后，工資减少的數額就会等于因废除磨粉稅和屠宰稅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資料的落价而实际增加的數額。

不是用貨幣而是用滿足工人生活需要的物品来表示的工資，即实际工資（不是名义工資），它的水平取决于供求关系。稅制的改变会使这种依附关系短时遭到破坏，但不会使这种关系發生长时期的变化。

所得稅在經濟上唯一的优点（这位国教顧問一个字也未提到），就是征收这种稅国家花費小一些。但无产階級并不会从这里賺到什么。

那末，所有這些關於所得稅的議論該歸結成什麼呢？

第一、這件事對無產階級沒有任何好處，或者只有暫時的好處。

第二、政府在征收磨粉稅和屠宰稅的時候每天同無產階級直接接觸，同他們相對立，為他們所痛恨；但在征收所得稅的時候，它却退避起來，要資產階級單獨出面進行這種降低工資招致痛恨的活動。

可見，所得稅只是對政府有利，這也說明為什麼國教顧問們在所得稅遭到否決以後那樣懊喪。

我們暫時假定所得稅對無產階級有利，那末這屆議會應不應該通過它呢？

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它不應該同意任何稅收；在政府沒有滿足它的全部要求以前，它就應該使整個財政制度原封不動。否決稅收是所有議會強迫政府向大多數人讓步的手段。議會只是在這次堅決否決稅收的問題上表現了它的气魄，這一點也激動了失算的國教顧問們，他們想從這一方面在人民面前把它誣蔑一番。

“萊茵觀察家”接着說道：“但是，所得稅問題正是自由派刊物自己提出來的。”

完全正確，因為這是十足的資產階級的措施。儘管如此，假如這項措施是資產者絲毫不信任的大臣們不合時宜地向他們提出的話，他們還是可以把它否決的。

但是，這種對所得稅著作權的承認我們將予以查照；以後我們要用到它。

國教顧問發表了一通極端空洞混亂的言論以後，突然哽住了，又放出下面一些關於無產階級的論調：

“什么是无产阶级呢（这也是只是为了不給回答而提出来的問題之一）^①？假如我們（即“萊茵觀察家”的国教顧問們，而不是其他一般報紙）^②說，整整 $\frac{1}{3}$ 的居民失掉了一切生活基础，另外的 $\frac{1}{3}$ 則每况愈下，这并不是夸大。无产者的問題是絕大多数人的問題；这是一个極端重要的問題。”

流露出一定的反政府情緒的联合省議會，竟这样迅速地开导了这些官員們！政府禁止報紙談及我們普魯士也有无产阶级这样一种“夸大”，难道是很久以前的事嗎？“特利尔日报”及其他一些毫无罪过的報紙曾受到查封的威胁，說它們居心不良，想讓讀者知道英法无产阶级的貧困状况在普魯士也同样存在，难道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嗎？这也只有看政府喜欢怎样了。承認无产者占人民絕大多数，这一点我們也将予以查照。

接着談道：“議會認為極端重要的問題是有关原則的問題，也就是这个高級會議应不應該取得政权的問題。而人民将得到一些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他們既得不到一条鐵路，也得不到一所农业銀行，賦稅也不減輕！多么幸运的人民呵！”

請注意，在国教顧問梳得溜光的头頂上开始露出狐狸耳朵来了。“議會認為極端重要的問題是有关原則的問題。”这条博爱的毒蛇多么聖潔啊！是否允許政府發行 3 000 万塔勒的公債，征收事先不能确定数量的所得稅，建立农业銀行（通过这个銀行，它可以以国家財產作抵押得到 4 亿或 5 亿塔勒）；是否要把这一切都交給目前这个消極的反动的政府办理，从而使它永远成为独立的政府，或者相反，用严格的預算控制它，并通过否决稅收的办法使它受制于社会輿論，——这就是我們这位无孔不入的国教顧問称为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有关原則的問題！

大慈大悲的国教顧問問道：“而人民將得到一些什麼呢？”“得不到一條鐵路”，因而人民也就不要交納那些支付公債利息和彌補這條鐵路開始經營以後必然遭受的重大損失的稅款。

“得不到一所農業銀行！”国教顧問的這種說法，使人覺得好像政府準備付給無產階級地租[⊖]似的。恰恰相反，它是想靠掠奪交納地租的人民向貴族支付地租。這種銀行似乎應當便於農民贖買徭役。但假如還要農民等上幾年，那大概也就不需要贖買了。假如封建領主碰上農民的大草叉（這到一定時候是很容易發生的），徭役就會自行消失的。

“得不到任何所得稅”，但只要所得稅不給人民帶來任何收益，人民就可以對它十分冷淡。

国教顧問接着說道：“但是，幸運的人民呵，你們在有關原則的問題上已經占了便宜！假如你們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那就讓你們的代表講給你們聽吧；你們在聽他們的長篇演說的時候，大概會忘掉飢餓的！”

誰還敢說德國出版物沒有自由呢？“萊茵觀察家”在這裡完全為所欲為地用了這樣一些詞句，如果在法國，許多地方審判官不用考慮就會宣布這些詞句是一個社會階級對另一個社會階級的挑釁，并使罪犯受到懲罰。

然而，国教顧問却表現得非常軟弱無能。他想討好人民，但又從來不想讓人民了解有關原則的問題是怎麼回事。他勉強裝出一付同情飢餓人民的面孔，但又為此進行報復，說他們愚蠢，根本不能參與政治。然而無產階級很清楚，有關原則的問題是怎麼回事，

⊖ 雙關語：《Rentenbanken》是“農業銀行”，《Rente》是“地租”。——編者注

他們譴責議會并不是因为它要把这些原則付諸实现，而是因为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階級譴責議會，是因为它执行防御策略，沒有轉入进攻，沒有大踏步地前进。他們譴責它不够坚决，沒有給无产階級提供参加运动的机会。无产階級当然不会对等級的权利發生任何兴趣。但假如議會能够提出实行陪审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徭役、实现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和真正的人民代議制的要求，假如議會能同过去一刀两断，根据目前的需要，而不是根据旧时的法律制定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議會是可以指望得到无产階級最热情的支持的。

“觀察家”接着說道：

“上帝保佑，这个議會可別得到通往政府权力的門路，因为这样一来，一切社会改善就会碰到不可克服的阻碍。”

国教顧問先生可以放心。对这个毫无办法对付普魯士政府的議會，必要的时候无产階級是有办法对付的。

国教顧問繼續进行观察：“据说所得税会导致革命和共产主义。它实际上也在导致革命，即导致社会关系的改造和无限貧困的消除。”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国教顧問在跟讀者开玩笑，他使用柏林蹩脚的同音詞只是想說明，所得税消灭无限的貧困是为了代之以有限的貧困；或者他在經濟問題上是个前所未有的最大最无耻的蠢汉。在英国，所得税已經推行了七年，但社会关系并沒有因而得到絲毫改造，无限的貧困也沒有絲毫减弱，他对这一点并不怀疑。他也不怀疑，在普魯士，正是在最无限的貧困十分普遍的地方（在西里西亚和拉文斯堡的农村紡織工人中間，在西里西亚、波茲南、摩塞尔、維斯拉河流域的小农中間），实行着級別稅即所得税。

但是，这种荒唐的言論难道值得認真批駁嗎？下面接着談道：

“它还会导致一般所了解的共产主义…… 凡是工商业的發展使一切关系紧密地交織在一起同时經常發生变化，以至个人在竞争的巨流中不能确保自身的地位，个人就会由于情况所迫而求助于社会，社会則应当为普遍不稳定的后果給每个人以补偿。社会对自己成員的生活負有連帶責任。”

这就是“萊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这样看来，在我們这种任何人的生活都沒有保証，任何人在生活中的地位都沒有保証的社会里，社会却要負責保証每个人的生活。国教顧問先是肯定現存社会做不到这一点，接着又要它完成这件它所做不到的事。

不論在什么地方，社会在对待个人方面都要改正由于它固有的普遍不穩定而不能預見到的种种疏忽，——这就是国教顧問的觀點。

“整整 $\frac{1}{3}$ 的居民失掉了一切生活基础，另外的 $\frac{1}{3}$ 每况愈下”。这就是說，有 1 000 万人需要个个补偿。难道国教顧問真的以为，貧困不堪的普魯士政府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嗎？

当然能够，而且正是靠那个会导致“萊茵观察家”認為是一般所了解的共产主义的所得税来完成！

妙極了！国教顧問對我們說了半天关于冒牌共产主义的廢話，声称社会对自己成員的生活負有連帶責任，社会应当关心他們（虽然它做不到这一点）；他發表了所有这些荒謬、矛盾的議論并提出了实现不了的要求以后，又建議我們把所得税当做一項可以解决一切矛盾、使一切实现不了的要求变成可以实现的要求并使一切社会成員之間的团结得到恢复的措施。

我們来看看提交議会的馮·杜厄斯堡先生关于所得税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認為，征收到的全部所得税要統統用光，不留分文。这样一来，財政緊迫的政府就不会有半文錢用来补偿每个人

由于普遍不稳定而带来的后果，使社会履行它的連帶責任。由于情况所迫而向馮·杜厄斯堡先生求助的即使不是1000万人，而总共只有10个人，馮·杜厄斯堡先生恐怕也要拒絕他們的。

不，我們錯了。除了所得稅而外，国教顧問先生还有一种办法可以实现他認為是一般所了解的共产主义：

“基督教教理的全部內容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人生就的罪恶和贖罪的教义。这也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大可能的团結和联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多么幸运的人民呵！極端重要的問題永远解决了。无产阶级在普魯士的天才和神聖精神的双重庇护下，获得了两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一个是所得稅的收入除去日常和非常的国家开支剩下来的余額，这个余額等于零；一个是天上的地产（生就的罪恶和贖罪）的收入，这种收入也等于零。这两个零就是失掉一切生活基础的 $\frac{1}{3}$ 居民謀生的牢固基础，就是每况愈下的另一个 $\frac{1}{3}$ 居民的有力支柱。無論如何，想象中的余額，生就的罪恶和贖罪要比自由派議員的长篇演說更能減輕人民的飢餓！下面接着說道：

“我們在‘我們的主’这篇祈祷中請求上帝‘不要使我們起邪心’。假如我們为自己提出这种請求，那我們本身对自己的亲友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但我們的社會条件必然成为人們产生各种邪心的源泉，而極端困苦的生活又迫使人們去犯罪。”

而我們（普魯士国家的官吏、审判官和国教顧問先生們）就根据这种理由为所欲为，車輾，砍头，监禁，橫加蹂躪，“使”无产阶级“起邪心”，然后我們也遭受車輾，砍头，监禁和蹂躪。一定是这样的。

国教顧問先生声称：“基督教国家是不会容忍这种情况的。它一定会进行帮助。”

是的，就是通过关于社会的連帶責任的謬論、想象中的余額和开給天父、天子等的空头支票来进行帮助。

我們这位进行观察的国教顧問認為：“甚至可以中止本来就是很无聊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議論了。假如基督教的社会原則能够得到那些應該發展这些原則的人發展的話，共产主义者很快就会不作声的。”

基督教的社会原則有过一千八百年的發展，它并不需要普魯士国教顧問做任何进一步的發展。

基督教的社会原則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辯护，也曾把中世紀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墜，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階級遭受压迫进行辯解。

基督教的社会原則宣揚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压迫階級）存在的必要性，它們对被压迫階級只有一个虔誠的願望，希望他們能得到統治階級的恩典。

基督教的社会原則把国教顧問答应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繼續在地上存在进行辯护。

基督教的社会原則認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齷齪的行为，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他罪恶的公正懲罰，就是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們贖罪的考驗。

基督教的社会原則頌揚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順从馴服，总之，頌揚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階級說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

基督教的社会原則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階級却是革命的。

基督教的社会原則就是这样。

还有：

“我們認為，社会改革是君主制最重要的使命。”

真的嗎？过去一直还没有听说过。就算是这样吧。那末君主制应当实现的社会改革又是哪些呢？就是实行从自由派刊物上抄袭来的、可能带来連財政大臣都不清楚的余額的所得稅；建立倒霉的农业銀行；修建普魯士的东部鐵路，特别是取得由生就的罪恶和贖罪构成的大量資本所带来的利潤！

“这是由王权本身的利益决定的”——王权竟落到这种地步！

“这是苦难的社会状况所要求的”——这种状况在目前与其說是要求教义，不如說是要求保护关税。

“这是福音書規定的”——随便什么規定的都可以，只要不是普魯士国庫極端严重的空虛規定的就好，在国庫这个无底洞中，三年內就可以把 1 500 万俄国人完全吞沒。一般說来，福音書規定了很多东西，其中閹割是社会改革用于自身的起点（“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二节）。

我們这位国教顧問硬說：“王权和人民是一个統一的整体。”

这句话不过是 *«l'état c'est moi»* [“朕即国家”] ⊖ 这句老話的另一种說法，和路易十六 1789 年 6 月 23 日对举行叛乱的等級所說的：假如你們不服从命令，我就把你們个个送回家去 *«et seul je ferai le bonheur de mon peuple»* [“我亲自来关照我的人民的福利”]，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王权既然决定使用这些詞句，它的处境一定十分窘迫，而我們这位最有学問的国教顧問也应该知道，法国人民当时是怎样答謝路易十六这番話的。

⊖ 一般認為这是路易十四的話。——編者注

接着，国教顧問先生肯定說：“宝座应当建立在广泛的人民的基础上；这样它才会最牢靠。”

是这样，只要人民还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上層建筑从自己寬大的肩膀上用力甩到深渊里去。

最后，国教顧問先生說道：“貴族使君主制保持了自己的威严并賦予它以詩意的光輝，但却使它丧失了实权。資产階級既夺去了它的权力，又夺去了它的威严，只留給它王室費。而人民則既保存了君主制的权力，又保存了它的威严，它的詩意。”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非常遺憾，国教顧問先生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御前演說⁸⁰中向自己的人民吹嘘的那番話，看得太認真了。推翻貴族，推翻資产階級，建立依靠人民的君主制，——这就是他的最后一言。

假如这些要求不是純粹的幻想，那其中就包含着一次完整的革命。

我們不打算浪費時間来証明：除非資产階級和人民共同努力，否則便不能推翻貴族；要人民在除了資产階級还有貴族存在的国家里居于統治地位，是荒謬絕倫的事。艾希霍恩的国教顧問的这种論調，不值得我們提出郑重其事的理由来反駁。

有些先生以为，对人民采取一些残酷的措施，就可以挽救处境極其令人擔憂的普魯士君主制度；为了教訓这些先生，我們只想提出一些善意的意見。

对国王來說，一切政治因素中最危險的是人民。但不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所說的那种吃了拳头、得点小恩小惠就感动得流泪的人民，这种人民自然不危險，因為他們只存在于国王的想象中。而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貧民，正象霍布斯所說的，是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 一个结实而调皮的孩子；他不会讓国王(无论是羸瘦的还是肥胖的)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这种人民首先要向陛下要求有普选权的宪法, 要求結社自由、出版自由和其他令人不快的东西。

他們一得到这些, 就会充分加以利用, 以便尽快地表示他們对君主制的权力、威严和詩意的态度!

假如那时人民能給現在有資格充任王位的人一个在柏林手工业者联合会做朗誦員的职位, 年俸 250 塔勒和每天一杯啤酒, 那他應該認為是很幸运的了。

假如現在掌握普魯士君主制和“萊茵觀察家”的命运的国家教顧問先生們不相信这一点, 那就請他們什么时候請教一下历史吧。历史給那些向自己人民呼吁的国王所安排的还不如这样的命运。

英国的查理一世也曾抱怨自己的等級而向自己的人民呼吁。他曾号召自己的人民拿起武器反对議會。但人民却宣布自己反对国王, 把議會中不代表人民利益的議員赶了出去, 使因此而成为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的議會把国王斬首。这就是查理一世向人民呼吁的結局。这是 1649 年 1 月 30 日的事; 1849 年是这个事件的二百周年。

法国的路易十六也向自己的人民發出过呼吁。三年中間他不断地呼吁一部分人民去反对另一部分人民, 并到处寻找自己的人民, 真正的人民, 忠于他的人民, 但始終沒有找到。最后, 他终于在科布倫茨軍营和普奧軍隊的輜重車上找到了他們。但是他的法国人民覺得这种做法太过分了。1792 年 8 月 10 日, 人民把呼吁者关进了騰普尔監獄, 召集了在一切方面都是人民代表机关的国民公会。

这个国民公会认为自己有权审查前国王的呼吁，经过一番讨论，呼吁者被押到革命广场，并于1793年1月21日上了断头台。

这就是国王呼吁自己人民的结局。至于国教顾问想成立民主君主制的算盘会得到什么结果，我们不久就会看到。

卡·馬克思写于1847年9月5日

载于1847年9月12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7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弗·恩格斯

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⁸¹

一 卡尔·倍克“穷人之歌”[⊖], 或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詩歌

“穷人之歌”的第一首歌是献给一个富有的家族的。

致路特希尔德家族

为了避免误解, 诗人称上帝为“HERR”, 称路特希尔德家族为“Herr”^①。

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他所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认为黄金是“按照”路特希尔德的“脾气进行统治”的; 这种幻想引出了一系列关于路特希尔德家族的势力的荒诞想象。

诗人并没有威吓说, 要消灭路特希尔德的实际势力, 消灭作为这一势力的基础的社会关系; 他只是希望比较人道地来运用这一势力。他抱怨银行家不是社会主义博爱家, 不是幻想家, 不是人类的善士, 而仅仅是银行家而已。倍克歌颂胆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风

⊖ 倍克: “穷人之歌”, 1846年莱比锡版 (K. Beck. «Lieder vom armen Mann». Leipzig, 1846)。——编者注

① “Herr” 这个字有宗教意义的“主”, 也有一般的“老爷”、“主人”、“先生”等意思。——译者注

气。歌頌“穷人”，歌頌 *pauvre honteux* [耻于乞討的穷人]——怀着卑微的、虔誠的和互相矛盾的願望的人，歌頌各种各样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頌倔强的、叱咤風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倍克对路特希尔德家族大加威吓和責难，尽管作者的意圖是好的，但給讀者的印象却比一位卡普勤教士的說教^①还要滑稽可笑。所以会有这样的威吓和責难，是由于对路特希尔德家族的势力抱着幼稚的幻想，完全不了解这一势力和現存各种关系之間的联系，对路特希尔德家族为了成为一种势力并永远保存这种势力而必須使用的那些手段持有非常錯誤的見解。怯懦和愚蠢、妇人般的多情善感、可鄙的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气，这就是拨动詩人心弦的繆斯^②，她們竭力使自己显得威严可怕，然而却徒劳无益，只是显得可笑而已。她們压低嗓子唱出来的男低音經常嘶裂成可笑的尖声怪叫；在她們的戏剧性的描繪下恩澤拉德⁸²的伟大斗争变成了滑稽小丑的翻跟斗。

“黄金按照你的脾气統治

.....

啊，但願你的工作是这样美！但願
你的心象你的权力这样伟大！”（第4頁）

可惜，**权力**是路特希尔德的，而**心**却是我們的詩人的。“如果把它們融合在一起，对世界來說就太多了”（巴伐利亚的路德維希先生的話）⁸³。

第一个和路特希尔德相对立的当然是歌者本人，也就是住在

① 卡普勤教派是天主教聖芳济会的一支。“卡普勤教士的說教”充滿一本正經的道德教誨。——譯者注

② 希腊神話中司文学和艺术的女神，共九个。——譯者注

“高雅而神聖的閣樓”上的德国歌者。

“歌人們唱着歌曲彈着琵琶，
彈奏着正義、光明和自由，
彈奏着三位一体的真正的上帝：
注意傾聽的人們跟隨着
這些神靈。”(第5頁)

這位從“萊比錫總匯報”⁸⁴上的題詞中借來的“上帝”，單是由於自己的三位一體性，就不能對猶太人路特希爾德發生任何影響，而對德國青年倒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恢復了元氣的青春在召喚
.....
興奮的富有生機的種子
萌芽在千百個壯麗的名字里。”(第6頁)

路特希爾德對德國詩人的估計則與此不同：

“你把神靈們給我們的歌曲，
叫作對於榮譽和麵包的渴求。”

雖然青春在召喚並且出現了千百個壯麗的名字（它們的壯麗就在於它們只限於激發熱情而已），雖然“戰鬥的號角聲響得那樣雄壯”，“心又在夜里跳得如此猛烈。”——

“這個愚蠢的心，它感到
一種神靈授胎的苦痛。”(第7頁)

啊，這顆愚蠢的心，這個聖母馬利亞！雖然

“青年人，一個更為陰郁的掃羅^①”(見卡爾·倍克“掃羅”，1840年在萊比錫由恩格曼書店出版)，

① 掃羅——公元前11世紀時的以色列國王。他的臣仆大衛非常聰明勇敢，屢次戰敗非力士人。掃羅因嫉妬大衛的才能而變得陰郁冷酷。——譯者注

“怨恨上帝，也怨恨自己”。

尽管这样，路特希尔德仍然維持着武装起来的和平，而这种和平，在倍克看来，也只是以路特希尔德一个人作为凭借。

报纸上所刊载的关于神聖的教皇領地授予路特希尔德救世主勳章的消息，成了我們的詩人証明路特希尔德不是救世主的理由；同样，这个消息也可以成为証明基督虽是救世主但不是救世主勳章的荣膺者的理由，这一証明也是很有意思的。

“你是救世主嗎？”(第 11 頁)

于是他向路特希尔德証明，說路特希尔德并没有象基督一样在可怕的黑夜里战斗，說他从来没有

“为了伟大的**神灵**委托給你的
一个温和的、給人幸福的使命”(第 11 頁)，

牺牲过驕傲的人世間的势力。

应该責备伟大的**神灵**在挑选自己的传教士时沒有显示出神灵的伟大力量，并且在号召完成为人們造福的事业时找錯了对象。它的伟大仅仅在于字很大而已。

路特希尔德沒有能力充当救世主的角色，这可以用三个例子，即他对七月革命、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行为来对他做詳細的証明。

“瞧，法兰西英勇的兒女起来了”(第 12 頁)，

一句話，七月革命爆發了。

“你會否准备？你的黄金會否象
云雀鳴轉一般欢乐而美妙地鳴响
迎接那喚醒了大地的春天？
春天使深深地沉睡在我們胸中的

所有渴念的願望

又恢复青春,又得到生命。”(第12頁)

“喚醒了大地的春天是資產階級的春天,对資產階級來說,不言而喻,黃金(路特希尔德和任何其他人的黃金)就象云雀鳴囀一般欢乐而美妙地鳴响。不錯,复辟时期的那种不仅沉睡在人們的胸中、而且沉睡在烧炭党人的“温特”⁸⁵里的希望这时已恢复了青春,得到了生命,然而倍克的穷人却无动于衷。可是,一当路特希尔德确信新政府有牢固的基础时,他自然就毫不犹豫地讓他的云雀去为寻常的利息而歌唱。

倍克把拉菲特和路特希尔德对立起来,他对拉菲特的崇拜表明,他已經完全沉溺于小市民的幻想中:

“一所授予聖者称号的市民住宅

紧密地蔓延在你令人羡慕的厅堂”(第13頁),

这就是拉菲特的住宅。这位兴高采烈的小市民引以自豪的是他那路特希尔德的令人羡慕的厅堂相反的簡朴的市民住宅。他的理想,即他想象中的拉菲特,当然也应该生活在簡朴的市民环境里;拉菲特的大公館被縮小成德国市民的住宅。拉菲特本人被他看做一位德高望重的家长,心地純潔的大丈夫;他被拿来和穆西烏斯·賽沃拉⁸⁶相比,他似乎会牺牲自己的财产来推动人和本世紀(倍克指的不是巴黎的“世紀”⁸⁷吧?)[⊖]向前迈进。倍克称拉菲特为富于幻想的孩童,最后竟称他为乞丐。他的葬仪被描写得十分动人:

“馬賽曲在送殯的行列里

迈着抑制的步伐前进。”(第14頁)

⊖ 双关語:一家报纸的名称叫做“世紀报”(«Siècle»)。——編者注

和馬賽曲并排走着的是王室的車乘，緊跟着的是索澤先生、杜沙特爾先生和眾議院里所有的大腹便便和貪得無厭的吸血鬼。

在七月革命以後，當拉菲特意氣洋洋地把自己的“教父”[⊖]奧爾良公爵請進市政廳大廈，同時說出今後將由銀行家來統治了這種令人驚訝的話的時候，馬賽曲的步伐應該抑制到什麼樣的程度啊！

至於說到波蘭人，詩人只限于責備路特希爾德對僑民不夠慷慨而已。對路特希爾德的攻擊在這裡變成了小城市里流行的趣聞，而且在攻擊以路特希爾德為代表的金錢勢力時所打的幌子也完全喪失了。大家知道，資產者在他們所統治的任何地方對波蘭人都是非常客氣的，甚至是很熱情的。

下面就是表明這種譏語的一個例子：有一個波蘭人跑來哀求周濟，路特希爾德給了他一個銀幣，波蘭人

“接過來銀幣，快樂得發抖，
並且為你和你的子孫祝福。”

巴黎的波蘭委員會在此以前已經基本上使波蘭人擺脫了這種境況。而我們的詩人寫出波蘭人的這幅景象來，只不過是為了給自己的裝腔作勢尋找借口而已：

“但是我把這乞丐的幸福
鄙視地拋回你的錢袋里，
以被侮辱的人們的名義。”（第16頁）

要能夠這樣扔到錢袋里去，那就需要有投擲的高度技巧和豐富的經驗。最後，萬一有人控告倍克犯了侵犯人身的罪，他也可以

⊖ 原文是《kompère》，來自法文《compère》，《compère》有兩重意思，一是教父，一是陰謀、冒險的參與者。——編者注

化险为夷，因为他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人們的名义行动的。

路特希尔德接受了豪华的奥地利首都授予他的公民权利証書，他因这件事还在第9頁上就已遭到了責难，

“在那里，你的受迫害的教友
为他的阳光和他的空气付錢。”

倍克甚至以为路特希尔德获得了維也納的公民权利証書，也就获得了自由人的幸福。

現在，在第19頁上，他質問他：

“你解放了你自己的种族嗎，
这永久希望着、永久忍受着的种族？”

这样說来，路特希尔德應該成为犹太人的救星了。但是，他應該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犹太人把他奉为**大王**，因为他的錢最多。他應該教导他們鄙視金錢，“为了世界的幸福而擯弃它”。（第21頁）

他應該使他們忘記利己主义，忘記欺詐和高利盘剝的手段，一句話，他应当以一个披麻蒙灰劝人行善和懺悔的传教士的姿态出現。我們的詩人的这个大胆的要求无异于要求路易-菲力浦教导那些受七月革命养育的資产者废除私有制。假使路特希尔德和路易-菲力浦竟这样疯癲，那末他們的权力很快就会丧失，但是犹太人决不会不做买卖，資产者也决不会忘記私有制。

第24頁上倍克責备路特希尔德榨干了資产者的脂膏，好象不應該讓資产者的脂膏被榨干似的。

第25頁上說，路特希尔德带坏了君主們。难道他們不應該被带坏嗎？

我們已經充分地証明了，倍克把多么神奇的势力强加在路特

希尔德的身上。可是下面愈說愈 *crescendo* [夸大]。在第 26 頁上他沉溺于这样的幻想中：如果他（倍克）是太阳的所有者，那末他将能做许许多多事情，就是說，还不到太阳沒有他做主人时所能做到的事情的百分之一。在这以后，他突然想到，路特希尔德并不是唯一的罪人，除他以外还有其他許多富人。但

“你能說善辯地坐在講座上，
富人們在你的学校里學習；
你必須把他們引入人世，
你能够是他們的良心。
他們粗狂放縱——你寬容忍受，
他們傷風敗德——是你的罪孽！”（第 27 頁）

因此，只要路特希尔德先生稍有良心，他就完全可以阻止商业和工业的發展、竞争、财产的积聚、国債和投机倒把，簡言之，即可以阻止現代资产階級社会的發展。必須真正地具有 *toute la désolante naïveté de la poésie allemande* [德国詩歌的全部令人不能容忍的幼稚性]，才敢于刊登这样的童話。路特希尔德在这里变成了真正的阿拉丁^①。

倍克并不滿足于此，他賦予路特希尔德以

“伟大得令人眩暈的使命：
.....
減輕这个世界上全部的苦难。”

这样的使命就是全世界的資本家合在一起也絲毫不能完成。难道我們的詩人沒有看到，他愈想裝得高尚和有力，就愈变得可

① “一千零一夜”“神灯記”中的主人公，他由于得到了一盞神灯，便能做出許多神奇的事情。——譯者注

笑；难道他没有看到，他对路特希尔德的一切責难都变成了最无耻的阿諛奉承，他对路特希尔德的势力的歌頌，甚至連最善于吹拍的人都要甘拜下風。当路特希尔德看到，他这个渺小的人物在德国詩人的头脑中成了这样一个巨大的紙老虎的时候，他也禁不住要为自己鼓掌欢呼。

在我們的詩人給德国小市民对大資本家的势力所抱的无知而浪漫的幻想和对他的善良願望的信賴披上詩歌的外衣之后，在他由于意識到自己的伟大得令人眩暈的使命而令人眩暈地大事吹嘘关于这一势力的幻想之后，他对理想和现实相违背表示了小市民的憤慨，并且是那样慷慨激昂，甚至能把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信徒^①惹得捧腹大笑：

“我真痛苦，在漫漫长夜里(12月21日)^②

我用灼热的头脑思索这一切，

.....

于是我的鬃髮都**豎立**起来，

我觉得我好像扯动**上帝**的心，

象鐘手扯动救火的警鐘。”(第28頁)

对这个老头子說来，这确实是給他的棺材釘上最后一个釘子了。他認為，“历史的神灵”在这里授給了他一些絕對不容許泄露出来的思想。于是，最后他絕望地决定在自己的棺材里跳康康舞^③：

“可是总有一天在霉烂的尸布里，

我的尸骨将要快乐得發顫，

① 教友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新教派，17世紀产生于英国，后流行于北美。教友派信徒举止端方，道貌岸然，以沉默寡言著称。——譯者注

②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③ 法国的游艺場里的一种下流舞蹈。——譯者注

如果这个消息下降到我(尸骨)^①这里，
說供品在祭壇上冒烟。”(第29頁)

我开始有点怕卡尔这个孩子了。

路特希尔德家族之歌到这里本来可以結束了。但是按照現代抒情詩人的慣例，下面是一段关于这首歌和詩人在这首歌中所起的作用的押韵的結語。

“我知道，你有力的膀臂
能够把我打得鮮血淋淋。”(第30頁)

也就是說会打他五十棍。奥地利人是决不会忘記毒打的。在面临着这种危險的时刻，崇高的感情赋予他以勇气：

“正如上帝吩咐，并且毫不迟疑，
我坦白地歌唱着我的胸怀。”

德国詩人总是遵照命令歌唱的。当然，應該負責的是主子，而不是仆人，因此，路特希尔德應該去找上帝而不是找他的仆人倍克算賬。下面是現代抒情詩人慣用的方法：

- (1) 把他們似乎由于自己的无害的詩而遭到的危險加以夸大；
- (2) 挨了打以后，就把自己托付給上帝。

“致路特希尔德家族”这一支歌的結尾是一些吹嘘这首歌的話，关于这首歌，作者自欺欺人地說：

“它自由而驕傲，它可以支配你，
可以告訴你說，它發誓相信什么。”(第32頁)

就是說，發誓相信那恰好在这几句結語中表現出来的自我完善。但是，我們耽心路特希尔德会去控告倍克的这个虛伪的誓言而不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去追究他的詩歌。

啊，願您能把黃金的天恩普照世人！

詩人号召富人帮助穷人，

直到勤劳为你的老婆孩子
获得一笔更为安穩的財富。

这全都是为了

你能够永久善良，
永久是一个公民、一个男人，

就是說 *summa summarum* [归根到底] 是个善良的小市民[⊖]。于是倍克便回到自己的理想中去了。

男仆和女仆

詩人歌頌两个使上帝高兴的灵魂，如象詩中極其乏味地描写的那樣，他們只是在經過了許多年省吃俭用和循規蹈矩的生活以后，才终于純潔地爬上了夫妇的臥床。

他們接吻？他們羞羞答答！他們調笑？他們小声小气！
啊！花朵的确是花朵，可是花朵开在冰里；
一个拄着拐杖的舞蹈！一只可怜的、迟暮的飞蛾，
一半兒是个神采煥發的兒童，一半兒是个衰頹的老者。

作者并不以全篇詩中絕无仅有的这一段佳作作为結束，在这以后他还讓他們为一份小小的財產，为“在自己的爐灶周围出现了自己的家具”而欢欣若狂，而高兴得發抖。說这句话时并没有带着

⊖ 俏皮話：德文中《Bürger》的意思是“公民”，《Mann》的意思是“男人”；《Bürgersmann》的意思却是“小市民”。——編者注

諷刺的口吻，而是感激零涕，淚下如雨。但這還沒有完：

只有上帝是他們的主人，天黑了，他命令星星發光，
他用慈祥的目光觀看打碎了鎖鏈的奴仆。

這樣一來，任何一點鋒芒都幸運地被消除了。膽怯和沒有信心經常箝制着倍克，驅使他把每首詩拉長到不可收拾的境地，使他在沒有用多情善感證明自己的全部庸俗性以前收不了場。他大概故意選擇了克萊斯特的六步韻詩體來使讀者陷入煩惱不堪的境地，就象一對戀人在長久的實驗時期內由於自己的膽怯的道德觀念而煩惱不堪一樣。

猶太舊貨商

在對猶太舊貨商的描寫中，可以看到下面這樣一些幼稚可笑的地方：

這個星期飛逝了，這個星期
只把五天供給你的勤勞。
你這喘不過氣來的人，趕快吧，
去掙得你每天的酬報。
星期六父親不願意工作，
星期天兒子不願意干活。

但是，在下面倍克便完全陷到自由主義的青年德意志派⁸⁸關於猶太人的空談中去了。詩在這裡消聲匿跡，一無踪影，仿佛聽到了患着癩癧病的薩克森等級院中的患癩癧病的發言：你不能成為手工藝人，不能作“小商販的頭目”，不能當莊稼漢，也不能當教授，但是醫學的大門對你敞開着。這用詩表現出來就是這樣：

他們不准你做手工藝活，
他們不給你一塊田地。

你也不能向青年們講話
 从一个教师的高高的靠垫上

 你可以在乡間給病人治病。

照这样，难道不可以用詩来写普魯士法典或把巴伐利亚的路德維希先生的詩譜成歌曲嗎？

犹太人給他兒子朗誦了下面的詩句：

你必須营謀，必須夺取，
 永久貪求产业和金錢，

接着他又安慰他說：

可是你永久是正直的。

罗 累 萊^①

这个罗累萊无非是黄金罢了。

卑鄙以巨大的波浪
 涌进內心的純潔，
 淹死每一个幸福安宁。

在这个內心純潔的洪流中，在这个幸福安宁的被淹死中，包含着庸俗和夸大的令人沮喪的混合物。接着就是責罵金錢可耻和不道德的庸俗冗长的臭詩。

它(愛)^②追求金銀，追求寶石，
 而不追求心和同心的靈魂

① 德国神話傳說中的一个美丽的女神，常在萊茵河滨以其歌声引誘水手使船触礁。——譯者注

②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以及一間小小的茅屋。

假如金錢的作用仅限于搞丑德国人对心和同心的灵魂以及席勒式的小小的茅屋（其中有足供一对幸福的恋人居住的地方）的追求，那末早就应当承認它具有革命的作用了。

战鼓之歌

在这首诗中，我們的社会主义詩人又一次表明，他由于已陷入德国小市民的鄙俗風气中，就总是把他給人留下的那点微弱的印象破坏了。

一团队伍在战鼓声中出發了。人民号召兵士和他們一起参加共同的事业。令人兴奋的是，詩人终于鼓起了勇气。但是很可惜，最后我們才了解到，这里所談的仅仅是皇帝的命名日和人民的呼唤，而这个呼唤也不过是一个参加典礼的青年（也許是个中学生）偷偷地作下的一首幻想的即兴詩：

一个青年这样做梦，火烧着他的心。

情节大致相同的同样的題材，在海涅的笔下会变成对德国人的極辛辣的諷刺；而在倍克那里仅仅成了对于把自己和无力地沉溺于幻想的青年人看做同一个人的詩人本身的諷刺。在海涅那里，市民的幻想被故意捧到高空，是为了再故意把它們抛到现实的地面。而在倍克那里，詩人自己同这种幻想一起翱翔，自然，当他跌落到现实世界上的时候，同样是要受伤的。前者以自己的大胆激起了市民的憤怒，后者則因自己和市民意气相投而使市民感到慰借。不过，布拉格的起义⁸⁹使他有机会来描写和这种滑稽剧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东西。

移 民

我从树干上折下枝条，
看林人就走去报告，
主人把我捆得紧紧，
給我打出来这个伤痕。

所缺少的只是看林人的报告沒有用这样的詩写出来。

假 腿

詩人本想叙述故事，但是却失敗得实在悲惨。整本書中所表現出来的这种对叙述和描写的完全无能为力，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詩篇的特征。“真正的社会主义”由于本身模糊不定，不可能把要叙述的事实同一般的环境联系起来，并从而使这些事实中所包含的一切特出的和意味深长的方面显露出来。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散文中也極力避免叙述故事。在他們无法規避的时候，他們不是滿足于按哲学結構組織一番，就是枯燥无味地記錄个别的不幸事件和社会現象。而他們所有的人，無論是散文家或者是詩人，都缺乏一种講故事的人所必需的才能，这是由于他們的整个世界观模糊不定的緣故。

馬 鈴 薯

根据“曙光，曙光！”的曲調写成

神聖的面包，
你为了我們的苦难，
你为了蒼天的原故
曾經来到人世，解救人民——
再見吧，你如今是死了！

在第二段里他把馬鈴薯称为

——这点小小的残余，
从伊甸园里遺留給我們的，

并且这样来描写馬鈴薯的病症：

瘟疫在天使們中間猖狂！

在第三段里倍克劝穷人穿上丧衣：

貧穷的人！
到那里去，披上丧衣，
你現在已經完全定了罪，
啊，你最后的东西消灭了，
哭吧，假若还能够哭泣！

你忧伤的祖国，
你的上帝死臥在沙土里，
可是讓人向你說句安慰的話：
沒有一个救世主被人打死，
他不能又重新复活！

能哭的和詩人一起放声哭吧。假如詩人不是象他的穷人缺乏好馬鈴薯那样缺乏精力，他会因为能够喝到去年秋天用馬鈴薯（这个資產階級的上帝、現存資產階級社会的柱石之一）做的飲料而高兴。德国的地主和資產者会允許在教堂中唱这首詩，这对他們是毫无損失的。

倍克这样卖力，他理应戴上馬鈴薯花編的花冠。

老 处 女

我們不来仔細分析这首詩，因为它长得簡直沒有个完，一共扯

了90頁，枯燥無味得簡直難以形容。在文明國家里多半只是在名義上還存在的老處女，在德國卻是一種重大的“社會現象”。

社會主義的揚揚得意的議論的一種司空見慣的手法，就是唱這樣的高調：從另一方面來看，只要沒有窮人，那就會萬事如意了。這種議論可以被應用到任何對象上去。它的真正內容就是在慈善掩飾下的偽善的小市民的庸俗氣，它完全同意現存社會的正面，使它悲痛的是，除了正面外，還存在着反面——貧窮；這種庸俗氣已和現代社會融為一體，而它的唯一的希望就是現代社會繼續存在下去，但是不要它存在的條件。

倍克常常以極端庸俗的形式在自己的詩中重複這種議論，例如，關於聖誕節他寫道：

啊時代，你慈祥地啓迪人心，
你會更為慈祥，加倍的可親——
如果在那個窮孩子的胸中
沒有嫉妒用它原始的罪惡
瘋狂地褻瀆神靈，
當他無家可歸向着闊孩子們的
節日盛裝的室內觀看的時刻！
是啊……
……在聖誕夜的燈光下
孩子們的歡呼我聽來更會甜美，
如果沒有窮人在潮濕的洞穴
躺在腐爛的草席上挨凍受罪。

不過，在這首無定形的、長得沒有個完的詩里，間或也有一些寫得好的地方，例如，對流氓無產者的描寫：

是誰天天地孜孜不息，
在傳染病疫的陰溝里翻垃圾；

是誰象麻雀一般追求食糧，
是誰補鍋鑼磨剪子磨刀，
是誰僵凍着手指漿洗衣裳，
是誰喘吁吁推着一車重載，
裝着些半生不熟的果子，
苦苦地喊着：誰買，誰買？
是誰為一個銅錢在泥土里打架；
是誰天天靠着街角的石壁
歌頌他所信仰的上帝，
幾乎不敢伸出手來，
因為行乞不被允許；
是誰雙耳聾聵忍受飢寒，
彈着豎琴，吹着笛簫，
在所有的窗前，在每個門旁——
一年又一年奏着同一的曲調——
引起看管兒童的阿姨舞蹈，
這個曲子自己却不能聽到；
是誰在夜里使大的城市明亮，
自己在家里却没有一點燈光；
是誰負着重担，是誰劈着木柴，
是誰失掉主人，誰受盡主人的虐待；
是誰又祈禱、又搓合男女、又偷盜，
酗酒把良心的殘余消磨盡了。

倍克在這裡第一次超出了德國市民的一般道德水平，借一個老乞丐的口誦出了這些詩句。這個老乞丐的女兒請求父親允許她去赴一個軍官的約會。在上面這些詩句里，老乞丐向他的女兒描畫出她的孩子將列身於其中的那些階級的充滿痛苦的景象，並且直接以她生存的環境為根據把他自己反對的意思表示出來，不過並沒有（這一點是不能不承認的）向她作道德的說教。

不要偷窃

一个俄国人的道德高尚的仆人（仆人自己把这个俄国人叫做善良的老爷）为了接济他的年迈的父亲，在夜里偷了他那个似乎在打瞌睡的主人的錢。这个俄国人悄悄地跟在他后面，从背后偷看了仆人写给他父亲的信，信的内容如下：

你收下这点錢！是我偷来的！
父亲，你向救世主祈祷吧，
求他将来从他的宝座上
对我的罪給以赦免！
我要多多工作而且挣錢，
从草席上赶走睡眠，
直到我能够給我善良的主人
补偿上这笔偷盗了的錢。

这个道德高尚的仆人的善良的老爷被这个吓人的自白感动得一句话也說不出来，他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仆人的头上，为他祝福。

但是这是一个死尸——
在恐怖中他的心都裂开了。

还有誰能写出比这更滑稽可笑的东西来嗎？倍克在这里降到了科采布和伊夫兰特的水平以下；这出仆人的悲剧比市僧的悲剧更胜一筹。

新的神灵和旧的痛苦

这首诗嘲笑（往往很中肯）的是隆格、“光明之友”⁹⁰、新一代犹太人、理髮师、洗衣妇、抱有温和的自由思想的萊比錫市民。最后，

詩人在庸人面前替自己辯白，因為他們將要因這一點而控告他，雖然他

在風暴和黑夜里唱出了
這首光明的歌。

然後他講述了一篇用社會主義的詞句修飾過的、以特殊的自然神論為基礎的、關於博愛和實踐宗教的教義，從而把自己的敵人的一種性質和他們的另一種性質對立起來。這樣一來，倍克就怎麼也收不了場，直到他再次斷送自己為止，因為他自己已深深地陷到德國的鄙俗風氣中，並且過多地考慮自己，考慮沉溺於自己詩中的詩人。我們的詩人在現代抒情詩人眼中又成了一個把自己打扮得奇奇怪怪的、妄自尊大的人物。他不是在現實世界中生活和創作詩歌的活動著的人，而是一個飄浮在雲霧中的“詩人”，但這些雲霧不過是德國市民的蒙矓的幻想罷了。倍克經常由極度誇張的高談闊論轉到干巴巴的小市民的散文，從一種向現狀開火的小幽默轉到和現狀實行感傷的和解。他常常忽然發覺他自己原來就是 *de quo fabula narratur* [所講到的那個人]。因此，他的詩歌所起的並不是革命的作用，而是

“止血用的
三包沸騰散”(第 293 頁)。

所以，用下面這樣一些表示恭順的無力的悲嘆作為整本書的結尾，是很合適的：

什麼時候在這世界上，
啊上帝，會變得協調？
在渴望上我是雙重地愉快，
在忍耐上我是雙重地疲勞。

倍克无疑地比德国文壇上的大多数小卒具有更大的才能和更多的天賦的精力。他的唯一的不幸就是德国人的鄙俗气，他那装模做样的哭哭泣泣的社会主义和青年德意志派的影响，是这种鄙俗气在理論上的表现。在社会矛盾还没有因为阶级的明确分化和资产阶级迅速夺取政权而在德国采取较尖锐的形式以前，德国诗人在德国本部是根本没有出路的。一方面，他在德国社会中不可能以革命的姿态出现，因为革命分子本身还太微弱；另一方面，由四面八方包围着他的长期存在的鄙俗气起着使他衰弱无力的作用，他即使能够暂时超越它，摆脱它和嘲笑它，可是过一会却又重新跌进它的陷阱里面去了。对于一切多少有些才能的德国诗人暂时还只能有一个劝告，即搬到文明的国家去住。

二 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論歌德”

1846年达姆斯塔德版[⊖]

格律恩先生被他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書弄得疲憊不堪，現在他把目光投向自己祖国的社会停滞，想借此休息一下。为了丰富多采，他决定这一次“从人的观点”来看一下歌德老人。他脫下了七哩靴^①，穿上了拖鞋，披上了睡衣，躺在安乐椅上悠然自得地伸着懶腰：

“我們不是写注释，我們只是看一看近在手边的东西。”(第244頁)

他把房里安排得非常舒适：

“我把玫瑰和茶花放在自己房里，把木犀草和三色堇放在打开的窗口。”(第III頁)“先不做任何注释！……但是在这里，桌上放着一部全集，房間里飄蕩着玫瑰花和木犀草的微香！看吧，看我們將前进得多远……只有騙子才会拿出多于自己所有的东西。”(第IV, V頁)

格律恩先生虽然 nonchalance [粗心大意]，但在这本書中却建立了丰功伟績。不过當我們听到了他自己的話之后，我們对这一点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他說，他是一个“因社会关系和私人关系的空虛而感到絕望”(第III頁)的人，当他“有埋沒于过分和杂乱无章之中的危險的时候，他就感到了歌德对他的羈絆”(同一頁)，他

⊖ K. Grün. «Über Goethe vom menschlichen Standpunkte». Darmstadt, 1846. ——編者注

① 德国童話中巨人之靴，相傳能渡海騰云，瞬息即达。——譯者注

具有“屬於我們灵魂的那种人的使命的崇高感情,为了这一点就是入地獄也在所不惜”(第 IV 頁)! 我們知道了,还在很早以前他就“一度向費尔巴哈的‘人’問过一个問題”,虽然这个問題“很容易回答”,但对于上述的“人”來說却显然还是非常困难的(第 277 頁); 我們看到了,格律恩先生在第 198 頁上怎样“使自我意識摆脱了困境”,在第 102 頁上他怎样甚至希望到“俄国皇帝的宫廷”里去,而在第 305 頁上怎样雷鳴般地向全世界宣告:“誰想借助法律来建立一个必須长久存在的新秩序,誰就應該被詛咒!”——當我們知道了这一切之后,就再也沒有有什么能使我们感到惊奇的了。当格律恩先生在第 187 頁上打算“嗅一下唯心主义”,并且把它“变为街头流浪兒”的时候,当他再三考虑如何才能“成为所有者”,“富人,富裕的所有者,以便有可能交納稅金,取得选入人的議会和列入对人和非人的問題做出决定的陪審員名册的权利”的时候,我們对任何事情都泰然处之了。

既然他立足于“全人类的无名的基础”之上(第 182 頁),难道他还做不到这一点嗎? 就是“黑夜和黑夜里的可怕的事情”(第 312 頁),如謀杀、通奸、盜窃、卖淫、放蕩以及由傲慢而产生的恶習也吓不倒他。誠然,他在第 99 頁上承認,他已經“在人突然發現自己空虛的时候感到无限的痛苦”。誠然,由于下面这句话,他也在公众面前“突然發現自己空虛”:

与你相近的是你能了解的精灵,
不是我! 91

事情是这样的:

“在这些字眼里仿佛雷电交加,山崩地裂。在这些字眼里,神殿前的帷幕撕裂了,坟墓裂开了……神的末日和远古的混沌世界来到了……星辰又互相

撞击，彗星唯一的尾巴刹那间焚毁了小小的地球，于是所剩下的就只是一片烟云雾海。即使想象出最可怕的破坏……同隐藏在这几个字眼里的破坏力比较起来，简直就算不了什么！”（第 235, 236 页）

固然，当格律恩先生到达“理论的边缘”的时候，特别是在第 295 页上，他的“背上就象有好多股冰水在奔流，使他混身上下毛骨悚然”。但是，他完全战胜了这一切，因为他到底是“伟大的人类共济会”（第 317 页）的会员啊！

Take it all in all[⊖]。格律恩先生有了这样的品质，在任何活动中都将取得胜利。在谈到他的关于歌德的大有成效的论断之前，我们先同他一起来巡视一下他的活动的几个次要的方面。

首先来看看自然科学方面，因为“对自然界的认识”，照第 247 页上所說，是“唯一实际的科学”，同时“也是人道的（vulgo [简言之] 人的）^①人完善化的表现”。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格律恩先生关于这一唯一实际的科学所告诉我们的一切实际的东西。诚然，他在这里没有详细地谈论这一科学，而只是在暮色朦胧的房中踱来踱去的时候，慢吞吞地吐出了几句话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他“也”是在制造着“最实际的”奇迹。

关于被认为是霍尔巴赫写的“自然体系”⁹²一书，他发现：

“在这里无法了解，自然体系是怎样突然中止的，是怎样突然中止在自由和自决应当从神经系统的必然性中冲出来的那一点上的。”（第 70 页）

格律恩先生可以非常准确地指出这个或那个“从神经系统的必然性中冲出来”因而使人的脑袋里面也挨揍的那一点。关于至

⊖ 整个说来，他就是如此（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的改写）。——编者注

①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今尚未受到注視的那一点，即关于头脑中意識的生产过程，格律恩先生可以提供最准确最詳細的知識。但是，很可惜！在从人的观点論歌德的这本书中，“这一点是决不会得到闡明的”。

杜馬、普萊費尔、法拉第、李比希至今还天真地坚持这样的意見：氧是无臭无味的气体。然而格律恩先生知道，一切酸性的东西都是会刺激舌头的，所以在第 75 頁上宣布“氧”是“有刺激性的”。同样，他在第 229 頁上用新的事实来丰富声学 and 光学：他在那里造出“能使物体淨化的音响和光照”，于是他就确定声和光的淨化力是无可置疑的。

格律恩先生并不满足于对“唯一实际的科学”所做的这些輝煌的貢獻，不满足于脑袋里面挨揍的理論，他在第 94 頁上發現了一根新的骨头：“維特是个沒有脊椎骨的、尚未成为主体的人。”到現在为止，人有两打以上的脊椎骨这种錯誤的見解一直占居統治的地位。現在格律恩先生不仅把这許多骨头簡化为标准单位，而且發現这个仅有的脊椎骨有一种能使人成为“主体”的奇妙的特性。“主体”——格律恩先生——理应由于这一發現而获得一个特殊的脊椎骨。

我們这位逢場作戏的自然科学家最后把他的关于自然界的“唯一实际的科学”做了如下的概括：

“难道自然界的核心

不是存在于人的心里嗎？⁹³

自然界的核心存在于人的心里。人心里存在着自然界的核心。自然界在人的心里有自己的核心。”(第 250 頁)

經格律恩先生的許可，我們做个补充：人的心里存在着自然界的核心。在心里存在着人的自然界的核心。在人心里自然界有自

己的核心。

在自然科学方面我們就談到这个卓越的“实际的”說明为止。現在来談談政治經濟学，可惜，根据上面所說的来看，它不是“实际的科学”。格律恩先生很瞧不起这門科学，不过就是在这里，他的行动虽然是在碰运气，然而还是非常“实际的”。

“个人反对个人，于是就产生了普遍竞争”。(第 211 頁)

这就是說，德国社会主义者关于“普遍竞争”的模糊而玄妙的观念一产生，“于是就产生了竞争”。在这里論据无疑地是不需要的，因为政治經濟学并不是实际的科学。

“金錢在中世紀还受到忠、爱、誠等的約束；16世紀打碎了这些枷鎖，金錢就获得了自由。”(第 241 頁)

麦克庫洛赫和布朗基过去一直陷于一种謬誤，認為金錢“在中世紀受到約束”，是由于沒有通往美洲的交通綫和花崗岩層把“金錢”的矿脉封閉在安第斯山脉中的緣故。如今麦克庫洛赫和布朗基将贊成給格律恩先生致賀詞，以感謝他的这一發現。

历史学也不是“实际的科学”，而格律恩先生却企圖賦予它以实际的性質，把他自己想象中的一系列事实拿来同传统的事实相对立。

在第 91 頁上，“艾迪森的卡托在維特前一百零一年就在英国的舞台上用匕首自杀了”，可見他表現出了多么惊人的厭世情緒。原来他自“杀”的时候，他的生于 1672 年的作者还是个嬰兒呢⁹⁴。

在第 175 頁上格律恩先生給歌德的日記做了修正，他指出在 1815 年德国各邦政府並沒有“宣布”出版自由，而不过是“允許”而已。这样看来，騷爱尔兰德的和和其他地方的庸人們告訴我們 1815

到 1819 年這四個有出版自由的年頭里所發生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他們的丑事和丑行怎樣全被報刊公布于世，以及最後 1819 年的聯邦決議⁹⁵ 怎樣結束了這種公開的恐怖行動，這一切都不過是一場夢而已。

其次，格律恩先生告訴我們說，自由的帝國城市^① 法蘭克福根本不是一個國家，而“只是市民社會的一部分”（第 19 頁）。而且在德意志境內決沒有什麼國家存在，因此，人們現在終於開始“愈來愈明白這種德意志無國家性的獨特的好處”（第 257 頁）；這首先就是十分容易挨打的好處。這樣說來，德意志的專制君主們就可以說：«la société civile, c'est moi» [“市民社會就是我”]，可是他們的情況還是很糟的，因為照第 101 頁上所說，市民社會只是一個“抽象”而已。

德意志人雖然沒有國家，但他們卻有着“巨額的真理的票據，並且這張票據一定能兌現，支取，變成硬幣”（第 5 頁）。毫無疑問，這張票據是可以在格律恩先生交納“稅金，取得選入人的議會的權利”的那個賬房裏支取的。

我們看到了關於法國革命的極其重要的“實際的”說明，談到這一革命的“意義”，作者離開了本題，而發表另外一種“獨特的言論”。他開頭就說出一句神諭：歷史的法和以理性為基礎的法之間的对立是有重大意義的，因為二者都是有歷史根源的。我們決不想稍微低估格律恩先生的又新鮮又重要的發現——以理性為基礎的法是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的意義，我們只想簡單地指出，在寂靜的房間里同畢舍的“議會史”⁹⁶ 的頭几卷進行的無聲的談話，

① 見本卷第 52 頁腳注。——譯者注

应当会告诉他这种对立在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

然而，格律恩先生宁愿详细地向我们证明革命的无用，这种证明最后就归结为一种绝无仅有的、但却是非常严重的责难：革命“没有研究‘人’这个概念”。这样的粗枝大叶真是不可饶恕。假如革命研究了“人”这个概念，那就既不会有热月9日的事件，也不会有雾月十八日的事件了⁹⁷。拿破仑也会满足于将军的官衔，也许在晚年还会“从人的观点”写出一本军队勤务条令来。其次，从关于“革命的意义”的说明中我们知道了，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基本上没有差别，并且也知道了为什么没有差别。这使我们可以满意地确信，格律恩先生还没有完全忘记他的黑格尔。例如，请对照一下黑格尔的“哲学史”第三编第二版第458、459、463页⁹⁸。其次，还是为了说明“革命的意义”，很详细地谈到了竞争（最主要的地方我们已经在前面叙述过了），然后为了证明他所说的犯罪是国家存在的结果，又从霍尔巴赫的著作中做了长篇的引证；同样又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摘录了大量的话来说明“革命的意义”，而关于这本书又解释说，这本书有先见之明，在1516年就极其精确地描绘了正好是“今天的英国”（第225页）。在整整的三十六页上东拉西扯地谈完了这一切见解和论断之后，终于在第226页上下了最后的判词：“革命就是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实现。”这真是对所有一切还没有研究过“人”这个概念的人们敲起的一声警钟！

为了安慰除马基雅弗利主义之外就一无所得的可怜的法国人，在第73页上格律恩先生给他们吃了一粒宽心丸：

“18世纪的法国人民是各族人民中的普罗米修斯，他用人权来对抗神权。”

这样说来，“‘人’这个概念”就应该是被“研究”过的了，而人权

也不是同神權，而是同國王、貴族和僧侶的權利“相對立”，關於這些我們不打算多加考慮，這些都是小事情，不必管它，我們感到十分沉痛的是，在這裡格律恩先生本人犯了“人的”毛病。

這就是格律恩先生忘記了，在他的比較早期的著作里（例如，請參看“萊茵年鑑”第一卷中所載的論“社會運動”的文章⁹⁹及其他等等），他不僅廣泛地闡述了“德法年鑑”中關於人權的著名論斷¹⁰⁰，使它“通俗化”，而且甚至以道地的剽竊者的熱心加以誇張，把它變成了荒謬的東西。他忘記了，他在那裡咒罵過人權，說它是小商人、小市民等等的權利，而現在卻突然把它們變成了“人的權利”，變成了“人”所固有的權利。在第 251 和 252 頁上格律恩先生也犯了同樣的毛病，他把從“浮士德”中抄襲來的“可惜誰也不肯照管的我們的天賦人權”變成了“你的自然權，你的人權，從內心決定自己的行動和享受自己的成果的權利”，雖然歌德把這個權利直接同“象惡病樣遺傳的法律和制度”¹⁰¹對立起來，即同 *ancien régime* [舊制度] 的傳統的權利對立起來，而同後者相對立的只是“天賦的、不以時效為轉移的、不可讓渡的人權”，即革命所宣布的人權，而絕不是“人”所固有的權利。這一次格律恩先生當然應當把過去所寫的東西忘掉，以便使歌德不失去人的觀點。

不過格律恩先生還沒有完全忘記他從“德法年鑑”和其他同一傾向的著作中所學到的東西。例如，在第 210 頁上他給當時的法國的自由下了一個定義，說它是“擺脫不自由的(!)普遍的(!!)本質(!!!)”。這個怪物顯然是在把“德法年鑑”第 204 和 205 頁翻譯成現代德國社會主義者的習慣用語時，從這幾頁上的“**共同體**”[⊖] 這

⊖ 俏皮話；德文中《*allgemeine Wesen*》意即“普遍的本質”；《*Unwesen*》意即“怪物”；《*Gemeinwesen*》意即“共同體”。——編者注

一字¹⁰²产生出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通常有一个习惯，当他们遇到一个他们所不懂的论断的时候（因为这个论断与哲学无关，所包含的是一些法律、经济及其他等等的术语），他们就立刻把它压缩成一句简短的、用哲学术语装饰起来的句子，并且把这种胡话背得滚瓜烂熟，以备随时应用。正因为如此，“德法年鉴”上的法的“共同体”就变成了上述的哲学上毫无意义的“普遍的本质”；“摆脱不自由的普遍的本质”这句话成了政治解放即民主在哲学上的简短公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可以把这一公式放到口袋里去，而不用再耽心学问对自己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了。同样，在第二XXVI页上格律恩先生利用了“神圣家族”中关于感觉论和唯物主义所说的话¹⁰³，并且利用这本著作中所指出来的一点，即在上世纪的唯物主义者那里，特别是在霍尔巴赫那里可以找到和现代的社会主义运动相合之点，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引用上述的霍尔巴赫的话，并且给这些话加上社会主义的解释。

现在来谈谈哲学。格律恩先生非常瞧不起它。还在第VII页上他就对我们说，他“今后要同宗教、哲学和政治分道扬镳了”，它们全都是“过时的东西，并且在一度解体之后就一蹶不振了”，又说，在它们里面，特别是在哲学里面，他“所要保存下来的仅仅是人和能够进行社会活动的社会本质”。因此，虽然我们因宗教、哲学和政治的一蹶不振的没落而悲伤，但这个能够进行社会活动的社会本质和上述的人的人无论如何是足以安慰我们的了。但是格律恩先生是非常温和的。他不但从哲学中“保存了人道的人”和各式各样的“本质”，而且还是一个获得了黑格尔的大量的、虽然是杂乱无章的遗产的幸运儿。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要知道，还在几年前他就不止一次地拜倒在黑格尔的半身像面前了。也许

有人會請求我們不要涉及這些可笑的丟人的 *personalia* [私事]，但是格律恩先生自己卻把這一秘密在報刊上透露了。這一次我們將不指出是在哪裏。我們已經再三向格律恩先生指明了他的論點的出處，甚至还指明了章節，因此我們可以要求格律恩先生也那樣為我們效一下勞，哪怕是一次也好。為了再一次證明我們願意為他效勞，我們要告訴他一個秘密，就是他在第 8 頁上所援引的對意志自由這個引起爭論的問題的最後解答，是從傅立葉的“論協作”中論意志自由那一章¹⁰⁴里借來的。只有認為關於意志自由的理論是“德國精神的謬誤”這種見解，才是格律恩先生本人獨有的“謬誤”。

最後，我們就要談到歌德。在第 15 頁上格律恩先生證明歌德有存在的權利。歌德和席勒是“沒有行動的享樂”和“沒有享樂的行動”即維蘭特和克洛普什托克之間對立的解決。“萊辛第一個使人依靠自身”（格律恩先生會不會跟着他玩一下這個把式呢？）。在這個哲學結構中我們立刻就發現了格律恩先生的一切論點的出處。結構的形式，總體的基础，這是眾所周知的黑格爾調和對立的方法。“依靠自身的人”，這是把黑格爾的術語應用於費爾巴哈。“沒有行動的享樂”和“沒有享樂的行動”（即對立，格律恩先生使得維蘭特和克洛普什托克就這個對立演奏了上述的變奏曲），是從莫·赫斯的文集中借來的。我們所沒有發現的唯一的出處是文學史本身，因為它與上面所引的那些廢話毫不相干，所以格律恩先生完全有理由對它置之不理。

因為我們正好談到席勒，所以最恰當還是引用格律恩先生的一句話：“席勒可以成為一切，就是不能成為歌德。”（第 311 頁）對不起，不是也可以成為格律恩先生嗎？不過我們的作者在這裡是

把巴伐利亚的路德維希的桂冠据为己有了：

羅馬，你缺乏的，那不勒斯有，那不勒斯缺乏的，正好你有；
假使你們两个城联合在一起，对于大地就是太多了。

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現是由这个历史結構安排好了的。萊辛使之“依靠自身的人”只有在歌德的笔下才能完成进一步的进化。在歌德身上發現“人”的功劳正是應該归于格律恩先生的，但这个人不是男人和女人所生的、自然的、生气蓬勃、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在更高意义上的人，辯証的人，是提炼出聖父、聖子和聖灵的坩鍋中的 *caput mortuum*[⊖]，是“浮士德”中的侏儒的 *cousin germain* [堂兄弟]，总之，不是歌德所說的人，而是格律恩先生所說的“人”。但是格律恩先生所說的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歌德身上除了人的內容外沒有別的內容。”(第 XVI 頁)在第 XXI 頁上我們看到，“歌德把人想象和描写成我們今天所希望实现的那样。”在第 XXII 頁上：“歌德在今天(他的著作也是如此)是人类的真正法典。”歌德就是“完美的人性”。(第 XXV 頁)“歌德的詩篇是 (!) 人类社会的理想。”(第 12 頁)“歌德不能成为民族的詩人，因为他的使命是作人的詩人。”(第 25 頁)尽管如此，在第 14 頁上“我国人民”即德国人仍然應該把歌德“看成自己本身的变态的本質”。

这里我們看到关于“人的本質”的第一个說明，我們完全可以信賴格律恩先生，相信他对“‘人’这个概念”毫無疑問地是有过極其深刻的“研究”的。歌德把“人”描写成格律恩先生所希望实现的那样，同时还描写了变态的德国人民，因此，“人”不外是“变态的德国人”。这是到处都可以得到証实的。正如歌德“不是民族的詩

⊖ 原意是：“骷髏”；轉意是：无用的残渣，經過加高热、化学反应等等之后所剩下的废物。——編者注

人”而是“人的詩人”一样，德国人民也“不是民族的”人民而是“人的”人民。因此，在第 XVI 頁上我們讀到：“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歌德的詩篇……过去和現在都和现实沒有任何共同之处。”“人”也是这样，德国人也是这样。而在第 4 頁上：“直到現在法国的社会主义还只是希望替法国造福；而德国的作家却面对着全人类。”（可是“人类”在大多数場合下却不是用“面”而是用身体上离面相当远并且与面相反的部分“对着”德国的作家）格律恩先生对于歌德希望“从內部把人解放出来”这一点在許多地方也都表现出自己的喜悦（例如見第 225 頁），但是这个純粹德国人的解放却仍然是“一場空”。

那末，我們現在就来談談这第一个說明：“人”就是“变态的”德国人。

我們来看一看格律恩先生根据什么認為歌德是“人的詩人”，認為“歌德身上有人的內容”。这种承認将極清楚地告訴我們，誰是格律恩先生所說的“人”。我們將看到，正如格律恩先生平常为了想竭力大声压倒自己所有的伙伴而常常向世界說出了其他弟兄們宁肯閉口不談的东西一样，他在这里泄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隱秘的思想。由于歌德自己时常在比較夸张的意义上使用“人”和“人的”这些字眼，格律恩先生就輕而易举地把歌德变成了“人的詩人”。歌德使用这些字眼自然仅仅是指当时的人們以及后来的黑格尔所使用的那种意义而言，那时，“人的”这个詞主要是用在同异教的和基督教的野蛮人相对立的希腊人身上，是指远在費尔巴哈赋予这些術語以神秘的哲学內容之前所使用的那种意义而言。这些字眼，特別是在歌德那里，大多具有一种完全非哲学的、肉体的意义。把歌德变成費尔巴哈的弟子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的功劳，是全部属于格律恩先生的。

关于歌德本人我们当然无法在这里详谈。我们要注意的只有一点。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象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问题不仅仅在于，歌德承认德国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视的另一一些方面。这常常不过是他的各种情绪的表现而已；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象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

境地，而且愈到晚年，這個偉大的詩人就愈是 *de guerre lasse* [疲于鬥爭]，愈是向平庸的魏瑪大臣讓步。我們並不象白爾尼和門采爾那樣責備歌德不是自由主義者，我們是嫌他有時居然是個庸人；我們並不是責備他沒有熱心爭取德國的自由，而是嫌他由於對當代一切偉大的歷史浪潮所產生的庸人的恐懼心理而犧牲了自己有時從心底出現的較正確的美感；我們並不是責備他做過宮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侖清掃德國這個龐大的奧吉亞斯的牛圈^①的時候，竟能鄭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宮廷做些毫無意義的事情和尋找 *menus plaisirs*^②。我們決不是從道德的、黨派的觀點來責備歌德，而只是從美學和歷史的觀點來責備他；我們並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來衡量他。我們在這裡不可能結合着他的整個時代、他的文學前輩和同代人來描寫他，也不能從他的發展上和結合着他的社會地位來描寫他。因此，我們僅限於純粹敘述事實而已。

我們將看到，就上述哪一方面來說，歌德的著作是“人類的真正法典”，是“完美的人性”，是“人類社會的理想”。

我們首先來談談歌德對現存社會的批判，然後再來談對“人類社會的理想”的實際的描述。顯然，由於格律恩先生這部書的內容很豐富，我們在這兩方面都只能引述一些最獨特最出色的地方。

歌德作為社會的批判家實際上是在製造奇蹟。他“詛咒文明”（第34—36頁），他時常發出一些浪漫的怨言，說文明抹殺了人的一切特點和個性。他在“普羅米修斯”里 *tout bonnement* [簡明地]

① 希臘神話中奧吉亞斯王的巨大的極其骯髒的牛圈。意思是指極端骯髒的地方。——譯者注

② 原意是：“小小的樂趣”；轉意是：花在各類怪癖上的額外費用。——編者注

描写了私有制的起源，从而“預告了資產階級世界的来临”（第 78 頁）。他（在第 229 頁上）是“世界的审判官……文明的米諾斯^①”。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小事情而已。

在第 253 頁上格律恩先生引証“教义問答講授”：

孩子，想一想，你的礼物都是从哪里来的？
你不能够从你自己那里得来。——
唉，一切都是从爸爸那里。
爸爸又从哪里得来？——从祖父那里。
可是祖父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他是搶来的。

好啊！格律恩先生放开嗓子喊道，*la propriété c'est le vol*〔财产就是盗窃〕——这才是真正的蒲魯东！

勒維烈可以带着他的行星回家，并且把他的勳章讓給格律恩先生了，因为我們在这里看到了比勒維烈的發現，甚至比杰克逊的發現和二乙醚蒸气的發現更伟大的东西。誰把蒲魯东使許多安乐的資產者不安的关于盗窃的話和上述歌德的不伤害人的諷刺短詩混为一談，誰就應該荣膺荣誉軍团大十字勳章。^②

“市民將軍”惹出的麻煩就更大了。格律恩先生把他从各方面打量了一番，破例地紧鎖双眉，疑虑地說：“当然……十分无味……革命在这里并未受到指責”（第 150 頁）……且住！他終於發現了这里所談的是什麼問題！是关于一瓶牛奶的問題。因此：“不要忘記……这仍然是……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的財產問題。”（第 151 頁）

当格律恩先生住的街上有两个老太婆为了一个咸鯪魚头而爭

① 希腊神話中冥府的审判官。——譯者注

② 拿破侖戰爭中，授予作战有功的軍官、將軍和元帥的勳章。——譯者注

吵起来时，請格律恩先生不辞辛勞，从他的“飄蕩着玫瑰花和木犀草的徽香”的樓房里走下来，向她們說，她們所涉及的也是“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的財產問題”。一切善意的人的感謝就是对他的最好的報酬。

歌德写成了“維特”，是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績。“維特”絕不象那些“从人的观点”来讀歌德的人至今所想的那样，是一部平凡的感伤的爱情小說。

在“維特”里，“人的內容給自己找到了如此恰当的形式，簡直无法在世界上任何一部作品里找到哪怕是稍微可以和它媲美的东西。”（第96頁）“維特对綠蒂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激情的汎神論的悲剧的杠杆和体现……維特是个没有脊椎骨的、尚未成为主体的人。”（第93、94頁）維特的自杀不是为了恋爱問題，而是“因为他（倒霉的汎神論的意識）无法弄清自己和世界的相互关系”。（第94頁）“在‘維特’这本书里，用艺术的手法揭露了社会的一切腐敗現象，指出了社会弊病的最深刻的根源，它們的宗教哲学基础（大家知道，这个“基础”的产生要比“弊病”晚得多）^①以及和它們同时出現的認識上的模糊不清……关于真正人性的純正、清晰的概念（不过首先是脊椎骨，格律恩先生，脊椎骨！）^②，也就是那种鄙俗气，即那种被称为日常生活的周身被蠹蝕了的秩序的死亡。”

这就是在“維特”里用艺术手法揭露“社会的腐敗現象”的范例。維特写道：

“奇聞异事？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愚蠢的字眼？……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的虛伪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奇聞异事，这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¹⁰⁵

富于幻想的好哭泣者对橫跨在市民的现实和自己对这个现实所抱的同样是市民的幻想之間的鴻沟所發出的这种絕望的哀号，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这些完全由于缺乏起碼的經驗而發出的悲嘆，格律恩先生在第 84 頁上硬把它們說成对社会的一种尖銳而深刻的批判。格律恩先生甚至硬說，上述引文里所表現出的“生活的无限痛苦，这种想把一切顛倒过来，以便使它們（哪怕是一次也好）改头換面（！）的病态要求，归根到底給自己敷設了法国革命的軌道”。革命在前面被看做馬基雅弗利主义的实现，而在这里却仅仅变成了少年維特的煩惱的实现。在革命的廣場上树起的断头台原来不过是維特的手槍的可怜的摹制品。

此后我們就用不着惊奇：歌德在“斯苔拉”中，如第 108 頁上所說的那樣，也研究了“社会的材料”，虽然在这部著作中只描繪了“極其可怜的情况”（第 107 頁）。“真正的社会主义”无所不在，簡直賽过我們的主耶穌。只要那里有两三人聚集在一起（虽然决不是因它而聚集起来的），它就出現在那里，并且硬說那里有“社会的材料”。就象它的信徒格律恩先生一样，它同“那种庸俗而又自滿的、什么都要过問却什么也不懂得的、无孔不入的人”（第 47 頁）是相似得頗为惊人的。

我們的讀者也許还記得威廉·麦斯特給他姐夫写的一封信（“修业时代”的最后一卷），他在信中說了些关于生长在富貴人家的优越性等十分庸俗的話之后，承認貴族对小市民的优势地位，確認小市民及其他一切非貴族階級的不平权的地位在最近期間是不应改变的。只有个别的人在一定情况下才有可能上升到貴族的水平。关于这一点格律恩先生說：

“如果把社会的上層階級和有教養的階級看作同一的东西，那末歌德所說的关于上層階級的优势地位的話，無疑是正确的，而歌德也正是这样做的。”（第 264 頁）

这方面的問題就談到这里为止。

现在来談一下引起那么多議論的一个基本問題，即歌德对政治和法国革命的态度問題。在这里，格律恩先生的这部書可以告訴我們，什么是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就在这里，格律恩先生表現了他的赤胆忠心。

要証明歌德对革命的态度是正当的，歌德自然就應該站在革命之上，應該还在革命爆發之前就制止它。因此，早在第XXI頁上我們就已經看到，“歌德远远地超过了他的时代的实际發展，因而照他自己的看法，他只能对它采取否定的态度，只能擯弃它。”在第84頁上，在談到我們已經看到的那个蘊蓄着 in nuce [处于萌芽时期的]整个革命的“維特”的时候，作者写道：“历史处于1789年，而歌德則已处于1889年。”同样，在第28和29頁上，格律恩先生迫使歌德“用不多的几句话彻底清除了所有关于自由的喊叫”，其根据是早在70年代歌德就已在“法兰克福学术通报”¹⁰³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根本沒有談到“空喊家”所要求的自由，而只是說了一些关于自由本身、关于自由这个概念本身的一般的十分平凡的話。其次，由于歌德在自己的博士論文中提出了每个立法者都有做一种礼拜的义务的論点（歌德本人把这个論点只看做法兰克福僧侶們的粗鄙的对罵所引起的一种滑稽可笑的怪論，而格律恩先生自己却引証了这点），因此就說，“大学生时代的歌德已經把革命的和当代法国的整个二重性当做穿破了的鞋底扔掉了”（第26、27頁）。显然，格律恩先生繼承了“大学生时代的歌德的穿破了的鞋底”，并且把它們釘在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七哩靴上。

不用說，歌德关于革命的言論我們到現在才完全清楚了。現在我們才明白，高高地站在革命之上的歌德，在革命前十五年就

“清除了”革命并把它“当做穿破了的鞋底扔掉”的歌德，超过了革命整整一个世纪的歌德，是不能同情革命的，是不能关心他在1773年就已与之绝交了的“空喊自由的”人民的。现在格律恩先生什么困难也没有了。让歌德随意地给老一套的传统智慧穿上二行诗的华美的外衣吧，让他去用庸俗短浅的眼光论证它吧，让他在威胁着他那和平的诗人幽居生活的巨大冰流面前体验一下小市民的恐惧吧，让他表现出浅薄、怯懦和下贱吧，——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的耐心的注释者发火。格律恩先生把他举在自己的不知疲倦的肩上，扛着他走过泥潭；不仅如此，他认为踩踏泥潭的事全都由“真正的社会主义”来效力，只要不弄脏歌德的鞋子就行。从“法兰西之战”到“私生女”，格律恩先生毫无例外地把一切都承担在自己的肩上（第133—170页），表现出高度的忠诚，甚至可以使毕舍这种人都感动得流泪。但是当一切都徒劳无益的时候，当泥潭太大的时候，就拿出一套高超的社会性的解释，于是格律恩先生就来解释下面的诗句：

法国的可悲的命运，大人物们要加以考虑，
但是说真的，小人物们更要多多地考虑。
大人物们消逝了；可是谁来保护群众
抵抗群众？这时群众是群众的暴君。¹⁰⁷

“谁来保护？”——格律恩先生竭尽全力地叫喊道，同时加上着重号，打上问号，还求助于一切“激情的泛神论的悲剧的体现”。“也就是说，谁将保护无产的群众即所谓平民以抵抗有产的群众，抵抗立法的平民呢！”（第137页）“也就是说，谁将保护”歌德以抵抗格律恩先生呢？

格律恩先生就是这样逐一解释“威尼斯警句”中所有非常明智

的市民的教誨的。在他看来这些教誨“是海格立斯^①的巨掌打的耳光，而它們的声音只是在現在（在小市民沒有危險之后）^②我們才覺得是那样地悅耳，因为我們已經有了伟大而苦痛的（对于小市民無疑是非常苦痛的）^③經驗”。（第 136 頁）

在“美茵茲的被困”中格律恩先生

“無論如何也不願忽略以下的地方：‘星期二……我匆匆地去……向……我的君主請安，同时我很榮幸地侍奉了亲王……我的殿下’”等等。

至于歌德把自己的忠誠讓普魯士国王[⊖]的近侍、皮条匠、戴綠帽子的里茨先生肆意踐踏的地方，格律恩先生却認為是不便引証的。

关于“市民將軍”和“流亡者”我們看到：

“歌德經常用詩的形式表現出来的对革命的全部反感，是由于这些永无止境的痛苦而引起的，是由于他看到人們光明磊落地掙来的和光明磊落地获得的地产被陰謀者、嫉妒者……所霸占而自己却被赶出来而引起的，是由于这种搶劫的非正义性而引起的……他的善于持家的爱和平的天性由于所有权的被侵害而被激怒了，这种侵害是用专橫的手段造成的，它使大批的人流离失所，陷入貧困。”（第 151 頁）

这里无須做任何評述，讓文責由“人”来自負吧，他的“爱和平的和善于持家的天性”在“光明磊落地掙来的和光明磊落地获得的（簡單地說，就是正当得来的）^④地产”中間感到那样的舒适，竟使他把 sans façon〔毫不客气地〕扫蕩了这些地产的革命風暴宣布为“专橫”，宣布为“陰謀者、嫉妒者”等等的勾当。

① 古希腊神話中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半神半人的英雄。——譯者注

② ③ ④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編者注

在讀了上面那段話之后，我們就再不会奇怪，为什么市民的牧歌“赫曼与竇綠苔”和它的胆小而精明的小城市居民、它的由于極端害怕长褲汉軍隊^①和战争灾祸而哭哭啼啼地四散奔逃的农民，竟喚起了格律恩先生的“最純正的快感”（第165頁）。格律恩先生

“甚至心安理得地滿足于最終……落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狹隘的使命：
繼續这种駭人听闻的騷乱，跟着人东奔西闖，
这样的态度和我們德意志人有点不相象。”¹⁰⁸

对苦难时代的牺牲者洒下同情之泪，因这些命运的打击而怀着爱国的絕望仰求蒼天，格律恩先生这样做是对的。要知道，本来就有不少腐化墮落的人，他們的胸膛里跳动着的是“人的”心，他們宁願在共和派陣营里随声应唱“馬賽曲”，甚至在竇綠苔的被遺弃的小屋子里开些猥褻的玩笑。象黑格尔这种人是那样冷酷无情地看待被历史的暴風雨摧残了的“宁靜的花朵”，是那样冷酷无情地嘲笑那些为“反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及其完成者”而發出的“对謙逊、恭順、仁愛和慈善等私德的枯燥无味的抱怨”¹⁰⁹，对这种冷酷无情格律恩先生是很恼恨的，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这样做是对的。他将在天堂里受到应得的奖賞。

我們用下面的話来結束“人”对革命的解釋：“真正的小丑会認为国民公会本身是極其可笑的”；而在还没有找到这个“真正的小丑”之前，格律恩先生在这方面同时給了我們一些必要的指示（第151和152頁）。

^① 长褲汉（法文 sans-culottes 是不穿短褲的意思）是18世紀法国資產阶级革命时貴族对革命者、共和党人所起的綽号，因为他們和穿天鵝絨短褲的貴族不同，穿的是粗布作的长褲。长褲汉軍隊就是指当时法国的革命的軍隊。——譯者注

关于歌德在革命以后对政治的态度，格律恩先生又給了我們一些令人惊奇的解释。在这里只举出一个例子。我們已經知道，“人”的胸中对自由主义者怀着多么深的敌意。“人的詩人”在沒有同自由主义者彻底划清界限之前，在沒有給韦尔凱尔、伊茨施泰因及其伙伴們留下一定的訓示之前，当然是不能进坟墓的。我們这位“自滿的无孔不入的人”在“温和的諷刺詩”中的下面一些詩句里找到了这一訓示(見第 319 頁)：

这只不过是旧日的污秽，
你們要变得更聪明！
若要永久不踩这块地方，
你們就繼續前行！

歌德發表了这样一种見解：“沒有什么比**多数**更討厭的了，因为它是由少数有力的首領、一些随机应变的騙子、被同化的弱者，以及尾随在他們后面的、完全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人群所組成的。”¹¹⁰这种見解实在庸俗，它的特点是仅仅在德国这样的小国家里才能有的无知和近視，但在格律恩先生看来，它竟是“对最近的(即当代的)^①法制国家的批判”。这一批判的重要性，可以“在，例如，任何一个众議院里”得到确証(第 268 頁)。这样看来，法国众議院之“腹”¹¹¹只是由于无知才那样深切地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同类。在几頁以后(第 271 頁)就会看到“七月革命”在格律恩先生看来原来是“命定了的”，而早在第 34 頁上关税同盟就已經受到严厉的指責，因为它“为了稍事加强王座(!!)的支柱，即加强自由主义的金融巨头們的势力(大家知道，在一切关税同盟国家里，自由主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义的金融巨头是同“王座”敌对的),而使得赤身露体的受冻者用以遮盖自己的赤身裸体的破衣褴衫更加昂贵”。大家知道,当问题涉及反对保护关税或资产阶级某种别的进步措施的时候,德国小市民总是把“赤身露体的受冻者”提在前头,而“人”也附和小市民的意见。

关于“人的本质”,歌德对社会和国家的批判通过格律恩先生的介绍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解释呢?

首先,照第 264 页上的说法,“人”对于“有教养的阶层”总是怀着深厚的敬意,对于上层贵族更是毕恭毕敬。其次,他的特点是极端畏惧一切巨大的群众运动、一切强大的社会运动;当运动迫近时,他不是胆怯地躲在火炉背后,就是急忙卷起铺盖溜之大吉。当运动在进行的时候,它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苦痛的经验”;但是运动刚一过去,他就从容不迫地站在舞台前面,用海格立斯的巨掌打耳光(这些耳光的声音只是现在他才感到那样的悦耳),并且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极其可笑的”。同时他全神贯注在“光明磊落地挣来的和光明磊落地获得的地产”上面,此外,他具有非常“善于持家的爱和平的天性”;他谦逊,知足,希望不要有什么暴风雨来打扰他享受他那微小的宁静的乐趣。“人是乐意生活在狭隘的环境里的”(第 191 页;这是“第二部分”的第一句话);他什么人也不羡慕,只要让他安静地生活,他就谢天谢地。一句话,这个“人”(我们已经知道,他是道地的德国人)渐渐和德国的小市民一模一样了。

歌德对社会的批判通过格律恩先生的转述实际上变成了什么呢?“人”认为应该归罪于社会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社会不符合于他的幻想。而这些幻想恰恰是那些喜欢空想的小市民的幻想,尤其是年轻的小市民的幻想。如果小市民的现实不符合这些

幻想，那不過是因為幻想只是幻想而已。然而，這些幻想本身卻更加符合小市民的現實。這些幻想和現實的不同只不過象空想中的某一狀態和這一狀態本身的不同一樣，因而今後也就談不上使它變為現實了。格律恩先生對“維特”的解釋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令人信服的例子。

其次，“人”所攻擊的是一切威脅德國小市民制度的東西。他對革命的全部攻擊就是小市民的攻擊。他對自由主義者、對七月革命、對保護關稅的憎恨極明顯地表現出受壓制的保守的小資產階級對獨立的進步的資產階級的憎恨。現在再舉兩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大家知道，小市民階層的興盛是和行會制度分不開的。在第40頁上格律恩先生以歌德的即“人”的精神說道：“在中世紀，同業公會把一個強者同其他強者聯合起來，從而給前者以保護。”在“人”看來，當時參加行會的市民都是“強者”。

但是行會制度在歌德的時代已經處於衰落狀態，競爭已經從四面八方侵入了。歌德這個真正的小市民在他的回憶錄中的一個地方（格律恩先生在第88頁上引証了這個地方），對正在開始的小市民階層的分化、富裕家庭的沒落、由此而引起的家庭生活的瓦解、家庭紐帶的鬆弛以及在文明國家里受到應有的卑視的其他各種市民的不幸，傾瀉出令人心碎的哀鳴。格律恩先生在這個地方看出了對當代社會的卓越批判，他喜不自勝，竟把這段引文里的全部“人的內容”加上着重號刊印了出來。

現在我們來看看歌德身上的實際的“人的內容”。我們現在可以前進得快一些，因為我們已經找到了“人”的足跡。

首先必須指出一個令人高興的發現：“威廉·麥斯特從父母家

里逃出”，“爱格蒙特”里的“布鲁塞尔市民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特权”，都不过是为了“成为人”，而不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第 XVII 頁）。

格律恩先生在蒲鲁东的道路上已经抓住了歌德老人一次。在第 320 頁上他幸运地又一次抓住了他！

“他所希望的，我們大家所希望的，就是拯救我們的个性，就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关于这一点歌德說道：

为什么却在最新的世界里
无政府状态是这样中我的心意？
每个人随心所欲地过活，
这也就是我的得获……”¹¹²

格律恩先生简直高兴得有些飘飘然了，因为在歌德那里也能找到由蒲鲁东首创并为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热烈接受的这个真正“人的”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然而这一次他失算了。歌德在这里說的是已经存在的“在最新的世界里的无政府状态”，它“是”他的得获，每个人都可以依据它随心所欲地生活，也就是說，他所說的是那种由于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解体、由于资产阶级兴起和有教养的阶级的社会生活中的宗法制度被废弃而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独立性。就是从語法上来推究，这里也談不上格律恩先生所心爱的将来的无政府状态（更高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歌德在这里談的根本不是“他所希望的”东西，而是他所發現的东西。

但是，这一点小小的失策算不了什么。我們还可以举出“财产”这首詩来。

我知道，归我所有的，
只是从我的灵魂里
自然流露的思想，

以及良善的命运，
使我彻底享受的
每个幸福的瞬間。

如果看不到，在这首诗里“迄今存在的财产正在象烟一般地消失”（第 320 頁），那末格律恩先生的理解力就完全不起作用了。

不过，讓格律恩先生的这些細小瑣碎的注释游戏去他的吧。它們实在多得不可胜数，而且一个比一个离奇。我們最好还是再来仔細瞧一下“人”吧。

我們已經听到，“人是乐意生活在狹隘的环境里的”。小市民也是如此。

“歌德的最初的一些作品都帶有純粹社会的(即人的)①性質……歌德珍視最靠近身边的、最不引人注意的、最舒适的东西。”（第 88 頁）

我們在人身上發現的第一件实际的东西，就是他的“最不引人注意的、最舒适的”、平靜的小市民生活中的乐趣。

格律恩先生概述歌德的話：“如果我們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地方，能够安安靜靜地生活和占有自己的财产，能够有足以供养我們的田地，能够有栖身之所，难道那里不就是我們的祖国嗎？”

于是格律恩先生就大声喊道：

“难道这些话不正是确切地表达出了我們今天的期望嗎？”（第 32 頁）

“人”无疑是穿着 à la propriétaire [有产者式样的]大礼服，但同时却暴露出自己是個道地的小市民。

誰都知道，德国市民只是在青年时代曾經迷戀过一會兒自由。“人”也有同样的特点。格律恩先生滿意地指出，歌德在晚年“咀咒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过”那早在“葛兹”这部“放蕩不羈的少年人的著作”里就已迸發出的“对自由的向往”，他甚至 in extenso [詳尽地] 引証了歌德的怯懦的否認(第 43 頁)。格律恩先生所謂的自由是什么，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他在这里把法国革命所宣布的自由和歌德在瑞士旅行期間的瑞士人的自由，即把現代的立宪民主的自由和中世紀帝国城市里的貴族和行会的統治，甚至和阿尔卑斯山游牧部落的古日尔曼人的粗野看做同一个东西。伯尔尼高原上的山岳人同国民公会里的山岳派[⊖]就是从名字上来看也毫无区别！

可敬的市民是一切輕佻和瀆神行为的大敌。“人”也是如此。作为真正市民的歌德既然在各个地方都談到这一点，那末在格律恩先生看来，这就是“歌德的人的内容”。为了使讀者确信这一点，格律恩先生不但收集这些珍珠，而且在第 62 頁上把他自己的某些宝貴啓示也补充上去，例如，“瀆神者……都是草包和蠢貨”等等。这使他的心即“人”和市民的心感到无上的光荣。

市民离了“心爱的君主”，离了亲爱的国父，就不能生活。“人”也是如此。因此，連歌德(在第 129 頁上)也把卡尔-奥古斯特視為“卓越的国王”。而英武的格律恩先生在 1846 年还热中于“卓越的国王”呢！

每个事件，只要直接涉及市民的私人生活，市民对它都感兴趣。

“甚至日常的事件，在歌德看来，都成为对他的市民的舒适不有害就有利的外在的对象；它們能够引起他的美学方面的或人的兴趣，但絕不是政治的兴趣。”(第 20 頁)

⊖ 双关語：德文中«montagnards»这个字的原意是“山民”；同时又用来称呼 18 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山岳派，即雅各宾党人。——編者注

“因此，”一當格律恩先生發現，某一事物“對他的市民的舒適不有害就有利”，他“就對這一事物感到人的興趣”。格律恩先生在這裡極其直率地承認，市民的舒適對於“人”是最主要的東西。

關於“浮士德”和“威廉·麥斯特”，格律恩先生寫了專門的章節。我們先來看看“浮士德”。

在第 116 頁上我們看到：

“歌德只是靠發現了植物結構的秘密”，他才“能夠創造出浮士德，他的人道的人”（毫無辦法規避“人的人”）。“要知道，浮士德同樣……也是靠自然科學才登上自己本性（！）的頂峰的。”

我們已經有過這樣的例子：“人道的人”格律恩先生也是“靠自然科學才登上自己本性的頂峰的”。顯然，他的天性就是如此。

其次，我們在第 231 頁上看到，第一場里的“獸的骨架和人的骨頭”意味着“我們全部生活的抽象”，而格律恩先生總是把“浮士德”看成聖約翰的啓示錄。大宇宙意味着“黑格爾哲學”，而這個哲學在歌德寫這一場的時候（1806 年），也許還只存在於黑格爾的頭腦中，至多是在黑格爾當時正在寫作的“現象學”手稿中罷了。然而，年代同“人的內容”有什麼相干呢？

在第 240 頁上，格律恩先生也不深入地研究一下就把“浮士德”第二部里對日趨沒落的神聖羅馬帝國的描繪看做對路易十四王朝的描繪，而且他還補充說，“因此我們自然而然地就有了憲法和共和國。”當然，別人必須經過艱苦的勞動才能得到的一切東西，“人”是“自然而然地”就有了的。

在第 246 頁上格律恩先生告訴我們，“浮士德”的第二部從它的自然科學方面來看，“是當代的經典，正如但丁的‘神曲’曾是中世紀的經典一樣”。我們把這個意見介紹給那些到現在為止還沒

有从“浮士德”第二部里得到很多收获的自然科学研究者们，介绍给那些从前在这个佛罗伦萨人的渗透了保皇党人¹¹³的党派精神的诗篇里看到了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经典”的东西的历史学家们！看来，格律恩先生是用歌德用来看自己的过去的那双眼睛（据第49页）来看历史的：“在意大利歌德是用贝尔韦德的阿波罗^①的眼睛来看自己的过去的”，可是，pour comble de malheur（非常不幸），这双眼睛是没有眼球的。

威廉·麦斯特是个“共产主义者”，就是说“在理论上是以美学观点为基础的（!!）”（第254页）。

“他把事业建立在虚无上面，
于是便大胆地占有了世界。”¹¹⁴（第257页）

当然，他有足够的金钱来占有世界，就象任何资产者占有世界一样，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根本用不着努力把自己变为一个“以美学观点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者”。威廉·麦斯特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虚无”上面，而且这个“虚无”，如第256页上所說的，还是十分广阔和内容丰富的，——在这样的“虚无”的庇护之下，就可以避免醉后头痛这种不愉快的事情。格律恩先生“喝干所有的酒杯也不会发生任何不良的后果，也不会头痛”。对于今后可以偷偷地酗酒而不受惩罚的“人”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了。为了将实现这一切的那个时候，格律恩先生今天就发现，“我把事业建立在虚无上面”这首诗，是“真正的人”的真正的餽宴之歌；“这支歌在人类把自己安排得配得上唱它的时候将被歌唱”。于是格律恩先生把它缩短成三节，并且删去了所有不适合于青年和“人”的地方。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艺术的保护者，预言之神，转意是美男子的意思。贝尔韦德是宫殿的名称。——译者注

歌德在“威廉·麥斯特”里確立了

“人類社會的理想”。“人不是教育人的本質，而是活着、行動着並且起着作用的本質。”“威廉·麥斯特就是這樣的人。”“人的本質就是活動”（這個本質是人和一切跳蚤所共有的東西）（第 257、258、261 頁）。

最後來談談“亲和力”。格律恩先生使這部本來就是說教性的小說更加充滿了說教的气味，因而幾乎使我們以為，他給自己規定了一個任務，要把“亲和力”推薦為女子中學適用的教科書。格律恩先生解釋道：歌德

“把戀愛和結婚區別開來，而且區別是在於：戀愛對於他是結婚的探求，而結婚則是獲得了的、完成了的戀愛”（第 286 頁）。

因此，照這樣說來，戀愛就是“獲得了的戀愛”的探求。其次，這就是說，在“青年戀愛自由”之後，作為“戀愛的最終結合”的結婚就一定會到來（第 287 頁）。在文明國家里恰好就是這樣，賢明的家長為了給兒子以後能找到一個門當戶對的妻子來“最終結合”，先讓他尽情地放蕩幾年。但是在文明國家里早就不把這種“最終結合”看做道德上的約束，恰恰相反，在那里丈夫擁有情婦，而妻子則給丈夫戴綠帽子作為報復，於是小市民又來搭救格律恩先生了：

“如果人有真正自由的選擇權……如果兩個人的結合是建立在雙方理性的意志上的（在這裡，關於情欲，關於血和肉連提都沒有提）^①，那就需要有一種瀟灑公子的人生觀，才能象歌德那樣，把這一結合的破壞看做小事情，而不是看做十分痛苦和不幸的事情。然而說歌德放蕩是根本談不上的。”（第 288 頁）

這個地方充分說明了格律恩先生有時對道德所做的羞羞答答的攻擊。小市民深信，對待青年人應該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況且最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放蕩的青年人后来都会成为最模范的丈夫。但如果他們在結婚之后还犯什么过失，那时就不能再寬恕他們，怜悯他們了，因为要这样做就“需要有浪蕩公子的人生觀”。

“浪蕩公子的人生觀！”“放蕩！”“人”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我們看到，他把手放在胸口，带着愉快和驕傲的感情大声喊道：不，我一点也不輕佻，一点也不“荒淫和放蕩”，我从来没有蓄意破坏任何人的平靜的家庭生活的幸福，我总是忠誠和正直的，从来没有在朋友的妻子身上打过主意，我不是“浪蕩公子”！

“人”說得对。他不是为了勾引漂亮女人而被創造出来的，他从来没有起过勾引妇女和破坏夫妻間的忠实的念头，他不是“浪蕩公子”，而是有良心的人，是正直和善良的德国小市民。他是

“……一个性情温和的小商人，
在商店里边抽着他的烟袋；
他怕他的老婆和她傲慢的声音；
他讓她在家里統治着一切，
最微小的指使他也默默听从。
他就这样忍辱、挨打而滿足地生活。

（帕尔尼《Goddam》^①第三首歌）

最后我們还要說明一点。如果我們在上面只是从一个方面观察了歌德，那末这完全是格律恩先生的罪过。他絲毫沒有描写歌德伟大的一面。对于歌德的一切确实伟大的和天才的地方，例如，“浪蕩公子”歌德的“羅馬哀歌”，格律恩先生不是匆匆地一閃而过，就是滔滔不絕地說一通言之无物的廢話。但是他却以他少有的勤

^① 《Goddam》是法国詩人帕尔尼的一部著作的名字，原著是用法文写的。Goddam 这个字是英文的感嘆詞，有“該死！”、“天杀的！”等等意思；在法国被用做帶有諷刺意味的英国人的綽号。——譯者注

勉去搜罗一切庸俗的、一切小市民的、一切瑣屑的东西，把所有这些收集在一起，用真正文学家的笔法加以夸张，并且每当他有可能利用歌德的权威，而且还常常是被歪曲了的歌德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狭隘性的时候，他就兴高采烈起来。

歌德每次和历史面对面时就背弃它，历史为此而給歌德的报复，并不是門采尔的叫罵和白尔尼的狭隘的辯駁。不是的，正如

蒂姐妮亚在仙宮，
發現在波頓的怀抱里，115

歌德也一度發現在格律恩先生的怀抱里。格律恩先生的辯解，他对歌德的每一句庸俗的言語所嘟嘟囔囔地說出来的感激不尽的話，这才是被侮辱的历史所能給予最伟大的德国詩人的最残酷的报复。

不过格律恩先生“死可瞑目，因为他沒有玷污做人这个使命。”
(第 248 頁)

弗·恩格斯写于 1846 年底—1847 年初
載于 1847 年 9 月 12 和 16 日，11 月
21、25 和 28 日，12 月 2、5 和 9 日
“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第 73、74、
93、94、95、96、97 和 98 各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德意志—
布魯塞尔报”

弗·恩格斯 經濟學家會議

大家知道，这里有些律師、官吏、醫生、食利者、商人等之類的人，他們在保衛自由貿易協會（與巴黎的組織類似）的招牌下相互講授政治經濟學的起碼知識。上個星期的最後三天，這些先生們走起運來了。他們召集了各國最偉大的經濟學家，舉行了一個偉大的會議。他們感到真是無法形容的高興，現在已經不是聽什麼茹爾·巴泰爾斯先生、勒·阿爾迪·德·博利約、法德爾即費德爾[⊖]或者其他不知名之士講經濟方面的道理了，現在是聽科學大師們親自講解了。他們真幸福，真高興，真走運，真是飄飄然了。

可是科學大師本身却很不走運。他們本以為鬥爭將很輕鬆，但實際上鬥爭對他們來說却很嚴酷；他們本以為，他們一來，一交鋒，就會取得勝利，但實際上，他們只是在投票時取得了勝利，在爭論的時候，第二天就被徹底打垮，第三天只是由於進行了幕後活動才避免了新的更徹底的失敗。假如他們那些為幸福所陶醉的聽眾沒有發覺這一切，那他們自己是應該深切地感到這一點的。

我們參加了這個會議。從前我們對這些科學大師也沒有特殊敬仰過，他們的學識主要表現在他們之間總是心安理得地相互矛

[⊖] 俏皮話：Fader（法德爾）是《fade》（“暗淡”、“庸俗”）一字來的；Faider（費德爾）是經濟學家會議一個與會者的姓。——編者注

盾和自相矛盾。有些人的高論(無論是書面和口頭的)我們并不很熟悉,因而對他們還可能有一定的敬意,但應該承認,在這次會議以後,我們連一點敬意都沒有了。老實說,我們惊奇的是,這次我們竟不得不聽這麼多庸俗荒唐的言論,這麼多舉世皆知的陳詞濫調。老實說,我們沒有想到,除了政治經濟學的初步道理而外,科學大師竟沒有提出一點新東西;這些初步道理,七八歲的孩子也許會感到新鮮,但對成年人特別是保衛自由貿易協會的成員來說,無論如何都應該是熟知的了。但這些先生是比我們更加了解自己的聽眾的。

這次會議上表現得最好的是英國人。他們和這次會議的利害關係最大;开辟大陸市場,他們很同意;自由貿易是他們的切身問題。他們非常明顯地証明了這一點:除了英文,他們在其他任何情況下從來都不用別的文字講話,而在这里,為了自己心愛的 free-trade [自由貿易],却甘願用法文發言。這就明顯的說明,這件事是多麼有力地觸動了他們的錢袋。法國人以抽象的思想家和有學識的幻想家的姿態發了言。他們一次也沒有顯示出法國人的機智和思想的新奇。但至少他們講的法文很漂亮,這種法文在布魯塞爾是難得聽到的。荷蘭人的發言很枯燥,說教似的。丹麥人大衛先生的發言根本無法理解。比利時人所起的作用應當說是消極聽眾的作用,頂多也只是象該國的工業那樣,只能模仿別人。最后是德國人,他們之中除了與其說以德國人不如說以英國人的身份發言的維爾特外,成了整個會議的 *partie honteuse* [污點]。在這方面,他們本來可以得到第一把交椅,假如不是一個比利時人為自己國家奪走了他們這個位置的話。

第一天。一般性的討論。費德爾先生代表比利時人首先發

言；他的整个發言和举止言談，都暴露出我們在布魯塞尔的街道上和散步的地方所看到的那种令人十分厭惡的矫揉造作和华而不实。費德尔先生开头說了一通空話，然后勉强談了一些最起碼的政治經济学道理。他那又臭又长的演說占去了我們相当长的時間，我們可不打算把这么多時間花在他身上。

接着走上講台的是在巴黎担任教授等职务的沃洛夫斯基先生。这位自鳴得意、膚淺的饒舌家，法兰西化的波兰犹太人，他能把这三个民族的缺陷全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而不接受它們的任何优点。沃洛夫斯基先生那个事先写好的、滿篇全是意想不到的詭辯的演說，喚起了热烈的反应。但可惜，这篇演說并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从弗雷德里克·巴师夏先生的“經济学的詭辯”¹¹⁶中抄来的。热烈鼓掌的布魯塞尔听众显然不知道这一点。沃洛夫斯基先生曾表示遺憾，說德国保护关税派将反对他，这么一来法国的保护关税派就失去了带头的机会。他曾为此受到懲罰。沃洛夫斯基先生演說的最后一部分是極其可笑的。他大談劳动階級，他保証貿易自由会給他們带来遍地黃金，并以他們的名义装出激憤的样子抨击了保护关税派。他尽力以激动人心的最高語調大声疾呼地說，是的，这些保护关税派，“这些心里(他拍着自己的大肚子)^①对劳动階級沒有一点同情的人”，他們妨碍我們实现崇高的理想和帮助工人摆脱貧困！但可惜他的憤怒过于造作了，它对工人席位上的那几个人不可能产生一点影响。

来自科倫的德国代表里廷豪森先生發表了一篇又臭又长的演說，为保护关税制度进行辯护。他是以真正德国人的身份發言的。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他帶着極其悲痛的表情抱怨德國的窘境，抱怨德國工業的脆弱，簡直是哀求英國人，請他們允許德國使自己擺脫他們那種劇烈逼人的競爭。他說，可敬的先生們，當我國直到目前幾乎到處都還保留着行會，我們自己還根本不能相互自由競爭的時候，你們怎能在我國實行自由貿易，要我們同所有國家自由競爭呢？

布朗基先生回答了里廷豪森先生。他是巴黎的教授、眾議院議員和進步保守派，一本可憐的有关政治經濟學史的著作¹¹⁷和其他蹩腳著作的作者，政治經濟學中所謂的“法蘭西學派”的主將。他是一個胖胖大大、沉着有禮的人，面部表情極其複雜，故意裝得既嚴肅又溫和仁慈，*cela va sans dire*〔顯然〕是個榮譽軍團勳章的獲得者。布朗基先生講話非常生動，但他話中的生動的思想卻非常少，這當然會博得布魯塞爾的自由貿易派的敬仰。而且他這次講的比他以前寫的還要空洞十倍。我們用不着把時間花費在這些空談上。

接着發言的是激進派議員包林博士；他是邊沁的英明思想的繼承人及其骨格的保管人¹¹⁸。他本人也是邊沁的骨格。顯然，選舉已經過去了；包林先生認為再用不着對人民讓步了，因而才以真正資產者的本來面貌發言。他的法文講得流利而確切，但英文雜音很重，常用最有力最可笑的手勢來加強自己講話的效果，這種手勢我們曾經看到過。最自私的英國資產階級的代表包林先生宣布，現在應該拋棄自私自利了，應該開始把自己的幸福與自己親友的幸福連系起來了。顯然他曾援引了舊的經濟“道理”——可以同百萬富翁進行更多的交易，從他身上賺到的錢要比同一個有幾千塔勒的人進行交易賺到的更多。最後他帶着激動的表情把上天的使者——走私者——頌揚了一番。

接着發言的是瓦朗西恩鼓励国民劳动协会主席杜沙多先生；他针对沃洛夫斯基的意見，为法国保护关税制度进行辯护。他十分平靜而准确地重述了那些人人都知道的保护关税派的道理，并十分公正地認為，单单这些道理已足以破坏自由貿易派先生們在整个會議过程中的情緒了。他无疑是这天第一流的演說家。

議員尤尔特先生用几乎使人无法理解的法文反駁了他，把在英国几乎每个街头頑童都早已熟悉的反谷物法同盟¹¹⁹的那些陈詞濫調重复了一遍。

如果只是按次序来講，还应该提一下波尔多自由貿易派协会的代表康潘先生。他所談的尽是些鷄毛蒜皮，我們一个字也沒有記住。

議員湯普逊上校把整个問題归結为一个简单的情形：在某个城市里，車夫拉一趟車得到一个半法郎。后来来了一輛公共馬車，同样一段路程它只要一个法郎。車夫們会說，这样一来，每次运程就使交易中少了半个法郎。是不是这样呢？这半个法郎跑到哪兒去了呢？乘客总要用这些錢去买些什么別的东西——肉酱、点心等。这就是說，这半个法郎还是要进入交易中去，这样消費者就会得到更多的好处。为車夫进行辯护的保护关税派和力求推行公共馬车的自由貿易派，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不过善良的湯普逊只是忘了一点：竞争会使消費者很快失掉这点小便宜，它会使你在一个地方沾到的便宜，在另一个地方如数失掉。

最后發言的是来自巴黎的国务参事杜諾瓦耶先生；他写过許多作品，其中包括“論劳动自由”¹²⁰一書，他在这本書中責备工人生育太无节制。他用国务参事那种激昂的声調發言，但講的都是廢話。杜諾瓦耶先生肥头大耳、大腹便便，秃头頂，臉面發紅并且

象狗一样地向前突出；显然，他不能容忍任何矛盾，但也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恐惧。关于他对无产阶级的轻率的攻击，布朗基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杜诺瓦耶先生向人民述说的这些严酷的道理，伏尔泰和卢梭在上一世纪曾奉献给各位君王。”

一般性的争论就到此结束。第二天第三天就个别问题进行的讨论，我们在最近一期¹²¹上再谈。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9 月 19 和 22 日之间
载于 1847 年 9 月 23 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 7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 保护关稅派、自由貿易派 和工人階級¹²²

保护关稅派从来没有保护过小工业即手工劳动。在德国，难道李斯特博士和他的学派曾經为小亚麻业、手工紡織业、手工业要求过保护关稅嗎？沒有，他們要求实行保护关稅，不过是为了用机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現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的生产。一句話，他們是想扩大资产阶级的統治，特别是大工业资本家的統治。他們甚至声称小工业、小资产阶级、小农业、小农的衰退和毁灭固然令人惋惜，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是德国工业發展的必然现象。

在德国这个学派繁多的国家，除了李斯特博士的学派而外，还有另一个学派；这个学派不仅要求实行保护关稅制度，而且要求实行真正的貿易限制制度。該学派的首脑馮·居利希先生写了一本有关工商业史的真正学术著作¹²³，这本书还譯成了法文。馮·居利希先生是个十分仁慈的人，他真心关怀保护手工劳动、国民劳动的問題。好極了！他做了些什么呢？他首先批駁了李斯特先生；証明工人阶级的福利在李斯特的制度中只是一个騙人的假象，一句空洞的高調；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下列建議：

1. 禁止外国工业品輸入；
2. 对輸入的原料如棉花、絲等，課以極高的进口稅，以保护本

国麻纺织业和毛纺织业；

3. 对殖民地商品也应采取同样措施，使当地产品把砂糖、咖啡、靛蓝、洋红、贵重木料等从市场上排挤掉；

4. 在国内应对机器课以重税，以保护手工劳动不受机器排挤。

可见，馮·居利希先生也属于同意这个制度及其一切后果的那一派。但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这不仅阻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而且阻碍本国工业的发展。

李斯特先生和馮·居利希先生体现了这种制度摇摆其间的两个极端。如果这种制度要保护工业的进步，首先就要牺牲手工劳动、一般劳动；如果它要保护手工劳动，就要牺牲工业进步。

我们再回头来谈谈不同意馮·居利希先生的幻想的保护关税派本身。

假如他们能用明显的、直截了当的语言跟工人阶级谈话，他们就应当这样来说明自己的仁慈观点：受自己同胞的剥削总比受外国人剥削好些。

我认为工人阶级永远不会满意这种解决办法；虽然这种办法的爱国主义情感颇为浓厚，但它对那些唯一的的活动就是生产财富、生产物质财富的人来说，总是有些禁欲主义和唯灵主义的味道。

可是保护关税派会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至少是保持了社会的现状。好也罢坏也罢，我们总还保证了工人的工作，不让他由于外国竞争而被抛到街头”。我不打算反驳这种说法，我同意这种说法。可见，保持和固守现状是保护关税派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达到的最有利的结果。这很好，但要知道，对工人阶级来说，问题不是要保持现状，而是要把现状转到某种完全相反的方面。

保护关税派还有一个最后的遁词：他们说，他们的制度决不妄

圖成爲進行社會改革的手段，但在對外關係方面進行經濟改革以前，仍然需要首先在國內實行社會改革。保護關稅制度起初是反動的，後來是保守的，最後成了保守的進步制度。雖然乍一看來，這種理論相當誘人，很實際又很合乎情理，但也相當明顯地暴露了本身的矛盾。真是驚人的矛盾！保護關稅制度把一個國家的資本武裝起來和別國的資本作鬥爭，加強一個國家的資本反對外國資本的力量，而主張這種制度的人還以為，通過這些辦法就可以使資本在對待工人階級方面變得軟弱而且容易讓步。歸根到底，這就等於指望資本大發慈悲，好像資本本身能夠大發慈悲似的。一般說來，社會改革永遠也不會以強者的軟弱爲前提；它們應當是而且也將是弱者的強大所引起的。

但是，我們沒有必要說明這個問題。自從保護關稅派承認社會改革不是他們制度的組成部分，不是從他們的制度產生的問題，而是一個特殊問題，從這時起，他們就離開了社會問題。因此我現在把保護關稅派放到一邊，來談一下自由貿易對工人階級狀況的影響問題。

卡·馬克思寫於1847年9月下半月
載於“卡爾·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
關稅的兩篇演說”單行本 1848年哈姆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48年
單行本譯的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討論自由貿易問題的布魯塞爾會議

9月16、17、18日此間(布魯塞爾)舉行了一次經濟學家、工業家、商人一類人物的會議，討論自由貿易的問題。出席的各國代表約有150名左右。英國自由貿易派出席會議的有：包林博士(議員)、湯普遜上校(議員)、尤爾特先生(議員)、布朗先生(議員)、“經濟學家”雜誌¹²⁴編輯詹姆斯·威爾遜等。從法國來的代表有沃洛夫斯基先生(法學教授)、布朗基先生(眾議院議員、政治經濟學教授，著有政治經濟學史等著作)、奧拉斯·薩伊先生(著名經濟學家之子)、沙·杜諾瓦耶先生(樞密顧問官，著有許多關於政治、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著作)等。德國的自由貿易派一個人也沒有派來，而荷蘭、丹麥、意大利等國則派有代表出席。馬德里的拉蒙·德·拉·薩格拉先生準備前來，但到得很晚。不用說，大批比利時自由貿易派也出席了會議，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於是，學術界的名流就匯聚一堂來討論一個重要的問題——自由貿易是否將造福於全人類？您大概會以為在這樣一個出色的會議上進行的辯論，經濟學界頭等名人之間的爭辯一定是最令人感興趣的。您大概會以為象包林博士、湯普遜上校、布朗基和杜諾瓦耶這樣的人物一定會發表異常高明的議論，提出異常有力的論據，從全新的異乎尋常的角度來論述一切問題。先生啊！要是您

出席了这次会议的话，您一定大失所望。用不了一个钟头，您的美妙的希望和天真的幻想就会化为乌有。我参加过无数次公开的集会和讨论。在我住在英国的期间，我曾不下千百次听到反谷物法同盟的信徒们滔滔不绝地提出他们的论据，可是从来也没有，我担保从来也没有听到过这样枯燥无味、令人头痛而且还讲得非常得意的废话。我还从来都没有这样失望过。这个会议上所进行的讨论根本不配叫做讨论，简直是茶楼酒肆中的乱扯。这些学术界巨子根本没有敢深入到真正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去。我不来向您转述头两天会上所有那些陈词滥调。取两三份“同盟”或“曼彻斯特卫报”¹²⁵来看一下，就可以找到这两天会上的全部发言。或许沃洛夫斯基先生讲的几句听来满有理的名言在报上找不到，可是他那些话都是从巴师夏先生（法国自由贸易派领袖）的“经济学的诡辩”那本小册子上剽窃来的。自由贸易派没有预料到除里廷豪森先生（德国的保护关税派，总的说来是一个平庸的人物）之外会有谁反对他们。可是突然杜沙多先生（法国工业家、保护关税派）起来发言，保护自己的钱包，正象尤尔特先生和布朗先生保护自己的钱包一样。他非常激烈地反对他们，以致在辩论的第二天，许多代表，其中甚至也有自由贸易派，都承认他们在这场辩论中被击败了。可是他们在投票表决时进行了报复——决议自然几乎是一致通过的。

第三天讨论了一个您的读者所感到兴趣的问题，即“实行普遍的自由贸易是否对工人阶级有利？”南郎卡郡的布朗先生（自由贸易派）用英语做了长篇的发言，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和威尔逊先生是唯一用英语发言的两个人，其他人全都讲法语；包林博士的法语讲得很好，汤普逊上校勉强勉强，尤尔特先生糟透

了。布朗先生用一種很象英國國教牧師講話的淒愴聲調，把反谷物法同盟的一部分老教條重復了一陣。

在他後面發言的是萊茵普魯士的維爾特先生。你們大概知道這位先生，他是一個年輕的商人，寫的詩很著名並且在全德國都享有盛譽。他在約克郡住過一些年頭，親眼看到過工人羣眾的狀況是什麼樣子。他在那裡的工人羣眾中間交了很多朋友，這些朋友知道他沒有把他們忘掉將會很高興。因為在會議全部發言中他的發言最能使您的讀者感到興趣，所以我想把它較詳細地傳達一下。他這樣講：

“先生們！你們在討論自由貿易對工人階級狀況的影響問題。你們宣稱對這個階級抱著無比深切的同情。對這一點我很高興，但是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在你們中間竟看不到工人階級的代表！法國的有產階級，這裡有貴族來代表他們；英國的有產階級，有幾位議員來代表；比利時的有產階級，有前內閣大臣來代表；連德國的有產階級都有一位先生來代表，他非常忠實地給我們描述了那個國家的狀況。然而我請問你們，工人階級的代表在哪裡呢？我看不到他們；因此，先生們，請允許我為工人的利益來講講話。我冒昧地以工人的名義，首先是以那 500 萬英國工人的名義向你們呼喚；我在他們中間度過了我最快樂的時光中的幾年，我了解他們，我愛他們。（鼓掌）先生們，工人實際上需要的是對他們的同情。到現在為止，從來都不是把他們當做人看待，而是當做牛馬看待，不，當做商品、當做機器看待；英國的工業家們很懂得這一點，所以他們從來不說‘我們雇用工人若干’，而說‘人手若干’。有產階級本着這一原則就可以完全心安理得地當需要他們的時候使用他們，當從他們身上再也榨不出利潤的時候把他們趕到街頭上去。可見這些現代社會的賤民的狀況是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了。請隨便向哪裡看一看吧：看看羅尼河的兩岸，看看曼徹斯特、里子和北明翰的又臟又臭的小巷，看看薩克森和西里西亞的山坡土崗或者威斯特伐里亞平原——你們到處都會看到同樣面黃肌瘦、同樣愁眉不展的人們，他們在徒勞地爭取自己在文明社會中應有的權利和地位。（會場大為轟動）”

接着，維尔特先生又說，在他看来保护关税制度实际上根本不保护工人，而自由貿易(他直截了当地、坦白地这样告訴工人，尽管他自己也是主张自由貿易的)同样根本不能改变他們的悲慘处境。他一点也沒有自由貿易派的那种幻想；似乎他們的制度付諸实行，会給工人階級带来好处。恰恰相反，实行自由貿易，即徹底实现自由竞争的原則，一方面使資本家之間更加展开損人利己的竞争，可是另一方面同样也会使工人之間产生更加尖銳的竞争。徹底的自由竞争必然会大大促进新机器的發明，那时机器每天都要排挤掉比現在更多的工人。这种自由竞争将从一切方面刺激生产的發展，可是恰恰由于这个緣故，它也将在同样程度上促成生产过剩、商品充斥和商业动蕩。自由貿易派硬說实行了自由貿易制度这些可怕的动蕩就会停止。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动蕩来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頻繁、更加剧烈。可能，甚至毫无疑問，食品价格的降低起初会有利于工人，生产費用的降低会引起消費量的增长，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然而这一点好处很快就会变成灾难，工人们由于相互間的竞争很快就会把自己降低到原来的挨餓受穷的生活水平。在提出了上述論据以及其他一些論据（显然这些論据对与会者說来是非常新穎的东西，因为他們听的时候都非常聚精会神，尽管“泰晤士报”記者傲慢地对这些话置之不理，他仅报之以无礼的但是意味深长的譏諷，說这是“宪章主义的那一套老生常談”）以后，維尔特先生这样結束了他的發言：

“先生們，不要以为这些观点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英国工人也抱有同样的观点，我是喜爱和敬重这个有智慧有毅力的階級的。（鼓掌，有人喊“这是恭維話”。）我举些事实来証明这一点。在整整六年的時間里，在座的反谷物法同盟的先生們一直在徒劳地强求工人的支持。工人从来也沒有忘記資本

家是他們天生的敵人。他們記得同盟在 1842 年所挑起的騷動¹²⁶，他們也記得企業主對十小時工作日法案所進行的反抗。只是在 1845 年底，憲章派即工人階級中**最優秀的部分**才和同盟進行了短時期的聯合以便擊潰他們的共同敵人——土地貴族。可是他們合作的時間很短，而且工人也沒有被科布頓、布萊特之流的虛偽諾言所欺騙，也並沒有真的指望他們所說的什麼麵包減價、提高工資、保證就業等等空話會付諸實現。不，工人們一刻也沒有放棄獨自指靠本身的力量，建立由自己的領袖——不屈不撓的鄧科布和菲格斯·奧康瑞爾領導的單獨的政黨。菲格斯·奧康瑞爾，儘管有人那樣對他進行誹謗中傷（這時維爾特先生朝包林博士那邊望了一眼，包林博士倏地顫動了一下），儘管有人那樣對他進行誹謗中傷，可是過幾個禮拜以後他就要和你們並排地坐到下院的席位上去了。我代表那千百萬不相信自由貿易會為他們造出奇迹來的人們向你們呼喚，請你們想些別的办法來切實地改善他們的狀況吧。先生們！我是在為了你們的利益而向你們呼喚。你們已經用不着懼怕全俄羅斯的皇帝了；你們也不怕哥薩克兵的侵襲；可是如果你們不當心一些的話，你們就有遭到自己的工人襲擊的危險，而對你們說來他們比天下一切哥薩克兵都更可怕。先生們！工人不願再聽你們的那些漂亮話了，他們希望你們做出事實來。而且你們沒有理由對此感到驚異。工人非常清楚地記得，在 1830 年和 1831 年，當他們在倫敦替你們爭取改革法案的時候，當他們在巴黎和布魯塞爾的大街上替你們打仗的時候，你們向他們頻送秋波，和他們握手，對他們贊不絕口；可是幾年以後，當他們要求麵包的時候，你們卻餉以刺刀和霰彈。（有人喊“噢！沒有，沒有！”有人喊“有的，有的！在比桑歇，在里昂！”¹²⁷）所以我再說一遍：你們要實行你們的自由貿易，那就實行好了；但是同時你們也要想一些別的措施——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措施，否則你們將會悔之不及的。（掌聲雷動）”

維爾特先生講完以後，**包林博士立刻針對着他的話發言。**

他說：“先生們，我要告訴你們，剛才發言的那位可敬的代表不是由英國工人選出來代表他們出席這次會議的。根本不是，在代表工人這一件事情上，英國人民照例總是把全權委託給我們的，因此，我們聲明，我們才是他們的真正代表。”

接着，他就把自由貿易的好處描繪了一番，他提出的證明是，

自从去年实行新关税率以来，英国食品輸入量有所增加。輸入了多少鷄蛋，多少百磅的黄油、干酪、火腿、咸肉，多少头牲畜等等，除去英国工人誰能吃掉这許多东西？可是包林根本忘記告訴我們英国自从容許外国竞争以来这些东西减产了多少。在他看来，輸入量增长是消費量增长的绝对証明，他認為这是一条不言自明的道理。他一字也沒有提起曼徹斯特、布萊得弗德、里子的那些流浪街头，找不到工作的工人，象那些工人哪里有錢来消受这种想象中的消費增长和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好处；我們可是从来沒有听說过，工人不做工主人就会把鷄蛋、黄油、干酪、火腿和肉白白送給他們。他一字也沒有提起当前工商业中的停滯現象，而所有的報紙都把这种停滯称为真正空前的停滯。他好象不知道自由貿易派的一切預言同他們的措施付諸实施以后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对工人階級所受的苦难沒有表示絲毫的同情，相反地，他把他們現在的悲惨状况描繪成所能希望的最快乐、最幸福、最安定的生活。

現在讓英国工人自己来决定这两个人之中誰是他們的代表吧。随后又有許多人發言，他們講了各种各样的題目，什么事情都談到了，只是沒有談到提出討論的那個問題。拜尔法斯特(?)选区議員麦克亚当先生大談爱尔兰的紡麻业，无尽无休地講个不停，他的統計数字几乎要了在座人的命。荷兰教授阿凱斯戴克先生講什么古老的荷兰、年輕的荷兰、列日大学、沃尔波尔和德·維特。万-德-卡斯泰尔先生講的是法国、比利时和內閣。柏林的阿斯海尔先生講的是德国的爱国主义，还有什么他称之为精神产物的新制品。荷兰人登·泰克斯先生講的天知道是些什么。后来，当全体到会的人都快要睡着了的时候，沃洛夫斯基先生把大家惊醒了，他回到了原来的話題，答复維尔特先生的發言。沃洛夫斯基先生

的發言，也象所有其他法國人的發言一樣，証明了法國資本家是多么懼怕維爾特先生的預言的實現。他們在談到工人階級的苦難時，假裝同情、裝模作樣、假慈假悲，做得象極了，要不是他們大腹便便的身軀，帶着鮮明的偽善標記的面孔，他們所提出的無濟于事的辦法以及極為顯眼的言行背馳，要不是這一切跟他們做出的那付樣子顯然相互矛盾的話，人家也許真會相信他們是出于真心的。不過他們並沒有騙得過一個工人。接着發言的法國貴族阿爾古爾公爵也要求承認出席會議的法國資本家、議員等人有權稱自己為法國工人的代表。他們之代表法國工人与包林博士之代表英國憲章派完全一樣。隨後發言的是詹姆士·威爾遜先生，他毫不知羞耻地重復着反谷物法同盟的陈腐論據，他的費拉得爾菲亞教友派信徒一般的聲調簡直使人昏昏欲睡。

從以上這些情況，您可以看出這次會議是一場多么奇妙的辯論。來自布魯塞爾的馬克思博士（您知道他是德國民主派最有才干的代表）也曾經要求發言。他準備了一篇演說，他這篇演說如果宣讀了的話，出席會議的那些“貴人們”就無法把所討論的問題付諸表決。可是維爾特先生的反對已經使他們害怕了。他們決心不讓那些不能確信其為正統派的人講話。所以沃洛夫斯基先生、威爾遜先生這般人的發言都超過規定時間，到四點鐘的時候登記發言的還剩下六七個人，主席突然宣布停止辯論，於是名曰政治經濟學家會議的這一群小丑、笨伯、騙子們就以多數票對一票（這一票是前面講過的那位可憐的德國保護關稅派傻瓜的）——民主派根本沒有參加表決——通過這樣的意見：自由貿易對工人極為有利，能解除他們的一切苦難。

鑒于馬克思先生的演說雖未發表，但對於這種無耻謊言却是

再也想象不出的最好、最有力的駁斥，又鑒于在英国、尽管在这問題上有人写下了連篇累牘的 pro [贊成] 和 contra [反对] 的意見，这篇演說的内容仍然会令人感到它是非常新奇的，所以我特地从中摘录几节随信寄上。

馬克思博士关于保护关税主义、自由貿易 和工人階級的演說

保护关税派又分两派。第一派在德国以李斯特博士为代表，这一派从来不以保护手工劳动为己任；相反地，他們之所以要求保护关税，是为了用机器挤掉手工劳动，用現代的生产代替宗法式的生产。他們总是企圖使富豪階級(資产階級)特别是大工业資本家取得統治地位。他們公然宣称，小工业家、小商人、小农的毁灭固然令人惋惜，然而却是完全无法避免的現象。保护关税派的第二派要求的不仅是保护关税制度，而且是絕對的貿易限制制度。他們主张保护手工劳动既不受外国竞争，同样也要不受机器的侵犯。他們主张不仅用高額关税保护本国的工业，而且还要用高額关税保护本国的农业和本国的原料生产。这一派得出了什么样的結論呢？不仅禁止外国工业品的輸入，而且还要禁止本国工业的發展。这样，整个的保护关税制度必然要落到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要末保护本国工业的發展而牺牲手工劳动，要末保护手工劳动而牺牲本国工业。保护关税派的第一派，即認為机器生产、分工和竞争的發展是不可遏止的那些人，这样对工人說：“不管怎样，既然你們得受剝削，那就最好讓你們的同胞来剝削你們，这总比受外国人的剝削要好些。”这种状况，工人們会长久地容忍下去嗎？我

想不会。这些为富人生产各种珍品和全部財富的人們不会滿意于这一点可怜的慰借。他們要求他們的物質生产所換回的應該是更好的物質上的滿足。可是保护关稅派說：“到底我們維持着社会的現狀。好也罢坏也罢，我們总算保證了工人得到他們所必需的工作。我們設法使他們不致由于外国竞争而被拋到街头。”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保护关稅派最多只能宣称他們所能做到的就是維持 status quo [現狀]，再大的本領便沒有了。但是工人階級所渴求的可不是維持住他們的現狀，而是改善現狀。保护关稅派还有一个最后的遁詞。他会說：他决不反对在国内实行社会改革，可是要保證社会改革的成功，第一件要事就是防止一切可能由外国竞争引起的混乱。他說：“我的这一套做法不是社会改革的办法，但是我們既然要改造社会，何不先从我們自己国内开始，然后再来談改革我們和別国的关系呢？”当然这些話听来是滿有理的，可是在这冠冕堂皇的表面下面却隐藏着惊人的矛盾。保护关稅制度把一个国家的資本武装起来和別国的資本做斗争，这个制度在加强本国資本同外国資本的斗争力量，可是这个制度的拥护者又深信，这样武装起来和增强了的資本要是跟劳动相較量，就变得温馴軟弱，变得那么好对付。而这就是说要指望資本大發慈悲，好象資本本身能够大發慈悲似的。要知道，社会改革从来不是靠强者的軟弱，而永远是靠弱者的强大来实现的。不过这一点我們沒有必要多講。只要保护关稅派承認社会改革不是他們制度的必然产物，也不是他們制度的組成部分，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特殊問題，只要他們承認了这一点，他們就离开我們所討論的問題了。因此，我們可以撇开他們来研究自由貿易对工人階級状况的影响這個問題。貿易摆脱一切桎梏而获得彻底解放对工人階級状况影响如何，這個問題

很容易解决。实际上这甚至不是一个問題。如果說在政治經濟学里面;还有什么东西講得不坏的話,那就是工人階級在自由貿易統治下的命运。在古典政治經濟学著作里所闡述的一切規律,只有在貿易的一切束縛都被解除、竞争不仅在某一个国家内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绝对自由的前提下,才是完全正确的。自由貿易实行得愈广泛,亚当·斯密、薩伊和李嘉圖所闡述的这些支配物質財富的生产和分配的規律,就愈加灵驗、愈加准确,愈不会是空洞的抽象。而且学者們在談到任何經濟学問題时,总是一再地告訴我們,他們所有的結論,都是建筑在貿易将摆脱迄今尚存的一切桎梏而获得解放这一前提上面的。他們遵循这样的方法完全正确。因为他們不是采取任意抽象的办法,而只是在分析的时候把一些偶然的情况攆弃掉。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經濟学家如李嘉圖等人,对于未来的社会比对于現存的社会知道得更清楚。他們对于未来比对于現在了解得更多。如果你們想讀一下有关未来的書籍,那就請你們翻开亚当·斯密、薩伊、李嘉圖的著作看看。你們会發現,他們的著作无比明确地写出了在徹底的自由貿易統治之下等待着工人的是些什么。譬如你們請教一下象李嘉圖这样独一无二的权威学者。从經濟学的观点看,工人劳动的自然正常价格是什么?李嘉圖的答复是:“降到最低限度,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的工資”。劳动是商品,也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商品的价格决定于生产該商品所必需的时间。要生产“劳动”这种商品需要些什么呢?工人必須吃飯,必須补偿他的体力消耗以便他能够活下去,并且不管怎样还要能够延續后嗣,这一切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商品,而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恰好也就是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可是我們决不應該認為工人永远不会上升到这个最低水平以

上或者永远不会降低到这个水平以下。不是这样的。按照这一規律，工人階級有时能够幸运一些，有时他們得到的会比最低工資多一些，然而多出来的这一点只不过是一笔补偿他在別的时候，即在工业停滯时所少得（和最低工資相比）的附加收入。这就是說，如果我們注意到，商业在一定的、永远周而复始地循环着的時間內，經歷着包括有繁荣、生产过剩、停滯、危机等阶段的周期，我們把工人超过最低工資的收入和低于最低工資的收入拿来平均一下，那我們就会發現，总起来看，他所得到的不多也不少，正好是最低工資。換句話說，工人階級仍然会作为一个階級保存下来，尽管他們經歷了許多灾难，受尽了許多折磨，在工业的戰場上抛下了多少尸体。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工人階級还是繼續存在下去，不但繼續存在下去而且人数还在增加。最低工資是“劳动”这种商品的自然价格，这条規律将随着李嘉圖的自由貿易这个前提的實現而發生作用。我們同意所有那些闡述自由貿易的优越性的發言。生产力是要發展的，全国由于保护關稅而担負的賦稅是要消灭的，一切商品的售价都将降低。可是李嘉圖又怎样講呢？他說：“劳动既然同样是商品，它也将同样以更低的价格出售”，你們将能够完全象买胡椒买盐那样非常廉价地买到它。正如同实行自由貿易以后所有其余的政治經濟学規律都将發生更强烈的作用、应驗得更加准确一样，馬尔薩斯所講的人口規律，在自由貿易統治之下，也将获得几乎想象不出的广泛發展。那末請你們来决定一下吧：要末你們把現存的政治經濟学全部推翻，要末你們就得承認在实行自由貿易的情况下，工人階級将听任无情的政治經濟学規律去摆布。这是不是說我們反对自由貿易呢？不是的：我們贊成自由貿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貿易以后，政治經濟学的全部規律及其最惊人的矛

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9 月底

载于 1847 年 10 月 9 日“北極星报”
第 520 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
“本报德国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極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第一篇

布魯塞爾 9 月 26 日。今天的“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登了海因岑的一篇文章。作者在這篇文章中借口反駁編輯部的無謂非難，對共產主義者大肆駁斥。

編輯部規勸雙方不要爭論。在這種情況下，編輯部本應該把海因岑這篇文章中確實是對責備他先攻擊共產主義者所進行的反駁那一部分發表出來。即使“海因岑自己沒有出版物”，這並不足以說明他就可以利用報紙進行連該報編輯部都認為是荒唐的各種攻訐。

可是，這篇文章的發表對共產主義者的幫助實在是再好不過了。過去對任何一個黨派的非難從沒有象海因岑現在對共產主義者的非難這樣荒唐、這樣庸俗。這篇文章是共產主義者最有力的論據。它證明，假如共產主義者以前一直沒有反對過海因岑，現在就該馬上反對了。

海因岑先生一開頭就以德國一切非共產主義者激進派的代表自居；他想同共產主義者進行爭論，象一個黨同一個黨進行爭論一樣。他“有權要求”，他極其堅決地宣稱：“可以指望”共產主義者一

些什么，“应该要求他们”一些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是什么”。他把他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和共产主义者同“德国共和派与民主派”之间的分歧完全混为一谈，并用“我们”一词来代表这些共和派。

那末，海因岑先生究竟是什么人，他究竟代表谁呢？

海因岑先生过去是个自由派小官吏，早在1844年就曾幻想过法律范围内的进步和可怜的德国宪法，他至多只是偷偷地承认过，在很遥远的未来，共和国的确应该是可以实现而又符合众望的体制。但海因岑先生认为有可能在普鲁士法律的基础上进行斗争这一点是错了。他曾因为他那本关于官僚制度的蹩脚著作（雅科布·费奈迭很久以前写的一本论述普鲁士的作品都比他的好得多）¹²⁸而不得不出走。现在他成熟了。他认为在法律基础上进行斗争是不可能的。他成了革命家，当然也是共和派。在瑞士，他结识了 *savant sérieux*〔学识渊博的〕卢格；后者使他熟悉了自己的贫乏哲学，这种哲学是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与人道主义、黑格尔的影响和施蒂纳的高调的杂拌。具备了这一套东西之后，海因岑先生便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成熟了。于是他就右面靠着卢格，左面依着弗莱里格拉特，开始了他的革命宣传。

当然，我们并不想责难海因岑先生从自由派转到疯狂的激进派。可是我们要指出，他这种转变完全是由于个人因素的影响。当海因岑先生还能在法律基础上进行斗争的时候，他对一切认为必须举行革命的人，都加以攻击。但一当他认为在法律基础上进行斗争已不可能的时候，他就声称这种斗争根本不可能，也不考虑目前德国资产阶级还完全可以进行这种斗争，而且他们的反抗常常具有十分合法的性质。当他一旦认为退路被切断以后，他就宣

称必須立即进行革命。他不是研究德国的情况，从而对德国有个总的了解并由此找出：什么样的进步措施、什么样的發展和什么具体办法是必要而又切实可行的，他不是探討德国各个阶级之間的复杂关系以及它們与政府的关系，由此制定出应当遵循的政策的基础，总之，他不是使自己的策略适应德国的發展进程，而是十分任性地要求德国的發展适应自己。

当哲学还是进步的时候，海因岑先生曾激烈地反对过它。直到哲学变得反动，成了所有动摇分子、庸人和投机文人的避难所的时候，海因岑先生才不幸地靠近了它。对海因岑先生來說更加不幸的是，畢生都只是一个平凡的拾人牙慧的卢格先生，又使海因岑先生成了唯一拾他牙慧的人。因此海因岑先生便成为卢格先生的安慰。卢格先生至少总算找到了一个自認已領会他空洞言論的奥义的人。

海因岑先生究竟主张什么呢？他主张立即建立德意志共和国，在这个国家里，美国革命的传统与1793年的传统将和他从共产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某些措施結合起来，共和国将具有鮮明的黑紅黃色彩¹²⁹。德国由于本国工业萎靡不振，在欧洲处于一种非常可怜的地位。它永远不会走在前头，不会首先宣布伟大的革命，沒有法国和英国的榜样也不会冒险建立共和国。任何一个不顧文明各国中的运动而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国，任何一次似乎可以完全不考虑德国各个阶级的实际运动而象海因岑先生所說的那样冒险进行的德国革命，都是以黑紅黃色裝飾起来的純粹幻想的产物。为了使这个光荣的德意志共和国更加光荣，海因岑先生把它嵌进卢格化的費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框子里，宣布它是就要到来的“人”的王国。所有这些幻想（一个比一个荒唐），德国人都要实现！

可是，伟大的“鼓动家”海因岑先生究竟是怎样进行宣传的呢？他宣称君主是造成一切贫困和灾难的祸首。这种論調不仅可笑，而且極端有害。海因岑先生在这里对德国君主这帮昏聩愚蠢的傀儡的阿諛献媚，实在到了頂点，他把一种虛构的、超自然的、神奇的威力加在这帮傀儡身上。海因岑先生硬說君主能造下多少灾祸，他們也就能做出多少好事。由此做出的結論却不是必須进行革命，而是虔誠地希望有一位可爱的国王、好心的皇帝約瑟夫。但是人民要比海因岑先生更加清楚誰是自己的压迫者。海因岑先生要把徭役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工人对雇主的仇恨轉到君主头上，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海因岑先生的所作所为确实对地主和資本家有利，因为他把这两个階級剝削人民的罪过轉嫁于君主。而德国十分之九的灾难却正是由于地主和資本家剝削人民造成的！

海因岑先生号召立即举行起义。他本着这个精神印刷传单，竭力在德国散發。試問：这种膚淺的、盲目的、毫无意义的宣传对德国民主派不是極其有害嗎？試問：难道經驗沒有証明这种宣传是毫无补益的嗎？难道在德国的大动蕩时期即 30 年代，沒有散發过几十万份类似的传单、小册子嗎？难道其中有一份取得什么成效了嗎？試問：难道会有一个头脑多少还正常的人能够認为人民对这种政治說教将予以絲毫重視嗎？試問：海因岑先生的传单除了說教以外，什么时候还做过別的事情嗎？試問：不經過冷靜思考，不了解也不估計实际关系，就向全世界大声宣称自己的各种革命号召，这豈不荒唐嗎？

党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組織討論，論証、闡發和捍衛党的要求，駁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論断。德国民主派刊物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从以下各个方面証明民主制的必要性：目前这

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贵族利益的管理方式是不中用的，将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立宪制度是不完备的，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这种刊物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因为在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这些人）为什么受官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应该说明，为什么会产生不仅是政治压迫而且首先是社会压迫，以及采取哪些手段可以消除这种压迫；它应该证明，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是采取这些手段的首要条件。其次，它应该探讨，立即实现民主制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党有哪些手段可以采取，当它还很软弱不能独立活动的时候，它应当联合哪些党派。所有这些任务，海因岑先生完成了一项吗？没有。他根本没有花费精力这样做。他没有向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说明任何问题。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各阶级和党派的情况。他所做的，就是在“揍它，揍它，揍它！”这个题目上玩弄花样。

海因岑先生又是对谁进行这种革命说教的呢？首先是对小农这个在目前最不能发挥革命首倡精神的阶级。近600年来，城市总是一切进步运动的策源地，农民在独立民主运动（瓦特·泰勒、杰克·凯德、查克里、农民战争¹³⁰）中总是反动的，而且总是被镇压下去。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成了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总是跟在他们后面。1789年的法国革命，英国、法国和美洲东部各州的现代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而海因岑先生在现在，在19世纪，却还把希望寄托在农民骚动上面！

然而海因岑先生也答应进行社会改革。当然，这是由于人民对他的号召表示冷淡才慢慢使他不得不这样做。这又是些什么改革呢？就是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那些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步骤。海因

岑先生談話中間唯一可以認為是正確的東西，却又是他從他所激烈抨擊的共產主義者那里剽竊來的。就是這些東西一到他的手

巴也達了游習紹倫 處于無組織狀態 國家本限制產量無限制

海因岑先生当然以为，财产关系、继承权等等可以任意改变和调整。海因岑先生（本世纪最无知的蠢汉之一）当然可以不知道，每个时代的财产关系是该时代所具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必然结果。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不改变整个农业经营方式，就不可能把大土地所有制变成小土地所有制，不然，大土地所有制很快就会重新恢复起来。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现代大工业、资本积聚和无产阶级的形成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象德国这样一个在工业上处于依附和被奴役地位的国家，它能够冒险对本国的财产关系实行的改造，只会是符合资产阶级和自由竞争的利益的改造。

简单说来，这些措施在共产主义者手里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看做随意提出的措施，而是看做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工具发展，以及这一发展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产生的这些措施并不是最后的措施，而是阶级斗争（也是过渡的）本身所决定的过渡的 *mesures de salut public*〔社会解救办法〕。

这些措施在海因岑先生手里就失掉了任何合理性，因为在他手里它们纯粹是任意编造出来的改善世界的庸俗幻想，他那里丝毫没有指出这些措施和历史发展的联系；因为海因岑先生一点儿都不考虑自己的草案实际上是否能够实现，他不是力求表述确定不移的生产规律，而是力求用法令来消除这些规律。

正是这位粗暴地歪曲了共产主义者的要求并把它变成纯粹的空中楼阁以后才加以接受的海因岑先生非难共产主义者，说他们“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他们“追求空中楼阁”和“丧失了现实基础(!)”！

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整个鼓动活动；我們公开声明，我們認為这种鼓动对整个德国激进派肯定是有害的，是有損它的声誉的。党的政論家应当具备完全不同于海因岑先生（前面已經指出，他是本世紀最无知的蠢汉之一）所有的品質。海因岑先生也許滿腦子都是最善良的願望，他也許是全欧洲信念最坚定的人。我們也知道，他本人誠实、勇敢、坚定。但要成为党的政論家，单有这些还是不够的。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願望和斯騰托尔¹³¹的嗓子而外，还需要一些別的条件。就海因岑先生現在具有的和多年經驗証明他能够具有的各方面的条件來說，党的政論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确，風格要更好一些，知識也要更丰富些。

然而海因岑先生由于自己的出走，他还是應該成为党的政論家。他不得不在激进派中間試行組織自己的党派。于是他就处于一种很不相称的地位，他为了能胜任自己的职务所进行的一番徒劳的努力，只是使他成为笑料。如果德国的激进派使他有理由認為他是他們的代表，他使自己成为笑料也是代表他們的話，那末这将使德国激进派本身也成为笑料。

可是海因岑先生并不代表德国激进派。他們的代表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如雅科比等。海因岑先生不代表任何人，除了在財政上支持他的宣传活动的某些德国資產者外，誰也不承認他是自己的代表。然而我們錯了。德国有一个階級承認他是自己的代表，受到他的鼓舞，为他欢呼，竭力为他压倒所有飯店顧客的声音（正象海因岑先生所說的共产主义者“压倒了整个著作界的反对派的声音”一样）。这个階級就是人数众多、教养有素、善良而有影响的推銷人階級。

就是这位海因岑先生要共产主义者承認他是激进派資產者的

代表,要他們把他当做激进派资产者的代表和他爭論!

上面講的一切已經足以說明,共产主义者对海因岑先生的駁斥是正确的。我們准备在下一期上談一談海因岑先生在本报上述第 77 号上对共产主义者的非难。

假如我們不是坚信海因岑先生根本够不上一个党的政論家,我們会劝他仔細鑽研一下馬克思的“哲学的貧困”。他劝我們讀一下弗呂貝尔的“新政治”¹³²,可惜我們只能回报以另一种劝告:安靜地坐下等待“战斗”吧。我們相信,海因岑先生作为一个政論家有多么拙劣,作为一个营指揮官就会多么英明。

为了使海因岑先生不致抱怨匿名攻击,我們在本文末尾署上名字。

弗·恩格斯

第 二 篇

我們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經說明,共产主义者攻击海因岑并不是因为他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蹩脚的民主派政論家。他們攻击他并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而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至于为什么發起这个攻击的正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完全是出于偶然。即使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也是要起来反对海因岑的。在这整个論爭中間,談的只是下面两点:(1)海因岑先生能不能作为党的政論家和鼓动家給德国民主派带来好处,我們否定这一点;(2)海因岑先生的鼓动方式是否正确,或者至少來說,能不能容忍,对这一点我們也是否定的。可見,談的不是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只是海因岑先生个人及其个

人的妄想。

在目前条件下，共产主义者不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毫无补益的爭論，而且他們本身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問題上，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現的。在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結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統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統治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此以前，两党的分歧是純理論性質的，这种分歧完全可以成为理論上爭論的問題而絲毫无害于共同行动。甚至可以談一談民主主义实现以后应当立即为一向受压迫的阶级采取的一些措施，如大工业和铁路交给国家管理，所有兒童的教育費由国家負担等等。

我們还是回头来談談海因岑先生吧。

海因岑先生宣称，不是他先同共产主义者爭論，而是后者先同他爭論。这个論据十分笨拙，因此我們不打算同他爭辯。他把自己同共产主义者的冲突說成是“共产主义者在德国激进派中制造的无謂分裂”。海因岑硬說，他在三年以前，就曾尽一切力量和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办法来防止即将發生的分裂，但是他徒劳一番，結果共产主义者还是对他發起了攻击。

大家都很清楚，三年以前海因岑先生根本还不是激进派。他当时还是一个自由派，主张实行法律范围内的进步措施。因此，同他的分歧絕不意味着激进派內部的分裂。

海因岑先生是1845年初，在布魯塞尔这里見到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当时不仅根本沒有因为海因岑先生似乎在政治上是所謂的激进主义者而想要攻击他，而且还尽了最大的努力爭取

当时还是自由派的海因岑先生轉到这种激进主义的立場上来。但没有用。海因岑先生只是到了瑞士才成为民主主义者。

“后来我越来越相信(!)必須大力反对共产主义者”，因而也就是相信激进派中无謂的分裂的必然性了！我們請問德国民主主义者們：这样可笑地自相矛盾的人配做党的政論家嗎？

可是海因岑先生所說的对他进行攻击的共产主义者是些什么人呢？上述的暗語，特别是下面紧接着对共产主义者的責难，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海因岑說，共产主义者

“压倒了整个著作界的反对派的声音，他們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極其无礼地非难最激进的人士，他們……尽力使政治斗争陷于瘫痪，甚至……最后他們公开同反动派联合起来。更糟的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显然是在他們学說的影响下，他們常常堕落为卑鄙的虛伪的阴谋家……”

这些模模糊糊的責难描画出一个相当鮮明的形象——投机文人卡尔·格律恩先生的形象。三年以前，格律恩先生同海因岑先生私人之間曾發生过一些誤会；格律恩先生为此在“特利尔日报”上对海因岑先生进行了攻击，格律恩先生曾想压倒整个著作界的反对派的声音，曾想尽力使政治斗争陷于瘫痪等等。

可是，格律恩先生是什么时候成为共产主义的代表呢？即使三年以前他曾經企圖靠近共产主义者，但他从来也沒有被認為是共产主义者，他自己也从来沒有公开这样自命过，一年多以前他甚至还認為必須反对共产主义者。

馬克思在当时就曾向海因岑先生表示完全不同意格律恩先生的作法，后来，他又抓住机会公开地描述了他的真面目。

至于海因岑先生最后对共产主义者进行的誣蔑（“卑鄙的虛伪的”），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由于格律恩先生和海因岑先生之間的

爭執。這場爭執與上面兩位先生有關，與共產主義者却毫不相干。我們連這場爭執的詳細情形都不了解，因此無從評判。我們暫時假定海因岑先生是對的。但是當馬克思及其他共產主義者已經否定了這場爭執的有關人士的作法以後，當這位有關人士從來也不是共產主義者這一點已經了如指掌以後，如果海因岑先生還要把這場爭執說成是共產主義學說的必然後果，那就太卑鄙了。

假如海因岑先生的上述責難不止是針對格律恩先生一人，那他所指的就是其真正反動的理論早就遭到共產主義者否定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了。這個現在已經完全瓦解的派別中所有能夠前進的人都轉向了共產主義，並且只要“真正的社會主義”一顯露頭角，他們就加以攻擊。海因岑先生把這些早已被埋葬的幻想又挖掘出來，並把它們歸咎於共產主義者，這就再一次暴露了他的屢見不鮮的極端無知。海因岑先生在這裡責難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他把他們和共產主義者混為一談）以後，對共產主義者發出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反對他們時曾提出過的荒謬譴責。其實他沒有任何權利抨擊“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因為他本人在一定的意義上也屬於這一派。當共產主義者在報刊上激烈反對這些社會主義者的時候，這位海因岑先生正在蘇黎世傾聽盧格先生傳授他自己混亂的腦袋里所裝的那一套“真正的社會主義”。盧格先生真是找到了一位值得教誨的門生！

但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在哪儿呢？海因岑先生談到了值得尊敬的非凡人材和才華四溢的人物；而且預言這些人將拒絕共產主義的同情（！）^①。共產主義者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和

^① 海因岑要講的是“拒絕同情共產主義”。這種表達法說明他的文風很糟糕，所以恩格斯在這裡加了（！）。——譯者注

行动已經拒絕給以任何同情。除了下面最后一句話而外，上述所有責难沒有一句是針對共产主义者的：

“共产主义者……妄自尊大，嘲笑一切可以成为誠实人联合的基础的东西”。

海因岑先生这里大概是指的下面这件事，共产主义者曾譏笑他的道德高尚的言論，嘲笑所有这些神聖高超的思想、高尚、正义、道德等等，而海因岑先生却認為这些是任何社会的基础。这个責难我們接受。尽管这位誠实人——海因岑先生感到道德上的义憤，共产主义者还是要繼續嘲笑这些永恒的真理。而且共产主义者認定，这些永恒真理無論如何都不是基础，相反地，是它們自身形成时所处的那个社会的产物。

同时，既然海因岑先生預見到共产主义者不会同情那些他想列入共产主义者营垒的人，那么他这些荒唐的責难和卑鄙的誣蔑又是为什么呢？既然海因岑先生对共产主义者的了解只是来自道听途說（这几乎是很明显的），既然他很少了解他們是些什么人，因之要他們对自身做出更确切的解释，要他們向他做个自我介紹，在这种情况下同他們进行爭論，該多么无耻呢？

“如果对那些介紹共产主义或叙述共产主义真实內容的人有了确切的了解，这可能会使大部分奉行共产主义并为共产主义所利用的人完全脫离共产主义，而反对这种要求的恐怕也不会只是‘特利尔日报’的先生們。”

隔几行下面接着写道：

“对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可以指望他們相当坚决和真誠地（好一位高尚的庸人！）^①公开宣布自己的学說，离弃那些非共产主义者。应当要求他們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真是庸人的用語!)①不要不知羞耻地(!)助长那种在成千上万受苦受难和沒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所制造的混乱:毫无根据地認為可能——其实是不能(!!)——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找到实现这种学說(!)的途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責任(又是这个高尚的庸人)②是:或者使一切都为所有靠近他們的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所了解,并把他們引到既定的目的,或者同他們一刀两断,不利用他們。”

假如卢格先生也能創造出三个这样的复杂句,那真是大可庆幸了。庸人的要求是和庸人所特有的思想混乱完全符合的:据說庸人关心的只是問題的本質,而絕不是形式,正因为如此,他講的和他想講的就截然相反。海因岑先生要求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冒牌的共产主义者划清界限。他們应当結束由于混淆两个不同的派別而产生的(他就是想这样說的)混乱。但是当“共产主义者”和“混乱”这两个字在他脑袋里碰到一起的时候,他脑袋里也就發生了混乱。海因岑先生失去了思路。共产主义者往往在沒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这个常見的公式,成了他自己的絆脚石,他忘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冒牌的共产主义者,可笑又可怜地在各种各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可能性上顛躓,最后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整个倒了下去,然后又清醒过来。这时他才又想到,他談的根本不是这个或那个是否可能的問題,他想談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又回到自己的題目上来,但他还是神情恍惚,連他在前面耍惊人把戏时所用的那个冠冕堂皇的句子都沒刪掉。

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文風。至于問題的实質,我們再說一遍,海因岑先生正象正直的德国人一样,他的要求提得太晚了,共产主义者早就否定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其次,我們在这里可以再

① ②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次看到，背地里进行誣蔑同高尚的庸人的本性也絕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特别是海因岑先生十分明显地暗示出，共产党政論家只是利用共产主义者工人。他相当直率地表示，这些政論家公开表述自己的观点会使为他們所利用的大部分人完全离开共产主义。他把共产主义政論家看做先知、术士或长于密謀的祭司，不过这种智謀只是他們自己享用而不传授給沒有受过教育的人，以便牵着他們的鼻子走。他認為共产主义者应使一切都为所有愚昧无知的人所了解并且不要利用他們，他这些高尚庸人的要求，显然是从这样一个設想出發的：好象共产主义著作家乐于讓工人永远愚昧无知，好象他們只是利用他們，就象上一世紀的伊留米納特¹³³打算利用人民一样。这种荒唐的看法也使海因岑先生不合时宜地到处宣揚沒有受过教育的人头脑中的混乱，而且語句顛三倒四，这是他說話不直截了当的报应。

我們只是把这些誣蔑指出来，而不打算批駁。我們請共产主义者工人自己去評判。

我們看了海因岑先生所有这些預先声明、迂迴其辞、要求、誣蔑和惊人的把戏以后，最后来看看他从理論上对共产主义者的抨击和他的論据。

海因岑先生

“認為共产主义学說的核心，簡單說来就是废除私有财产(劳动所得也包括在內)和做为这种废除的必然結果的共同使用地力的原則”。

海因岑先生以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論原則即自己的核心出發并从此进一步做出結論的学說。海因岑先生大錯特錯了。共产主义不是学說，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則出發，而是从事实出發。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已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

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理论概括。

海因岑先生现在该不会不认识到，为了评判共产主义，只是认为它的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废除私有财产是不够的；他最好不要空谈废除私有财产，而是踏踏实实地研究一下政治经济学；假如他对废除私有财产的前提也不了解，那他对废除私有财产可能造成的后果便不会有任何概念。

海因岑先生在最后这个问题上暴露了何等严重的无知，他竟认为“共同使用地力”（措辞挺不坏）是废除私有财产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由于大工业和机器生产、交通工具、世界贸易空前的发展规模使个别资本家越来越不可能进行个人经营，由于日益加剧的世界市场的危机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由于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下的生产力和交换手段日益超出了个人交换和私有财产的范围；总之，由于工业、农业、交换的社会管理将成为工业、农业和交换本身的物质必然性的日子日益逼近；由于这一切，私有财产一定要被废除。

海因岑先生把废除私有财产（这种废除当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前提）同这种废除的前提本身分离开来，他不把废除私有财产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观察，而只是把它当作书斋里的愚蠢的臆想，这

样一来，这种废除就成了十足的空谈，海因岑先生只能在这上面发表一通平庸的废话。他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

“通过上面所谈到的废除一切私有财产的做法，共产主义必然也要废除个人的独立存在（可见，海因岑先生是在责备我们要把人们变成暹罗的连体双生子①）②。结果又把每个人投入几乎是（!!）刻板划一的兵营生活（请胸怀宽大的读者留意，大家都知道，这一切正是海因岑先生自己大谈个人的独立存在的结果）③。共产主义者就这样消灭了个性……独立……自由（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资产者的陈词滥调。由于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分工而成为鞋匠、工厂工人、资产者、律师、农民，即成为一定职业及与这种职业相适应的习俗、生活方式、偏见、局限性等等的奴隶的现代个人，似乎还具有某种可以消灭的个性！）④。共产主义把个人和他的获得的私有财产——这个个人不可缺少的特征或基础——（这个“或”字真是妙极了！）⑤用来祭祀共同体或社会（这不也是施蒂纳的话吗？）⑥，而对每个人来说，共同体可以而且应该（应该!!）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海因岑先生特别重视获得的财产，这就再一次证明了他根本不了解他所谈论的对象。海因岑先生本着他那高尚庸人的正义感，想把自己赚到的分给每个人，可惜这种正义感被大工业化为乌有了。只要大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足以使自己完全挣脱私有财产的羁绊，它就不能容许现存方式以外的其他任何分配方式，资本家就还要把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工人在实践中也会更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最低工资。蒲鲁东先生曾经企图有系统地发展获得的财产的原则并把它同现存关系联系起来，大家知道，他的这种企图已彻底破产。海因岑先生的确永远也不敢进行这样的尝试，因为这样他就要研究问题，但他不打算这样做。不过他仍然可以

① 1811年生于暹罗的连体双生子汉克和恩克，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暹罗人。

——译者注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将蒲魯东先生作为前車之鑒，少来显示自己的获得的財產。

如果海因岑先生还来非难共产主义者，說他們追求空中樓閣，丧失了现实基础，那么这种非难又是針對誰呢？

海因岑先生还談了許多別的，我們都不去管它了。我們只是指出，越往后他的詞句就越显得笨拙。他十分不善于选择恰当的詞彙，因而語句軟弱无力，这就足以敗坏任何一个原想把他看做自己著作家的党派的名声。他固执的信念常常使他說了一些不是他所想說的話。因此他的每一句話都包含着两重廢話：一种是他要說的廢話，一种是他不要說但还是說出来的廢話。上面我們已經舉了这样的例子。我們还要指出一点，海因岑先生不断重复他的关于君主的威力这种陈旧的迷信观点。他說，那种应当被推翻、本身也无非是国家权力的**政权**，現在是而且永远都是一切无权現象的根源和支柱，他要“尽力”建立**真正的法制国家(!)**，并在这个幻想的大厦的範圍內“进行那些由于普遍的發展(!)而产生的理論上正确(!)而又实际可行的(!)社会改革”!!!

願望多好，文風就多糟。高尚的品德在这个倒霉領域里的下場就是这样。

受了当代精神的腐蝕，
成了愚昧的长褲汉。
舞跳得虽然不好，
但毛茸茸的胸膛里却充滿了豪迈；
.....
虽不是个天才，也是一条好汉¹³⁴。

我們的文章会使海因岑先生象一个高尚庸人受到凌辱一样感到理所当然的憤慨，但他既不会因而改变自己的文風，也不会改变

他的败坏名声和无的放矢的鼓吹方式。他威胁說，他要在坚决行动的时刻訴諸絞架，这曾使我們一度感到快慰。

总之，共产主义者应当而且也希望同德国激进派采取共同行动。但是他們保留对任何一个败坏全体声誉的政論家进行批駁的权利。根据这个理由（而不是根据别的理由），我們認為必須批駁海因岑先生。

弗·恩格斯

1847年10月3日于布魯塞尔

注意：我們刚才收到一个工人[⊖]写的小册子：“海因岑的国家。斯蒂凡的批評意見”伯尔尼，雷策尔版¹³⁵。海因岑先生写的即使能赶上这个工人的一半，都是可以欣慰的。除了其他一些东西外，海因岑先生从这本书可以相当清楚地了解到，为什么工人連听都不想听他的土地共和国。还要指出一点，这是工人写的第一本书，作者不是在进行說教，而在尝试用各个社会阶级之間的斗争來說明現时的政治搏斗。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9月26日
和10月3日
載于1847年10月3、7日“德意志—
布魯塞尔报”第79、80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德意志—
布魯塞尔报”

⊖ 斯蒂凡·波尔恩。——編者注

Mardi 26 Octobre 1847.

PREZ DE L'ABONNEMENT :
Par an, 12 fr.
— 6 mois, 6 fr.
— 3 mois, 3 fr.
— 15 jours, 1 fr.
On s'abonne chez le Directeur, ou chez les Propriétaires, ou chez les Libraires, ou chez les Postes.
On s'abonne aussi par mandat sur le Trésorier de la République.

LA REFORME

PREZ DES INSERTIONS :
Les annonces, en petit texte, à 10 cent. la ligne.
— en grand, 20 cent. la ligne.
— en colonne, 15 cent. la ligne.
— en page, 10 cent. la ligne.
— en page, 10 cent. la ligne.
— en page, 10 cent. la ligne.
— en page, 10 cent. la ligne.

弗·恩格斯 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 运动。爱尔兰¹³⁶

目前籠罩着英国的商业危机，其尖銳程度确实超过以前一切危机。无论1837年的萧条或1842年的萧条都没有目前这样普遍的性質。英国所有的工业部門在發展的鼎盛时期，突然瘫痪下来了。到处呈現着萧条，到处都是被抛弃在街头的工人。这种情况当然使工人非常激动，他們在商业繁荣的时候受尽厂主們的残酷剝削，而現在又被大批解雇，落到听任命运摆布的地步。这就是怀有不满情緒的工人所組織的集会迅速增加的原因。宪章派工人的机关报“北極星报”用了七栏多的篇幅报道上周內举行的集会，而通知在本周內举行集会的布告又滿滿占了三栏。这家报纸还报道了一个叫約翰·諾克斯的工人出版的小册子¹³⁷，作者直截了当地公开攻击了貴族对土地的占有权。

他說：“英国的土地是人民的財產，而我們的貴族却用暴力或欺詐手段把它从人民手里夺走。必須承認人民对財產有絕對的所有权，必須宣布地租是全民的財產并用来滿足共同的利益。可能会有人对我說，这是革命的言論。是不是革命的言論，那是无关紧要的；既然人民不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那末他們就只好試用非法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宪章派展开了异常有力的活动是毫不足怪的。他們的領袖，著名的菲格斯·奥康瑙尔不久前宣称，他准备在最近期間到苏格兰去，以便在那边的各个城市里召开大会，并發动群众在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全民請願書上签名；这份請願書是准备遞交議会的最近一次會議的。奥康瑙尔还說，在議會开会以前，宪章派将增出一份“民主主义者”日报¹³⁸。

讀者大概还記得，在最近的选举中，“北極星报”的主編哈尼先生已被梯維尔頓区选作宪章派的議員候选人；这个区也把外交大臣帕麦斯頓勋爵选进議會。但是当帕麦斯頓勋爵要求投票表决¹³⁹时，在举手表决初选中获胜的哈尼先生就放弃了自己的候选資格。同时發生了这样一件事，足以說明梯維尔頓区的居民对該区的一小群議會选举人是何等反感。当市政委员会中有一个缺額时，等級比議會选民繁复得多的地方机构选民就讓提哈尼先生当候选人的劳克利弗先生补了缺。应该补充的一点，是宪章派正在全国范围内准备迎接 11 月初的全国市政选举。

现在来談談英国工业最發达的地区郎卡郡，在那里工业萧条的苦难比別的任何地方都更为深重。郎卡郡的情况極为紧张，那里大部分工厂已經完全停工，而在那些还繼續生产的工厂中，工人在一星期內至多也只能工作两三天。不仅如此，極重要的棉紡織工业中心埃士頓的工厂主已經向工人宣布：一星期后将降低他們的工資 10%。这一使工人極为紧张的消息已經传遍全区。几天以后，在曼徹斯特召开了全郡工人代表會議，會議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見厂主，以便促使他們收回成命，取消降低工資的威胁。如果代表团得不到任何結果，郎卡郡棉紡織企业的全体工人将宣布罢工。这次罢工和北明翰冶金工人和矿工的已經开始的罢工联合起来，

很快就会达到象 1842 年爆發的最后一次总罢工那样可怕的規模。对政府說来,这次罢工很可能更为可怕。

同时,飢餓的爱尔兰又痛苦地抽搖着。習艺所已挤滿了乞丐,破了产的所有者再不願繳納济貧捐,飢餓的人們往往成千地集合在一起搶劫农場主的谷倉和畜圈,甚至搶劫不久前他們还極其敬畏的天主教神甫的谷倉和畜圈。

今冬,爱尔兰人看来决不願再象去年那样默默地餓死了。从爱尔兰进入英国的移民每天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着。据以往的統計,每年平均有 5 万爱尔兰人移入英国,而今年到英国去的則已經超过 22 万人。9 月份每天有 345 人进入英国,而 10 月份每天就达 511 人。这样,工人之間的竞争就日趋激烈,如果这次危机所引起的激动强烈到使政府必須同意实行極重要的改革,那是毫不足怪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10 月 23 日

載于 1847 年 10 月 26 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改革报”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英国的雇主和工人

致“工場”杂志的工人編輯¹⁴⁰

諸位先生！

剛才我讀了貴刊 10 月号上一篇題為“**英国的雇主和工人**”的文章；這篇文章根據“新聞報”的報道談到了 8 月 29 日在曼徹斯特舉行的所謂的郎卡郡棉紡織業工人代表大會。這次大會通過的決議成了“新聞報”用來證明英國的勞動和資本十分和諧的證據。

先生們，你們對法國資產階級報紙引自英國資產階級報紙的報道的真實性表示懷疑，這一點做得好極了。應該承認，這篇報道是很確切的，當時通過的決議正是“新聞報”所引証的那個。報道中只有很小的一個地方說得不够確切，但正是這個不够確切的小地方包含了問題的全部本質：“新聞報”所說的大會不是**工人**的大會，而是**工頭**的大會。

先生們，我在郎卡郡的中心，而且是在工人中間住過兩年。我既看見過他們的群眾大會，也看見過他們的人數不多的委員會會議。我了解他們的領袖和演說家，因而敢肯定地向你們說，比郎卡郡的這些棉紡織業工人更忠於民主原則的人，比他們更有決心打碎折磨着他們的剝削者資本家的枷鎖的人，在全世界的任何一個

国家里，都是无法找到的。我亲眼看到过工人们开会的时候把几十个厂主从会议厅的台上哄下来，他们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和高高举起的拳头使聚集在台上的资本家们吓得发抖。请问，难道现在这些工人会因雇主们俯允采取缩短劳动时间的办法，而不采取降低工资的办法，就对雇主们感恩不已吗？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吧。难道缩短劳动时间对工人来说不是等于降低工资吗？显然是等于降低工资；无论采取那一种方法，工人的境况同样是越来越坏。因此工人对雇主采取第一种办法而不采取第二种办法来减少工人的收入，并没有任何理由要加以感谢。可是先生们，如果你们翻一翻8月底的英国报纸，那末你们就会深信，棉纺织业厂主宁可采取缩短劳动时间的办法，而不采取降低工资的办法，是有许多原因的。当时原棉的价格上涨了；报道那次大会情况的同一号伦敦“地球报”也做了这样的报道：利物浦的投机商准备操纵棉纺织业市场，以便人为地抬高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曼彻斯特的厂主们怎么办呢？他们派自己的工头出席大会，叫他们通过象“新闻报”向你们报道的那样的决议。这是厂主们在投机商力图抬高棉花价格时所采用的尽人皆知的老办法。它是对投机商的警告，警告他们不要企图过分抬高价格，否则厂主们将减少对原料的需求，而这就必然会使价格下降。因此，使“新闻报”欢欣若狂和热烈赞赏的那次大会只是工头们的一次集会，这种集会在英国是谁也迷惑不了的。

只有厂主的机关报“曼彻斯特卫报”收到这份决议，其他报纸都是转载该报的，仅仅指出这一点，你们就更可以相信这次大会是资本家一手操纵的。工人民主派的报纸“北极星报”也引用了这一决议，但是在引用的时候加了一个足以向工人揭露它的按语，即指

出它是从这家资本家的报纸引来的。

此致……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0月26日左右

载于1847年11月“工场”杂志第2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工场”杂志

卡·馬克思

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

論德意志文化的歷史，駁卡爾·海因岑[⊖]

在宗教改革以前不久和宗教改革期間，德國人創立了一種獨特的、單是一個名稱就夠駭人的文學——粗俗文學。目前我們正處在類似16世紀的革命時代的前夜。粗俗文學重新出現在德國人面前是並不奇怪的。對歷史發展發生的興趣不難克服這類作品所引起的美學上的反感；這類作品早在15、16世紀就在那些甚至鑒賞力不高的人們中間引起過這種反感了。

16世紀的粗俗文學是：平淡無味，廢話連篇，大言不慚，象伏拉松¹⁴²一樣夸夸其談，攻擊別人狂妄粗暴，對別人的粗暴則歇斯底里地易動感情；費力地舉起大刀，嚇人地一揮，後來却刀背朝下地砍去；不斷宣揚仁義道德，又不斷將它們破壞；把激昂之情同庸俗之氣滑稽地結合一起；自稱關心問題的本質，但又經常忽視問題的本質；以同樣自高自大的態度把市僧式的書本上的一知半解同人民的智慧對立，把所謂“人的理智”同科學對立；輕率自滿，大發空言，無邊無際；給市僧的內容套上平民的外衣；反對文學的語言，給

⊖ 我回答海因岑先生並不是為了擊退他對恩格斯的進攻。海因岑先生的文章¹⁴¹值不得回答。我之所以回答是因為海因岑宣言為分析提供了有趣的材料。
——卡·馬·

語言賦予純粹肉体的性質（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喜欢在字里行間显示著者本人的形象：他磨拳擦掌，使人知道他的力气，他炫耀寬肩，向誰都摆出勇士的架子；宣揚健康的精神是寓于健康的肉体，其实已經受到 16 世紀極无謂的爭吵和肉体的感染而不自知；为狹隘而僵化的概念所束縛，并在同样的程度上訴諸極微末的实践以对抗一切理論；既不滿于反动，又反对进步；无力使敌手出丑，就滑稽地对他破口大罵；索洛蒙和馬科尔夫¹⁴³，唐·吉訶德和桑科·判扎，幻想家和庸人，两者集于一身；卤莽式的憤怒，憤怒式的卤莽；庸夫俗子以自己的道德高尚而自鳴得意，这种深信无疑的意識象大气一样飘浮在这一切之上。如果我們沒有記錯，德国人民的智慧已用“海涅卡——力大无穷的仆人”这首歌为它立下了一座抒情紀念碑。海因岑先生是复活这种粗俗文学的功臣之一，在这方面可以說，他是象征着各国人民的春天即将来临的一只德国燕子。

海因岑發表在“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第 84 号上的攻击共产主义者的宣言，为我們研究这种畸形文学（上面我們已經指出这种文学代表德国的历史兴趣的一面）提供了便利的机会。我們根据海因岑宣言来描述以这篇宣言为代表的文学变种，正如文学史家根据 16 世紀流传下来的作品描述 16 世紀的作家如“笨蛋传教士”[⊖]一样：

裴朗 藏好你的头，阿基里斯；赫克脫全身甲冑来了。

国王 跟这个人一比，赫克脫不过是一个特洛伊人。

鮑益 可是这是赫克脫嗎？

杜曼 我想赫克脫不会长得这么漂亮。

裴朗 这个人决不是赫克脫。

⊖ 托馬斯·穆尔納的綽号。——編者注

杜曼 他不是个天神，就是个画师，因为他会制造千变万化的脸相[⊖]。

但是，毫無疑問，海因岑先生就是真正的赫克脫。

他坦白地說：“很久以來，我就感到難受，我預感到我要被一個共產主義的阿基里斯一手打倒。而現在當我受到瑟息替斯的攻擊時，脫險的念頭又重新鼓起了我的勇氣……”

赫克脫只是預感到他要被阿基里斯一手打倒。

其實，海因岑先生這種關於阿基里斯和瑟息替斯的概念也許並不來自荷馬而來自施勒格爾所譯的莎士比亞？

於是他就把自己扮成了一個哀杰克斯。

讓我們來看看莎士比亞的哀杰克斯吧。

哀杰克斯 你再說，你這發霉的酵母，再說；我要打掉你這丑陋的皮囊。

瑟息替斯 我要罵開你那糊塗的心窩；可是我想等到你能够不瞧着書本念熟一段禱告的時候，你的馬也會背誦一篇演說了。你會打人嗎？你這害血瘟症的！

哀杰克斯 壞東西，把布告念給我聽。

瑟息替斯 我想，它說你是個傻瓜。

哀杰克斯 你這婊子生的賤狗！

瑟息替斯 你打，你打。

哀杰克斯 你這替妖精墊屁股的橈子！

瑟息替斯 好，你打，你打；你這下賤的莽驢子！他們叫你到這兒來打幾個特洛伊人，你却給那些聰明人買來買去，好象一個蠻族的奴隸一般……你這沒有肚腸的東西。

.....

瑟息替斯 怪事，怪事！

阿基里斯 什麼怪事？

⊖ 莎士比亞“愛的徒勞”。（第五幕第二場，參看朱生豪譯“莎士比亞戲劇集”，1954年作家出版社版第八冊第102頁。——譯者注）

瑟息替斯 哀杰克斯在戰場上走來走去，到處尋訪他自己。

阿基里斯 是怎麼一回事？

瑟息替斯 他明天必須單人匹馬去和赫克脫交戰；他因為預想到這一場英勇的廝殺，驕傲得了不得，所以滿口亂嚷亂叫，卻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阿基里斯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

瑟息替斯 他跨着大步，象一只孔雀似的走來走去，踱了一步又立定了一會兒；他那滿腹心事的样子，就象一個靠着腦筋打算盤的女店主在那兒計算她的賬目；他咬着嘴唇，裝出一副深謀遠慮的神氣，好象說：我這兒有一腦袋的神機妙算，你們等着瞧吧……我寧願做一只羊身上的虱子，也不願做這麼一個沒有頭腦的勇士。⊖

不管海因岑先生所戴的假面具是赫克脫還是哀杰克斯，他只要一出台，就象雷鳴一樣向觀眾宣布，他的敵手並未使它受到“致命的打擊”。他帶着純朴的心情，以荷馬敘述古代英雄的史詩般冗長的篇幅來講述他得救的原因，他說：“我之所以得救，是因為我有一個天賦的缺陷”。“天賦沒有把”我“降低到”敵手的水平。海因岑先生比他的敵手高出兩個頭，因此他那“小劊子手遠遠地照准打了”兩下都沒有觸及他那“文藝脖子”。並且特別着重地再三強調恩格斯先生“矮小”，說他是“小劊子手”，說他是“小人物”。接着就是一些古代英雄故事或者關於大漢歌利亞和矮子大衛^①的古代民間喜劇中才能見到的用語：“假如您吊得這樣高——吊在燈杆的頂端，——世界上就沒有一個人能夠發現您了。”這就是巨人的荒誕無稽而且聳人聽聞的幽默。

⊖ 莎士比亞“特洛埃勒斯與克蕾雪達”。（第二幕第一場，第三幕第三場，參看朱生豪譯“莎士比亞戲劇集”，1954年作家出版社版第十冊第141—143頁，第146、188—189、191頁。——譯者注）

① 參看舊約全書撒母耳記上第17章。——譯者注

海因岑先生不仅以如此“文艺的”手法显示了自己的“脖子”，而且显示了自己的全部“天赋”，显示了自己的整个身体。他把他那“矮小的”敌手摆在自己身边，以便通过对比来鲜明地突出自己体态的完美。“矮小的”丑兒在小手里拿着劊子手的屠刀——也許是1794年时送給小孩玩的一架袖珍断头台。而他本人却是一名威严的勇士，带着凶恶而輕蔑的冷笑，手中拿的武器不过是一条鞭子，正如他告訴我們的，他早就用这条鞭子来“懲罰”共产主义者这些可恶“兒童”的“輕举妄动”。巨人以师长的姿态和藹地对待他那“昆虫似的敌手”，沒有践踏这有勇无謀的小家伙。他以小孩的朋友的身份和藹地同他交談，給他講解道德，对他的重大毛病，如“撒謊”、“荒謬而幼稚地撒謊”、“蛮橫”、“暴躁”、无礼等等年輕人的毛病进行严肃認真的規劝。如果这时滿腔师长热情的巨人的鞭子不时在学生头上大声呼嘯，如果粗魯的語句間或中断了滔滔不絕的劝善良言，以至在某些地方完全抹杀这些格言的作用，那末，一刻也不要忘記，巨人并不能象昆圖斯·菲克斯萊恩¹⁴⁴一类的学校专任教师那样从事道德教育，不要忘記天性即使从門口被赶出去，又会从窗口跑回来。此外还应当注意，同样的話出自矮子恩格斯之口就是令人生厭的淫秽之言，而出自巨人海因岑之口就美妙得象自然界的音响那样入耳动听令人心醉。况且，以庸俗言論的狹隘尺度来衡量英雄的語言，这恰当嗎？当然不恰当，正象荷馬說他最喜爱的主人公之一哀杰克斯“頑固如駟”，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荷馬下降到了粗俗文学的水平一样。

巨人在“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第77号上向共产主义者显示自己的鞭子的时候也是出于这种好意的！¹⁴⁵而“矮小的”丑兒由于巨人根本不給以發言的机会，却对他并不那么領情（他对矮子这种捉

摸不透的傲慢无礼，曾多次地表示他那勇士的驚訝)。他埋怨說：“这絕不是进行忠告。”“恩格斯先生渴望我死；他想杀害我，这个恶棍。”

而他本人呢？無論在对待普魯士政府时，或者在这种情况下，他都是“热情奔放地展开斗争，在軍衣下面提出和平的建議，捧着一颗追求人道地調和当代矛盾的心灵”。[⊖]可是，(唉！)“这种热情飽含着詭計多端的刺激性水分”[⊗]。

伊瑟格林残暴凶狠。他爪子一伸，
张牙咧嘴，驀地冲了上去。
莱涅克机智地迅速閃开，連忙分泌出
强烈的刺激性水分，浸湿了毛茸茸的尾巴，
然后在沙里滾了一身薄泥。
伊瑟格林滿以为这下子可以把狐狸抓住。
誰知淘气鬼突然用潮湿的尾巴
往他眼睛上一打——狼的視力頓時模糊不清。
这是狐狸常玩的慣技，
已有不少野兽、不少无辜的人
受到过他那尿液的浸蝕。[⊘]

“恩格斯先生，我从干政治生涯开始就是共和主义者，我的信念沒有發生过变更和动摇，不象某些共产主义者的脑袋那样，时而朝东，时而朝西”[⊙]。

“不錯，現在我才变成了革命者。共产主义者的策略就是这样：他們意識到自己是不可改正的，所以，当敌手在改正自己的时候他們就非难敌手”[⊚]。

海因岑先生根本不是变成共和主义者的；他一开始他的政治

⊖ Karl Heinzen. «Steckbrief» (卡尔·海因岑：“逮捕令”)。

⊗ 同上。

⊘ 歌德：“狐狸-莱涅克”。

⊙ 海因岑宣言，“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第84号。

⊚ 同上。

生涯就是共和主义者。因此，他是前后一贯、坚毅不拔、始终如一的。而他的敌手则是出尔反尔、摇摆不定、经常转变。海因岑先生并非一向就是革命者；他是变成革命者的。不错，这一次是海因岑先生在转变；因此，情况就变了样：这些转变不再具有不道德的性质并且今后就叫做“自我改正”。而共产主义者的前后一贯却反而不再具有崇高道德的性质。那末它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不可改正”。

固定或者转变两者既是道德的，又是不道德的；从道德高尚的庸人方面来说是道德的，从他的敌手方面来说是不道德的。批评化的庸人高明的地方就是知道何时应当说“白”，何时应当说“黑”，善于在需要的时候说需要的話。

一般认为，无知总是一种缺陷。我们已习惯于把它看做负数。我们倒要看看庸人的批评的魔杖怎样把精神上的负号变成道德上的正号。

海因岑先生附带告诉我们，在哲学上，他现在同 1844 年时一样一直是门外汉。黑格尔的“语言”对他来说“始终不容易消化”。

事实就是这样的。接着就是在道德上的加工。

由于黑格尔的语言对海因岑先生来说一开始就“不容易消化”，所以他不象“恩格斯等人”似的迷住了心窍，一见好机会就不顾道德，高傲地吹嘘自己通晓这种黑格尔的语言，而是象人所共知的威斯特伐里亚农民一样，从来就没有“吹嘘自己通晓”梵文的妄想。但是要知道，真正的道德行为就是要避免为不道德行为造成任何口实；为了防止“吹嘘自己通晓”某种语言这一不道德倾向，便干脆不去了解这种语言，这倒确实是一种最简便的办法！

对哲学一无所知的海因岑先生自己认为，他没有进过“学

校”^①請教哲学老师就是为了这个緣故。他的学校是“人的理智”和“生活深处”。

他帶着一種老实人的謙遜的自豪感高声說道：“正因为这样，我才得以免除背弃自己的学派的危險。”

要防止在道德上背弃学派的危險，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参加学派！

一切發展，不管其內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發展阶段，它們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說，人民在自己的發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領域的發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而用道德的語言來講，否定就是背弃。

背弃！批評化的庸人可以絲毫不懂这个詞的含義而用这个詞來辱罵任何一种發展；他可以郑重其事地把自己本能上的發育不全完全相反地說成是道德上的十全十美。例如各国人民的宗教幻想把无罪的时代、黄金时代列在史前时期（当时还根本沒有任何历史發展，因此也沒有任何否定、任何背弃），从而辱罵了整个历史。又如在轟轟烈烈的革命时代，在強烈的、激情的否定和背弃的时代，例如 18 世紀，出現了正直而善良的大丈夫，出現了以停滯状态的田园生活來同历史的頹廢相對抗的素有教養、作風正派的蓋斯納之类的色鬼。但是为了嘉獎这些田园詩人（他們也是一些批評化的道德家和道德化的批評家），应当說，他們在評定牧人和山羊两者在道德方面誰數第一时所表現的那種猶豫不決的態度是誠懇的。

① 德文的《Schule》一字兼有“学派”的意思。——譯者注

讓道德高尚的庸人毫無拘束地尽情享受自己的优越感吧！我們就跟他到他在自己的想象中轉入“本題”的地方去。我們到處都會碰到這種方法。

“如果恩格斯先生和其他共產主義者對於權力也統治着財產，財產關係上的不公平全靠權力來維持這一點都視而不見的話，我就無可奈何了……凡是对資產者獲得金錢表示仇恨而对國王獲得權力却听其自然的人，我都把他們叫做糊塗虫和胆小鬼”[⊖]。

“權力也統治着財產。”

無論如何，財產也是一種權力。例如，經濟學家就把資本稱為“支配他人勞動的權力”。

可見，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權力：一種是財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權力，另一種是政治權力，即國家的權力。“權力也統治着財產。”這就是說：財產的手中並沒有政治權力，甚至政治權力還通過如任意徵稅、沒收、特權、官僚制度加于工商業的干擾等等辦法來捉弄財產。

換句話說，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還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國家的權力還沒有變成它自己的權力。在那些資產階級已經奪得政治權力的國家里，政治統治已成為資產階級對整個社會的階級統治，而不是個別資產者對自己的工人的統治，對於這些國家說來，海因岑先生的斷言就喪失了自己的意義。無產者同政治統治當然毫無共同之點，因為政治統治直接屬於財產。

這樣，海因岑先生以為自己道出了不僅是永恆的，而且還是獨創的真理，其實他只指出德國資產階級必須奪得政權這個事實，也

⊖ 海因岑宣言，“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第84號。

就是說，他所說的和恩格斯所說的是相同的話，但是，他却無意識地滿以為他說的是相反的話。其實，他只是慷慨激昂地把德國資產階級對德國政權的暫時關係宣布為永恆的真理，從而表明了怎樣把“運動”變成“僵硬的核⼼”而已。

海因岑先生繼續說，“財產關係上的不公平全靠權力來維持”。

或者海因岑先生把“財產關係上的不公平”理解為上述的壓迫，即德國資產階級甚至在自己“最神聖的”利益方面所受到的君主專制的壓迫，那末他就只是重復了上述的話，或者他把“財產關係上的不公平”理解為工人的經濟狀況，那末他的啟示就具有如下的含義：

現代的資產階級財產關係靠國家權力來“維持”，資產階級建立國家權力就是為了保衛自己的財產關係。因此，哪裡的政權落到資產階級手裡，哪裡的無產者就必須將它推翻。無產者本身必須成為權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權力。

海因岑先生又一次不自覺地說出和恩格斯所說的相同的話，並且又一次天真地自以為所說的是相反的話。他所說的不是他所想的，而他所想的卻又沒有說出來。

其實，如果資產階級從政治上即利用國家權力來“維持財產關係上的不公平”，它是不会成功的。“財產關係上的不公平”以現代分工、現代交換形式、競爭、積聚等等為前提，決不是來自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統治，相反，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統治倒是來自這些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宣布為必然規律和永恆規律的現代生產關係。因此，當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從而也使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然顛覆的物質條件尚未在歷史進程中、尚未在歷史的“運動”中形成以前，即使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它的

胜利也只能是暫时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輔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統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錘击，象魔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遺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懦怯的資產階級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給資產階級扫清了道路。同样，如果資產階級实行階級統治的經濟条件沒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暫时的。人們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見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財富”，而是靠他們垂死的世界上一切的历来自己創置的产业。他們在自己的發展进程中首先必須創造新社会的物質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們摆脱这个命运。

“人的理智”来自“生活深处”，并且不会因为任何哲学的或其他学术研究而破坏自己天然的習性，它的全部粗俗性格表現在：在它看出有差別的地方就看不見統一，在它看見有統一的地方就看不出差別。当它在規定差别的定义时，这些定义立即在它手下硬化为頑石，而它認為假如使这些僵化的概念互相撞击而打出火花，那是最有害的詭辯。

例如，海因岑先生談到金錢和权力、財產和統治、获得金錢和获得权力不同是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在字面上即已犯了同义反复的毛病，并且还覺得單純規定字面上的差別就是一桩了不起的功績，他自恃眼力过人，拿这种功績来同那些竟“盲目”到連这种初級的、純粹兒童的理解都不願一顧的共产主义者相对比。

“获得金錢”怎样变成“获得权力”，“財產”怎样变成“政治統治”，也就是說，为何不是象海因岑先生所奉为教条的那种硬性規定的差別，而是两种势力相互作用，直到两者合而为一；海因岑先

生要想了解这一切是不难的。問題只是他必須知道，农奴怎样为自己买得自由，公社¹⁴⁶怎样买得自己的市政权；市民一方面怎样利用工商业从封建主的口袋里攫取金錢并通过期票使他們的地产化为泡影，而另一方面又怎样帮助君主专制战胜因此而被削弱的大封建主并为自己买得他們的种种特权；然后他們怎样利用君主专制本身的財政危机等等；后来甚至君主专制本身又怎样由于现代工商业的产物——国債制度而依附于股票大王；在国际关系方面工业垄断又怎样直接变成政治統治（例如，在“德意志解放战争”中神圣同盟的各国君主就是英国豢养的雇佣兵）等等。

但是，当“人的理智”的傲慢的粗俗性格把获得金錢和获得权力之間的那些差别奉为“毫无疑問”应当“如此这般”去对待的永恒真理，把那些差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的时候，它就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合意的障地，可以从那里针对这类信仰符号的反对者的“盲目”、“愚蠢”或“卑劣”倾泻自己的道德憤怒。这种吵吵嚷嚷的粗暴發泄一方面引起了他的自我滿足，同时不过是用漂亮詞句做成的仅仅夹杂着两三个貧瘠真理的羹湯。

海因岑先生可要活到甚至普魯士的財產权力将同政治权力强迫成婚的时候。讓我們听下去吧：

“你們想把社会問題作为我們这个时代的主要問題，可是你們沒有看到，沒有任何社会問題比关于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問題更为重要。”[⊖]

刚才海因岑先生看到的只是金錢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間的差別；而現在他看到的却只是政治問題和社会問題之間的統一。其实，他看到的当然还有敌手們的“可笑的盲目”和“可鄙的胆怯”。

⊖ 海因岑宣言，“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第84号。

人們的政治关系同人們在其中相处的一切关系一样自然也是社会的、公共的关系。因此，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問題都是社会問題。

粗汉天真地以为說出只有在 8 岁兒童用的教义問答中才能碰到的类似观点，就意味着不仅說出了什么东西而且还在現代冲突的天平上加了一些重量。

沒有想到“在我們这个时代探討”的“社会問題”随着我們步出君主专制的領域而日益重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起源于德国而起源于英国、法国和北美。

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出現于資产階級革命时期君主立宪废除的时候。首先宣布这些“社会問題”的是最徹底的共和主义者，即英国的“平均主义者”¹⁴⁷、法国的巴貝夫和邦納罗蒂等。巴貝夫的朋友和党内同志邦納罗蒂所写“巴貝夫的密謀”¹⁴⁸一書表明这些共和主义者怎样从历史“运动”中得出一种信念：随着君主制和共和制这一社会問題的消失，还没有一个“社会問題”的解决是对无产階級有利的。

财产問題，既然在“我們这个时代”提出，决不能把它仅仅归結为（照海因岑的說法）重新闡明：“一个人拥有一切而另一个人一无所有，个别人一般可以拥有某些东西是否公平”，也不能归結为类似的简单的良心問題和关于公平的詞句。

财产問題的表现形式極不相同，这是同一般工业發展的不同阶段和各国工业發展的特殊阶段相适应的。

例如，对加里西亚的农民來說，财产問題归結为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变成小資产階級的土地所有制。这个問題对于他們來說和对于 1789 年前夜的法国农民來說，意义是一样的。相反，英国的

农业工人同土地所有者沒有任何关系。他只同农場主即用办工厂的同一原理办农場的經營資本家發生关系。这种經營資本家从自己这方面說由于付給土地所有者以地租而同所有者直接發生关系。因此，对英国工业資產階級來說，消灭土地所有制是最重要的財產問題，它对谷物法进行斗争，正具有这种意义。对英国农业工人來說則相反，他們和英国工厂工人一样，對他們來說消灭資本乃是最重要的財產問題。

無論在英国革命或者法国革命中，財產問題的提法都歸結为給竞争以广闊的自由和消灭一切封建財產关系，即封建領地、行会、垄断等等，因为这些关系在 16 至 18 世紀时期中变成了工业發展の桎梏。

最后，在“我們这个时代”，財產問題的意义在于消灭因大工业、世界市場和自由竞争的發展而造成的冲突。

財產問題从来就随着工业發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这个或那个階級的切身問題。17、18 世紀时要废除封建財產关系，財產問題就是資產階級的切身問題。19 世紀时要废除資產階級財產关系，財產問題就是工人階級的切身問題。

可見，在“我們这个时代”作为全世界历史性的問題的这个財產問題，只是在現代資產階級社会中才有意义。这种社会愈發达，一个国家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就愈發展，因而国家的权力就愈具备資產階級性質，那末社会問題就愈尖銳：法国比德国尖銳，英国比法国尖銳，君主立宪的国家比君主专制的国家尖銳，共和制的国家又比君主立宪的国家尖銳。例如，信用制度和投机等等引起的冲突在北美比任何地方都更为尖銳。同样，社会的不平等在北美东部各州也表現得比任何地方都突出，因为在这里社会的不平等不

象在別的地方那樣為政治的不平等所掩蓋。至於說這裡的赤貧現象還沒有發展到象英國的那種程度，自有其經濟上的種種原因，我們不能在此一一闡述。不過，這裡的赤貧現象也是很可觀的。

“這裡沒有特權等級，社會上的一切階級都有平等的權利（但是困難正在於階級的存在）^①，而且我們的人口還遠沒有達到妨礙生活資料發展的地步，在這樣一個國家里竟看到赤貧現象這樣猛烈地增長，實在令人吃驚。”（梅勒迪斯先生向賓夕法尼亞州議會作的報告¹⁴⁹）

“已經證明：在二十五年的時期中馬薩諸塞州的赤貧現象增長了 60%。”（摘自美國人奈爾斯的“紀事”¹⁵⁰）

北美的最有名的經濟學家之一、激進主義者托馬斯·庫伯建議：

- （1）禁止無產者結婚。
- （2）取消普選權，他大叫說，因為

“社會是為保護財產而建立的。由於永恆的經濟規律永遠得不到財產的人還要求享有頒布關於他人財產的法律的權利，這怎麼合理呢？這兩個階級的人怎麼能有共同的動機和利益呢？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工人階級的情緒是不革命的，那末，他就捍衛他賴以生存的業主的利益。例如，在新英格蘭最近的選舉中，廠主們力圖保證自己的選票，把他們的候選人名字印在白布塊上，而他們的每個工人都在自己褲子的前檔上戴上這樣一塊白布。

“或者是工人階級由於共同的集體生活等等而成為革命的，那末，國內的政權遲早要轉到它的手里，而在這種制度下任何財產都是沒有保障的”。^②

工人們在英國以憲章派為名、在北美以民族改良派為名分別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② 托馬斯·庫伯：“政治經濟學講義”哥倫比亞版第 361—365 頁〔Thomas Cooper.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Columbia, p. 361—365〕。

形成政党，其战斗口号根本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而是以**工人階級的統治代替資產階級的統治**。

現代資產階級社会有其与本身适应的立宪或共和的代議制国家形式。既然正是在这个現代資產階級社会中“财产問題”成了最重要的“社会問題”，那末，只有德国小市民的狹隘要求才使得他終於叫喊出什么**君主制問題**就是“我們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社会問題”。同样李斯特博士在“国民政治經濟学”¹⁵¹的序言中对于人們“錯誤地認為”我們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問題是**赤貧現象**而不是**保护關稅**这一点也表示天真的煩惱。

金錢和权力之間的差別同时又是战斗双方的个人差別。

“小家伙”以小扒手姿态出現，只同拥有“金錢”的敌人周旋；神話般的壯士与他不同，他是向这个世界上的“权貴”作斗争。

Indosso la corazza, e l'élmo in testa. [他身穿鎧甲，头戴鋼盔。]⊖

并且喃喃說道：

“不过，在这里閣下比我处境更好。”⊖

但是，处境最好的还是这个世界上的“权貴”，当海因岑先生向自己的学生發起如下的进攻时他們轻松地喘了一口气：

“現在您和一切共产主义者一样丧失了**鑒別政治情况同社会情况之間的联系的能力**。”⊖

剛才我們听到伟大人物以惊人的簡潔在大体上闡述了**政治情况和社会情况之間的联系**的道德說教。当即又以**君主制**为例直觀

⊖ Ariosto. «Orlando Furioso» [阿里欧斯托：“瘋狂的罗兰”]。

⊖ 海因岑宣言，“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第84号。

⊖ 同上。

地教給自己的学生如何实际运用这种方法。

他說，君主，即君主制是“一切灾难和貧困的祸首”。在君主制已經废除的地方用这种方法解释显然是不行的，因此，曾使古代共和国走向灭亡、又将在北美合众国南部各州导致可怕冲突的**奴隶制**⊖就会用約翰·福斯泰夫的話高声地說：“啊，要是理由能賤得象烏莓子一样有多好啊！”¹⁵²

但是，首先要明白：君主和君主制是某一个人产生的呢，还是某一个东西产生的？

有一个时候，人民为了公共的利益曾經必須以最优秀的人物作为自己的首領。后来，这个职位开始在一定的家族内部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最后，由于人們的愚蠢和墮落，这种濫用現象得以維持數百年之久。

即使把欧洲所有的天生健談之士召集在一起会談，他們也不能做出另外的回答。如果你們看完海因岑先生的全部文章，你們从里面也找不到別的答案。

坚实的“人的理智”以为宣布自己是**君主制的反对者**，就是对它做了解释。但是对这个正常理智來說，最困难的似乎应当是說明：人的理智和人的道德品格的反对者来自何处，他又怎样把自己那种惊人頑强的寿命延长了好几百年加以說明。这是再簡單沒有了！沒有人的理智和人的道德品格，这几百年也过来了。換句話說，數百年的理性和道德同君主制相适应而不是同它相矛盾。我們这个时代的“人的理智”所不能了解的正是以往數百年的这种理性和这种道德。它不了解它們，可是却看不起它們。它从历史的

⊖ 关于这一問題請參看美利堅合众国奠基人之一、連任兩屆美国總統的杰弗遜的回忆录。

領域逃到道德的領域，所以，它在这里也可以把自己的道德憤怒的重炮全部放射出來。

正如政治的“人的理智”在这里說君主制的起源和長期存在是由于考慮不周一樣，宗教的“人的理智”也說異教和不信教是由魔鬼一手造成的。同樣，非宗教的“人的理智”也說宗教是由神甫這樣一種魔鬼一手造成的。

既然海因岑先生已經用道德方面的老生常談論證了君主制的起源，那末，得出關於“君主制和社會情況之間的聯繫”的結論是十分自然的。請聽：

“一個人把整個國家抓在自己手里，使全體人民或多或少地不僅在物質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為他個人和他的親信犧牲，在人民中造成高低不同的層次階梯，象區分肥肉瘦肉一樣把人民分成等級，並且實質上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同一國家的每一成員變成另一成員的公開敵人。”[⊖]

海因岑先生看到君主處於德國社會大廈的最上層。他毫不懷疑：最上層的社會基礎就是他們創造的並且他們每天都在重新創造這種基礎。君主制是社會狀況的公開政治表現，要解釋兩者間的聯繫，除了把君主說成是這種聯繫的創造者以外，還能有比這更簡單的解釋嗎！代表機關同它們所代表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有什麼聯繫呢？它們創造了社會！例如政治偶像及其機構和層次階梯創造了罪惡世界，而政治偶像是罪惡世界的至聖物。例如宗教偶像創造了世俗狀況，而這些世俗狀況反映在宗教偶像中也是一些虛幻的、天上的東西。

以高度熱情宣揚類似的簡陋智慧的粗漢們自然一定要以驚異

⊖ 海因岑宣言，同前。

而又憤的目光來看待敵手，因為後者挺身出來向他們證明：蘋果並不創造蘋果樹。

現代歷史編纂學表明，君主專制發生在一個過渡時期，那時舊封建等級趨於衰亡，中世紀市民等級正在形成現代資產階級，鬥爭的任何一方尚未壓倒另一方。因此構成君主專制的因素決不能是它的產物；相反，這些因素所構成的倒是它的社會前提，這種前提的歷史淵源人們已經很清楚了，沒有重提的必要。德國的君主專制發生較晚、維持較久，這只能以德國資產階級的畸形發展來解釋。關於這個發展之謎可以在工商業的歷史中找到答案。

德國小市民自由城市衰落，騎士等級消滅，農民遭到失敗，這一切決定了領主王公最高權力的確立；現代世界市場和大型手工工場出現時，以純粹中世紀關係為基礎的德國工商業衰落了；三十年戰爭留下了人口絕滅的淒慘景象；振興的民族工業部門（如小型亞麻生產）具有與宗法關係和情況相適應的性質；由於輸出的多半是農產品，因而在物質生活來源上有所增加的幾乎全是貴族地主，他們對市民來說，勢力也就相對增大；德國在世界市場上一般處於從屬地位，所以國民收入以外國人对王公們的接濟為主要來源；因此市民就依附於王室；——形成德國社會面貌和同它相適應的政治組織的諸如此類的情況，在粗漢的人的理智看來，已變成一些英明的箴言，而其全部英明所在就是“德國君主”創造了“德國社會”並且每天都在重新“創造”它。

使人的理智得以“看出”君主制是德國社會的發源地，而不把德國社會看成是君主制的發源地的那種錯覺是不難解釋的。

它初看之下（它往往以為初看就非常透徹），發現德國君主們在維持和堅持他們政治生命所系的德國舊社會秩序，並且對破壞

性因素使用暴力。另一方面，它又看見破壞性因素也在同君主的權力作鬥爭。於是健全的五官全部出馬，證明君主制是舊社會及其等級結構、偏見和矛盾的**基礎**。

但是仔細觀察一下，這種現象只推翻了它無意中為其充當論據的那一幼稚觀點。

君主制所扮演的暴虐、反動角色只是表明在舊社會的孔隙中形成了新社會，這種新社會必然也感到政治外壳（舊社會的天然外皮）是反自然的桎梏而必須撐破。這些新的破壞性社會因素越不發達，舊政權的即使是最凶猛的反動派也越保守。這些新的破壞性社會因素越發達，舊政權的即使是最無關緊要的保守意圖也越反動。君主權力的反動性並不證明這種權力創造舊社會，倒是相反地證明，只要舊社會的物質條件消亡，君主權力本身也就消滅[⊖]。它的反動性同時就是舊社會的反動性，因為舊社會仍然是**官方的社會**，因此也仍然是權力的**官方享有者或官方權力的享有者**。

當社會生存的物質條件發展到迫切需要變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時候，舊政權的整個面貌就發生變化。所以，現在君主專制不實行**集權**（集權本是它的開明措施）而打算實行**分權**。君主專制產生於封建等級垮台以後，它積極參加過破壞封建等級的活動，而現在卻力圖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據的**外表**。如果說君主專制從前保護過工商業，以此鼓勵過資產階級上升，並且還曾經把工商業看做使國家富強、使自己顯赫的必要條件，那末現在君主專制到處都成了工商業（它們正在成為已經很強大的資產階級手中日益可怕的武

⊖ 談話語：《machen》是“創造”，《abmachen》是“消滅”。——編者注

器)發展道路上的障礙。它那胆怯而魯鈍的目光又从使它繁榮的搖籃——城市,轉到了它从前埋葬強敵的地方——乡村。

但是,海因岑先生把“政治情况同社会情况之間的联系”,仅仅理解为德国君主制同德国的灾难和貧困之間的联系。

从物質方面說,君主制也和其他一切国家形式一样,直接用捐稅来加重工人階級的負擔。捐稅体现着表現在經濟上的国家存在。官吏和僧侶、士兵和舞蹈女演員、教师 and 警察、希腊式的博物館和哥德式的尖塔、王室費用和官阶表这一切童話般的存在物于胚胎时期就已安睡在一个共同的种子——捐稅之中了。

哪一个饒舌的庸人不会向飢餓的老百姓指出,捐稅,这种君主得来的不义之財就是他們貧困的根源?

德国的君主和德国的貧困!換句話說,就是君主們得以驕奢淫逸、人民以自己的血汗为代价付出的捐稅!

对于那些高談闊論的人类救世主,材料是多么丰富啊!

君主制要求龐大的开支,这是毫无疑問的。就拿北美的国家預算来同我們的 38 个小国为了受統治和被控制所必須繳納的数目来比較一下吧!这些妄想蠱惑人心的粗暴攻击,甚至无須共产主义者講話,只要如李嘉圖、西尼耳等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用三言兩語就可以駁倒了。

国家存在的經濟体现就是捐稅。

工人存在的經濟体现就是工資。

必須确定捐稅和工資之間有什么关系。

由于竞争的結果,平均工資必然下降到最低限度,就是說下降到勉强維持个人和后嗣生存的地步。捐稅就是这种最低工資的一部分,因为工人的政治使命正是繳納捐稅。假如工人肩負的全部

捐稅用激進的辦法廢除，結果必然是從工資中扣除目前付出的捐稅總額。因此，不是同樣直接增加雇主的利潤，就是僅僅變換徵稅的形式。先前是資本家把工人應繳的捐稅連同工資一起發給，現在則是不經過轉手而把這些捐稅直接付給國家就是了。

如果說北美的工資高於歐洲的工資，那末，這絕不是由於北美的捐稅較輕，而是由於北美的地理位置及其工商業的緣故。在那裡勞動力求過於供的情況遠遠超過歐洲。這一真理是每個中學生都早已從亞當·斯密那裡就知道的。

對資產階級來說則相反，捐稅的分配、徵收和使用的方法之所以成為切身問題，不僅是由於它對工商業起着影響，而且還因為捐稅是可以用來扼殺君主專制的一條金鎖鏈。

海因岑先生對“政治情況同社會情況之間的聯繫”和“階級關係”同國家權力之間的聯繫進行了如此深刻的說明之後，得意揚揚地大聲叫道：

“的確，我在自己的革命宣傳中沒有犯‘共產主義者的局限性’的毛病——不面向人們，只面向‘階級’，唆使不同‘行業’的人們互相反對。這是因為我承認‘人性’不總是以‘階級’或‘錢包的大小’為轉移的‘可能性’。”

“粗俗的”人的理智把階級差別變成了“錢包大小的差別”，把階級矛盾變成了“各行業之間的爭吵”。錢包的大小純粹是數量上的差別，它可以尽情唆使同一階級的兩人互相反對。大家知道，中世紀的行會是在“行業差別”的原則上互相對立的。但是大家也知道，現代的階級差別絕不建立在“行業”的基礎上；相反，分工在同一階級內部造成不同的工種。

海因岑先生把完全從他本身的“生活深處”和他本身的“人的理智”中取來的他本身的“局限性”可笑地稱為“共產主義者的局

限性”。

我們暫且假定，海因岑先生知道他說的是什麼，因而假定他說的不是錢包的“各種大小”，不是“各行業之間的爭吵”。

單獨的個人並不“總是”以他所從屬的階級為轉移，這是很“可能的”；但是這個事實不足以影響階級鬥爭，正如少數貴族轉到 tiers état [第三等級] 方面去不足以影響法國革命一樣。而且就在這時，這些貴族至少也加入了一定的階級，即革命階級——資產階級。然而海因岑先生卻硬要一切階級在“人性”這個熾熱的思想面前消失。

如果海因岑先生認為，以不依自己意志為轉移的經濟條件做為存在的基础並因這些條件而彼此處於極尖銳的對抗中的各階級，可以靠一切人們所固有的屬性“人性”而越出本身存在的現實條件，那末，某一個君主主要靠自己的“人性”而使自己超出自己的“君主的權力”，超出自己的“君主的行業”該是多麼容易呵！當恩格斯看出海因岑先生的革命詞句背後是“好心的皇帝約瑟夫”時，海因岑先生竟不能原諒恩格斯，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但是海因岑先生一方面由於極不明確地對待德國人的“人性”而抹掉一切差別，甚至不惜把自己的號召擴大到君主身上。而另一方面又認為自己必須在德國血統的人們中間確立一種差別，因為沒有差別就沒有對立面，而沒有對立面就沒有材料進行卡普勤^①式的政治說教。

因此，海因岑先生就把德國血統的人們劃分為國君和臣民。海因岑先生看到了這種對立面並且對它作了表述，在他自己看來，

① 見本卷第 224 頁腳注。——譯者注

这是一种道德力量的表现，是具有个人胆量、政治头脑、激动的人的感情、严肃态度、远见和值得敬佩的勇敢的明証。如果注意到，臣民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特权者不但看不出政治等级是降低人格的阶梯，却反而认为它是飞黄腾达的途径，甚至那些把臣服看做是锁链的臣民（对这些锁链的重压的感受很不一致）也注意到这一切，那就表明自己毫无理智、表明自己有警察思想。

然而却冒出一些“狭隘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不仅看出了国君和臣民之间的政治差别，而且看出了阶级间的社会差别。

一分钟以前海因岑先生在道德上的伟大之处在于看出了差别并给以表述，现在他的伟大之处却在于看不出差别、不予注意而且加以掩盖。表述对立面的言语由革命的言语一变而成为反动的、恶毒地“唆使”被人性团结在一起的弟兄互相反对的言语。

大家知道，七月革命后不久，胜利的资产阶级在九月法令中规定（大概也是为了“人性”）“唆使各阶级的居民互相反对”为最大的政治罪行，违者囚禁，课以罚金等等。¹⁵³ 其次，大家知道，英国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也放弃其他一切告密形式而宁愿责难宪章派的领袖和共和主义者唆使一些阶级的居民去反对另一些阶级的居民。甚至大家也知道，德国的作家们就是因为唆使各阶级的居民互相反对而被活活埋葬在城堡中的。

这一次海因岑先生是不是在用法国九月法令、英国资产阶级报纸和普鲁士刑法典上的言语讲话呢？

不是。善良的海因岑先生担心的只是共产主义者“企图用革命的排毒法¹⁵⁴使君主免除危险”。

比利时的自由派硬说激进派同天主教徒串通；法国的自由派硬说民主派同正统派串通；英国的自由贸易派硬说宪章派同托利

党人串通；同样，海因岑先生也硬說共产主义者同君主串通。

正如我已在“德法年鑒”上証明的，德国染上了基督教德意志的特殊病症¹⁵⁵。它的資產階級出現太晚了，当它开始同君主专制进行斗争而力圖确立自己的政权的时候，一切先进国家中的資產階級已經在同工人階級进行残酷的斗争了，它那种政治幻想在欧洲人的意識中早已过时。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还保存着君主专制的政治貧乏以及一大群已趋沒落的半封建等級和关系，同时又局部地存在着由于工业的發展和德意志对世界市場的依附而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引起的現代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斗争；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¹⁵⁶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德国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尚未形成階級之前就同无產階級处于对抗地位。“臣民”之間的斗争不顧一切汉巴赫之歌¹⁵⁷而在君主和貴族被赶出国土之前就爆發了。

海因岑先生对这种充滿矛盾的事态（这当然会在德国文学上有所反应）做不出別的解释，只是說，这要唯敌人的良心是問，这是共产主义者进行反革命陰謀的后果。

可是德国工人非常清楚：君主专制在为了討好資產階級而向无產階級敬以霰弹和皮鞭的时候是毫不犹豫的（而且也不能犹豫）。既然如此，他們为什么还宁肯受专制政府及其半封建侍从的粗暴压迫而不願受資產階級的直接統治呢？工人非常清楚：資產階級不仅在政治上必将比君主专制對他們作出更大的讓步，而且为了自己的工商业它还会违背自己的意旨为工人階級創造团結的条件，工人階級的团結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工人知道，要消灭資產階級的財產关系不能通过保存封建的財產关系来实现。他們知道，資產階級反对封建等級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

使他們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进展。他們知道，他們自己同資產階級的斗争只有在資產階級胜利之日才能开始。尽管如此，他們对海因岑先生的資產階級幻想也是不会同意的。他們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資產階級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絲毫也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終目的。

工人在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在不久以前反谷物法同盟的运动中，英国宪章派就做出了光輝的范例。他們一刻也沒有相信資產階級激进主义者的虛伪保証和捏造，一刻也沒有停止同他們作斗争，他們充分自覺地帮助自己的敌人战胜了托利党人；但是当谷物法废除后的第二天在选举斗争的战场上两相对抗的已不是托利党人和自由貿易派，而是自由貿易派和宪章派了。宪章派就是因为同这些資產階級激进主义者作斗争才在議會中給自己爭得了席位。

正如对工人不大了解一样，海因岑先生也不大了解資產階級自由派，虽然他在无意地为他們服务。他認為有必要违背他們的意願再三重复反对“德国的和善、温順”的老調。他这位道德高尚的大丈夫对某一个康普豪森或汉澤曼所販卖的奴才言論信以为真。資產者先生們会嘲笑这种幼稚的。他們哪里有毛病，他們自己更清楚。他們知道，革命中的老百姓是莽撞的和过火的。因此，資產者先生們千方百計总想不經過革命而用和平方式把专制君主国改造成資產階級君主国。

但是普魯士的专制君主国也和从前英国和法国的一样，是不願意自动变成資產階級君主国的。它是不会自动退位的。除了君主本人有偏見以外，还有大批的文职、軍职和神职官僚束縛住他們的双手，因为君主专制的这一組成部分是絕對不願意拿自己的統

治地位去換取資產階級手下的职位的。另一方面，封建等級又極端保守；對他們來說這是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問題，也就是財產的保留或者被剝奪的問題。儘管資產階級以一切忠心耿耿的誓言來表示自己的忠誠，專制的君主依然認定他的真正利益同這些等級的利益是一致的，這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正如某些拉利-托朗達爾、穆尼哀、馬魯埃和米拉波的甜言蜜語未能說服路易十六堅決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封建主和君主專制的殘余一樣，所有這些康普豪森和漢澤曼之流的海妖之歌也不能對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有所迷惑。

但是海因岑先生既不同德國資產階級打交道又不同德國無產階級打交道。他的政黨就是“人們的黨”，所謂人們就是指那些以“人類”目的為幌子、為“資產階級”利益沖鋒陷陣，但同時又沒有意識到理想主義詞句與其現實主義實質之間的聯系的誠實正直而胸襟開闊的幻想家。

國家締造者海因岑先生向自己的政黨即人們的黨，或者說得更確切些，安居在德國的人類的黨推薦“最好的共和國”、他親自策劃的最好的共和國，即“具有社會制度的聯邦共和國”。盧梭曾為波蘭人草擬過最好的政治制度，馬布利也曾為科西嘉島上的居民草擬過最好的政治制度。偉大的日內瓦公民找到了一個更偉大的繼承者。

“我只能(多麼謙卑!)^①用共和制的因素構成共和國，正如只能用花瓣構成花朵一樣。”^②

一個會用花瓣構成花朵，即使是一朵雛菊的人，大概他也能構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② 海因岑宣言，“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第84號。

成“最好的共和国”吧，不管墮落的人世就这一点說了些什么。

英勇的国家締造者对一切恶意攻击置之不理而把北美共和国的宪法作为自己的标本。凡是他认为不体面的，都用他那粗汉之笔删去。結果他就得到了 *in usum delphini* [皇太子用的]⊖、也就是为“德国人”謀福利的修訂本。于是，当他对“共和国、而且正是已确定的共和国的情景”加以描述之后，就“揪住”这“矮小的”无礼学生的“共产主义耳朵”一把提将起来，声色俱厉地質問道：这个人是否也能“造出”一个世界、并且是“最好的世界”？他“揪住共产主义耳朵”把“小家伙”一个劲“往上”提，直到后者的“鼻子碰到”“新世界——最好的共和国的大圖时为止。他把他所設計的这幅世界大圖小心翼翼地亲自挂上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

«*Cacatum non est pictum*» [塗抹并不是繪画]——拒不悔改的“小”蛇發出嚙嚙的叫声。

共和主义的哀杰克斯在盛怒之下把共产主义的瑟息替斯摔倒在地，并从他那毛茸茸的寬闊胸膛里冲出了可怕的字眼：

“您可笑到了極点，恩格斯先生！”

的确，恩格斯先生！难道您不認為“美国联邦制度”是“历来的治国艺术梦寐以求的最好的政治形式嗎”？您搖頭！甚么？您根本否認“美国联邦制度”是“治国艺术”梦寐以求的嗎？什么，“社会的最好的政治形式”只 *in abstracto* [抽象地] 存在？真是奇怪！

同时，您竟“厚顏无耻，昧着良心”硬要我們認為，想利用北美宪法（而且是經過美化和改善的）来为亲爱的祖国謀福利的正直的德国人好比一个抄袭自己的富裕对手的賬簿的愚蠢商人，自以为

⊖ 这是 17 世紀下半期法国皇太子专用的拉丁文書籍的注脚，書中“不道德”之处均被删去并加这样的注脚。——編者注

有了这份抄本就占有了对方使他眼紅的財富！

您似乎还用您小手里的“劊子手的屠刀”、用 1794 年时送給您玩的袖珍断头台来威胁我們吧？您自言自語地說，巴巴魯和其余的彪形大汉在玩弄断头台的时期被砍去脑袋，是因为他們无意中叫出了“美国联邦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形式”¹⁵⁸。所有那些人，即当欧洲、特别是当完全处于封建割裂状态的德国發生某一民主革命的时候，不去爭取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及其归于統一的中央集权，而企圖去培植“美国联邦制度”的歌利亚們，也要得到同样的下場。

我的上帝！公安委员会¹⁵⁹的委員們和支持他們的雅各宾吸血鬼原来都是一些惨无人道的暴徒，而海因岑式的“最好的共和国”却是“历来的治国艺术”为了“人”、为了好人、为了人道的人而“梦寐以求”的“最好的政治形式”！

的确！“您可笑到了極点，恩格斯先生！”

此外，締造国家的海格立斯絕不是依样画葫蘆地抄袭北美的“联邦共和国”。他用“社会制度”将它裝飾起来，他許以“在合理的基础上調整财产关系”，而他用来消除資产階級旧社会的“缺点”的七大“措施”絕不是从現代不中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飯館里討来的淡而无味的残羹剩飯。伟大的卡尔·海因岑开的“使社会人道化”的藥方，应当归功于“印加族”和“康培的兒童讀物”¹⁶⁰，同样，上述他那意味深长的詞句不应归功于哲学家波美拉尼亚人卢格，而应归功于英明到头髮都發白的“秘魯人”。可是恩格斯先生把这一切称为純系任意捏造的美化世界的庸俗幻想！

不錯，在我們这个时代“比較优秀的人們日益消失”而“最优秀的”总是完全不为人所了解。

譬如，举一个善良的市民为例，讓他憑良心說：現代“财产关系”的毛病是什么？这个善良的汉子一定会把食指按在額角上，意味深长地嘆两口气，然后“毫不肯定地”說，許多人“一”无所有，甚至沒有起碼的必需品，而另外一些人不但搜刮衣不蔽体的无产者而且搜刮可敬的市民，他們象貴族一样手中积累起千千万万的不义之財，这是耻辱。Aurea mediocritas！中庸！——中等階級的勇士叫了起来！就是要避免極端！哪有可以同这些極端、这些極端、这些最可鄙弃的極端相容的合理的国家制度！

現在来看看海因岑式的具有“社会制度”以及“使社会人道化”的七大措施的“联邦共和国”。这里对每一个公民的“最低限度”财产（他至少不能低于这个水平）作了保證，同时也对他的“最高限度”财产（他至多不能超过这个水平）作了規定。

当海因岑先生以国家法令的形式重申了一切正直市民的虔誠願望——人人所有既不太多、也不太少，——从而实现了这个願望的时候，一切困难不是都解决了嗎？

海因岑先生就是用类似的既簡單而又冠冕堂皇的办法解决了全部經濟矛盾。他在合乎道德高尚的大丈夫的正义感的合理基础上对财产进行了調整。不消說，“合理調整”财产正是那些在冷酷的必然性面前不得不把一切正义“措施”化为灰烬的“經濟規律”，虽然这些措施是印加族和康培的兒童讀物所推荐的并且是最極端的爱国志士所竭誠拥护的。

在一个与众不同、不“夸耀自己对政治經濟学有研究”而是相反地，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一直善于保持謙遜朴質，好象他在政治經濟学的研究中刚刚打算开步走的人面前提出經濟学的見解来同他爭論，是多么失当啊！正因为这个人虽然受的教育不多，却能煞

有介事地提出1842年以来早已通过奥格斯堡“总汇报”透入德国生活深处的一切¹⁶¹，如替“获得的”财产、“个人自由和个性”担心等等来反对共产主义敌人，所以才是很了不起的。真的，共产主义作家的精神堕落是严重的，其标志就是他们只在对经济学和哲学有修养的人们中间挑选敌手，而对粗汉的人的理智所发出的“毫不肯定的”攻击却置之不理，他们首先应当把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常识教给粗汉的人的理智，然后才有可能就这些问题同它进行辩论。

例如，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从属的、已趋没落的，而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既然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都是阶级关系，（这是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每一个学生都应当知道的，）那末，这些关系当然只有在各阶级本身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变化或根本消灭；而阶级间的关系的变化就是历史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总之，是一定“历史运动”的产物。著作家可以献身于这个历史运动，成为它的表现者，但是，不言而喻，他不能创造运动。

例如，为要说明封建的财产关系的消灭，现代历史学家就必须指出现代运动的特征，这就是在运动的进程中，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其生活条件已充分发展，它完全可以消灭一切封建等级和它自己先前的封建生存方式，因而也可以消灭这些封建等级赖以进行生产的封建生产关系。可见，封建财产关系的废除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建立绝不是由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做出结论的学说中产生出来的。相反，资产阶级著作家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期提

出的原則和理論无非是实际运动在理論上的表現，同时可以精确地看出，这种理論上的表現以其所处实际运动的阶段的不同而反映出空想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学理主义的程度也往往不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不揣冒昧地向自己的可怕的敌手、締造国家的海格立斯講到作为“运动”之理論表現的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論的时候）。

但是，我們这位巨人在道德高尚的憤怒之下叫道：“我是想把实际后果弄个明白，我是想使共产主义的‘代表們’承認这些后果，”也就是說，在对資产階級私有制仅有虛幻概念的人的心目中必然同私有制的废除相联系的那些荒謬的后果。他是想迫使恩格斯“为一切荒謬的話辯护”，照海因岑先生的英勇策划看来，这些荒謬的話恩格斯“是会摆到光天化日之下来的”。但是萊涅克-恩格斯使这位道德高尚的伊瑟格林大失所望，他在共产主义中找不到任何可以“吞噬”的“核心”，并惊异地自問：“这种現象須怎样加以烹制才能食用？”

善良的大丈夫用花言巧語来自慰的企圖沒有得逞，例如，他提出历史运动豈不是“人的感情的运动”等等反問，甚至恳求伟大的“卢格”的灵魂为他破这个自然之謎！

失望的汉子叫道：“事情發生以后，西伯利亚的严寒封住了我的心；事情發生以后，我总是感到有人叛变，梦到有人暗算”[⊖]。

实际上，他最后对問題做出的解释是恩格斯“背弃自己的学派”，“胆小而可笑地退却”，“仅仅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而殃及全人类”，“在决定性的关头背弃自己的政党或是将其一脚踢开”以及諸

⊖ Karl Heinzen. «Steckbrief»〔卡尔·海因岑：“逮捕令”〕。

如此类的道德化的疯狂非难。同样，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空想共产主义体系和批判的共产主义之間所制造的差别无非是“叛变”和“暗算”。是的，純粹是耶穌会教徒式的“事后补作的”差别，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誰也沒有把这些差别告訴海因岑先生，看来，就連生活深处的風暴也絲毫沒有把它們吹进他的耳朵！

从表現这些矛盾的文字看来，海因岑先生对它們所作的說明是多么微妙呵！

“魏特林比您要高明一点，确实还可以算得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或者是：

“如果格律恩先生願意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并把恩格斯先生赶走，又怎样呢？”

在这以后，不言而喻，道德高尚的大丈夫“由于完全不能自拔，不能認為誠实和正直（無論它們多么陈旧）是被賦以理性的实体之間完全无用的东西”，于是便开始拿无稽的謊言来款待我們，例如，說什么恩格斯也打算写有关“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的文章，但是卡·格律恩似乎比他“搶先一步”，因此，恩格斯就“未能为他这一索然无味的重复之作找到出版商”。海因岑先生还奉送了不少諸如此类的新發現，作为他根据“一定原則”得出的“結論”。

道德化的批評所得到的可怜結果是由这一批評的“性質”本身決定的，無論如何也不能归咎于哀杰克斯·鉄拉孟^①的个人缺点。尽管这位神聖的粗汉非常愚蠢和卑鄙，但是他在道德上却有他自

^① 希腊神話：特洛伊戰爭中亞爾哥斯人的英雄之一鉄拉孟的兒子，身軀高大、又稱大哀杰克斯。——譯者注

我安慰的地方，这就是他在自己的信念上是愚蠢、卑鄙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是一个首尾一貫的統一体。

但是不管“事实”在那里說明什么問題，伟大的卡尔·海因岑本人却安之若素，听其“自然”；他在自己正直的胸脯上拍了三下叫道：“我，我坦然地随身携带着我的原則，如果有人向我問起这个原則，我是不会把它扔掉的”。

亨利希七十二世·馮·罗伊斯-施萊茨-艾貝斯道弗有二十年左右也是騎在他的“原則”的背上的。

注意。我們向“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的讀者推荐一篇斯蒂凡[⊖]写的批評文章：“海因岑的国家”。不言而喻，对著者來說，海因岑只是一个引子；即使他随使用一个德国的空談著作家来使真正革命工人的观点同好辯、謾罵的小資產者的观点对比，也同样会成功的。海因岑先生沒有更好的办法答复斯蒂凡，只好庄严地宣称斯蒂凡的文章是一篇坏作品，以此作为本質的批判。由于斯蒂凡其人他并不認識，所以他干脆罵他是街头恶少和商品推銷員来为自己开脫。但是他認為这对于他的对手还罵得不够恶毒，于是便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把他变成警察局的密探。其实，法国警察局大概是經過同海因岑先生洽商沒收了100本斯蒂凡写的小册子，由此可以看出这种責难究竟有几分公允。

海因岑先生用上述方法向工人斯蒂凡上了一堂实际的道德課以后又用下面那种庸人的口吻向他說：“从自己方面講，我(無論我怎样乐于同工人进行辯論)不能把无礼当作代替資格的手段”。德

⊖ 斯蒂凡·波尔恩。——編者注

国工人真要受宠若惊了，原来只要他們对待民主主义者卡尔·海因岑谦逊有礼，这位伟大人物就会同他們进行辯論。无奈海因岑先生本来就沒有資格同斯蒂凡先生进行論爭，所以他才竭力用他那无耻的攻击来弥补这一缺陷。

卡·馬·

卡·馬克思写于 1847 年 10 月底

載于 1847 年 10 月 28、31 日和 11 月
11、18、25 日“德意志—布魯塞尔报”
第 86、87、90、92 和 94 号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德意志—
布魯塞尔报”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原理¹⁶²

第一个問題：什么是共产主义？

答：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說。

第二个問題：什么是无产阶级？

答：无产阶级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資本的利潤来获得生活資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要看对劳动的需求而定，也就是要看生意的好坏，要看无法制止的竞争的波动而定。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就是19世紀的劳动阶级。

第三个問題：是不是說，无产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答：是的，不是一向就有的。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但是，象上述那种生活条件的穷人、工人，即无产者，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竞争并不是一向完全自由和不受限制一样。

第四个問題：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答：无产阶级是由于产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18世紀后半期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产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紡紗机、机器織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發明而引起的。这些价錢很貴、只有大資本家才买得起的机器，改变

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挤掉了原来的工人。这是因为机器制造出来的商品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紡車和織布机制造出来的既好又便宜。这样一来，这些机器就使全部工业落到大資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那一点薄产(工具、織布机等)变得一錢不值；資本家很快就侵占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了。从此，在紡織方面就实行了工厂制度。机器和工厂制度一經采用，这一制度很快就推行到其他生产部門，特别是印花布、印書、陶器和金屬品的制造业等部門。工人之間的分工也愈来愈細了，結果，从前完成整件工作的工人，現在却只做这件工作的一部分了。这种分工可以使产品制造得更快，因而也就更便宜。分工把每个工人的活动变成一种非常簡單的、老一套的机械的操作，用机器不但能够做得同样出色，甚至还要好得多。因此，一切生产部門都象紡紗和織布业一样，一个跟着一个地受到了蒸气、机器和工厂制度的支配。这样一来，所有的工业部門完全都落到大資本家的手里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后的一点独立性。工厂制度的統治不仅逐漸地扩展到道地的手工工場，而且也日益侵占了手工业，因为这里大資本家也在不断挤掉小师傅，建立可以大量节省开支和实行細致分工的大作坊。結果，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工厂生产几乎已在一切劳动部門中建立起来，手工业和手工工場几乎到处都被大工业排挤掉了。于是，从前的中層等級，特别是小手工业者，日益破产，劳动者的状况也發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漸漸并吞所有其他階級的新的階級。这两个階級就是：

一、大資本家階級，現在他們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几乎是一切生活資料以及生产这些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的独占者。这就是**資產者階級或資產階級**。

二、完全沒有财产的階級，他們为了換得維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只得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給資產者。这一階級叫做无产者階級或无产階級。

第五个問題：无产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把劳动出卖給資產階級的？

答：劳动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它的价格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也是由同样的規律决定的。正象我們在下面将看到的，在大工业或自由竞争的統治下，情形都是一样，商品的价格平均起来总是和这种商品的生产費用相等的。因此，劳动的价格也是和劳动的生产費用相等的，而劳动的生产費用也正好是使工人能够維持他們的工作能力并使工人階級不致于死光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数量。工人的劳动所得不会比为了这一目的所需要的更多。因此，劳动的价格或工資将是糊口所必需的最低額。但因为买卖总是有时清淡有时兴旺，工人所得也就有多有少，正象厂主卖出商品所得的錢有多有少一样。如果把旺季和淡季平均起来，厂主卖出商品所得的既不多于他的生产費用，也不少于他的生产費用，同样，工人平均得到的也是既不会多于这个最低額，也不会少于这个最低額。大工业越是在所有的劳动部門占統治地位，工資的这一經濟規律也体现得愈充分。

第六个問題：在产业革命前，劳动階級是怎样的？

答：在不同的社会發展阶段上，劳动階級的生活条件也各不相同，它在同有产階級和統治階級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古代，正象現代在許多落后国家、甚至美国南部一样，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在中世紀，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貴族的农奴，直到今天这种农奴在匈牙利、波兰和俄国都还残存着。此外，在中世紀，

甚至在产业革命前，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者帮工，随着手工工场的发展，就渐渐地出现了受大资本家雇佣的手工工场工人。

第七个问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每个奴隶是特定的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们与主人的利害攸关，他们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而一个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阶级的财产。他们的劳动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才能卖掉，因而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对整个无产者阶级来说，这种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隶被看做物件，不算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认为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比奴隶为高。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一种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却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个问题：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答：农奴拥有并使用生产工具和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或者服一定的劳役。无产者是用别人的生产工具做工，他们就是为这个别人生产，从而换得一部分收益。农奴是交出东西，无产者是得到报酬。农奴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生活无保障。农奴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农奴可以通过以下各种道路获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是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和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是把他们的

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私有者。总之，农奴可以通过不同的办法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并进入竞争领域而得到解放。无产者则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

第九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

第十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工场工人有什么区别？

答：16—18 世纪，几乎任何地方的手工工场工人都占有生产工具，如：织布机、家庭用的纺车和一小块在工余时间耕种的土地。这一切，无产者都没有。手工工场工人几乎总是生活在乡下，和地主或雇主维持着或多或少的宗法关系。无产者通常生活在大城市里，和雇主只有金钱关系。大工业使手工工场工人脱离了宗法关系，他们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财产，因此才变成无产者。

第十一个问题：产业革命和社会划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者首先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第一、由于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以前世界各国的手工工场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那些一向或多或少和历史发展不相称、工业尚停留在手工工场阶段的半野蛮国家，现在已经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开始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手工工场工人置于死地。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改革，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改革。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以后就会夺去中国成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

⊖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以下是空白，没有第九个问题的答案。——编者注

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發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因此，如果現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在解放自己，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并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

第二、凡是大工业代替了手工工場的地方，产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自己的財富和扩充了自己的势力，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个阶级。結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便夺取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統治阶级——貴族、行东和代表他們的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繼承权或不許出卖領地的禁令，取消了貴族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特权貴族、土地貴族的权力。资产阶级取消了所有行会，废除了手工业者的一切特权，从而打垮了行东的威風。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代替它們；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經營任何一个工业部門，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資本，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的經營。这样，实行自由竞争无异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由于社会各成員的資本多寡不等，所以他們之間也不平等，資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而資本家，资产者則成为社会上的第一个阶级。但是，自由竞争在大工业發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貴族和行东的社会威力以后，也就摧毁了他們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成了第一个阶级以后，它就宣布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第一个阶级。这是通过实行代議制而实现的；代議制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認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制度在欧洲各国采取君主立宪的形式。在君主立宪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資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議員，而他們的議員可以运用拒絕納稅的权力，选出资产阶级的政府。

第三、产业革命到处都促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资产阶级愈发财，无产者的人数也就愈众多。因为只有资本才能使无产者找到工作，而资本也只有在使用劳动的时候才能增殖，所以无产阶级的增长是和资本的增长完全一致的。同时，产业革命使资产者和无产者都集中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大城市里，广大群众聚集在一个地方，就使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后来，随着产业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就把工资愈压愈低，把它降低到上述的那种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愈来愈不堪忍受了。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产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来进行的社会革命。

第十二个问题：产业革命进一步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大工业创造了象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里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制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的扩展这样容易，大工业的必然后果——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地步。大批资本家都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饿。到处出现了可怕的贫困现象。不久以后，过剩的产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资提高，生意也渐渐地比以往更好起来。但这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很快又会生产出过多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到来，这种新危机的发展过程和前次危机完全相同。由此可见，从19世纪初期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就要发生一次，它总是给工人带来可怕的灾难，激起普遍的革命义愤，并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了极大的危险。

第十三个問題：这种定期重演的商业危机会产生什么后果？

答：第一、虽然大工业在它的發展初期自己創造了自由竞争，但是現在它的發展已經超越了自由竞争的范围。竞争和个人經營工业生产已經变成大工业的枷鎖，大工业要粉碎它，而且一定会粉碎它。大工业只要还是按照現今的原則經營，就只有依靠每七年出現一次的普遍混乱才能維持生存，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将是一种威胁，它不但将无产者抛入貧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許多資产者破产。因此，或者必須消灭大工业，——这是絕對不可能的，或者是承認，大工业造成一种絕對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組織，在这个新的社会組織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領導，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計劃和社会全体成員的需要来領導。

第二、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們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員都能够完全自由地發展和發揮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見，現代社会中造成一切貧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組織中却正是消灭这种貧困和这些有害的动蕩的因素。

因此，以下各点便得到完全令人信服的証明：

(1) 現今的一切貧困灾难，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時間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

(2) 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鏟除这一切貧困的手段已經具备。

第十四个問題：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答：首先将根本剝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門

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說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第十五个问题：这么说，过去废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

答：不可能。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私有制就是这样产生的。私有制并非一向就有；在中世纪末期，产生了一种手工工场那样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已经超越了当时封建和行会所有制的范围，于是这种已经超越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手工工场便为自己创造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对于手工工场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另外一个阶级即贫穷和被压迫的阶级存在。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就要看当时生产所处的发展阶段了。在以农业为中心的中世纪，是地主和农奴；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里，是师傅、帮工和短工；在17

世紀是手工工場主和手工工場工人；在 19 世紀則是大廠主和無產者。非常明顯，在這以前，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能以足夠的產品來滿足所有人的需要，同時私有制也還沒有成為這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和障礙。但是現在由於大工業的發展：**第一**、有了資本和規模空前的生產力，並且具備了能在短時期內無限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第二**、生產力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里，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愈來愈多地變成了無產者，並且資產者的財富愈是增加，無產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慘和難以忍受；**第三**、這種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的發展，已經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范围，以致經常引起社會制度極其劇烈的震動。因此，現在廢除私有制不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第十六個問題：能不能用和平的辦法廢除私有制？

答：但願如此，共產主義者也會是最不反對這種辦法的人。共產主義者很清楚，任何密謀都不但無益，而且有害。他們很清楚，革命不能預先隨心所欲地製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個別政党和整個階級的意志和領導為轉移的各種情況的必然結果。但他們也看到，幾乎所有文明國家的無產階級的發展都受到強力的壓制，共產主義者的敵人這樣做無異是想盡方法引起革命。因此，如果所有這些最終把被壓迫的無產階級推向革命，那時，我們共產主義者將會用實際行動來捍衛無產階級的事業，正象現在用言語來捍衛它一樣。

第十七個問題：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呢？

答：不，不能，正象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建立公有經濟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征象顯著即將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現社會，並且只有在廢除私有制所必需的

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第十八个问题: 这个革命的进程将是怎样的呢?

答: 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 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 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 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这种统治, 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小农和小资产阶级正处在分化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 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愈来愈依赖无产阶级, 因而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同意无阶级的要求。为此可能还需要新的斗争, 但是, 这次斗争必定以无阶级的胜利而告终。

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 那末, 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这些由现有条件中必然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1. 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2. 一部分用国营工业竞争的办法, 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 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厂主以及铁路和海船所有者的财产。

3.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举行暴动反对大多数人民的叛乱分子的财产。

4. 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在国家的田庄、工厂、作坊中工作, 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 并迫使残存的厂主付出的工资跟国家所付出的一样高。

5. 直到私有制完全废除为止, 对社会的一切成员实行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 特别是农业方面的产业军。

6.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 把信贷系统和银钱业集中

在国家手里。封閉一切私人銀行和錢庄。

7. 随着国家所拥有的資本和工人數目的增加而增加国营工厂、作坊、鐵路、海船的數目，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地的土質。

8. 所有的兒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顧的时候起，由国家机关公費教育。把教育和工厂劳动結合起来。

9. 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結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頗和缺点。

10. 拆毀一切不合衛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街。

11. 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遺產繼承权。

12.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人民手里。

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它們将一个跟着一个实行。只要向私有制一發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繼續向前迈进，把全部資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換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内生产力日益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資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人民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錢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增加了，人也改变了，那时，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最后形式也才会消失。

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內發生呢？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場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無論在什么地方，资产阶

級和无产階級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階級，它們之間的斗争成了我們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發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較發達，財富积累較多，以及生产力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別加速它們原来的發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場所。

第二十个問題：彻底废除私有制以后将产生什么結果？

答：由于社会将剝夺私人資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权，也将剝夺他們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資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計劃来支配这一切东西，所以同現在实行的大工业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灭。經濟危机将終止，扩大的生产在現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貧困的極重要的原因；但是到那时候，这种生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并一定要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余额不但不会引起貧困，而且将保証滿足社会全体成員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創造出滿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这种生产余额将是进一步前进的条件和刺激，它会实现这种进步，同时也不会因此（象过去那样）而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周期性混乱。摆脱了私有制束縛的大工业将来的發展規模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象手工工場和我們这个时代的大工业相比一样。工业的这种發展将給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滿足它的全体成員的需要。現在由于私有制的压迫和土地的分散而

很难运用現有的改良和科学成就的农业，将来同样也会进入繁荣的新时代，并将給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这样一来，社会就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組織分配以滿足全体成員的需要。这么一来，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階級也就是多余的了；这种划分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和新的社会制度互不相容的。階級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到那时現在这种分工也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述的那种水平，单靠机械的和化学的輔助工具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發展运用这些工具的人的能力。当 18 世紀的农民和手工工場工人被吸引到大工业中以后，他們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同样，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經營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發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創造出这种新人来。生产的社会管理不能由現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們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門，受它束縛，听它剝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發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中的某一个部門或者某一个部門的一部分。就是現在的工业也漸漸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經營的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統的人。因此現在已被机器动搖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外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这种分工，将要完全消失。教育可使年輕人很快就能夠熟悉整个生产系統，它可使他們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們自己的爱好，輪流从一个生产部門轉到另一个生产部門。因此，教育就会使他們摆脱現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則組織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員能够全面地發揮他們各方面

的才能，而同时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就必然消失。因此，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便给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条件。

由此可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已经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种阻碍在目前已经深深地感到了。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

第二十一個問題：共产主义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

答：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勿需干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灭。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僧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悲鸣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这种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

第二十二個問題：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各民族？

——保留原案¹⁶³。

第二十三個問題：共产主义組織將怎樣對待現有的各宗教？

——保留原案。

第二十四個問題：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什么區別？

答：所謂社会主义者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那些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这种社会已被大工业、世界貿易和由它們所造成的資產階級社会所消灭和日益消灭着。这一类社会主义者从現代社会的苦难中做出了这样的結論：應該恢复封建的和宗法的社会，因为它沒有这种种苦难。这一类人的一切主张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为了这一目的。共产主义者随时都要坚决同这类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作斗争，尽管他們假惺惺地表示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和为此而洒出热泪。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

(1) 追求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2) 希望恢复貴族、师傅、手工工場主以及和他們相联系的专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侶的統治，他們想恢复的这种社会固然沒有現代社会的各种缺点，但至少会有同样多的其他灾难，而且它也不会开辟通过共产主义社会来解放被压迫工人的任何前途；

(3) 当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階級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者总要暴露出他們的真实意圖。在这种場合下，他們馬上和資產階級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

第二类是現代社会的拥护者，現代社会必然产生的苦难，使他們不得不替这一社会的存在耽心。因此，他們力圖保持現代社会，不过要消除和它联系在一起的苦难。为此，他們中有的人提出了

种种简单的慈善办法，有的人则提出了规模庞大的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在改组社会的借口下企图保存现代社会的基石，从而保存现代社会本身。共产主义者也得和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作不懈的斗争，因为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所维护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要推翻的社会。

最后，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道，他们希望实现×××个问题[⊖]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做引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做足以消除现代社会中的贫困和苦难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直到争得民主制度和实行由民主制度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这个阶级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需要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并且要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那些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

第二十五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余各政党？

答：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将采取各种不同的态度。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党暂时还有共同的利益，并且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现在到处都坚持的那些社会主义措施中愈接近共产主义者，即他们愈明确地坚持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愈加依靠无产阶级，这种共同的利益也就愈大。

⊖ 手稿上为空白，指的是第18个问题。——编者注

例如在英国，由工人組成的宪章派就要比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或所謂激进派更接近共产主义者。

在实行民主宪法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必須支持願意用这个宪法去反对資产階級、并利用它来为无产階級謀利益的政党，即主张全国土地改革的政党。

在瑞士，激进派虽然本身也是个成分極其复杂的政党，但是共产主义者只能同他們达成協議，其中瓦得和日内瓦的激进派又是最进步的。

最后，在德国，資产階級和君主专制之間的决战还在后面。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資产階級取得統治权以前就和資产階級进行决战，那末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帮助資产階級尽快地取得統治权，以便随后能尽快地把它推翻。因此，在自由派資产階級同政府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終应当支持自由派資产階級，但同时也应当提防不要跟着資产階級自欺欺人，不要去听他們那一套娓娓动听的說什么資产階級的胜利会給无产階級带来良好結果的花言巧語。共产主义者从資产階級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以下这些：（1）得到各种讓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衛、討論和传播自己的原則，从而使无产階級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結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組織的階級；（2）使他們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輪到資产者和无产者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党在这里所采取的政策，也将和在資产階級已占統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10 月底—11 月

1914 年第一次以单行本發行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弗·恩格斯 宪章派土地綱領¹⁶⁴

大約两年前，宪章派工人建立了一个协会，目的是要获得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划为小型农场分配给该会会员。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消除劳动市场上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并成立一个全新的本质上民主的小耕作者阶级，来缓和产业工人间过度的竞争。这个方案的作者就是菲格斯·奥康瑙尔。这个方案极为成功，宪章派土地共用社会会员已达二三十万人[⊙]，拥有公共基金6万英镑（合150万法郎），而根据“北極星报”发表的通讯，新近的收入每星期在2500英镑以上。总而言之，这个协会（以后我还要作较详细的报道）的发展已引起土地贵族的惶恐不安；显然，这一运动要是照目前的规模发展下去，最后终将演变为要求全部土地归人民的全民运动。资产阶级对该协会也不会有好感；资产阶级看到协会使人民掌握了杠杆，人民有了这个杠杆不必求助于中等阶级就能解放自己。或多或少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尤其反感，他们对土地共用社完全抱着恶意的态度，因为这个阶级现在发觉宪章派已远不如协会成立以前那样需要它的帮助了。而且，激进派不了解人民对他们的冷淡正是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的必然结果，他们还在

⊙ 本文在1847年11月6日“北極星报”第524号以英文发表的时候，“会员已达二三十万人”改为“已有大批会员”。——编者注

不断攻击奥康瑙尔先生，把他当作宪章派和激进派团结的唯一障碍。建立土地共用社的是奥康瑙尔先生，这就足以遭致激进派，即某种程度上的资产者对该社的憎恨。起初他们对该社置之不理，到不能再施展缄默诡计的时候，他们就企图证明该社的组织原则必然会使它遭致极可耻的破产；到最后，当这种手段也阻碍不了该社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们又重新乞灵于十年来一直用来反对奥康瑙尔先生而始终毫无成效的战术。他们企图使人们怀疑他的道德面貌，怀疑他的大公无私，使他无权再称为工人的廉洁公正的全权代表。不久以前，当奥康瑙尔先生发表他的年度结算的时候，六家或多或少属于激进派的报纸就不约而同地起来攻击他。这六家报纸就是“每周快讯”、“地球报”、“非国教徒”、“曼彻斯特观察家”、“劳埃德氏新闻周刊”和“诺定昂信使报”。它们控告奥康瑙尔先生犯了最无耻的贪污盗窃罪，从这一决算中引用一些数字，企图作为控告的根据，至少给他加上一个似是而非的罪名。这样还远不解恨，于是他们就开始在这位有名的鼓动家的私生活中找岔子。对他的控告接踵而至，而且一个比一个厉害，他的敌人指望他因此就会一蹶不振。可是，奥康瑙尔已经和所谓激进派报纸不断地斗争过十年，尽管这些恶意中伤的抨击纷至沓来，但他并不屈服。他在本月23日的“北极星报”上发表了对六家报纸的答复。在这个答复中，在这极似威廉·科贝特的卓越的抨击文章的论战艺术杰作中，他逐一反驳了控告，并进而向六个编辑反击，使他们陷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并对他们表示了傲然的轻蔑。在人民看来，这已足够说明奥康瑙尔是正确的了。本月30日的“北极星报”上援引了在五十多个地方的公开会议上对奥康瑙尔投信任票的总结。可是，奥康瑙尔希望他的敌人能在人民面前反对他。他要求他们出席在

曼徹斯特和諾定昂举行的公开會議，并要求他們當場列举控告的根据。他們中誰也沒有出席。在曼徹斯特一个一万多人的集会上，奥康瑙尔作了长达四小时的演說，轟鳴的掌声淹沒了他的講話，大家都一致表示对他信任。听众太多了，以至除了奥康瑙尔为替自己辯护而亲自出場的大会而外，不得不在廣場上另行組織集会，由几个演說家向不能进入会场的一万至一万五千人講話。

會議一結束，奥康瑙尔就宣布征集資金并收納土地共用社会員会費，当晚就征集了 1 000 英鎊(合 25 000 法郎)以上。

次日，奥康瑙尔在諾定昂召开了一个空前盛大的集会，他的演說在人民中引起了同样热烈的反响。

在資產階級報紙至少成百次的惡意中傷中，奥康瑙尔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不屈不撓的爱国者始終沉着应付所有这些攻击，繼續自己的工作；而英国人民对他一致信任，就是他的勇敢、坚毅和廉潔公正的最好的証明。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10 月 30 日

載于 1847 年 11 月 1 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改革报”

弗·恩格斯 宪章派为 1847 年选举而 举行的宴会¹⁶⁵

在前天的信中，我曾經为宪章派和他們的領袖菲格斯·奥康瑙尔辯护，反击了資產階級激进派的报纸对他們的攻击[⊖]。今天我以極其滿意的心情告訴你們一件事，这件事可以証实我就两党的性質所發表的意見。你們自己就可以判断，法国民主派應該同情哪一方面，是同情宪章派呢，还是同情資產階級激进派；前者是真誠的民主主义者，没有什么見不得人的想法；后者連人民宪章、普选权等字眼也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談，只声明拥护完全选举权¹⁶⁶。

前一个月在倫敦举行了一次宴会来庆祝民主輿論在最近几次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当时曾經邀請了十八个激进派代表，但因为这次宴会是宪章派發起的，所以除了奥康瑙尔以外，这些先生都沒有出席。显然，激进派的这种举动使我們有可能預言，他們将如何忠于他們在最近几次选举时所作的諾言。

沒有他們出席也行，何况他們还派了一位可敬的代表埃普斯博士出席宴会了。这是一个懦怯的舍本逐末的改良主义者，他对世界上的任何人，除了那些贊成我們的觀點的積極而堅毅的人們

⊖ 見本卷第 375—377 頁。——編者注

以外，都很温和；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博爱主义者，据他自己说，他热望给人民自由，但不希望人民不通过他的帮助而解放自己。总之，这是一个可敬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信徒。

埃普斯博士提议首先为人民的主权干杯，但是他整篇演说中的冰冷的语调不止一次地引起了全场的不满，虽然他也讲了几句比较热情的话。

他说：“我不认为人民的主权可以用革命的手段争得。法国人斗争了三天，却被骗走了国家的主权。我也不认为人民的主权可以用长篇大论的演说争得。讲得少些的人倒做得多些。我不喜欢那些吵闹不休的人；高谈阔论是做不出大事来的。”

向宪章派发出的这些含沙射影的攻击引起许多人的指责。确实也不可能有别的反应，特别当埃普斯博士补充了下面这段话以后：

“人们在工人面前诽谤资产阶级，好象唯一能为工人取得政治权利的阶级并不是资产阶级。（叫声：“不是！不是！”）不是？难道资产者不是选民？难道不是只有选民才能给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以选举权？你们中间有没有一个人当他可能成为资产者的时候却不成为资产者呢？啊，如果工人愿意戒酒，戒烟，那末他们就会有钱进行政治宣传，因而也就会有力量来促进他们的解放……。”

这就是反对奥康瑙尔和宪章派的那些先生们的演说词！

在埃普斯先生之后起来发言的人慷慨激昂地狠狠地驳斥了激进派博士的奇谈怪论，全场不止一次地响起掌声。

宪章派协会¹⁶⁷ 执行委员会委员麦克格雷先生提醒大家：人民不应该相信资产阶级，人民应该用自己的力量争取自己的权利。如果人民恳求别人把本来属于他们的东西再施舍给他们，那是有损他们的尊严的。

琼斯先生提醒全场：资产阶级是从来不顾人民的。他说，现在资产阶级看到了民主派的成就，所以极力利用他们去推翻土地贵族，打算一达到资产阶级所追求的目的就立即反过来消灭民主派。

奥康瑙尔先生更直截了当地驳斥埃普斯先生，向他提出问题：使国家担负了无力担负的巨额债务的不是资产阶级又是谁？剥夺了工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不是资产阶级又是谁？今晚拒绝了人民邀请的不是那十七位可敬的资产者（民主派轻率地投了他们的票）又是谁？不，不，资本永远都不会成为劳动的代表！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建立一致的感情和利益，那比猛虎和羔羊媾和还难！

“北極星报”的編輯哈尼先生最后提議，“為我們的弟兄，全世界的民主主义者，為他們在爭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中所努力获得的成功干杯！”他说，全世界的国王、贵族、神甫、资本家都联合起来了，愿全世界的民主主义者也会这样！现在民主势力到处都在迅速发展。在法国，拥护选举改革的宴会一个接着一个地举行，运动的规模非常巨大，结果必然是良好的。这一次我们可以指望群众会从运动中得到益处，而法国人所争得的改革也会比我们在1831年争得的¹⁶⁸更进一步。

在整个主权尚未完全归于民族的时候，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在1793年宪法的原則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不可能有民族的主权。

接着哈尼先生叙述了民主派在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的成就。最后，他宣布他将非常坚决地清除埃普斯先生所发挥的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奇谈怪论。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1月1日

載于1847年11月6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改革报”

弗·恩格斯 拉馬丁先生的宣言

你們的報上最近發表了一篇稀奇的精心杰作¹⁶⁹。這篇作品明確地分成兩個部分：**政治措施**和**社會措施**。談到**政治措施**，那幾乎全部是從1791年憲法里原封不動地搬來的；換言之，這些措施是向革命初期資產階級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倒退。在那個時代，整個資產階級，連小企業主也包括在內，都分享到政權，而現在却只有大資本家才能夠參政。那末拉馬丁先生提出的政治措施的意義何在呢？這些措施的意義就在於把管理國家的權力交到下層資產階級的手里，但表面上要使人覺得是把這種權力給予全體人民（他要求兩級選舉制的普選權，意義就在於此，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釋）。而他的**社會措施**又是些什麼呢？有的是一些只有在革命勝利使政權轉入人民手中以後才可能實行的辦法，例如普遍實行免費教育；有的是純粹的救濟辦法，也就是旨在削弱無產者的革命鬥志的辦法；也有的干脆就是一些毫無實際意義的高調，象用非常法令來消滅乞丐，通過立法途徑來消滅社會的苦難，設立一個民生部等等。可見，這些措施不是對人民一點好處沒有，就是僅僅使人民的需求得到一定限度的滿足，以便保證一定的社會安寧；再不然就只是一些沒有人能夠兌現的空洞諾言，——在後兩種情況下不僅沒有好處，而且有害。總之，拉馬丁先生不論從社會方面還是從政治方面

来看，都显示出自己是小企业主的，即下層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表者。作为这样一个人物，他也具有这个阶级所特有的错觉，以为他是代表劳动者的。在宣言的末尾，他竟愚蠢得向政府呼吁，要求政府支持他所提出的办法。应该知道，现在的大资本家的政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但是恰恰做不到这一件事。所以，“改革报”的态度完全正确，它肯定了他的良好愿望，同时又指出（虽然是很善意地）他这些措施本身以及他所选择的实施办法都是行不通的。

“改革报”写道：“这固然都是些动听的话，显示着一个伟大的胸怀，显示着一种同情正义事业的精神。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一颗博爱的心在跳动。这些字句会象柏拉图的格言鼓舞伯利克里时代的希腊人似地鼓舞我们的诗人和哲学家。可是我们现在和伯利克里已相隔甚远，我们是生活在路特希尔德先生、菲尔希隆先生和杜沙特尔先生的统治时代，换言之，即金钱、本能的恐惧心理和警察三位一体的统治时代；统治着我们的是利润、特权和市近卫军。难道拉马丁先生指望着自己为人民主权和社会友爱呼吁一声，这个利益紧密交织着的同盟，这个由富豪、官僚、垄断机构组成的分离派同盟[⊖]就会缴械投降吗？应该知道，无论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着的，这个支撑着那个，没有任何事物是孤立存在的；这就说明为什么即使象马康的议员[⊙]所提出的最高超的纲领，只要它带有任何垄断的胎痣（即对权利和平等的封建式的破坏），也将会象夏天的一阵香风那样逝去，象空洞的喇叭声一样沉寂下来。而且正是在目前，当政府完全处于惊恐万状的时刻，这个特权阶级的同盟就结合得特别紧密。

至于他所提出的这套措施，官场及其领袖人物把这样的东西叫做哲学上的小玩艺，杜沙特尔先生和基佐先生将会置之一笑。如果马康的议员不换个地方寻求武器，募集战士来保卫他的理想，则他至死也只能唱唱高调而不能前进一步！假如他不是向政府呼吁，而是来向人民群众请教的话，那我们就会告诉他，他走的道路错了，他永远不能够使革命、使有思想的人、使人民赞同

⊖ 指瑞士的分离派同盟——七个天主教州结成的反动同盟。——编者注

⊙ 拉马丁。——编者注

他那一套办法——多級选举制、济貧捐和慈善事业。其实社会革新和政治革新的原理在五十年前就出現了。普选权、直接选举、議員支薪，这都是政治主权的基本条件。平等、自由、友爱，这是一切社会机构均应受其支配的原則。可是看一看济貧捐，远不是建筑在友爱原則上面的，同时还粗暴地（尽管是非常軟弱无力地）否認了平等原則。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英国資產階級那套权宜的办法，而是一个能伸张正义，滿足一切人的需求的全新的社会經濟制度。”

几天以后，拉馬丁先生的第二个宣言發表了，这次講的是法国的对外政策。在这个宣言里，他硬說法国政府自 1830 年以来所奉行的和平政策是唯一正确的行动范例。他用美丽的詞句来粉飾法国政府的卑劣行径，即先煽动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举行起义，后来却把它們丢开不管，讓它們去受命运的摆布。我們还是来引証“改革报”对这个悅耳的宣言的有力的回答吧：

“我們爭取解放的合法的、唯一的手段——为原則而进行神聖的战争——被拉馬丁先生拿来做了和平理論的牺牲品，而这种和平理論，在各国之間的关系还是以外交家的政治手腕和各国政府的鈎心斗角为基础的时候，就只能是軟弱的表現，是撒謊，甚至是卖国行为。毫无疑问，和平是文明所最需要的东西；可是同俄国的沙皇尼古拉講和平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屠杀各民族的劊子手，把各民族的兒女送上絞架的絞刑吏！他进行残酷的战争，甚至不顧死活，也不接受过去的教訓！把一个伟大的光輝灿烂的国家淹沒在泪水和血泊里面！对全人类、对文明、对法国本身說来，同这个疯狂的劊子手講和平就是怯懦；对正义、对人权、对革命說来，这是犯罪！同梅特涅，同这个豢养大批刺客，为了一个头戴王冠的羊癩疯病人而剝夺整个民族自由的家伙講和平意味着什么呢？同所有那些欧洲的小暴君、落魄的浪蕩子、今天討好于耶穌会教徒，明天討好交际花的荒淫无耻的伪君子們講和平意味着什么呢？同貴族的、充滿商人气的英国政府，这个海上的暴君，扼杀葡萄牙自由的劊子手，从本国衣不蔽体的老百姓身上也要榨出油水来的政府講和平意味着什么呢？我們再說一遍，同这些高利貸者、五毒俱全的家伙講和平，对一个革命的国家說来，就是怯懦、耻辱、犯罪、道德墮落，不仅是利益的破产，而且也是正义和荣誉的破产。”

巴黎的其他各报也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表示不同意拉馬丁先生的綱領。可是他还在自己的报纸,馬康“公益报”¹⁷⁰上繼續解释这个綱領中的原則。几个月以后我們就可以看出众議院对他这个新步驟的反应如何了。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1月初

載于1847年11月13日“北極星报”
第525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編者注:
“本报巴黎通訊員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北極星报”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瑞士的内战¹⁷¹

对于“自由的搖籃”、“泰尔和文克里特的子孙”、森帕赫和穆尔頓城下英勇的胜利者¹⁷²等喋喋不休的贊語終於說到頭了！原来，所謂自由的搖籃不过是野蛮的中心和耶穌会教徒的温床而已；所謂泰尔和文克里特的子孙除了用炮弹以外，是无法用别的道理来开导的；所謂森帕赫和穆尔頓城下的英勇气概則不过表现了坚决反对文明和进步的粗野而迷信的山地种族的絕望情緒而已。

欧洲民主終於要摆脱这个淳朴而反动的旧瑞士贅瘤了，这真是个大幸。民主主义者只要繼續标榜这些阿尔卑斯山牧民的美德、幸福和宗法式的朴实，他們就始終带着反动的阴影。現在，当民主主义者支持文明的、工业的、現代民主的瑞士来反对那些古老的游牧州的那种野蛮的基督教德意志的民主的时候，他們到处都成了进步的代表；現在，他們連一点反动形象也沒有了；現在，他們証明自己已經懂得了 19 世紀民主的意义。

欧洲有两个地方还保持着最原始的古基督教德意志式的野蛮，几乎还以橡实为食料，这两个地方就是挪威和阿尔卑斯高山地区即旧瑞士¹⁷³。挪威和旧瑞士还提供了一个人种的典型，这种人曾經在条多堡森林用道地的威斯特伐里亚方式，即用木棍和打谷棒歼灭了羅馬人¹⁷⁴。挪威和旧瑞士都是按民主方式組織起来的。

不过民主有各种各样的，而文明国家的民主主义者最后有必要拒绝为挪威和旧瑞士的民主负任何责任。

一切文明国家中民主运动的最終目的都是取得无产阶级的政治統治。因此，只有存在着无产阶级，存在着占統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存在着产生无产阶级并使资产阶级走上統治地位的工业，才可能有这一运动。

这一切无论在挪威或在旧瑞士都不存在。在挪威我们看到非常著名的农民执政 (bonde-regimente)，而在旧瑞士我们却看到，那里虽然有民主的宪法，但是大批无知的牧民却仍然受着阿比貝尔克等几个富有地主的宗法統治。挪威有资产阶级存在，这只是一个例外，而旧瑞士根本就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则几乎完全没有。

因此，文明国家的民主即现代的民主跟挪威的民主或旧瑞士的民主都毫无共同之处。前者所力求实行的既不是挪威的制度，也不是旧瑞士的制度，而是和它们有天渊之别的另一种制度。不过我们仍然要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个古日耳曼的民主，看一看首先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旧瑞士。

哪一个德国小市民不赞美祖国的解放者威廉·泰尔？哪一个学校的教员不把莫尔加頓¹⁷⁵、森帕赫、穆尔頓同馬拉松、普拉迪、薩拉密斯¹⁷⁶相提并論？哪一个如癡如狂的老处女不梦想淳朴的阿尔卑斯山青年人的结实的小腿和窄小的臀部？从艾吉迪烏斯·丘迪到約翰·弥勒，从弗洛里安到席勒，他們都不断地在詩歌和散文中歌頌过旧瑞士在勇敢、自由、灵活和力量等各方面的伟大。現在，十二个州的大炮和来复槍就是对这些热烈的贊美歌所加的評注。

瑞士那些旧州的居民在历史上曾經两次引起过人們的注意。第一次是他們光荣地摆脱了奥地利的暴政，第二次是現在，他們为了神，为耶穌会教徒和祖国作战。

就是連光荣地摆脱奥地利鷹的魔爪这件事也經不起光天化日下的仔細考察。奥地利王室在它的全部历史中只起过一次进步的作用。那是在这王室的經歷的初期，当时它和城市小市民結成联盟来反对貴族，并且企圖建立德意志君主国。它的进步性完全是小市民式的，但終究还是一种进步。而当时反对它最为坚决的是誰呢？是瑞士旧州的居民。反对奥地利的战斗、格留特利的光荣宣誓¹⁷⁷、泰尔的英勇射击、永远值得紀念的莫尔加頓城下的胜利，所有这一切都是頑固的牧民对历史發展潮流的对抗，是頑固保守的地方利益对全民族利益的反抗，是愚昧对教养、野蛮对文明的反抗。牧民战胜了当时的文明，因此他們受到了与后来的文明完全隔絕的懲罰。

不仅如此。这些强壮而頑固的阿尔卑斯山牧民还很快遭到了完全是另一种方式的懲罰。他們摆脱了奥地利貴族的統治，却又落入了苏黎世、琉森、伯尔尼和巴塞尔小市民的牢籠。这些小市民發現，瑞士土著居民就象他們的公牛那样强壮，那样愚蠢。他們加入了瑞士联邦，从此他們就安閑地坐在柜台后面，而頑固的牧民却拿起武器替他們解决同貴族和公爵的一切冲突。森帕赫、格兰桑、穆尔頓和南錫¹⁷⁸的情形就是如此。同时他們还給这些人保留了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处理自己內部事务的权利，于是这些人就幸福得飘飘然了，根本不知道自己怎样受着亲爱的盟兄們的剝削。

从那时起就很少听到他們的情况。他們虔誠地循規蹈矩地忙着挤牛奶，制干酪，忙于修身和唱阿尔卑斯山歌。他們有时去参加

民众大会，他們分成了角党、蹄党和其他以动物的特征为标志的集团，而一切事情必須經過基督教德意志式的热烈爭吵才能了結。他們貧窮，但却純潔无瑕；他們愚蠢，却虔誠仁慈；他們粗野，却健壯魁梧；他們缺乏头脑，却有結实的小腿。有时他們的人显得太多了，于是年輕的人們就“踏上征途”（«rei Blaufen»），也就是受雇在外国軍隊里服役，并且不論何处，只要發生事情他們总是赤胆忠心地捍衛他們所服务的旗帜。关于瑞士人，我們只能这样說：为了薪餉，他們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辞。

很久以来，这些瑞士旧州的强壮的居民就以絲毫沒有背弃祖先的習慣而万分自豪；在数百年的岁月里，他們完整无損地保存了祖先的淳朴、純真、严峻和仁义的風尚。的确，碰上他們的峭壁峻岩和他們的头盖骨这样的花崗石堡垒，要想开化他們，那是千难万难的事。从文克里特的祖先把永远带着安閑的鈴声的母牛赶到菲尔瓦尔施泰特湖畔的处女牧場的那一天起，到神甫为文克里特的末代的武运祈祷的今天为止，他們所有的房屋都是按同一方式建筑的，所有的乳牛都是按同一方式挤奶的，所有的髮辮都是按同一方式編束的，所有的干酪都是按同一方式制作的，所有的孩子都是按同一方式生育的。这里，在山地还存在着極乐园，这里还没有罪恶。因此，当阿尔卑斯山的純潔无邪的兒子踏入开闊的世間，虽然立即受到大城市的引誘，受到腐朽文明的脂粉和魅力的蠱惑，受到那些沒有山崗却生长谷物的罪恶地方的恶習的誘惑，不过他的純潔无邪的天性却根深蒂固，使他永远不会遭到徹底的毁灭。只要牧歌的声音触动了他的耳鼓，即使只是那么两个象狗叫似的音調，他也会立刻激动起来，悔恨交集，急忙掙脫誘惑的糾纏，跪倒在老父亲的面前，痛哭流涕地說：“父亲，我对故乡山地，对你犯了罪，我

不配称为你的兒子!”只有这样他才能心安理得。

近代这个淳朴風尚和原始力量遭到了两次侵袭。第一次是1798年法国人的入侵。法国人虽然到处都传播过一点文明，但是在那些旧州他們却毫无成就。那里絲毫沒有留下他們的痕迹，他們絲毫也未能动搖古老的風尚和道德。第二次侵袭發生在大約二十年以后，这次至少还产生了某些后果。这次侵入的是英国的旅行者，倫敦的貴族和大地主，接着还有无数的蜡烛商、肥皂商、食品杂货商和旧貨商。这次入侵总算結束了古老的好客風气，而那些几乎不知道金錢是什么的牧舍中的誠实居民变成了世上少有的最貪婪狡猾的騙子手。但是，这一进展絲毫沒有触动淳朴的古風。这种不十分純潔的欺騙行为和純真、勤勉、忠厚、老实等宗法道德一拍即合，亲密无間。甚至他們的虔誠也沒有因此受到損害，因为神甫特别乐于饒恕他們欺騙不列顛异教徒的一切行为。

但是，現在这种淳朴看来終于要徹底消失了。可以設想，討伐的軍隊将尽一切可能来結束这种原始力量和淳朴風尚。小市民們，你們悲痛吧！那时，虽然貧穷然而却心滿意足的牧民再也不会存在了！他們那种宁靜的无憂无虑的生活，你們只有在星期天，在用菊苣制成的咖啡和黃荊叶制成的茶叶做了六天的投机生意以后，才能想望到一点。学校的教員們，你們哭泣吧！你們再也不能希望出現新的森帕赫—馬拉松和其他的丰功伟績了。30岁以上的如癡如狂的老处女們，你們哀怨吧！使你們孤独的梦想变得甜美的六吋粗的小腿再也不会有了，具有安提諾¹⁷⁹般美貌的强壮的“瑞士小伙子”再也不会有了，使你們神魂飄蕩一心向往阿尔卑斯山的結实的大腿和紧身褲再也不会有了。寄宿女校的娇弱的小姐們，你們也嘆息吧！你們讀了席勒的著作就幻想着猎羚羊的敏捷

的猎人的那种純潔然而倒很現實的爱情，現在你們的柔情的幻想就要破滅，只好閱讀亨利克·斯特芬斯的著作和幻想冷冰冰的挪威人了。

够了！要和瑞士諸旧州的这些居民周旋，我們还得用别的武器，而不能仅仅靠嘲笑。民主不仅要清算他們宗法式的德行，而且还要清算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东西。

是誰在1789年7月14日守衛巴士底獄，抗击进攻的人民？是誰从坚固的城牆后面用榴霰弹和槍弹屠杀聖安东郊区的工人？是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是泰尔、什陶法赫尔¹⁸⁰和文克里特的子孙。

是誰在1792年8月10日保衛路弗尔宮和土伊勒里宮中的卖国賊路易十六，反对人民正义的憤怒？是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

是誰靠納尔逊的帮助鎮压了1798年的那不勒斯革命？是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

是誰靠奧地利人的帮助于1823年在那不勒斯恢复了君主专制？是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

是誰在1830年7月29日又一次为叛徒国王[⊖]战斗到最后一刻并又一次从路弗尔宮的窗口和廊柱后面开槍射击巴黎工人？是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

是誰又勾結奧地利人以駭人听聞的残酷手段鎮压了1830和1831年罗曼內起义？是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

一句話，是誰直到現在还在鎮压意大利人，迫使他們忍受貴族、君主和僧侶的沉重压迫？誰是奧地利在意大利的一只右手？是

⊖ 查理十世。——編者注

誰直到現在還在讓嗜血成性的豺狼那不勒斯的斐迪南有可能压制对他切齿痛恨的人民？是誰直到現在還在他进行大規模槍杀的时候充当劊子手的角色？仍然是那些分离派同盟的旧瑞士人，仍然是泰尔、什陶法赫尔和文克里特的那些子孙！

总而言之，在法国，不論何时何地，只要爆發了直接間接对民主有利的革命运动，旧瑞士的雇佣兵总是極其頑固地和革命运动对抗到底。特別是在意大利，这些瑞士雇佣兵經常是奥地利最忠实的奴才和帮凶。这真是对瑞士光荣地摆脱双头鷹的魔爪这件事的公正的懲罰！

不要以为这些雇佣兵是他們本乡的废物，他們的同乡抛弃了他們。琉森人在自己城門口就豎起了一座巨大的用岩石雕成的獅子（冰島人托尔瓦德森的虔誠的艺术作品），这枝利箭穿心、血流不止的獅子仍至死忠誠不渝，用脚掌掩护着波旁王朝的百合花盾。而且这紀念物正好是他們为 1792 年 8 月 10 日在路弗尔宮陣亡的瑞士人建筑的。分离派同盟对自己子弟的那种卖身求荣的忠誠，就是这样来表示敬意的。分离派同盟不仅以买卖人口为生，并且对这种勾当贊美不已。

难道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能同这类民主有一点共同之处嗎！

就是資產階級也由于他們的工商业和政治制度力圖使只顧自身利益的小地区能脫离閉关自守的隔絕状态，互相联合起来，使利益融合为一，打开狹隘的眼界，消除地方的習慣、装束和見解，并使許多至今彼此独立的各个地方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的利益、習俗和見解的大国。資產階級已經有了相当的中央集权。无产階級根本不認为自己因此而受到了損害；恰恰相反，正是这种中央集权才使

无产阶级有可能联合起来，感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发现民主是适当的政治世界观并且最后战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不仅需要资产阶级最初实现的那种中央集权，而且还应当使这种中央集权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实行。在法国革命的短时期内，当山岳派执政的时候，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它用榴霰弹和断头台等一切手段实行了中央集权。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如果要重新确立自己的统治，就应当不仅使各个国家也都中央集权化，而且应当尽快地使所有文明国家统一起来。

旧瑞士则相反，它的所做所为恰好是反对中央集权。它简直象牲畜一样顽固地坚持与整个世界隔绝，死守着地方习惯、装束、偏见以及全部地方狭隘性和闭塞性。在欧洲中部只有它还保持着原始的野蛮状态，而所有别的民族，甚至连其余的瑞士人都都已前进了。旧瑞士人象野蛮的古代日耳曼人那样，极端顽固地坚持各州的主权，也就是不管邻居如何受害，硬要永远成为愚昧无知、粗野鄙陋、顽固不化和出卖自己的人。说到他们那种动物般的状态时，是指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多数，否定任何协定和义务。但是在19世纪，同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要是彼此互不往来毫不相干地并存是不可能的。激进的各州对分离派同盟有影响，而分离派同盟对激进的各州也有影响，那里有些地方也还有极其落后的东西。因此，激进的各州希望分离派同盟抛弃它那种愚昧顽固和狭隘保守，但是如果分离派同盟不愿意这样做，那末这种固执将必然被暴力所摧毁。目前所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

因此，现在爆发的内战只会有利于民主事业。在激进的各州里也还相当地保存了古日耳曼的那种粗野；那里的民主也还时而意味着农民的统治，时而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统治，时而意味着两者

的混合物；最文明的各州也还落后于欧洲文明的发展，只有个别地方慢慢地出现了真正的现代化的东西；但是这一切决不足以说明分离派同盟是正确的。这个粗暴的古条顿主义、野蛮迷信、宗法式的淳朴保守和誰出錢多就忠于誰的那种至死不渝的忠誠的最后避难所，必須坚决、徹底地予以消灭。瑞士議會行动得愈坚决，震撼这个僧侶的老巢愈有力，就愈能得到所有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的支持，就愈能証明它了解自己的地位。固然，五大列强就摆在那里，而激进派自身也担着風險。

对于分离派同盟，对于威廉·泰尔的这些真正的子孙來說，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不得不向奥地利王室——瑞士的真正的敌人求救，而且正好是在奥地利已經衰落，比任何时候都更卑鄙齷齪、更为可恨的今天。这也是对瑞士因光荣地摆脱双头鷹的魔爪和过分吹嘘这件事而追加的惩罚。就象是要使这种惩罚达到最严厉的地步似的，目前奥地利自身尚且难保，对泰尔的子孙更是爱莫能助了！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1月10日左右

載于1847年11月14日“德意志—
布魯塞尔报”第91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德意志—
布魯塞尔报”

弗·恩格斯

法国的改革运动

在最近一次的两院會議上，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揭發了无数的行賄丑聞，以为这样就会把政府推翻，可是政府仍然熬过了這場風險；臭名远揚的那 225 位議員[⊖]表示“滿意”，相信內閣是清白的，这时似乎已經天下太平。而到快要閉会的时候，議會反对派又象會議开始的时候一样，陷入了有气无力、茫然若失的状态。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結束。尽管路特希尔德先生、富尔德先生、菲尔希隆先生之流滿意了，可是人民并不滿意，就連資產階級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滿意。大部分法国資產階級，特别是中小資產階級不能不看到，現在的选民越来越变成一小撮銀行家、交易所經紀人、鐵路股票投机家、大工业家、地主和矿主的恭順仆从了，而政府所唯一关心的也正是这一小撮人的利益。他們懂得，如果不扩大选民范围，他們就根本没有希望恢复他們 1830 年以来在两院中日益失去的席位。他們知道，选举改革和議會改革對他們說來是危险的嘗試，然而他們又有什么办法呢？眼看着金融貴族——巴黎交易所巨頭——既收买政府又收买两院，眼看着自己的利益遭到公开的践踏，在这种情况下他們要末就得忍气吞声，坐待掌握統治权

⊖ 支持基佐政府的众議院多数派議員。——編者注

的金融大王的鲸吞蚕食而走向破产，要末就得大胆地争取议会改革。他们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所以，大约四个月以前，反对派的各色各样人物联合起来组织了支持选举改革的示威运动。他们决定举行一次公开的宴会，这次宴会是在7月间在巴黎的紅宮舞厅举行的。所有支持改革的派别都有代表人物参加，所以这次集会的成分是相当复杂的；但是表现得最积极的民主派显然占了优势。他们提出了一项要求作为他们参加宴会的条件，即不为国王的健康干杯，而为人民的主权干杯。委员会知道得很清楚，在法国的这个最民主的城市里，没有民主派参加它是搞不起一个象样的示威运动的，于是不得不表示同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也曾经刊登过有关这次宴会的详细报道¹⁸¹。这次宴会从各个角度看来——无论是在人数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是巴黎民主派实力的一次无比有力的炫示。

“辯論日报”没有放过机会就这次宴会的事情拚命叫嚣。

“怎么？没有为国王干杯？而且免去为国王干杯这个项目并不是由于粗心大意，也不是由于不懂礼仪——不，免去这个项目是一部分发起人作为他们参加宴会的条件而提出的要求！看，那位头脑冷静的、安分守己的杜韦尔瑞·德·奥兰先生和那位衛道者——拥护君主主义的奥迪隆·巴罗先生竟和什么样的一群好货为伍！天啊！这不光是共和主义，这纯粹是闹革命，是宣传动武，是社会主义、烏托邦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哼！先生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认得你们，——我们见过你们的血腥罪行的样本，我们有证据证明你们的斗争目标是什么。先生们，五十年前你们这一伙人会自称为雅各宾俱乐部！”

第二天，“国民报”引用了路易-菲力浦 1790 年和 1791 年的私人日记中许许多多的话来回答这家極端溫和的报纸的狂吼怒骂。那位当年的“公民小埃加里泰”每天的日记开头写的都是：“今天我

在雅各宾俱乐部”，“今天我在雅各宾俱乐部講了几句話，博得热烈的掌声”，“今天我在雅各宾俱乐部被分配去看門”以及諸如此类的話。

反对派的中央委员会号召自己的同情者在地方上也照首都这样做，到处举行这类支持改革的宴会。他們果然这样做了，几乎在法国的各个地方都举行了許許多多的支持改革的宴会。然而并不是各个地方的各派拥护改革的人都能够同样团结一致。在許多較小的城市里，资产階級自由派的势力相当大，他們还能够坚持为国王的健康干杯，从而把民主派排斥在門外。在其他一些地方，自由派想把干杯的形式变个样子以便蒙混过去，即变成“为立宪国王和人民主权干杯”。因为这仍旧不能使民主派滿意，自由派便又出了一个花招，把“立宪国王”改成“立宪体制”，“立宪体制”当然暗中把王权包括进去了。目前在地方的自由派中間爭論着一个重要的問題：究竟是在这一点上也讓步，不再以任何形式或以任何变相的方法勉强保留为国王健康干杯这个項目，还是公开地和民主派分道揚鑣（如果这样，民主派就会单独举行宴会来和他們竞争）？因为民主派坚持最初达成協議的条件，要求根本不要把国王牵扯在宴会这件事內；虽然“国民报”派曾一度有些动摇，可是“改革报”派却坚守着共和主义立場。在所有的大城市里，自由派都被迫讓步，至于說在比較次要的地区到底做到了为国王的健康干杯，那是因为这些宴会花錢很多，人民自然无法参加。“改革报”就巴尔勒杜克举行宴会一事写道：

“誰要是以为这样的示威活动表明了法国的輿論状况，那他无疑是大錯而特錯了。这些示威活动是资产階級一手包办的，人民則完全被排斥在門外。如果这个运动局限于巴尔勒杜克宴会那样的範圍內，那它将会象一切資

产阶级运动一样地烟消云散，例如自由贸易运动在讲过几句空话以后很快就消亡了。”

繼巴黎宴会以后第一个规模巨大的宴会是9月初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这次宴会带有相当浓厚的民主派色彩，而且在宴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工人提議为劳动組織干杯；劳动組織这个名詞在法国是表示英国全国职工联合会所争取实现的东西，那就是通过把工业的、农业的以及其他的企业組織起来的道路，使劳动从資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项組織任务或是由联合起来的工人们自己执行，或是在一个民主政府下由全国人民来执行。

随后举行的是巴尔勒杜克的宴会，这是一次资产阶级的示威，終席的时候由市长提議为立宪国王（自然是非常贊成立宪的国王！）的健康干杯；此外还有科尔馬、里姆斯和莫市的宴会，在所有这些宴会上优势完全在资产阶级方面，他們在这些二等城市中总是能够自行其是的。

可是聖岡丹的宴会又多少带有民主派的色彩了；而9月底在奥尔良举行的宴会則是十足道地的民主派集会。宴会上曾为工人阶级干杯，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宴会了。巴黎最著名的律师之一，民主主义者馬利先生在响应这个提議时講了話。他开始是这样講的：

“讓我們为工人，为那些一向被輕視、被遺忘的人們，为那些永远忠于自己国家的利益、在保衛祖国免受外国掠夺者侵犯或保衛我們的制度免遭国内敌人破坏的斗争中随时准备为祖国而死的人們干杯！为那些滿足了我們的要求——給我們带来了七月的日子的人們，为那些行动时威風凜凜，胜利时慷慨大方，具有非凡的勇敢、誠摯和大公无私的品質的人們干杯！”

他的祝詞的結束語是“自由，平等，友爱！”能說明問題的是，奧

尔良的宴会是我们所能证实的唯一为工人设有席位的宴会。

库洛米耶、梅侬和康纳的宴会又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集会。“左翼中心”的人物们，即“立宪主义者报”¹⁸²和“世纪报”的那些资产阶级自由派，津津有味地听着巴罗先生、波蒙先生、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之流贩卖改良的小贩子们讲话。在康纳，民主派公开地反对示威运动，因为这里的发起人坚持要为国王的健康干杯。在罗亚尔河畔的拉沙里岱的宴会上，也是由同样的狭隘精神占统治地位的。

与此相反，沙特尔的改革派的宴会又完全是民主派的集会。这里不是为国王干杯，而是为建立在最广泛的基础上的选举改革和议会改革，为波兰和意大利，为劳动组织干杯。

本星期内，在利尔、瓦朗西恩、阿温，以及在诺尔省全省都将举行这种宴会。可以预期，至少利尔和瓦朗西恩的宴会民主派将占绝对优势。法国南部、里昂和西部也都在筹备着示威活动。争取改革的运动正方兴未艾。

从这篇报道你们可以看出下面一些情况：1847年的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自由派和民主派互相斗争的特点；在一切比较次要的地区自由派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在所有的大城市里，在巴黎、斯特拉斯堡、奥尔良、沙特尔，甚至在一个不大的城市圣冈丹，却是民主派的势力大；自由派极力争取民主派的支持，他们采取支吾搪塞的办法或者作出让步，而民主派则无论在哪里都丝毫没有放弃过他们同意给予支持的条件；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民主派参加宴会，他们总是能够坚持自己的做法。因此，到头来整个运动畢竟变得有利于民主派，因为凡是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公众注意的宴会都清一色地带有民主派色彩。

改革运动得到了在9月間开会的省議会的支持，这些省議會全部是由資產階級的代表組成的。科多尔、芬尼斯特尔、埃恩、摩塞尔、上萊茵、瓦瑟、佛日、諾尔等省份的省議會都或多或少地要求較為广泛的改革，当然沒有一个省議會超出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范围。

你們也許要問，那末是要求改革些什么呢？不同的改革方案很多，有多少种自由派和激进派，就有多少种方案。这些要求之中的最低的要求就是把选举权扩大到这样一种程度：所謂“飽学之士”[capacities]，或者象你們在英国所謂的知識界^①，即使不繳納200法郎的直接稅(在目前，只有繳納200法郎直接稅的人才能成为选民)也享有选举权。此外，自由派还有一些多多少少和激进派的建議相吻合的建議，即：

(1) 扩大不得兼任的范围，也就是宣布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人不得同时充任議員。目前在众議院有150多个受制于政府的官員，他們之中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被解职，因此他們完全要看內閣的眼色行事。

(2) 扩大某些选区；其中有的选区里选民还不到150人，以致这些选民完全受制于政府，因为政府影响着他們地方上的和私人的利益。

(3) 一个省所有議員的选举應該由全省选民集中在省会一次进行。这个办法預計可以或多或少地把地方利益包容在全省的共同利益之中，从而使政府的舞弊手段和压力起不了作用。

其次是建議降低各級选举的选举資格。这些建議中間最激进

^① 英文原文为«the learned professions»,指神学界、医学界和法学界。——譯者注

的一个是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小企业主的机关报“国民报”所提出来的，它主张扩大选举权，把选举权给予每一个属于国民自衛軍的人。这项措施将会使整个手工业者和店主阶级获得投票的权利，把选举权扩大到象英国改革法案那样大的范围。然而这项措施的后果对法国却严重得多。在这个国家里小资产阶级受大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非常厉害，所以只要一获得选举权，他们就不得不立刻采取直接侵犯金融大王的措施。我在几个月以前寄给你们的那篇文章里已经说过，小资产阶级将会一步深一步地卷入这个运动，甚至要和他們自己的意志相违背；他們将必須有所抉择：或是放弃已经取得的障地，或是公开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而这是迟早要导致共和国的[⊖]。小资产阶级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这一点。这个阶级大部分都拥护普选权，“国民报”派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他們提出前面讲过的措施，只是把它看做改革道路上的前奏。然而在巴黎所有的日报当中，只有一家报纸除普选权而外什么也不能使它满足，它不是把“共和国”这个词简单地了解为到头来仍使工人阶级象今天一样受穷的政治改革，而是把它理解为社会改革，并且是毫不含糊的社会改革。这家报纸就是“改革报”。

我們不應該認為改革运动就是法国今天所进行的全部运动。远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宴会，不論是自由派的还是民主派的，都是资产阶级占优势；奥尔良的宴会是唯一的一次有工人参加的宴会。在进行这些宴会运动的同时，工人运动也在不声不响地、秘密地、一步一步地进展着，要不仔細观察，就几乎看不见它。但是現在它正在空前地活跃着。这个情况政府是很了解的。所有那些资产阶

⊖ 見本卷第 206 頁。——編者注

級的宴会政府都准許举行，但是当9月間巴黎印刷工人請求准許举行一向是每年一次并且毫无政治性的例行宴会时，却遭到了拒絕。政府非常怕工人，連絲毫的自由也不敢讓他們享有。它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人民完全放弃了任何鬧事和起义的打算。政府盼望人民鬧事，而且正在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挑动鬧事。警察們投擲出装有煽动暴乱的传单的小炸弹，炸弹爆炸以后传单就滿街乱飞。聖奧諾萊街工厂事件就被用来当作口实向人民进行最野蛮的进攻，以便激怒他們起来鬧事和动武¹⁸³。連續两个星期每天晚上都有几万人聚集在街头；他們受到最卑劣的待遇；他們已經完全准备好以武力回答武力，但是他們忍耐住了，沒有讓政府从他們那里找到頒布箝制言論自由的新法律的借口。想想看吧，他們对当时的首要任务該有怎样的領悟，該有怎样一致的認識啊！巴黎的人民要拿出多么大的耐性才能忍受这样卑劣的待遇而不进行毫无希望的起义！巴黎工人所表現的这种坚忍的精神就証明他們已經有了多么大的进步！要知道，巴黎工人在跑上街头的时候，很少不把阻挡他們前进的一切打得粉碎，他們把起义看成家常便飯而且干起革命来就象上酒館喝酒一样地高兴。可是，如果你們由此得出結論說人民的革命热情已开始减退，那你們就大錯特錯了。恰恰相反，这里的工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深深地感到必須进行革命，而且是远比第一次更为徹底、更为激烈的革命。然而他們从1830年的經驗中懂得，单靠武装斗争是不够的；在击潰敌人以后还必须采取措施来巩固自己的胜利，这些措施不仅要摧毀資本的政治力量而且还要摧毀它的社会力量，不仅要保証工人的政治力量而且还要保証他們的社会福利。因此，他們非常沉着地等待时机，但同时又認真地从事于一些社会經濟問題的研究，这些問題的解决会

使他們知道只有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为一切人的幸福生活打下巩固的基础。路易·勃朗所著“劳动組織”¹⁸⁴一書，只一两个月就在巴黎工厂工人中間銷售了6 000册，值得注意的是这本書以前已經出过5版了。工人們还讀了其他許多有关这一問題的書籍。他們組成10—20人的小組，一起討論这些書籍里面所闡述的各种方略。关于革命，他們却談得不多，因为这是毫无疑問的事情，是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問題；一旦人民和政府之間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他們会立刻出現在大街和廣場上，挖断馬路，把公共馬車、运貨的和載客的馬車都放倒橫在街上，把每一条通路堵死，把每一条小巷变成一座堡垒，并且从巴士底廣場突破一切障碍直向土伊勒里宮前进。到那时，恐怕出席改革宴会的那些大人先生們大部分都要躲在自己家中最黑暗的角落里，或者象枯树叶一样在人民的狂風暴雨中四散飘落。到那时，奧迪隆·巴罗先生、波蒙先生及其他叱咤風云的自由派人物的末日就要到了；到那时，人民将要严厉地判決他們，正象他們自己今天严厉地判決保守的政府一样。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1月初
載于1847年11月20日“北極星报”
第526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編者注：
“本报巴黎通訊員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北極星报”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于1940年
“无产階級革命”杂志第4期

弗·恩格斯 宪章运动¹⁸⁵

包括有人民党派重要代表人物在内的新选出的议会的开幕，不能不在民主派的队伍中引起轰动。宪章派的地方协会在普遍改组；群众性的集会多起来了；会上提出并讨论了关于行动方法的各种建议。宪章派协会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了这一运动，在告不列颠民主派书中拟定了宪章派在本届议会任期之内将遵循的行动计划。

书中说：“过几天，公然在人民面前自称为英国下院会议的会议就要召开了。过几天，这个仅由社会上一个阶级所选出的会议就要为（损害工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进行非正义和卑鄙的活动了。

“必须使人民群众一开始就对这个会议行使窃取来的立法权表示抗议。联合王国的宪章主义者，你们是有办法的，你们应该把这套办法拿出来！我们向你们提供一份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新的全民请愿书。把你们千百万人的名字都签上，努力帮助我们把它作为表达民族意志的文件、作为人民对未经他们同意就颁布的一切法律的严正抗议以及作为恢复多少世纪以来就被剥夺了的人民主权的法案提出来。

“但是单凭请愿是不能满足形势的要求的。诚然，我们把奥康瑞尔先生送进了议会，因而已在那里取得一个席位。民主派的代表们将会把他当作一个机警的和富有活动能力的领袖。但必须使奥康瑞尔得到外部压力的支持，而这个外部压力、这个强大而有力的公众舆论正是应该由你们来造成。我们协会的各地支部都应该改组；所有过去的会员都应该回到我们队伍中来；各

处都应该召开群众大会；各处都应该把讨论宪章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切地方组织都应该收集会费来充实我们的基金。积极行动起来，再次拿出英国人原有的毅力，目前开始的运动就会成为我们为取得民主胜利而进行的一切运动中最光荣的运动。”

几乎包括欧洲各国民主派的“民主派兄弟协会”¹⁸⁶也决定无条件地公开参加宪章派的鼓动工作。该协会通过如下的决议：

“英国人民只有在自己取得民主统治以后，才可能有效地支援其他国家的民主派的斗争；

“我们的协会是为了帮助各国战斗中的民主派而建立的，我们有责任参加英国民主派的斗争，以便取得以宪章为基础的选举改革；

“鉴于以上两点，‘民主派兄弟协会’誓以全力支持为实现人民宪章而进行的鼓动。”

这个兄弟协会，由于把居住在伦敦的无论英国或外国的最著名的民主主义者都团结在自己的队伍里，也就日益具有更大的意义。协会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使伦敦的自由派都认为把它同自由贸易派有名的议员主持下的资产阶级万国联盟¹⁸⁷相对比是不无裨益的。以包林博士、汤普逊上校和其他自由贸易拥护者为首的这个新的组织的目的，无非是在仁爱、自由的幌子下来宣传对外贸易自由。但这个组织的成就看来不会很大。它成立六个月以来，几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而“民主派兄弟协会”却公然表示反对一切压迫行为，不管这种行为来自何方。因此，伦敦的（无论英国的或外国的）民主派代表都倾向“民主派兄弟协会”，同时声明说，他们决不为英国自由贸易派厂主们所利用。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1月21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1847年11月22日“改革报”

俄文译自“改革报”

弗·恩格斯

改革派陣营的分裂。“改革报”和 “国民报”。民主主义的胜利

自从我發出上一封信[⊖]以来，在利尔、阿温和瓦朗西恩都举行了宴会。阿温的宴会具有純立宪主义的性質，瓦朗西恩的宴会具有妥协的性質，而在利尔，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的阴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現在簡要地报道一下关于这一重大集会的几件事。

被邀請的除了一些自由派及“国民报”派外，还有“改革报”的民主派；賴德律-洛兰先生和“改革报”的編輯弗洛孔先生都应邀出席了宴会。资产阶级德高望重的大人物奥迪隆·巴罗先生也接到了邀請。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大家正要举杯庆祝的时候，奥迪隆·巴罗先生突然宣称，如果不加一段話說明这种改革“是用来保証1830年7月所取得的制度的純潔和真正精神”，他就不能出席，也不能“为議会改革”干杯。不言而喻，这样的补充就会使共和派不得出席。这一举动使委员会茫然不知所措，然而巴罗先生还是坚持己見。最后，大家同意把問題交由本會議解决。但是，會議非常明确地宣称，它不希望議程有任何更改，也不拟破坏民主派据以出席利尔宴会的条件。奥迪隆·巴罗先生同他手下一伙自由派

⊖ 見本卷第394—402頁。——編者注

代表和編輯一起傲慢地退席。弗洛孔先生和賴德律-洛兰先生也被請來了；尽管有自由派的阻撓，宴会还是举行了，而且賴德律先生的演說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这样，资产阶级的改革派的奸险阴谋破产了，民主派获得了光辉的胜利。奥迪隆·巴罗先生不得不可耻地躲藏起来，再也不敢在民主的城市利尔露面。他用来为自己辯解的唯一論据是：他似乎知道“改革报”的先生們有意利用利尔的宴会来搞革命——在这升平盛世！

过了几天，在阿温的只不过是几个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家庭宴会上，巴罗先生算得到了一点安慰。这里，他高高兴兴地为国王干杯。可是在瓦朗西恩他又因为遭到了跟他在利尔宴会上所遭到的同样命运而不得不把他那心爱的祝賀之杯收拾起来。虽然那些随时都能制造革命的可怕人物并没有出席瓦朗西恩的宴会，但是人們却没有为国王的健康干杯！处处碰壁的大人物只得克制自己高尚的憤慨，除非讓他再有可能在别的幽靜的宴会上当着某个小城市的吃惊的食品杂货商和蜡烛商咒罵“无政府主义”，“暴力”和“共产主义”。

利尔的宴会在报界引起了一场非常热烈的論战。保守派的报纸因改革派内部發生分歧而欢天喜地。梯也尔先生的陈旧而乏味的“立宪主义者报”和巴罗的“私人”报纸“世紀报”突然陷入了極度的不安中。

“世紀报”恼羞成怒，向着自己的听众，小店主們大声喊道：“不，不，我們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毫无关系，我們和这些主张恢复恐怖統治的人，这些馬拉和罗伯斯比尔的信徒毫无共同之处。即使現今的制度再坏百倍，我們也宁愿选择現今的制度而不要他們的血腥統治！”

完全正確！白色睡帽比之雅各黨人的紅色帽子更百倍地適合於這些和平的食品雜貨商和蠟燭商。同時，這些報紙一方面對“改革報”進行卑鄙惡毒的謾罵，一方面對“國民報”卻又畢恭畢敬。的確，“國民報”的態度因而也就曖昧到了極點。在康納舉行宴會時，這家報紙就已經對許多由於席間要為國王的健康干杯而不願出席的民主主義者的行為加以責難。現在它對利爾的宴會又非常冷淡並對使這次示威暫時發生混亂的事件表示遺憾；而“國民報”的許多外省的同盟者公開批評賴德律和弗洛孔先生的行為。因此，“改革報”要求該報更明白地表示態度。“國民報”宣稱它的文章是非常清楚的。於是“改革報”就問：在利爾的令人遺憾的事件是什麼意思？你們感到遺憾的是什麼？你們是對巴羅先生的行為感到遺憾呢還是對賴德律-洛蘭先生的行為感到遺憾？你們是對巴羅先生的狂妄行為感到遺憾呢還是對他的失敗感到遺憾？也許，你們對賴德律先生為保障普選權所作的演說感到遺憾吧？或者，是因為君主主義的失敗和民主主義的勝利而感到遺憾吧？你們是否同意你們外省的同盟者在這一個問題上所說的話呢？你們欣賞“世紀報”的贊揚、贊成它對我們謾罵嗎？假如奧迪隆·巴羅先生在奧爾良提出類似的要求，你們會勸告你們的朋友馬利先生屈從嗎？“國民報”回答說，為黨着想，它將避免和“改革報”論戰，並且對它的一個“朋友”發送給外省各報的文章將不負責任；至於其他一些問題，“國民報”的過去可以允許它置之不理，不必予以答復。“改革報”引用了整個答復，僅附有一點說明：“問題依然懸而未決。”現在，民主派的面前有許多文獻，他們可以自行判斷一切。他們是這樣做了。法國大多數激進派報紙，甚至自由派報紙，都以最斷然的措詞表示贊成“改革報”。

毫无疑义，“国民报”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这家报纸愈来愈听命于资产阶级了。在最近一个时期内，它总是在紧要关头背叛民主事业，它不断宣传同资产阶级缔结联盟，而且屡次都是专为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服务。要是“国民报”不立即改变自己的做法，那末，人们将不再认为它是民主派报纸。在这次利尔事件中，“国民报”仅仅由于对那些比它自己更有激进倾向的人的个人敌意，就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为组织宴会而和自由派所缔结的同盟的基本原则。在事情发生以后，“国民报”再也不能在以后的宴会上坚决反对为国王干杯。“国民报”的“过去”也并不怎么光彩，要对同行提出的问题保持缄默那是不行的。这只要想一想它如何为巴黎的那些堡垒¹⁸⁸辩护就够了。

附启：本星期在第戎举行了改革派的宴会。出席宴会的有1300人。这是真正民主派的宴会。自然，根本没有为国王干杯。所有演讲的人都属于“改革报”派。其中主要的有路易·勃朗，弗洛孔，埃·阿拉戈和赖德律-洛兰先生。“改革报”的编辑弗洛孔先生举杯为其他国家的民主派祝贺，同时还以最大的敬意评论了英国的宪章派。下星期我将要寄上他演讲的全文，并对这一重大的集会的总的进行情况作一全面的报道¹⁸⁹。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1月底

载于1847年12月4日

“北極星报”第52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極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55年的
“历史问题”第11号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論 波 兰¹⁹⁰

1847年11月29日在倫敦舉行的
紀念1830年波蘭起義十七周年的
國際大會上的演說

馬克思的演說

各民族團結友愛，這是目前一切黨派，尤其是資產階級的自由貿易派的一句口頭禪。的確，現在存在着一种各民族的資產階級兄弟聯盟。這就是壓迫者對付被壓迫者的兄弟聯盟、剝削者對付被剝削者的兄弟聯盟。一個國家中個別資產者之間雖然存在着競爭和衝突，但資產階級却總是聯合起來反對本國的無產階級；同樣，各國的資產階級雖然在世界市場上互相衝突和競爭，但總是聯合起來反對各國的無產階級。要使各民族真正團結起來，他們就必須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們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須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係，因為現存的所有制關係是造成一些民族剝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對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係最關心的只有工人階級。只有工人階級能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也就是克服了一切民族間和工業中的衝突，這些衝突在目前正是引起民族互相敵視的原因。因此，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同時就是

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毫無疑問，旧波兰已經死亡了，我們絕對不希望它復活。不过死亡的不仅是旧波兰。旧德国、旧法国、旧英国，——整个旧社会都已經过时了。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沒有什么东西可以喪失的人們來說并不是一种損失，而一切現代国家里的極大多數的人所处的状况正是这样。而且，他們必須通过旧社会的灭亡才能获得一切；旧社会的灭亡将使一个不再以階級对立为基础的新社会建立起来。

同別的国家比較起来，英国是一个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对立最为尖銳的国家。因此，英国无产階級对英国資产階級的胜利对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們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其所以說應該在英国解放波兰，而不是在波兰解放波兰，原因就在于此。因此你們，宪章主义者，不應該仅限于表示有解放各民族的善良的願望。粉碎你們国内的敌人，那时你們就有权感到自豪，是你们消灭了整个旧社会。

恩格斯的演說

我的朋友們，請允許我今天作为一次例外，以一个德国人的身份来講几句话。我們德国民主主义者，对波兰的解放是特別关心的。正是德国的君主們曾經从瓜分波兰中取得利益，正是德国的士兵直到現在还在蹂躪加里西亚和波茲南。我們德国人，我們德国的民主主义者，首先应当洗刷我們民族的这个污点。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別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因此，不把波兰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波兰和德

国之所以有着共同的利益，波兰的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之所以能够为解放两个民族而共同努力，原因就在于此。我也认为，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将进行首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促使民主主义获得胜利，欧洲各国求得解放；我在英国已经住了几年，并且在这段时间内公开地参加了宪章运动。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将第一个奋起，因为正是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最为激烈。为什么这个斗争最为激烈呢？因为由于现代工业，由于运用机器，英国一切被压迫阶级已经汇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庞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因为对方阵营里的一切压迫阶级也由此联结成为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这样，斗争便简单化了，因此只要一次强有力的打击就能解决这次斗争。难道不是这样吗？贵族在英国已不再拥有任何权力，独揽大权的是资产阶级，贵族还是受资产阶级庇护的。跟资产阶级对抗的是众志成城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战胜统治者资本家的时刻已日益临近了。消灭过去分隔工人各个阶层的那种利益分歧，使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趋于均衡，这一切你们均应归功于机器生产；没有机器生产就不会有宪章运动，即使机器生产使你们的现状恶化，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胜利才有可能。不仅在英国，就是在所有别的国家里，机器生产对工人的影响也都是如此。在比利时、美国、法国和德国，机器生产使一切工人的状况平均化了，并且越来越使这一状况均等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里的工人目前都关心着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推翻压迫他们的阶级——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均衡，各民族工人党派利益的一致，这些都是机器生产的结果，因此机器生产将继续成为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既然各国工人的状况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末他们就应当

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
阶级兄弟联盟。

載于1847年12月9日“德意志—
布魯塞爾報”第9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德意志—布魯塞爾報”

俄譯文第一次全文發表

弗·恩格斯

紀念 1830 年波兰革命¹⁹¹

亲爱的公民！

我昨晚来到这里，正巧赶上了紀念 1830 年波兰革命的群众大会。

我曾参加过不少类似这样的集会，但从未见到象这样热情洋溢，在不同民族的人们中間这种开誠相見暢所欲言的和諧气氛。

英国工人阿諾特先生被推选为主席。

第一个發表演說的是“北極星报”編輯厄內斯特·琼斯先生。他虽然抨击了 1830 年起义时的波兰貴族的行为，但是对于波兰为掙脫压迫者的桎梏所作的努力却是热烈贊許的。他的卓越有力的演說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在他講完后，米歇洛先生用法語發表了演說。

接着發言的是德国人沙佩尔先生。他通知會議說，布魯塞尔的民主协会¹⁹²已派遣一个副主席、德国民主主义者馬克思先生到倫敦来安排布魯塞尔民主协会和倫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之間的通訊联系，同时筹备召开歐洲各国民主派代表大会。

当馬克思先生出現在講台上的时候，会上發出了不絕的掌声。

馬克思先生用德語演說，由沙佩尔先生翻譯。馬克思先生宣称，波兰解放的信号将由英国發出。他說，只有当西欧的文明国家

在爭取民主制度的时候，波兰才会自由。而在这些欧洲国家中，英国的民主运动是力量最强，为数最多，最具有全国性組織規模的民主运动。正是在英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發展到了極点，所以这两个社会阶级間的决战，愈来愈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而，正是在英国最有可能开始这场战斗，它将以民主主义的普遍胜利而告終，同时波兰的桎梏也将在这场战斗中被粉碎。欧洲其他民主派的成功将取决于英国宪章派的胜利，所以，波兰也将賴英国而得救。

“北極星报”的主笔哈尼先生接着向布魯塞尔的民主派表示謝意，感謝他們一开始就同倫敦的民主派联系，而对倫敦的万国联盟中资产阶级的討好絲毫不予理睬。这个联盟是自由貿易派所創立的，其目的是为了自由貿易的利益而利用外国的民主派，并为了同几乎全由工人所組成的“民主派兄弟协会”进行竞争。

其后發言的是来自巴黎的德国民主主义者恩格斯先生，他宣称，德国特別关心波兰的解放，因为德意志各邦政府的暴政正部分地扩展到波兰。德国民主派應該把推翻有辱德国的暴政看做自己的絕對責任。

来自列日的特德斯科先生說話坚毅有力，他感謝 1830 年波兰战士们公开宣布了起义的英勇行为。他的演說由沙佩尔先生翻譯，不时博得暴風雨般的掌声。

在查理·基恩先生作了簡短的演說后，奧博尔斯基上校代表波兰人致答詞。

最后發言的是英国工人威尔逊先生，还在不久前，由于他的坚决反对，差一点沒有把万国联盟的大会解散了。

經哈尼和恩格斯两先生的提議，會議以三陣爆裂般的掌声向

歐洲三大民主主義的報紙——“改革報”、“北極星報”和“德意志—布魯塞爾報”致敬；經沙佩爾先生的提議，三次高呼反對三家反民主主義的報紙——“辯論日報”、“泰晤士報”和奧格斯堡的“總匯報”。

與會者全體脫帽肅立，高唱“馬賽曲”，大會在歌聲中結束。

弗·恩格斯寫於 1847 年 11 月 30 日

載於 1847 年 12 月 5 日“改革報”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改革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卡·馬克思 駁阿·巴泰尔斯¹⁹³

阿道夫·巴泰尔斯先生說他的社会生活結束了，并且他真的完全鑽进个人生活的圈子里去了。每当某种政治事件發生时，他只是表示抗議和公开发表声明，說他与事件无关，他巴泰尔斯先生并没有参加运动，运动是违反他巴泰尔斯先生的意志而發生的，因此，他認為自己有权不予最后批准。誰都会承認，参加社会生活采取这种方式或采取其他任何方式是沒有絲毫差别的，所有这些宣言、声明、抗議，只是以私人的謙虛的外表把社会的人掩盖起来了。无人了解和无人承認的天才正是这样来显示自己的。

巴泰尔斯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各国民民主主义者在組織这个称为民主协会的团体时，目的只是为了交換意見和在能够團結各国人民建立兄弟友誼的原則方面达到互相了解。在抱有这种目的的协会中，一切外国人的責任当然有义务公开說明自己的观点，如果每逢他們为履行其所加入的协会的义务而發表意見时，就称他們为老师，那就实在太可笑了。阿·巴泰尔斯先生之所以指責外国人喜欢教訓一切人，只是由于他們不願意听他自己的說教罢了。

毫無疑問，阿·巴泰尔斯先生还能記得，他甚至在临时委员会中(他是委員之一)建議把德意志工人协会¹⁹⁴作为新协会的核心。当时我不得不代表德国工人拒絕这个建議。阿·巴泰尔斯先生是不是想乘机为我們設下圈套以便将来自己可以告密呢？

当然，巴泰尔斯先生可以随意罵我們的观点“卑鄙和野蛮”。

他沒有批評，沒有論證，却來指責，並且忙于指責他所不了解的東西以表現自己的正統性。

我們比阿·巴泰爾斯先生更善于容忍，我們可以原諒他那一點也不得罪人的“臆想症”。

阿·巴泰爾斯先生與其說是民主主義者，不如說是神政論者，因此他以“布魯塞爾報”¹⁹⁵為自己的同盟者，是十分自然的。這家報紙責備我們打算“改良人種”。請它放心吧。幸而我們德國人不是不知道，從1640年起“宣傳信仰協會”¹⁹⁶就獨占了改良人種的權利。我們太淺薄，太渺小，不配在這仁愛的天意方面和可敬的神甫們競爭。請他們費神去比較一下“德意志—布魯塞爾報”和“北極星報”的報道吧，他們定會確信，所謂“憲章派……你們將被當作人類的救世主而受到歡迎”¹⁹⁷等話，完全是出自“北極星報”的錯誤而強加于我的。

“布魯塞爾報”在更為慈善的心腸的驅使下，向我們提起阿那卡雷斯·克羅茨企圖比1793—1794年的愛國志士更愛國而喪命于斷頭台的例子。在這方面，可敬的神甫們是無可指責的，他們從來就不比愛國志士更愛國，相反地，他們隨時隨地都遭到譴責，說他們力圖比反動分子更反動，而且更壞的是他們力圖成為比本國政府更道地的政府。當我們想到不久以前他們在瑞士的慘痛教訓時，我們承認，他們為了使我們避免另一極端和防止類似的危險而向我們提出的嚴重警告，是出于早期基督徒的那種可貴的好心腸，為此，我們向他們表示感謝。

卡·馬克思寫于1847年12月17日左右

用法文載于1847年12月19日
“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第101號

署名：卡爾·馬克思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德意志—
布魯塞爾報”

卡·馬克思 拉馬丁和共产主义

布魯塞爾 12 月 24 日。法國報紙又登載了拉馬丁先生的信。這一回談的是共产主义，是詩人兼社会主义者被卡貝所迫最后直率地傾吐出來的。同時，拉馬丁答應在最近的將來要**充分地**研究這個“重要的問題”。不過目前他還滿足於某些簡短的神諭格言。

他說：“我對共产主义的見解，可以簡單地用**感覺**（！）來表達，那就是：要是上帝委託我教化一群野蠻人，使他們都成為文明人，那末，我要給他們制定的第一個制度就是所有制。”

拉馬丁先生繼續說：“人把許多東西占為己有是一種自然規律和一種生活條件。人在呼吸時就把空氣占為己有，在活動時就把空間占為己有，在耕種時就把土地占為己有，在繁衍種族時甚至就把時間占為己有；所有制是宇宙中生活原則的組織；而共产主义却會使勞動和全人類毀滅”。

拉馬丁先生最后安慰卡貝先生說：“你的幻想對我們這個世界說來是過分美好了。”

拉馬丁先生就是這樣反對共产主义的。他不僅反對共产主义制度，而且拿起武器來捍衛“私有制的萬古長存”。因為他的“感覺”告訴他三種東西：（1）所有制可以教化人們；（2）所有制是宇宙中生活原則的組織；（3）所有制的對立物，共产主义，對這個腐敗的世界說來是過分美好的幻想。

毫無疑義，拉馬丁先生“感覺”到一個更好的世界，在那裡“生活原則”是按別的方式“組織”起來的。但是在这个腐敗的世界，**“占有”**終究是生活的條件。

我們沒有必要借分析拉馬丁先生的模糊感覺來揭露他特有的矛盾。我們只指出一點。拉馬丁先生提出，所有制根本就是從野蠻狀況到文明狀況的過渡階段，並解釋說，所有權是進行呼吸和生育兒女過程的先決條件，同樣也是社會現存的私有財產的先決條件。他以為這樣就証實了資產階級所有制的萬古長存。

拉馬丁先生正象沒有看到“占有”空氣和“占有”社會產品之間的差別一樣，沒有看到從野蠻過渡到文明的時代和我們的時代之間的區別；就象兩個時代都是“過渡時代”一樣，反正兩者都是“占有”！

毫無疑義，拉馬丁先生在他那反對共產主義的“充分的”論戰中一定會發現有可能從他的“感覺”所產生的這些一般詞句里“合乎邏輯地”引伸出一系列更為一般的詞句。那時，也許我們也有可能來“更加充分地”研究他的詞句。可是目前我們却只想把天主敎君主主義報紙用來同拉馬丁先生的感覺相對峙的那種“感覺”轉告我們的讀者。例如，昨天的“君主同盟報”就發表了反對拉馬丁先生的感覺的意見：

“我們看到這些人類的啓蒙者是怎樣使人類失去領導者的。可憐的人們！他們奪去了窮人借以安慰自己的上帝；他們奪去了窮人的天，他們只留下一個貧窮和困苦的人。接着他們又過來說：你想占有土地；土地不是你的。你想過幸福生活；幸福生活是別人的。你想得到一份財產；這是不可能的；管你貧困，管你赤身露體，管你顛沛流離，死了活該！”

“君主同盟報”用上帝來安慰無產者。“公益報”，即拉馬丁先生的報紙卻用“生活原則”來安慰他們。

卡·馬克思寫於1847年12月24日

載於1847年12月26日“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第103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德意志—布魯塞爾報”

弗·恩格斯 “改革报”和“国民报”

利尔的宴会引起了“改革报”和“国民报”之间的争论，使得两家报纸现在已彻底决裂了。

事实是这样的：

在为改革而举行的宴会运动开始以后，“国民报”就比以往更为露骨地倒向王朝反对派¹⁹⁸。在利尔，“国民报”派的德若尔日先生同奥迪隆·巴罗一起退出了宴会。“国民报”本身对利尔宴会的意见是异常含糊的。当“改革报”要求它更直率地说个明白时，它就借口不希望同这家报纸论战而拒绝了。但是这决不能成为拒绝说清事实真相的理由。总之，“改革报”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最后它向“国民报”的一位代表人物加尔涅-帕热斯开了火，因为他在一次演说中否定了阶级的存在，并用 *citoyens français* [法国公民] 这种笼统的说法抹煞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到这个时候，“国民报”才终于声明说，它要保护自己的朋友，不让报纸诬蔑所有象卡诺、加尔涅-帕热斯那样正直的爱国人士。

不久，“国民报”在各个方面都遭到了失败，于是它除了责备“改革报”宣传共产主义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出路了。

“你们讲什么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的那些模糊的意图、理论和体系，你们谴责我们，说我们公开攻击这些，直截了当地说，共产主义意图。好，那你们就

直截了当地表明吧：你们赞成还是反对共产主义？我们要大声地宣称：我们和共产主义者（那些否定财产、家庭、祖国的人）毫无共同之点。一旦发生战斗，我们不会同这些心怀叵测的人站在一起，而是要反对他们。我们和这些可憎的空想是没有和解可谈的，我们对它，对这种把人变成畜生、把人贬到野兽状态（le réduit à l'état de brute）的荒谬而残忍的（sauvage）体系是不能宽容的。你们以为人民会和你们在一起么？人民为什么要抛弃他们辛辛苦苦赚到的一点财产，抛弃家庭，抛弃祖国呢？你们以为人民总有一天会相信，无论是奥地利使我们屈从它的专制制度或是法兰西为列强所瓜分，对他们说来反正都是一样么？”

“国民报”不仅提出了这些反对共产主义的理由，而且还提出了它的改善工人状况的计划：邮政改革、财政改革、奢侈品税、国家补助金、废除入市税¹⁹⁹、自由竞争。

“国民报”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想法是不值一驳的。滑稽的只是，“国民报”仍然用什么“列强”侵犯法兰西的经常威胁这类话来吓唬人；仍然以为莱茵河和英吉利海峡那边有千百万的刺刀对着法兰西，千百门大炮瞄准着巴黎。对于这一点，“改革报”回答得完全对，它说：在国王们侵犯的情况下，能保护我们的将不是巴黎的堡垒，而是人民自己。

“改革报”在回答上面所引用的“国民报”的文章时声明说：

“我们之所以不是共产主义者，正是由于共产主义没有重视生产的规律，也没有考虑到有必要为全社会生产足够的东西。但是，共产主义者在经济方面的建议，对我们说来，比那无条件地接受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原则的‘国民报’的建议要接近得多。我们今后仍然要保护共产主义者，使他们不受警察和‘国民报’的迫害，因为我们承认他们至少有权自由辩论，因为工人自己的学说永远值得注意。”

我们感谢“改革报”，因为它如此刚毅地反对“国民报”，捍卫了真正的民主。我们感谢它，因为它在同这家报纸的斗争中保卫了

共产主义。我們很滿意地指出，当政府迫害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它总是为他們辯护。当德朗格尔先生通过法庭迫害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²⁰⁰的时候，所有巴黎报纸中**只有一家**“改革报”起来为他們辯护，卡貝先生則差点沒有出来替政府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行为辯护。使我們高兴的是，共产主义目前虽然还不十分發展，“改革报”却已看到其中包含着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对自己更相近的东西。然而，我們希望很快就能够向“改革报”証明，它們捍衛的原則比起法国人迄今所熟悉并部分地传播到国外的那种共产主义，倒更接近于我們所捍衛的共产主义。

其实，“改革报”对“国民报”的指責，只是表达了在德国、英国和比利时民主派中，一句話，除法国以外在所有民主派中早已形成的意見而已。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2月底

載于1847年12月30日“德意志—
布魯塞尔报”第10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德意志—
布魯塞尔报”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說

“北極星报”在报道第戎宴会的时候批評了路易·勃朗先生的演說，我們完全同意这一批評²⁰¹。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团結并不排斥相互間的批評。沒有这种批評就不可能达到团結。沒有批評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談不到团結。我們轉載“北極星报”的意見，是为了表示我們也反对那些偏見和幻想，这些东西和現代民主主义的願望是截然相反并完全敌对的，因此，如果希望各国的民主主义者的团結不致成为一句空話，就应当摒弃那些偏見和幻想。

勃朗先生在第戎宴会上說道：

“我們必須在民主的範圍內团結一致。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一点上迷失方向。我們思想，我們工作，这不仅是为了法国，而且是为了全世界，因为法国的将来就是全人类的将来。其实，我們所处的地位是非常优越的，我們一方面仍然是屬於本民族的，一方面却又必然是世界主义者，而且我們身上世界主义的成分要比民族的成分强。任何人如果自称为民主主义者，而同时又想做一个英国人，那就是否定他本国的历史，因为英国在历史上的作用一向就是为了利己主义而反对 «fraternité» [“友爱”]。同样，法国人如果不想同时做一个世界主义者，那也就是否定他本国的历史，因为法国除了讓有利于全世界的思想获得胜利之外，永远不会讓別的思想占上风。可敬的先生們！在十字軍远征，欧洲进軍夺取聖墓的时候，是法国衛护了这一进軍。以后，当天主教神甫打算强迫我們套上教皇最高权力的枷鎖的时候，是教皇权限制派的主教們捍衛了信仰自由。是誰在旧君主制的末日里支持了年輕的共和政体

的美国？是法国，就是这个法国！如果我所說的話对君主政体的法国來說都是正确的，那末对共和政体的法国來說又怎么能不对呢？法兰西共和国虽然已在本国的疆土上和刑場上流尽了鮮血，但为了巴达維亚弟兄們，却仍然不惜流血牺牲，历史上哪里能找到哪怕有一点类似这种惊人的、充滿自我牺牲的无私精神的例子啊！無論在失败的时候或是在胜利的时候，法国天才的光芒总是照耀着一切甚至連敌人也包括在內！讓欧洲开拔十六个集团軍来进攻我們吧，我們將以自由来回答欧洲！”

关于这一点，“北極星报”說道：

我們完全不想抹煞法国革命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的意义，也不想减少全世界对共和国伟大活动家应有的謝意。但是我們仍然認為，上述引文以世界主义的观点来比較法国和英国的地位，那是完全錯誤的。我們根本否認强加在革命前的法国身上的世界主义的[⊖]性質。路易十一和黎塞留的时代就是明証！路易·勃朗先生对法国所說的实际上是什么呢？“法国除了讓有利于全世界的思想获得胜利之外，永远不会讓別的思想占上风。”但是，我們認為，在这方面不同于法国或可能不同于法国的国家，勃朗先生在世界上是連一个也举不出来的。就以勃朗先生用来直接和法国对比的英国为例吧。英国發明了蒸汽机，英国修筑了铁路，而这两件东西，我們認為，却抵得上一大堆思想。就是这样！英国發明这些东西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全世界呢？法国人自吹他們到处传播文明，尤其是在阿尔及尔。那末，在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传播文明的不是英国，又是誰呢²⁰²？法国曾經为解放一个共和国而参加了一定的斗争，可是为这个共和国奠定基础的又是誰呢？是英国，就

⊖ 这里所用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等不是指路易·勃朗演說中遭到本文批判的那种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这里是“全人类的”、“摆脱民族偏見的”等意思。——編者注

是这个英国！如果說，法国支援过美利坚共和国摆脱英国暴政的解放斗争，那末早在二百年前，英国就已从西班牙的奴役下解放过荷兰共和国。如果說，法国在上世紀末給全世界做出了光荣的榜样，那末我們也不能避而不談这一事实：英国还比它早一百五十年就已做出了这个榜样，而那时法国还根本没有准备向英国学习呢。至于18世紀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和达兰貝尔等闡明的那些思想，不是首先产生在英国又是产生在哪儿呢！我們决不能因为密尔顿（第一个为弑君辯护的人）、艾尔杰楠·悉尼、博林布罗克和舍夫茨別利的法国繼承者比他們的先輩更为出色便忘了他們的先輩！

勃朗先生肯定地說，“英国人如果自称为民主主义者，那就是否定他本国的历史”。

那又有什么呢！我們認為真正的民主主义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应当**否定本国的历史，**应当**拒绝对充滿貧困、暴政、阶级压迫和迷信的过去負任何責任。法国人还是不要在其他各国的民主主义者中間标新立异吧！不要为他們过去的国王和貴族的所作所为承担責任吧！因此，勃朗先生認為英国民主主义者的一个缺点，我們倒認為是英国民主主义者的一大优点，那就是他們**应当**抛弃过去而只展望将来。

勃朗先生說，“法国人必然是世界主义者”。是的，只要在法国的影响，法国的道德、風尚、思想和政治制度占統治地位的世界里，就的确如此！只要在每个民族都習染了法国民族性的世界里，就的确如此！然而，其他民族的民主主义者应当反对的正是这一点。他們决心抛弃本民族的粗鹵的一面，同时希望法国人也能这样做。他們非常不滿意法国人的武断：既然是法国人，就自然是世界主义

者。这样的武断等于要求所有别的人都成为法国人。

我們拿德国来做比較吧。德国是印刷机等許多發明的誕生地。德国产生的卓越思想和世界主义思想比法国和英国的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这是大家公認的。而在实际上,德国却总是受到侮辱,总是陷于失望。德国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能說明,法国的世界主义究竟是什么。法国可以埋怨英国政策的背信弃义,可是德国也同样領略过法国从路易十一到路易-菲力浦的背信弃义的政策。如果我們采用了勃朗先生的标准,那末德国人就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然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根本就沒有这样的奢望。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2月

載于1847年12月30日“德意志—
布魯塞尔报”第10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德意志—
布魯塞尔报”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宪章派的鼓动

議會開幕以後，憲章派就進行了大規模的鼓動。他們準備請願書，召開群眾大會，派專人到全國各地。除了有大批人簽名的要求實現人民憲章的全民請願書（這次可望征集到 400 萬人簽名）之外，另有兩個關於憲章派的土地共用社的請願書剛剛才提交人民裁奪。其中第一個請願書由奧康璠爾草擬並發表於本周“北極星報”，內容大致如下：

“致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可敬的議會代表。

諸位先生！

我們這些簽名的人是憲章派土地共用社社員，按地位是工人；我們考慮到，用我們勞動果實來進行無止境的投機、無限的競爭和機械生產資料的不斷增加，已使我們的勞動到處都喪失了銷售市場；

隨着機械生產資料的增加，手工勞動減少了，工人失去了工作；

由於你們最近通過關於暫時停止鐵路工作的決議，成千上萬的工人將失去工作，充斥勞動市場，廠主則可借此而再次降低早已多次降低了的工資；

但是，我們只求有可能靠自己的勞動果實來生活；

我們反對任何種類的濟貧捐，認為這是侮辱，這種措施只是使資本家掌握一批後備軍，他們隨時都可以把這批後備軍拋入勞動市場，利用工人相互間的競爭來降低工資；

要是工廠工業已不能給它所產生的廣大無產者以工作，農業生產卻還有供我們運用勞動的廣闊場所，因為在適當耗費勞動的情況下，我國土壤的肥

沃程度至少能增加四倍，那是已經証明了的；

因此，我們建立了能获得一定土地的共用社，以便我們每一家都能在这些土地上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既不增加教区或私人慈善事业的負担，也不必去参加竞争从而降低其他工人的工资；

鑒于以上各点，我們在这一請願書中吁請你們諸位先生，頒布一条免除**土地共用社**印花稅以及砖瓦、建筑木材和其他材料稅的法律，并批准即将提出的有关法案。”

这一法案也是奥康瑙尔起草的，最近即将由他提交議會討論。

第二个請願書要求把屬於教区的荒地还给人民。三十年来大块大块地卖给大所有者的这些土地，应根据請願書提出的要求分成小块出租或以优惠条件卖给当地工人。这个請願書是在倫敦的一个群众大会上通过的，因为奥康瑙尔忙于議會事务沒有出席，在大会上为請願書做解释的是“北極星报”的編輯哈尼先生和琼斯先生。不久以前这請願書又在諾里奇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被通过了。在这次大会上，英国最优秀的演說家之一，琼斯先生再次起来为請願書作了解释，發表了一篇无可辯駁的出色的演說。

最后，全民請願書不久前便在倫敦的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上通过了。这次会上發言的主要是基恩先生、沙佩尔先生(德国人)和哈尼先生。后者的演說以其民主派的气魄而显得特別突出。

他說：“我們整个社会政治制度无非是为无耻的寄生者和騙子手的利益服务的一大堆虛伪和欺騙。

“請看看教会吧。一方面大主教和主教領高额的薪水，另一方面牧师(教会的劳动者)一年才只有几英鎊。千百万英鎊是以什一稅的形式从人民那里勒索来的；这种什一稅过去主要是用来維持教堂和救济貧民的；現在作为这方面开支的已有特別稅，而教会却把全部什一稅都装到自己的衣袋里去了。我請問你們，教会不就是有組織的欺騙么？(鼓掌)

“請看看我們的下院吧。那里所代表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貴族和資產

阶级；它把我国 $\frac{6}{7}$ 的成年男子从政治上沦为奴隶，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这种下院不就是合法的欺骗么？（掌声大作）

“请看看这些可敬的勋爵吧。他们对全国人民的绝望的呼声置之不理，却在每晚的例会上冷静地等待下院送特别法草案给他们。谁能告诉我，这种养老院对不可救药的人有什么好处，谁敢起来为这种传统的欺骗辩护，你们中找到这样的人么？（掌声）

“自然，为了尊重君主制，即尊重我们祖先的英明的光辉的象征，我只能用最忠顺的话来评论维多利亚女王那样有趣的女人，她每年按时生产一篇女王演说和一个至尊的婴儿。（笑声）女王演说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至于那个婴儿，如果可以相信报纸的话，到明年三月我们也就有了。陛下广施仁政，体察民情，赞扬人民耐心，俯允再生一子。咳！她在这一点上从来也不食言！（笑声大作）其次，我们还有一位阿尔伯特亲王，他能发明新式女帽，养肥猪，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元帅，就因为这些功劳他每年得到 3 万英镑的报酬。啊，公民们，不是的，君主制决不是欺骗。（笑声，鼓掌。）”

演讲人把官方社会的情景同人民疾苦的情景作了对比，最后他建议与会者通过要求实现宪章的全民请愿书。请愿书获得一致通过。等请愿书传到全国各地以后，邓科布先生就会把它递交下院。一俟原文到手，就把译文寄给你们。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12 月底
 载于 1847 年 12 月 30 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滿意的”多数派議員。基佐的
“改革”方案。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
古怪見解。民主派在沙隆举行的宴会。
賴德律-洛兰先生的演說。民主派
大会。弗洛孔先生的演說。
“改革报”和“国民报”

法国的两院會議已經開幕了，很快我們將有幸知道爭取改革的运动对那 225 位“滿意的”多数派議員發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們將知道他們对基佐在瑞士問題上使法国成为全欧洲笑柄的这种做法是否也同样滿意。然而这些肥头碩脑、賄賂往来、投机倒把、招搖撞騙、吸入膏血、胆小怕事的多数派議員恰恰是一些連这种事情也能忍在肚里的人；当帕麦斯顿为雪西班牙联姻問題之耻而玩弄自己可尊敬的同僚基佐²⁰³时，他們却表示“称意”，竟能宣称法国从来没有象目前这样伟大、这样光荣、这样可敬、这样“滿意”。

恰好目前所有的巴黎報紙，从“辯論日报”起以至“改革报”，都在情况允許的条件下尽可能公开地議論着一旦路易-菲力浦死去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辯論日报”担心多数派議員中間發生分裂，所以它每天都向他們發出警告說，这件不可避免的事無論在什么

时候發生，都会成为所有政党大会师的信号；“共和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等等都会从地洞里冒出来，到处散布灾难、恐怖和毁灭；除非秩序之友（自然是基佐先生那一伙人）严厉地压制这些思潮，否则法兰西必趋灭亡，自由、安全、财产都将毁灭；这个危险的时刻随便在哪一天都可能到来；如果不帮助基佐先生保住他的位置，那就一切都完了。而其他的报纸——“新闻报”、“立宪主义者报”、“世纪报”——则抱着完全不同的见解，它们说将来發生的情况恰恰相反，如果到国王死去的时候，这个卑鄙下流的貪官基佐还没有为这三家报纸各自的政治人物所代替，即为德·日拉丹先生、梯也尔先生或奥·巴罗先生所代替，流血革命的恐怖将会籠罩全国。激进派报纸，如我們即将看到的，是从另外一种观点来談这个问题的。

可見，就連“辯論日报”也間接地承認了“滿意的”法国只是在等待着适当的时机来証明自己的不滿，其方式将会象惊恐万状的“辯論日报”的資產階級本能在吓昏头脑的情况下所胡思乱想的那样。然而这对那 225 位“滿意的”議員說来却是无关紧要的。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邏輯。如果人民滿意，那自然沒有理由改变現存制度。而如果人民不滿意，那正說明有必要更加巩固这个制度，因为只要稍一退讓，就会使充滿恐怖的革命突然爆發。不管怎样，这些資產者总会做出一个結論，即他們是国家的最好的統治者。

可是基佐还是打算实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改革。他想把“飽学之士”，也就是一切持有大学學位證書的人——律師、医生以及諸如此类的騙子都列为选民。真正是了不起的改革！然而，这却足以解除“进步保守派”（或者叫做“保守反对派”，这是他們自己今天所用的名称，因為他們沒有事情可做，于是就每三个月把名称改变

一下)的武装。这个方案同时还能够打击梯也尔先生。梯也尔先生一面派遣自己的亲信杜韦尔瑞·德·奥兰先生去参加改革派的宴会,一面偷偷地准备自己的改革方案,他指望借此在两院中一鸣惊人,而他这个改革方案却和他的对手基佐现在所要提出的一模一样。

看来在两院中总要有一番哭喊吵闹;但是我并不认为基佐先生真的会担心他的忠实的 225 位議員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

官场的情况就是如此。此外,改革派的宴会以及“国民报”和“改革报”之间的争论仍在继续进行。反对派联盟,即左翼中心(梯也尔先生那一派人)、左派(奥迪隆·巴罗先生那一派人)和“明智的激进派”(“国民报”),在加斯特尔、蒙彼利埃、纽堡和其他一些地方举行了宴会;极端民主派(“改革报”)则在沙隆举行了宴会。蒙彼利埃和纽堡的宴会上主要演说者是加尔涅-帕热斯先生,几年前故去的一个著名民主主义者[⊖]的兄弟。可是小加尔涅-帕热斯先生根本不象他的哥哥;他丝毫没有象那位已故的法国民主派领袖所借以获得如此显要地位的那种毅力、那种勇气和坚定的原则性。在纽堡,小加尔涅-帕热斯先生发表了一连串武断的言论,这些言论说明他对于社会的实际状况根本一无所知,因而对于改善社会状况的方法也全然不懂。尽管全部现代民主主义都是以下面这一最重要的事实为出发点的:现代社会已无可挽回地分裂为两个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 and 全部产品的资产阶级和除去唯一的生活手段即劳动而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后一个阶级受到前一个阶级的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尽管世界各国现今的民主派的

⊖ 埃蒂耶纳·约瑟夫·路易·加尔涅-帕热斯。——编者注

众所公認的意圖是要使政权从資產階級手里轉到无产階級手里，因为后者在人民之中是占压倒多数的——尽管如此，加尔涅-帕热斯先生却不顧这一切事实，竟妄自断言，在现实中人們根本没有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分；他說这不过是基佐先生为了在人民中間制造分裂而恶意捏造出来的东西；他說他和基佐先生相反，認為所有法国人都是平等的，他們全都过着同样的生活，对他來說，在法国只存在着**法兰西公民**！那末，照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說法，資產階級垄断全部生产工具，听憑无产者受工資經濟規律的摆布，工資規律把工人所得减少到最少的一点点食物，这也是基佐先生捏造出来的了！現在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里都进行着劳动和資本之間的殊死斗争，这种斗争表现为同盟、工联、暗杀、暴动和流血起义等不同的阶段，在里昂、普累斯顿、兰根比劳、布拉格被槍杀的无产者²⁰⁴就証明了这种斗争的实际情况；而这种斗争，照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說法，並沒有充分的依据，只不过是一位法国教授的謊言罢了！这就是說，“讓資本家繼續垄断全部生产力，讓工人照旧靠極少的几个錢去过活；但是为了补偿他所受的苦难，我們贈之以公民的称号”。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話除了这样一种解释之外，还能有什么別的解释呢？不錯，在某些情况下，而且附上某些保留条件，加尔涅-帕热斯先生或許也会同意給人民以选举权；但只是不要讓他們妄想利用这个礼物采取一些根本改变現行的物質財富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措施，即迟早会把全国的生产力交付到全体人民手里并把所有的“雇主”都一律打倒的措施！“改革报”把这位可尊敬的先生叫做**資產階級激进派分子**是完全正确的。

極端的民主派，我前面已經講过，只举行了一次宴会，但是声

勢浩大，这一个宴会抵得过联合党派的十几个宴会。在索恩河畔的沙隆出席宴会的有两千多个公民。“国民报”派也被邀请，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出席。因此“改革报”的代表们就成了这一场合的全权主人。被“国民报”指为极端民主党的领袖的赖德律-洛兰先生，在这里就担当起这个角色。他把1789年以来法国民主发展的各个阶段做了一个出色的简要介绍，来说明自己的态度以及自己的党的态度。然后，他反驳了“国民报”对他的攻击，他自己又反过来抨击这家报纸并建议成立一个由全法国各个地方的民主主义者组成的仲裁委员会（两派各出同等数目的代表）来解决“改革报”和“国民报”之间的争吵。他说：

“法国民主派在解决了这一内部问题以后，如能和其他国家的民主派建立关系，那将是一件不坏的事。目前在欧洲，在一切备受压迫、受苦挨饿的人们中间，正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现在是安慰他们，给他们撑腰打气，和他们建立联系的时候了。让我们来召开一次世界各国民主派大会，而且就是在现在，在君主们的大会已经垮台的时候召开！在欧洲有一个共和国，它是刚刚在自己土地上取得了民主胜利的，这个国家就是瑞士，它是一个有资格在自己的自由土地上接待世界各国的民主派的国家！现在，公民们，请允许我最后在我的‘为法国革命团结干杯’的祝词之外再加一句祝词：‘为全世界民主派团结干杯’”。

这篇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而且确是受之无愧的。我们衷心地为赖德律-洛兰先生的演说艺术在沙隆所获得的成功而高兴，但同时我们必须对演说中的一句失慎的话（我们深信他不是对任何人怀有恶意的）提出异议。赖德律-洛兰先生说，对法国民主派说来，是安慰其他国家受苦工人和给他们撑腰打气的时候了。我们相信，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派需要人安慰，不管是谁所给予的安慰。各个国家的民主派赞美法国民主派的革命自豪感，但是他们

也有权保有同样的自豪感和独立性。400万英国宪章派无疑是强大的，他們完全能够依靠本身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任务。法国民主派热情地抓住了召开民主派大会和建立世界各国民主派联盟的这一思想，对这一点我們固然非常高兴，可是我們所期望的首先是完全的互助和平等的关系。任何联盟，如果它不以这种平等关系作为自己的基础，那它本身就是反民主的。不过我們深知“改革报”的同人对民主的珍爱，所以我們相信，毫无問題，他們会完全同意我們的看法。我們只希望他們为了我們的共同事业，把那些陈詞濫調丢掉，这些东西是“国民报”还是法国民主派唯一代表者的时期的遺迹，根本不表达他們的真实情感。

在同一个宴会上，弗洛孔先生講了話，他贊成“为人权和公民权干杯”。他把国民公会所頒布的权利宣言²⁰⁵讀了一遍，他說权利宣言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真正民主原則的精确表述。他把現今的金錢关系統治制度拿来和这些他所謂的真正法国式的原則相对照；在現今的制度下人被貶低到比牛馬还低的地位，因为在这个制度下存在着过剩的人口，而当人的劳动不为人所需要的时候，他所消耗的要比他本身所能提供的多。他把这个制度叫做英国的制度，因为它最初产生于英国。他說：

“看啊，在革命的故乡采用英国的制度，而英国人自己則竭力要从自己脖子上除下这个制度的枷鎖，他們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了响亮的口号：‘自由、平等、友爱！’这样，最先把真理公諸于世的这个国家就要重蹈历史复轍，再次陷入黑暗和无知的状态从而不久将只好从邻国汲取它本身所未能保持下来的革命传统。难道我們會落到那样的地步嗎？不会的，永远不会，只要有象你們一样的民主派、有象今天这样的集会，就不会落到那种地步！不，我們决不支持連英国人都不願再支持的英国制度这座腐朽了的建筑物！（喊声：“决不！决不！”）既然这样，那末就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去吧，以色列人！你們每一个人

都應該站在自己的旗幟下！每一個人都為自己的信仰而奮鬥！這邊，在我們的陣營里，是民主派和需要他們去解放，被他們以公民、弟兄相稱，平等相待並看做自由人的2500萬無產者；那邊是烏七八糟的對派以及它的壟斷組織和資本貴族！他們宣傳把選舉資格降低一半；我們則提出人權和公民權！（暴風雨般的長時間的鼓掌，以全場合唱《Chant du départ》²⁰⁶而告終。）”

很遺憾，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們不能把這次出色的真正民主派的宴會上的其餘演說一一引述。

“改革報”終於迫使“國民報”和它來進行論戰。“改革報”雖然宣稱它贊同加爾涅-帕熱斯先生在蒙彼利埃宴會上就法國革命所發表的演說中的那些原則，但是並不承認象加爾涅-帕熱斯先生這種曾把民主派的利益出賣給奧迪隆·巴羅先生和資產階級對派的人有資格充當革命原則的代表者。這終於使得“國民報”刊登了一篇文章作答，同時對賴德律-洛蘭先生也進行了攻擊。“國民報”受到的譴責主要有如下幾點：第一，這家報紙贊成在巴黎周圍建立堡壘，從而把革命的遺產置於1200門大炮的監視之下。第二，去年它對卡諾先生的那本小冊子未置一詞；卡諾先生在那本小冊子里曾向民主派建議：參加左翼中心和左派，儘快地使它們的代表人物取得政府職位，暫時放棄共和主義的原則而為了在憲章²⁰⁷所允許的範圍內爭取擴大選舉權展開宣傳。大約在同時，小加爾涅-帕熱斯先生提出了類似的原則，所以那本小冊子上說它所反映的不是個人的意見而是眾議院中一個黨派的意見。“改革報”既批評了加爾涅-帕熱斯先生的演說又批評了卡諾先生（著名的國民公會代表兼共和國軍事部長[⊖]之子）的小冊子，竭力地引逗“國民報”講話。但是“國民報”仍舊保持沉默。“改革報”說得對，兩位

⊖ 拉查爾·尼古拉·卡諾。——編者注

議員提出这一政策，就是为了把民主派完全置于梯也尔先生和巴罗先生的控制之下，然后把这个作为独立政党的民主派根本消灭掉。第三，在支持改革的宴会运动进行的期間，“国民报”派实际上奉行的是卡諾先生所提出的政策。第四，“国民报”对共产主义者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誣蔑，但是却提出任何现实而有效的办法来改善工人階級的困苦状况。

爭論进行了不下一个星期。最后，“国民报”派终于放弃了他們所进行的太不成体統的斗争。他們徹底失敗了，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失敗，他們终于接受了賴德律先生提出的組織民主派仲裁委員會的建議。

对于“改革报”在这件事情上所起的作用，我們只有表示完全贊同。“改革报”保住了法国民主派作为一个独立的党派所具有的荣誉、独立性和力量。它捍衛了处于“国民报”奉行的那种政策威胁之下的革命原則。它奋起捍衛工人階級的权利，使其不受資產階級的侵犯。它撕破了这些資產階級激进派的假面具，这些人企圖使人民相信階級压迫是不存在的；他們不願意承認现代社会中残酷的内战，即階級对階級的战争；工人从他們那里所能得到的只是一些空話而已。“改革报”一直没有停止斗争，最后终于迫使驕傲的敌手打破沉寂，迫使它动摇，使它不得不背弃自己講过的話，做出解释，乃至终于不得不退却。我們認為“改革报”对民主事业做了很好的貢獻。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1月初

載于1848年1月8日“北極星报”

第533号并在标题下附有編者注：

“本报巴黎通訊員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北極星报”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爱尔兰特别法和宪章派²⁰⁸

爱尔兰特别法于上星期三生效了。爱尔兰总督便毫不迟疑地行使这一新法律赋与他的专制权力；里美黎克郡和梯培雷里郡都已普遍地实行了非常法，这一法律在克勒尔郡、瓦特福德郡、科克郡、罗斯考門郡、利特里姆郡、卡万郡、郎弗德郡和**国王郡**²⁰⁹中的許多地区也同样有效。

但是这一卑鄙措施将引起什么結果还不得而知。关于这一点我們已經听到了爱尔兰土地占有者，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这一措施的那个阶级的意見。他們在自己机关刊物上大声疾呼：結果将等于零。为此竟实行了全国戒严！ $\frac{9}{10}$ 的爱尔兰的議會代表竟为此都背弃了自己的祖国！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变节带有普遍的性質。甚至奥康奈尔一家在討論法案时也發生了分裂：約翰和莫里斯，已故的“解放者”[⊖]的兒子是忠于他們的祖国的，可是他們的弟兄摩尔根·奥康奈尔却不仅投票贊成法案，而且在辯論时还屡次起而为它辯护。投票贊成无条件地否决法案的代表不过18人；投票贊成倫敦郊区一位宪章派代表韦克利先生的修正案的也只有20人。韦克利要

⊖ 即丹尼尔·奥康奈尔。——編者注

求在实施特别法的同时也能采取特别措施来减少所要杜絕的那种犯罪的原因。就是在这 18 个和 20 个投票者中間，四五个代表是英国激进主义者，两个是被英格兰地区的代表們选举出来的爱尔兰人；因此，在由爱尔兰派到議會去的 100 个代表中，坚决抵制这一法案的，勉强才有 12 个人！

从奥康奈尔去世以来，关于爱尔兰問題这是第一次重要的爭論。这次爭論一定会弄清楚，誰配做一个伟大鼓动家来領導爱尔兰。在議會開幕以前，約翰·奥康奈尔先生在爱尔兰已被默認為他父亲的繼承者。但是在这些辯論开始以后不久，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他是不能成为党派的領導者的；另一方面，約翰·奥康奈尔所遇到的又是菲格斯·奥康瑙尔这样一个厉害的敌手。后者是民主派的領袖，关于他丹尼尔·奥康奈尔曾經这样說过：“我們情願把菲格斯·奥康瑙尔贈送給英国宪章派”。正是这个人馬上就成为爱尔兰派的領袖。是他提議无条件地否决特别法草案；是他把所有反对派团結在自己的周围，并使他們起来反对法案的每一条款，尽可能地拖延投票；是他在自己的演說中概括了反对派反对这一法案的全部理由；最后，是他首次在 1835 年以后重新提出取消合并²¹⁰的提案，而这一点是任何一个爱尔兰議員都做不到的。

爱尔兰的代表們很不願意承認奥康瑙尔是自己的首領。他們的思想深处是純粹的輝格党人，他們对奥康瑙尔的那种民主派的气魄是深为恼恨的。奥康瑙尔不讓他們再利用取消合并这种宣传来为輝格党的利益而推翻托利党，然后，当輝格党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就把“取消”两字忘得一干二淨。但是主张取消合并的爱尔兰代表沒有象奥康瑙尔这样的領袖是怎么也不行的；虽然在爱尔兰他們总是企圖破坏他新的声望，但在議會里却不得不服从他的

领导。

当议会常会一闭幕，奥康瑙尔就可能去爱尔兰，以便加紧宣传取消合并和建立爱尔兰宪章派政党。毫无疑问，要是奥康瑙尔实现了这一计划，不出半年他就会成为爱尔兰人民的领袖。这样，当他一手掌握三个王国的民主派的领导权的时候，他就会获得包括奥康奈尔在内的所有鼓动家都未曾有过的地位。

读者们自己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两个岛国民族不久结成联盟，那是多么重要。不列颠民主派如能吸收 200 万勇敢而热情的爱尔兰人加入自己的队伍，就一定会更快地前进，而不幸的爱尔兰最后也必然会向自己的解放迈进一大步。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 月 4 日

载于 1848 年 1 月 8 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改革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菲格斯·奥康瑙尔和爱尔兰人民

1848年“北極星报”第1号登載了英国宪章派著名的領袖和他們的議会代表菲格斯·奥康瑙尔的一篇告爱尔兰人民書。这一文件是值得每个民主主义者通讀一遍并好好地領会的，不过由于篇幅所限，我們不可能把它刊載出来。

可是，我們沒有权利避而不談。对爱尔兰人民的这个强有力的号召很快就会显示出非常实际、鮮明和可以感觉到的后果。菲格斯·奥康瑙尔本身是爱尔兰人、新教徒，十余年来一直是英国伟大的工人运动的領袖和支柱，今后同样應該被認為是爱尔兰合并取消派和改革派的真正首脑。人們可以这样称呼他首先就是由于他在下院反对新近通过的卑鄙的“爱尔兰特別法”。此后，他还为爱尔兰的利益而繼續进行鼓动，这証明菲格斯·奥康瑙尔正是爱尔兰所需要的人。

对他來說，千百万爱尔兰人的幸福是真正切身的事情，对他來說，Repeal（取消合并，換句話說，要求爱尔兰議会独立）决不是一句空話，也不是为自己和朋友們取得有利地位并謀取私利的幌子。

他在告人民書中向爱尔兰人民証明，丹尼尔·奥康奈尔这个政治騙子十三年来怎样欺騙爱尔兰人并用“取消合并”这样的字眼蒙蔽他們。

他把約翰·奧康奈爾的行為揭露無遺。約翰·奧康奈爾是他父親的政治繼承人，並且象他父親一樣，使千百萬輕信的愛爾蘭人為他的投機事業和他的個人利益而犧牲；約翰·奧康奈爾在都柏林的“調停大廳”²¹¹的全部演說、全部口是心非的保證和花言巧語都不能洗雪他從前，特別是目前在下院討論“愛爾蘭特別法”時造成的恥辱。

愛爾蘭人民終究應該覺醒，而且必然會覺醒，到那時他們就一定會把這伙自命為合併取消派的人，這伙撫摸著裝得滿滿的錢袋而私下竊笑的人統統一脚踢開；到那時狂熱的天主教徒和政治扒手約翰·奧康奈爾就必然會遭到最沉重的打擊。

要是告人民書的內容僅限於此，那末我們倒不必予以特別重視。

可是它的意義遠遠不止於此，因為在這裡菲格斯·奧康諾爾不僅是作為一個愛爾蘭人，而且還——甚至主要是——作為一個英國民主主義者、作為一個憲章主義者發表意見的。

他用最樸實的人也能理解的明白的語言向愛爾蘭人民證明必須竭盡全力同英國工人階級，同憲章派緊密團結起來為實現“人民憲章”的六點（每年改選議會、實行普選權、進行無記名投票、取消任何財產資格限制、人民代表支薪和按居民人數劃分選舉區）而鬥爭。只有這六點獲得之後，實現“取消合併”才能給愛爾蘭帶來實際利益。

接著，奧康諾爾指出：正是英國工人早就征集了350萬人簽名²¹²上書請願，要求以公正的態度對待愛爾蘭，而現在仍然是英國憲章派在無數請願書上提出抗議，反對“愛爾蘭特別法”，最後，英國和愛爾蘭的被壓迫階級或者將來一起鬥爭，一起獲得勝利，或

者今后就一起遭受同样的压迫和贫困、同样依赖于资本家特权统治阶级。

毫无疑问，今后爱尔兰人民群众将会愈来愈紧密地同英国宪章派团结一致并按照共同计划行动。这样，英国民主主义者的胜利以及爱尔兰的解放就一定会提早很多年。奥康瑙尔告爱尔兰人民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1月初
载于1848年1月9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55年
“历史问题”杂志第11期

卡·馬克思

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

1848年1月9日發表于布魯塞爾
民主協會的公眾大會上²¹³

先生們！

英國穀物法的廢除是19世紀自由貿易所取得的最偉大的勝利。凡是廠主們談到自由貿易的地方，主要都是指自由買賣穀物和一切原料而言。“對國外穀物的進口實行保護關稅，這是卑劣的行為，這是利用人民的飢餓進行投機。”

廉價的糧食，高額的工資（Cheap food, high wages），這就是英國的自由貿易派不惜耗費巨萬力求達到的唯一目的，他們以自己的熱情感染了他們在大陸上的同伙。總的說來，人們要求自由貿易，那只是為了改善勞動階級的處境而已。

可是，奇怪得很！想盡辦法讓人民得到廉價的糧食，而人民却毫不領情。現在英國的廉價糧食，如同法國的廉價政府一樣，都信譽掃地。人民把那些充滿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們，把包林，布萊特一類人及其同伙當做自己最大的敵人和最無恥的偽君子。

誰都知道：在英國，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間的鬥爭被稱為自由貿易派和憲章派之間的鬥爭。

現在我們來看看英國的自由貿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證明促使他

們起来行动的那种高尚意圖的。

他們向工厂工人这样說：

谷物稅是你們向大地主，向这些中世紀的貴族代表交納的工資稅；你們貧困的原因是在于日用必需品价格的昂貴。

工人反过来問厂主們：在最近三十年中，我們的工业發展到最高的水平，而我們的工資的下降率大大超过了粮价的上涨率，这种情况又怎么解释呢？

照你們所說的，我們交納給地主的稅，对每一个工人來說，每周約計 3 辨士；可是，在 1815 年到 1843 年这一时期內，手工織工的工資从每周 28 先令降到 5 先令，而在 1823 年到 1843 年这一时期內，机器織工的工資从每周 20 先令降到 8 先令。

在这整个时期內，我們交納給地主們的稅从未超过 3 辨士。而在 1834 年，粮食价廉，在市面上出現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的时候，你們对我们說过什么話呢？——“你們是不幸的，因为你們生育的孩子太多了，原来你們的婚姻比你們的手艺还要多产”。

这就是当时你們向我们所說的千真万确的話，同时你們还制訂了新的济貧法，設立了習艺所这种无产者的巴士底獄。

厂主对此回答說：

工人先生們，你們說的对，規定工資水平的不仅是粮食的价格，而且还有工人为寻找职业而發生的竞争。

但注意一下这个情况吧：我們的土地都是由岩石和砂砾构成的。也許你們还想在花盆里种植谷物呢！要是我們不把自己的資本和劳动用来耕种不毛之地，撇掉农业，专门来搞工业，那末，整个欧洲就得把工厂都关掉，那时英国也就成了一个大的工厂城市，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就都变成英国的农业区了。

可是厂主和工人們的談話被一个小商人打断了。他也要求答复这样一个問題：

“如果我們废除了谷物法，那末，即使我們荒废了本国的农业，我們也不会因此而迫使其他国家关闭它們的工厂，来向我們的工厂定貨。

結果将怎样呢？我将失去現在农村的主顧，而国内貿易也会丧失市場。

厂主抛开工人轉过身来回答小鋪主說：那末，就讓我們随便怎么做好了。一旦废除了谷物稅，我們就会从国外得到更廉价的粮食。那时，我們就会降低工資，同时在那些供給我們谷物的国家里，工資却会因此而提高。

因此，除了目前我們已有的那些优越条件之外，又加上更低廉的工資，有了这一切优势，我們就能使大陆購買我們的商品。

可是，現在农場主和农业工人也插进来爭論了。

他們叫道：可是我們到底又将如何呢？

难道我們應該把养育我們的农业宣判死刑嗎？难道我們能够任人拆我們的台，而一言不發嗎？

反谷物法同盟却不作回答，而一味滿足于給三部論述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农业的好处的优秀著作頒發奖金。

获得这种奖金的是霍普、摩尔斯和格萊格三位先生，他們的著作成千上万册地散布在农业区域。

其中第一位获奖者企圖証明，自由輸入外国谷物既不会使农場主吃亏，也不会使农业工人吃亏，吃亏的只是地主。他大声疾呼地說，英国农場主不應該害怕谷物法的废除，因为沒有一个国家能象英国那样生产如此价廉物美的粮食。

因此，他断言說，即使粮价下跌，这也不会使你們遭致任何損失，因为粮价下跌只能引起地租的縮減，但絕對不会伤及企业主利潤和工資，它們依然会保持在过去的水平上。

第二位获奖者是摩尔斯先生。他相反地断定，废除谷物法的結果必然是粮价上涨。他挖空心思力圖証明，保护关税从来都沒有能使粮食保有足够有利的价格。

他引用事实来証实自己的論点說，在英国，每当輸入外国粮食的时候，粮价总要大大上涨，而当进口减少的时候，粮价便急剧下跌。他忘却了不是粮食进口引起粮价上涨，而是粮价上涨才刺激了粮食进口。

他的見解同他的获奖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断言說，每次粮价上涨总是有利于农場主和工人，而不利于地主。

第三位获奖者是大厂主格萊格先生，他的著作是为大农場主写的，他不能滿足于重复类似的濫調，他的話是比較科学的。

他承認谷物法之所以促进地租的上涨，只是因为谷物法引起了粮食价格的上涨，而谷物法所引起的这种上涨，正是由于谷物法迫使資本投于劣等地，这是很容易說明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如果没有国外谷物的輸入，就不得不去开垦次等地，耕种这种土地需要較大的耗費，因而它的产品也就較貴。

既然谷物的銷路有充分保証，那末谷物的价格必然要受耗費最大的地区的产品价格的調节。这一价格和优等地的生产費用間的差額便构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废除谷物法而降低了粮食价格，从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話，那末，这种情况的發生是因为不再在次等地上耕作的緣故。由此可見，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农場主的破产。

为了理解格萊格先生的話，作这几点說明是必要的。

他断定說，那些不能再繼續經營农业的小农場主，可以去工业中謀生。至于那些大农場主，則仍然会占得优势。土地所有者却只好或者把自己的土地以極低廉的价格卖給他們，或者和他們訂立期限極長的租約。这就有可能使这些农場主把巨額資本投向土地，更大規模地采用机器，从而也就节省了手工劳动，但手工劳动也将由于工資的普遍下降（这是废除谷物法的直接結果）而更加低廉。

包林博士对所有这些論証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認。他在一个公开的大会上大嚷：“耶穌基督是自由貿易，自由貿易是耶穌基督！”

显然，这种假仁假义是根本不能減輕粮食跌价給工人带来的痛苦的。

其次，对于厂主那种单憑一时心血来潮而發的慈悲，工人又怎么能够相信呢？要知道对于将工厂工人的工作日从 12 小时减到 10 小时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²¹⁴ 反对最力的，正是这些厂主們！

为使你們对厂主的慈悲得到一个概念，先生們，我提醒你們注意一下所有工厂都采用的厂規。

任何厂主为他个人的日常生活所需，都有一套規程，其中規定对一切有意无意的过失都处以罰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了一下，偶而私語或談笑，迟到了几分鐘，損坏了机器的某一部件，或者制品的質量不合規格等等，他就得挨罰。事实上罰款往往超过工人实际所造成的損失。为了設法使工人容易挨罰，工厂的鐘点拨快了，發給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制出好的成品。工头要是沒有足够的花招来增加类似的犯規数字，便被辞退。

先生們，你們看，这种私人立法的建立是为了制造过失，而过

失却成为生財之道。因此，厂主不择手段，竭力减低名义工資，甚至还要从这些并非由于工人的过失而造成的事故中得到好处。

这些厂主就正是那些力圖使工人相信他們只要为了改善工人的处境，他們是能够不惜任何破費的慈善家。

这样一来，厂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厂規处心积虑地克扣工人的工資，另一方面又冒着最大的牺牲借反谷物法同盟来提高工資。

他們不惜巨大的开銷来建筑宮殿，反谷物法同盟在宮殿里也大体上設立了自己的官邸，他們派遣整批传道大軍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貿易的宗教。他們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贈送，讓工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他們不惜破費拉攏报刊。为了領導自由貿易运动，他們組織龐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辯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

“要是地主出卖我們的骸骨，那末，你們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

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厂主之間斗争的意义的。他們很了解，厂主希望降低粮食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資，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資本的利潤也就上升多少。

英国自由貿易派的传道者，本世紀最杰出的經濟学家李嘉圖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是和工人們的意見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学名著中說：

“要是我們不在自己本土耕作而找寻新的市場以便获得更廉价的粮食的話，那末，工資就要降低，利潤就会增加。农产品的跌价不仅降低了农业工人的工資，而且也降低了所有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工資。”²¹⁵

先生們，不要以为工人在粮价較賤时仅仅收入 4 法郎还是象过去一样收入 5 法郎这件事是无所謂的。

难道說，工人的工資和利潤比較起来不是愈来愈低嗎？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来是每况愈下，难道这还不清楚嗎？不但如此，工人实际上还遭受直接的損失。

当粮价和工資都同样处于較高的水平时，工人能节省少許粮食就足以滿足其他的需要。但是一旦粮价大大下跌，因而工資也大大下降的时候，工人便几乎根本不能節約粮食来購買其他的东西了。

英国工人已經向自由貿易派表明，他們是不願做自由貿易派那种幻想和欺騙的牺牲品的；他們所以联合自由貿易派来跟地主斗争，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和孤立敌人罢了。工人并没有估計錯：为了向自由貿易派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一起贊助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們三十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

在經濟学家會議[⊖]上，包林博士从口袋里取出一份长长的統計表，他想論証，为了滿足（照他的說法）工人的需要，英国輸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鷄雛等等。可是遺憾的是，他却忘記了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危机的来临，曼徹斯特和其他一些工业城市的工人却被抛到街头。

在政治經濟学中，任何时候都絕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統計材料就得出一般規律。常常需要引証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說，需要引証在现代工业經過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

显而易见，当一切商品跌价时（这种跌价是自由貿易的必然結

⊖ 見本卷第 276—281 和 285—296 頁。——編者注

果), 我用一个法郎买的东西要比过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他任何别的法郎一样, 具有同等价值。看来, 自由貿易对工人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里只产生了一个小小的不方便, 也就是說, 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换别的商品以前, 必須先以自己的劳动去交换資本。要是当他进行这种交换的时候, 仍然能以同量的劳动换得上述数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价的話, 那末他在这种交易中始終都会是有利的。困难并不在于証明当一切商品跌价的时候, 用同样的錢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

經濟学家总是在用劳动换成其他商品的时候去观察劳动价格。可是他們对于用劳动换成資本这一环节却完全置之度外。

当开动生产商品的机器需要較少的費用时, 則保养被称为工人的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东西, 同样也得跌价。如果一切商品都低廉了, 那末, 同是商品的这种劳动的价格也同样降低了。而且, 正如我們在下面将看到的, 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的下跌較其他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时候, 仍然繼續相信那些經濟学家的論据的工人将發現自己口袋里的法郎已經融化, 剩下的已不到五苏^①了。

經濟学家們会反对我們这一点說: 好吧, 我們同意說工人之間的竞争(这种竞争在自由貿易的統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 很快会使工資和更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是, 另一方面, 商品价格的下跌会导致需求的增加; 需求的增加就得加紧生产, 而生产又引起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 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结果将是工資的提高。

全部論据可以归結如下: 自由貿易扩大了生产力。如果工业

① 法国旧銅幣名, 等于 $\frac{1}{20}$ 法郎。——譯者注

發展，如果財富、生產力，總而言之，生產資本增加了对勞動的需求，那末，勞動價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資也就提高了。資本的增殖是对工人最有利不過的事。這一點必需同意。要是資本停滯不動，工業却不會停止不動而是會垮台的，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工業垮台的第一个犧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將先于資本家而死亡。假使在資本增殖時，也就象上面所說的，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況下，工人的命運又將如何呢？他還是一樣會死亡的。生產資本的增殖也就意味着資本的積累和積聚。資本集中的結果是分工的擴大和機器的更廣泛的使用。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使工人的手藝化為烏有，從前需要用手藝的地方，現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從而工人之間的競爭也就加劇了。

這種競爭之所以更趨激烈，是因為分工使一個工人可以完成三個人的工作。機器的採用也引起了同樣的結果，而且規模還更大得多。生產資本的增殖促使工業資本家不斷增加生產資料，從而使一些小企業主破產，把他們拋入無產階級隊伍。其次，因為利息率隨着資本的積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過活，只好到企業中去工作，從而擴大無產者的人數。

最後，生產資本愈增殖，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為市場生產，生產愈益超過了消費，供應愈益力圖擴大需求，由於這一切，危機的發生也就愈益頻繁而且愈益猛烈。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機又加速了資本的集中，擴大了無產階級的隊伍。

這樣，隨着生產資本的增殖，工人之間的競爭便在更大的程度上加劇起來。大家的勞動報酬都減少了，而一些人的勞動強度也增加了。

1829年在曼徹斯特36個工廠中有1088個紡紗工人。到1841

年紡紗工人总共才只有 448 人，可是他們所照管的紗錠却比 1829 年的 1 088 个工人所照管的还要多 53 353 个。假定采用手工劳动的数量随着生产力的發展而相应增长的話，則工人的数量应达 1 848 人；也就是說，技术設備的改进使 1 100 个工人失了业。

經濟学家們的答复，我們是可想而知的。他們一定会說，失业的人会找到别的职业。在經濟学家會議上，包林博士沒有忘却引用这个論据，同时也沒有忘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 年包林博士在下院以 5 万倫敦織布工人为題發表了演說，这些工人长期以来徒劳无益地寻求自由貿易派用以安慰他們的新职业而处于飢餓潦倒之中。

讓我們从包林博士的演說中引用一些最堪注意的地方吧。

他說：“手工織工所处的貧困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的必然遭遇，因为这种劳动易于學習，而且随时都可能被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之間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减少，就会引起危机。手工織工好象处于人生的邊緣。再走一步，他們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点輕微的振蕩，就足以致他們于死命。技术設備的进步使手工劳动愈来愈被排挤，因此在过渡时期必然要引起許多暫时的苦难。民族的繁荣只有以某些个人的不幸作代价才能取得。工业的發展总是靠牺牲落后者来完成的；在所有的發明中間，只有用蒸汽發动的織布机对手工織工的命运影响最大。在許多本来是用手制做的制品的生产中，現在手工織工已經完全被排挤了，而在迄今尚用手制做的許多其他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織工的命运也是危在旦夕。”

他接下去說：“我这里有印度总督跟东印度公司的往来信件，其中論及达卡地区的織布工人。总督在他的信件中說：几年以前，东印度公司購入 600 万到 800 万匹当地手机織成的棉布。后来需求逐漸下降，大約縮減到 100 万匹。

“現在，需求几乎降到零了。此外，1800 年北美从印度得到的棉布約为 80 万匹。1830 年印度所輸出的棉布还不到 4 000 匹。而在 1800 年运入葡萄牙的棉布，还有 100 万匹。到 1830 年葡萄牙所得到的不过 2 万匹。

“印度織工的苦難情景給我們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但是這些苦難的原因何在呢？

“在於英國產品在市場上的出現，在於用蒸汽發動的織布機來進行生產。大量的織工死於飢餓，其餘的人多半在農業中找到其他的職業。不能改行的人則活該餓死。現在英國的棉布和棉紗充斥達卡地區。以耐久和美觀見稱於世的達卡細棉布，也由於英國機器的競爭而完全絕迹了。象東印度居民的所有的貧苦階級所受的那種苦難，恐怕在全部貿易史上都很难找到第二個例子。”

包林博士在演說中所引用的事實是真實的，所以他的演說就更其出色。但是他力圖掩蓋這些事實，其措詞和自由貿易的信徒們的其他說教一樣，是偽善的。他把工人描寫成有待以更廉價的生產資料來代替的生產資料。他故弄玄虛，把所說到的這種勞動部門看作完全特殊的勞動部門，而把排斥手工織工的機器看作完全特殊的機器。他忘記了，任何一個手工勞動部門都總有一天要經受手工織布業的命運。

“實際上任何技術設備的改進，其固定不移的目的和意圖就是要完全排除人的勞動，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勞動代替男工的勞動，用非熟練工人的勞動代替熟練手工藝工人的勞動，以求降低勞動的價格。在大多數機器紡紗廠中（英文叫 *throstle-mills*），紡紗的盡是些 16 歲及 16 歲以下的小姑娘。由於用自動紡紗機代替了簡單的騾機，大部分成年工人被解雇，留下的僅是些少年兒童。”

自由貿易的最狂熱的信徒尤爾博士的這些話²¹⁶，是對包林先生自白的很好的補充。包林先生談到一些個別的人所遭到的不幸，同時又告訴我們，這些個別的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所有一切貧苦階級於死命；他談到了“過渡時期”“暫時的苦難”，而且並不諱言，這些具有過渡性質的苦難，對大多數人說來，是從生產到死亡的轉變，而對其他的人說來，是從他們過去的處境到更壞的處境的轉變。

变。如果他进一步說，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业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且是国家的繁荣所必要的，那末，他也就等于承認工人階級的苦难的处境就是資產階級繁荣的必要条件。

包林先生慷慨地所給予奄奄待毙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貿易派所創立的全部补偿理論可归結如下：

成千上万的奄奄待毙的工人們，你們不应灰心失望。你們可以非常安靜地死去。你們的階級是不会絕种的。它将永远保有足够数量的人听任資本去宰割而不致死絕。如果資本不力求取得供其不断地剝削的材料（工人），資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运用呢？

那末，为什么还要把关于实现自由貿易对工人階級状况的影响作为未解决的問題来談呢？从魁奈到李嘉圖的經濟学家們所表述的一切規律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碍自由貿易的羈絆已不再存在。这些規律的作用随着自由貿易的实现而加强。其中第一条規律是說，竞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該商品的最低生产費用。因此，最低工資是劳动的自然价格。什么是最低工資呢？这就是說，要維持工人使他能勉强养活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續自己的子嗣，就需要一些物品，生产这些工人生活必需品时的最低限度的支出恰好就是最低工資。

不要由此得出結論說，工人的所得不可能多于最低工資，也千万不要認为他所得到的总是最低工資。

不是的，在这一規律的作用下，工人階級有时也有較幸运的时候。有时他的所得也会多于这种最低工資，但这种多余部分不过是补充了他在工业停滞时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資的不足部分而已。这就是說，工业接連地經過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諸阶段而形

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在这一定的周期內，如果把工人階級高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計起来，那末它所得的总額不多不少，恰好是这个最低額；換言之，尽管工人階級忍受了一切苦难和貧困，尽管工人階級在工业戰場上抛下了許多尸体，但是工人階級依旧作为一个階級而保持了它的完整性。这会有什么意义呢？这說明工人階級还是繼續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数量还在增长。

但是还不止此。由于工业的發展，出現了更廉价的生活資料。于是，伏特加代替了啤酒，棉織品代替了毛織品和亞麻織品，馬鈴薯代替了面包。

因而，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营养品来維持工人生活的新方法，最低工資也就不斷降低。如果說，起初这种工資迫使人为了活下去而去劳动，那末，到最后就把人变成机器人了。工人的存在的全部价值只不过在于他是一种生产力而已；資本家就是这样来对待工人的。

随着自由貿易(經濟學家們的基本前提)的逐漸實現和成为生活现实，劳动商品的这一規律，即最低工資的規律也就愈益明显地显现出来。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貿易的假定作基础的政治經濟学，或者就同意說在自由貿易的情况下工人一定要經受經濟規律的全部灾难。

讓我們来作个总结：在現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貿易呢？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資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一种商品交換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資本的关系繼續存在，就永远会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存在。那些自由貿易的

信徒認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資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对抗，他們这种自信狂，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階級的对立更形显著。

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海关，不再有城市进口稅，一句話，假使工人迄今認為是使自己处于貧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况都全部消失，那时，一向掩盖着他的真正敌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开了。

他将看到摆脱羈絆的資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關稅束縛的資本对他的奴役。

先生們，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字眼来欺騙自己吧！这是誰的自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別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資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不过是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必然产物时，怎么还能把自由竞争奉为自由的观念呢？

我們已經指出，在同一个国家里，自由貿易在不同的階級之間会产生怎样一种友爱。即使自由貿易在世界各国之間建立起友爱关系，这种友爱关系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剝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資產階級才想得出来。在任何个别国家內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現象，都会在世界市場上以更大的規模再現出来。再沒有必要停留在自由貿易的信徒对这个問題所散布的詭辯上，这些詭辯完全值得我們的三位获奖者霍普、摩尔斯和格萊格先生去論証。

例如，有人对我们說，自由貿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并根据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規定出生产种类。

先生們，你們也許認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

賦吧。

二百年以前，跟貿易毫無關係的自然界在那里連一棵咖啡樹、一株甘蔗也沒有生長出來。

也許不出五十年，那里連一點咖啡、一點砂糖也找不到了，因為東印度正以其更廉價的生產得心應手地跟西印度虛假的自然秉賦作競爭。而這個自然秉賦異常富庶的西印度，對英國人說來，正如有史以來就有手工織布天賦的達卡地區的織工一樣，已是同樣沉重的負擔。

同時不應忽視另一種情況：既然一切都成了壟斷性的，那末即使在今時，也會有些工業部門去支配所有其他部門，並且保證那些主要從事於這些行業的民族來統治世界市場。例如，在國際交換中，棉花在貿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義。自由貿易的信徒從每一個工業部門找出兩三個特殊品種的生產，把它們跟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中一般消費品的最廉價的生產等量齊觀，這真是太可笑了。

怪不得自由貿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國如何犧牲別國而致富；要知道這些先生們更不想懂得，在每一個國家內，一個階級是如何犧牲另一階級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們，不要以為我們所以批判自由貿易是打算維護保護關稅制度。

一個人宣稱自己是立憲制的敵人，並不見得自己就是舊制度的擁護者。

但是，保護關稅制度不過是為了在某個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也就是使這個國家依賴於世界市場，但自從對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以來，對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此外，保護關

稅制度也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發展。因此，我們看到，在資產階級开始以一个階級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資產階級便竭力爭取保护關稅。保护關稅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貿易的手段。

但总的說来，保护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資產階級間的对立达到了頂点。总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

1848年2月初以小册子
發行于布魯塞爾
署名：卡尔·馬克思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1848年版譯的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

共 产 党 宣 言²¹⁷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47年12月—1848年1月
1848年2月第一次以单行本在
倫敦出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1890年德文版
并曾与1848年、1872年
和1883年版本核对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

Gedruckt in der Office der „Bildungs-Gesellschaft für Arbeiter“
von J. C. Burghard.

46, LIVERPOOL STREET, BISHOPSGATE.

“共产党宣言”第一版的扉頁

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怪影。旧欧洲所有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探，都为神聖地驅除这个怪影而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那些当权的敌人咒罵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罵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的敌人呢？

从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結論：

共产主义已經被欧洲一切势力公認為一种势力了。

現在，共产党人已經應該向全世界公开說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并且拿出自己的党的宣言来对抗那关于共产主义怪影的神話了。

为了这个目的，屬於各种不同民族的共产党人就集会于倫敦，拟定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兰德尔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一) 資产者与无产者[⊖]

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 資产阶级是指現代資本家阶级，現代資本家是占有社会生产資料、使用雇佣劳动的。无产阶级是指現代雇佣工人阶级，現代雇佣工人是没有自己的生产資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維持生活的。（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自由民和奴隶，貴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㉞和帮工，簡短些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終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隱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結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們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級，可以看到由各种不同的社会地位构成的整个阶梯。在古代的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和奴隶；在中世紀，有封建領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和农奴，并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特殊的等第。

从灭亡了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現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

但是，現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簡單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陣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㉞ 即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在 1847 年的时候，关于社会的史前状态，即关于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組織，几乎还完全沒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發現了俄国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毛勒証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日耳曼部落的历史發展所由肇源的社会基础，从而逐漸搞清楚，土地公有的村社乃是或者曾經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發現了氏族的本質及其在部落中的地位，才把这个原始共产社会的典型的内部結構弄明白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終於彼此对抗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試圖在《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2. Aufl., Stuttgart, 1886（“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 年，斯圖加特，第二版）一書中加以探討。（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²¹⁸

㉟ 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會員，他是行会内部的工匠，而不是行会的首长。（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和环绕非洲的航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资料 and 一般商品的增加，给予了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未有的刺激，因而也就促进了崩溃着的封建社会内部所产生的革命因素的迅速发展。

以前封建的或者行会的工业组织已经不能再满足随着新市场的扩大而增加的需求了。于是，就有工场手工业取而代之。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层等级排挤掉了；各个同业公会间的分工也就从此消失，由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所代替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工场手工业也不能再满足这种需求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就引起了工业中的革命。现代的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批批产业军的统帅，即现代的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层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引起了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工具的大规模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范围的扩大，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发展，资产阶级也越发展了，它越增加自己的资本，越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等级都排挤到后面去了。

由此可见，现代的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和交换方式多次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这样每发展一步，都伴随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它在封建主统治时期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面是一个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

些地方又組成君主國中納稅的第三等級[⊖]；後來，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它是等級制的君主國里或專制的君主國里與貴族相抗衡的勢力，並且是一切大君主國的主要基礎；最後，從大工業和世界市場確立的時起，它在現代的代議制國家里奪得了獨攬的政治統治權。現代的國家政權只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者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

凡是資產階級已經取得統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純朴的關係統統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那些使人依附於“天然的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即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別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誠、義俠的血性、庸人的溫情，一概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個人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它把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都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來代替了。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冷酷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剝削。

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職業的莊嚴光彩。它使

⊖ 在法國新興的城市，甚至在它們還沒有從封建領主手中爭得地方自治權和“第三等級”各項政治權利以前，就已經稱為“公社”了。一般說來，這裡是把英國看成資產階級經濟發展的典型國家，而把法國看成資產階級政治發展的典型國家的。（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意大利和法國的市民，從他們的封建領主手中贖買或爭得了最初的自治權利以後，把自己的城市團體稱為公社。（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 在經恩格斯校訂過的1888年的英文版中，“獨立的城市共和國”後面加有“（如在意大利和德國）”，在“君主國中納稅的第三等級”後面加有“（如在法國）”。

——編者注

医生、律师、牧师、詩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用的仆役。

資产階級撕破了籠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紗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單純的金錢关系。

資产階級揭示了，中世紀那种深受反动派称許的蛮悍勇武举动，自然是和怠惰因循習气相輔相成的。它首次証明了，人类的活动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它創造了同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哥德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同民族大迁移和十字軍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

資产階級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經常發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經常發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相反，过去一切工业階級賴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經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連不断的震蕩，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資产階級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一切陈旧生鏽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見解和观点，都垮了；而一切新产生的关系，也都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变为陈旧了。一切等級制的和停滯的东西都消散了，一切神聖的东西都被褻瀆了，于是人們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靜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

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銷路，資产階級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鑽营，到处落戶，到处建立联系。

資产階級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場，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費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資产階級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民族工业部門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着。它們被新的工业部門排挤掉了，因为建立新的工业部門已經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問題；这些部門

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極其遙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們所出产的产品，已經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費，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費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貨就能滿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靠非常遙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滿足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閉关自守和自給自足状态已經消逝，現在代之而起的已經是个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賴了。物質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經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狹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

資产階級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工具極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毀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頑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憂惧之下采用資产階級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就是說，变成資产者。簡短些說，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創造出一个世界。

資产階級已經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規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依賴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賴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賴于資产階級的民族，使东方依賴于西方。

資产階級一天天地消灭生产資料、财产和人口等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資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原先各自独立的、几

乎只是由联盟关系联系起来的，各有其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税则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制、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统一的税关的民族了。

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和交换资料，都是在封建社会里面造成的。在这些生产和交换资料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制造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能再同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了。这种关系已经不是促进生产而是阻碍生产了。它们已经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们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和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即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

现在，在我们眼前又发生着类似的运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曾经象魔术一样造成了极其庞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现在它却象一个魔术师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所以，几十年来的工商业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的历史，即反抗那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周期性的而且愈

来愈凶猛地危及整个資產階級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間，每次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毀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产力也被毀灭掉了。在危机期間，發作了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好象是荒唐現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轉瞬間回复到突如其来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大飢荒、一場毀灭性的大战争，完全吞嚥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資料；仿佛是工商业全被毀灭了，——这是什么緣故呢？就因为社会文明过度，生活資料太多，工商业規模太大。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經不能再促进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关系的發展；相反，生产力已經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納的地步，資產階級的关系已經阻碍生产力的發展；而当生产力一开始突破这种障碍的时候，就使整个資產階級社会陷入混乱状态，就使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資產階級的关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們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資產階級是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的呢？一方面是破坏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夺取新的市場，更加徹底地榨取旧的市場。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資產階級在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一种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一种办法。

資產階級用来推翻了封建制度的那个武器，現在却对准資產階級自己了。

可是，資產階級不仅鍛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同时它还造就了将运用这武器来反对它自己的人——現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資產階級即資本愈發展，无产階級即現代的工人階級也就愈發展；現代的工人只有當他們能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但是他們又只有當他們的劳动还能增殖資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

不能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如同其他任何貨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們也不免要受到竞争方面一切偶然情况的影响，也不免受到市場方面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机器采用范围的扩大和分工程度的增加，无产者的劳动已經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質，因而也就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力。工人已变成机器的简单附属品，他所担任的只不过是一些極其简单的、極其单调的和極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費用，也就几乎只限于維持工人生命和延續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一切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²¹⁹的价格，都是同它的生产費用相等的。因此，劳动愈使人感到厭恶，工資也就愈减少。不但如此，机器的采用范围愈广，分工愈細，劳动量也就愈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時間內所要求的劳动量的增加，机器操作过程的加速，等等。

現代的工业已經把宗法性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工业資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象士兵一样被編制起来。他們是产业軍的小兵，受着整批士官和将校的層層監視。他們不仅是資产者階級的奴隶，不仅是資产階級国家的奴隶，并且他們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本厂厂主資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橫制度愈是公开表示自己的目的是發財，那末它就愈显得刻薄、可憎和令人痛恨。

手工劳动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愈少，換句話說，現代的工业愈發达，那末男工劳动也就愈受到女工劳动和童工劳动的排挤。对于工人階級來說，性別和年齡的差別已經沒有什麼社会意义了。他們都是劳动工具，仅仅因为他們性別和年齡的不同而需要有多寡不一的費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們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們終於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間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店主、高利貸者等等，紛紛奔向工人們了。

中層等級的下層，即小工業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業者 and 農民——所有這些階級都降落到無產階級的队伍里來了，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夠經營大工業，經不起大資本家競爭；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專門技藝已經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一錢不值了。無產階級的队伍就是這樣從居民中間的各個階級補充起來的。

無產階級經歷了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從它開始存在的那一天開始的。

最初是個別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工廠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地方某一勞動部門的工人，同那直接剝削他們的個別資產者作鬥爭。他們攻擊的對象不僅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並且是生產工具本身；他們毀壞那些來競爭的進口貨，搗毀機器，放火燒毀工廠；他們力圖用強力恢復已經失去的中世紀工人的地位。

在這個階段上，工人們還是分散在全國各處、因為相互競爭而聯合不起來的人群。這時候，工人群眾的團結，還不是由於他們自己的聯合，而僅僅是資產階級聯合的結果，當時資產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曾經不得不發動、並且暫時還能夠發動整個無產階級投入運動。所以，在這個階段上，無產階級還不是同自己的敵人作鬥爭，而是同自己的敵人的敵人作鬥爭，即同君主專制的余孽、地主、非工業資產者和小資產者這些人作鬥爭。因此，這时的全部歷史運動都操在資產階級手里；在這種條件下取得的每一個勝利就都成了資產階級的勝利。

然而，隨着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它集

合成为广大的群众了。它的力量日益增加，它自己也日益感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各种劳动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少，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变本加厉的竞争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得工人们的工资愈加摇摆不定；由于机器日益迅速的发展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得无产者的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个别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工人们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一致起来保卫他们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时使自己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转变成为起义。

工人们有时也得到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实成果并不是直接得到的成效，而是工人们的越来越大的团结。促进这种团结的，是由大工业所造成的愈益发达的交通工具，因为这种交通工具使各地工人彼此有了联系。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只在地方范围内发生而性质又都相同的斗争汇合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阶级的斗争了。本来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斗争。中世纪的市民因为交通梗阻而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团结，现代无产者因为铁路交通便利而只消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这样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因工人们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发生，并且每一次都显得更加强大，更为坚固，更有威力了。它乘资产阶级各个阶层互相争执的机会，迫使他们用立法手续承认工人们的个别利益。英国颁布过十小时工作日法律就是一

⊖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同盟”后面添了“（工会）”。——编者注

个例子。

一般說来，旧社会内部的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發展。资产阶级进行不断的斗争，最初是反对贵族，后来又反对其利益同工业进步相抵触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并且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免要向无产阶级呼吁，不免要向无产阶级求援，因而不免要把无产阶级卷进政治运动里。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一部分知识[⊖]授予了无产阶级，也就是把反对自身的武器授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們已經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給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知识。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过程，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显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锐，这就使得统治阶级中间有一小部分人分化出去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归附于未来主人翁阶级。所以，正象过去贵族中间有一部分人曾经轉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间也有一部分人轉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这就是已经提高到在理論上認識全部历史运动进程的一部分资产者思想家。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發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層等級，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們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們这种中層等級的生存，以免于灭

⊖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自己的一部分知识”改为“自己的一部分政治知识和普通知识”。——編者注

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动的，因為他們力圖把历史的車輪扭向后轉。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指他們將轉入无产階級的队伍里來，那是指他們維護的不是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他們將來的利益，那是指他們拋棄自己原來的觀點，而接受无产階級的觀點。

流氓无产階級是旧社会最下層腐化的消極产物，他們雖然間或被无产階級革命卷进运动里，但是他們的全部生活条件却使他們更甘心被人收買，去干反动勾當。

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階級的生活条件中間已經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沒有私产的，他們和妻子兒女的关系是同資產階級的家庭关系完全不同的；現代的工业劳动，現代的資本压迫，無論在英国或法国，也無論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已經使无产者失去任何民族性了。法律、道德和宗教，在他看来全都是掩蔽資產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的偏見。

过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权之后，总是力圖把已經获得的生活地位巩固起来，使全社会都服从那保障它們的占有方式的条件。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現有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至今存在的占有方式，才能获得社会的生产力。无产者本身并沒有什麼必須加以保护的东西，他們必須打破至今保护过和保障过私有財產的一切。

至今發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謀利益的运动。无产階級的运动是絕大多數人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无产階級是現代社会的最下層，它如果不摧毀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組成官方社会的階層所构成的全部上層建筑，就不能抬起头來，挺起腰來。

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那末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最初總是民族的鬥爭。每一個國家里的無產階級首先當然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的最一般的階段的時候，我們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多少隱蔽的國內戰爭，以及這個戰爭轉變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統治的過程。

我們已經看到，至今有過的一切社會，都是建立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對抗上面的。但是，為了有可能壓迫某一個階級，就必須保證這個階級至少有能夠維持它那奴隸般生存的条件。農奴制度下的農奴曾經掙扎到公社社員的地位，正如封建專制制度束縛下的小資產者曾經掙扎到資產者的地位一樣。相反，現代的工人却並不是隨着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每況愈下地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由此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資產階級再不能做社會上的統治階級了，再不能把自己階級的生存条件當做支配一切的規律強加于全社會了。資產階級再不能統治下去了，因為它甚至不能再使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般的生活的水平了，因為它不能不讓自己的奴隸們落到這樣的地步，以至它必須養活奴隸，而不是由奴隸來養活它了。社會再不能在它的權力下面生活下去了，也就是說，它的生活再不能同社會相容了。

資產者階級賴以生存和統治的基本条件，是財富積累在私人手里，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生存条件是僱傭勞動制。僱傭勞動制是全靠工人們的自相競爭來支持的。但是，資產階級所無意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的進步，却使工人們因成立團體而達到的革命團結，代替了他們因相互競爭而引起的分散狀態。于

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底下抽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二)无产者与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并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殊政党。

他们并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并不提出什么想用以限制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殊的[⊖]原则。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

所以，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一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是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某一个世界改革家所臆想或发现的思想或原则为根据的。

[⊖] 在 1888 年的英文版中，“特殊的”改为“宗派的”。——编者注

[⊖] 在 1888 年的英文版中，“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改为“最先进的”。——编者注

这些原理不过是当前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总的表述，不过是现在我們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遭到了經常發生的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經常發生的历史的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而代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說，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用一句話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

有人責备我們共产党人，說我們要消灭人們亲自获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財產，消灭那种构成一切个人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財產。

好一个劳动所得的、自力挣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財產！你們說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所有制嗎？那种所有制用不着我們去消灭，工业的發展早就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还在消灭它。

或者，你們說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給无产者創造出什么

⊖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改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編者注

财产来嗎？沒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創造的是資本，即剝削雇佣劳动的财产，亦即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剝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現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資本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演进的。讓我們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方面吧。

做一个資本家，这就是說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的一种純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的一种社会的地位。資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有通过社会的全体成員的共同活动，才能动作起来。

由此可見，資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

所以，把資本变为屬於社会全体成員的集体财产，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不过是所有制的社会性質。它将失掉它的階級性質。

現在，我們再来看一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資，即工人为維持其作为工人的生命所必需的一份生活資料。所以，雇佣工人靠自己劳动結果所占有的东西，只能勉强維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这种直接供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我們决不打算消灭它，因为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东西能为什么人造成支配別人劳动的权力。我們要消灭的仅是这种占有的悲惨性質，它使工人仅仅为增殖資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統治階級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

在資產階級社会里，活的劳动只不过是增殖已經积累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經积累的劳动只不过是扩大、丰富和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

所以，在資產階級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着現在，而在共产主义社

会里則是現在支配着过去。在資產階級社会里，資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却被剝夺了独立性和个性。

但是，資產階級却硬說消灭这种关系就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呢！它說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資產階級的个性，要消灭資產階級的独立性和資產階級的自由。

在現今資產階級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謂自由只不过意味着貿易的自由，买卖的自由。

可是，买卖一旦消灭，自由的买卖也就会随之消灭。我們的資產者高談自由买卖的論調，也如同他們其他所有一切高談自由的大話一样，本来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來說，对于中世紀被奴役的市民來說，才是有些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要消灭資產階級生产关系和消灭資產階級本身这一点來說，却是毫无意义的。

你們一听到我們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們的現今社会里，私有制在十分之九的成員中間已經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在十分之九的成員中間已經不存在。可見，你們責备我們，原来是說我們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絕大多數人沒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們責备我們，原来是說我們要消灭你們的那种所有制。是的，我們确实要这样做的。

你們声明說，从劳动不能再变为資本、貨幣和地租的时候起，簡單地說，从劳动不能再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即从个人的所有制不能再变为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

那末，你們自己承認，你們所認為个性的，不外是資產者，即不

Handwritten header text in German, likely a title or address, including the name 'Karl Marx'.

Main body of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consisting of approximately 15 lines of dense, cursive script.

“共产党宣言”原稿的一頁 (馬克思的手稿, 头两行是燕妮·馬克思的手迹)

外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该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旦消灭，一切活动都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代之而兴。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应该早就因为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一切顾虑，都归结为这样一句同义反复语：一旦没有了资本，也就不会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于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同时又推广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消灭阶级性的所有制，在资产者看来就是消灭生产本身，同样，消灭阶级性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消灭一切教育。

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变成为机器的附属品罢了。

然而，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的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见解来衡量我们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末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吧。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偏颇观念，驱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生产发展过程中暂时的历史性的关系夸大成为永久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而你们的这种偏颇观念原是过去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一谈到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敢去理

解你們在談到古代的所有制和封建的所有制的时候能理解的那种道理了。

消灭家庭！連極端的激进党人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恶的意圖表示憤慨。

現代的、資產階級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資本上面的，建筑在私人發財的制度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完全發展的形态，只有在資產階級中間才存在着，而它的补充現象却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生活和公娼制。

資產階級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現象的消逝而消逝，两者都要随着資本的消灭而消灭。

或者你們責备我們，說我們要废止父母对子女的剝削吧？我們甘願承認这种罪狀。

但是，你們却硬說，我們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們最亲密的关系。

难道你們的教育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嗎？不是由你們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嗎？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干涉决定的嗎？共产党人並沒有臆造什么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們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質，要使教育摆脱統治階級的影响。

无产階級中間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因为大工业的發展而陷于破坏，他們的子女愈是被变成簡單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那末資產階級的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間的亲密关系的那一套大話，就愈是令人听来作呕。

但是，你們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資產階級异口同声地向我們这样叫喊。

资产者原来是把自已的妻子仅仅当作一种生产工具看待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联想到妇女也会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连想也想不到，问题正在于要消灭妇女被当作简单生产工具看待的这种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对于共产党人要实行莫须有的正式的公妻制表示惊骇，那是再可笑也没有的了。公妻制无须共产党人来实行，因为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儿女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就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其特别的享乐呢。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所以至多也只能这样责备共产党人，说什么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可是，只要现代的生产关系一消灭，那末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自然就会随之而消灭。

其次，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什么他们要废除祖国，废除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确立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發展，随着貿易自由和世界市場的确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間的

⊖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改为“上升为民族的主导阶级”。

——編者注

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

无产阶级的統治将更加快它們的消逝。联合的努力，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努力，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剝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剝削就会随之而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哲学和一般思想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責难，都不值得我們詳細地探討了。

人們的觀念、观点、概念，簡短些說，人們的意識，是随着人們的生活条件、人們的社会关系和人們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別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嗎？

思想的历史，豈不是証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質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嗎？任何一个时代的統治思想都不过是統治阶级的思想。

人們說，思想能够促使整个社会革命化，其实人們这样說只不过是說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經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解体与旧生活条件的解体是同时进行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击败了。当 18 世紀基督教思想在啓蒙思想的打击下陷于灭亡的时候，封建社会曾經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知識領域里占統治地位罢了。

“然而”，——有人会說，——“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和法的等等观念，当然在历史發展过程中是改变过的了。但是，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本身，在这种不断的改变的过程中却是始

終保存着的。

“此外，还存在着一些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是社会發展的一切阶段所共有的。但是，共产主义却要废除永恒的真理，它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把它們革新；可見，共产主义是同过去的全部历史發展进程背道而馳的。”

这种責难究竟有什么意思呢？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階級对立中演进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又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的这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却是过去一切世紀所共有的事实。所以，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識，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別，总是在一定的共同的形态中演进的，也就是在那些只有随着階級对立的徹底消逝才会完全消逝的意識形态中演进的。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

不过，我們还是把資產階級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責难撇开不談吧。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階級变成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无产階級运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組織成为統治階級的无产階級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須对所有权和資產階級生产关系

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們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沒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們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在各个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都可以采取下面的办法:

1. 剝夺地产,把地租供国家支出之用。
2. 征收高額累进稅。
3. 废除繼承权。
4. 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資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按照总的計划来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軍,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同工业結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間的差別[⊖]逐步消灭。
10. 对一切兒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取消現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質生产結合起来,等等。

在發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別已經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

⊖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在“越出本身”后面添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举行进攻成为必要”。——編者注

⊖ 在1848年的版本中是“城乡之間的对立”。在1872年的版本中和以后的历次德文版本中,“对立”改为“差別”。在1888年的英文版本中,“促使城乡之間的差別逐步消灭”改为“通过全国各地居民更加平均的分布,逐步消灭城乡之間的差別”。——編者注

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 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地位，自然要写出一些讽刺的小品来攻击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在法国 1830 年七月革命和英国议会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到什么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上的斗争了。然而就是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代[⊖]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怀自身的利益，仅仅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向资产阶级声罪致讨了。他们引为快事的是：写出一些刺激的文字来

[⊖] 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英国 1660—1689 年间的复辟时代，而是法国 1814—1830 年间的复辟时代。（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譏諷自己的新統治者，并向他低聲細語地說出一些不祥的預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哀怨，半是譏諷；半是过去的余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候固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判刺中資產階級的心，但是它由于自己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进程的劣根性，却常常使人感到可笑。

这班貴族为了籠絡人民，往往把无階級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揮舞。但是，人民每次跟着他們走的时候，發現他們的臀部盖有旧的封建印章，就哈哈大笑，嘩地一下子散去了。

一部分法国正統主義者和“青年英国”²²⁰，就都排演过这种滑稽劇。

如果封建主說他們的剝削方式是和資產階級的剝削方式不同，那只是他們忘記了他們本来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經过时了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剝削的。如果他們說在他們的統治下並沒有出現过现代的无階級，那只是他們忘記了现代的資產階級正是他們那个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們很少隱諱自己那一套批評的反動性質：他們控告資產階級的主要罪狀，恰好是說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根本推翻的階級發展起来。

他們責备資產階級，与其說是因为它产生了一般性的无階級，倒不如說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階級。

所以，在政治实践上，他們总是参加反对工人階級的一切暴力措施，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又不顧自己所吹噓的那一套堂皇动听的論調，却总是毫不放过机会，拾取黄金果[⊖]，不惜信义、爱和名

⊖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黄金果”前面加有“从工业树上落下来的”。——編者注



“共产党宣言”1848年版的封面（30頁本）

誉，靠經營羊毛、甜菜和烧酒生意获取暴利[⊖]。

正如僧侶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侶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給基督教禁欲主义塗上一層社会主义色彩，是再容易也没有的了。基督教不是曾經竭力表示，它是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的嗎？为了代替这一切，它不是提倡过积德和行乞，独身和絕欲，修道和信教嗎？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侶用来滌除貴族肝火的一种聖水罢了。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貴族并不是唯一的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已經漸漸恶化和消失的阶级。中世紀的市民等級和小农等級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輩。在工商业不很發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至今还在兴發着的资产阶级身旁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

在近世文明已經發展的国家里，已經形成了——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經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资产阶级，它动搖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但是，竞争經常把这一阶级的成員扔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所以他們已开始覺察到，随着大工业的發展，他們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們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

⊖ 这里主要是指德国說的，那里的土地貴族和容克地主通过自己的管事自行經營自己的大部分地产，他們还開設大規模的甜菜糖厂和釀酒厂。較富有的英国貴族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但是，他們也知道怎样讓人家用他們的名义創辦頗为可疑的股份公司，以补偿地租的下降。（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他們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員所代替。

在农民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里，例如在法国，自然要出现一种作家，他們虽然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但是他們在批評资产阶级制度的时候，总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来衡量资产阶级制度，他們在维护工人事业的时候总是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發。这样就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英国，就是这类文献的头面人物。

这种社会主义很会揭示現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經濟学家的伪善的辯护伎俩。它确凿地証明了机器生产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資本和地产的集中，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沒落，无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財富分配的極不平等，各民族之間的歼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道德、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等。

可是，按其积极內容來說，这种社会主义不是力謀恢复旧的生产 and 交換資料，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就是力謀重新把現代的生产 and 交換資料硬塞进已被这些資料突破而且必然要突破的那种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在前后两种場合，它都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

行会式的工业組織和宗法式的农业，——这就是它的最后結語。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發展中已經变成了一种胆怯的怨声[⊖]。

⊖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發展中已經变成了一种胆怯的怨声”改为：“最后，当确鑿不移的历史事实使幻想的安慰作用消灭无余的时候，这种社会主义就变成了一种可怜的怨声”。——編者注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一种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准哲学家和一班爱说漂亮话的人们，贪饕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作品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变成了纯粹著作界的一个流派。它必然表现为一种关于实现人性的无谓冥想。例如，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法国革命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只不过是意味着纯粹意志即正当意志、真正人类意志的规律的表现。

德国著作家的全部工作，只是要把法国的新思想同他们自己的旧的哲学良心调和起来，或者正确点说，只是要从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出发去领会法国的思想。

这种领会，如同一般领会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天主教的僧侣曾经在古代异教的经典著作原稿上面写了一些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用正相反的态度对待了法国的不信神的作品。他们在法文的原文下面添进了自己的一套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评货币关系的法文原稿下面添上了“人性的异化”，在批评资产阶级国家的法文原文下面添上了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废除”等等。

这种用自己的哲学辞令贗造法国理論的戏法，他們叫做“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論証”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閹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就不再表現一个階級反对另一个階級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滿以为自己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就滿以为自己不是坚持真实的要求，而是坚持对于真理的要求，不是代表无产階級的利益，而是代表人性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屬於任何階級，并且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哲学冥想的渺茫太空。

这种德国的社会主义曾把自己那一套笨拙的小学生作业看得極為郑重庄严，并且大言不慚地加以吹嘘，現在它却漸漸失去了它那种自命博学的天真了。

德国的特别是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反对封建主和君主专制的斗争——簡短些說，自由主义的运动——已愈来愈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有了盼望已久的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因循慣例地詛咒自由主义、代議制国家、資產階級的竞争、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資產階級的法、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力鼓吹，說什么在这个資產階級运动中，人民群众不仅一无所得，而且还有失掉一切的危险。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記了，法国的批評（德国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批評的可怜回声）原是以現代的資產階級社会和与它相适应的物質生存条件和相当的政治机构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尙待爭取的。

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就成为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一班随

从——僧侶、学監、頑固守旧的容克和官僚順手抓来吓唬那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一个稻草人。

因此，这种社会主义不过是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用鞭子槍彈給德国工人起义苦头吃的时候所加的甜味罢了。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为德意志各邦政府手中用以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一种武器，那末它同时也就成为直接表现反动的利益，即表现德国市僧的利益的一种手段。在德国，16世紀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經常以各种形态再三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現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全这个小资产阶级，那无异就是保全德国的現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統治和政治統治那里等候着自己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資本的集中，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增长。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够一箭双雕。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象瘟疫一般地流行起来了。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給自己的那几条干癟的“永恒的真理”披上这件用思辨的蛛絲織成的、綉滿辞令花彩和浸透甜蜜温情之泪的神秘外衣，只是使他們的貨物在这班顧客中間增加銷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自己也漸漸地認識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充当这班市僧的堂皇的代表。

它把德国的民族标榜为模范的民族，把德国的市僧推崇为人的模范。它給这班市僧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一种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一种完全相反的东西。它既然一貫到底，就公然来反对共产主义的那种“橫蛮破坏”的傾向，并且肆口揚言，說什么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所有現时在德国冒充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作品而流行的东西，除了極

少数的例外，都是这一类卑鄙齷齪、令人萎靡的作品[⊖]。

2. 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

資產階級中間有一部分人要想把社会的疾病治好，以求巩固資產階級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中間有經濟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階級生活改进派，慈善事业組織者，动物保护会會員，禁酒运动协会發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微小改良主义者。这种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定成一些完整的体系了。

我們且举蒲魯东的“**貧困的哲学**”一書为例。

社会主义的資產者要保全現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又不要有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們要保全現代社会，但是不要有那些使这个社会發生革命和陷于解体的因素。他們只願有資產階級而不要无产階級。在資產階級看来，資產階級統治着的世界当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把这一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加工，制定成或多或少完整的体系。它号召无产階級来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只不过是要无产階級始終停留在現今的社会里，但要他們抛弃把这个社会看成是一种可恶东西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还有一种比較不完整、但是更为实际的形式，它力圖使工人階級对一切革命运动持否定态度，硬說能給工人階級

⊖ 1848年的革命風暴已經把这个可恶的流派扫除淨尽，并且使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再也不高兴拿社会主义来投机了。格律恩先生就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者和典型人物。（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说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而是一种行政上的改良，这种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使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关系有所改变，至多也只能替资产阶级缩减它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国家事务。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仅仅是一套演说辞令的时候，才算给自己找到了最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囚室！——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3.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里我们且不谈在近代一切大革命里代表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的著作等等)。

无产阶级试图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和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一些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欠发展，同时也是由于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因为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初期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現的革命文献，按其内容来说，不免是反动的。这种文献所鼓吹的是普遍的禁欲主义思想和粗鄙的平均主义。

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如聖西門、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階級同資产階級之間的斗争尚未發展的最初时期出現的，关于这个时期，我們在前面已經叙述过了（見“資产階級与无产階級”）。

这些体系的發明家們虽然曾經看出階級的对立，看出統治着的社会本身内部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們沒有看出无产階級方面的任何历史首創作用，沒有看出无产階級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既然階級对抗是随着工业的發展而發展的，所以这些發明家同样也还不可能發現无产階級解放的物質条件，于是他們就去探求那應該能够造成这种条件的社会科学、社会規律。

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們个人的發明活动来代替，实现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階級逐步向前組織成为階級的进程就要由按照他們臆想出来的方案組織社会的努力来代替。在他們看来，今后全世界的历史都归結为他們那些社会計劃的宣传和实现。

誠然，他們也意識到他們在这些計劃中主要是拥护工人階級这一受苦最深的階級的利益。在他們的心目中，无产階級只是作为这个受苦最深的階級才存在的。

可是，不大發展的階級斗争形式以及他們本身的生活地位，却使他們自以为是高高超出这种階級对抗之上的人物。他們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員的生活，甚至連那些处境極优的成員也包括在內。因此，他們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甚至主要是向統治階級呼吁。根据他們的意見，人們只要理解他們的体系，就会承認这种体系是建設最美好社会的最优良的計劃。

因此，他們拒絕一切政治行動，特別是拒絕一切革命行動；他們想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並且企圖通過一些細小的、當然不會成功的試驗，用實例的力量來為新的社會福音開拓道路。

這種幻想的未來社會方案，是在無產階級還處於很不發展狀態，因而對本身所處地位還抱著一種幻想的時候產生的，是從無產階級希望社會總改造的最初的充滿預感的激動中產生的。

但是，這些社會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著作也包含有批判的成分。這些著作抨擊現存社會的全部基礎。因此，它們提供了啓發工人意識的極為寶貴的材料。它們關於未來社會的一些積極的結論，例如消滅城鄉之間的对立[⊖]，消滅家庭，消滅私人發財制度，消滅僱傭勞動制，提倡社會和諧，把國家變成單純的管理生產的機關等，——所有這些原理無非都是表明消滅階級對立的必要，但是由於這種階級對立在當時還剛剛開始發展，它們當時所知道的只是這種對立的最初的無定形的模糊表現。因此，這些原理也就還帶有完全空想的性質。

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義，是與歷史的發展進程成反比例的。階級鬥爭愈發展和愈具有確定的形式，那末，這種幻想超出階級鬥爭的意圖，這種用幻想辦法克服階級鬥爭的態度，就愈失去任何實際意義和任何理論根據。所以，雖然這些體系的創始人在許多方面也曾經是革命的，但是他們的信徒卻就總是組成一些反動的宗派。這些信徒無視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繼續向前發展的事實，還是死守着他們的老師們的一些陳舊觀點。所以，他們一貫地一再企圖削弱階級鬥爭，調和對立。他們還在夢想用試

⊖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這一處改為“它們所提出的一些實際措施，例如消滅城鄉之間的差別”。——編者注

驗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梦想创办单个的“法倫斯泰尔”，梦想建立所謂“国内移民区”，梦想創立小“伊加利亚”[⊖]即創立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樓閣，他們就不得不去央求資產階級放軟心腸，解囊施舍。他們漸漸地墮落而与上面講过的那些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成为一丘之貉了，不同处只在于他們更为一贯迂腐，更加狂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能奏奇功异效罢了。

所以，他們就忿怒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認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的福音才發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主义者，在法国有傅立叶主义者，前者反对宪章派，后者反对改革派²²¹。

(四) 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看过了第二章之后，就可以明白共产党人对于已經形成的各个工人党派的态度，即他們对于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的态度了。

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階級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們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联

⊖ 法倫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設計的社会主义移民区的称呼；伊加利亚是卡貝給自己的理想国和后来他在美洲創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稱。（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国内移民区(Home-colonies)是欧文給他的示范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起的名稱。傅立叶所設計的社会宮叫做法倫斯泰尔。卡貝所描繪的那种建立了共产主义制度的空想臆造国叫做伊加利亚。（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合社会主义民主党[⊖]去反对保守派的和激进派的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并不因此放弃对于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产生出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党人，但是，他们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派社会主义者，另一部分是激进派的资产者。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支持曾经发动过 1846 年克拉柯夫起义的那个政党。

在德国，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地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敌对情形的意识，以期德国工人能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器，以期在推翻德国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就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现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 17 世纪的英国和 18 世纪的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

⊖ 当时这个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是赖得律-洛兰，在著作方面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在报纸方面的代表是“改革报”（《Réforme》）。他们所发明的名称——社会主义民主党，是他们曾经用以表明民主党或共和党中一部分多少涂上社会主义颜色的人的。（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法国以社会民主党自称的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代表是赖得律-洛兰，在著作方面的代表是路易·勃朗；所以，它同现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有如天渊之别。（恩格斯在 1890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成为无产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旨在反对現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們最为注重的是所有制問題，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問題，不管这个問題当时的發展程度怎样。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爭取世界各国民主主义政党之間的团結和協議。

共产党人認為隱瞞自己的观点和意圖是可鄙的事情。他們公开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讓那些統治階級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顫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頸上的鎖鏈。而他們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弗·恩格斯

1847年的运动

1847年无疑是我们历年来最动荡的一年。普鲁士颁布了宪法和实现了联合省议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出乎意料地迅速活跃起来，普遍武装起来反对奥地利；瑞士发生了内战；英国产生了带有鲜明激进色彩的新议会；法国发生了争吵和举行了支持改革的宴会；在美洲，合众国征服了墨西哥；这就是近年来未曾有过的一系列大变动和事件。

1830年是最后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法国的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法案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而在英国来说，则是工业资产阶级即厂主已经战胜非工业资产阶级，即食利者。比利时和瑞士的一部分也步其后尘，资产阶级在这里也获得了胜利²²²。波兰起义了，意大利在梅特涅的压迫下辗转呻吟，德国到处发生了骚动。所有国家都准备进行一场大搏斗。

但是1830年以后一切都后退了。波兰垮台，罗曼内起义的人们东奔西散²²³，德国的运动被镇压。法国资产阶级粉碎了本国的共和主义者，出卖了本来由于它自己的唆使而发动起义的其他国家的自由派。英国自由党内阁则毫无作为。最后，到了1840年反动势力的气焰已非常嚣张。波兰、意大利、德国在政治上死气沉沉，在普鲁士，“柏林政治周刊”高踞王座²²⁴，在汉诺威废除了达尔

曼先生的高明的宪法²²⁵；1834年的維也納會議的決議²²⁶充分發揮了力量。在瑞士保守派和耶穌會教徒獲得勝利，在比利時天主教徒掌握了政權，在法國基佐獲得了勝利，在英國輝格黨的政府在皮爾日益增長的威力的壓力下作最後掙扎，憲章派在1839年一敗塗地後重新改組的打算落了空。反動派處處勝利而一切進步黨派完全崩潰。歷史運動停止了，看來這就是1830年大搏鬥的最終結果。

但是，正象1830年是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頂峰一樣，1840年是反動勢力的頂峰。從1840年起反對現存制度的運動又重新開始了。這些運動往往遭到失敗，但卻逐漸爭得越來越多的障地。在英國憲章派又重新組織起來，而且空前地強大有力；皮爾不得不屢次背叛自己的黨，宣布廢除谷物法而使本黨受到致命的打擊，最後不得不下台。在瑞士激進派獲得成功；在德國，特別是在普魯士，自由派的要求一年比一年更為強烈。在比利時自由派也在1847年的選舉中獲得了勝利。只有法國在1846年的選舉中反動的內閣獲得了空前的多數，意大利直到底護九世（1846年底他作過一些似是而非的改革嘗試）即位時止，仍舊是死氣沉沉。

於是，1847年來到了，這一年幾乎給各國的進步黨派帶來了一連串的勝利。即使在這些黨派遭到失敗的地方，失敗也比立刻勝利更為有利。

1847年沒有決定任何事情，但是却使各黨各派彼此尖銳而鮮明地對立起來了；這一年沒有徹底解決一個問題，但是却提出了一切必須馬上加以解決的問題。

1847年最大的事件和變化是發生在普魯士、意大利和瑞士。

在普魯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終於不得不頒布憲法。桑蘇

西宮^①中絕后的唐·吉訶德經過長期搏鬥和痛苦以後生產了憲法，按他的意思，這一憲法應該保證封建的、宗法的、專制的、官僚的、僧侶的反動勢力永遠勝利。但是他的如意算盤打錯了。資產階級已經十分堅強，能夠把這個憲法也變成反對他和社会上一切反動階級的武器。資產階級在普魯士也象在別的地方一樣，首先拒絕借錢給國王，這使國王處於絕望的境地。在拒絕借錢以後，最初可以說，普魯士根本沒有國王；普魯士完全處於革命狀態而不自覺。幸而出現了1500萬的俄國貸款；於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又重新成了國王，議會中的膽戰心驚的資產者便立刻屈服；革命的風暴消失了。普魯士資產階級暫時遭到了失敗。但它仍舊前進了一大步，它爭得了集會場所，向國王顯示了力量，并使全國動蕩。普魯士的統治權應該屬於誰，應該屬於以國王為首的貴族、官僚、僧侶的聯盟呢，還是應該屬於資產階級？不是前者，即是后者，這一問題現在必須解決了。過去在聯合省議會中，雙方還有協商的可能，但是現在已經沒有這種可能性了。他們正進行着你死我活的鬥爭。此外，各個委員會（柏林憲政製造者的倒霉發明）²²⁷正在召開。這些委員會無疑地會把原來就糾纏不清的法律問題搞得更亂，使得誰也无法徹底弄清。它們會把問題變成一團只有快刀才能斬斷的亂麻；它們必須完成普魯士資產階級革命的最後准备工作。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靜待這一普魯士革命的開始。到1849年，不管國王願不願意，必須重新召開聯合省議會。我們給予國王陛下的期限只到這時，不能再多。那時，他必須把王笏和著名的“萬世的”王位²²⁸讓給本國的基督教的和猶太的資產者。

① 桑蘇西宮（Sanssouci）在波茨坦，是普魯士國王的一座行宮。——譯者注

因此，1847年是普魯士資產者在政治方面最順利的一年，尽管他們遭到暫時的失敗。德國其余各邦的資產者和小市民也看出这一点，并对普魯士資產者深表同情。他們知道，普魯士資產者的勝利就是他們自己的勝利。

在意大利我們亲眼看到一幅奇怪的景象：全歐洲最反動的人、中世紀頑固思想的代表——羅馬教皇[⊖]成了自由主義運動的首領。運動轉瞬間具有了巨大的規模，迫使托斯卡納的奧地利大公[⊖]和撒丁的叛徒查理-阿爾伯特也參加了運動，動搖了那不勒斯斐迪南的王座；運動的浪潮席卷了倫巴第，沖擊到了提羅耳和施梯里亞的阿爾卑斯山區。

當前意大利的運動和1807年到1812年普魯士的運動性質是相同的。就象當時的普魯士一樣，問題在於以下的兩方面：對外的獨立和內部的改革。目前要求的還不是憲法，而只是行政改革；暫時避免和政府發生任何嚴重沖突，以便在占優勢的國外勢力面前保持最大的統一。但這究竟是些什麼改革呢？這些改革對誰有利呢？首先是對資產階級有利。出版受到優待，官僚制度被迫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例如撒丁的改革，羅馬諮詢會議²²⁹和重新改組內閣）；資產者在地方行政機關中獲得更大的勢力，貴族和官僚的專橫受到限制；資產階級獲得了市民自衛軍這樣的武裝力量。到目前為止，一切改革都是有利的於資產階級的改革，而且只能是有利的於資產階級的改革，這些改革可以同拿破侖時期普魯士的改革相比。那時候的改革也帶有同樣的性質，而且很多方面還更前進了一步，例如：那時的行政當局服從於資產階級的利益，貴族和官僚的專橫

⊖ 庇護九世。——編者注

⊖ 托斯卡納的公爵列奧波特二世。——編者注

受到抑制，城市实行自治，后备軍建立起来，徭役也已經废除。現在的意大利和那时的普魯士一样，由于资产阶级的財富日益增长，特别是由于工商业对于全体人民生活的作用日益加强，资产阶级成了从外国的統治下解放意大利的主要阶级。

因此，意大利的运动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一切醉心于改革的阶级（从王公貴族到皮費拉利和拉察罗尼²³⁰）暂时都以资产者身份出现，而目前教皇还扮演着意大利第一个资产者的角色。但是这些阶级一旦永远摆脱奥地利的束縛，就会大失所望。当资产者战胜外部敌人时，资产者就会在自己家里把綿羊跟山羊分开。于是公爵和伯爵就不得不重新求助于奥地利，但为时已晚了，那时米兰、佛罗倫薩、那不勒斯的工人会知道，他們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

最后談談瑞士。瑞士在成立以来的整个时期中第一次在欧洲各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瑞士第一次敢于坚决行动，第一次鼓足勇气不作为彼此各不相关的二十二个州的混合物出现，而是作为联邦共和国出现。瑞士非常坚决地消除了內战，保证了中央政权的领导，也就是說，瑞士中央集权了。事实上已經实现的中央集权将在不久以后的盟約改革中取得合法化。

我們仍旧要問：战争的結果，同盟的改革以及分离派同盟各州的改組究竟对誰有利呢？显然是对胜利的政党有利，对 1830 年到 1834 年在某些州占得上風的党派如自由派和激进派有利，也就是对资产者和农民有利。由于七月革命，从前帝王城市的貴族統治已經被推翻了。凡是后来实际上恢复貴族統治的地方，如伯尔尼和日内瓦，1846 年都爆發了革命。凡是貴族統治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的地方，如城市巴塞尔^①，在那一年这种統治也剧烈地动搖了。

① 城市巴塞尔是瑞士的一个州名。——譯者注

在瑞士封建貴族是不多的，而在他們還存在的地方，他們的主要力量是依靠同阿尔卑斯高山地区牧民的同盟來維持的。這是資產者最後的、最頑強的、最凶狠的死敵。他們是自由主義各州的反動分子的支柱，在耶穌會教徒和虔誠派教徒的幫助下，他們用反動的陰謀密網纏住了整個瑞士（例如在瓦得州）。他們破壞了資產階級在瑞士議會中的一切計劃。他們妨礙了徹底摧毀從前帝國城市中的市僧貴族統治。

瑞士資產者的這些最後的敵人於1847年被徹底粉碎了。

瑞士資產者早就幾乎在所有各州的工商業中有相當大的活動自由。行會還原封未動地保存着，但它們對資產階級的發展沒有多大妨礙。內部稅關則幾乎全都沒有了。凡是資產階級得到某種程度發展的地方，政權就掌握在他們手中。雖然資產階級在某些州有極大發展並獲得支持，但是它恰恰缺少最主要的東西——中央集權。封建制度、宗法制度和庸俗氣味是在彼此隔絕的各省和在某些城市中發展起來的，而資產階級為了自身的發展則要求有尽可能廣闊的區域，它需要的是一个大瑞士，而不是二十二個小州。各州的獨立這一最適合於舊瑞士的政治形式成了資產者沉重的枷鎖。資產者需要中央政權，而且中央政權還應當有足够的力量使各州的立法趨於一致，並依靠其巨大影響，消除各州在國家機構和法律上的區別。這種政權應該消除封建的、宗法的和庸俗的立法殘余，並積極保衛瑞士資產者在對外關係方面的利益。

資產階級得到了這樣的中央政權。

難道農民沒有參與摧毀分離派同盟嗎？當然是參加了的。至於農民，現在他們對資產者仍將扮演他們長期對小市民所扮演的角色。他們將仍然是供資產者剝削的工具，替他們打仗，給他們

紡紗織布，為他們補充無產階級的隊伍。那末農民還要作什麼呢？農民和資產者一樣是私有者，現在幾乎在各方面都同資產者有共同的利益。他們所能實行的一切政治措施給資產者帶來的利益比給他們自己帶來的利益要多。但是和資產者比較起來，農民是軟弱的，因為資產者富裕得多，並且手里掌握着當代一切政權的杠桿——工業。農民跟隨資產者還可以得到許多東西，要是反對資產者，便什麼也得不到。

毫無疑問，总有一天貧困破產的農民會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到那时无產階級會發展到更高的階段，向資產階級宣戰；關於這點暫且不提。

驅逐耶穌會教徒及其信徒，驅逐資產階級的這些有組織的敵人，普遍實施世俗的教育以代替宗教教育，把大部分教會財產轉歸國家，這些都是首先對資產者有利，這是自不待言的事。

因而 1847 年三個最著名的運動彼此有共同之點，就是這些運動首先主要是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進步的黨派到處都是資產者的黨派。

事實上，這些運動的特征是：正是那些在 1830 年落后的國家去年却採取了堅決的步驟來達到 1830 年的水平，即取得資產階級的勝利。

根據以上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出，1847 年是資產階級最光輝的年份。

我們再往下談。

在英國出現了新議會，根據教友派信徒約翰·布萊特的說法，新議會是以往召開過的一切議會中最道地的資產階級議會。約翰·布萊特本人是所有英國人中最道地的資產者，因而在這個問

題上他是最理想的權威。但是資產者約翰·布萊特却不是統治法國的資產者，不是口出不遜大肆攻擊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資產者。約翰·布萊特所說的資產者就是廠主。在英國，資產階級的某些派別從1688年起就已經掌握政權，但為了使自己易于奪得統治權，他們把有名無實的政權留給依附他們的債務人——貴族。由此可見當時英國的鬥爭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內部某些派別——食利者和廠主之間的鬥爭，不過廠主還可以把這一鬥爭說成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必要時說成貴族和人民之間的鬥爭。廠主決不希望給貴族保留統治的假象，因為那些勳爵、從男爵、鄉紳沒有欠他們一分一文。相反地他們非常希望消滅這種假象，因為隨着這種假象的消滅，食利者將失去最後的據點。這一任務將由目前的資產者或廠主的議會來完成。這個議會將使帶有封建外表的古老英國變成按資產階級方式組織起來的較現代化的國家，它將使英國憲法接近法國式的或比利時式的憲法。這個議會將使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獲得最後的勝利。

這樣，資產階級就會更前進一步，因為資產階級內部的進步會擴大和加強他們的統治。

法國似乎是唯一的例外。1830年整個大資產階級獲得的政權一年年越來越限于最富有的大資產者的統治，限于食利者和股票投機分子的統治。他們使大多數大資產者服從他們的利益。以部分廠主和船主為首的少數變得越來越不足道了。現在這少數人和被剝奪了選舉權的中小資產者聯合了起來，在支持改革的宴會上隆重地宣布了這一同盟。這少數人已經不相信有一天能靠現在的選民上台執政。因此經過長期動搖後，他們決定允許比他們地位低的資產者，例如律師、醫生等資產階級思想家參加政權，認為這

是最沒有危險的一伙人。誠然，这少数人还远不能执行他們的諾言。

因此，我們看到在英国几乎已經結束了的資產階級內部斗争，現在即將降臨法国，所不同的只是，在法国，情勢和往常一样总帶有更明显更革命的性質。这样坚决地分为两个营垒也是資產階級的一个进步。

在比利时資產階級在 1847 年的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天主教的内閣被迫辞职，这里直到現在仍然是自由資產者在执政。

在美洲我們看到墨西哥已被征服，这使我們十分高兴²³¹。这个国家一向都仅仅埋头于处理内部事务，在长期的内战中弄得四分五裂，因而丧失了一切發展的可能性，这样一个国家至多只能成为英国工业方面的附屬国，可是現在它被迫卷入了历史运动，这也是一个进步。墨西哥将来受合众国的监护是符合于其自身發展利益的。合众国因兼并加利福尼亚而获得太平洋的統治权，这是符合整个美洲發展的利益的。但我們仍旧要問，首先从战争中获利的是誰呢？只有資產階級。美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及新墨西哥得到了新的地区，他們在这些地区将得到新的資本，即培植出新的資產者并使現有的資產者大發其財，因为現代所获得的全部資本总是都落到資產階級手中去的。而渴望从开凿特万特佩克地峽运河²³²中获利的不是美国船主又是誰呢？从太平洋的統治中获利的不是这些船主又是誰呢？将来以工业品供应被征服的土地上新出現的消費者的不是美国厂主又是誰呢？

因此，在美洲資產者也有了巨大的成績；資產階級的代表現在所以反对战争，那只是証明他們怕在某些方面为这些成績所付的代价太高。

甚至在極不开化的国家里資產階級也有了成績。在俄国，工业一日千里地發展，甚至貴族也逐漸变成資產者。在俄国和波兰，农奴制已受到限制，这意味着貴族的削弱和自由农民階級的出現，前者有利于資產者，后者則为資產階級到处所需要。迫害犹太人，这是定居的基督教市民深为称意的事，因为行商使他們的生意遭到損失。在匈牙利封建主逐漸变成谷物、羊毛及牲畜的批發商，他們在議會中的發言帶有徹底的資產階級性質。在土耳其、埃及、突尼斯、波斯和其他一些未开化的国家，这一切輝煌的“文明”成績不是給未来資產階級的繁荣准备条件又是什么呢？在这些国家里正實現着預言家的話：“为主开路…… 打开大門，敞開世界之門，好讓光荣的皇帝进来！”誰是光荣的皇帝呢？就是資產者。

凡是我們目力所及的地方，資產階級到处都作出了巨大的成績，它昂首闊步，傲慢地向敌人挑战。資產階級期待着决定性的胜利，而且它的希望不会落空。資產階級准备根据自己的标准重新划分全世界，并且在地球的大部分区域内作到了这一点。

我們并非資產階級的朋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这次我們很希望他們胜利。資產階級特别是德国的資產階級，对似乎微不足道的少数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那种傲慢态度，我們可以一笑置之。我們一点也不反对資產階級到处實現他們的願望。

不仅如此，當我們看到資產者在几乎处处都是得心应手的时候所表現的那种儼然不可一世、得意忘形的样子，我們不禁要报以冷笑。这些先生真的以为，他們是在替自己干。他們鼠目寸光，以为他們一胜利世界就会最后改变面貌。可是很明显，他們到处都只是為我們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开辟道路，他們充其量只能提心吊胆地享几年福，然后，很快也会被打倒。資產者的背后到处

都有无产阶级，他们有时同意资产者的愿望及资产者的部分幻想，象在意大利和瑞士那样；有时保持沉默、行动谨慎，却逐步地准备推翻资产者，象在法国和德国那样，有时他们公开起义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象在英国和美国那样。

但我们还可以作得更多。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直截了当地告诉资产者，可以向他们摊牌，让资产者事先知道，他们的努力只会使我们获益。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能停止对君主专制和贵族僧侣的斗争。他们必然是要末取得胜利，要末立刻灭亡。

在德国他们很快就会来向我们求援。

那末，资产者大人先生们，勇敢地继续你们的战斗吧！现在我们需要你们，我们在某些地方甚至需要你们的统治。你们应该替我们扫清前进道路上的中世纪残余和君主专制。你们应该消灭宗法制，实行中央集权，把比较贫穷的阶级变成真正的无产者——我们的新战士。你们应该通过你们的工厂和商业联系为我们建立解放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为了奖励这一点，你们可以获得短期政权。你们可以支配法律，作威作福。你们可以在王宫中欢宴，娶艳丽的公主为妻，可是别忘了

“刽子手就站在门前”²³³。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1月20日左右

载于1848年1月23日“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第7号

署名：弗·恩·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魯塞尔报”

弗·恩格斯 奥地利末日的开端

已故的皇帝弗兰茨曾说过：“我和梅特涅还支持得住。”如果梅特涅不想让他的主子落得吹牛大王之名，那末他就应该趁早死掉。

由继承和窃得的小块土地拼成的七零八落的奥地利君主国，这个由十种语言和民族构成的混乱局面，这堆由绝对矛盾的习俗和法律乱七八糟凑成的东西，终于开始土崩瓦解了。

可敬的德国市民多少年来一直都在竭力恭维管理这架支离破碎的国家机器的人，恭维那个懦怯的骗子手和背信弃义的凶手梅特涅。达来朗、路易-菲利浦和梅特涅（这是三个极其平庸的人物，因而非常适合于当前的平庸时代）在德国市民的眼里是三十年来象傀儡戏中提线人似的左右着全世界历史的三位神明。根据自己的日常经验，这些可敬的市民把历史仅仅看成酒店里的密谋和妇人的谰言诽谤，只不过规模稍大一些而已。

诚然，革命的激流和拿破仑的三次侵袭对任何国家都没有象对奥地利那样不留丝毫痕迹。诚然，在家长的大棒保护下的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婢膝的庸俗气味在任何国家里都不象在奥地利那样完整无损。可是，难道这一切都是梅特涅干的吗？

奥地利王室之所以强大、稳固而富有生命力，原因是什么呢？

早在中世紀的后半期，意大利、法国、英国、比利时以及德国的北部和西部都已紛紛摆脱了封建的野蛮状态，那里的工业已經發展起来了，商业扩大了，城市兴起了，市民取得了政治势力，在这样的时候，德国的一部分却落后于西欧的發展水平。資產階級文明沿着海岸、順着江河传播开来。內地，特别是貧瘠而交通阻塞的山区就成了野蛮和封建的避难所。这种野蛮特别集中于远离海洋的南部德意志和南部斯拉夫区域。这些远离海洋的地方因阿尔卑斯山脉而跟意大利的文明隔絕，因波希米亚山脉和莫拉維亞山脉而跟北德意志的文明隔絕，同时碰巧又都位于欧洲唯一反动的河流的流域之內。多瑙河非但没有为它們开辟通向文明的道路，反而將它們和更加粗野的地区連接了起来。

既然西欧由于資產階級文明而形成了一些大君主国，那末多瑙河上游的那些国家也該联結成一个君主政体的大国才是。仅仅为了防守就需要这样做。在这里，在欧洲中部，操各种語言的各族野蛮人都集結在哈布斯堡王室的王笏之下了。这一片野蛮地区的核心就是匈牙利。

多瑙河、阿尔卑斯山脉、波希米亚的悬崖峭壁，这就是奥地利的野蛮和奥地利君主国賴以存在的基础。

如果說哈布斯堡王朝一度支持过市民反对貴族，支持过城市反对王公，那只不过是出于一个大君主国一般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存在。如果說这个王朝后来又一次支持小資產者，那也是由于在欧洲的其余部分这些小資產者本身对于大資產階級已經开始起着反动的作用。哈布斯堡家族在前后两种情况下援助小資產者都抱了一定的反动意圖。不过現在这种手段已无济于事了。

可見，奥地利王室一开始就是欧洲的野蛮、保守和反动的代

表。因山区交通阻塞而更加巩固的宗法关系产生愚昧，野蛮又造成冥頑鄙野，而奥地利王室的权力正是以此为基础的。風俗習慣、性格、制度絕然不同的一打民族由于对文明有着共同的反感而团结起来了。

可見，只要奥地利王朝的臣民不改变他們的野蛮状态，奥地利王朝就是不可战胜的。因此，威胁着它的只有一种危险，那就是资产阶级文明的渗入。

然而不可避免的正是这种危险。资产阶级文明可能暂时被阻止；它也可能在一个时期内适应并屈从于奥地利的野蛮。但是资产阶级文明迟早总会征服封建的野蛮状态，而唯一串联那些習性殊异的地区的紐带也就会綳断。

奥地利政策之所以消極动摇、胆小如鼠、卑鄙龌龊、阴险奸詐，原因就在于此。奥地利已不能象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地野蛮了，因为它每年都得向文明讓步，而且一年年地愈来愈不能信任它的臣民了。每一个坚决的步驟在国内或邻邦都会引起某种变化；而每一种变化又都会成为奥地利借以勉强抵御現代文明浪涛的堤壩上的裂痕；一旦發生任何变化，第一个牺牲者将是跟野蛮形影不离的奥地利王朝本身。在1823年和1831年奥地利还能用炮弹把皮蒙特、那不勒斯和罗曼內的起义者轟跑²³⁴；到1846年，在加里西亚它就不得不使尙未發展的革命因素——农民也投入运动²³⁵；到1847年奥地利則不得不把它的軍隊停止于費拉拉城下而在羅馬城內搞阴谋活动²³⁶。反革命的奥地利竟然使起革命的手段，这显然証明它已快完蛋了！

1831年的意大利起义和1830年的波兰革命都已經被鎮压，法国资产阶级也保証以后要規規矩矩，現在弗兰茨皇帝可以安息了；看

来，連他的沒有头脑的后代[⊖]也能站得住脚的平凡的时代已經来到了。

这个加冕的白痴的帝国暂时还不受革命的威胁。但是誰能担保它不产生引起革命的原因呢？

只要工业还保存着家庭手工业的性質，只要每一农户或至少每一农村所需的工业品都还是自行生产而極少仰求商业，那末工业本身就始終是封建性的工业，并且同奥地利的野蛮状态正好合拍。只要这一工业还停留在工場手工业和农村工业的水平，只輸出少量的內地产品而很少进行对外貿易，它就只能存在于一定的区域并且很容易适应于奥地利的 *status quo* [现状]。既然在英国和法国工場手工业才只形成了少数大資產阶级，那末在人口稀少而偏僻的奥地利它至多只能形成一些中層等級，而且还仅限于个别地方。只要手工劳动一直都占統治地位，奥地利就能平安无事。

但是机器發明了，而机器又引起了手工劳动的衰落。工业品价格的暴跌，首先引起了工場手工业的崩潰，然后又使最古老的封建的家庭工业也漸漸瓦解。

奥地利企圖用徹底执行保护关税制度来躲避机器。但是枉費心机。保护关税制度恰好促使机器輸入奥地利。波希米亚的棉紡織工业發展起来了，倫巴第的机器絲紡业發展起来了，在維也納甚至开始出現了机器制造业。

后果也就接踵而来了。工場手工业的工人断絕了生路。工場手工业地区的居民全被迫放弃他們熟悉的生活方式。从过去的小市民中产生了大資產者，他們支配着千百个工人，就象他們的邻居

⊖ 斐迪南一世。——編者注

公爵和伯爵們支配着千百个徭役农民一样。徭役农民，由于旧工业的瓦解就丧失了原有的副业，由于新工业的發展却出现了新的需求。封建的农业經營方法已經无法同現代工业并存。徭役已必須取消。农民和地主間的封建关系已不可能繼續存在。城市相繼兴起来了。行会已使消費者受到限制，对行会會員不利并使工业家无法忍受。必須逐步准許竞争了。社会各階級的状况起了根本的变化。那些旧階級已越来越讓位于新的階級——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同工业比較起来农业的比重已經降低，农村已讓位給城市。

这就是奥地利个别地区——波希米亚和倫巴第使用机器的后果。它們又或多或少地反过来影响了整个君主国；它們到处摧毁了旧的野蛮状态的基础，因而也就摧毁了奥地利王朝的基础。

1831年，当受过严格訓練的奥地利士兵在罗曼內用榴霰弹回答«Viva l'Italia!»〔“意大利万岁！”〕的呼声的时候，英国却建筑起了第一条铁路。正如机器一样，铁路也立即成为欧洲各国所必需的了。因此无论奥地利願意与否，它也必須接受。为了使本来就蒸蒸日上的資產階級的势力不再扩大，政府就亲自动手来建筑铁路。然而这却是才出狼窩，又入虎穴。政府为了防止資产者成立强大的股份公司，只好向他們借款来建筑铁路，因而也就成了路特希尔德、阿恩施坦、埃斯克勒斯、辛納等的債務人。

奥地利王室更不可能避免建筑铁路所引起的后果了。

过去，崇山峻岭使奥地利君主国同外界隔絕，使波希米亚同莫拉維亞以及奥地利隔絕，使奥地利同施梯里亞隔絕，使施梯里亞同伊利里亞隔絕，使伊利里亞同倫巴第隔絕；現在，这种屏障在铁路面前粉碎了。过去各地借以保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和閉关自守的生

活的花崗石岩壁現在再也不能起屏障的作用了。大工业即机器生产的产品飞快地而且几乎不花運費便侵入到君主国的穷乡僻壤，摧毀了古老的手工劳动，鏟除了封建的野蛮。各地相互間的貿易，和其他文明国家的貿易，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流向落后地区的多瑙河已不再是帝国的主要干綫；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森林仿佛已不再存在；一条新的干綫从的里雅斯特伸展到汉堡、奥斯坦德和哈佛尔，远远地伸出帝国的境界，跨过山脉，一直綿延到遥远的北海和大西洋岸边。参与全国的共同事务和干預外界的事态，已經成为必需的了。地方性的野蛮習俗日益消失。在某一些地方利益是分歧的，而在另一些地方則融合为一。有的地方民族彼此分离，有的地方則結合在一起，在一堆杂乱的彼此各不相同的地区，又产生了具有共同願望和共同利益的某些相当大的集团。

“我和梅特涅还支持得住。”的确，法国革命、拿破侖和七月風暴都支持过来了。但是却支持不住蒸气。蒸气开辟了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森林的道路，蒸气使多瑙河失去了作用，蒸气徹底摧毀了奥地利的野蛮，因而也就摧毀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根基。

欧美的公众現在可以高兴地看到梅特涅和整个哈布斯堡王朝怎样为蒸汽机輪撕碎，奥地利君主国又怎样为自己的机車輾裂。这是非常有趣的場面。在意大利一些封侯起来反抗了，而奥地利却不敢吭声；自由主义象瘟疫一般传遍了倫巴第，而奥地利却犹豫不决，在自己的臣民面前胆战心惊。在瑞士，奥地利过去的叛逆者（瑞士旧州的居民）却受到奥地利的保护；他們受到了攻击，但奥地利却被奥克辛本的豪言壯語吓得呆若木鷄。奥克辛本說：“只要一个奥地利士兵踏上瑞士的国土，我就开两万人到倫巴第，宣布成立意大利共和国。”于是奥地利竟徒劳无益地向它所輕視的慕尼黑宮

廷、斯圖亚特宫廷和卡尔斯卢厄宫廷求救来了！在波希米亚各等級拒絕交付5万盾的稅款；奥地利想追收这笔稅款，但是无法从阿尔卑斯山脉抽出軍隊，只好向各等級作平生从未有过的讓步，放弃了5万盾！在匈牙利，議會正在拟定革命的法案，而这一法案預計会得到多数的拥护；奥地利在米兰、摩地納和巴馬都需要匈牙利的輕騎兵，奥地利自己向議會提出了革命的法案，虽然它很清楚这意味着自身的死亡！这个不可动搖的奥地利，这座野蛮習俗的永久靠山不知道該往哪兒去才好。它渾身上下都發出了極可怕的斑疹：搔了前面后面痒，搔了后面又前面痒。

于是随着这一陣奇痒奥地利王室就要嗚呼哀哉了[⊖]。

如果老梅特涅并不急于追随他的“正直的”弗兰茨而去，他还可能看到他那勉强保全的帝国崩潰，看到帝国的大部分落入資產者手里；他还可能遇到那种聞所未聞的耻辱：“庸俗的成衣匠”或“庸俗的雜貨商”在普拉特尔²³⁷就不再向他脫帽致敬，而只称他“梅特涅先生”了。只消再有几次动乱，几次費用浩大的备战，整个奥地利君主国就会落入沙尔·路特希尔德的錢袋。

我們非常高兴看到資產者对奥地利帝国的胜利。我們只希望真正卑鄙齷齪、道地犹太人的資產者能把这个可尊敬的帝国买下来。这个可憎的、以棍棒服人的、“家长制的”、恶劣透頂的政府應該被真正恶劣透頂的、滿身疥疮的、發出恶臭的敌手所征服。不过，梅特涅先生可以相信，以后我們也会无情地对付他的敌手的，就象这个敌手不久将无情地对付梅特涅本人那样。

⊖ 原文是一句俏皮話：《Und mit diesem possierlichen Kratzen kratzt das Haus Östreich ab》。——編者注（德文中“痒”《der Kratz》和“死亡”《abkratzen》在字形上是很相似的。——譯者注）

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奥地利的没落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奥地利的罪过是它使我们落得一个压迫其他民族、充当各国反动雇佣兵的臭名。德国人在奥地利的旗帜下奴役着波兰、波希米亚和意大利。从塞拉库斯到特里延特，从热那亚到威尼斯，德国人都被当做专制制度的卑鄙的雇佣兵而遭到仇视，这一点我们应感谢奥地利君主国。谁只要亲眼看到过意大利人对 tedeschi〔德国人〕的那种不共戴天的仇恨，那种完全正当的切齿痛恨的复仇心理，他就必然会对奥地利恨之入骨，为这座野蛮习俗的靠山、德国的这种耻辱局面的崩溃而拍掌欢呼。

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德国人一定会为了洗雪奥地利加在自己头上的耻辱而向奥地利报仇。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将来摧毁奥地利的统治并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扫清走向自由的道路的，必然是德国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牺牲品已经倒下，只等刀子刺入它的咽喉。愿德国人这一次不放过时机，愿他们有足够勇气说出连拿破仑都没有敢说出的话：

«La dynastie de Habsbourg a cessé de régner!»〔“哈布斯堡王朝再不能统治了！”〕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1月25日左右

载于1848年1月27日“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第8号

署名：弗·恩·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魯塞尔报”

卡·馬克思

2月6日的“社会辯論报”

論民主协会

2月6日的“社会辯論报”²³⁸替布魯塞爾民主协会和它的分部做了辯护。我們想对这个辯护的方法提出几点意見。

也許，比利时激进党是想証明給天主教徒看，他們責难比利时激进党的行动是违背自身利益的。也許，比利时激进党是想把下層僧侶和上層僧侶加以区分，并把全体僧侶恭維一番，以弥补由于它对一部分僧侶說明了真理而引起的后果。究竟为什么，我們完全不清楚。我們只是感到奇怪，“辯論报”怎么会沒有發現，弗兰德斯的天主教报刊对民主协会的攻击会立即轉載在“独立报”²³⁹上，据我們所知，“独立报”并不是天主教的報紙。

“社会辯論报”声称，比利时人力圖通过民主协会来达到政治改革。

我們認為，“辯論报”一时忘記了民主协会的国际性。关于这一点，它恐怕已經忘記不止一次了。“辯論报”只記得：一个力求促使民主在世界範圍內获得胜利的团体，首先應該在本国發揮作用。

“社会辯論报”并不滿足于声称比利时人希望靠民主协会来实现的是什么。它还进一步談到他們不希望靠民主协会来实现的是什么，因而也就是說，作为比利时人，为达到政治改革而建立的协

会的成員所不應該希望的是什么。Avis aux étrangers!〔外国人注意!〕

“辯論报”說：“比利时人想靠民主协会来达到政治改革，这絕不是某些国家的民主主义者的幻想，在那些国家里社会制度不允許存有实行真正改革的希望，因而要想获得已經得到自由的人民所拥有的些微福利就象水中捞月一样。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無論幻想發百万大財，或是幻想取得一百塔勒的地租或利潤，都可以想入非非。”

显然，“辯論报”这里指的是**共产主义者**。

我們要問“辯論报”：“自由”英国的“些微福利”是不是表現在济貧捐比人口增长得快这一点上？

我們要問“辯論报”：它所說的“自由人民所拥有的些微福利”是不是指弗兰德斯居民的貧困？

我們想要知道“辯論报”用100塔勒的利潤或地租来頂替工資的秘密。大概它是把“自由人民所拥有的些微福利”理解成自由的資本家和地主的些微福利了！

最后，我們還要問“辯論报”：布魯塞尔民主协会有沒有委托它去揭露那些不相信“自由人民所拥有的些微福利”的空想家的謊言呢？

不过，“社会辯論报”所議論的显然不是一般的共产主义者，而是**德国共产主义者**，他們由于本国的政治發展既不可能組織德国的同盟，也不可能組織德国的自由协会²⁴⁰，在絕望中只好投入了共产主义的怀抱。

我們要請“辯論报”注意，共产主义的發源地是英国和法国，而不是德国。

德国共产主义是一切空想主义的死敌，它絕不輕視历史發展，

恰恰相反，它以历史發展为憑借；我們暫且向“社会辯論报”証明这一点，以回答它的証明。

德国在政治發展方面落后了，在这方面它还必須走过漫长的道路。我們完全不否認这一点。但是从另一方面來說，我們認為一个拥有四千多万人口的国家要鬧革命的話，是不会到自由小国家的激进主义那里去寻找衡量本国运动的准繩的。

或許，“辯論报”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特別強調階級对立和階級斗争吧？如果是这样，共产主义就不成其为共产主义，而是政治經濟学或資產階級社会了。

我們知道，罗伯特·皮尔曾經預言过由于現代社会的階級对立必然会爆發可怕的危机。我們知道，甚至基佐也認為，他在“文明史”²⁴¹中所描繪的只是階級斗争的某些形式而已。但是，皮尔和基佐都是空想主义者。而实际主义者倒是那些一提到社会現象就認為是违反循規蹈矩的处世秘訣的人。

“社会辯論报”可以随心所欲地称頌北美和瑞士，美化它們。

我們要問“社会辯論报”，北美的政治制度能不能够有一天不經過巨大的社会变革而在欧洲得到實現呢？我們認為，例如（請“辯論报”原諒我們的放肆）要使英国的宪章不是由某些梦想普选权的人来提出，而是由一个全国性的大党来提出，那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把英国工人联合成一个階級；那时，这个宪章的目的就会完全成为另一个样子，它所引起的社会結果也会和美国以及瑞士的宪法所爭取和导致的完全两样。在我們看来，空想主义者正是把政治形式和它們的社会基础分隔开来并把它們当做一般的抽象的教条的那些人。

当談到民主协会因自由貿易問題而引起爭論的时候，“社会辯

論報”对于不滿足于“自由人民所拥有的些微福利”的“某些民主主义者”进行了排斥,这也就向我们表明它是打算怎样来为协会辯护的。

“辯論報”說:“为討論这个極有意思的問題已开了六次会,本城各工厂的許多工人所提出的一些論据,即使在去年9月布魯塞尔的著名的經濟学家會議上也不能認為是不正当的。”

在这以前,“社会辯論報”肯定說,协会几乎一致認為各民族間的絕對自由貿易就是民主的目的。

在这以后,“辯論報”在同一号上刊登了勒·阿尔迪·德·博利約先生的一篇由英国自由貿易派的殘羹剩飯湊合成的非常平淡的演說。

而在結束时称贊了科布頓。

原来协会大多数人所支持的自由貿易就是經濟学家會議所理解的自由貿易,就是資產階級自由貿易派所理解的自由貿易,經過“社会辯論報”这一番闡述之后,誰还会怀疑这一点呢?

卡·馬克思写于1848年2月10日左右

載于1848年2月13日“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第1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德意志—布魯塞尔报”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弗·恩格斯

三个新宪法

說实在的，我們关于资产阶级即将获得胜利的預言[⊖]应驗得比我們所能預期的还要快。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時間內，三个君主专制国家(丹麦、那不勒斯和撒丁)都变成了立宪国家。

在意大利，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了。教皇領地、托斯卡納、撒丁，一个接着一个站到了这一运动的最前列；一个国家推动着另一个国家前进，一个进步的举动每次都引起了某种新的进步举动。意大利的关税同盟²⁴²是組織意大利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步骤，意大利资产阶级坚决地领导了民族运动，它和奥地利之間的冲突也就愈来愈尖銳了。资产阶级几乎获得了君主专制时代可能获得的一切；代議制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然而意大利资产者的困难也正是在于使立宪制度获得胜利。君主們并不欢迎这些制度，资产者也不能过分地威胁他們，以免重新把他們推向奥地利的怀抱。参加关税同盟的意大利人如果不是完全出乎意料地突然得到西西里島起义的支援的話，那就还得等待一个很长的时期。巴勒摩的人民表现了史无前例的英雄气概，赶跑了城里的国王軍隊[⊙]。

⊖ 見本卷第 505—515 頁。——編者注

⊙ 巴勒摩的 20 万居民战胜了 13 000 士兵，巴黎的 100 万居民在七月革命时期战胜了七八千士兵。——編者注

阿布卢齐、亚浦利亚和卡拉布利亚再度进行了起义的尝试，就在那不勒斯城里进行了战斗的准备。嗜血成性的斐迪南四面楚歌，依靠奥地利军队的希望也破灭了，他成了意大利君主中第一个被迫同意颁布宪法和允许出版完全自由的人。这一消息传到了热那亚和都灵；两个城市都要求撒丁不落在那不勒斯的后面。查理-阿尔伯特被深深地拖入了运动，以致后退不得，又加上缺少对付奥地利的军事准备费用，就被迫在都灵人和热那亚人的非常强硬的要求面前让步，也同意了颁布宪法。毫无疑问，托斯卡纳一定会跟上来，就连庇护九世也得做新的让步。

在巴勒摩街头，意大利资产阶级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它胜利了，接着应该做的就是：全面地利用这一胜利，保卫胜利的成果免遭奥地利的侵犯。

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这一胜利对奥地利来说是一个新的失败。老梅特涅想必是暴跳如雷了！他早就预料到那不勒斯会发生革命，曾多次坚决要求教皇和托斯卡纳允许他的军队通过，可是却仍然不得不让他的潘都尔兵^①和克罗地亚兵^②滞留于波河北岸。那不勒斯接二连三地派来了信使；斐迪南、科克勒和德尔·卡烈托不断向他求援，而梅特涅，这个曾在1823年和1831年作为一个万能的统治者统治过意大利的英雄今天却无能为力了。他只能静静地眼看他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最忠诚的同盟者被粉碎、遭污辱，眼看革命把整个那不勒斯放到不利于奥地利的天平盘上去。而他的15万士兵却停留在波河北岸！但是英国并没有睡觉，奥地利人跨过波河就会成为他们占领威尼斯和轰炸的里雅斯特的信号，因此残

① 以残暴著名的从前的匈牙利步兵。——译者注

② 在三十年战争之前和骠骑兵建立以前匈牙利轻骑兵的称号。——译者注

暴的梅特涅匪帮只好手执武器，踏步不前，眼巴巴地看着那不勒斯从自己的手中溜走。

在意大利發生这一切事变的时期，英国的举止是非常体面的。其他的列强（无论是法国或俄国）都千方百计地援助梅特涅，只有英国站在意大利运动方面。英国资产阶级非常希望奥意的保护关税协定瓦解，而反过来促使在意大利建立以自由貿易为基础的反奥关税同盟。这也就是英国支持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原因，而意大利资产阶级为了本身的发展，目前也需要自由貿易，因而也就成为英国资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

同时奥地利正在武装自己。这种軍备扩展使它的財政彻底破产了。奥地利沒有經費，只好向路特希尔德借債；路特希尔德声明，他不希望战争，因而不能資助战争。既然象英国这样的国家可能进来干預，还有哪一个銀行家会借錢給腐朽透頂的奥地利君主国来从事战争呢？因此，梅特涅再要指靠资产阶级已經是不可能了。俄国皇帝几年前靠烏拉尔和阿尔泰矿山以及谷物貿易也成了大资本家，这位白色沙皇帮助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1 500 万銀卢布，看来已經完全变成一切沒落的君主专制国家的路特希尔德了。現在，梅特涅就向他求救。听说沙皇尼古拉答应給 7 500 万，当然是以俄国利息和可靠的保証为条件。这是再好不过的事。如果沙皇除了本国的花費之外，还要抵偿普魯士和奥地利王朝的費用，如果他的錢要浪費在无益的反对意大利的軍备上，那末他的財富很快就会耗尽。

奥地利敢不敢發動战争呢？我們認為未必敢。它的財政破产了，匈牙利在激烈的騷动中，波希米亚也不可靠。而在战场上，在倫巴第，地下到处都会冒出游击队来。但是梅特涅最害怕的是英

国。目前帕麦斯顿勋爵是欧洲最强有力的人物。他的立场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这次他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在欧洲的另一端，在丹麦，国王[⊖]已奄奄一息。他的儿子[⊗]，愚蠢的快活的酒鬼立刻召集名士、等级代表委员会来开会，讨论公国[⊙]和丹麦的统一宪法。为了让德国人到处出丑，公国就应当声明不愿接受这个宪法，因为这个宪法会使它们脱离自己的大德意志祖国！²⁴³

这件事的确可笑。公国的居民要比丹麦的居民少得多，却仍然得到同等数量的代表席位。他们的语言无论在会议上或是在记录里，确实是到处都同样有权使用。简言之，丹麦人对德国人做了一切可能做的让步，而德国人却固执地不愿放弃庸俗的民族自尊心。德国人在民族利益和进步利益相符合的场合，从来也不坚持民族立场；可是在民族的和进步的相对立的时候，他们却总是坚持民族立场的。在应该站在民族立场上的场合，他们扮演起世界主义者的角色；而在没有必要直接站在民族立场上的时候，他们却又坚守民族的立场到荒唐的地步。他们在各方面都成为人的笑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公国的居民都是能干的人，并且他们在自己的发展方面超过了丹麦人，那末他们在等级院里就会获得对丹麦人的优势，因而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或者他们，德国笨汉们不论在工业和政治的发展方面都落后于丹麦，那末早就应该让丹麦人拖着他们走了。强壮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向4 000万德国人求援以反对丹麦人，并且拒绝走上战场，其实在那

⊖ 克里斯提安八世。——编者注

⊗ 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

⊙ 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编者注

里他們所要遇到的战斗条件是和自己的敌人所处的战斗条件完全相同的，这真是荒謬絕倫的事情；他們向德意志联邦的警察求援以反对宪法，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

正如那不勒斯的宪法对于奥地利來說是一个打击一样，丹麦的宪法对于普魯士來說也是一个打击，虽然丹麦的宪法本身只不过是2月3日的一次沒有成功的普魯士宪法試驗的反应而已。普魯士政府除了已有的許多困难之外又增加了一項困难，这就是和一个新的立宪国家毗邻；可是却失去了一个忠誠的藩臣和同盟者。

因此，意大利和丹麦都列入了立宪国家的行列，而德国却落在后面。各族人民都在前进；最小的和最弱的民族总是能够在欧洲的事变中找到便利的时机，不顧强大而反动的邻邦的意志而在本国实施一連串现代化的制度。只有4000万德国人原封未动。固然他們已不再沉睡，但是却仍然在說空話，玩弄毫无意义的政客伎俩，而不去进行实际工作。

但是如果德意志各邦政府还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資產階級这种害怕行动的心理上，那它們就大錯而特錯了。德国人将最后出动，因为他們的革命将完全不同于西西里島的革命。德国的資產者和小市民非常清楚，在他們的背后站着日益壮大的无产者，无产者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会提出完全不是这些資產者和小市民所希望的要求。因此，德国的資產者和小市民才表现出胆怯、犹豫和动摇；他們害怕冲突的程度并不亚于政府。

德国革命的意义比那不勒斯革命的意义重要得多。在那那不勒斯互相对抗的只有奥地利和英国；在德国革命中将是整个西方对抗整个东方。那不勒斯的革命只要爭得激进的資產階級制度就算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德国的革命在达到这一点的时候，实际上却只

是刚刚开始。

因此，德国人首先必定会在其他一切民族的面前把自己的名声弄得一败涂地，他们必定会比今天更加成为全欧洲的笑柄，必须迫使他们起来革命。到那时候他们就会真正站起来，不过那不是胆怯的德国庸人们，而是德国的工人；他们将起来彻底结束肮脏的和摇摇欲坠的德国当局的统治，而通过激进的革命来恢复德国的荣誉。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2月中旬

载于1848年2月20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1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論波蘭問題²⁴⁴

1848年2月22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
1846年克拉柯夫起義兩周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

馬克思的演說

先生們！

歷史上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1793年的雅各賓黨人成了今天的共產主義者。1793年俄羅斯、奧地利、普魯士瓜分波蘭的時候，這三個強國就以1791年的憲法為借口，據說這個憲法具有雅各賓黨的原則因而遭到一致的反對。

1791年的波蘭憲法到底宣布了什麼呢？充其量也不過是君主立憲罷了，例如宣布立法權歸人民代表掌握，宣布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公開審判、廢除農奴制等等。所有這些當時竟被稱為徹頭徹尾的雅各賓原則！因之，先生們，你們看到了吧，歷史已經前進了。當年的雅各賓原則，在現在看來，即使說它是自由主義的話，也變成非常溫和的了。

三個強國和時代并駕齊驅。1846年，因為把克拉柯夫歸併給奧地利而剝奪了波蘭僅存的民族獨立，它們把過去曾稱為雅各賓原則的一切東西都說成是共產主義。

克拉柯夫革命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由于这革命的目的是复兴波兰民族，因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要是这么說，欧洲同盟为拯救民族而反对拿破侖的战争何尝不可以說成共产主义的战争，而維也納會議又何尝不可以說成是由加冕的共产主义者所組成的呢？也許由于克拉柯夫革命力圖建立民主政府，因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吧？可是，誰也不会把共产主义意圖妄加到伯尔尼和紐約的百万豪富身上去。

共产主义否認階級存在的必要性；它要消灭任何階級，消除任何階級的差別。而克拉柯夫革命家只希望消除階級間的政治差別；他們要給不同的階級以同等的权利。

到底在哪一点上說克拉柯夫的革命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

也許是由于这一革命要粉碎封建的鎖鏈，解放封建劳役的所有制，使它变成自由的所有制，現代的所有制吧？

要是法国的私有主說：“你們可知道波兰的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什么？波兰民主主义者企圖采用你們目前的所有制形式。”那末，法国的私有主会回答說：“他們干得很好。”但是，要是和基佐先生一同再去向法国私有主說：“波兰人要消灭的是你們 1789 年革命所建立的、而且如今依然在你們那里存在的所有制”。他們定会叫喊起来：“原来他們是革命家，是共产主义者！必須鎮压这些坏蛋！”在瑞典，废除行会和同业公会，实行自由竞争現在都被称为共产主义。“辯論日报”还更进一步，它說：剥夺 20 万选民出卖选票的收益，这就意味着消灭收入的来源，消灭正当获得的财产，这就意味着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毋庸置疑，克拉柯夫革命也希望消灭一种所有制。但这究竟是怎么样的所有制呢？这就是在欧洲其他地方不可能消灭的东西，正如在瑞士不可能消灭分离派同盟一样，

因为两者都已不再存在了。

誰也不会否認，在波兰，政治問題是和社会問題联系着的。它們永远是彼此不可分离的。

但是，最好你們还是去請教一下反动派吧！难道在复辟时期，他們只和政治自由主义及作为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的伏尔泰主义这一沉重的压力战斗嗎？

一个非常有名的反动作家坦白承認，不論德·梅斯特尔或是博納德的最高的形而上学，最終都可以归結为金錢問題，而任何金錢問題难道不就是社会問題嗎？复辟时期的活动家們并不諱言，如要回到美好的旧时代的政治，就应当恢复美好的旧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道德的所有制。大家知道，不納什一稅，不服劳役，也就說不上对君主政体的忠誠。

讓我們再回顧一下更早的时期。在1789年，人权这一政治問題本身就包含着自由竞争这一社会問題。

在英国又發生了什么呢？从改革法案开始到废除谷物法为止的一切問題上，各政党不是为改变财产关系而斗争又是为什么呢？他們不正是为所有制問題、社会問題而斗争嗎？

就在这里，在比利时，自由主义和天主教的斗争不就是工业資本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嗎？

难道这些討論了十七年之久的政治問題，實質上不正是社会問題嗎？

因而不論你們抱什么观点（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好，激进主义的观点也好，甚至貴族的观点也好），你們怎么能責难克拉柯夫革命把政治問題和社会問題联系在一起呢？

領導克拉柯夫革命运动的人深信，只有民主的波兰才能获得

独立，而如果不消灭封建权利，如果没有土地运动来把农奴变成自由的私有者，即现代的私有者，波兰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你们使波兰贵族去代替俄罗斯专制君主，那只不过是使专制主义改变一下国籍而已。德国人就是在对外的战争中也只是把一个拿破仑换成了三十六个梅特涅的。

即使俄罗斯的地主不再压迫波兰的地主，骑在波兰农民脖子上的依旧是地主，诚然，这是自由的地主而不是被奴役的地主。这种政治上的变化丝毫也不会改变波兰农民的社会地位。

克拉柯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虽然这次革命暂时被雇佣凶手的血手所镇压，但是现在它在瑞士及意大利又以极大的声势风起云涌。在爱尔兰，证实了这一革命原则是正确的，那里狭隘的民族主义政党已经和奥康奈尔一起死亡，而新的民族政党首先就要算是改革派和民主派的政党了²⁴⁵。

波兰又重新表现了主动精神，但这已经不是封建的波兰，而是民主的波兰，从此波兰的解放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主义者的光荣事业。

恩格斯的演说

先生们！

今天我们纪念的这次起义并没有获得成功。在几天的英勇抵抗以后，克拉柯夫陷落，波兰的血淋淋的幽灵一度在它的凶手的眼前出现，现在又进入了坟墓。

克拉柯夫革命結果是失敗了，這次失敗是非常慘痛的。讓我們對犧牲的英雄們致以崇高的敬意，並對他們的失敗深表惋惜，對因這次失敗而遭受更大奴役的2000萬波蘭人民，表示我們深切的同情。

但是，先生們，難道我們應該做的就只有這些嗎？在不幸的國家的墓地上痛哭一場，並發誓永遠痛恨奴役波蘭的人，同時却毫無作為，難道這就算完事了嗎？

不，先生們！克拉柯夫起義的紀念日不僅是悲痛的日子；對我們民主主義者來說，這也是一個慶祝的日子，因為失敗本身中就包含着勝利，而且這一勝利的果實我們已經鞏固地取得，失敗只是暫時的。

同時，這個勝利也是年輕的民主的波蘭對老朽的貴族的波蘭的勝利。

是的，在波蘭為反對外國奴役者進行最後的鬥爭以前，波蘭內部就已進行着隱蔽的、秘密的，但又堅決的鬥爭，這是被壓迫的波蘭人反對壓迫的波蘭人的鬥爭，波蘭的民主政治反對波蘭的貴族政治的鬥爭。

比較一下1830年和1846年，比較一下華沙和克拉柯夫吧。1830年波蘭的統治階級在立法會議上表現得那樣自私、狹隘和懦弱，但在戰場上卻又表現得那樣富有自我犧牲的精神，滿懷着堅毅和勇氣。

1830年的波蘭貴族所希望的是什麼呢？就是保衛已得的權利不受帝王方面的侵犯。貴族把起義局限於維也納會議樂於稱為波蘭王國的一塊不大的地區；不讓波蘭其他地方也爆發起義；農民的農奴身份原封未動，依舊过着非人的牛馬生活；猶太人依舊處於屈

辱的地位。如果在起義過程中，貴族不得不向人民讓步，那也只是在最後，當起義已經注定要失敗了的時候。

直截了當地說，1830年的起義既不是民族革命（波蘭的 $\frac{3}{4}$ 沒有卷入起義），也不是社會的或政治的革命；這次起義一點也沒有改變人民的內部狀況；這是一次保守的革命。

可是在這次保守的革命的內部，就在國家的政府中，有人尖銳地批判了統治階級目光短淺。他提出一些確實是革命的措施，這些大膽的措施使議會里的貴族感到惶恐。他號召整個舊波蘭拿起武器，把波蘭獨立戰爭變成歐洲戰爭，賦予猶太人及農民以公民權利，把土地分給農民，在民主與平等的基礎上改造波蘭，——他通過這些號召摸索着變民族鬥爭為爭取自由鬥爭的道路；他力圖使一切民族的利益和波蘭人民的利益等同起來。這個人的天才訂出了如此廣泛而又簡單的計劃，要不要提一下他的名字呢？這人就是列列韋爾。

1830年，多數派貴族利令智昏，總是拒絕這些建議。但這些思想在十五年之久的奴隸生活考驗下成熟起來，而且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我們看到克拉柯夫起義的旗幟上就寫着這些原則。在克拉柯夫，顯然已經沒有什麼可能經受巨大損失的人了；那里已經完全沒有貴族了。每一個既定步驟都具有民主勇氣，這種勇氣，我可以說，很象無產階級的勇敢。無產階級除了貧困以外，什麼也不會失去，而得到的則是整個祖國，整個世界。這裡沒有任何猶豫和懷疑的余地。三個強國立刻發起進攻，宣布農民的自由、土地改革、猶太人的公民平等，絕不因為這會觸犯一些貴族利益而躊躇不前。

克拉柯夫革命既不想恢復舊波蘭，也不想保持外國政府還原封不動地保存着的古代波蘭制度；這次革命既不是反動的，也不是

保守的。

不，克拉柯夫革命敵視波蘭本身，敵視這個以奴役大多數人民為基礎的陳旧的、野蠻的、封建的、貴族的波蘭，更甚於敵視波蘭的外國壓迫者。克拉柯夫革命絕不是要恢復這陳旧的波蘭，而是要徹底消滅它，並且在它的廢墟上依靠完全新的階級，依靠廣大人民，建立新的、現代的、有文化的、民主的、不愧為 19 世紀的波蘭，要波蘭真正成為捍衛文明的先進戰士。

1830 年和 1846 年之間存在着差別；遍地血腥，任人宰割的極端不幸的波蘭有了巨大的進展；投入祖國壓迫者懷抱的波蘭貴族完全和波蘭人民分離；波蘭人民堅定不移地轉到民主方面；在波蘭，正如在我們這裡一樣，出現了階級鬥爭這一個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克拉柯夫革命的民主勝利就在於此，起義的結局就在於此，而當起義者為失敗而雪恥時，目前的結局還會帶來更多的果實。

是的，先生們，由於克拉柯夫起義，波蘭問題已由過去的民族問題變成各國人民的問題，已由過去的同情對象變成與一切民主主義者有切身關係的問題。1846 年以前，我們應該對罪行報仇；而現在，我們應該擁護同盟者，而且我們一定會這樣做。

我們德國首先應該為波蘭湧起的民主浪潮而高興。我們自己在最近期內也將完成一次民主革命；我們將要同奧地利及俄羅斯的野蠻匪幫進行鬥爭。在 1846 年以前，我們還可以懷疑，如果德國發生民主革命，波蘭將站在哪一邊。現在，克拉柯夫革命把一切疑慮都打消了。從今以後，德國人民和波蘭人民便緊密地聯結在一起。我們有着共同的敵人，共同的壓迫者，因為俄羅斯政府也象壓迫波蘭人一樣地壓迫着我們。無論是解放德國，無論是解放波

兰,其首要条件是根本改变德国目前的政治状况,推翻普魯士和奥地利,把俄罗斯逐出德涅斯特河和德維納河之外。

因而,我們两个民族的同盟既不是什么美梦,也不是什么幻想;不,先生們,这个同盟是我們两个民族的共同利益所絕對必要的,而且由于克拉柯夫革命,它已成了一种必然的东西了。迄今为止,德国人民对自己事业的热心几乎只表現在口头上。为了我們波兰兄弟的利益,現在應該見諸行动了;并且象我們在座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向波兰民主主义者伸出手来一样,所有德国人民将庆祝在第一次战斗的戰場上同波兰人民結成的同盟,因为在这次战斗中,我們共同的力量将战胜我們共同的压迫者。

載于1848年3月布魯塞爾出版的
“布魯塞爾慶祝1846年2月22日
波兰革命兩周年紀念文集”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文集

弗·恩格斯 致“改良报”²⁴⁶

魯卡的“改良报”回答了奧格斯堡的“总匯报”上的一篇卑劣的論文，这篇論文是“总匯报”經常按照維也納宮廷总务府的指示所發表的論文中的一篇。

下流的雷赫报纸²⁴⁷不仅把奧地利 518 000 兵士对他們昏君斐迪南的忠誠捧上了天，而且还断定这些兵士（波希米亞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克羅地亞人、海杜克^①、瓦拉几亞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等）想望着德国的統一，只要皇上有意于此，他們就願为統一而捐軀！

好象糟糕的并不是当奧地利还存在的时候，德国就必须冒險讓海杜克、克羅地亞人、瓦拉几亞人来保衛自己的統一；好象当奧地利存在的时候，德国的統一除了同克羅地亞人、瓦拉几亞人、馬札兒人和意大利人統一而外，还可能有什么別的办法！

“改良报”非常中肯地回答那个“極下賤的”^②，斥責它那种說

① 匈牙利的一种馬札兒人雇傭步兵。1605年德兰士瓦尼亞公爵斯蒂芬·博奇科伊由于他們在反抗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1276—1918）的斗争中有功，賜給他們貴族特权，并授以大片領土。——譯者注

② 俏皮話，《Allgemeine Zeitung》是“总匯报”，而《All-Gemeine》則是“極下賤的”。——編者注

什么奥地利在倫巴第保衛着德意志民族利益的謬論，最后，“改良报”把 1848 年的意大利运动和 1813 年及 1815 年的德国解放战争相提并論，对德国人發出号召。

显然，“改良报”想借此对德国人恭維一番，否則，它决不会作出违心之事，竟把現代进步的意大利运动和这些反动的战争相提并論。正是由于这些反动的战争，意大利才受到奥地利的奴役，德国又回复了过去的極度混乱、分裂和暴政的統治，而整个欧洲則訂下了 1815 年可耻的条約。

“改良报”可以相信我們，德国不仅已从这些战争的結果，而且从这些“光荣”时代的英雄們的凄慘的下場里清楚地認識到解放战争的性質。只有卖淫式的官方报纸才会竭力称頌这如醉如狂的时代。众人对此則嗤之以鼻，甚至鉄十字勳章也将为之赧然。

正是这些报纸，正是这些 1813 年的以吞掉法国人为快的人，現在又象他們过去对法国人那样，对意大利人狂吠，頌揚奥地利、基督教德意志的奥地利，并鼓吹發动一次十字軍远征来惩治拉丁民族的狡猾和輕率；因为意大利人本来就和法兰西人一样都屬於拉丁民族！

如果意大利人想举例說明，他們从解放时代的那些拙劣的吹牛家身上能指望些什么，这些紅头髮的幻想家对意大利民族又有什么看法，我們可以引用奥·阿·路·福倫的一首著名的歌曲²⁴⁸給他們：

来，我們来贊美边疆，
那里有曼陀令和吉他的低奏，
金色的橙子透过茂密的叶丛中閃閃發光；
我爱那德意志李子紅得發紫，

也爱那勃斯多尔夫^①苹果的紅光

以及諸如此类的永远明达的人的詩意的狂妄的果实。然后就是关于匪徒、匕首、火山、拉丁民族的狡黠、意大利妇女的不貞、臭虫、蝎子、毒药、毒蛇、凶手等等極可笑的观念。道貌岸然的李子爱好者在意大利每走一步都会产生不少这样的錯觉。最后，好幻想的庸人感謝着他的上帝，因为他处在爱情与友誼的国家里，处在用板凳腿打架的国家里，处在碧眼而忠实的牧师的女兒的国家里，处在正直和純朴的国家里，总而言之在德意志式的忠实的国家里。1813年英雄們的脑子里填滿了这种对意大利的迷信的幻想，不用說，他們是从未見過意大利的。

“改良报”和从事意大利运动的所有活动家可以深信，德国的輿論坚决支持意大利人。德意志人民也和意大利人民一样，迫切希望奥地利垮台。德国人民对意大利人的每一个成就都感到欢欣鼓舞，同时，我們希望在适当时机，德意志人民将为永远結束整个奥地利的統治而投入战斗。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2月22日左右

載于1848年2月24日“德意志—
布魯塞尔报”第16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德意志—
布魯塞尔报”

^① 德国萊比錫附近一村名。——譯者注

弗·恩格斯 巴黎的革命

1848年的情况很顺利。抱着一套套宪法的西西里革命刚刚一闪而过，巴黎就发生了胜利的起义。

反对派代表公开宣称要以勇敢的游行示威来捍卫集会权，以防基佐、杜沙特尔和阿贝尔对它的侵犯。

一切准备均已就绪。餐厅已布置好，正待客人赴宴。当行动时刻到来时，忽然间，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左派胆小鬼，和往常一样，怯懦地退却了。

宴会停止了。但是巴黎人民是不甘心退却的，因为他们受了众议院吹牛大王的刺激，对这些庸人的怯懦心理极为愤慨，并对持久的普遍失业现象表示不满。

星期二^①晌午时分，所有巴黎居民都拥到街头去了。群众高呼：“打倒基佐，改革万岁！”人民冲向基佐的官邸，军队都几乎保护不了，窗户玻璃被打得粉碎。

群众同时又向奥迪隆·巴罗家拥去，大声呼喊：“打倒巴罗！”他家的窗户玻璃也同样被打得粉碎。巴罗先生，即这位吓破胆的肇事罪魁，就要求政府……派遣警卫队保护！

① 即1848年2月22日。——编者注

軍隊站在一旁，並沒有加以干涉。只有市近衛軍開了槍，並且行為異常殘暴。市近衛軍主要是從亞爾薩斯人和洛林人，即半德意志人中招募來的，每人每天的薪金是三個半法郎；他們的身材高大而且喂得很肥壯。市近衛軍是當時所有軍隊中最卑鄙無恥的軍隊，他們比憲兵還壞，比舊日的瑞士近衛軍還壞；一旦人民獲得勝利，這支軍隊就得倒霉。

傍晚時分，人民起而反抗。他們建築街壘，攻下前哨防禦工事並縱火燒毀。在巴士底廣場上一個警察密探被殺死。武器鋪也被搗毀。

五點鐘時，國民自衛軍接到了總攻擊的信號。但是出來的只有極少數人，而且這些人還高喊“打倒基佐！”的口號。

入夜，一切都重新平靜下來。最後一些街壘被佔領了，騷動似乎已告結束。

但是星期三的早晨，起義又重新爆發。蒙馬特爾街以東巴黎市中心的一大塊地區都築起了街壘；從十一點鐘起，軍隊就不敢向那兒接近。國民自衛軍聚集了大批兵力，但只不過是為了迫使士兵放棄向人民進攻，以便宣布：“打倒基佐，改革萬歲！”

按照熱拉爾元帥制定的防禦計劃²⁴⁹，巴黎的5萬名士兵也投入了戰鬥，於是他們就佔領了全部戰略據點。可是這些據點太多了，使得所有軍隊只能招架不能還手。除市近衛軍外，幾乎沒有一支軍隊採取過攻勢。熱拉爾的宏大計劃原來對起義倒有莫大好處；它使軍隊癱瘓，使這些本來就處於被動的軍隊更加陷於被動。彼此隔絕的堡壘反而對政府不利。而那些堡壘里又必須留衛戍部隊，這就拖住相當大的一部分軍隊不能進入戰鬥。誰也沒有想到轟擊，甚至連這些炮壘是否存在都根本記不得了。在大城市的群

众起义面前，一切防御计划都毫无用处，那是自不待言的！

晌午时分国民自卫军队伍里对内阁不满的怨声极为强烈，以致许多校官在土伊勒里宫发出通告说，如果内阁仍然执掌政权，他们就不能担保自己军队的行动。

下午二时，年老的路易-菲利浦不得不把基佐免职，另组新阁。这一消息刚一宣布，国民自卫军的士兵就欢天喜地，四散回家，装起彩灯以示庆祝。

但是建筑街垒、冒着枪林弹雨同市近卫军进行斗争的人民，即工人，决不是为了摩莱先生和比约先生²⁵⁰而战的。他们还是继续斗争。当意大利大街正兴高采烈欢喜若狂的时候，圣阿瓦街和朗比多街上却子弹横飞。斗争持续到深夜，直至星期四的早晨还没有停止。巴黎四周所有铁道全被破坏，就证明工人是普遍地参加了这一斗争的。

资产阶级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他们推翻了基佐，并结束了大交易所经纪人的独占统治。但在目前的第二场斗争中，已经不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同另一部分资产阶级相对峙：目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相对峙了。

* * *

刚刚传来的消息说，人民已经获得胜利，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老实说，我们并没有料想到巴黎的无产阶级会达到如此辉煌的成就。

临时政府中有三个委员是属于激进民主派的，激进民主派的机关报是“改革报”。有一个委员是工人[⊖]，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国

⊖ 即阿尔伯。——编者注

家里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其余的委员是拉马丁、杜邦·德·累尔和“国民报”的两个活动家²⁵¹。

由于这次革命获得胜利，法国的无产阶级又成了欧洲运动的领袖。荣誉和光荣属于巴黎的工人们！他们推动了整个世界，所有国家都将一一感到这一点，因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胜利就是全欧洲民主派的胜利。

我们的时代，民主派的时代来到了。在土伊勒里宫和皇家之宫燃起的火焰，是无产阶级的朝霞。现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到处都要崩溃，被推翻。

应该相信，德国一定会步法国的后尘。德国现在如果不从屈辱中振作起来，将来就永远做不到这一点！要是德意志人还有毅力、尊严和勇气，那末过不了四个星期，我们也会高呼：

“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

2月25—26日

载于1848年2月27日“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第1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魯塞尔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55年
“历史问题”杂志第11期

弗·恩格斯 給“北極星报”編輯的信

亲爱的先生!

由于法国發生了重大的事件，比利时人民和比利时政府所采取的立場就比平时更加引人注意。所以我要赶忙把2月25日星期五以来所發生的事情告訴給您的讀者。

那天晚上整个布魯塞尔都处在不安和激动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謠言，但誰也沒有認真听信。車站上挤滿了各階層的人，他們焦急地等待着新消息。法国大使，从前的呂敏尼侯爵也在那里。夜里十二点半到站的列車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說星期四那天爆發了革命；所有的人忽然一致热烈地高呼：«Vive la République!»〔“共和国万岁！”〕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城。星期六一天平靜无事。但是星期日街道上挤滿了人群，每个人都想知道，民主协会和同盟这两个組織将采取什么措施。这两个組織在晚上都召开了會議。同盟（資產階級激进派的团体）决定再等等看，因而脫离了运动。民主协会則通过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決議，从而使自己处于运动的前列。他們决定把每星期集会一次改为每天一次，并向市政委员会遞送了請願書，要求不仅把武器發給資產階級市民自衛軍，而且發給每个地区所有的公民。晚上街道上發生了一些騷动。人們高呼：«Vive la République!»〔“共和国万岁！”〕，并聚集在市政厅大厦

的周围。许多人被逮捕了，但是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事情。

被逮捕的人当中有两个德国人，一个是政治流亡者沃尔弗先生，另一个是工人。您一定知道，布鲁塞尔这里有一个德意志工人协会。这个协会经常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并且发行一份德文的民主主义报纸[⊖]。大家知道，居住在布鲁塞尔的德国人都是非常积极的不屈不挠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几乎都是民主协会的会员，而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副主席马克思博士也是民主协会的副主席。

政府非常了解，在比利时这样的小国的相当一部分居民中，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是比较浓厚的，于是它就立刻利用这种情况散布谣言，说什么所有为争取共和制度的鼓动都是一些德国人搞起来的，这些人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损失的，他们由于自己的卑劣行为已经被三四个国家驱逐出境，他们打算独揽他们所预谋的比利时共和国的大权。这个惊人的消息星期一就传遍了全城。不到一天的功夫，组成市民自衛军的全体小店主便异口同声地叫嚷着反对那些想把他们幸福的比利时祖国拖到革命中去的德国造反者。

德国人曾指定一个咖啡馆为集会的地点，每个人应当把巴黎的最新消息带到这里来。但是，由于小店主喧嚷得太厉害，由于流传着各种各样的风声，说政府要如何如何对付德国人，所以德国人甚至不得不放弃这种与人无损的交往办法。

星期日晚上警察已经警告咖啡馆的老板、即德意志工人协会所在地的房东，今后他不得再让德意志工人协会在这里举行任何会议。

⊖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编者注

德国人在这整个期間表現得非常好。虽然他們遭到警察的最卑鄙的迫害，但他們仍然坚守崗位。他們每晚都出席民主协会的會議。他們避开街道上一切喧嚷拥挤的人群，但是他們表示，即使本身遭到不幸，在危急的时刻他們絕不会抛弃自己的比利时弟兄。

过了几天，星期日和星期一那种不寻常的激昂情緒平息了，人們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政府也从第一次惊恐中恢复了常态，这时候又發生了一系列迫害德国人的事情。政府頒布了許多命令，根据这些命令，所有失业的外国工人将被立刻驅逐出境，而所有身份証不妥貼的外国人也要遭到同样的对待。除了采取这些措施外，政府同时还散布各种各样的謠言使企业主也反对所有的外国工人，結果德国人便无法找到工作。連那些原来有工作的德国人也失掉了工作，从此就听候驅逐出境法令的支使了。

政府不但迫害失业的工人，而且还迫害妇女。一个年輕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以丈夫的資格和一个法国女子同居（这是符合法国和比利时的風俗習慣的），大概由于他在布魯塞尔的居留使警察局感到不安，于是便突然遭到了迫害，这迫害表現在对他的情人的追究上。借口她沒有身份証（哪一个住在比利时的人以前會想到向一个妇女要身份証的事！），就威胁要把她立刻驅逐出境，警察局还声明說，这样做与其說是由于她本人，不如說是由于和她同居的那个人。三天內警官就到她家里去了七次。她被叫到警察局好几次，最后，由一个警察把她带到了警察总局。要不是有一位有威信的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出面干預，她必然会被迫离开这个国家的。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迫害工人，放風声說某某人将被逮捕，星期二晚上将在城市所有的咖啡館里搜捕德国人，——所有这一切，我再重复一遍，和我現在所要告訴您的事情比較起

来，是算不了什么的。

星期五[⊖]晚上，馬克思博士（还有其他一些人）接到了国王的一道命令，限他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国境。夜里一点鐘，当他收拾行李准备啓程的时候，一个警官带着十个武装警察，违反在日落到日出这段时间公民住宅不可侵犯的法律，闖入馬克思的住宅，逮捕了他，把他押解到市政厅监狱。除了說他的身份証不妥貼（虽然他至少給他們拿出了三个身份証，并且他在布魯塞尔已經住了三年）外，沒有說明逮捕他的任何理由！馬克思就这样被带走了。他的妻子非常惊惶不安，立刻跑到一位比利时律师、民主协会主席若特兰先生那里去。若特兰先生总是乐于帮助被迫害的外国人，我在叙述前面那件事情时所提到的正是他的友誼的干預。馬克思夫人在回家的路上遇見了一位比利时友人日果先生。他送她回家去。到家时，他們看到两个曾逮捕馬克思的警察站在門口。馬克思夫人問道：“你們把我的丈夫带到哪里去了？”他們回答說：“如果您跟我們走，我們就告訴您他在哪里。”警察把她和日果先生一起带到市政厅，但是，他們並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反而把馬克思夫人和日果先生交給了警察局，于是馬克思夫人和日果先生就被关进监狱。馬克思夫人的三个小孩子被留在家里由女仆照管，她自己被关进一間囚着一群最下流妓女的牢房，她便和这些娼妓在一塊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她被移到另一个根本沒有生火的房間，在那里一直待了三小时，冷得直打哆嗦。日果先生也被扣留起来。馬克思先生同一个狂暴的疯子关在一个牢房里，因此他必須时刻提防着这个疯子。所有这些卑鄙的行为还不算够，看守人也用最

⊖ 原文中誤为“星期六”。——編者注

粗暴的態度對待他們。

下午三時馬克思夫人和日果先生終於被提審，法官很快就釋放了他們。他們到底犯了什麼罪呢？游蕩罪，因為他們兩個人沒有隨身帶着身份証！

馬克思先生也被釋放了，但是命令他在當天晚上離開國境。原來給他料理私事的二十四小時中，有十八小時他被非法關在監獄，在這期間，不但他本人，連他的妻子也被迫離開他們的三個孩子（其中最大的女孩還不滿四歲）；最後，他來不及料理一下私事就被驅逐出境了。

日果先生在被捕的前一天才從監獄釋放出來。他上一次是在星期一早晨六點鐘和三個列日的民主主義者一起在旅館里被逮捕的；他們全部是被加以游蕩罪名而被逮捕起來的，因為他們沒有帶身份証。星期二就已經下令釋放他們，但仍然非法地把他們扣留到星期四。他們之中的特德斯科先生直到如今還在監牢里，而且誰也不知道究竟給他加的是什麼罪名。他和沃爾弗先生兩人不是即將被釋放，就是在这个星期內提交法庭審判。

但是，我必須指出，比利時的工人和比利時的許多民主主義者，尤其是若特蘭先生，對被迫害的德國人的態度是非常好的。他們已經擺脫了一切狹隘的民族感情。他們不是把我們看作外國人，而是看作民主主義者。

我聽說，政府已經下令逮捕比利時工人、英勇的民主主義者德·居阿斯科先生。昨天法庭審訊了被指控為參加叛亂而在上個星期日被捕的另一個民主主義者達希先生；可是還沒有宣判。

我時刻都在等待着驅逐出境的命令，如果沒有更壞的遭遇的話，因為誰也不能預料這個俄國式的比利時政府還會採取什麼手

段。我已作好准备，驅逐令什么时候下来都行。这就是德国民主主义者在这个“自由的”、如报纸所说，比法兰西共和国毫不逊色的国家里的处境。

致以

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誼

您的老朋友

3月5日于布魯塞爾

本文是弗·恩格斯写的

載于1848年3月25日

“北極星报”第54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北極星报”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卡·馬克思 給“改革報”編輯的信

編輯先生！

比利時政府現在已經完全倒向支持神聖同盟政策的那一邊去了。它的反動的怒火驅使它極端暴虐地對待德國民主主義者。如果不是這些針對我們的迫害激起了我們無比的憤怒，我們真要嘲笑羅日埃內閣，嘲笑它的可笑的處境——它怪罪一些德國人違背比利時人自己的願望企圖強迫他們接受共和國；但在我們所指的那樁事上，可鄙甚於可笑。

編輯先生，首先應該告訴您，几乎所有的布魯塞爾報紙都是法國人編輯的，他們大多是為了躲避祖國對他們的可恥的懲罰而逃出來的。這些法國人在1833年曾出賣了比利時的獨立²⁵²，現在他們對保衛比利時的獨立卻表示無限關切。國王、大臣和他們的僕從利用這些報紙來加強這種看法：似乎比利時的具有共和精神的革命本來只是*francequillonnerie*[⊖]，而目前比利時境內已可感覺到的民主鼓動，則全是好激動的德國人搞出來的。

德國人絕不否認他們公開地和比利時民主主義者結成聯盟，但他們這樣做根本不是由於什麼激動。但是在皇家檢察官看來，

⊖ 弗拉曼特語中表示輕視的說法，意思是：“毫無意義地模仿法國的一切”。——編者注

这等于煽动工人反对资产者，等于挑拨比利时人不信任他们心爱的德籍国王，这就是德国人为法国的侵略打开比利时的大门。

3月3日傍晚五时，我接到了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比利时王国的命令。当天夜里，我就忙着准备出发，突然一个警官带着十名警察闯进了我的住宅，搜查了整个房间，最后以我没有身份证为借口，逮捕了我。且不说我有杜沙特尔先生把我逐出法国时发给我的完好无缺的身份证，我手中还有逐出比利时的命令，这还是几小时前才给我的。

编辑先生，我的被捕和遭到的粗暴对待甚至在奥地利都是难以想象的，否则我也不谈这些了。

我被捕后，我的妻子就立刻去找比利时民主协会主席若特兰先生，请他采取必要的措施。当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了警察，后者彬彬有礼地告诉她，如果她想和马克思先生谈话，请随他走。我的妻子马上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她被带到警察局，警官一开头就对她讲，这里没有马克思先生，接着就粗暴地审问她，问她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若特兰先生那里去，她是否持有身份证。陪她一起去警察局的比利时民主主义者日果先生对警官提出这些荒谬而无礼的问题表示愤怒，但警察禁止他说话，把他抓起来送到监狱里去。他们以游荡罪名，把我的妻子送进市政厅监狱，和妓女一起关在阴暗的牢房里。次日上午十一时，一队宪兵在众目共睹之下把她送到侦讯室。不顾各方面的坚决抗议，把她拘留在禁闭室达二小时之久。她在那里忍受了严寒和宪兵的极其可恶的对待。

最后，当她站在侦讯员面前时，侦讯员对勤勉的警察就差没有把孩子們也一起逮捕表示惊奇。审讯只可能是纯粹形式主义的；

我的妻子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魯士貴族，却贊成丈夫的民主信念。

关于这件令人憤怒的事情的全部細節，我不想再詳談了。只告訴你一点，当我們被释放时，二十四小时的限期已滿，我們不得不立即离开，連最必需的东西也沒有来得及带走。

布魯塞爾民主協會副主席

卡尔·馬克思

写于1848年3月6日左右

原文是法文

載于1848年3月8日“改革報”

俄文譯自“改革報”

卡·馬克思

外国人在布魯塞尔所受的迫害²⁵³

2月27日星期日，布魯塞尔民主协会召开了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事前就已知道，出席大会的将有大批工人，他們对协会所認為必須采取的一切措施，将坚决地積極加以支持。

政府方面散布出空气，好象只要人民願意，国王列奧波特就准备逊位。这是对比比利时民主派設下的圈套，目的是使他們不要采取任何坚决的行动来反对这样慈祥的国王，因为国王一心渴望卸下王权的重負，只求遵照礼节給他一笔可觀的养老金就是了。

这时候，王国政府已經掌握了一份被認為犯有破坏社会秩序罪而必須当晚逮捕的名单。經与暗探局局长奧迪先生策划，在該名单中确定应将外国人列为无中生有的所謂騷动的主謀人，他的用意是要轉移人們的視听，使人們不大注意大批公認為坚决的共和主义者的比利时人的被捕，并挑拨民族感情。这便說明为什么在不久以后罗日埃先生閣下（他之不是比利时人正如列奧波特国王陛下之不是法国人一样）就發表了指令，要所有地方当局严密監視法国人（罗日埃的同国人）和德国人（列奧波特的同国人）。这个指令在形式上很象嫌疑法。

对2月27日晚上被捕的人來說，一切所謂煽动挑拨都是莫須

有的罪名，因而实施这一布置得非常周密的计划也就显得更为卑鄙，更为恶毒。

逮捕这些人可以说只是为了任意折磨他们和尽情地嘲弄他们。

他们被捕后就立刻遭到拳打脚踢和军刀的痛殴。这些共和主义者的脸上被吐口水，他们在慈善家奥迪面前横遭侮辱，而这位慈善家则因为能使外国人知道自己的厉害而得意忘形。

既然找不到控告他们的任何罪证，那只有将他们释放。可是，并不是这样！他们却在监狱里关了六天之久。然后，又用监狱的马车把这些被捕者中的外国人直接押上火车。那里，他们都被关进囚车，互相隔离，然后发送到基埃夫兰，被比利时的宪兵逐向法国边境。

最后，他们发觉自己已在自由的土地上，才有些清醒过来，那时他们口袋里除了一份填有被捕前夕日期的驱逐令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了。被逐者之中有一位是法国人阿拉尔先生。

就在这个时候，比利时小国之王的政府在下院宣布：比利时王国，包括两个弗兰德斯在内，是可能有的共和国中最好的共和国，它有着象奥迪先生这样的人所统率的模范警察，旧共和主义者，傅利叶主义者和新出现的列奥波特的信徒在奥迪先生一人身上都兼而有之。下院高兴得流泪，而天主教报纸和自由派报纸对国王列奥波特的私德和他的家仆罗日埃的公德则备加赞扬。

比利时民意倾向于共和政体。列奥波特只有在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耶稣会教徒、官僚以及那些被逐出法国后成为比利时行政及新闻界首脑人物的前法国人中间，才有他的信徒。

梅特涅由于碰巧就在法国边上有了象科布尔克家族的代表这

样一个法国革命的死敌而喜不自胜。可是，他忘却了目前人們只有在婚姻問題上才考虑到科布尔克家族了。

卡·馬克思写于1848年3月10日左右

載于1848年3月12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改革报”

弗·恩格斯 比利时的状况²⁵⁴

3月18日于布魯塞尔

两星期前，比利时资产阶级拒绝了人民提出的建立共和国的要求，而现在这个阶级却准备发起争取共和国的运动。它还不公开宣布，但整个布魯塞尔都已在窃窃私语：“列奥波特必须下台，这是肯定的。只有共和国才能拯救我们，这也是肯定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秩序井然的象样的共和国，在那里既没有劳动组织和普选权，也没有工人方面的干涉！”

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不久前竭力反对一切模仿法兰西共和国的企图的可敬的布魯塞尔资产阶级，已经尝到了巴黎财政危机的恶果。他们痛骂在政治上模仿别人，可是自己却沉湎于在财政上模仿别人。他们盛赞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可是自己却看到比利时的交易所完全屈从巴黎的交易所。南部国境线上的军事警戒线，挡不住有价证券狂跌的怒潮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有保证的中立的比利时领土。

事实上，布魯塞尔的交易所几乎完全麻木了。许多中小商人因破产而毁灭，有价证券再也找不到买主，交易所牌价徒有其名，现金比在巴黎还消失得快，商业完全停顿，大多数企业家已在解雇工人。这里举几个证券普遍跌价的例子：几天以前，一个实业家想

出售 150 张票面 100 法郎的唐德尔河流域铁路的股票；二月革命前，在伦敦交易所中这种股票的市价是高于票面价格的。第一天他不肯按每股 45 法郎的价格出售，第二天又不肯按每股 35 法郎出售，到第三天，他只得按每股 10 法郎售出！两年以前价值 6 000 法郎的土地，现在甚至连 $\frac{1}{3}$ 的价钱也卖不到！

正当大家惊慌失措的时候，政府要求先预征 $\frac{2}{3}$ 的直接税，然后发行五、六千万强制公债。这些措施在原来就因预算不断增长而不满的纳税人中间引起了震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可敬的资产者不能不相信，由于他们拜倒在君主政体面前，虽然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一点在法国已经获得的好处，但是却必须完全分担由法国的情况所引起的一切忧虑。这就是共和主义精神在他们中间活跃起来的真正原因。

可是，工人们决不甘沉寂。几天来根特发生了骚动；前天在布鲁塞尔工人们纷纷集会，向国王递出请愿书。列奥波特只得屈尊往迎，亲自从长满老茧的手中把请愿书接过去。接着就发生了气势更加浩大的示威游行。每天都有大批工人失业。只要工业危机再延长一些时候，只要工人阶级的情绪更为熾烈一些，比利时资产阶级，就会象巴黎资产阶级一样，同共和国结成“利害婚姻”。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3 月 18 日

本文原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研究院于 1932 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补 遺

弗·恩格斯

英国谷物法史^①

在上一世紀中叶以前,英国的谷物几乎每年都有輸出,而很少需要从国外輸入。可是从那时起,情况就發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条件,谷物价格必然低廉,另一方面,由于肉类价格昂貴,許多耕地变成了牧场;同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机器發明,正在这个时期推动了工业空前未有的發展,而人口也有了空前未有的增加。于是,英国不得不首先取消粮食輸出,最后甚至要求从国外輸入粮食。由于革命时期二十五年的对法战争,輸入發生困难,迫使英国用粮多少局限于本国所生产的。战争所造成的輸入困难起了保护关税的作用。谷物价格上涨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地租也就增加到以前的两倍,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增加到以前的五倍。因此,不久前变成牧场的大部分土地,又重新种植谷物了。英国土地占有者(順便說說,他們包括几百个勋爵、六万个左右从男爵和出

① 这篇文章是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新發現的,發表于1955年8月“統一”(«Einheit»)杂志第8期。本文按写作日期应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俄文版因当时第二卷已出版,第三卷亦已付印,因此作为补遺收入第四卷,我們也由于来不及編入第二卷,暫時仍按俄文版收入第四卷中,待再版时改正。——譯者注

身于非貴族的乡紳)的收入大大增加,于是他們追求起豪华奢侈揮霍无度的生活来,这样,即使他們地租有所增加,也很快就入不敷出。不久他們的庄园就为重債所累。1814年的和平清除了輸入上的障碍,因而粮价下跌,由于租金过高,租佃者的收入已不足抵偿粮食的生产費用;当时出路只有两条:或是土地占有者降低地租,或是实行真正的保护关税来代替过去实际上起了保护关税作用的东西。土地占有者,他們不仅在上院和內閣里占着优势,同时在下院也几乎有絕对的权力(在改革法案实施以前),他們当然选择后者,于是不顧資產階級以及当时还受資產階級领导的人民的激憤,于1815年借助刺刀实行了谷物法。1815年的第一个谷物法規定,在英国粮价每夸特^①低于80先令时,絕对禁止粮食进口。只有在达到这种价格或超出这一价格的情况下,才許可从国外自由輸入粮食。然而,这个法律不仅不符合工业居民的利益,而且也不符合农业居民的利益,于是在1822年又做了若干修改。但是,这次修改是沒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近几年来粮价总是低廉,从来沒有到过許可从国外輸入粮食的水平。虽然历次修改法律,議會又屢次組織委员会进行調查,租佃者仍然不能补偿自己的生产費用,于是哈斯基森和坎宁终于發明了著名的 Sliding-Scale [調节制],这一制度后来被他們的內閣繼任者訂为法律²⁵⁵。依据这一調节制,进口稅随着国内粮价下跌而提高,随着粮价上涨而降低。以为用这种方法就能保証英国租佃者获得一个高昂而固定的粮价,使他可以毫不費力地支付高額地租。然而,这一措施也沒有起什么作用。这一制度日益使人不堪容忍,从实施改革法案以来,在下院占統治地位

^① 夸特是英国的容量单位,約合 2.909 公石。——譯者注

的资产阶级更加坚决反对谷物法了，于是罗伯特·皮尔爵士在組閣一年以后，就不得不降低关税。

反对谷物法的反对党也組織了自己的力量。由于粮食騰貴而不得不給工人支付較高工資的工业资产阶级，不惜任何代价力圖废除这些它所痛恨的法律——代表农业利益的旧統治（而且这种統治使其他国家易于同英国工业进行竞争）的最后遺迹。1838年底，曼徹斯特的几个大厂主創立了一个反谷物法协会；这个协会的势力在曼徹斯特近郊和其他工业地区迅速扩展开来；反谷物法协会后来称为反谷物法同盟，它組織募捐，創辦杂志（“反谷物稅通报”²⁵⁵），并出資派遣演說家到各地去，利用一切英国慣用的鼓动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谷物法同盟成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正好是处于萧条状态的那四年），其言論是極端激烈的。当1842年初萧条变为真正的商业危机而使全国工人阶级陷于可怕的貧困时，反谷物法同盟就成为真正革命的同盟了。它的口号就是耶利米的格言：“餓死的，不如被刀杀的”^①；它的机关刊物明确地号召人民去造反，并以“长槍和火把”威胁土地占有者。它的巡迴鼓动家們走遍了全国各地，到处宣传鼓动，他們所用的語言，比之他們的机关刊物也并无逊色。群众大会一个接着一个召开，遞交議会的請願書一份接着一份散發，而且正当議會开会的时候，同盟也就在紧靠議會大厦的隔壁同时召开代表大会。当皮尔不顧所有这一切，对谷物法只作修改而拒絕废除时，这个代表大会就声明說：

“人民对政府再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他們应当只靠自己；必須刻不容緩地立即停止政府机器車輪的轉动；使用言語的时刻已經过去，行动的时刻

① 見旧約全書耶利米哀歌第4章第9节。——譯者注

已經到来；應該相信人民不願再为穷奢極欲的貴族而活活餓死，如果这一切都不行，还有一个能够迫使政府讓步的办法：必須(全国大工业城市的大厂主和市政官吏的这个代表大会就是这样声明的)①把人民派遣到产生各种貧困的农业区去；但是人民不應該象一群温順的‘貧民’似的而要象‘去仇敌那里扎营’似的开进去。”

厂主們想采取一种巨大措施，于二十四小时內就在曼徹斯特賽馬場召开一次 50 万人的集会并發动一次反谷物法的起义；这就是关闭他們的工厂。

七月里情况开始好轉。定貨数量增加了，厂主們發覺危机即将結束。但是人民仍然憤憤不平，貧困現象到处都是；既然反正总要出事，那就應該馬上行动。一个斯泰里布雷芝的厂主当情况已經好轉而本应提高工資的时候，反而突然降低了工人的工資，这便迫使他們不得不停止工作以求把工資保持在从前的水平上。于是这件事便成为工人起义的信号，工人使城內和近郊的全部工厂停了工，他們輕而易举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厂主(全部是反谷物法同盟的盟員)一反往常，并没有加以任何阻挠。工人召集會議；会上厂主亲自担任主席，他們企圖把工人的注意力轉到谷物法上。1842年8月9日，即起义后四天，工人进入了曼徹斯特，在那里他們沒有遇到任何反抗就使全部工厂停了工。反对他們的只有一个厂主，他是保守党人，是同盟的敌人。起义扩展到了所有工业区；市政当局(大家知道，在英国，一切諸如此类的事情都由市政当局决定)全是反谷物法同盟的盟員，他們哪里也沒有反对起义者。这期間，同盟的活动家一直是为所欲为的。但是有一点他們是失算了。他們为了要用强力废除谷物法而把人民拖到起义中去，可是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人民却很少想到这些谷物法。人民所要求的是 1840 年水平的工資和实现人民宪章。同盟發覺这一点以后，就立即掉轉武器来反对自己的同盟者。同盟的全体成員都报名当了特別警察，他們宣了誓，組織了一支镇压起义的新軍隊——一支为他們所敌視的政府服务的軍隊。人民的起义很快就遭到了失敗（这次起义突然爆發是出于人民意外的，因为人民根本就沒有准备进行这样的起义）；谷物法依旧保存了下来，于是無論資產階級或人民又都受了一次教訓。反谷物法同盟为了用事实証明它並沒有因起义失敗而被徹底打垮，于 1843 年又掀起一个巨大运动，号召盟員募集 5 万英鎊；在一年內，同盟就超額地募集到这笔款項。同盟重新开始了鼓动，但不久就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听众。它总是吹嘘，从 1843 年起，在工业区已无事可做，可以把自已的活动轉向农业区了。但是症結却正在于此。1842 年起义以后，曾經被无耻地出卖过的人民憤慨万分，那时同盟的代表人物已无法在工业区召开公开會議，否則就会被人民打得头破血流，狼狽地赶下講台。因此，他們为了替自己的那一套言論找市場，就不得不到农业区去。这里同盟是有某些实际功績的，它使租佃者因以前依附土地占有者而产生了一种特有的羞愧情感，并使农业階級成为关心整体利益的階級。1844 年，同盟在前次募捐获得成就的鼓舞下，宣称将开展一次总額为 10 万英鎊的新的募捐。第二天，曼徹斯特的厂主曾聚集一堂，半小时内就認捐了 12 000 英鎊，1844 年 11 月認捐总額达 82 000 英鎊，其中 57 000 英鎊已經付款。几个月以后，展覽会在倫敦開幕了，它也会使同盟有一笔巨額的收入。这一巨大的运动从曼徹斯特扩展到整个英国，吸引了英国極大多数資產階級，但是（我們再說一遍）絲毫也沒有引起工人階級的同情；如果我們問一下：这个运动的动因是

什么，那我们就应该承认，首先是大不列颠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私利。对这个阶级说来，有巨大意义的是建立一种制度，以便至少象它所想象的那样，在工商业方面保有永久的世界垄断，能和竞争者一样支付低薪，同时还能利用八十年来英国因现代工业居于首位而取得的一切优势。在这里因废除谷物法而获益的只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人民。其次，资产阶级还要求把这一措施作为改革法案的补充法。改革法案规定采用选举资格，废除对某些个人和团体旧有的选举特权，这在原则上应该使资产者富豪阶级掌握政权；但在实际上，土地占有者阶级在议会中还保存着相当大的优势，他们派到议会去的代表直接的有各郡产生的 143 人，间接的有小城市产生的几乎所有代表，此外，大城市的托利党人代表也是代表他们的。农业利益的这种优势，使皮尔在 1841 年建立了托利党人的内阁。废除谷物法会给下院大土地占有者的政治势力以致命打击，换句话说，实际上会给全部英国法律以致命打击，使租佃者不再依附土地占有者而独立。废除谷物法意味着宣布资本为英国的最高权力；而英国宪法就会根本动摇；立法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即土地贵族的一切财富和一切权力就会被剥夺，因此，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前途的影响远远大于任何其他政治措施。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废除谷物法在这一方面也并不会给人民带来任何利益。

弗·恩格斯写于 1845 年秋。

载于 1845 年 12 月“德意志电讯”
杂志第 193 和 194 期

编辑部附注中说明作者为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电讯”杂志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附 录

馬克思所做的关于 1847 年 8 月 5 日 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魯塞尔支部 和区部的記錄

8 月 5 日。建立新支部。

馬克思当选为主席，

日果当选为秘書兼財務員。

区部委员会：日果、荣格、馬克思、沃尔弗

第一次發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²⁵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一章 同盟

第一条 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第二条 盟员的条件：

(a) 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

(b) 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

(c) 承认共产主义；

(d) 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并且必须把参加某团体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

(e) 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

(f) 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

(g) 必须获得一致通过，才能被接收入某一支部。

盟员如果不能遵守这些条件即行开除(见第八章)。

第三条 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他们都是兄弟，因而有义务在一切场合下互相帮助。

第四条 盟员皆有盟内代号。

第五条 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

第二章 支部

第六条 支部的組成至少三人至多二十人。

第七条 每个支部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主席主持各种會議，副主席管理財務，主席缺席时由副主席代理主席职务。

第八条 接收新盟員須經支部事先同意，由支部主席和充当介紹人的盟員办理。

第九条 各地区的支部彼此不得相識或保持任何联系。

第十条 各支部均須有特別称号。

第十一条 任何一个盟員迁居时均須事先报告本支部的主席。

第三章 区部

第十二条 区部轄有两个以上十个以下支部。

第十三条 由这些支部的主席和副主席組成区部委员会。区部委员会从委員中选出领导人。区部委员会同本区各支部和总区部保持联系。

第十四条 区部委员会是区内各支部的权力执行机关。

第十五条 各独立支部須加入已有的区部，或同其他各别的支部成立新的区部。

第四章 总区部

第十六条 本国或本省内的各区部隶属于一个总区部。

第十七条 由代表大会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建議按省划分同盟各区部和指定总区部。

第十八条 总区部是本省各区部的权力执行机关。它同各该区部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

第十九条 新建立的区部加入邻近的总区部。

第二十条 总区部向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则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第五章 中央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第二十二条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不少于五人，由代表大会指定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区的区部委员会选出。

第二十三条 中央委员会同各总区部保持联系，每三个月作一次关于全盟状况的报告。

第六章 一般规定

第二十四条 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

第二十五条 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连选得连任，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之。

第二十六条 每年9月进行选举。

第二十七条 区部委员会必须根据盟的意图对各支部所进行的讨论加以领导。

如中央委员会认为某些问题的讨论具有普遍的和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提交全盟讨论。

第二十八条 盟员至少每三个月同所属区部委员会联系一

次，支部每月联系一次。

每个区部至少每两个月向总区部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每个总区部至少每三个月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

第二十九条 同盟各级机关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同盟的安全并加强其活动，按照章程独立负责进行活动，并立即把一切通知上级机关。

第七章 代表大会

第三十条 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关于修改章程的一切提案均经总区部转交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

第三十一条 每个区部都可派遣代表。

第三十二条 盟员不超过三十人的区部派代表一名，满六十人者派两名，满九十人者派三名，以此类推。各区部可以选举不属于本地区的盟员为自己的代表。

凡属上述情况，则各区部须赋予自己的代表以全权并给予详细的指示。

第三十三条 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遇紧急情况中央委员会得召集非常代表大会。

第三十四条 每届代表大会指定本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同时指定下届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

第三十五条 中央委员会得出席代表大会，但无表决权。

第三十六条 代表大会于每次会议后除发指示信件外，还可以代表全党发表宣言。

第八章 反盟罪行

第三十七条 凡不遵守盟員条件者(見第二條),視情节輕重或暫令离盟或开除出盟。

凡开除出盟者不得再接收入盟。

第三十八條 开除盟籍的問題只能由代表大会決定。

第三十九條 区部或独立支部可以暫令各別盟員离盟,但必須立即报告上級机关备案。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同样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作出決定。

第四十條 被暫令离盟的盟員重新入盟問題,須由中央委员会根据区部的提議处理。

第四十一條 反盟的罪行由区部委员会审理;区部委员会还应督促判決的执行。

第四十二條 为了盟的利益必須对被暫令离盟者、被开除盟籍者和可疑者加以監視,使他們不能为害。有关这些人的阴谋活动必須立即通知有关支部。

第九章 盟的經費

第四十三條 代表大会为每个国家規定每一盟員应繳納的最低盟費。

第四十四條 盟費半数上繳中央委员会,半数由区部或支部留用。

第四十五條 中央委员会的經費用作下列各項支出:

(一) 联络費用和組織費用。

(二) 印發传单。

(三)中央委员会因执行某种任务所派代表的一切費用。

第四十六条 地方委员会的經費用作下列各項支出：

(一)聯絡費用。

(二)印發传单。

(三)在必要时派遣代表的一切費用。

第四十七条 凡支部和区部六个月不向中央委员会交盟費，中央委员会即令其暫時离盟。

第四十八条 区部委员会最迟不超过三个月向所屬各支部报告收支情况。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盟的經費分配情况和盟的收支情况。任何濫用盟的經費的行为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懲罰。

第四十九条 特別費用和召开代表大会的費用由特殊收入开支。

第十章 接收盟員

第五十条 支部主席向被接收入盟的盟員宣讀和說明章程的第一条到第四十九条，要在簡短的講話中特別強調入盟者应尽的义务，然后向他發問：“那末，你願意加入这个同盟嗎？”如果后者回答：“願意！”，那末主席就要他保證尽盟員的一切义务，然后宣布他为盟員并在下一次會議上将他編入支部。

受 1847 年秋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之委托公布。

秘書

主席

签名：恩格斯

签名：卡尔·沙佩尔

1847 年 12 月 8 日于倫敦

布魯塞爾“民主協會”致倫敦 “民主派兄弟協會”

去年12月的來信收到，我們立即討論了關於召開國際民主派代表會議以及貴會和我會每月進行通信的建議。²⁵⁸

你們考慮到將來要在倫敦召開第二次會議，因而建議第一次會議在布魯塞爾這裡召開；你們建議我會在今年比利時革命紀念時舉行第一次會議，並由我會委員會準備會議議程；這些建議都已一致熱烈通過了。

你們表示準備每月和我會進行定期的通信，我們同樣竭誠歡迎。

現在，概括地敘述一下我們的成就和我們事業的一般情況。

我會正在蓬勃發展，實堪欣慰。會員人數每周都有增加，所有公眾，尤其是工人階級，已愈來愈關心我們的活動。

但是，足以更好地證明我們的成就的却是我們的運動在比利時各省所引起的關注。比利時一些最大的城市向我們提出要求，希望我們派遣代表幫助他們建立象我們這樣的民主協會，並和首都的協會建立經常的聯繫。

我們立即對這些要求作了答復。為了召開大會以建立協會的分会，我們派遣了代表團到根特。到會的人數極多，大會以不可名

狀的熱情接待了我們由不同民族所組成的代表團。立即通過了建立民主協會的決議，並編制了會員名單。此後，我們得到根特來的消息，知道協會終於成立，而且舉行了第二次大會，到會人數比第一次大會更多，情況也更為熱烈。出席會議的有三千多公民，令人高興的是其中大多數是工人。

我們認為在根特所取得的進展是我們在比利時的事業的最大成就。根特是比利時的主要工業城市，居民達十萬以上，可以說是弗蘭德斯所有勞動居民的中心。根特所處的地位對整個比利時工人運動具有決定的意義。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這個比利時的曼徹斯特的工廠工人的那種再接再厲展開純民主運動的決心，體現着、預示着比利時大多數無產者的同樣決心。

在下次信中，我們想報道一些我們在比利時其他城市中的進一步成就，這些成就將逐漸恢復比利時的強大、團結而有組織的民主黨。

你們最近的告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工人書²⁵⁹中關於“國防”問題的見解，我們完全同意。我們希望，這篇告工人書將使英國人民充分認識清楚誰是他們真正的敵人。

我們對英國憲章派的大多數為了最後建立愛爾蘭人民和大不列顛人民的緊密同盟所採取的步驟，同樣感到非常的滿意。愛爾蘭人民由於成見，對英格蘭的被壓迫階級和兩國的壓迫者毫無區別地都一概加以憎恨，我們覺得現在消除這種成見的可能性比已往任何時候都要大。我們希望，英格蘭和愛爾蘭的人民運動將很快由菲格斯·奧康諾爾一人統一領導起來，同時我們認為，英格蘭和愛爾蘭的被壓迫階級在民主旗幟下形成的這種團結將是我們整個事業的最重要的成就。

最后,請接受我們兄弟般的敬意。

民主协会委员会:

主 席 律·若特兰

副 主 席 卡·馬克思

律師兼秘書 阿·皮卡尔

1848年2月13日于布魯塞尔

載于1848年3月4日
“北極星报”第54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北極星报”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摘自“德意志—布魯塞爾報”
关于民主協會 1848 年 2 月 20 日
會議的報道

布魯塞爾。民主協會 2 月 20 日會議。主席為馬克思先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一個發言，他抨擊了法國政府在“巴黎通報”上發表的關於他被驅逐出法國的文章。恩格斯簡短地敘述了他被驅逐的情況²⁶⁰。

協會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說明表示十分滿意。許多發言人都作了這樣的表示，同時還補充描述了法國政府以前驅逐外國人的情形。

這些發言都已編入民主協會的正式文件彙編。

載于 1848 年 2 月 24 日“德意志—
布魯塞爾報”第 16 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德意志—
布魯塞爾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致“北極星報”編輯、 倫敦“民主派兄弟協會”書記 朱利安·哈尼先生

巴黎剛發生了光榮的革命，這是你們已經知道的。

我們應該告訴你們，這個重大的事件促使民主協會在這裡採取和平的、但是有力的宣傳，以便利用比利時政治制度下所可能有的各種條件來取得法國人民剛剛爭到的幸福。

在熱烈贊同下通過了以下決議：

1. 民主協會將每晚舉行會議，吸收公眾參加。

2. 以協會的名義向法國臨時政府發表宣言，表示我們同情2月24日的革命。

3. 向布魯塞爾的市政委員會提議建立市的武裝力量，以避免任何流血事件並維持社會安寧，這支武裝力量基本上由市民自衛軍組成，即由平時持有武器的資產者和在非常時期依照國家法律必須加以武裝的手工業者所組成。這樣，就能將武器均等地分發給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

關於以後的步驟和成就我們將尽可能地經常通知你們。

我們希望你們也很快就能使人民憲章成為你們國家的一種法律，並希望這將有助於你們取得新的進一步的成就。

最後，我們建議你們在這個緊要的時期和我們保持經常的聯

系,把你們國家中發生的、可能對比利時人民有利的一切新東西告訴我們。

委員會委員們簽名

1848年2月28日于布魯塞爾

載于1848年3月1日
“社會辯論報”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社會辯論報”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致法兰西共和国公民們和 临时政府委員們

公民們！

民主协会怀着崇高的敬意祝賀你們，祝賀法兰西民族最近完成的功績，并感謝你們对人类所作的伟大貢獻。本会以團結各国人民建立兄弟友誼为目的，我們的协会不久以前已在布魯塞尔成立，它由欧洲各民族的代表組成。我們正同比利时人一起在他們的領土上利用那些早就允許自由地公开发表任何政治宗教見解的制度，进行工作。

我們也曾向瑞士人致敬，祝賀他們最近的行动，他們这种行动就是各民族解放事业的开端。落在你們肩上的使命就是以全力来繼續这一事业，英勇的巴黎人民每当执行自己使命的时候总是这样表現的。我們坚信，不需很久，我們就会以对瑞士人所致的敬意向法国人致敬。法国已离我們向它祝賀的时候不远了。至于說希望各民族今后急起直追你們，那就自不待言了。

我們認為完全可以相信，同法兰西紧紧毗邻的民族将最先追随法兰西走上它刚刚走过的道路。

法国所完成的革命首先巩固了法国和各民族的联系，而并没有威胁任何一个民族的独立，这更进一步証实了上面的估計。我們向 1848 年 2 月的法国致敬，因为它是各民族的模范，而不是各

民族的統治者。从今以后，法国不再需要别的敬重了。

我們看到，命运操在你們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伟大民族，真正是在普遍的信任中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公民們，我們也看到，这个伟大的民族，甚至和一向被其視為爭雄对手的其他民族重新建立起曾为少数人的腐朽政策所破坏的联盟。英国和德国重新向你們伟大的国家伸出了手。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和比利时也将振奋起来，或者在你們联盟的庇护下享受安靜和自由。象拉撒路一样，波兰定会从死中复活，响应你們以三种文字向她發出的号召。

最后，甚至俄国也必然会發出西方和南方人民还很不熟悉的呼声来响应你們。法国人，荣誉和光荣归于你們！你們奠定了各民族联盟的基础，这种联盟是你們不朽的貝朗热早就預言式地歌頌过的。

公民們，我們怀着不可动搖的兄弟友誼，向你們表示深切的謝意。

以团结各国人民建立兄弟友誼为目的的布魯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

签名：主席律·若特兰律师；副主席卡·馬克思；
名誉主席梅利奈將軍；根特民主协会主席
斯皮特霍恩律师；布魯塞尔大学教授迈因
茨；列列韦尔；财务員巴兰；副書記巴泰；
工人佩列林；批發商拉比奧。

1848年2月28日于布魯塞尔

載于1848年3月4日“改革报”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改革报”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1848年3月3日的决议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前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伦敦中央委员会已卸除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并将其所在地迁到布鲁塞尔，本此决定布鲁塞尔总区部的区部委员会即被确立为中央委员会；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

鉴于：

在目前形势下，要在布鲁塞尔将盟员尤其是德国盟员加以联合是不可能的；

布鲁塞尔的同盟领导人员不是已被逮捕或被驱逐，就是随时都有被驱逐出比利时的可能；

目前巴黎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

目前的形势要求要对同盟进行非常有力的领导，为此无疑地必须使领导人员有权自行处理一切事务；

因此决定：

1. 中央委员会迁到巴黎。

2. 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授权盟员卡尔·马克思在目前独自实现中央对同盟一切事务的领导，这项工作他要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央委员会和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负责。

3. 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委托马克思：一俟情况许可，就亲自选择人员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应是最适当的盟员，为此甚至可以将不住在巴黎的盟员召去。

4. 解散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

本决议于 1848 年 3 月 3 日在布鲁塞尔通过。

中央委员会

签名：恩格斯，弗·费舍，日果，

亨·施泰因根斯，卡·马克思

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19 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第 1 册 1853 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该书第 1 册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 1848年3月8日會議記錄

1848年3月8日支部會議記錄

选出 主席：卡·沙佩尔

秘書：卡·馬克思

沙佩尔提議我們組成巴黎区部而不单是一个支部。

馬克思等表示同意。通过。

海尔曼被通过。

討論关于重新接受本支部被暫令离盟的盟員問題。

波尔恩彙报了“欧罗巴”咖啡館的會議情况，斯特尔比茨基也做了同样的彙报。多数票决定不到德克尔和費奈迭举行會議的这个咖啡館去。

恩格勒、布赫芬克和福格勒(魏特林派)被一致通过。

一致决定：委托上述三位盟員吸收魏特林支部中他們認為可以吸收的人員加入本支部。

席林被一致通过。

批准下列几人为公开的工人团体的負責人：

主席：亨·鮑威尔

副主席：海尔曼

秘书两人: 波尔恩和福格尔

财务员: 莫尔

干事三人: 布赫芬克, 沙佩尔, 霍尔奈。

决定主席应用“朋友们”来称呼别人, 其他人自便。

委托马克思起草工人团体的章程。

公开团体应该命名为**德国工人俱乐部**²⁶¹。

威廉·赫格尔被接受为盟员 (根据沙佩尔的提议并有亨·鲍威尔附议)。

公开团体的地址应在市中心。委托盟员数人去寻找适当的地址。

同盟会议定在**圣奥诺莱区圣路易街 6 号**举行。

斯特尔比茨基提议**海尔曼**为候选人, 通过。

秘书 卡·马克思 主席 卡·沙佩尔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3 月 8 日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 1848年3月9日联席會議記錄

3月9日晚九时举行

馬克思把他起草的章程草案²⁶²提交會議討論。

第一条以大多数票对两票通过。第二条全体一致通过。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和第六条也同样全体一致通过。

这样，章程草案就无修改地通过了。接着秘書宣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新入盟的盟員听完章程后，声明他們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

馬克思提議全体盟員报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会上討論了这个问题，最后通过決議：同盟的每一个盟員要报告他在这里所用的名字和他的住址。

沙佩尔提議除主席和秘書外，再选出五个人組成巴黎区部委員會。

四个支部中每个支部應該选出一人，选举延到下一次會議举行。

沙佩尔做了关于中央委員會的报告。根据沙佩尔的提議，决定每一个人發言时必须起立并脫帽。

根据馬克思的提議，中央委員會应在下次會議上提出关于同

盟的总的情况的报告。

波尔恩曾被派往騎术学校开会并彙报會議情况。三刻鐘后他即返回,描述了這個协会²⁶³的糟糕情景。

下一次會議定于本星期六 8 时在聖奧諾萊区格列涅尔街“比利时”咖啡館举行。

閉会前盟員向秘書报告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馬克思提議全体盟員都纏上紅色布带。全場一致通过。

通过了沙佩尔的建議：指定一个人給大家代購鮮紅色布带。这一任务委托公民查克斯去执行。

卡尔·馬克思写于 1848 年 3 月 9 日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俄譯文第一次發表

注 释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 1 本文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發出的通告之一，正如恩格斯在“論共產主義者同盟史”(1885年)一文中所指出的，這些通告是“在論及當時形成中的共產黨的內部事務的特殊場合”時發出的。

克利蓋的觀點和活動在通告中受到尖銳的批判，由於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要求，他不得於1846年6月6日至13日在他主編的“人民論壇報”第23號和24號上發表了這一文件。該通告於1846年也在“威斯特伐里亞汽船”雜誌7月號上發表，然而該雜誌主筆、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代表之一奧托·呂寧別有用心地加以改動，他擅自增加了一些東西並修改了很多地方。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1929年版第五卷)所載的通告，是根據“威斯特伐里亞汽船”雜誌發表的文章譯出的，其中許多地方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文而是呂寧寫的。本版的譯文是初次按原稿翻譯的。

本文標題是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加的。——第3頁。

- 2 “人民論壇報”*«Der Volks-Tribun»* 是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紐約創立的週報。出版時間從1846年1月5日至12月31日。——第3頁。
- 3 “青年美國”是美國手工業者和工人的組織。該組織是1845年創立的群眾性的全國改革協會的核心，協會宣稱它的宗旨是無償地分給每一個勞動者一塊土地。40年代後半期協會宣傳土地改革，反對使用奴隸的種植場主及土地投機分子，並提出了許多其他民主要求(實行十小時工作制、廢除農奴制、取消常備軍等等)。許多德國手工業僑民參加了這一土地改革運動，但是曾經一度參加過全國改革協會的克利蓋和他的集團卻鼓吹“真正的社會主義”那種反動的空洞思想，引誘德國僑民脫離爭取民主的鬥爭。——第9頁。

- 4 指 1789 年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出版的艾·約·西哀士写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級?”(«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中的一段:“什么是第三等級? 都是。它在政治方面直到現在有何作为? 无所作为。它希望什么呢? 希望有所作为。”——第 17 頁。
- 5 埃薩伊是古犹太宗教教派(公元前 2 世紀——公元 3 世紀)。——第 19 頁。
- 6 指海外貿易公司(*Seehandlung*), 这是 1772 年在普魯士設立的貿易信用协会。該协会享有許多重要的国家特权, 它給予政府巨額的貸款, 实际上充任了政府的銀行家和財政經紀人。1904 年該协会正式改为普魯士的国家銀行。——第 21 頁。
- 7 布魯塞爾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給古·阿·克特根的信和其他一些文件一样, 反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想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建立联系, 以便为建立国际无产階級政党打下基础。这封信是答复爱北斐特的社会主义者古·阿·克特根的信(1846 年 6 月 10 日)。古·阿·克特根曾打算把烏培河谷(普魯士萊茵省巴門和爱北斐特两个城市的总称)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的人联合起来。但由于这些人的思想混乱, 馬克思和恩格斯信中提到的关于在烏培河谷建立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的想法, 未能实现。——第 23 頁。
- 8 指 1846 年 6 月通过的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些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輸入谷物的所謂谷物法, 是英国为了大土地占有者即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1846 年的法案的通过, 表明在自由貿易的口号下进行反谷物法斗争的工业資產階級取得了胜利。——第 27 頁。
- 9 指宪章派的領袖奧康瑞尔在 1846 年 7 月的选举会上进行举手表决时战胜了資產階級的議會候选人霍布豪斯一事。英国在 1872 年前, 候选人提名那天, 表决是以举手的方式进行的, 沒有选举权的人也可以参加表决。但是在正式选举那天(在举手表决时已被否決的候选人也有被选权), 有投票权的仅限于具有大量财产和长久居住期限等資格的少数“合法”选民。

尽管有这种反民主的制度, 奧康瑞尔在 1847 年 8 月的投票选举中

仍然获得了多数票而被选进議會。——第 27 頁。

10 包括了宪章派的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議會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宪章包括6点：普选权（年滿21岁的男子）、議會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議會議員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發給議員薪金。1839年和1842年宪章派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請願書都被議會否決了。1847—1848年，宪章派又展开了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群众性运动。——第 28 頁。

11 “北極星报”（《The Northern Star》）是英国的一种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創刊，1852年停刊；該报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4年11月起在倫敦出版。該报的創辦人和主編是非·奥康瑙尔，40年代乔·哈尼也曾任該报主編。1845年9月至1848年3月弗·恩格斯曾为該报撰稿。——第 28 頁。

12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 30 頁。

13 “国民报”（《Le National》）是从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40年代它是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的机关报。

“改革报”（《La Réforme》）是一家法国日报，是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派的机关报；于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到1848年1月期間，恩格斯在該报上發表了許多文章。——第 31 頁。

14 指小册子“高利貸大王路特希尔德第一的富有教益和有趣的故事”，1846年巴黎版（《Histoire édifiante et curieuse de Rothschild I-er, roi des juifs》. Paris, 1846）。該小册子的作者是若·瑪·德恩威尔。——第 32 頁。

15 指1847年2月3日發布的关于召开所謂普魯士联合省議会的国王聖諭。根据这些聖諭，联合省議會應該是1823年确立的各省等級議会的联合会議。联合省議会的职权限于批准新的稅收和貸款，討論法律草案时有發言权和向国王呈交請願書。議会的会期是根据国王的意見決定的。

联合省議会在1847年4月11日開幕，但是由于大多数代表拒絕表決新的貸款，所以在6月就被解散了。——第 33 頁。

- 16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的报纸,1785年创办于伦敦。
- “地球报”(《*The Globe*》)是一家英国报纸“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的简称,1803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机关报,在该党执政的时期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66年起成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33页。
- 17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在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33页。
- 18 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是在1834年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意志所有各邦。普鲁士在这个同盟里起了领导的作用。由于必须建立全德意志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后来也促进了德意志政治上的统一。——第35页。
- 19 1846年2月在波兰的土地上准备了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叛变以及起义的领导者遭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被破坏了,仅仅发生了个别的革命爆发。只有在从1815年起受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国王管制的克拉柯夫共和国,起义者在2月22日获得了胜利,成立了国民政府,颁布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同时,在加里西亚也爆发了乌克兰农民的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波兰小贵族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许多场合挑起了起义的农民和起义的波兰小贵族的队伍之间的冲突。克拉柯夫的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接着奥国政府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1846年11月签订了条约,把克拉柯夫归并奥地利帝国。——第41页。
- 20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42页。
- 21 “特利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1757年在特利尔创刊,1815年起以这个名称出版;从19世纪40年代起成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报纸;40年代中叶开始,接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格律恩就是该报

- 的經常撰稿人之一)的影响,因而受到了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批評。——第 42 頁。
- 22 指比·約·蒲魯东的“經濟矛盾的体系,或貧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I—II, Paris, 1846)。——第 42 頁。
- 23 “萊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倫出版,該报是萊茵省一些对普魯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情緒的資產階級人士創立的。該报會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派撰稿。1842年4月馬克思开始为“萊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該报編輯之一。“萊茵报”也發表了恩格斯的許多文章。在馬克思担任編輯期間,該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質。政府当局对“萊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閉了。——第 42 頁。
- 24 指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神聖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駁布魯諾·鮑威尔及其伙伴”(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3—268頁)。——第 42 頁。
- 25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奧·呂宁創办的月刊。1845年1月—1846年12月在比雷菲尔德出版,1847年1月—1848年3月在帕德波恩出版。——第 43 頁。
- 26 馬克思对1845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卡·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K. Grün. «*Die soziale 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Belgien*» Darmstadt, 1845)一書的評論是“德意志思想体系”的一章,这一章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發表的(參看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德意志思想体系”第2部分第4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3卷第489—534頁)。这篇評論登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1847年8月号和9月号上。——第 43 頁。
- 27 K. Grün. «*Bausteine*». Darmstadt, 1844. ——第 44 頁。

- 28 “德法年鑒”(«*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編是卡·馬克思和阿·盧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一期双刊号。其中載有馬克思的“論犹太人問題”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学批判大綱”和“英国状况。評托馬斯·卡萊尔的‘过去和現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頁)。这些著作标志着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終地轉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和資產階級激进分子盧格之間存在着原則上的意見分歧。——第44頁。
- 29 “新軼文集”(«*Neue Anekdoten*»)收集了莫·赫斯、卡·格律恩、奧·呂宁等人的文章,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于1845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44頁。
- 30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本来預备于1847年以单行本在德国發表的。可是由于出版者被捕,这本小册子就沒有印成。这篇文章的原稿(保存下来的不全)于1929年在苏联第一次發表。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46頁。
- 31 这里指的是“改革报”(«*Réforme*»)的支持者。他們主张建立共和国并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第48頁。
- 32 法国正統主义者是1830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在反对以金融貴族和大資產階級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統主义者常常抓住社会問題进行蠱惑宣传,說自己維護劳动者,使他們不受資產者的剝削。
“青年英国”是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的集团,成立于19世紀40年代初。“青年英国”的活动家們反映了土地貴族对資產階級經濟势力和政治势力的增强心怀不滿,他們采取蠱惑手段,企圖把工人階級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工人階級来反对資產階級。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些集团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叫做封建的社会主义。——第49頁。

- 33 大陆体系，也叫做大陆封鎖，拿破侖于1806年宣布这样一項措施，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其中也包括普魯士)和英国进行貿易。——第52頁。
- 34 二月三日聖諭。——見本卷注15。——第66頁。
- 35 恩格斯这里把柏林以西的施潘道要塞(普魯士实行兵营訓練的中心之一和拘留“国事犯”的地方)的名字，用来象征普魯士反动国家制度。——第66頁。
- 36 指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被鎮压下去以后，普魯士政府同意把克拉柯夫并入奥地利帝国(見本卷注19)。这种做法的后果之一，就是把克拉柯夫列入奥地利的稅界，使普魯士的商品負担高額关稅。——第66頁。
- 37 “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是馬克思主义的極重要的理論著作之一，是卡·馬克思反对小資产階級思想家比·約·蒲魯东的主要作品。1846年12月底，馬克思在讀了出版不久的蒲魯东所著“經濟矛盾的体系，或貧困的哲学”一書以后，就決定批判严重地阻碍在工人中間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蒲魯东观点，同时从科学唯物主义的立場来闡明无产階級革命运动中的許多理論和策略問題。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給俄国文学家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表明了許多極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成为馬克思为反駁蒲魯东而写的这部著作的基础。从恩格斯在1847年1月15日給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1847年1月馬克思就已經着手回答蒲魯东。至1847年4月初，馬克思的这部著作已基本完成并已付印(見本卷第42頁)。1847年6月15日，馬克思为該書写了一篇簡短的序言。

馬克思的这部著作于1847年7月初在布魯塞尔和巴黎出版。該書在馬克思生前沒有再版。該書德文版第一版于1885年出版，譯文曾經恩格斯校訂，他專門为德文版写了一篇序言并加了許多注釋。恩格斯在校訂德文版过程中，参考了馬克思在1876年1月1日送給娜塔麗雅·吳亭娜(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委員尼·伊·吳亭的妻子)的一本1847年法文版上的修正。1886年俄国馬克思主义小組“劳动解放社”出版了維·查苏利奇翻譯的“哲学的貧困”俄文版第一版。該書的德文版第二版于1892年出版。恩格斯写了一篇簡短的序言，糾正原文中

- 某些不準確的地方(見本卷注 48)。恩格斯逝世以後,馬克思的女兒勞拉·拉法格整理的法文版第二版於 1896 年出版,該版也根據馬克思送給娜·吳亭娜的一本上的修正作了更正。——第 71 頁。
- 38 馬克思引自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概論” 1837—1838 年布魯塞爾版第 1—2 卷(Simon de Sismondi. «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T. I—II, Bruxelles, 1837—1838)。——第 81 頁。
- 39 Lauderdale.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origine de la richesse publique».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E. Lagetie de Lavaisse. Paris, 1808, p. 33. ——第 81 頁。
- 40 大·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租稅的原理”,弗·索·孔斯坦西奧譯自英文,附有讓·巴·薩伊的解釋性和批判性的注。1835 年巴黎版第 2 卷第 65 頁(D. Ricardo. «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l'impôt».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F.-S. Constancio, avec des notes explicatives et critiques par J.-B. Say. T. II, Paris, 1835, p. 65)。——第 81 頁。
- 41 指亞·安德森的著作“商業史”(A. Anderson. «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to the Present Time»)。第 1 版於 1764 年在倫敦出版。——第 83 頁。
- 42 安·施托爾希“政治經濟學教程,或論決定人民幸福的原理” 1823 年巴黎版第 1—4 卷(H. Storch.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Exposition des principes qui déterminent la prospérité des nations». T. I—IV, Paris, 1823)。馬克思引用的是第 1 卷。——第 85 頁。
- 43 指 1815 年拿破侖戰爭結束和波旁王朝在法國復辟以後的時期。——第 89 頁。
- 44 亞當·斯密“原富”(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 1 版於 1776 年在倫敦出

版。——第 90 頁。

- 4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96—625頁和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269—587頁。——第95頁。

- 46 布阿吉尔貝尔的文章，引自欧仁·德尔編的“18世紀的財政經濟學家”，1843年巴黎版，文集附有編者所加的作者史略和評注（《Économistes-financiers du XVIII siècle》. Précédés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ugène Daire. Paris, 1843）。——第108頁。

- 47 W. Atkinson.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0. ——第109頁。

- 48 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經濟學”1827年倫敦版(Th. Hodgskin.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27)。

原文誤作霍普金斯(Hopkins)。奧地利資產階級法學家門格爾曾經利用這一點，說馬克思的這段引文毫無根據。在1892年的“哲學的貧困”德文版第二版中，恩格斯改正了這一錯誤。他寫了如下的序言：

“對於這第二版，我只想說幾句話：在法文原文中霍吉斯金這個名字誤作霍普金斯，現已改正；又威廉·湯普遜的著作的出版年份也已改為1824年。希望安東·門格爾教授先生的圖書學良心將因此獲得安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年3月29日於倫敦”——第110頁。

- 49 W. Thompson.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 London, 1824.

T. R. Edmonds. «Practical Moral and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28. ——第110頁。

- 50 J. F. Bray.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Leeds, 1839. ——第110頁。

- 51 1847年6月8日英国議會通过了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但是实际上許多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第116頁。
- 52 馬克思引自伏尔泰所著的“議會史”(«Histoire du parlement»)一書中的一章；該章題目是“摄政时期的財政和約翰·罗的制度”。——第122頁。
- 53 指薩伊为李嘉圖著作的法文版所做的注(見本卷注40),第2卷第206—207頁。——第126頁。
- 54 N. W. Senior. «Political Economy». In: «Encyclopaedia Metropolitana, or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Knowledge». Vol. VI, London, 1836. ——第127頁。
- 55 J. St. Mill.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4.
托·圖克“价格史和1793年到1837年的流通状况”1838年倫敦版第1—2卷(Th. Tooke.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 Vol. I—II, London, 1838)。——第127頁。
- 56 Th. Cooper. «Lectures on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該書第1版于1826年在哥倫比亞出版；第2版增訂版于1831年在倫敦出版。——第128頁。
- 57 M. Th. Sadler. «The Law of Population». Vol. I, London, 1830, p. 83, 84. ——第129頁。
- 58 指魁奈的两部主要經濟著作：“經濟表”1758年版(«Tableau économique» 1758)和“經濟表的分析”1766年版(«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 1766)。——第139頁。
- 59 馬克思暗指魁奈的同时代人尼·勃多于1770年發表的著作“經濟表說明”(«Explication du Tableau économique»)。——第139頁。
- 60 乔·威·弗·黑格尔“邏輯学”第3卷；全集1841年柏林第二版第5卷第320頁(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Bd. III;

- Werke, 2-te Aufl., Bd. V, Berlin, 1841, S. 320)。——第 141 頁。
- 61 这几个字馬克思引自卢克莱茨的詩篇“事物的本性”(第 3 册第 869 首)中的一句：“不死的死夺去了有死的生”(«mortalem vitam mors immortalis ademit»)。——第 144 頁。
- 62 A. de Villeneuve-Bargemont. «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該書第一版于 1839 年在布魯塞尔出版。——第 153 頁。
- 63 馬克思引用的是亚当·斯密的“原富”的法文本：«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T. I, Paris, 1802, p. 33—34. ——第 160 頁。
- 64 勒蒙特指他自己的著作：“理智和愚蠢各抒己見(供年长智低者閱讀的簡明倫理教程)” 1801 年巴黎版(«Raison, folie, Chacun son mot; petit cours de morale mis à la portée des vieux enfants». Paris, 1801)。
- 馬克思引証的是勒蒙特的作品：“分工的道德影响”(Influence morale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勒蒙特在这一著作里引了上一著作。——第 160 頁。
- 65 A. Ferguson.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civile». T. II, Paris, 1783, p. 108—110. ——第 161 頁。
- 66 查·拜比吉“論機器和工厂的經濟性質” 1833 年巴黎版第 230 頁(Ch. Babbage. «Traité sur l'é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 Paris, 1833, p. 230)。——第 168 頁。
- 67 A. Ure.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 ou Économie industrielle». Bruxelles, 1836, t. I, première partie, chapitre I. ——第 171 頁。
- 68 P. Rossi.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T. I—II, Paris, 1840—1841. ——第 178 頁。
- 69 J. Steuart. «Recherche 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 T. II, Paris, 1789, 190—191. 該書英文第一版于 1767 年在倫敦出版。——第 180 頁。
- 70 伏尔泰“有四十个埃巨的人”(«L'homme aux quarante ecus»)。——第 181 頁。
- 71 威·配第“政治算术”(W. Petty. «Political arthmetick»), 見他所著“政治算术論文集”一書, 1699 年倫敦版 («Several essays in political arithmetick», London, 1699)。——第 191 頁。
- 72 当时在法国实行的法律, 如 1791 年資產階級革命时期中制宪會議通过的所謂列沙白里哀法案和拿破侖帝制时期制訂的刑法典, 禁止工人建立工人联合会和組織罢工, 违者受到严厉的惩处。在法国, 对职工会的禁令到 1884 年才撤消。——第 194 頁。
- 73 全国职工联合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ted Trades*) 是工联的組織, 1845 年在英国成立。联合会的活动限于爭取出卖劳动力的优惠条件和改善工厂立法的經濟斗争。联合会一直存在到 60 年代初, 但是 1851 年以后它在工会运动中沒有起多大作用。——第 196 頁。
- 74 乔治·桑的历史小說“揚·瑞日卡”的序。——第 198 頁。
- 75 “揚恶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 是理·謝里敦所写的一个五幕喜劇。——第 199 頁。
- 76 潘多拉的盒子是装满罪恶和糾紛的盒子。这是一个文学典故, 源出于古希腊神話中潘多拉的故事。潘多拉由于好奇, 打开了装着各种各样祸害的盒子并把祸害散布出来。——第 201 頁。
- 77 指法国众議院里面支持基佐政府的反动多数。——第 201 頁。
- 78 卡·馬克思的“‘萊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 是为回答反动的普魯士政府人士想通过宣传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使人民群众脱离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 并利用他們来反对資產階級反对派而写的。当时馬格德堡的国教顧問、后来的保守党領袖之一格·瓦盖納(馬克思批判的这篇文章可能就是他写的), 仗着宗教、教育、医

务部大臣艾希霍恩的庇护，进行了这种宣传。

后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拉薩尔派向俾斯麦政府和容克地主的阿諛諂媚时，把这篇文章当做論証工人政党对“普魯士国王政府的社会主义”的不可調和的立場的文献（見馬克思和恩格斯 1865 年 2 月 23 日給“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的声明）。

“莱茵观察家”（*«Rheinischer Beobachter»*）是一家保守的日报；1844 年起在科倫出版；德国 1848 年 3 月革命后停刊。——第 207 頁。

79 “德意志—布魯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魯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創办的；1847 年 1 月創刊，1848 年 2 月停刊。起初，該报的方針是以它的編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力求調和激进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別这种意圖决定的。但从 1847 年夏天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战友在該报發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 年 9 月起，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該报的經常撰稿人并对該报的方針开始發生直接影响，1847 年最后几个月，他們实际上已經掌握了該报的編輯工作。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該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 207 頁。

80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1847 年 4 月 11 日在普魯士联合省議會開幕时發表的御前演說。国王在这篇演說中宣布，他永远也不会讓“君主和人民之間的自然关系‘变成’有条件的、宪法上的”关系，讓“写滿了字的紙”来代替“亘古以来神聖的忠誠”。——第 220 頁。

81 恩格斯在 1846 年底开始写“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这篇評論。到 1847 年初恩格斯写成了一篇評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論歌德”一書的文章（即本文第二部分的基础）。恩格斯打算把这篇文章加以修改后补入他和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思想体系”中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那一章（見恩格斯 1847 年 1 月 15 日給馬克思的信）。不过本文只是以单篇文章發表在 1847 年 9 月至 12 月的許多号“德意志—布魯塞尔报”上。——第 223 頁。

82 恩澤拉德（或恩克拉德），古希腊神話中和奧林帕斯山上諸神战斗的

巨人之一。——第 224 頁。

- 83 这是按照巴伐利亚的路德維希的“二行詩”中的两句改写的。

巴伐利亚的国王路德維希一世的詩是典型的詞藻华丽而毫无內容的詩，这些詩后来已被完全遺忘了。——第 224 頁。

- 84 “萊比錫总匯报”(«*Leipziger 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37 年創刊。19 世紀 40 年代初是資產階級的进步報紙。在普魯士境內于 1842 年 12 月 28 日由內閣下令禁止發行，而在薩克森該报則出版到 1843 年 4 月 1 日为止。該报的題詞是：“真理和权利，自由和法律”。——第 225 頁。

- 85 法国烧炭党人的密謀团体是以意大利同一名称的团体为榜样，于 1820 年底—1821 年初成立。这个团体的支部称“温特”。把各种政治派別的代表人物联合在自己队伍里的法国烧炭党人的目的是要推翻波旁王朝。1822 年密謀策动在許多城市(伯尔福，罗舍尔等等)的駐軍里同时举行起义。烧炭党人团体在密謀失敗和几个領袖被处死刑后，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第 227 頁。

- 86 穆西烏斯·賽沃拉是古代羅馬的传奇式的英雄；相传他当着于公元前 507 年围困羅馬的伊特刺斯坎王的面，焚燒自己的右手，以証明羅馬人的勇敢和爱国精神。——第 227 頁。

- 87 “世紀报”(«*Le Siècle*»)是 1836 年至 1939 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日报。在 19 世紀 40 年代該报反映了一部分仅限于要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小資產階級的观点。——第 227 頁。

- 88 青年德意志派是 19 世紀 30 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代表，海涅和白尔尼对这一团体有很大的影响。“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茲科夫、文巴尔克和蒙特等)在他們的文艺作品和政論中反映出小資產階級的反抗情緒，他們起来捍衛信仰和出版自由。“青年德意志”的一些代表宣传犹太人解放的思想。青年德意志派的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們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墮落成为庸俗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第 234 頁。

- 89 指1844年6月后半月布拉格紡織工人的自發的起義。布拉格事件在捷克其他許多工業中心(列勃里茲、捷克的菩提樹等)引起了工人騷動。在運動中發生了破壞工廠和搗毀機器的事情。這次運動被政府軍隊殘酷地鎮壓下去。——第236頁。
- 90 “光明之友”是一種宗教派別。它反對在官方新教中占統治地位的、以極端神秘和虛偽為特征的虔誠主義。這個宗教反對派是19世紀40年代德國資產階級對德國反動制度不滿的一種表現形式。——第241頁。
- 91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一場(“夜”) (見郭沫若譯“浮士德”第一部195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第27頁。——譯者注)。——第245頁。
- 92 恩格斯指的是“自然體系，或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規律”一書，法國科學院常任秘書和該院四十個委員之一米拉波先生著，1770年倫敦版(«Système de la Nature ou Des Loix du Monde Physique et du Monde Moral». Par M. Mirabaud, Secrétaire Perpétuel et l'un des Quarant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Londres, 1770)。本書的真正作者是法國唯物主義者保·亨·霍尔巴赫。為了不暴露自己，他在自己的書上署了1760年逝世的法國科學院秘書米拉波的名字。——第246頁。
- 93 引自歌德的詩“哀的美敦書”(“上帝和宇宙集”)。——第247頁。
- 94 英國作家艾迪森的悲劇“卡托”寫于1713年；歌德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寫于1774年。——第248頁。
- 95 1819年的聯邦決議是1819年8月在卡爾斯巴德(卡羅維發利)召開的德意志聯邦各邦代表會議上制定的一系列反動的決議。這些決議規定在德意志各邦內實行書報預先檢查制度，對大學實行嚴格的監督，禁止組織學生團體，成立中央調查委員會來調查反政府的嫌疑分子(所謂“蠱惑人心者”)。鼓吹實施這些警察措施的人是奧地利首相梅特涅。——第249頁。
- 96 指畢舍和盧-拉維涅出版的“法國革命議會史，或1789年到1815年的

国民會議日志” 1834—1838 年巴黎版第 1—40 卷 (《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ou Journal des assemblées nationales, depuis 1789 jusqu'en 1815》. T. I—XL, Paris, 1834—1838)。——第 249 頁。

- 97 热月九日是 1794 年 7 月 27 日法国反革命政变的日子，在这一天顛复了雅各宾党人的政府，建立了反革命的大資產階級的統治。

霧月十八日是 1799 年 11 月 9 日政变的日子，在这一天法国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勢力取得了勝利；政变的結果建立了拿破侖·波拿巴的專政。——第 250 頁。

- 98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史講義”第 3 編；全集第二版第 15 卷 1844 年柏林版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Th. III; Werke, 2-te Aufl., Bd. XV, Berlin 1844)。——第 250 頁。

- 99 指格律恩的“政治和社会主义”一文。

“萊茵社会改革年鑒”(《*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 杂志是激进政論家海·皮特曼办的；共出版过两卷，第 1 卷于 1845 年 8 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 2 卷于 1846 年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別列塢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要取得在德国宣传共产主义观点的陣地，就必须利用杂志。在該杂志第 1 卷中載有弗·恩格斯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說”，在第 2 卷中載有他的“在倫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卷第 602—626 頁和第 662—676 頁)。但是年鑒的总的方向已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德意志思想体系”(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 3 卷第 7—544 頁) 中对該杂志进行了尖銳的抨击。——第 251 頁。

- 100 見馬克思的“論犹太人問題”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436—443 頁)。——第 251 頁。

- 101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場“浮士德的書齋”(見郭沫若譯“浮士德”第

- 一部 195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 93 頁。——譯者注)。——第 251 頁。
- 102 見馬克思的“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440—442 頁)。——第 252 頁。
- 103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聖家族, 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駁布魯諾·鮑威爾及其伙伴”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卷第 158—170 頁)。——第 252 頁。
- 104 沙·傅立叶“論家务农业协作”第 1—2 卷, 1822 年在巴黎和倫敦两地出版(Ch. Fourier. «Traité de l'association domestique-agricole». T. I—II, Paris-Londres, 1822)。——第 253 頁。
- 105 歌德“瑞士来信”第一部分。这本著作是歌德在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出版以后以書信(这些信是假設在这本小說的主人公的書信中發現的)的片断形式写成的。——第 259 頁。
- 106 “法兰克福学术通报”(«Frankfurter Gelehrte Anzeigen») 是德国杂志, 1772 年在法兰克福創刊, 1790 年停刊; 1772 年歌德、海德及其他进步作家和学者等为該杂志的編輯委員。——第 261 頁。
- 107 引自歌德的詩集“威尼斯警句”。——第 262 頁。
- 108 歌德“赫曼与賽綠苔”第 9 首歌(見郭沫若譯“赫曼与賽綠苔”1956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 91 頁。——譯者注)。——第 264 頁。
- 109 乔·威·弗·黑格尔“历史哲学講义”緒論(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Einleitung) (参看 1956 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版“历史哲学”第 108 頁。——譯者注)。——第 264 頁。
- 110 歌德“論自然科学。一些見解和格言”(引自“散文中的名言集”)。——第 265 頁。
- 111 法国众議院之“腹”——見本卷注 77。——第 265 頁。
- 112 歌德“温和的諷刺詩”第 4 节。——第 268 頁。

- 113 保皇党人是12世紀羅馬教皇和德国皇帝进行斗争期間在意大利成立的一个政党。成員主要是拥护皇帝的封建貴族，它和教皇的政党即教皇党人(意大利城市中的商业手工业階層上層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保皇党和教皇党一直存在到15世紀。但丁認為皇帝的权力是克服意大利的封建割据的手段，他从1302年参加了保皇党。——第272頁。
- 114 歌德的詩“虛无！虛无中的虛无！”(«Vanitas! vanitatum vanitas!»)中的两句的改写。——第272頁。
- 115 引自歌德的“警句集”中的四行詩“警告”(蒂姐妮亚〔Titania〕和波頓〔Bottom〕是歌德借自莎士比亚的喜劇“仲夏夜之夢”中的人物。蒂姐妮亚是个仙后，波頓是个愚蠢的小人物的形象。參看朱生豪譯“莎士比亚戏剧集”1954年作家出版社版第一册。——譯者注)。——第275頁。
- 116 F. Bastiat. «Sophismes économiques». 該書第一版于1846年在巴黎出版。——第278頁。
- 117 阿·布朗基的“歐洲政治經濟学从古代到現代的历史”(A. Blanqui. «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n Europe depuis les anciens jusqu'à nos jours»). 該書第一版于1837年在巴黎出版。——第279頁。
- 118 指边沁曾委托包林把他的骨格应用于学术方面，这里即指包林为完成这一委托应負的責任。——第279頁。
- 119 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徹斯特的厂主科布頓和布莱特于1838年創立的。同盟要求貿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見本卷注9)，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資，削弱土地貴族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企圖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第280頁。
- 120 沙·杜諾瓦耶的“論劳动自由，或关于人的力量能够得到最大發揮的条件的簡述”1845年巴黎版第1—3卷(Ch. Dunoyer. «De la liberté

du travail, ou Simple exposé des conditions dans lesquelles les forces humaines s'exercent avec le plus de puissance» T. I—III, Paris 1845)。——第 280 頁。

- 121 “德意志—布魯塞爾報”未再發表有關該會議的其次幾次會議的報道。關於這些會議，可以參看恩格斯發表在“北極星報”上的“討論自由貿易問題的布魯塞爾會議”一文（本卷第 285—296 頁）。——第 281 頁。
- 122 “保護關稅派、自由貿易派和工人階級”一文是馬克思準備在布魯塞爾的經濟學家會議上發表的演說全文的一部分。馬克思在會議上沒有得到發言的機會，會議閉幕以後，他就把演說整理了一下，發表在 1847 年 9 月 29 日的比利時報紙“民主工場報”上。傳到我們手裏的只是這篇演說頭一部分的德譯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約·魏德邁 1848 年曾在哈姆把這部分譯文和馬克思 1848 年 1 月 9 日發表的關於自由貿易的另一篇演說（見本卷第 444—459 頁）的譯文一起發表。魏德邁會把演說最後一部分刪掉，理由是這部分的內容和 1 月 9 日的演說是重復的。恩格斯的“討論自由貿易問題的布魯塞爾會議”一文也引用了馬克思這篇演說的內容（見本卷第 292—296 頁）。——第 282 頁。
- 123 指古·居利希的“關於現代主要商業國家的商業、工業和農業的歷史敘述”1830—1845 年耶拿版第 1—5 卷（G. Gülich.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erer Zeit». Bd. I—V, Jena, 1830—1845）。——第 282 頁。
- 124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是英國經濟、政治方面的周刊，1843 年起在倫敦出版，大工業資產階級的機關刊物。——第 285 頁。
- 125 “同盟”（《The League》）是英國資產階級雜誌，反谷物法同盟的機關刊物；於 1843—1846 年在倫敦出版。
- “曼徹斯特衛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國資產階級報紙，自由貿易派的機關報，後來是自由黨的機關報；從 1821 年起在曼徹斯特出版。——第 286 頁。

- 126 1842年8月，反谷物法同盟企圖利用宪章运动来同政府及大地主进行斗争，于是就恣意工人行动起来。然而大规模的罢工和骚动吓坏了自由资产阶级，结果它支持对工人的镇压。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挑拨行动加速了宪章派和他们的决裂。——第289頁。
- 127 指1831年和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遭到血腥的镇压，以及1847年初在比桑歇(屬安德尔省)飢餓的工人因搶劫投机商販的粮車和倉庫而遭到政府軍队的屠杀。——第289頁。
- 128 指卡·海因岑的“普魯士的官僚制度”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K. Heinen. «Die Preußische Bürokratie». Darmstadt, 1845)和雅·費奈迭的“普魯士和普魯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J. Venedey. «Preussen und Preussenthum». Mannheim, 1839)。——第298頁。
- 129 海因岑想象中的未来的德国是与瑞士联邦类似的自治区共和联邦。当时許多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正是把这一内容加进了德国统一的口号，统一的象征就是黑紅黃三色旗。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这样解释德国统一的口号是小资产阶级狭隘性和不能坚决反对分离主义和分散主义的表现。与此相反，他們提出了在德国建立统一的集中的民主共和国的要求。——第299頁。
- 130 恩格斯列举了中世紀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1381年)和杰克·凱德起义(1450年)、法国1358年的农民起义(查克里)和德国1524—1525年的农民战争。后来，恩格斯在研究农民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史和农民在1848—1849年革命期間举行革命发动的經驗的基础上，改变了自己对农民运动的評價。他在“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出版)等著作中，指出了农民起义的革命解放性質及其在搖撼封建制度的基础方面所起的作用。——第301頁。
- 131 斯騰托尔，荷馬的“伊利亚特”中的人物，一个有不平常的高嗓子的勇士。——第304頁。
- 132 指尤·弗呂貝尔的“社会政治体系”，“新政治”1847年曼海姆第二版第1—2卷(J. Fröbel. «System der socialen Politik». Zweite

- Auflage der «Neuen Politik». Th. I—II, Mannheim, 1847)。
以“新政治”为書名的第一版于1846年用笔名尤尼烏斯出版。——第305頁。
- 133 伊留米納特(直譯为“照耀派”),是1776年在巴伐利亚成立的靠近共济会的秘密团体的成員。該团体是由不滿国王专制制度的市民和貴族反对派組成的。同时伊留米納特的一个特点是害怕一切民主运动;他們的章程也反映了这一点:該章程把普通會員都变成了領導人員的盲目工具。1784年,該团体被巴伐利亚当局搗毀。——第311頁。
- 134 海涅的“阿塔·特洛尔”第24章。——第314頁。
- 135 «Der Heinzen'sche Staat. Eine Kritik von Stephan». Bern, 1847. Gedruckt bei E. Rätzer. ——第315頁。
- 136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316頁。
- 137 約·諾克斯“貴族的土地占有权”1847年倫敦版。(J. Noakes. «The Right of the Aristocracy of the Soil». London, 1847)——第316頁。
- 138 出版宪章派日报“民主主义者”(«Democrat»)的計劃后来并没有实现。——第317頁。
- 139 只有極少数享有选举权的人才能参加投票表决(見本卷注8)。——第317頁。
- 140 “工場”(«L'Atelier»)是一种法文月刊,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1840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編輯部由工人代表組成,每三月改选一次。——第319頁。
- 141 指1847年10月21日“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第84号上發表的一篇海因岑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代表’”(«Ein «Repräsentant» der Kommunisten»)。——第322頁。
- 142 伏拉松是羅馬剧作家忒倫底烏斯的喜劇“太监”中的人物,是一个好吹噓的糊塗軍人。——第322頁。

- 143 索洛蒙和馬科尔夫(或莫罗尔夫)是14、15世紀德国滑稽剧(短篇諷刺故事)中的人物;通过索洛蒙的形象描写一个賢明而不切实际的君主,通过馬科尔夫的形象描写一个机智的农民。——第323頁。
- 144 昆圖斯·菲克斯萊恩是讓·保尔(約·保·弗·李希特尔的笔名)的小說“昆圖斯·菲克斯萊恩的一生”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位小学教师。——第326頁。
- 145 指“德意志—布魯塞尔报”(1847年9月26日第77号)上登載的一篇卡·海因岑的論战性文章,該文攻击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为此,恩格斯發表了“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进行反駁。——第326頁。
- 146 关于中世紀的公社参看“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和1890年德文版恩格斯注(本卷第468頁)。——第333頁。
- 147 馬克思指“真正平等派”(“真正平均主义者”),亦即“掘地派”,他們是17世紀英国資产階級革命运动时期極左派的代表。“掘地派”代表城乡貧民階层的利益,他們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圖通过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第334頁。
- 148 菲·邦納罗蒂“为平等而密謀,又名巴貝夫的密謀”1828年布魯塞尔版第1—2卷(Ph. Buonarroti. «Conspiration pour l'égalité dite de Babeuf». T. I—II, Bruxelles, 1828)。他这本书使工人革命运动中重新恢复了巴貝夫的传统。——第334頁。
- 149 馬克思引証的是以梅勒迪斯为主席的济貧法实施調查委员会于1825年1月29日向宾夕法尼亚州議会的众議院提出的报告。該报告發表于1828年8月的“宾夕法尼亚紀事报”。——第336頁。
- 150 “奈尔斯氏每周紀事”(«Niles' Weekly Register»)是美国一种有关政治、經濟、历史和地理問題的綜合性周刊,1811—1849年在巴尔的摩出版。——第336頁。
- 151 指弗·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斯圖加特和杜宾根版

- (F. List.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Stuttgart und Thübingen, 1841)。——第 337 頁。
- 152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場（參看朱生豪譯“莎士比亚戏剧集”1954年作家出版社版第十二册第194頁。——譯者注）。——第 338 頁。
- 153 指 1835 年 9 月法国政府頒布的反动法令。該法令限制陪审法庭的活动，并采取了严厉措施对付出版物。在出版方面規定增加期刊的押金，如果發表反对私有制和現行国家制度的言論則处以囚禁和課以巨額罰金。——第 345 頁。
- 154 排毒法 是用人工刺激皮膚的表面而引起潰瘍，中世紀的医术認為这是排出“病毒”的办法。——第 345 頁。
- 155 見卡·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52—467頁）。——第 346 頁。
- 156 指 1844 年 6 月 4—6 日西里西亚紡織工人的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資產階級之間第一次大規模的階級搏斗）和 1844 年 6 月下半月捷克工人的起义（見本卷注 89）。——第 346 頁。
- 157 指汉巴赫大典进行时唱的歌曲，这次大典于 1832 年 5 月 27 日在巴伐利亚邦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德国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組織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發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團結一致反对德国君主，为爭取資產階級自由和宪制改革而斗争。——第 346 頁。
- 158 指 1793 年夏吉倫特派（大資產階級政党）掀起的反革命暴乱，他們打着保衛各省的自治权和联合权的旗帜反对雅各宾政府。暴乱平息以后吉倫特派有許多領袖（包括巴巴魯在內）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第 350 頁。
- 159 公安委员会是法国革命政府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 年 6 月 2 日—1794 年 7 月 27 日）的中央机关。——第 350 頁。
- 160 指德国資產階級教育学家約·亨·康培所写的兒童讀物，具体指他的

- “美洲的發現”一書，其中有一節是講秘魯的印加族和西班牙人占領秘魯的故事。——第 350 頁。
- 161 “總匯報”(《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國的一種反動日報，1798 年創刊；1810 至 1882 年在奧格斯堡出版。1842 年發表了捏造的空想共產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在其“共產主義和奧格斯堡‘總匯報’”一文中揭露了這種捏造，該文發表在 1842 年 10 月“萊茵報”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130—134 頁)。——第 352 頁。
- 162 弗·恩格斯的著作“共產主義原理”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綱領草案。關於以問答方式擬定綱領的問題，早在正義者同盟進行改組和改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1847 年 6 月)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前就進行過討論。1847 年 9 月，共產主義者同盟倫敦中央委員會(沙佩爾、鮑威爾、莫爾)把“共產主義問答”分發給同盟的各個區部和支部。這個帶有空想社會主義影響痕跡的文件不能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滿意，同樣，“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莫·赫斯在巴黎擬定的“修正”草案也不能使他們滿意。10 月 22 日，在巴黎共產主義者同盟區部委員會的會議上，恩格斯尖銳地批評了赫斯的草案，使它遭到否決。恩格斯受委託起草新的草案。這個草案就是很快寫成的“共產主義原理”。
- 恩格斯把“共產主義原理”僅僅看成是綱領的初稿，他在 1847 年 11 月 23—24 日給馬克思的信中會談到應當以“共產主義宣言”的形式來起草綱領的想法，而拋棄那陳舊的問答方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1847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8 日)上捍衛了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的科學基礎，大會委託他們以宣言的形式擬定綱領。在寫作“共產黨宣言”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曾運用了“共產主義原理”中提出的一系列的原則。——第 357 頁。
- 163 在手稿中，在回答第二十二個問題以及下面一個即第二十三個問題的地方，寫着“保留原案”等字樣。顯然，這是說答案應當仍維持原案，即仍照已失傳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綱領的初步草案之一中業已擬定的答案。——第 372 頁。

- 164 本文是恩格斯为“改革报”写的，同时也刊载于1847年11月6日宪章派机关报“北極星报”第524号。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375頁。
- 165 指1847年10月25日在倫敦为庆祝宪章派領袖菲格斯·奧康瑙尔及几个激进派活动家当选議會議員而举行的宴会。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378頁。
- 166 19世紀40年代初，英国資产階級激进派的代表們曾要求实行所謂的完全选举权，完全选举权这个概念十分含糊，可作各种解释。資产階級激进派提出这个要求，是企圖使工人脱离为实现宪章派的社会綱領和政治綱領而进行的斗争，并使工人运动处于他們的影响之下。——第378頁。
- 167 1840年7月建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涨的年代，會員曾达4万名之多。协会的活动表明协会会员缺乏思想上和策略上的一致，表明宪章派大多数領袖有小資产階級思想意識。1848年宪章运动失敗后，协会趋于衰落，至50年代完全停止活动。——第379頁。
- 168 指1831年英国下院通过、1832年6月上院終於批准的选举法改革。这次改革是反对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政治垄断，并为工业資产階級的代表进入議会打开通路。争取改革的斗争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和小資产階級被自由資产階級所欺騙，沒有获得选举权。——第380頁。
- 169 1847年10月30日“北極星报”第523号刊登了拉馬丁宣言的摘录。——第381頁。
- 170 “公益报”（*Le Bien Public*）是法国温和的資产階級共和派的机关报；于1843年8月至1848年12月間出版（最初在馬康，从1848年5月起改在巴黎）。拉馬丁参加了报纸的創辦和出版工作。——第384頁。
- 171 本文是因瑞士爆發七个天主教州所發动的內战而写的。这些經濟上落后的州在1843年就已成立了分离的同盟（分离派同盟），目的是抵制瑞

士先进的资产阶级实行的各种改革并保卫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分离派同盟的首領是天主教僧侶和城市的上層貴族。該同盟的反动企圖遭到了 40 年代中叶已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議會里占居优势的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 年 7 月議會通过了解散分离派同盟的決議，分离派同盟就以此为借口在 11 月对其他各州采取了軍事行动。11 月 23 日分离派同盟的軍隊被联邦政府的軍隊所粉碎。由于这一胜利和 1848 年通过的新宪法，瑞士由国家联盟改成为联盟国家。——第 385 頁。

- 172 威廉·泰尔是 13 世紀末到 14 世紀初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战争的民間傳說中的英雄；据說，他百發百中的箭术射死了奥地利地方长官。

文克里特是傳說中的瑞士战士；相传在 1386 年 6 月 9 日，当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軍隊在森帕赫（屬琉森州）城下作战的时候，他舍身杀敌决定了瑞士人的胜利。

穆尔顿是瑞士夫賴堡州的一个城市；是 1476 年 6 月 22 日瑞士人同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的軍隊作战的地方，这次战役瑞士人获得最終的胜利。——第 385 頁。

- 173 恩格斯所說的“旧瑞士”是指 13 世紀到 14 世紀构成瑞士联盟雛形的瑞士的山地各州。——第 385 頁。

- 174 指日耳曼部落为反抗羅馬征服者跟羅馬人在条多堡森林进行的战役（公元 9 年）。战役以羅馬軍团的潰灭而告終。——第 385 頁。

- 175 1315 年 11 月 15 日在莫尔加頓城下發生了瑞士的义勇軍和哈布斯堡列奥波特的軍隊之間的战役，結果瑞士人获得胜利。——第 386 頁。

- 176 馬拉松、普拉迪和薩拉密斯是波希战争（公元前 500—449 年）时期的几次大战的地方，这些战斗都以希腊人得胜而告終。——第 386 頁。

- 177 格留特利的宣誓是关于建立瑞士联盟的一种傳說，这个联盟的基础是 1291 年由山地的三个州即什維茲、烏利和下瓦尔頓締結的协定所奠定。相传这三个州的代表于 1307 年在格留特利（或留特利）草地会合，

- 宣誓要忠于联盟，共同反抗奥地利的統治。——第 387 頁。
- 178 格兰桑 是瓦得州的一个城市，1476 年 3 月 2 日瑞士的步兵在这个城的附近打败了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
- 南锡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1477 年 1 月 5 日大胆查理的军队在該城下为瑞士人、洛林人、亚尔萨斯人和德国人所歼灭。——第 387 頁。
- 179 安提諾是羅馬皇帝阿德里安(公元 2 世紀)的近侍，以异常的俊美而著名。——第 389 頁。
- 180 什陶法赫尔 是 13 世紀末到 14 世紀初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战争中的传奇人物；据说他是瑞士联盟的奠基人之一。——第 390 頁。
- 181 关于在紅宮里举行的宴会的报道載于 1847 年 7 月 17 日“北極星报”第 508 号。——第 395 頁。
- 182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 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15 年到 1870 年每日在巴黎出版；40 年代它是奥尔良派中温和的一派的机关报；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反映了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 年 12 月政变以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398 頁。
- 183 恩格斯所描写的巴黎事件發生在 1847 年 8 月底和 9 月上半月；起因是聖奧諾萊街的皮鞋工厂的工人由于厂主企圖克扣一个工人的工資而和厂主發生冲突。——第 401 頁。
- 184 L. Blanc.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該書第一版于 1840 年在巴黎出版。——第 402 頁。
- 185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 403 頁。
- 186 “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員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間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于 1845 年在倫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 1845 年 9 月

22日各国民派會議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會議上成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离开倫敦并没有出席这次會議。他們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經常的联系，竭力以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协会会员(特别是1847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协会的无产階級核心)，并通过协会从思想上影响宪章运动。协会会员的理論上的幼稚观点，曾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

1848年宪章派失敗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到1853年协会就徹底瓦解了。——第404頁。

187 万国联盟，或人民万国联盟是英国資产階級激进派和主张自由貿易的自由派1847年在倫敦成立的团体。托·庫伯、威·福克斯、約·包林以及民主派政論家、詩人和艺术家威·林頓都参加了联盟的創立工作和活动。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流亡者中某些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团体，例如朱·馬志尼就是該联盟的發起人之一。1848年联盟的活动(組織群众大会、講解国际問題以及散發批評文章)即告停止。——第404頁。

188 1840年法国政府借口巩固国都以防外敌入侵，在巴黎四周着手建筑許多孤立的堡垒。七月王朝的統治集团企圖以这些堡垒来对付人民的起义。民主主义集团坚决反对在巴黎建筑新的“巴士底獄”。但是大部分資产階級反对派的代表，包括“国民报”的拥护者在內，却以巩固国防为由，替建筑堡垒辯护。——第408頁。

189 恩格斯关于法国改革运动的下一篇通訊，載于1847年12月18日的“北極星报”。“德意志—布魯塞尔报”也發表过类似內容的通訊。本卷所刊载的是根据“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發表的那篇通訊譯出的(見本卷第423—426頁)。——第408頁。

190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409頁。

191 恩格斯的这篇通訊是以書信形式写給“改革报”編輯的。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413頁。

192 民主协会于1847年秋在布魯塞尔成立，它把无产階級革命者(其中

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民主进步分子團結在自己的队伍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协会的成立起了積極的作用。1847年11月15日,馬克思当选为該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馬克思的影响下,布魯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国資產階級二月革命时期,布魯塞尔民主协会中的无產階級成分曾設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爭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尔和比利时当局拘捕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以后,比利时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就不能領導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民主协会的活动就成了更狹窄和純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第413頁。

- 193 馬克思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比利时小資產階級政論家阿·巴泰尔斯向侨居比利时的革命流亡者發动的并被反动僧侶集团所利用的誹謗运动。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416頁。

- 194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末在布魯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啓蒙教育和向他們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无產階級革命力量的合法中心。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魯塞尔支部。协会在建立布魯塞尔民主协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848年法国資產階級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該会成員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驅逐出境,协会在布魯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416頁。

- 195 “布魯塞尔报”(«*Journal de Bruxelles*»)是比利时保守的僧侶的报纸,天主教集团的机关报;1820年开始出版。——第417頁。

- 196 宣传信仰协会(*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是17世紀时神甫所創立的天主教組織,目的是在各国传播天主教以及和异教作斗争。协会是羅馬教皇及天主教集团的反动政治工具之一。——第417頁。

- 197 馬克思指的是1847年12月4日“北極星報”上关于1847年11月29日在倫敦举行的紀念1830年波兰起义的會議的报道。該报道对馬克思在会上的演說作了刪减，并且轉述得不确切。1847年12月9日“德意志—布魯塞尔報”上所發表的演說詞比較完整确切(見本卷第409—410頁)。——第417頁。
- 198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議院中的一个反对派集团。这个集团中反映工商业資產階級自由派情緒的人們，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認為这是避免革命和保存奥尔良王朝的方法。王朝反对派的首領是奥迪隆·巴罗。——第420頁。
- 199 入市稅是城市对輸入的日用品所征收的稅。——第421頁。
- 200 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是19世紀40年代法国工人創立的从事密謀活动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的會員。他們都受到法国空想共产主义中革命派和唯物派代表人物德奧多·德薩米的思想影响。对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会员的审判發生于1847年7月，結果他們被判长期監禁。——第422頁。
- 201 1847年12月18日“北極星報”發表过恩格斯的一篇通訊“法国的改革运动。第戎的宴会”，后来“德意志—布魯塞尔報”又以“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說”为題發表了这篇通訊的摘要。——第423頁。
- 202 路易·勃朗以为似乎法国是独一无二的文明传播者，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就集中注意力揭露这个民族主义的論点，沒有打算在同勃朗的論战中揭露資本主义国家在經濟落后的国家里传播的資產階級“文明”的本質。在論述印度、爱尔兰、中国、伊朗等的書信和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些国家之被拖入資本主义关系之中，是由于英国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进行殖民奴役，使它們成为宗主国的农业原料附屬地，是由于殖民者无耻地掠夺它們的天然財富并残酷地剝削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3年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来結果”一文中写道：“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資產階級文明的故乡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的伪善和它所固有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了，因为在故乡它还装出一付道貌岸然的

- 模样,而在殖民地它就一点也不加掩饰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 1954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1 卷第 334 页)。——第 424 页。
- 203 1846 年,基佐政府达到了使西班牙女王王位继承者和路易-菲力浦的幼子结亲的目的,破坏了英国打算使科布尔克公爵列奥波特和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联姻的计划。在 1847 年瑞士内战时期,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设法洗雪了英国外交上的这一耻辱。他一面怂恿基佐提出五国干涉计划来支持分离派同盟,一面却在暗地里拆后者的台。基佐的外交手腕全盘失败。——第 430 页。
- 204 屠杀里昂工人的事件发生在 1831 年和 1834 年里昂纺织工人起义的时候。
- 1842 年 8 月在普累斯顿英国工人和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这个事件是当时英国许多工业基地汹涌澎湃的自发的宪章运动浪潮中的一个插曲。
- 兰根比劳是西里西亚的一个村镇,1844 年 6 月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中心之一,也是政府军队屠杀织工的地点。
- 1844 年夏天在布拉格,政府军队屠杀了起义的工人。——第 433 页。
- 205 指附在 1793 年共和国宪法前面的人权及公民权宣言。这部宪法是法国 1792 年 8 月 10 日推翻了君主国以后所召开的国民公会制定的。——第 435 页。
- 206 «Chant du départ» (“进军曲”)——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后来在法国人民群众当中也非常流行。——第 436 页。
- 207 指宪法宪章 (Charte constitutionnelle)。这个宪章是法国在 1830 年资产阶级革命后所制定的,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第 436 页。
- 208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 438 页。
- 209 国王郡即奥法里郡 (爱尔兰中部),16 世纪中叶英国侵略者为了纪念女王玛丽·都鐸的丈夫——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采用了这一名称。——第 438 页。

- 210 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1798年爱尔兰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合并自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把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也给剥夺了，并解散了爱尔兰的议会。从19世纪20年代起，取消合并 (Repeal of Union) 的要求成为爱尔兰最得人心的口号。但是，领导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 (奥康奈尔等人) 却只是把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看做是爱尔兰资产阶级从英国政府取得小小让步的一种手段。1835年奥康奈尔和英国的辉格党勾结后，就根本停止了这种鼓动。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爱尔兰的自由派不得不在1840年建立了合并取消派 (合并取消的拥护者) 协会，他们力图使这个协会和英国各统治阶级妥协。——第439页。
- 211 “调停大厅” (《Conciliation-hall》) 是都柏林的公共集会场所。——第442页。
- 212 指1842年5月宪章派向议会递交的全民请愿书；请愿书中除要求通过人民宪章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要求，其中包括要求取消1801年的英爱合并。请愿书未被议会接受。——第442页。
- 213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是1848年2月初在布鲁塞尔用法文发表的，就在同年，由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朋友和学生魏德迈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1885年根据恩格斯的意见，作为“哲学的贫困”的德文第一版的附录刊印，自此以后，就作为该版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止一次地再版过。“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俄译文，于1885年“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以单行本首次发表，译者为普列汉诺夫。1889年在波士顿出版了美国的单行本，上面有恩格斯的序言，这篇序言早先在1888年7月，以“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为题，用德文单独刊载于“新时代” (《Die Neue Zeit》) 杂志。——第444页。
- 214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见本卷注51。——第448页。
- 215 马克思引证了李嘉图著作的法文版：《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l'impôt》.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F.-S. Constantio, avec des notes explicatives et critiques par J.-B. Say. T. I. Paris, 1835. p. 178—179. ——第449页。

216 A. Ure.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 ou Économie industrielle». T. I, Bruxelles, 1836, p. 34. ——第 454 頁。

217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最伟大的綱領性文献。“这虽然是一个薄薄的小册子，但是它的价值却不下于整整的好几卷書；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并推动着文明世界整个有組織的和战斗的无产阶级”（列宁）。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綱領而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最初于 1848 年 2 月在倫敦用共有 23 頁的单行本發表。1848 年 3 月至 7 月，“共产党宣言”又在德国流亡者的民主派机关报“德意志倫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上連載。德文原本也是 1848 年在倫敦再版的，这是一个共有 30 頁的小册子；这次更正了第一版中一些印錯的字，并改进了标点符号。这一原本后来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規定为以后各个經作者同意的版本的基础。1848 年“宣言”同时又被翻譯成許多种欧洲文字（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丹麦文、弗拉曼特文和瑞典文）。在 1848 年的各个版本中未提“宣言”作者的名字。1850 年宪章派的机关刊物“赤色共和党人”（«Red Republican»）登載“宣言”的第一个英文譯文时，該杂志的編輯乔·哈尼在序言中第一次指出作者的名字。

1872 年“宣言”出版了新的德文版，作者作了某些不大的修改，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一篇序言。这一版本以及后来在 1883 年和 1890 年出版的各个版本，都是以“共产主义宣言”为題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俄文譯本是由巴枯宁翻譯的，1869 年在日内瓦出版，他在許多地方歪曲了“宣言”的內容。1882 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普列汉諾夫的譯本消灭了第一个版本中的缺陷。普列汉諾夫的譯本給“宣言”的思想在俄国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在俄国宣传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們特地給这一譯本写了一篇序言。

在馬克思逝世之后，“宣言”出版了許多种曾經由恩格斯校閱过的版本，例如在 1883 年出版了附有恩格斯写的序言的德文版；在 1888 年出版了由賽·穆尔翻譯的英文版，这一版本是由恩格斯校訂过的，并附有恩格斯补写的序言和附注；在 1890 年出版了附有恩格斯写的序言

的德文版。在最后的这一版本中，恩格斯也曾加上了几个附注。1885年，在“社会主义者报”（«Socialiste»）上发表了“宣言”的法文譯文，这是馬克思的女兒劳拉·拉法格翻譯的，并由恩格斯校閱过。恩格斯曾給 1892 年的波兰版“宣言”和 1893 年的意大利版“宣言”分別写过序言。——第 461 頁。

218 恩格斯也曾經把这一个附注加在 1890 年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中去，只是省去了最后的一句話。——第 466 頁。

219 在比較后期的各种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用“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等等比較确切的概念（这是由馬克思开始采用的）分別代替了“劳动价值”和“劳动价格”等等概念（見本卷說明第 XI 頁）。——第 473 頁。

220 法国正統主义者和“青年英国”見本卷注 32。——第 492 頁。

221 改革派 見本卷注 31。——第 502 頁。

222 指比利时資產階級革命（1830 年秋），这次革命使比利时脫离了尼德兰王国，并在比利时建立了以科布尔克王朝为首的資產階級君主立宪。

法国資產階級七月革命以后，瑞士自由主义改革运动也加强了。在許多州中自由派和激进派用自由主义精神修改了地方宪法。——第 505 頁。

223 1831 年 2 月在摩地納、罗曼內（教皇領地东北部）和巴馬，發生了起义，这是由意大利資產階級革命分子在統一意大利、驅逐外国人的口号下發動的。这次起义为奥地利軍隊及意大利各邦政府的反革命武装力量所鎮压。——第 505 頁。

224 指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是極端反动的报纸，1831 年到 1841 年間出版；該报受到王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840 年起即位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保护。——第 505 頁。

- 225 1833年在汉諾威实施的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影响下制定的宪法。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达尔曼积极参加了制定宪法的工作。1837年汉諾威国王依靠反动的地主集团废除了宪法，1840年实行了新法律，使代議机关的权利縮小到最低限度。——第506頁。
- 226 德意志各邦大臣参加的維也納會議，在奥国首相梅特涅和普魯士当权人物的倡議下于1834年召开，會議的目的是采取措施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派和民主运动。會議决定在具有代議机关的德意志各邦内限制代議机关的权利，加强書报检查，对各大学实行更严格的监督，并迫害参加反对派学生組織的分子。——第506頁。
- 227 指省議會代表組成的所謂联合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为討論新刑法草案而于1848年1月召开的。普魯士政府召开这些委员会，是企圖用准备改革的幌子来緩和日益激昂的輿論。委员会的活动因三月初在德国展开的革命發动而中断。——第507頁。
- 228 指1847年4月11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联合省議会的开幕詞中的声明，他說，他是“万世的王位的繼承人，也应该把万世的王位传給自己的繼承者。”——第507頁。
- 229 羅馬諮詢會議或羅馬国家參議院，是羅馬教皇庇护九世在1847年底成立的諮議机构。由自由派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組成。——第508頁。
- 230 皮費拉利（因意大利的吹奏乐器“皮費罗”而得名）是意大利中部亚平宁山坡地带的牧民。
拉察罗尼是那不勒斯王国不务正业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鄙称；拉察罗尼不止一次被保皇派反动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第509頁。
- 231 指1846年至1848年美国 and 墨西哥的战争，这次战争是由于美国的使用奴隶的种植場主和大资产阶级对墨西哥領土的侵略野心所挑起的。这次战争的結果，美国几乎掠夺了墨西哥的一半領土，包括整个得克薩斯、北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及其他地区。

-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后的几年內詳細地研究了美国对墨西哥和美洲大陆其他国家的侵略史。1861年馬克思在“北美內战”一文中把美国統治階級对拉丁美洲各国的政策称作侵略政策，这种政策的真正目的是夺取新地盘来扩大奴隶制和奴隶主的統治权。——第 513 頁。
- 232 美利坚合众国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开凿特万特佩克地峡的运河以連接太平洋和墨西哥灣的計劃，企圖控制中美的商业干道和市場。但是在 19 世紀 70 年代，美国資本家認為还是投資于化費較少的墨西哥鐵路建設較為合算，于是放弃了这个計劃。——第 513 頁。
- 233 摘自海涅的詩歌“騎士奧拉夫”。——第 515 頁。
- 234 指 19 世紀 20 年代初那不勒斯王国和撒丁王国的革命事变和 1821 年 2 月罗曼內的起义（見本卷注 223）。1820 年 7 月在那不勒斯，資產階級革命者烧炭党人为反对专制制度举行了起义，爭得了温和的自由主义宪法。1821 年 3 月撒丁王国（皮蒙特）爆發了起义。領導起义的自由派宣布宪法，企圖利用运动来反对奧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統治，把国家統一在皮蒙特的統治者薩伏依王朝的政权之下。由于神聖同盟列强的干涉，由于奧地利軍隊占領了那不勒斯和皮蒙特，因而这两个国家里又恢复了专制制度。——第 518 頁。
- 235 指 1846 年克拉柯夫起义时期加里西亚农民和波兰小貴族的起义部队的冲突，这次冲突是奧地利当局挑拨起来的。——第 518 頁。
- 236 1847 年 7 月駐意大利的奧地利当局因羅馬国（教皇領地）人民运动的强大而感到不安，把軍隊开到了教皇領地的边境城費拉拉。在羅馬，奧地利人支持企圖废除庇护九世的自由主义改革的那些反动集团。費拉拉的占領在整个意大利激起了强烈的憤怒，使奧地利政府不得不立刻撤軍。——第 518 頁。
- 237 普拉特尔是維也納的一个公园。——第 522 頁。
- 238 “社会辯論报”（《Le Débat Social》）是比利时的一家日报，它是資產階級激进派和民主派的机关报；1844 年至 1849 年在布魯塞尔出版。——第 524 頁。

- 239 “独立报”(«L'Indépendance»)是比利时一家资产阶级日报“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的简称;1831年在布鲁塞尔出版,在19世纪40年代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524页。
- 240 同盟(建立于1841年)和自由协会(建立于1847年)都是比利时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组织。——第525页。
- 241 弗·基佐“罗马帝国崩溃至法国革命期间的欧洲文明通史”(F. Guizot.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 depuis la chute de l'empire romain jusqu'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第一次刊载于弗·基佐“近代史教程”1828年巴黎版(F. Guizot. «Cours d'histoire moderne». Paris, 1828)。——第526页。
- 242 指1847年11月由撒丁国王、教皇和托斯卡纳公爵所缔结的关于召集意大利各邦代表会议来建立关税同盟的协定。建立意大利关税同盟的草案是和意大利大资产阶级想以教皇或萨伏依王朝为首的君主同盟形式“从上面”来统一意大利的意愿相符合的。但是1848—184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事变的进程和1849年反革命的胜利,使这些计划成为泡影。——第528页。
- 243 1848年革命前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的德国居民反对为丹麦和公国制订的统一宪法(宪法草案公布于1848年2月28日)的运动,就其本身的目的而言是分离主义的运动,并没有超出温和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范围。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在德国北部再建立一个小的德意志邦作为反动的普鲁士的仆从国。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形势改变了。在德国革命事变的影响下,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民族运动具有了革命的解放的性质。争取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脱离丹麦的斗争成了德国一切进步力量争取全国范围内民族统一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斗争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坚决的支持。——第531页。
- 244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534页。
- 245 指1847年1月由爱尔兰民族运动中不满奥康奈尔的妥协政策而脱离

- 合并取消派协会的激进派和民主派所創立的爱尔兰同盟。其中大多数人屬於“青年爱尔兰”这一由爱尔兰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于1842年組成的团体。爱尔兰同盟的革命左翼支持人民反对英国統治的起义，并竭力把爱尔兰独立斗争和民主改革的斗争結合起来。爱尔兰爆發的起义被英国当局鎮压以后，爱尔兰同盟就在1848年夏天中止活动。——第537頁。
- 246 “改良报”(《*La Riforma*》)是意大利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报纸，1847年11月至1850年初發行于魯卡。——第542頁。
- 247 指“总匯报”(《*Allgemeine Zeitung*》)，該报出版于雷赫河岸的奥格斯堡。——第542頁。
- 248 阿·福倫是乐譜的作者，歌詞是詩人弗里德里先的作品。——第543頁。
- 249 指热拉尔元帅所制定并于1840年通过的計劃，該計劃規定了政府軍隊在巴黎起义时的布置和行动。——第546頁。
- 250 1848年2月23日基佐政府倒台以后，奥尔良王朝的支持者曾企圖由以摩萊伯爵为首的温和君主主义者奥尔良分子(梯也尔、比約等)組織內閣。但由于巴黎的人民起义获得胜利，这一維護奥尔良君主政体的企圖就破灭了。——第547頁。
- 251 在1848年2月24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資產階級共和派(拉馬丁、杜邦·德·累尔、克萊米約、阿拉戈、馬利和恩格斯提到的两位“国民报”的活动家——馬拉斯特和加尔涅-帕热斯)占了大部分职位。此外，三个“改革报”派代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賴德律-洛兰、弗洛孔、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机械工阿尔伯(本姓馬丁)也参加了政府。很快就看出，“社会主义者部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只是資產階級政府的裝飾品而已。——第548頁。
- 252 指19世紀30年代初法国奥尔良派在比利时問題上的口是心非的立場。这些人暗中策划并吞比利时，同时又鼓动比利时人爭取脫离荷兰。同时，在倫敦五强(英、法、俄、奧、普)會議上，他們牺牲比利时的利益，

- 和支持荷兰的强国勾結在一起。因此，比利时人不得和荷兰国王締結对自己不利的条約（1833年5月最后签署），并割讓一部分領土。——第555頁。
- 253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558頁。
- 254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561頁。
- 255 調节制实施草案是由坎宁的托利党内閣于1827年制定的，經某些修改后于1828年由威灵頓的托利党内閣作为法律实施。——第564頁。
- 256 “反谷物稅通报”（《*The Anti-Bread-Tax Circular*》）是反谷物法同盟的机关刊物，原称“反谷物法通报”（《*The Anti-Corn-Law Circular*》）；1839至1843年在曼徹斯特每两周出版一次。——第565頁。
- 257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积极参加了該章程的起草工作）于1847年6月在同盟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拟定。这个章程經過同盟各支部討論后重新提交第二届代表大会审查，最后于1847年12月8日批准。——第572頁。
- 258 指“民主派兄弟协会”致布魯塞尔民主协会的信。該信發表于1847年12月11日的“北極星报”及1847年12月26日的“德意志—布魯塞尔报”。关于建立各国民主派之間更正规的联系以及准备召开国际民主派代表會議的建議，1847年11月底至12月間“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代表曾經和代表民主协会委员会的馬克思討論过，当时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倫敦。——第578頁。
- 259 1848年1月3日“民主派兄弟协会”告大不列顛和爱尔兰工人書，刊載于1848年1月8日的“北極星报”。当时英国資产階級集团正在宣传沙文主义并放出风声說，似乎法国准备进攻不列顛島，以便使工人階級脫离爭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告工人書在談及英国国防时，揭露了这一阴谋。告工人書中号召工人坚决反击“力圖挑撥工人的阴谋家，这些人制造卑劣的謊言，把不同国家的人說成是‘天生的敌人’”。告工人書中指出，要真正加强英国的防御力量，就应该給英国人民以民主权利和自由。——第579頁。

260 驅逐恩格斯的借口是說他1847年12月31日在巴黎德国革命流亡者新年宴会上發表了演說。很多工人和手工业者出席了这次宴会，恩格斯在他們中間进行了革命宣传，因而使法国当局感到恐慌。1848年1月底，巴黎警察当局借口恩格斯的演說中有反政府性質的政治暗語，而对他进行迫害。同年1月29日，恩格斯接到了要他在二十四小时內离开法国否則就把他解交普魯士警察当局的指令。在恩格斯被驅逐的同时（警察当局夜間曾闖进了恩格斯的住宅），有共产主义者嫌疑的德国工人流亡者也遭到了逮捕。尽管政府报刊大肆进行誣蔑宣传，反对派的报纸还是透露出了恩格斯被驅逐的真正原因。

“巴黎通报”（*«Le Moniteur Parisien»*）是19世紀40年代出版的每日晚报，半官方刊物。——第581頁。

261 德国工人俱乐部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提議于1848年3月8—9日在巴黎建立的。馬克思在这个团体中起了领导作用。建立俱乐部的目的是要团結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流亡者，向他們說明无产階級在资产階級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反对资产階級和小资产階級民主派企圖通过民族主义的宣传引誘工人参加志願軍团攻入德国的冒险計划。俱乐部在組織德国工人个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方面，进行了很多工作。——第589頁。

262 指德国工人俱乐部的章程草案。——第590頁。

263 1848年二月革命后在巴黎建立的“德意志民主协会”的會議都在騎术学校举行。领导这个协会的小资产階級民主主义者海尔維格、伯恩施太德、德克尔等曾鼓动德国流亡者組成志願軍团攻入德国。他們打算用这种方法在德国进行革命，并建立共和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斥責了这种冒险計划。——第591頁。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46年5月—1848年3月)

1846

- 春天** 馬克思和恩格斯領導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爭取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團結各國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先進人物，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準備條件。
- 5月5日** 馬克思寫信給蒲魯東，建議他擔任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駐法通訊員並參加工人運動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的討論。馬克思接到蒲魯東5月17日的回信後確信他同蒲魯東的意見有根本分歧，因而放棄通過蒲魯東和法國工人運動建立聯系的打算。
- 5月11日** 在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會議上通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草擬的反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海·克利蓋的通告。該通告分發給所有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
- 夏天** 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德意志思想體系”各主要章節。在德國由於書報檢查條件以及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代表人物的反對，手稿未能付印。
- 6月15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信給古·阿·克特根，準備在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和烏培河谷的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觀點的擁護者之間建立經常的通訊聯系。
- 7月17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寫“布魯塞爾的德國民主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給菲格斯·奧康瑞爾先生的信”，該文發表於7月25日憲章派報紙“北極星報”。

- 8月1日** 馬克思写信告訴出版商克·弗·列斯凱完成“政治和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一書的計劃。該書后来沒有写完。
- 8月15日** 恩格斯受布魯塞爾共产主义通訊委員會的委托前往巴黎，准备在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工人成員中間宣传共产主义，組織通訊委員會，并同魏特林主义、蒲魯东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
- 8月15日到19日之間** 恩格斯結識了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埃·卡貝。
- 8月19日** 恩格斯寄信給布魯塞爾共产主义通訊委員會，談在巴黎的德国工人运动以及法国社会主义出版物的情况。以后恩格斯經常向委員會报道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發展以及德国工人小組的情况。
- 9月1日左右** 恩格斯写关于法国状况的文章，該文發表于9月5日“北極星报”。
- 9月**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批評蒲魯东的小資產階級观点。
- 10月** 恩格斯在巴黎德国工人的三次集会上批評了蒲魯东的小資產階級空想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的庸俗思想。由于恩格斯的活動，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大多数成員脫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魯东主义。
- 10月中旬左右** 恩格斯研究路·費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質”一書，并記下对費尔巴哈哲学批判的要点。
- 10月20日左右** 布魯塞爾共产主义者拟就第二个反对克利盖的通告，該通告由馬克思簽署。原文沒有保存下来。
- 12月** 巴黎当局派警察暗中監視恩格斯。
- 12月28日** 馬克思写給俄国著作家巴·瓦·安年柯夫，信中批判了他刚刚讀完的蒲魯东的“經濟矛盾的体系，或貧困的

哲学”一書，同时闡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原理。

1847

- 1月—6月15日 馬克思写作“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一書。
- 1月—4月 恩格斯写“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作为“德意志思想体系”第二卷的补充。
- 1月20日 正义者同盟倫敦委员会派代表約·莫尔到布魯塞尔見馬克思，并到巴黎見恩格斯，建議他們加入同盟。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确信同盟领导者願意改組同盟并接受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做为綱領基础之后，就同意参加同盟。
- 2月底 恩格斯写“普魯士宪法”一文。該文發表于3月6日“北極星报”。
- 3月—4月 恩格斯写关于德国制宪問題的著作。
- 4月3日 馬克思写短評駁斥由卡·格律恩煽动起来的“特利尔日报”对他的誣蔑性攻击。該短評發表于4月8日“德意志—布魯塞尔报”和4月9日“特利尔日报”。
- 6月初 恩格斯積極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倫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討論了新的章程。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前同盟的口号：“人人皆兄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代表大会结束后恩格斯返回巴黎。
- 6月26日 恩格斯写“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资产阶级的現狀”。該文發表于7月3日“北極星报”。
- 7月初 馬克思的“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一書出版。
- 7月27日左右 恩格斯从巴黎到布魯塞尔和馬克思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問題。

- 8月5日** 在馬克思的領導下，布魯塞爾成立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支部和區部。馬克思當選為支部主席及區部委員會委員。
- 8月底**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魯塞爾組織德意志工人協會並在協會中宣傳科學共產主義的思想。
- 8月—9月** “威斯特伐里亞汽船”雜誌單獨發表了馬克思寫的“德意志思想體系”中的一章，內容為對格律恩的“法蘭西和比利時的社会運動”一書的批判。
- 9月12日** “德意志—布魯塞爾報”刊載了馬克思的論文“‘萊茵觀察家’的共產主義”和恩格斯的文藝批評“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的開頭一部分。從這時候起馬克思和恩格斯就經常為“德意志—布魯塞爾報”撰稿。在他們的影響下，該報成了宣傳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機關報。
- 9月16日—18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在布魯塞爾召開的國際經濟學家會議。馬克思本來準備發言，可是由於怕他鼓吹革命，會上沒有給他發言的機會。這篇會上沒有發表的演說後來登載於9月29日布魯塞爾“民主工場報”；恩格斯發表於10月9日“北極星報”的“討論自由貿易問題的布魯塞爾會議”一文中也附有這篇演說。
- 9月27日** 恩格斯參加了布魯塞爾民主派的國際宴會。宴會上通過了成立民主協會的決議。
- 10月3、7日** “德意志—布魯塞爾報”刊載了恩格斯的兩篇論戰性的文章，總標題為“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
- 10月中旬** 恩格斯自布魯塞爾返回巴黎，着手建立和鞏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地方組織。他受託從事同盟區部委員會的通信工作。
- 10月下半月** 恩格斯和以“改革報”為中心的法國民主主義者建立了

- 联系。他和該报編輯部約定供給有关英国和德国情况以及宪章运动發展的文章。恩格斯第一次为“改革报”写的一篇关于英国商业危机的文章發表于10月26日，以后他繼續为該报撰稿直至1848年1月止。
- 10月18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倫敦中央委员会建議布魯塞尔区部派代表出席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希望馬克思出席代表大会。
- 10月22日**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會議上尖銳地批評“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莫·赫斯所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綱領草案。委员会委托恩格斯拟定新的綱領草案。
- 10月底** 馬克思写“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論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駁卡尔·海因岑”一文。該文分期發表于10月28日至11月25日“德意志—布魯塞尔报”。
- 10月底—11月** 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的委托为同盟草拟名为“共产主义原理”的綱領草案。
- 11月初** 恩格斯写“法国的改革运动”一文。該文發表于11月20日“北極星报”。
- 11月14日** 恩格斯被同盟巴黎区部选为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 11月15日** 馬克思在布魯塞尔民主协会會議上当选为协会副主席。
- 11月23日—24日** 恩格斯写信給馬克思，建議以宣言形式拟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綱領，并称該綱領为“共产主义宣言”。
- 11月27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分別由布魯塞尔和巴黎前往倫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們在奧斯坦德会面并在那里討論了同盟的綱領問題。

- 11月29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倫敦出席“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紀念1830年波兰起义而举行的国际大会。馬克思把布魯塞爾民主协会的信件交給“民主派兄弟协会”，該信建議在两个組織間建立更密切的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会上發表了关于波兰問題的演說。关于大会的报道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演說載于12月4日“北極星报”、12月5日“改革报”及12月9日“德意志—布魯塞爾报”。
- 11月29日—12月8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積極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經過長時間的热烈討論后，他們的观点为全体代表所接受。大会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宣言形式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綱領，并批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 11月30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倫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會議上發表演說。馬克思在演說中报告了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
- 12月7日** 恩格斯在倫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會議上做了关于經濟問題的報告。
- 12月9日到12月底之間**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閉幕后，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写“共产党宣言”。
- 12月13日左右** 馬克思从倫敦返回布魯塞爾。
- 12月15日左右** 恩格斯写文章批評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說。該文發表于12月18日“北極星报”和12月30日“德意志—布魯塞爾报”(曾經略作修改)。
- 12月17日** 恩格斯从倫敦到布魯塞爾。
- 12月下半年** 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协会做关于雇佣劳动和資本的講演。除了其他准备講演的材料以外，馬克思还拟定了“工資”大綱。

- 12月20日左右 倫敦“民主派兄弟协会”委任恩格斯为駐巴黎代表。
- 12月20日 馬克思在布魯塞尔民主协会大会上报告了倫敦紀念1830年波兰革命大会的情况，并宣讀“民主派兄弟协会”的賀詞。在这次大会上，恩格斯当选为民主协会駐巴黎的代表。
- 12月底 恩格斯离开布魯塞尔前往巴黎。
- 12月31日 馬克思出席布魯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新年宴会。
恩格斯在巴黎德国革命流亡者新年宴会上發表演說。

1848

- 1月9日 馬克思在布魯塞尔民主协会公众大会上發表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大会通过以单行本出版馬克思的演說的決議。这本小册子于1848年2月初問世。
- 1月下旬 馬克思写完“共产党宣言”。手稿于1月底寄往倫敦。
- 1月23日 “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發表了恩格斯的“1847年的运动”一文。
- 1月27日 “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發表了恩格斯的“奥地利末日的开端”一文。
- 1月29日 恩格斯因在巴黎工人中間从事革命活动被法国政府驅逐出境。
- 1月31日 恩格斯到达布魯塞尔。
- 2月 馬克思整理他在布魯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做的关于雇佣劳动和資本的講演准备付印。这些講演一部分以“雇佣劳动和資本”为題發表于1849年4月“新萊茵报”。
- 2月13日 馬克思出席布魯塞尔民主协会的會議。在会上討論了召开国际民主派代表會議的問題，并通过給倫敦“民主

- 派兄弟协会”的回信，信上签名的有馬克思和协会委员会的其他委員。
- 2月20日** 在布魯塞尔民主协会上恩格斯报告了法国政府迫害民主主义者的情况以及他自己被驅逐出巴黎的詳細經過。
- 2月22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魯塞尔民主协会为紀念克拉柯夫起义两周年而举行的大会上發表了演說。他們的演說在1848年3月發表于克拉柯夫起义紀念文集上。
- 2月24日左右** “共产党宣言”在倫敦出版。
- 2月25日—3月初** 馬克思和恩格斯積極参加比利时的共和主义运动，这次运动是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馬克思自己出錢去武装布魯塞尔工人。
- 2月25日—26日** 恩格斯写“巴黎的革命”。該文發表于2月27日“德意志—布魯塞尔报”。
- 2月27日左右** 由于法国爆發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倫敦中央委员会将全权授予馬克思領導的布魯塞尔区部委员会。
- 2月27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布魯塞尔民主协会大会，会上通过決議要求市政当局武装布魯塞尔工人。这次会上同时还通过了每日召开协会例会以及和其他国家的民主主义者建立定期联系的決議。
- 2月28日** 馬克思同布魯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的其他委員签署致“北極星报”編輯和“民主派兄弟协会”書記乔·哈尼書，以及給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賀信。
- 3月1日左右** 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員斐·弗洛孔書面通知馬克思撤销基佐政府对馬克思的驅逐令，并請他返回法国。
- 3月3日** 馬克思收到二十四小时內离开比利时的敕令。
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魯塞尔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同盟的活动中心轉移到巴黎。馬克思受委托在巴黎組織新

- 的中央委员会。
- 3月3日夜** 馬克思准备离开的时候，警察突然闖入住宅，逮捕了馬克思。3月4日燕妮·馬克思也被逮捕。經過十八小时的監禁后，馬克思全家被迫立即离开比利时。
- 3月5日** 馬克思到达巴黎。
恩格斯積極参加抗議比利时迫害馬克思及其他政治流亡者的运动，他写信給“北極星报”編輯部揭露比利时政府的陰謀。恩格斯的信在3月25日發表。
- 3月6日** 馬克思出席了由于法国革命事件而召开的巴黎德国工人大会。
- 3月6日—3月中** 馬克思反对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海尔維格和伯恩施太德等）所提出的冒险計劃，他們主張由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組成武装部队攻入德国，在德国完成革命。与此相反，馬克思的意見是德国工人應該单个地回到德国，参加当地的革命运动。
- 3月8日** “改革报”發表馬克思叙述他被驅逐出布魯塞尔的經過情形的信件。
馬克思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會議，会上通过決議：成立同盟巴黎区部和建立名为德国工人俱乐部的公开的工人組織。会上委托馬克思拟定俱乐部章程草案。
- 3月9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會議通过由馬克思拟定的德国工人俱乐部章程草案。
- 3月11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馬克思当选为委员会主席。在布魯塞尔的恩格斯被缺席选入中央委员会。
- 3月19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倫敦区部委员会寄給在巴黎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共产党宣言”1000册。

人名索引

三 画

万-德-卡斯泰尔(Van de Castele)——利尔厂主,自由貿易派。——第290頁。
 大衛,克利斯提安·格奥尔格·納坦(David, Christian Georg Nathan 1793—1874)——丹麦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政治活動家,自由派。——第277頁。

四 画

巴泰(Bataille)——比利时工人,比利时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585頁。
 巴罗, 奥迪隆 (Barrot, Odilon 1791—1873) ——法国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1848年2月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領袖; 1848年12月—1849年10月領導了保皇派党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內閣。——第31、203、398、402、405—408、420、431、432、436、437、545頁。
 巴兰, 費里克斯 (Ballin, Felix 約生于1802年) ——比利时民主运动的活動家,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585頁。
 巴巴魯, 沙尔·讓 (Barbaroux, Charles Jean 1767—1794) ——18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活動家, 吉倫特分子。——第350頁。
 巴貝夫, 格拉古 (Babeuf, Gracchus 1760—1797) ——真名为弗朗斯瓦·諾埃爾 (François Noël), 法国革命家,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 “平等派”密謀的組織者。——第334、499頁。
 巴斯夏, 弗雷德里克 (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 ——法国庸俗經濟學家, 資本主义的狂热的辯護者。——第278、286頁。
 巴泰尔斯, 茹尔 (Bartels, Jules) ——比利时律師。——第276頁。
 巴泰尔斯, 阿道夫 (Bartels, Adolf) ——比利时小資產階級政論家, 自1844到1846年为“社会辯論报”的編輯。——第416、417頁。
 日果, 菲利浦 (Gigot, Philippe 1820—1860) ——比利时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40年代接近馬克思和恩格斯。——第3、4、24、25、29、552、553、556、571、587頁。
 日拉丹, 艾米尔·德 (Girardin, Emile de 1806—1881) ——法国資產階級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 以政治上毫无原則性而著称; 在1848—1849年革命之前, 对基佐政府采取反对派的立場。——第199—203、394、431頁。
 日拉丹, 亚历山大·德 (Girardin, Alexandre de 1776—1855) ——法国將軍; 艾米尔·德·日拉丹 (Emile de Girardin) 的父亲。——第201頁。
 尤尔, 安得魯 (Ure, Andrew 1778—1857)

- 英国化学家，庸俗經濟学家，自由貿易論者。——第 169—171、454 頁。
- 尤尔特，威廉 (Ewart, William 1798—1869) ——英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自由貿易論者。——第 280、285、286 頁。
- 尤維納利斯，德齐姆斯·尤尼烏斯 (Juvenalis, Decimus Junius 生于 1 世紀 60 年代——死于 127 年后) ——著名的羅馬諷刺詩人。——第 101 頁。
- 比約，奧古斯特·阿道夫·瑪麗 (Billault, Auguste-Adolphe-Marie 1805—1863) ——法国政治活动家，溫和的君主主义奥尔良分子，1851 年后成为波拿巴分子。——第 547 頁。
- 毛勒，格奧尔格·路德維希 (Maurer, Georg Ludwig 1790—1872) ——德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紀的德国社会制度的研究者。——第 466 頁。
- 邓科布，托馬斯·斯令斯比 (Duncombe, Thomas Slingsby 1796—1861) ——英国政治活动家，資產階級激进分子，40 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第 199、429 頁。
- 孔斯坦西奧，弗朗西斯科·索拉諾 (Constancio, Francisco Solano 1772—1846) ——葡萄牙医生，外交家和作家；他曾把英国經濟学家的著作譯成法文。——第 81、90 頁。

五 画

- 弗格森，亚当 (Ferguson, Adam 1723—1816) ——苏格兰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第 161 頁。
- 弗洛孔，斐迪南 (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編輯之一，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員。——第 405—408、430、435、548 頁。
- 弗洛里安，讓·比埃尔 (Florian, Jean-Pierre 1755—1794) ——法国作家和詩人，貴族頹废詩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關於威廉·泰尔的詩篇。——第 386 頁。
- 弗呂貝爾，尤利烏斯 (Fröbel, Julius 1805—1893) ——德国政論家和进步書刊發行人，小資產階級激进分子；1848—1849 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會議的代表，屬於左翼；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第 305 頁。
- 弗兰茨一世 (Franz I 1768—1835) 奥国皇帝 (1792—1835)，1806 年前膺有神圣羅馬帝国皇帝的称号。——第 516、518、521、522 頁。
- 弗雷德里克七世 (Frederick VII 1808—1863) ——丹麦国王 (1848—1863)。——第 531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 (Friedrich-Wilhelm II 1744—1797) ——普魯士国王 (1786—1797)。——第 263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 ——普魯士国王 (1797—1840)。——第 33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 ——普魯士国王 (1840—1861)。——第 21、24、26、33、35、36、39—41、66、67、220、221、348、505—507、512、530 頁。
-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 (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 ——德国詩人，开始活动时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詩人，1848—1849 年为“新萊茵报”編輯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50 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 298 頁。
- 布朗，威廉 (Brown, William 1784—1864)

- 英国商人和銀行家，自由貿易論者。——第 285—287 頁。
- 布雷，約翰·弗兰西斯 (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 ——英国經濟學家，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的信徒，他的職業是印刷工人。——第 110—115、117 頁。
- 布萊特，約翰 (Bright, John 1811—1889) ——英国廠主，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自由貿易論者，反谷物法同盟創立者之一；自 60 年代末起為自由派政黨領袖之一；在自由黨內閣中曾歷任大臣職位。——第 444、511、512 頁。
- 布朗基，阿道夫 (Blanqui, Adolphe 1798—1854) ——法国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經濟學說史家，庸俗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第 94、248、279、281、285 頁。
- 布赫芬克 (Buchfink)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第 588 頁。
- 布萊辛頓，瑪格麗特 (Blessington, Marguerite 1789—1849) ——伯爵夫人，英国自由派女作家。——第 28 頁。
- 布阿吉爾貝爾，比埃爾 (Boisguillebert, Pierre 1646—1714) ——法国經濟學家，重農學派的前驅者，法国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第 108、127 頁。
- 卡諾，拉查爾·尼古拉 (Carnot, Lazare Nicolas 1753—1823) ——法国數學家，政治和軍事活動家，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18 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傾向雅各賓黨人，1794 年參加熱月 9 日的反革命政變。——第 436 頁。
- 卡諾，拉查爾·伊波利特 (Carnot, Lazare-Hippolyte 1801—1888) ——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第 420、436、437 頁。
- 卡爾-奧古斯特 (Karl-August 1757—1828) ——薩克森-魏瑪大公。——第 270 頁。
- 卡貝，埃蒂耶納 (Cabet, Etienne 1788—1856) ——法国政論家，空想的和平共產主義的卓越代表人物，“伊加利亞旅行記”一書的作者。——第 6、47、418、422、502 頁。
- 加萊爾，阿爾芒 (Carrel, Armand 1800—1836) ——法国資產階級政論家，自由派；“國民報”的創始人和編輯之一。——第 200 頁。
- 加爾涅-帕熱斯，路易·安都昂 (Garnier-Pagès, Louis Antoine 1803—1878) ——法国政治活動家，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1848 年為臨時政府委員。——第 420、430、432、433、436、548 頁。
- 加爾涅-帕熱斯，埃蒂耶納·約瑟夫·路易 (Garnier-Pagès, Etienne-Joseph-Louis 1801—1841) ——法国政治活動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30 年革命後領導了共和黨反對派。——第 432 頁。
- 盧梭，讓·雅克 (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 ——杰出的法国啓蒙運動者，民主主義者，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第 348、425 頁。
- 盧格，阿爾諾德 (Ruge, Arnold 1802—1880) ——德国政論家，青年黑格爾分子，資產階級激進分子；1848 年為法蘭克福國民會議代表，屬於左翼，1866 年後成為民族自由主義者。——第 209、298、299、308、310、350、353 頁。
- 盧克萊茨，梯特·卡爾 (Lucretius, Titus Carus 約公元前 99—55) ——杰出的

- 羅馬哲学家和詩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論者。——第 144 頁。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溫和的托利党人，曾任首相(1841—1846)，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第 506、526、565、568 頁。
- 皮卡尔，阿尔伯(Picard, Albert)——比利时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布魯塞爾民主协会会员。——第 580 頁。
- 包林，約翰(Bowring, John 1792—1872)——英国政治活动家，語言学家和文学家，边沁的信徒，自由貿易論者；50 年代他是在远东实施英国殖民政策的高級官員。——第 279、285、286、289—291、404、444、448、450、453—455 頁。
- 边沁，耶利米(Bentham, Jeremy 1748—1832)——英国資產階級社会学家，功利主义理論家。——第 279 頁。
- 丘迪，艾吉迪烏斯(Tschudi, Agidius 1505—1572)——瑞士的年代志作者和反动的政治活动家，宗教改革的敌人，代表瑞士归州的宗法貴族集团的利益。——第 386 頁。
- 汉澤曼，大衛(Hansemann, David 1790—1864)——大資本家，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1848 年 3 月至 9 月任普魯士的財政大臣，实施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 347、348 頁。
- 白尔尼，路德維希(Börne, Ludwig 1786—1837)——德国政論家和批評家，激进的小資產階級反对派的卓越代表人物之一；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第 8、257、275 頁。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罗斯皇帝(1825—1855)。——第 530 頁。

六 画

- 达希(Dassy)——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布魯塞爾民主协会会员。——第 553 頁。
- 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Dahlmann, Friedrich Christoph 1785—1860)——德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派。——第 209、505 頁。
- 达来朗-貝里戈爾，沙尔·莫里斯(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1754—1838)——公爵，著名的法国外交家，外交大臣(1797—1799、1799—1807、1814—1815)，出席維也納會議(1814—1815)的法国代表；以政治上毫无原則性和自私自利著称。——第 516 頁。
- 达兰貝爾，讓(D'Alembert, Jean 1717—1783)——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18 世紀資產階級啓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第 425 頁。
- 列列韦尔，約阿希姆(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 年波兰起义参加者，波兰流亡民主派領袖之一。——第 539、585 頁。
- 列奥波特一世(Leopold I 1790—1865)——比利时国王(1831—1865)。——第 556、558、559 頁。
- 列奥波特二世(Leopold II 1797—1870)——托斯卡納的大公(1824—1859)。——第 508 頁。
- 艾迪森，約瑟夫(Addison, Joseph 1672—1719)——英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英国資產階級啓蒙学派的先驱者之一。——第 248 頁。
- 艾希霍恩，約翰·阿尔勃萊希特·弗里德里希(Eichhorn, 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1856)——普魯士国

- 家活动家，曾任普魯士宗教、教育、医务大臣（1840—1848）。——第209、220頁。
- 艾德門茲，托馬斯·婁 (Edmonds, Thomas Rowe 1803—1889)——英国經濟學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曾利用李嘉圖的理論來論證社会主义。——第110頁。
- 西尼耳，納騷·威廉 (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英国庸俗經濟學家，工人运动的凶惡敵人。——第127、342頁。
- 西哀士，艾曼紐爾·約瑟夫 (Sieyès, Emmanuel Joseph 1748—1836)——法国神甫，18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活动家，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第17頁。
- 西斯蒙第，讓·沙尔·列奧納爾·西蒙·德 (Sismondi, 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經濟學家，批評資本主义的小資產階級批評家。——第81、107、109、161、494頁。
- 米歇洛 (Michelot)——法国民主主义者，“民主派兄弟协会”會員。——第413頁。
- 米拉波，奧諾萊·加布里埃爾 (Mirabeau, Honore Gabriel 1749—1791)——18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卓越活动家，大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貴族的利益的代表者。——第348頁。
- 伊茨施太因，約翰·亞當 (Itzstein, Johann Adam 1775—1855)——德国政治活动家，巴登邦議會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領袖之一。——第265頁。
- 伊夫兰特，奧古斯特·威廉 (Iffland, August Wilhelm 1759—1814)——德国演員和戏剧活动家，著有美化德国反动制度和充滿小市民道德的剧本。——第241頁。
- 乔治·桑 (George Sand 1804—1876)——著名的法国女作家，著有长篇社会小說多种，浪漫主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第198頁。
- 安德森，亞當 (Anderson, Adam 約1692—1765)——苏格兰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貿易史的著者。——第83頁。
- 迈因茨，卡尔·古斯塔夫 (Maynz, Karl Gustav 1812—1882) 德国法律學家，布魯塞爾大学教授，布魯塞爾民主协会会员。——第585頁。
- 伏尔泰，弗朗斯瓦·瑪麗 (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論哲學家，諷刺作家，历史學家，18世紀資產階級啓蒙运动的卓越代表人物，曾經为反对专制政体和天主教而斗争。——第122、181、425頁。
- 托尔瓦德森，倍尔特尔 (Thorvaldsen, Bertel 1768—1844)——著名的丹麦雕刻家。——第391頁。

七 画

- 杜馬，讓·巴蒂斯特 (Dumas, Jean-Baptiste 1800—1884)——法国化学家。——第247頁。
- 杜邦·德·累尔，雅克·沙尔 (Dupont de l'Eure, Jacques-Charles 1767—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派，18世紀末資產階級革命和1830年革命的参加者；40年代接近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1848年为临时政府主席。——第548頁。
- 杜沙多 (Duchateau)——法国工业家，保护关税政策的拥护者。——第280、286頁。

- 杜沙特尔,沙尔(Duchâtel, Charles 1803—1867)——法国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内务大臣(1839—1840,1840—1848年2月)。——第30、199—206、228、545、556頁。
- 杜韦尔瑞·德·奥兰,普罗斯比尔(Duvergier de Hauranne, Prosper 1798—1881)——法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第432頁。
- 杜諾瓦耶,沙尔(Dunoyer, Charles 1786—1862)——法国庸俗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第103、280、281、285頁。
- 杜厄斯堡,弗兰茨(Duesberg, Franz 1793—1872)——普魯士反动的国家活动家,1846年到1848年三月革命期間为財政大臣。——第216、217頁。
- 克利盖,海耳曼(Kriege, Hermann 1820—1850)——德国記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40年代后半期在紐約領導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集团。——第1、6—20頁。
- 克特根,古斯达夫·阿道夫(Köttgen, Gustav Adolf 1805—1882)——德国画家和詩人,在40年代时曾参加工人运动,他的观点接近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第23、24頁。
- 克罗茨,阿那卡雪斯(Cloots, Anacharsis 1755—1794)——18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活动家,接近左翼雅各宾党人;革命前是普魯士的男爵。——第417頁。
- 克莱斯特,亨利希(Kleist, Heinrich 1777—1811)——德国詩人和剧作家,反动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第234頁。
- 克洛普什托克,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勃(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 1724—1803)——德国詩人,德国資產階級啓蒙运动的初期代表人物之一。——第253頁。
- 克里斯提安八世(Christian VIII 1786—1848)——丹麦国王(1839—1848)。——第531頁。
- 沃尔弗,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德国无产階級革命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卓越活动家,1848—1849年为“新萊茵报”編輯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50、553、571頁。
- 沃尔弗,斐迪南(Wolf, Ferdinand)——德国政論家,1846年为布魯塞爾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委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48—1849年为“新萊茵报”編輯之一;1848—1849年革命后从德国逃亡出来,后来脱离了政治活动。——第3、4、24、25頁。
- 沃尔波尔,罗伯特(Walpole, Robert 1676—1745)——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領袖,曾任首相(1721—1742),創立了不受国王支配而依靠議會多数的內閣制度;他广泛地使用了賄賂手段。——第290頁。
- 沃洛夫斯基,路易〔路德維克〕(Wolowski, Louis〔Ludwig〕 1810—1876)——法国庸俗經濟学家和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原籍波兰。——第278、280、285、286、290、291頁。
- 李嘉圖,大衛(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經濟学家,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最聞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第79、81、89—94、97、99、106、110、125、126、132、138、156、181—186、294、295、342、352、449、455頁。
- 李比希,尤斯圖斯(Liebig, Justus 1803—

- 1873) ——杰出的德国学者, 农业化学的奠基人之一。——第 247 頁。
- 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 (List, Friedrich 1789—1846) ——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策。——第 282、283、292、337 頁。
- 麦克亚当 (MacAdam) ——爱尔兰亚麻改良协会工作者, 自由贸易论者。——第 290 頁。
- 麦格雷格, 菲利浦 (MacGrath, Philip) ——宪章运动的活动家, 19 世纪 40 年代为国民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第 379 頁。
- 麦克库洛赫, 约翰·雷姆赛 (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 248 頁。
- 贝朗热, 比埃尔·让 (Béranger, Pierre Jean 1780—1857) ——法国最著名的民主主义大诗人, 政治讽刺文的作者。——第 585 頁。
- 狄更斯, 查理 (Dickens, Charles 1812—1870) ——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28 頁。
- 狄德罗, 德尼 (Diderot, Denis 1713—1784) ——法国杰出的哲学家, 机械唯物论的代表人物, 无神论者, 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 启蒙运动者, 百科全书派领袖。——第 425 頁。
- 里廷豪森, 摩里茨 (Rittinghausen, Moritz 1814—1890) ——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撰稿, 第一国际委员, 后来成为(1884年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 278、279、286、291 頁。
- 坎宁, 乔治 (Canning, George 1770—1827)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1807—1809, 1822—1827)、首相(1827)。——第 564 頁。
-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 271 頁。
- 沙佩尔, 卡尔 (Schapper, Karl 约 1812—1870)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0 年共产主义同盟分裂时期为“左”倾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 1856 年重又和马克思接近;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 413—415、428、577、588—591 頁。
- 吕敏尼, 玛丽·伊波利特 (Rumigny, Marie-Hippolyte 1784—1871) ——侯爵, 法国外交家。——第 549 頁。
-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8) ——罗马教皇(1846—1878)。——第 506、508、509、529 頁。
- 劳克利弗, 威廉 (Rowcliffe, William) ——英国激进主义者, 19 世纪 40 年代靠近宪章派。——第 317 頁。
- 希尔迪奇, 理查德 (Hilditch, Richard) ——19 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第 187 頁。
- 邦纳罗蒂, 菲利浦 (Buonarroti, Filippo 1761—1837) ——意大利革命家,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法国革命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 巴贝夫的战友。——第 334 頁。
- 忒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阿费尔) (Publius Terentius Afer 公元前约 185—159) ——著名的罗马剧作家。——第 322 頁。
- 亨利希七十二世·罗伊斯-罗宾斯坦-艾

貝斯道弗(Heinrich LXXII Reuß-Lo-benstein-Ebersdorf 1797—1853)——德意志一小邦弟系罗伊斯的大公(1822—1848)。——第 355 頁。

八 画

阿尔伯(Albert)(真名是亚历山大·馬丁 Alexandre Martin 1815—1895)——法国工人,七月王朝时期曾参加秘密革命团体,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員。——第 548 頁。

阿拉尔(Allard)——法国民主主义者。——第 559 頁。

阿諾特,約翰(Arnott, John)——宪章运动的活动家。——第 413 頁。

阿貝尔,米歇尔·比埃尔·阿列克西斯(Hébert, Michel-Pierre-Alexis 1799—1887)——法国法律学家和保守派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分子,曾任司法大臣(1847—1848 年 2 月)。——第 204, 545 頁。

阿拉戈,埃蒂耶納(Arago, Etienne 1803—1892)——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民主主义者;1848 年为邮政总管,属于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第 408 頁。

阿特金森,威廉(Atkinson, William)——19 世紀 30—50 年代的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反对者,保护关税論者。——第 108, 109 頁。

阿斯海尔,卡尔·威廉(Asher, Karl Wilhelm 1798—1864)——德国资产阶级法律学家和经济学家。——第 290 頁。

阿尔古尔,弗朗斯瓦·欧仁·加布里埃尔(Harcourt, François-Eugène Gabriel 1786—1865)——公爵,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自由党人,貿易自由的拥

护者。——第 291 頁。

阿凱斯戴克(Ackersdyck)——荷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290 頁。

阿比貝尔克,約翰·泰奥多尔(Abyberg, Johann Theodor 1795—1869)——瑞士政治活动家,瑞士什維茲州的保守党領袖。——第 386 頁。

阿里欧斯托,洛多維科(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大詩人。——第 337 頁。

拉·薩格拉,拉蒙·德(La Sagra, Ramon de 1798—1871)——西班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自由派。——第 285 頁。

拉利-特朗达尔,特罗菲姆·热拉尔(Lally-Tollendal, Trophime-Gérard 1751—1830)——法国政治活动家,18 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属于温和的保皇派,即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貴族的代表。——第 348 頁。

拉比奧(Labiaux)——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布魯塞爾民主协会会员。——第 585 頁。

拉菲特,雅克(Laffitte, Jacques 1767—1844)——法国大銀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分子,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第 30, 227, 228 頁。

拉薩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論家和律師,倾向于工人运动,是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的奠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魯士的霸权下“自上”来統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內創立了反对派。——第 95 頁。

拉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詩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40 年代为自由派,温和

- 的資產階級共和派領袖之一，1848年任外交部長，是臨時政府實際上的首腦。——第381—384、418、419、548頁。
- 拉梅耐，費里西德 (Lamannais, Felicité 1782—1854) ——法國神甫，政論家，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思想家之一。——第8、18頁。
- 羅西，佩勒格里諾 (Rossi, Pellegrino 1787—1848) ——意大利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法律學家和政治活動家，庸俗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他在法國居住很久。——第94、178頁。
- 羅巴克，約翰·阿瑟 (Roebuck, John Arthur 1801—1879) ——英國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資產階級激進分子。——第199頁。
- 羅日埃，沙爾·拉圖爾 (Rogier, Charles-Latour 1800—1885) ——比利時資產階級國家活動家，溫和的自由派；1847—1852年任內務大臣。——第555、558、559頁。
- 羅德戴爾，詹姆斯 (Lauderdale, James 1759—1839) ——伯爵，英國政治活動家和經濟學家；從庸俗政治經濟學的立場批判了亞當·斯密的理論。——第81、92、132頁。
- 波蒙·德·拉·蓬尼尼埃爾，古斯塔夫 (Beaumont de la Bonninière, Gustave 1802—1866) ——法國資產階級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溫和的自由派；1848—1851年為資產階級共和黨人。——第398、402頁。
- 波爾恩，斯蒂凡 (Born, Stephan 1824—1898) ——真名為西蒙·布特爾米爾希 (Simon Buttermilch)，德國排字工人，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在德國1848—1849年革命時期，他是德國工人運動中最早的改良主義代表人物之一；革命後脫離了工人運動。——第315、355、588、589、591頁。
- 波旁王朝 (Bourbons) ——法國王朝名 (1589—1792, 1814—1815 和 1815—1830)。——第391頁。
- 居利希，古斯塔夫 (Gulich, Gustav 1791—1847) ——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保護關稅的擁護者。——第282、283頁。
- 居阿斯科，德 (Guasco, de) ——比利時民主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參加者，他的職業是木匠。——第553頁。
- 居比耶爾，阿梅德·路易 (Cubières, Amédée Louis 1786—1853) ——法國將軍和國家活動家，奧爾良分子；1839和1840年為陸軍大臣，1847年因貪污受賄及參與投機勾當被降級。——第199、200頁。
- 杰克逊，查理·托馬斯 (Jackson, Charles Thomas 1805—1880) ——美國醫生和化學家，他把乙醚用作麻醉劑。——第258頁。
- 杰弗逊，托馬斯 (Jefferson, Thomas 1743—1826) ——美國政治活動家和作家，資產階級啓蒙運動的卓越代表，在北美殖民地的獨立戰爭中為美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集團的思想家，美國總統 (1801—1809)。——第338頁。
- 杰罗尔德，道格拉斯·威廉 (Jerrold, Douglas William 1803—1857) ——英國資產階級幽默作家和劇作家。——第28頁。
- 帕爾尼，埃瓦里斯特·德吉烈 (Parny, Evariste Désiré 1753—1814) ——子爵，法國詩人。——第274頁。
- 帕麥斯頓，亨利·約翰 (Palmerston, Hen-

- ry John 1784—1865) ——英国国家活动家, 开始活动时是托利党人, 1830年起为辉格党的领袖之一, 依靠的是该党最反动的分子, 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 1835—1841 和 1846—1851), 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317、430、531 頁。
- 弥勒, 約翰(Müller, Johann 1752—1809) ——德国历史学家, 著有世界史和瑞士史, 代表保守的市民集团的观点。——第 386 頁。
- 欧文, 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 ——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500、502 頁。
- 佩列林, 讓(Pellering, Jean 1817—1877) ——比利时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 他的职业是靴匠。——第 585 頁。
- 奈尔斯, 海澤凱(Niles, Hezekiah 1777—1839) ——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 “奈尔斯氏每周纪事”杂志的出版者。——第 336 頁。
- 法拉第, 迈克尔(Faraday, Michael 1791—1867) ——著名的英国学者, 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第 247 頁。
- 門采尔, 沃尔弗干格(Menzel, Wolfgang 1798—1873) ——德国反动作家和文学批评家, 民族主义者。——第 257、275 頁。
- 舍夫茨别利, 安东尼(Shaftesbury, Anthony 1671—1713) ——伯爵, 英国道德论哲学家, 自然神的卓越的代表人物; 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第 425 頁。
- 舍尔比利埃, 安都昂·埃利澤(Cherbuliez, Antoine Elisée 1797—1869) ——瑞士经济学家, 西斯蒙第的信徒, 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的理论的要素结合在一起。——第 187 頁。

九 画

- 哈林, 哈罗(Harring, Harro 1798—1870) ——德国作家, 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第 14、16、19 頁。
- 哈維, 威廉(Harvey, William 1578—1657) ——英国著名的医生, 科学生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发现了血液循环系统。——第 177 頁。
- 哈尼, 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 ——英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宪章运动左派领袖之一; “北極星报”的編輯; 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第 317、380、414、428、429、582 頁。
- 哈斯基森, 威廉(Huskinson, William 1770—1830)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貿易大臣(1823—1827), 主张在经济上向工业资产阶级让步。——第 194、564 頁。
- 哈克斯特豪森, 奧古斯特(Haxthausen, August 1792—1866) ——普魯士官員和作家, 写过一本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公社制度残余的著作, 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农奴主反动分子。——第 466 頁。
- 查理-阿尔伯特(Charles-Albert 1798—1849) ——撒丁国王(1831—1849)。——第 508、529 頁。
- 查克斯(Sax)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第 591 頁。
-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 ——英国国王(1625—1649), 在 17 世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221 頁。

查理二世 (Charles II 1630—1685)——英国国王 (1660—1685)。——第 191 頁。

查理十世 (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 (1824—1830)。——第 390 頁。

科布頓, 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厂主, 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論者, 反谷物法同盟的發起人之一。——第 527 頁。

科貝特, 威廉 (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小資產階級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为爭取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了斗争。——第 376 頁。

科采布, 奥古斯特 (Kotzebue, August 1761—1819)——德国反动的作家和政論家。——第 241 頁。

科克勒, 切列斯提諾·瑪麗亞 (Cocle, Celestino Mary 1783—1857)——意大利神学家和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的接受懺悔的牧师。——第 529 頁。

科布尔克——見列奥波特一世。

施蒂納, 麦克斯 (Stirner, Max 1806—1856)——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德国哲学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 43、298、313 頁。

施托尔希, 安得列·卡洛維奇 (亨利希) (1766—1835)——俄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 統計学家和历史学家, 彼得堡科学院委員, 政治經濟学古典学派的模仿者。——第 85 頁。

施勒格尔, 奥古斯特·威廉 (Schlegel, August Wilhelm 1767—1845)——德国詩人, 翻譯家和文学史家, 反动的浪

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324 頁。

施泰因根斯, 祖伊特倍尔特·亨利希·海爾曼 (Steingens, Suitbert Heinrich Hermann 約生于 1817 年)——布魯塞爾德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他的职业是画匠。——第 587 頁。

威尔逊 (Wilson)——英国宪章运动的参加者。——第 414 頁。

威尔逊, 詹姆斯 (W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論者, “經濟学家”杂志的创办人和編輯。——第 285、286、291 頁。

威斯特华倫, 埃德加尔·馮 (Westphalen, Edgar von 生于 1819 年)——燕妮·馬克思的弟弟, 1846 年参加布魯塞爾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第 3、4 頁。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和历史学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活动家, 站在同資產階級妥协的立場上。——第 402、408、423—426、503、548 頁。

勃多, 尼古拉 (Baudeau, Nicolas 1730—1792)——法国神甫, 經濟学家, 重农学派拥护者。——第 139 頁。

韦克利, 托馬斯 (Wakley, Thomas 1795—1862)——英国医生和政治活动家, 資產階級激进分子。——第 438 頁。

韦尔凯尔, 卡尔·泰奥多尔 (W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德国法律家, 自由主义政論家,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會議的議員, 属于右派。——第 265 頁。

昂利, 約瑟夫 (Henry, Joseph 約生于 1795 年)——法国企业主; 1846 年 7 月

- 曾謀刺路易-菲力浦；被判終身苦役。
——第 30 頁。
- 拜比吉, 查理 (Babbage, Charles 1792—1871) ——英国数学家和机械专家,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第 168 頁。
- 若特兰, 律西安·列奧波特 (Jottrand, Lucien-Léopold 1804—1877) ——比利时法律家和政論家, 40 年代为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布魯塞爾民主协会的主席。——第 552、553、556、580 頁。
- 柯尔培尔, 讓·巴蒂斯特 (Colbert, Jean-Baptiste 1619—1683) ——法国国家活动家, 財政督察长 (1665—1683), 实际上他領導了法国的内外政策; 奉行有利于巩固君主专制制度的重商主义政策。——第 175 頁。

十 画

- 馬利, 亚历山大 (Marie, Alexandre 1795—1870)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派, 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 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員。——第 397、407 頁。
- 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傳記材料)。
- 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14—1881) (父姓为馮·威斯特华倫 Von Westphalen) ——卡尔·馬克思的妻子, 馬克思的忠实的朋友和助手。——第 552、553、556、557 頁。
- 馬魯埃, 比埃尔·維克多 (Malouet, Pierre Victor 1740—1814) ——法国政治活动家, 18 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屬于溫和的保皇派, 即大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貴族的代表。——第 348 頁。
- 馬布利, 加布里埃尔 (Mably, Gabriel 1709—1785) ——卓越的法国社会学家,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348 頁。
- 馬拉斯特, 阿尔芒 (Marrast, Armand 1801—1852) ——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領袖之一, “国民报”編輯; 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員和巴黎市长。——第 548 頁。
- 馬尔薩斯, 托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 ——英国牧师, 反动的經濟學家, 資產階級化的地主貴族的思想家, 資本主义制度的辯护人, 宣传仇視人类的人口論。——第 295 頁。
- 海涅·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 ——伟大的德国革命詩人。——第 236、314、515 頁。
- 海爾曼 (Hermann)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第 588、589 頁。
- 海爾堡, 路易 (Heilberg, Louis) (生于 1818 年) ——德国新聞記者, 布魯塞爾的政治流亡者, 1846 年为布魯塞爾共产主义通訊委員會委員。——第 3、4 頁。
- 海因岑, 卡尔 (Heinzen, Karl 1809—1880) ——德国激进派理論家, 小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第 297—315、322—334、337—342、343—356 頁。
- 格律恩, 卡尔 (Grün, Karl 1817—1887) ——德国小資產階級政論家, 在 40 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 42—45、244—275、307、308、354、498 頁。
- 格萊格, 威廉·萊斯本 (Greg, William Rathbone 1809—1881) ——英国工业家和政論家, 自由貿易論者。——第 446—448、457 頁。
- 格萊安, 詹姆士·罗伯特·乔治 (Graham,

-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 ——英国的国家活动家，皮尔派(溫和的托利党人)，1841—1846年为皮尔內閣的内务大臣。——第199、204頁。
- 席林(Schilling)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第588頁。
- 席勒，弗里德里希(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 ——伟大的德国作家。——第236、253、256、386、389頁。
- 泰勒，瓦特(Tyler, Wat 死于1381年) ——1831年英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領袖。——第301頁。
- 泰克斯，科尔奈利斯·安奈·登(Tex, Cornelis Anne den 1795—1854) ——荷兰资产阶级法律学家，他还研究了政治經濟学的問題。——第290頁。
- 庫伯，托馬斯(Cooper, Thomas 1759—1840) ——美国学者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經濟学的卓越代表人物。——第128、336頁。
- 庫伯，托馬斯(Cooper, Thomas 1805—1892) ——英国詩人和記者，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40年代初参加宪章运动；后来成为基督教的传教士。——第28頁。
- 恩格勒(Engler)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第588頁。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传记材料)。
- 讓·保尔(Jean Paul) ——約翰·保尔·弗里德里希·李希特尔(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 1763—1825)的笔名，德国小资产阶级諷刺作家。——第326頁。
- 配第，威廉(Petty, William 1623—1687) ——杰出的英国經濟学家和統計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經濟学的始祖。——第191頁。
- 索澤，讓·比埃尔(Sauzet, Jean-Pierre 1800—1876) ——法国律师和保守的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分子，众議院議長(1839—1848年2月)。——第228頁。
- 埃普斯，約翰(Epps, John 1805—1869) ——英国医生和社会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第378—380頁。
- 納尔逊，霍雷修(Nelson, Horatio 1758—1805) ——英国海軍上将，卓越的海軍統帥。——第390頁。
- 热拉尔，埃蒂耶納·莫里斯(Gérard Etienne-Maurice 1773—1852) ——法国元帅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分子。——第546頁。
- 特德斯科，維克多(Tedesco, Victor 1821—1897) ——比利时律师，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的参加者，1847—1848年接近馬克思和恩格斯。——第414、553頁。
-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 ——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52、53、145、250、257、508、516、521、523、535、537頁。
- 倍克，卡尔(Beck, Karl 1817—1879) ——德国小资产阶级詩人，40年代中叶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第223—243頁。

十一画

- 畢舍，菲利浦(Buchez, Philippe 1796—1865)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249、262頁。

- 康潘 (Campan)——波尔多貿易局委員，貿易自由拥护者。——第 280 頁。
- 康德，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1804)——杰出的德国哲学家，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創始人。——第 162、256 頁。
- 康培，約阿希姆·亨利希 (Campe, Joachim Heinrich 1746—1818)——德国資產階級作家，教育家和語言學家，著有兒童和少年讀物。——第 350、351 頁。
- 康普豪森，卢道夫 (Camphausen, Ludolph 1803—1890)——德国銀行家，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1848 年 3—6 月任普魯士首相，奉行与反动派妥協的叛賣政策。——第 347、348 頁。
- 勒維烈，烏尔本·讓·約瑟夫 (Leverrier, Urbain Jean Joseph 1811—1877)——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第 258 頁。
- 梅利奈，弗朗斯瓦 (Mellinet, François 1768—1852)——比利时將軍，原籍法国；1830 年比利时資產階級革命和比利时民主运动的積極參加者，布魯塞爾民主協會的名譽主席。——第 585 頁。
- 梅特涅，克雷門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公爵，奧地利國家活動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狂熱的反動分子，神聖同盟的組織者之一。——第 465、505、516、521、522、529、530、537、559、560 頁。
- 梅勒迪斯，威廉·莫里斯 (Meredith, William Morris 1799—1873)——美国資產階級法律學家和國家活動家。——第 336 頁。
- 莫尔，托馬斯 (More, Thomas 1478—1535)——英国政治活動家，曾任上院議長，人道主義作家，空想共產主義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烏托邦”一書的作者。——第 250 頁。
- 莫尔，約瑟夫 (Moll, Joseph 1812—1849)——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動家，职业是鐘表匠；正義者同盟的領導者之一，共產主義者中央委員會委員，1848—1849 年革命的參加者，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牺牲。——第 589 頁。
- 盖斯納，薩洛蒙 (Geßner, Salomon 1730—1788)——瑞士詩人和藝術家，脱离实际生活的田園詩的代表人物。——第 329 頁。
- 盖尔溫努斯，格奧尔格·哥特弗利德 (Gervinus, Georg Gottfried 1805—1871)——德国資產階級历史學家，自由派。——第 209 頁。
- 基恩，查理 (Keen, Charles)——宪章运动的參加者，“民主派兄弟協會”的領導人之一。——第 414、428 頁。
-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爾·吉約姆 (Gu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學家和國家活動家，1840 年至 1848 年間實際上操縱了法国的內政和外交，他所代表的是大金融資產階級的利益。——第 30、199—201、204、206、431—433、465、506、526、535、545—547 頁。
- 勒·阿尔迪·德·博利約，讓·沙爾·瑪麗·約瑟夫 (Le Hardy de Beaulieu, Jean-Charles Marie Joseph 1816—1871)——比利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自由貿易的拥护者。——第 276、527 頁。
- 勒蒙特，比埃爾·愛德華 (Lemontey, Pierre Edouard 1762—1826)——法

- 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接近立法會議(1791—1792)的反革命右翼。——第160、161、171頁。
- 荷馬(Homerus)——傳說中的古希臘敘事詩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第324—326頁。
- 悉尼，艾爾杰楠(Sydney, Algernon 1622—1683)——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17世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复辟时期輝格党反对派領袖之一，君主立宪制度的拥护者。——第425頁。
- 密爾頓，約翰(Milton, John 1608—1674)——杰出的英国詩人和政論家，17世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共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425頁。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曾任总理(1836—1840)及共和国总统(1871—1873)，屠杀巴黎公社起义者的劊子手。——第31、206、406、408、431、432、437頁。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246、323—325、338頁。
- 斯圖亚特，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第179、180頁。
- 斯皮特霍恩，沙尔·路易(Spilthoon, Charles Louis 1804—1872)——比利时律师，民主运动的卓越活动家，1830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根特民主协会主席。——第585頁。
- 斯特尔比茨基(Sterbitzki)——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588、589頁。
- 費舍，弗·(Fisher, F.)——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586頁。
- 費奈迭，雅科布(Venedey, Jacob 1805—1871)——德国激进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會議議員，屬左翼；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第298、588頁。
- 費德尔，維克多(Faidier, Victor)——比利时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276—278頁。
- 費爾巴哈，路德維希(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43、245、253、255、298、299頁。
- 湯普遜，威廉(Thompson, William 約1785—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利用李嘉圖的理論來論證社会主义；欧文的信徒。——第110頁。
- 湯普遜，托馬斯·培倫涅特(Thompson, Thomas Perronet 1783—1869)——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庸俗的經濟学家，自由貿易論者。——第280、285、286、404頁。
- 博納德，路易·加布里埃尔·昂勃魯阿茲(Bonald, Louis Gabriel Ambroise

十二画

-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經濟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第79、88—91、99、121、156、160、161、167、170、179、294、343、352頁。
- 斯特芬斯，亨利克(Steffens, Henrik 1773—1845)——德国自然科学家，謝林派哲学家和作家，原籍挪威；著有描写挪威生活的小說。——第390頁。

1754—184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君主主义者,复辟时期的貴族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之一。——第 536 頁。

博林布罗克,亨利 (Bolingbroke, Henry 1678—1751)——英国自然神論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領袖之一。——第 425 頁。

菲尔希隆,讓·克劳德 (Fulchiron, Jean Claude 1774—1859)——法国大資本家和保守的政治活动家,金融貴族的利益的積極維護者。——第 394 頁。

菲力浦一世 (Philippe I 約 1052—1108)——法国国王 (1060—1108)。——第 122、123 頁。

斐迪南一世 (Ferdinand I 1793—1875)——奧地利皇帝 (1835—1848)。——第 519、542 頁。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1810—1859)——那不勒斯国王 (1830—1859)。——第 391、508、529 頁。

凱德,傑克 (Cade, Jack 死于 1450 年)——1450 年英国农民和手工业者在英国南部举行反封建起义时的領袖。——第 301 頁。

琼斯,厄內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階級詩人和政論家,宪章派左翼領袖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380、413、428 頁。

隆格,約翰奈斯 (Ronge, Johannes 1813—1887)——德国牧师,利用天主教来为德国资产階級服务的“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發起人之一。——第 241 頁。

萊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伟大的德国作家,批評家和哲学家, 18

世紀卓越的啓蒙运动者之一。——第 253、254 頁。

傅立叶,沙尔 (Fourier, 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253、500、502 頁。

雅科比,約翰 (Jacoby, Johann 1805—1877)——德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 年为普魯士国民會議中的左翼領袖之一, 70 年代接近社会民主党。——第 304 頁。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最大的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極全面地發展了唯心主义的辯証法。——第 138、139、141—143、145—146、148、250、252、253、255、264、271、298、328 頁。

富尔德,阿希尔 (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銀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分子,后为波拿巴分子, 1849—1867 年曾数次担任财政部长之职。——第 30、394 頁。

普萊費尔 (Playfair 1818—1898)——英国化学家。——第 247 頁。

十三画

奧迪 (Hody)——布魯塞尔暗探局局长。——第 558、559 頁。

奧康奈尔,丹尼尔 (O'Connell, Daniel 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階級的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派的領袖。——第 438—441、537 頁。

奧康奈尔,約翰 (O'Connell, John 1810—1858)——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派,丹尼尔·奧康奈尔的儿子。——第 438、439 頁。

奧康奈尔,摩爾根 (O'Connell, Morgan

- 1804—1885)。——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反对为取消1801年英爱合并而进行斗争，丹尼尔·奥康奈尔的儿子。——第438頁。
- 奥康奈尔，莫里斯 (O'Connell, Maurice 死于1853年)——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派，丹尼尔·奥康奈尔的儿子。——第438頁。
- 奥康瑙尔，菲格斯 (O'Connor, Feargus 1794—1855)——宪章运动左翼领袖之一，“北極星报”的创办人和編輯，1848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27—29、317、375—380、427、428、439—443、579頁。
- 奥克辛本，約翰·烏尔利希 (Ochsenbein, Johann Ulrich 1811—1890)——瑞士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1847年内战时期的瑞士激进派和自由派的领袖之一，联邦政府的首脑 (1847—1848)。——第521頁。
- 奥尔良公爵 (Orleans)——即路易-菲力浦 (Louis Philippe)。
- 奥博尔斯基，路德維克 (Oborski, Ludwig 1787—1873)——倫敦的波兰政治流亡者，“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第414頁。
- 奥倫治公爵威廉三世 (William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 (1672—1702)，英国国王 (1689—1702)。——第558、559頁。
- 路易-菲力浦 (Louis 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 (1830—1848)。——第31、32、206、228、229、395—398、406—408、426、430、431、516、547頁。
- 路易十一 (Louis XI 1423—1483)——法国国王 (1461—1483)。——第424、426頁。
-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 (1643—1715)。——第127、271頁。
- 路易十五 (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 (1715—1774)。——第138、206頁。
- 路易十六 (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 (1774—1792)，18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219、221、348、390頁。
- 路特希尔德，沙尔 (Rothschild, Charles 1788—1855)——路特希尔德銀行的代表之一。——第522頁。
- 路特希尔德，索洛蒙 (Rothschild, Solomon 1774—1855)——維也納路特希尔德銀行行长。——第520、530頁。
- 路特希尔德，詹姆斯 (Rothschild, James 1792—1868)——巴黎路特希尔德銀行行长。——第30—32、206、394頁。
- 路特希尔德家族 (Rothschild)——金融世家，在欧洲各国拥有許多銀行。——第223—233頁。
- 路德維希一世 (Ludwig I 1786—1868)——巴伐利亚国王 (1825—1828)。——第224、235、254頁。
- 聖西門，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500頁。
- 戴勒尔，塞巴斯提安 (Seiler, Sebastian)——德国政論家，1846年为布魯塞爾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委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第3、4頁。

十四画

維特，楊·德 (Witt, Johann de 1625—

1672)——尼德兰国家活动家,荷兰地区的真正統治者(1653—1672),大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第290頁。

維尔特,格奥尔格(We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詩人和政論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編輯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25、277、287—291頁。

維兰特,克利斯托夫·馬丁(Wieland, Christoph Martin 1733—1813)——资产阶级啓蒙运动时期的德国作家。——第253頁。

維尔紐夫-巴尔热蒙,讓·保尔·阿尔班(Villeneuve-Bargemont Jean-Paul-Alban 1784—1850)——子爵,法国反动的政治活动家和經濟学家,封建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153頁。

赫斯,莫澤斯(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論家,在40年代中期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第253頁。

赫格尔,威廉(Höger, Wilhelm)——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第589頁。

歌德,約翰·沃尔弗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244、247、248、251—276、327頁。

魁奈,弗朗斯瓦(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法国大經濟学家,重农学派的創始人,他的职业是医生。——第138、139、455頁。

福倫,奧古斯特·阿道夫·路德維希(Follen, August-Adolf-Ludwig 1794—1855)——德国政論家和詩人,曾参加反对拿破侖法国的战争,1815年后参加反政府的学生运动。——第543

頁。

福格尔(Vogel)——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第589頁。

福格勒(Vogeler)——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第588頁。

蒲魯东,比埃尔·約瑟夫(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論家,庸俗的經濟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創始人之一。——第8、42—44、71、75—91、92—108、110、115、118—153、158—165、167—170、172—183、185—194、258、268、313、498頁。

十五画

德·梅斯特尔,約瑟夫(De Maistre, Joseph 1753—1821)——法国作家,君主主义者,貴族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之一,18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死敌。——第536頁。

德尔,欧仁(Daire, Eugène 1798—1847)——法国經濟学家,政治經濟学著作的出版者。——第108、127頁。

德尔·卡烈托,弗兰切斯科·薩韋里奧(Del Carretto, Francesco Saverio 約1777—1861)——意大利反动的政治活动家,那不勒斯王国的警務大臣(1831—1848年1月)。——第529頁。

德克尔(Decker)——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588頁。

德薩米,德奧多(Dèzamy, Theodore 1803—1850)——法国政論家,空想共产主义革命派的卓越代表人物。——第8頁。

德魯安·德·路易斯,爱德华(Drouyn de Lhuys, Edouard 1805—1881)——法国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温和的君

主義者奧爾良分子；1851年後為波拿巴分子；外交部長（1848—1849、1851、1852—1855、1862—1866）。——第398頁。

德羅茲，弗朗斯瓦·克薩維埃·約瑟夫（Droz, François-Xavier-Joseph 1773—1851）——法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第94頁。

德若爾日，弗雷德里克（Degeorge, Frédéric 1797—1854）——法國資產階級政論家，溫和的共和主義者。——第420頁。

德朗格爾，克勞德·阿爾丰斯（Delangle, Claude-Alphonse 1797—1869）——法國法律學家和反動的政治活動家；1847年到1848年二月革命期間為總檢查長。——第422頁。

摩萊，路易·馬蒂約（Molé, Louis Mathieu 1781—1855）——伯爵，法國國家活動家，奧爾良分子，總理（1836—1837、1837—1839），1848—1851年為保守的君主主義的“秩序黨”領袖之一。——第206、547頁。

摩爾斯，阿瑟（Morse, Arthur）——英國自由貿易論者。——第446、447、457頁。

摩爾根，路易斯·亨利（Morgan, Louis Henry 1818—1881）——傑出的美國學者，人種學家，考古學家和原始社會史作者，自發的唯物主義者。——第466頁。

圖克，托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接近古典學派；他批評了李嘉圖的貨幣論。——第127頁。

賴德律-洛蘭，亞歷山大·奧古斯特（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

—1874）——法國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領袖之一，“改革報”編輯，1848年為臨時政府委員。——第405—408、430、434、436、437、503、548頁。

黎塞留，阿爾芒·讓（Richelieu, Armand Jean 1585—1642）——法國專制制度時期最著名的國家活動家，紅衣主教。——第424頁。

十六 画

霍普，喬治（Hope, George 1811—1876）——英國農場主，主張保護貿易自由。——第446、457頁。

霍布斯，托馬斯（Hobbes, Thomas 1588—1679）——傑出的英國哲學家，機械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他的社會政治觀點具有鮮明的反民主的傾向。——第220頁。

霍布豪斯，約翰·凱姆（Hobhouse, John Cam 1786—1869）——英國政治活動家，自由黨人。——第27頁。

霍爾巴赫，保爾·亨利希（Holbach, Paul Heinrich 1723—1789）——傑出的法國哲學家，機械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無神論者，法國革命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之一。——第246、250、252頁。

霍爾奈（Horne）——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第589頁。

霍吉斯金，托馬斯（Hodgskin, Thomas 1787—1869）——英國經濟學家和政論家，他以空想社會主義的立場捍衛無產階級的利益和批判資本主義，利用李嘉圖的理論來論證社會主義。——第110頁。

鮑威爾，布魯諾（Bauer, Bruno 1809—1882）——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最著

名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分子，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43页。

鮑威尔，亨利希 (Bauer, Heinrich)——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他的职业是鞋匠；1851年流亡澳洲。——第588、589页。

諾克斯，約翰 (Noakes, John)——英国激进主义政論家。——第316页。

十七画

穆勒，詹姆斯 (Mill, James 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圖理論的庸俗化者；在哲学上是边沁的追随者。——第187页。

穆勒，約翰·斯圖亚特 (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論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繼承者。——第127页。

穆尼哀，讓·約瑟夫 (Mounier, Jean-Joseph 1758—1806)——法国政治活动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属于温和的保皇派，即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代表。——第348页。

穆尔納，托馬斯 (Murner, Thomas 1475

—1537)——德国諷刺作家和神学家，他反对宗教改革，被路德主义的拥护者称为“笨蛋传教士”。——第323页。

謝里敦，理查·布林斯利 (Sheridan, Richard Brinsley 1751—1816)——英国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輝格党激进派的代表人物。——第199页。

十八画

薩伊，讓·巴蒂斯特 (Say, Jean 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81、89、99、125、126、160、294页。

薩伊，奧拉斯 (Say, Horace 1794—1860)——法国庸俗经济学家。——第285页。

薩德勒，迈克尔·托馬斯 (Sadler, Michael Thomas 1780—1835)——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博爱主义者，接近托利党。——第128、129页。

魏特林，威廉 (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萌芽时期的卓越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論家之一，他的职业是裁縫。——第3页。

期刊索引

二 画

- “人民杂志”(*The People's Journal*)——倫敦出版。——第28頁。
 “人民論壇报”(*Der Volks-Tribun*)——紐約出版。——第3—5、7—12、14、16、17、18、20頁。

三 画

- “工場。工人自編的劳动階級机关刊物”(*L'Atelier, organe spécial de la classe laborieuse, rédigé par des ouvriers exclusivement*)——巴黎出版。——第319、321頁。

四 画

- “公益报”(*Le Bien Public*)——馬康出版。——第384、419頁。
 “巴黎通报”(*Le Moniteur Parisien*)——第581頁。
 “反谷物稅通报”(*The Anti-Bread-Tax Circular*)——曼徹斯特出版。——第565頁。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布魯塞爾出版。——第524頁。

五 画

- “世紀报”(*Le Siècle*)——巴黎出版。——第227、398、406、407、431頁。
 “北極星报”(*The Northern Star*)——倫敦

出版。——第22、26、28、29、32、33、39、41、206、296、316、317、321、375、376、380、381、384、395、402、408、413—415、417、423、424、427、428、437、441、549、554、580、582頁。

“布魯塞爾报”(*Journal de Bruxelles*)——第417頁。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巴黎出版。——第398、406、431頁。

六 画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倫敦出版。——第33、320、376頁。

“同盟。自由貿易主义的喉舌和全国反谷物法同盟的机关报”(*The League. The Exponent of the Principles of Free Trade, and the Organ of the National Anti-Corn-Law League*)——倫敦出版。——第386頁。

七 画

“时代”(*L'Époque*)——巴黎出版。——第202頁。

“改革报”(*La Réforme*)——巴黎出版。——第31、33、47、318、377、380、382、383、396、400、404、405—408、415、420—422、429、430、432—436、437、440、503、547、555、557、560、585頁。

“改良报”(*La Riforma*)——魯卡出版。

——第 542—544 頁。

“每周快訊”(The Weekly Dispatch)——
倫敦出版。——第 376 頁。

“君主同盟報”(L'Union monarchique)——
巴黎出版。——第 419 頁。

“勞埃德氏倫敦新聞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第 376 頁。

八 画

“國民報”(Le National)——巴黎出版。
——第 31、33、200、395、396、400、405、
407、408、420—422、430、432、434、436、
437、548 頁。

“非國教徒”(Nonconformist)——倫敦出
版。——第 376 頁。

“奈爾斯氏每周紀事”(Niles' Weekly Re-
gister)——巴爾的摩出版。——第 336
頁。

“法蘭克福學術通報”(Frankfurter Gelehr-
te Anzeigen)——第 261 頁。

“社會辯論報，民主派機關刊物”(Le Dé-
bat Social, organe de la démocratie)——
布魯塞爾出版。——第 524—527、583
頁。

九 画

“星報”(Star)——即“北極星報”。

“總匯報”(Allgemeine Zeitung)——奧格
斯堡出版。——第 352、415、542 頁。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
chenblatt)——第 505 頁。

“威斯特伐里亞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帕德波恩出版。——
第 43 頁。

“政治和文學辯論日報”(Journal des Dé-
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巴黎
出版。——第 33、395、415、430、431、

535 頁。

十 画

“紀事”(Register)——即“奈爾斯氏每周
紀事”。

“泰晤士報”(The Times)——倫敦出版。
——第 33、288、415 頁。

“特利爾日報”(Trier'sche Zeitung)——第
42、45、213、307 頁。

十一 画

“曼徹斯特衛報”(The Manchester Guar-
dian)——第 286、320 頁。

“曼徹斯特觀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
——第 376 頁。

十二 画

“萊茵觀察家”(Rheinischer Beobachter)
——科倫出版。——第 207、208、210—
216、221 頁。

“萊比錫總匯報”(Leipziger Allgemeine
Zeitung)——第 225 頁。

“萊茵—摩塞爾日報”(Rhein-und Mosel-
Zeitung)——科布倫茨出版。——第 42
頁。

“萊茵社會改革年鑒”(Rheinische Jahrbü-
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
達姆斯塔德出版。——第 251 頁。

“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
werbe)——科倫出版。——第 42 頁。

十三 画

“新聞報”(La Presse)——巴黎出版。——
第 200、202、319、320、431 頁。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倫敦出
版。——第 285 頁。

十五画

“德法年鑒”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巴黎出版。——第44、94、251、252、346頁。

“德意志電訊”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漢堡出版。——第568頁。

“德意志—布魯塞爾報” (*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第37、45、69、207、222、275、281、297、305、315、323、326、330、333、337、348、355、356、393、412、415、

417、419、422、426、443、515、523、527、533、544、548、550、581頁。

十六画

“諾定昂信使報” (*Nottingham Mercury*)——第376頁。

二十一画

“辯論日報” (*Débats*)——即“政治和文學辯論日報”。

譯 后 記

本書是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并参照有关的原文翻譯的。其中“共产党宣言”一文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譯文的基础上校訂的，由唯真同志最后定稿，并請朱文叔先生从中文上提过修辭意見。“哲学的貧困”一文在譯校过程中曾参考了何思敬同志的譯本(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

参加本書翻譯工作的有馮世熹、王燕华、湯鈺卿、张文煥、任田升、朱中龙、张植芳、沈渊等同志。譯文最后由樊以楠等同志校訂。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